



Raymond Aron

# Mémoires

*édition intégrale inédite*

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

## 雷蒙·阿隆回忆录

【上】

增订本

〔法〕雷蒙·阿隆 著

杨祖功 王甦 译

增订本

# Raymond Aron

# Mémoires 雷蒙·阿隆回忆录

*édition intégrale inédite*

【上】

【法】雷蒙·阿隆 著

杨祖功 王甦 译





## 出版说明

《雷蒙·阿隆回忆录》的简体中文版于1992年首次出版，并于2006年再版，两个版本依据的都是Julliard出版社1983年的版本。1983年法文版的出版者因嫌书稿过于“臃肿”删掉了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这三章。Robert Laffont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增订本”，收录了初版中删去的三章。读者眼前的这本书正是对应这一法文版的中文“增订本”。中文版“增订本”由杨祖功先生对原译文做了文字上的修订完善，王甦女士翻译了新收录的三章内容。

雷蒙·阿隆是20世纪法国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他的回忆录有助于读者理解偏重现实主义的这位思想家的思想特质及生活细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阿隆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有偏见的，这种偏见也体现在他的回忆录中。我们并不认同书中的有关论断，但为了让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阿隆的思想，我们对于相关内容不做删减，也请读者在阅读时予以甄别。

以上种种，敬请读者了解。我们期盼读者的批评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7月

# 序言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 的时代

尼古拉·巴弗雷\*

雷蒙·阿隆的一生及他的著作都与 20 世纪历史相交织。他 1 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1905 年，卒于 1983 年，这一年，以“欧洲导弹危机”为终极标志的冷战正愈演愈烈，六年后，苏联帝国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垮台。阿隆在 1930 年确定思考计划时所依赖的基础是他对尼采预言的“以意识形态名义开展大型战争”时代的种种理解。当时的他在德国居住过一段时间，魏玛共和国的没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后的他也从未偏离过这一思考计划：“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思考 20 世纪，并尝试阐明现代社会的所有领域：经济、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政治体制、国家间关系和意识形态论争。”<sup>①</sup>

尽管阿隆无法亲眼见证 1989 年发生的结局，他的《回忆录》依然是对 20 世纪历史的最好介绍。在这本书中，阿隆不但对自己作为学者进行了分析——为了以哲学、历史、社会学和战略的观点进行交叉分析，他从学科间传统藩篱中解放了出来——而且还对自己作为一位自由战士的介入参与，进行了批判性评价和严格慎独的双重把关。民族和帝国之间、民主和极权之间的殊死斗争由一页页书稿编织而出。第一次

---

\* Nicolas Baverez, 法国当代史学家、经济评论员。——编者注

① Raymond Aron, *Le Spectateur engagé*, Paris, Julliard, 1981, pp. 299 - 300.



2 世界大战标志着自由欧洲的文明的自我毁灭，大战让思想真空的豁口大开，各种关于阶级和种族的意识形态纷纷乘虚涌入，而这些意识形态又都将内战和对外战争当成统治的原则。与此同时，随着产业的倒闭、失业、赤字和债务而来的大型经济危机，自由国家的根基被动摇。然而，历史从来就不是预先写就或早已确定了的；是人民在决定历史。最后迎来的会是暴力还是和平，是自由还是压迫，这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智慧、意愿和勇气。尽管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尽管他们依然四分五裂，但就三次世界战争而言——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由1989年天鹅绒革命和平完成的——最后依然是民主战胜了帝国和极权制。

但是，《回忆录》是否会因此而只属于过去呢？它揭示的是否仅仅是一个时期的真相以及一个已然过时的知识分子——即便他十分独特且具有重大影响？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合理的，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一个试图以最为实际的方式阐明历史诞生的人物及其思想。而且我们不得不指出，21世纪的格局和历史进程与阿隆那本遗作——《本世纪的最后这些年》<sup>①</sup>描述的情景大相径庭。在那本书中，阿隆讨论了苏维埃主义的未來和民族主权的位置，并以此得出了国际体系中两极世界具有稳定性和国家至上的结论。

苏维埃帝国在1989年崩塌；民主制虽不再受到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但依然因为宗教、种族或民族认同在与大规模恐怖主义的联合中重新复兴而受到威胁。世俗宗教的瓦解让修会宗教和政治神学恢复了地位。随着以2001年9月11日袭击为

---

<sup>①</sup> Raymond Aron, *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siècle*, Paris, Julliard, 1984.

开端的一连串冲突的发生，昔日的冷战重新演变成热战。一个传统维度和多个不对称的方面交织于这些冲突中，而且冲突还侵入了诸如太空或网络空间这些新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运载工具的扩散，核威慑已经被架空。在服务和技术的发展面前，在不同领土和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竞争面前，工业社会日益消失。在那场差点导致汇率和国际收支崩溃的大危机来临之前，全球化通过让政治自由与资本主义脱钩，就已经将一种普世维度赋予了资本主义。这一变化首先导致的是经济调控方式的一次新转变，公共干预的强力回归和以二十国集团为中心的全球性治理的崛起便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这一变化还导致了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偏移。美中共治因此替代了20世纪后半叶由美国、欧洲、日本组织并稳定世界市场的三足鼎立之局面。

因此，21世纪呈现为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它是以充满变数且不稳定的多极格局为特征的。在这个新局面中，一切似乎都与阿隆毕生研究的那种20世纪的刚硬且稳定的两极结构截然相反。然而，这一表象并非事实。阿隆为了成为意识形态时代的分析家和阐释者，一向坚决拒绝决定论，也从来不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就是历史的终点。自1960年开始，他就已经在以“普世史之黎明”——“普世史之黎明”可以理解为一个经历着相同的唯一历史的人类社会的诞生<sup>①</sup>——为主题的讲座中勾画了我们时代的原则。确切而言，全球化建

---

① Raymond Aron, « L'Aube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 conférence donnée à Londres le 18 février 1960 sous l'égide de la Société des amis de l'Université hébraïque de Jérusalem et publiée dans *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 Paris, Plon, 1961, pp. 260 - 295.



立有一种紧张关系上，一边是市场统一和技术进步带来的世界—社会的崛起，另一边则是身份诉求的加剧和暴力的激进化。正是这种对人类自由、历史消逝和认知局限的强烈意识，让阿隆的思想在 21 世纪的冲突与危机面前反倒具有了现代性。如果想从他的《回忆录》中找出一种学说、一个预言或一个被揭示的真相，那只会是徒劳无功的。在这本书中，我们能找到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和一种公民的情操，这让我们得以理解那些让历史加速的关键时刻，让我们选择投入自由事业之中。同样，如果把《回忆录》当成一部叙述民主如何战胜极权主义且让自身得以存续的教材来读，也不会有什么收益。与此正相反，它给我们上了一堂自由主义应用课，展现了在各种危机、战争和革命还在继续编织人类历史纷乱经纬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是如何应对这些危机、战争和革命的。

## “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

“历史，再度面临重大的转折”，这是阿隆喜欢引用的汤因比的说法，它提醒我们，历史既非线性的也不具有连续性。构成现代世界的各种动力——民主运动、资本主义、民族和帝国、战争——都不具备永恒不变的要素。它们都是历史现象，是变化不息的。对这些历史的转向时刻加以解释并从中得出教益，这极其重要，却也十分困难。实际上，这些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势力等级的改变，它们也是在对各种价值、思考模式和人类生活的管理制度重新提出质疑。

阿隆的独创性在于他将反思与行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符

合他曾在《历史哲学导论》<sup>①</sup>这篇论文中探索研究过的人类历史命运——让·卡瓦耶斯（Jean Cavailles）曾强调，正是这篇论文将历史哲学引入了法国哲学史中。这也解释了为何阿隆会对20世纪节奏性发生的大动荡有超前而且准确的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隆还是一名少年。当时的他完全赞同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但在德国逗留时，他目睹了魏玛共和国的没落，明白了纳粹主义的性质及其危险，从而成了第一批站在埃利·哈莱维（Elie Halévy）一边的人，且早在1930年代后半期，他就开始将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做比较。1939年，他响应号召到伦敦，并于1940年6月加入了自由法国。从1945年起，他阐述了必然导致世界两极化的苏联极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性质，随后又分析了冷战——其所有内容都可以表  
5  
达为“无法实现的和平，不大可能的战争”——并像教师一样为世人讲解了核威慑带来的战略革命。<sup>②</sup>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欧洲殖民帝国的解体，这让阿隆成了第一批赞同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人。<sup>③</sup>而且他在反抗极权主义、捍卫自由方面的积极努力没有妨碍他分析斯大林去世后苏维埃政体的演变，也没有妨碍他设想作为后冷战世界关键事件的意识形态之争的终结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最后，他还在经济方面捍卫了战后市场经济——从管制封闭的生产体系的重新开放到共同市场的建设，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进。

---

① Raymond Aron, *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Essai sur les limites de l'objectivité historique*, Paris, Gallimard, coll. «Bibliothèque des idées», 1938.

② Raymond Aron, *Le Grand Schisme*, Paris, Gallimard, 1948; Id., *Les Guerres en chaîne*, Paris, Gallimard, 1951.

③ Raymond Aron, *La Tragédie algérienne*, Paris, Plon, 1957.



毫无疑问，自雷蒙·阿隆辞世以来，历史加速发展，出人意料的事件层出不穷。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了苏维埃帝国意想不到的骤然倾覆，而且这一切还是在和平情况下发生的。拆除柏林墙并非一个军事决定，而是一个政治和精神的决定。这一决定的产生更多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功劳，而是因为被东方势力奴役的人民发动了起义，他们一方面反抗谎言和恐怖的联手，另一方面还反抗着变得无法自我革新、只能靠武力维持统治的腐朽的苏维埃体系。而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则标志着大规模恐怖主义的来临，使宗教被重新推向历史的最前沿，还为新一轮的尚武好战打响了起跑枪。世界资本主义不断制造出泡沫和破产，直到发生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珍珠港事件”：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这差点儿导致了一场范围和强度都超过1930年代的世界性通货紧缩。

6 全球化处于这些事件的中心。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9年：在这关键的一年中，阿富汗被苏联入侵，约翰·保罗二世当选教皇，这两个事件会对将来苏联解体起关键作用；邓小平发起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标志着穆斯林觉醒且导致了神权政治复兴的伊朗革命发生了；保罗·沃尔克领导下的美联储也在这一年推动货币政策的转向；撒切尔夫人在这一年成为首相，她为一种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调控标准开辟了道路。影响并塑造21世纪的重大因素在1970年代末现出端倪：一为资本主义世界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二为民族主义及在种族或宗教上的认同感对（旧有）意识形态的报复，三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追赶。只是即便到了苏联解体时，这些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既未在知识层面上被

理解，也未在政治层面上受到关注。

人们曾提出过对冷战之后的世界的两种解释。一种是弗朗西斯·福山推崇的乌托邦，它是一种与市场民主的全球崛起相连的历史结局，却在双子塔的废墟中化为了灰烬。另一种是萨缪尔·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预言，他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同亚洲专制政权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形成的同盟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文明冲突。事实证明亨廷顿与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不过鉴于亨廷顿的观点有助于让美国新保守主义这条歧路合理化，它又比弗朗西斯·福山的观点更加危险。自1970年代后半期以来，新保守主义让美国势力在战略和经济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削弱，由超级大国的假定所衍生的战略泡沫的破灭便是例证——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都陷入了困境。认为银行和市场理应自我监管，这让房地产和信贷产生了经济泡沫，这类泡沫的破裂又是另一例证。

与1945年发生的事情相反，民主国家领导人在1989年后便仅满足于发放和平的虚假红利，并对世界和资本主义放任自流，且不再试图为21世纪设想原则、制度和规则。这是一种对冷战后体系与世界资本主义思考和构建的双重失败，2000年以来发生的战争、危机和冲突都直接源于这种失败。那些关于历史终极样貌的梦想，不论它们是以市场民主还是以欧洲式的永久和平为标志，不论它们是以新保守主义的过度滋长还是以对两极性加以延续的其他方式——诸如反恐战争或反对邪恶轴心的战争——为标志，都同样源自对全球化时代的不理解。

雷蒙·阿隆的思想遗产能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世界的这种巨大转变。历史决定论之所以荒谬，是因为它否定了人的自



由：历史既没有方向也没有目的；它完全取决于人，人既能够不断推动历史，使之朝向同属一个人类，甚至同属一个星球的归属感方向发展，又或让暴力在获得科技帮助而威力倍增的同时向极端升级。基于同样的原因，简单的想法——尽管它们的诱人之处也是它们的力量所在——会经常显露出错误和危险来：无论是力求和解的模式还是撒旦模式，无论是悲观模式还是乐观模式，一旦考虑到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过渡时期所具有的复杂性、消解性和不确定性，这些模式就会统统失败。最后还有一点，出现于历史断裂时期的新问题是不能用过去的概念或以往的解决办法加以思考和对的。简言之，21世纪的人必须在全球化本身所具的独特性中去思考全球化，这样才能在其中谋划行动，而不能将20世纪的甚至19世纪的种种类型或战略运用到全球化进程中。

美国已经无法再单独预见或操纵多极世界的风险与压力，中国抑或软弱无力的联合国多边主义也同样无法做到——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便为此提供了一个残酷的新例证。同样，以前还可以用欧文·费雪在1933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6年建立的原则——通过拯救银行、以公共开支来维持经济活力和支持就业、控制保护主义的影响力——来对抗通货紧缩和阻止经济衰退，但世界资本主义在走出危机这一阶段所面临的问题却已无法运用这些原则来解决了。如何协调依然属于各国自身权限的经济政策的规范化？如何调节金融领域、稳定  
8 汇率市场并重新平衡世界收支？如何减少商业、金融业和货币市场中的不均衡现象？如何让合适的全球性风险的治理方式浮出水面——不论这些风险是金融的还是工业的，是环境的还是气候的，抑或鉴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和网络世界的

扩大而是地缘政治的？既然就调控和监督而言，拥有特别强大的专制势力的发展中国家让资本主义从政治自由和开放竞争中解脱出来，那么民主国家如何才能应对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挑战？

## 全球化的辩证逻辑

21 世纪的开端是以世界局势和民主状况的重新定义为标志的。试图将阿隆为了理解冷战两极秩序及工业社会而构建的概念类别应用到这一全新环境的做法是无用的。本·拉登既非列宁也非希特勒；即便只对宗教激进主义的宗教性质和其源自西方之外这两点加以考虑，也能明白宗教激进主义是不能与 20 世纪的那些意识形态混同的；与处于美苏关系核心位置的核力量均衡相比，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与非殖民化引起的冲突有着更多相似点；处于开放经济核心的系统性风险和通货紧缩风险与凯恩斯的增长机制正好相反——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一起上升，增值价值的分配方案不利于资本增长——这让利润和投资也受到了阻滞。

阿隆用以分析 20 世纪历史的那种概念和思想脉络受到了启蒙思想和德国历史哲学的影响。公民化国家支配一国的内部生活，而丛林体系则超越国家继续支配了国际关系，地缘政治学就是以二者的区分为基础的；国家不但是公民享有和平的保障者，也是面对外部危险时国家主权的捍卫者。我们就此可以认为存在某种三元结构，纵横交织其中的三元分别是：国际体系——民主制和极权制之间、民族和帝国之间的殊死斗争支配着它；国家——政治和文化身份的载体，各国之间为了自身势力的增长而相互对抗；社会——它受到了工业社会自身紧张关

系及参与者从政治权威下日渐解放这一事实的影响。民族国家自17世纪以来就作为政治形式存在，且孵化发展出了民主公民制度、市场经济和社会联系等要素，在这一格局中，民族国家成为地缘政治格局及其内涵的关键因素。20世纪是西方自17世纪就主宰自己命运的历史的延伸。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民主制的畸枝，世界冲突则是由支配力扩张至全球规模的西方所开展的内战的畸枝。

全球化标志着与具有这种政治思想的世界的根本决裂。随着法外之地和完全处于国家控制之外的灰色地带的倍增，随着移民流控制中种种困难的出现，各种原始形态又重新进入各国内部，连最富裕的国家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国际公民身份的萌芽迹象也大大增加。就区域层次而言，欧盟便是例证，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市场和自由而非以武力、征服和支配为基础达成的一个大陆的一体化。就世界范围而言，全球化政治治理的孕育便是例证，从二十国集团及其金融稳定委员会，到世界贸易组织及其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再到关于气候的艰难协商，都是其体现。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处于竞争的环境中；各个国家受到了位于自己实力之上及之下的其他国家的挤压，已经无法再在行使合法暴力和操控国家关系上实施垄断；一种以社会信息网为基础的全球性公共舆论也间或被调动，伊朗人对抗毛拉政权的暴动便是例证。在这种竞争中，由于将发展放在绝对优先位置的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追赶——正如人们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指出的，这些国家为了发展甚至不惜损害环境——加之经济和金融危机已让西方在资本主义调控的合法性上破产，西方因此失去了平衡。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但它的这种强大不是一

种绝对的强大，而是相对的；欧洲则因为各国对货币、预算、税收、社会和环境的各种规定形成了敌视生产和革新的环境，而被困于经济增长低迷和大规模失业的境遇中；日本因为20年的通货紧缩而无法前进，已经不再是世界第二大国，它在亚洲反倒受了新兴势力——中国在经济上的赶超和在政治上的排挤。

全球化危机让世界资本主义向东方和南方加速倾斜。自此，新兴世界占据了工业生产的52%，而不再是20年前的30%，它还持有80%的世界外汇储备。亚洲创造了世界财富的21%，并拥有32%的世界资本，而美国和欧洲所占比例分别才到30%和20%。与19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相反，现在是欧洲集中承受了2008年信贷崩溃带来的压力。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反映的是一个大陆的衰落及为其一体化所掩盖的适应全球化新局面上的失败。欧洲大陆的人口持续减少，据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欧洲人口还会减少五千多万；这也是一个过度负债且缺乏竞争力的大陆，这点体现为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0%锐减到了15%，而且自2000年起，它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从28%减少到了22%。尤为重要的是，自希腊危机发生后，欧洲显露了它在处理内外打击上的无能，这与美国或中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上的卓有成效形成了鲜明对比。金融和货币上的各种压力并没有强化欧盟的制度，也没有迫使它实现经济政策上的协调或是对具有连带性的预算政策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所鼓励，因此这些压力不但没有再次促进欧陆的一体化进程，反而导致了各国转向本国战略，普遍采用了紧缩性财政政策——就连那些贸易顺差的国家也不例外——而对这种政策的普遍采用又对欧洲经济复苏构成了严重

威胁。这些问题除了关系到欧元的存续，还对欧洲独立以及欧洲在 21 世纪世界中的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柏林墙的倒塌摧毁了东西藩篱，全球化取消了南北藩篱，但也消解了美国和欧洲因资本主义垄断权而取得的红利。曾主导过世界经济 20 个世纪之久——最近这两个世纪除外——的亚洲强势回归世界舞台，拉丁美洲和非洲也紧随其后；特别是非洲因其充满活力的人口因素（2050 年将有 18 亿人）、丰富的原材料（能源和可耕地资源储备）、正在崛起的企业家阶层、带来了每年 6% 的增长的大陆资本主义而成了一个发展的新天地。

与 1990 年代人们抱有的天下无国界的幻想相反，国家远远没有消失，正如我们在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大国谋求强大的战略以及在这些国家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所发挥的重要角色中见到的一样。不过，21 世纪的格局由于更多参与者之间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而明显愈加复杂。当今国家体系是多极的，其中不光混杂了为了争夺领导权而相互对立的两个超级势力——美国和中国，还包括了各个次级极点——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欧洲和南非（如果它能够成功逃脱与津巴布韦相似的变故的话），那些拒绝服从国际社会的国家——比如伊朗、委内瑞拉或朝鲜，最后还有一些向外输出暴力的危机横行之地——从近东途经巴尔干或高加索，直到巴基斯坦。一些新的全球化参与者也与国家一起存在于国际活动领域中：全球化企业、市场运营商、非政府组织、各种活动分子，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犯罪组织或恐怖主义团体。在某些领域中，比如人权领域、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或环境保护领域中，国家不但承受着国内舆论的压力，而且承受着不定时被调动的全球性公民社会的压力。与此同时，国家还越发经常地处于与个体参与者的竞争中，尤其是



在对网络空间的控制权的争夺中。

在 21 世纪，被阿隆置于现代社会核心部位的三个辩证逻辑——平等、社会化和普遍性依然发挥着作用；然而，全球化——阿隆从 1969 年开始使用这一概念<sup>①</sup>——已经改变了这些辩证逻辑的利害关系且赋予了它们一种全球维度。在普世史的时代，只剩下位于亚马孙或大西洋的某些民族还属于列维-斯特劳斯的冷社会，而几乎全部人类都已生活在各种热社会中，市场和技术的发展加快了这些社会持续变化的节奏。

12

经济发展和平等之间的辩证逻辑也不再是以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之间的阶级斗争或交锋来定义的。全球化因为让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且让十多亿人脱离贫困，所以大大缩小了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与此同时，在最贫困的国家中以及各民族内部，各种不平等也加剧了。法国就是众所周知的一个特例：伴随着发达国家金融领域的膨胀，发达国家的增值价值分配转向了有利于资本收入、不利于工作收入的方向。此外，在服务型经济及充斥着个人主义的复杂社会中，社会阶层变得模糊不清，各种不平等也发生了转化：基于出身、性别、社会地位和学历的不公正待遇，与财富和收入水平上的不平等具有了同等重要性。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多处不稳定让就业主力军对可能失去既有社会地位心生忧惧，从而形成了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社会氛围。新兴国家的超速增长表现出财产和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这一指标水平在中国和俄罗斯都达到了顶点。尤其是在各

---

① Raymond Aron, *Les dés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Calmann-Lévy, coll. «Liberté de l'esprit», 1969, p. 231.

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状况相似——身份认同的冲突，尤其是宗教身份的冲突，趋于创造出比收入或发展不平等更为严重的隔阂。

13 社会化依然以家庭、教育和工作为基本动力，不过方式已迥然不同。开放社会通过信息的、各种人类学体系的，尤其是种类繁杂的家庭结构的 market 和技术，让直接且即时的关系得以形成。家庭没有遭遇预言中的衰落，相反，它似乎成了亚洲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要素。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中，人们在面对失去原有社会地位和遭遇社会排斥的风险时，家庭能提供最好的保护。家庭不但没有被全球化削弱，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教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关键之一，正如它也是漫漫生命历程中个人安全和活动能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工作也远没有消失，它依然是建立社会联系、实现社会融合和获取公民身份的第一媒介。与此相反，结构性失业体现的则是人口或领土整体朝着完全失序的方向转变，社会排挤也因此替代贫困成为发达世界中社会的头等大敌。社会异化不再是不平等工作的后果，而是放任失业的后果。

普遍性的发展动力与全球化有着同样的源头。一面是市场的相互融合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另一面则是身份认同感的强化和价值观的极端异质性，全球化被这两面左右拉扯着。就经济方面而言，资本主义只受到马尔萨斯递减理论的质疑，即便在它受到重大冲击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个奢侈理论是由正在老龄化的欧洲富裕国家提出的，在北美和新兴世界中反响微弱。全球化遭受的风险尤其来源于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而发达国家中长期存在的经济增长缓慢问题和失业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为了在人口老龄化冲击来临之前获得更高生活水平

而加快追赶步伐的愿望，都在不断对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推波助澜。这与 20 世纪初的情况相似。其时，19 世纪的自由主义秩序正是因为欧洲谋求强大才被挫败，同理，全球化也可能在民族主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保护主义）和宗教（继续作为人类最深层的激情）的联手之下而粉碎。暴力对人的蛊惑始终如初、丝毫未变，随时都可能让开放社会暴露于狂热崇拜和恐怖主义、战士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非法盗用和网络卫士的交叉攻击之下：在欧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不论是人还是国家，都还没有‘永别武器’”。<sup>①</sup>

因此，我们时代的最艰难挑战乃是如何从各个势力的野心、不同价值观、多样化的甚至处于公开对立状态的各种文化出发，制定出维稳所需的全球性原则、规则以及相关机构，还在于如何能够以此将全球化维持下去。从多哈回合谈判和世贸组织谈判的举步维艰，到后来哥本哈根国际大会的流产，这些 14 都充分表明，由于两百来个国家因主权问题而相互猜忌，全球性秩序的建立依然困难重重。欧洲大陆的一体化会因为各国在欧元启用后重新获得了力量而受阻，这本身就是主权强大的证据，它也说明了以各国人民及其合法政府自由加入为基础而建立的超国家机构和超国家政治是多么脆弱。

历史格局已经翻转，处于 21 世纪如此开端下的人们因此也遇到了阿隆穷尽一生去研究的那些问题。首先是现代自由的自相矛盾问题。一边是一直在对技术、行为和机构精益求精的理性，另一边是燃烧着的集体激情，现代自由在这两者之间无

---

<sup>①</sup> Raymond Aron, *Penser la guerre, Clausewitz*, t. II, *L'Âge planétaire*, Paris, Gallimard, 1976, p. 286.

所适从。民主政体也存在矛盾之处，它们要么在个人主义、社会主体原子化和公民的政治冷漠的作用下变得再无理想与活力，要么就是在非理性和惧怕中遭到动荡的威胁。战争还是和平，这一基本选择现在面对的是恐怖主义的威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对立势力的雄心勃勃、狂热崇拜的压力以及逃脱了国家全套监控之空间的增多所带来的风险。还有，世界资本主义的调控既无法以市场自我调节为原则——这种放任是2008年的崩溃之所以会发生的根源所在——也无法将重新回到管制经济模式作为解决办法。最后，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保护环境的要求相结合，这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寻求地方、国家、大陆及世界层面上不同层级的公民权的结合，是一个敏感而必需的问题。

## 投身自由事业

阿隆是一位秉持启蒙思想的人，他在意识形态斗争和世界大战的世纪中为了捍卫自由和理性而斗争。就思想层面而言，他注意到了新康德主义实证论的失败，这种思想因为第一次世界  
15 世界大战的极端暴力及大战导致的欧洲社会粗暴化而失去了影响力。与此同时，他没有在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极度推崇面前，或是在马克斯·韦伯所预言的无法避免的价值观战争引起的晕眩面前退却。阿隆像揭露虚无主义的危险那样揭露了阶级狂热和种族狂热制造的谎言，他捍卫的是自由之多元开放的定义。不过，阿隆没有放弃对康德意义上的那种理性抱有希望，这种理性是人性的基础，且让人类重拾和平变得可能。就政治方面而言，阿隆自1930年代直到辞世，一直都站在了支持多元政体、反对极权主义战斗的最前端：面对纳粹主义的

抬头，他批评和平主义；他是现代马基雅维利主义和世俗宗教的分析家；在伦敦，他是《自由法兰西》的总编；他是唯一站在安德烈·马尔罗一边对冷战初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法国思想界获得垄断地位提出异议的人；他是《知识分子的鸦片》<sup>①</sup>的作者，这本书不但在第一次法共与路人浪潮和斯大林主义保持距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还在人民民主政权中以“萨密兹达”<sup>②</sup>形式被广泛传播；他还是一位坚持不懈的哨兵，为那些与苏联展开殊死斗争的自由国家执行警戒。

因此，阿隆是20世纪法国自由主义政治的一位伟人，与孟德斯鸠、孔多塞、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托克维尔和埃利·哈莱维的思想一脉相承。只要自由没有扎根于宗教性质的上帝、意识形态的骗人学说或传统中，它就会深植于政治与历史之中。自由处于首位，但这一首要地位也具历史性，且与任何形式的超验性都没有关系。自由强调的是偶然性，而不是作用于人类发展的必然性或法则。事实上，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本人也不记得他这样说过：“在自由主义原则中，并不存在任何能让自由主义成为不变学说的东西，不存在任何既稳定又固定的一劳永逸的规则。我们在行事中只需要知道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应当最大限度地运用自发之力，尽可能少地使用强制力；不过这一原则本身又在运用中包含着无穷变化。”

有鉴于此，自由是以蕴于人民历史文化之中的公民意愿、

① Raymond Aron,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Paris, Calmann-Lévy, coll. «Liberté de l'esprit», 1955.

② 萨密兹达（Samizdat）是苏联时期为当局禁止但在社会上流传的秘密出版物。——译者注



领导人的明智以及体制的稳定性为基础的。现代自由不但多元而且异质性强，它与多种原则和权利并立而行：源自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和启蒙思想的公共自由；国家主权和权力分立；普选制；社会和经济权利；环境保护。现代自由虽然脆弱——因为它建立在公民美德和抽象规定之上，集体的冲动随时能将它夺走——但也拥有毋庸置疑的耐受力。如果说在权力、生产、知识、信息和真理的种种秩序之间必然存在相互作用的话，那么在自由国度中，它们是、也必须是维持了自主性的。依照适度原则和权力分立原则，自由因此也必须“提防自身的狂热盲信”——用卡尔·波普尔的话来说。

阿隆的自由主义有异于功利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因为对他而言，自由首先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政治不应该被局限或混淆为经济（即市场），或是社会结构，又或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的技术发展。阿隆对人类能力打了个帕斯卡尔式的赌，他相信人们会为了肩负自己的自由责任以及在必要时能够自卫而开展自我教育。人并非生而自由，而是变得自由。但是，人并非通过萨特那样的反抗变得自由，而是通过教育和参与城邦生活才变得自由的。国家在城邦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却没有对公民（即值得享有自由的个人）的塑造实行垄断。民主制度的价值永远不是现成的：公民必须不断对其重新定义，使之与时俱进，具有时代价值。这尤其让我们能够超越马克思指出的那种存在于劳动者联合、工作权利和社会保障系统之中的形式自由和实际自由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自由和理性之间存在一种基本联系，这种联系是克服集体冲动和意识形态欺骗性学说的最好药剂，就像它同时也是公民解放的动力一样。为了避开实证主义那种一味和解的乐观主义以及为

了辨识技术可能导致的歧路，阿隆一直让自己作为进步的——尤其是科学进步的——坚定辩护者，只要这种进步是有益于人类解放的，而不是会导致人类的堕落甚至导致种族灭绝式的人类大屠杀。理性，这一人性的最终黏合剂，它本身也还需要我们认识和思考其局限性，而这种认识和思考有可能与自由对立。当我们面对 21 世纪的各种冲击和挑战的时候，这种政治自由主义更是前所未有地适用于当下的现实情形。

首先，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对等确实存在。事实上，20 世纪的极权主义已经表明，在没有多元政体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仍然可以——至少在短时期内可以——在民主制之外发展，正如昔日佛朗哥的西班牙和皮诺切特的智利，又如今日处于另一个层次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自由是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其成功的基础，是其扩张和具有影响力的秘密所在”这一总结完全没有丧失其价值。只不过，这种体现自由意愿的经济理念此后在全球范围内均适用。资本主义和技术应用的普及远远没有自动导致民主降临或让谋求强大的意愿消失，它反而加剧了自由国家与专制或集权体制之间的竞争。就连新兴大国阵营也显现出分裂，一方面是中国和俄国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对抗。如果民主国家对纳粹主义的胜利属于军事胜利的话，那么在东方处于经济停滞、日益贫困的情况下，西方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就在苏联及其帝国的崩溃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今天，民主国家遭到由某些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挑战，后者试图对那些曾经殖民过自己的殖民者施行报复，所采取的办法就是在提升自己在经济和技术领

域的等级的同时拒绝政治多元主义，并继续维持对社会的严密控制。

18 显然，民主国家在这场考验中并没有处于有利地位。美国虽继续保持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但仍由于在苏维埃主义陷落后的行事过分而遭到持续削弱。这种过分体现在美利坚帝国和美国军事的过度扩张上，最终导致美国陷入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潭；这种过分还体现在那场可算是 1929 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其后果就是削减债务的要求和大规模失业持续阻滞着经济增长；它还体现为已经对法治国家造成重大打击的安全问题——前有《美国爱国者法案》与中央情报局的绑架和秘密监狱，后有关塔那摩监狱。欧洲则因缺乏合理有效的决策体系而无法在全球化中获得影响力，并因此陷入可能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对实施反通货紧缩措施的动员加大了国家从欧盟手中重新取回控制权的力度，欧洲诸国将共同体政治重新本国化的做法使得连这些国家中最强大的德国都达到了不再遭受整体风险的程度。欧洲大陆的一体化及其经济发展在人口老龄化、竞争力缺乏、过度负债、欧元估值过高及缺乏有效率的政治决策体系（这一点在 2010 年国家负债危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的综合影响下受到了阻滞。

在整个发达世界中，增长疲软、持续失业以及大经济部门因新兴国家的竞争而状况不稳的情况使保护主义和民众主义抬头。全球化不但让西方的资本主义优势受到质疑，而且还逼迫西方不得不在经济和社会模式上有所创新。面对这样的全球化，面对恐怖主义的顽固威胁，民主国家内部以安全名义牺牲自由的想法很强烈。1940 年 6 月法国溃败及随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垮台，显示了民主原则及其制度在重大打

击面前何其脆弱，这让雷蒙·阿隆终身印象深刻。他及时对 21 世纪的人们发出了警告：因外部危险而牺牲自由的做法就是在为自由之敌助势，而且谨慎和节制本身并非就意味着公共权威的瓦解，也不代表要主动与武力或那些与民主制为敌的国家妥协。

全球化危机远没有让政治自由主义信誉扫地，相反，它显示了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多么迫切的需要。世界资本主义之所以严重偏航，其根源可以在集体不理智中找到，这种不理智存在于投机泡沫中，存在于关于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中，还存在于在既无限制也无牵制的情况下对经济和企业领导权实施的吞并中。在与危机解决办法相连的主要风险中，我们看到的是围绕公共债务、发达世界中央银行和原材料产生的泡沫经济的复苏，以及由于环境所迫而产生的向不受任何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回归。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在面对全球化危机时也显现出了其管理和财政方面的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经济领域的崩溃以及由此孕育的社会灾祸助长了政治暴力，而政治暴力虽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天然办法，却充满危险。因为极端主义只会通过扩大政治危机来达到降低经济危机的目的。

我们在解决危机时所遇到的关键选择在于是继续坚持全球化还是任由全球化崩溃。如果缺了坚持不懈的理性教育，如果缺了坚定不移的改革，如果与个人主义策略反道而行的合作观念没能战胜民族主义和人人为己所产生的各种诱惑，世界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是无法超越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的这场危机的。因此，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而是危机的解决办法，它保障个体权利得到尊重，保证集体决策的优先地位——只要集体决策依旧是自由选择达成一致的结果，而且它还使存在于

企业、市场、民族、大陆或全球各层面上的所有权力均衡有度。对危机及其恶性连锁反应的解决，体现的不是天数，而是人愿。

## 介入的旁观者的方法和伦理

阿隆同法国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通过拒绝一切封闭思想体系、一切刚性学说和一切建立学派的企图，一直坚守着他秉承的自由的多元开放概念。他毫无建立学说的念头，他定义了一种让人们能够不再被动承受历史，而是可以理解历史且在历史中行动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方法。他为我们提供的不是一个永远固定的框架，而是一种持久有效的方法，这种方法既是现实的，也是比较的、或然的和辩证的。之所以说它是现实的，那是因为“最严重的错误乃是无法以世界之本来面目去看待世界”，确立事实是分析、解释和判断事实之前必不可少的一步。之所以说它是比较的，那是因为观点的增多能启发理解：正如孟德斯鸠、托克维尔或哈莱维通过描绘英国或美国来论述法国，阿隆从工业社会的结构出发，强调了民主和极权之间的绝对对立。之所以说它是或然的，那是因为历史从来就未事先写成，它于各种深层力量的交汇处结成，而这些力量又都是对经济、技术、地缘政治格局及人民和国家执政者的行为——尤其是他们在危机或战争时期的行为——具有影响的。最后，之所以说它是辩证的，那是因为人及其历史处于一种持久紧张关系中，一边是偶然性和瞬时性，另一边则是普遍性和永恒性。

有鉴于此，阿隆坚定地选择了与乌托邦及暴力阵营都不同的阵营，站在了负责任的一方。乌托邦通向的最好前景乃是本

身的软弱无力，最坏前景则是以创造新人类的空想制造恐怖，这种新人类因为把某个种族、某个民族或某个社会阶级视作优等而证明了自身的存在。毋庸置疑，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士，但这需要以尊严、自由和人的生命这等血腥牺牲为代价，而人类的激情又只会对诉诸武力推波助澜。历史前进的速度越快，冲击越是让人措手不及，选择改革还是选择暴动就越是生死攸关。因此，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伦理不在于对集体冲动阿谀奉承，也不在于激化仇恨和不满或鼓励人们诉诸武力，他们应该为了平息紧张和冲突而去帮助阐明现代性的困境。

教育人们热爱自由、呼唤责任感及以讨论为优先，这些都不应该被混同成某种与存在或政治脱节的冰冷概念。节制同疏懒毫不相干；谨慎也是不介入的反面。阿隆采取的是一种混合了学者的方法和为了自由而战的姿态：“尽可能老老实实地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时代，永志勿忘自己的知识的局限性；从现时中超脱出来，但又不满足于当旁观者。”<sup>①</sup>《回忆录》是这种修行的忠实体现，从这种修行可以看出，与自我辩护相反，阿隆毫无宽宥地反思了自己的介入行动和各种分析。

21

对客观性的执着追求，于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离经叛道的批判性和公民性中扎根，但没有阻止他在评论上散发活力、甘冒风险。阿隆因而不但站在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第一线，还站出来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尽管他无法在《费加罗报》的字里行间为此斗争——并揭发了“五月风暴”的伪革命性质：他认为这场革命不但没给第五共和国带来解决问题的另一种办法，还导致了法国大学的衰落。从1930年代初

---

<sup>①</sup> Raymond Aron, *Mémoires*, Paris, Julliard, 1983, p. 53.



期隐秘地帮助德国反纳粹人士离境，到1940年去伦敦坚持斗争，再到在冷战期间被大学冷落和他对戴高乐派原教旨主义分子的揭发，最后还有对东欧异见人士与越南船民的支持，这些都体现出阿隆身心所具的卓尔不群的勇气。他的人生和思想不但超越了语言，而且也完全有异于那种毫无建树的思想炫技。它们证明了自由主义只适合于强大的灵魂而非胆小鼠辈，只适合拥有批判精神的人而非软弱求同之辈，只适合英勇的公民而非胆怯的懦夫。

阿隆是要求严格的爱国者，是对欧洲信服有加的欧洲人，还是大西洋联盟的坚定支持者。正因如此，他才对法国、欧洲和西方的弱点做出了无情的批评，他以孟德斯鸠的格言作为自己的准则：“在一切面前都诚实如故，即便对自己的祖国也如此。每个公民都必须为祖国而死；没有任何人为国撒谎。”这种清晰的逻辑和面对放弃民主制等歧流时所生的愤慨，在这个西方受到公开质疑、美国处于相对衰落阶段的时期，在民主国家的诸多歧路和遁世面前，具有前所未有的现时性。这是一个欧洲在摒弃了武器且放弃了如此多的谋求势力的工具和意愿之后又去尝试放弃生产和革新的时期。这是一个法国因为有了脱离现代的可能而倍受威胁的时期，而这种状况之所以会形成，又是因为围绕极端集中的权力组织而成的机构的存在以及社会经济模式对发展的阻滞——这是一种以过度负债、生产力低下、极端冗复的公有领域、狭窄且缺乏竞争力的私有领域、持续性大规模失业，以及在移民融入方面的长期失败为特征的社会经济模式。

这种对民主国家的弱点的批判以及对民主之脆弱怀有的忧虑之情，完全不能与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或失败主义相提并论。阿隆呼吁的是，用公民的美德和领导者的明智来采取措施应对

困难，为了应对危机形势而重新提出质疑并推进必要的改革。确切说来，冷战后时代和全球化危机要求民主国家做的也正是这种自我审视、自我反思和自我建设的工作。美国已数次成功证明了自己具备革新能力，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证明美国社会和政治主体意识到了必须采取激进改革——即便这些改革也有缺点且结果难测。美国民主及其吸引力始终历久弥新；美国即便在被削弱的情况下也依然会在往后几十年中继续成为唯一拥有所有实力手段且唯一势及全球的国家。相反，如果欧洲最终没有实现政治统一，那么我们就只能对欧洲能否在那些建构21世纪历史的各大极点中算得上一极而忧心忡忡。身处于正在衰落的欧洲之中，法国尤其受到了威胁，法国的现代化努力已经因为这场社会经济危机而深受打击。这场危机远没有让伪法国模式再次焕发青春，却反倒使封闭社会和管制经济在法国死灰复燃，让奉行向后看和对法国昔日强大的那种“民族-追念”崇拜再次启动，它还让本质上属于非自由主义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让我们明白法国的路途何以挫折重重，也正是这种思想让国家得以脱离全球化进程——重新获得了合法性，而这一切又都加大了法国国家地位降级的风险。

阿隆没有为我们的时代提供任何现成的应对方法。不过，23他及时提醒了我们，欧洲和西方先后取得的现代世界领导权，并不是靠经济和技术上的领先或某种天生的优越性来维持的，而是靠能够明确自身困难和弱点的才能、能够得出新解决办法的想象力以及能将公民动员起来实施举措的能力。简而言之，靠的是质疑自己的能力，这种质疑为的是自我革新和自我创造，而不是灰心气馁。他的行动伦理要求每一代人都不要去一味重复既有模式，而是要弄明白自己所属历史时代的动力——每

一代人都深陷于自己的时代中，需要由自身去找到适应时代所需的意愿和方法，而不能将自己的命运交到虚幻上帝的手中。全球化既非福佑也非邪恶。它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历史格局，而身处其中的民主国家必须找到关键，才能让全球化在进步方面所具有的可观潜力增值并成功操控全球化所包含的各种风险。对全球化一味追捧与否认全球化一样，都是轻率冒失之举。我们必须在思考全球化的同时行动起来，这样才能让全球化为人类捍卫自身的自由与尊严所用。

\* \* \*

雷蒙·阿隆，这位被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誉为20世纪法国人民的“思想保健师”的人也是一名全球化公民，而全球化在初期就呈现出了陷世界历史于困境的混乱局面。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已用下面这段话解释过了：“人们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如此多的理由不再自相残杀。他们史无前例地拥有了如此多的理由感到人类被相同且唯一的事业所联结。但我不会就此认为，普世史的时代将和平盛行。我们知道人类是理性的存在，然而，每个人都是理性的存在吗？”<sup>①</sup>

24 以柏林墙的倒塌为开端的普世史时代依然有待书写，它的进程从未如此不确定。世界资本主义和开放社会在让大部分人享受其成果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二十国集团的体制化便可被视作全球化治理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伊斯兰世界并非命中注定只能被仇恨和暴力所困，温和力量是有能力最终取胜的，伊朗人民在反抗毛拉独裁的起义中探索出来的新道路便是一例。

---

<sup>①</sup> Raymond Aron, 《L'Aube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art. cit., p. 295.

不过，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冲突也有可能因为诸如巴基斯坦这类已陷崩溃的国家，或因为伊朗这种不服从的国家，甚至因为恐怖主义团体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而发展到灾难性的规模。被殖民过的人们所发起的报复也有可能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战略领域，并在武力交锋中改变方向。世界贸易和支付体系也可能会在保护主义和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压力下坍塌。

决定权属于 21 世纪的人们，他们虽从传统和意识形态中解放了出来，却又再次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他们的情况前所未有地充满了戏剧性，因为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行动、知识和技术上所拥有的出色手段自由地造就极好或极坏。这是一些数目更加庞大且处于老龄化社会中的人，他们必须就如何管理一个无法再为他们提供无限资源的星球达成一致。这是一些既变得更加统一又更加孤独、距离既变得更近又变得更远的人，他们必须确立一些原则、制度和规则来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这还是一些在变得更加强大的同时也比以前更加脆弱的人，他们的活动已经延伸到了网络世界这个处女地，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结合还让他们能够通过改变遗传基因来干预自己的本性，从而为新疗法及令人生畏的优生学开辟了道路。

安德烈·马尔罗曾写道：“伟大的知识分子是注重细微差别、讲究尺度、追求品质、直面真理本身及复杂性的人。就定义和本质而言，他们是反善恶二元论的。”阿隆就属于这一小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们拒绝那些虽能快速得出却实属错误的确定性，拒绝那些虽具决定性但确实存在偏差的评价，拒绝那些形式上完美无缺却与事实脱节的思想构建。与此相反，他们倾向于在依然残缺不全、捉摸不定的知识面前，在总是有着

比人类想象力更加丰富惊奇之处的历史面前保持谦虚。

没什么比以为这体现的是一种悲观的本质或放弃的形式错得更离谱的看法了。意识到知识或行为的局限性并非就是在抹灭人类能够通过自身努力及对真理的寻求而赢得自由这一事实。正如极权主义遭遇的失败以及 2009 年伊拉克起义表明的那样，自由从来就不是镜花水月。历史之所以充满悲剧性，仅仅是因为人说到底还是在自由地塑造历史，除了依靠自身意识，人在其中别无所依，历史的悲剧和灾祸如同历史的成功一样，都只能由人一肩承担。这种情况并没有使退缩或漠然变得合理，反而构成了一种对行动的呼唤，它对公民和领导人发出了有益的邀请，邀请他们将自己的命运以及他们民族、大陆或星球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阿隆的最后启示因此而充满了乐观与希望。没有任何宿命可以证明仇恨和暴力会重新主宰一切。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对民主或自由之未来感到绝望。与盲目狂热和玩世不恭相反，最好的解剂是保持理性。正是理性让阿隆的人生和他相继写成的那些既哲学又论战、既社会学又历史学、既学术又社论的丰硕成果获得了统一。作为一位法国爱国者和世界公民，作为一位共和派与自由主义者，作为一位政治思想中心人物和自由战士，阿隆对行走于 21 世纪历史之陡峭道路上的人而言是最好的旅伴。而 21 世纪历史的关键已经在《回忆录》中被清楚阐明：“如果那些既雄心勃勃又不牢固稳定的文明必须在遥远的未来实现先知们的梦想，那么除了理性，还有什么普遍使命能够将它们统一起来呢？”<sup>①</sup>

---

<sup>①</sup> Raymond Aron, *Mémoires*, op. cit., p. 729.

## 增订本出版说明

本书为《雷蒙·阿隆回忆录》首次出版的增订本。书中包括 1983 年版的出版者认为过于臃肿而撤掉的几章，即“社会主义插曲”（本书第 994 页）、“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第 1015 页）和“走向苏联霸权主义？”（第 1027 页）。



# 前言 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

茨维坦·托多洛夫\*

再回首，人们就会发现，雷蒙·阿隆（1905—1983）  
1 似乎是 20 世纪法国最清醒的政治评论家。而这本《回忆录》则比他的其他任何著作更近乎集知识和经验之大成的巨著。作为政治评论家，他才华横溢，涉猎广泛，从为日报撰写社论到出哲学文集，还写了历史研究专著和论战小册子。今天，他的主要论点已经被一切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士所接受。从他的正式传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他的成就并非始于今日。他生前发表了四十余本著作，同时定期为《战斗报》、《快报》周刊和《费加罗报》等大报刊撰写文章。他先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和法兰西学院授课。他在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最高学府做过无数次学术报告。他得到过许多最负盛名的奖项和名誉博士称号。他会见过当时法国、欧洲和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他们都愿意倾听他的意见。

他是个思想得到公认的胜者，但这种表象容易让人误解，这是因为阿隆思想在形成时期与其说是非主流的，毋宁说是反潮流的，是反对成见和约定俗成的。《回忆录》的细心读者还

---

\* Tzvetan Todorov (1937—2017)，原籍保加利亚，法国著名批评家、符号学家，结构主义大师，叙事学理论奠基者之一，主要作品有《符号学研究》《什么是结构主义》《巴赫金与对话理论》《我们与他人》等。——编者注

会发现，作者不仅分析精到，而且是一个随时准备怀疑一切，尤其是怀疑自己的人。他敢于揭自己的疮疤，袒露自己的忧虑和不足。因此，人们看到其传记的杰出作者尼古拉·巴弗雷提到“这个无限复杂的忧患灵魂”<sup>①</sup>时也就不会诧异了。

要更好地了解雷蒙·阿隆，仅仅归纳和概括一下他的理论是不够的——当然，只注重其个人命运而忽视其理论也不对。思想的活力和人性的脆弱不是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

## 重大选择

像阿隆一样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因年幼未能参加战争的20世纪的欧洲人，必须对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殖民主义等重大政治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阿隆每次都坚定地选择了个人立场。

他发现了国家社会主义，但不是从书本知识中发现的：他从1930年3月到1933年8月在德国工作和学习，先在科隆，后到柏林；他目睹了民主制度的垮台和希特勒夺取政权的危机。这些事件改变了他对政治生活的观察方式：阿隆与当时在法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盛行的和平主义决裂了，他还为不同报刊撰写文章，发出警告说希特勒的威胁已经暴露无遗。但那时，他还是个无名小辈，他的警告没有得到任何反响。随后几年，他尝试着更好地了解这种新的政治秩序，并引进了“世俗宗教”概念，后来的国家社会主义即属于此类。他在战争初期应征入伍，1940年6月撤退到法国南方。他听说有些法国人

---

<sup>①</sup> N. Baverez, Raymond Aron, Flammarion-Champs, 1993, p. 381. 关于阿隆的另一部分丰富资料来自：*Commentaire* (n°s 28 - 29, février 1995)。

3 以伦敦为基地继续抵抗侵略者时立即做出抉择，把妻儿留在法国，于6月23日成功登上驶往英国的船。在英国，他参加了自由法国抵抗运动，经历了战争，直到1944年9月回到巴黎。

早在战前，阿隆就对共产主义这另一种“世俗宗教”持批评态度。尽管1942年俄国人与西方人结成了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他还是对“这种超越地球的信仰”（巴弗雷《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210页）提出质疑。他感到因站对了队而得到回报的时候，特别是战胜纳粹之后，便投入一场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无情斗争中。“铁幕”一词出现在他1945年7月以后写的文章中。为了这场斗争，1947年他选择去《费加罗报》而不去宽容共产主义的《世界报》当社论撰稿人。和平主义再次不合时宜。出于同样的想法，1950年他成为一个反对极权主义的组织——“保卫文化自由大会”的发起人之一，该组织的委员包括莱昂·勃鲁姆（Léon Blum）、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阿尔贝·加缪等法国人（由于有人揭露该组织的部分基金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成员们于1966年终止了活动，但其言论自由与行动自由从未受到限制）。阿隆经常在这个组织的刊物《论证》上发表文章；1955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精辟地分析了为什么共产主义能够吸引西方知识分子。他还有其他著作，是研究苏联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问题的。1970年代中期，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出版之际，他进一步揭示了法国左派抱有的执拗幻想。在法国左派看来，只要是为了崇高的理想，集中营也就不残酷。诚然，阿隆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起来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但至少，他是法国坚持时间最久和为战友提供最有力论据的人。

尽管在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异，但是人们是否有权把它们同“世俗宗教”或“意识形态专制”，甚至极权主义归于同一类别呢？对于这个问题，阿隆 4 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公众看到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但应不应该同样严厉地谴责二者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隆认为不该如此对待，因为尽管它们的实践有些近似，但计划目标是对立的。他解释道，国家社会主义的罪恶在于已将纳粹计划付诸实施，而“共产主义的罪恶”则是对共产主义目标的一种背叛。他还是从这种意识形态论证出发，认定斯大林消灭农民尚且有合理性，希特勒灭绝犹太人则绝非如此。然而，阿隆撰写《回忆录》的时候又得出结论，这种差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因为共产主义纲领只起一种掩盖作用。于是，他对这两种制度的评判又趋向接近了。“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可憎程度不亚于纳粹主义。为了区分阶级救世与种族救世，我多次使用过的论据已经几乎不会再触动我了。阶级救世论的那种表面的普遍性最终变成了一种装饰门面的东西。”

殖民地问题往往不大引起阿隆的注意，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其观点的连续性：他始终认为应该同法兰西民族保持团结，但赞成最好让殖民地独立。在伦敦期间，他支持放弃印度支那。当1946年越南起义爆发时，他不愿公开谴责投入战争的法国军队，但他看出了法国政府的实践有悖于其声称的普世原则与平等原则。“用暴力来维持，而不是维护法兰西。”他满怀激情地热爱他的祖国，但这种热爱要求国家忠实于自己的理念。1951年，他重申自己的愿望：印度支那应该独立。然而，他后来不再经常发言支持政府的那种非殖民化政策。

他确实直到1957年6月才通过一本名为《阿尔及利亚的

悲剧》的小册子真正介入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这本小册子立即引起爆炸性影响。此时，法国已经有人为他辩护，赞同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他与别人不同，他支持的不是他们要达到的目标，而是支持他们提出的理由。他反对维持殖民统治，因为殖民统治意味着维持人类族群之间的不平等，这是与法国的理想背道而驰的。结果，维持殖民统治几乎把他的国家引向内战。他不仅向坚定地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而且向政府和议会里的政治家们补充了一条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理由：维持一个殖民地——尤其是在冲突期间——太得不偿失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阿隆并没有走到拥护民族解放阵线和号召新兵开小差的地步：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服从法律要高于顺从民意。

阿隆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因为他实际上认定了自由民主制度。后者意味着在两种要求之间实现一种妥协，尽管这种妥协往往是脆弱的：“把自主权交给个人，但国家要为弱势群体提供一些生存手段，帮助其行使本应享有的权利。”一方面要有建立在权力多元化基础上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要进行反对不平等的斗争。这种妥协不仅是脆弱的，而且始终是不完善的。因此，不能只想着如何批判各种民主制度；即使出于留恋过去或对未来的美好社会抱有幻想，这种批判也不能成立。人们是用民主理想本身来批判民主的。阿隆尽管从总体框架上接受和支持民主制度，但也指责这个社会个人利益排斥总体利益，压力集团使国家瘫痪，公民变成了单纯的消费者，只关心如何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辩论似乎永无止境。

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威胁是：民主国家认为自己是完美无

缺的化身，企图用实力来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阿隆写道：“不能也不应当用十字军东征的办法来推广自己的制度。”让国际关系服从于国内原则，纯属一种危险的幻想。6  
“人权不能成为一种政策”，这是他的访谈录《介入的旁观者》<sup>①</sup>中的一个小标题。在同样的背景下，阿隆对后来试图要建立超越国家之上的国际公正也表示怀疑。“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法庭。”纽伦堡法庭在这一点上不能成为反证。纳粹国家的领导人首先被判处“反和平罪”，这是一个战胜国唯一有权判处的罪行。“谁赢了战争，谁就可以指定由战败者对战争负责。”（参见《介入的旁观者》第299页）换句话说，所谓行使权利，实际上就是强者为王。

## 为什么和怎么办

上述就是阿隆的基本政治立场。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他的同代人之中，能够为这种明智的选择而自豪的知识分子为数并不多。阿隆本人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中学毕业时他接触到哲学，这促使他采取了这种“思考我们的存在而不是忍受存在”的立场。然而，他是怎样摆脱知识分子的陋习的？是由于他受过高等教育？还是因为他得到过名师指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出人意料的：他并非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板凳上，而是在柏林的大街上度过了求学生涯的关键阶段。决定其政治方向的关键人物不是康德或黑格尔，而是斯大林和希特勒。1932~1933年，他亲眼看到了纳粹在德国的崛起，于是他自愿选择了这条罕见而艰难的道路：面对周围世界，不要闭起自

---

<sup>①</sup> 参见 Julliard, 1981; Presses - Pocket, 1983, p. 294。

7 己的眼睛，不要用幻想和抽象来代替现实，而要把亲身经验当作理论的试金石。阿隆留给后代最重要的教训是：拒绝把生活与思考割裂开来，始终“把理念同这些理念所反映的、所改变的、所扭曲的事实加以比照”。他在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刻强调的不是他的智慧超群，而恰恰是其独特的个人反应能力与学术建设之间的连续性，他说：“我从来不会为辩证而辩证，为不能辩解而辩解。”

他在旅居德国的时候决定了自己将要采取的行为方式。在那里，他不仅发现了非理性力量的强大和群体暴力，也发现了可以应对政治弊病的某些规则。规则之一来自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这条规则就是：在公共行动领域中，少看行为人的意图，多看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另一条规则来自一次偶然路遇，他在巴黎碰到了某位法国政治家。阿隆向其陈述在德国日益升级的危险，后者反诘道：“你说的当然很在理，但具体一点，如果你坐在总理的位置上，你会怎么办？”不要只看到那些正当的抱怨，要把自己放在行为人的位置上。不要仅仅以高尚原则的名义去批评他们，不要仅仅从愿望出发，要想想有无可能性，不要被美丽的形式所陶醉，要将其付诸实践来检验。这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教益，也是阿隆旅居德国几年得到的教益。

与此同时，他也从中找到了未来优先研究的对象。他不满足于纯粹的哲学思辨——尽管他为此做了几年的研究准备——而更愿意认识和解读卷入历史运动和纷繁社会的人。他漫步在莱茵河畔或施普雷河畔，想出了一个终生不渝的课题：“思考正在形成的大写的历史”。（1965年的论文，转引自巴弗雷《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338页）马克斯·韦伯



又成为他的楷模，在这一点上甚至胜过其他哲学家或学者。他善于把研究对象引入正在前进的历史中——让世界震撼的历史。他懂得如何“把持续和瞬间的含义”连接在一起。这次轮到阿隆自己来全身心地投入身边的世界了，成为“倾听其声、关注其怒和探究其意”的同代人了。 8

生存与思想之间的连续性有一种初看有些矛盾的必然结果，那就是阿隆经常重申的“不要把善与真混为一谈”。回过头来，他自责在来德国转变观念之前的早期著作中就把两者混淆了，以作者的良好愿望代替了对事实的明确分析。凡是想了解政治的人，都会对他的判断感叹不已。他的判断是，要弄清行为人的本来面目，而不要看他们是否符合自己的想法。阿隆于1937年写道，政客本人应该不讲“人性和仁慈，但要果敢而严厉”（巴弗雷《历史的见证——雷蒙·阿隆传》，第125页）。发现和捍卫真理，需要勇气。当多数同代知识分子缺乏这种勇气时，他具备了：阿隆早在1933年就看清了希特勒的威胁，早在1945年就看到了斯大林的危险。

当然，明确区分真与善，拒绝用道德抽象代替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并不意味着可以消灭其中某个观念或偏好某个观念。恰恰相反，不把二者混淆使得我们可以厘清它们的关系。阿隆的贡献在于，他批判了把二者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将其纳入了新的价值结构之中。在政治上，把“现实主义者”同“理想主义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后者，那些怀抱愿景的人，与只满足于记录现状的纯粹看客是对立的。而现实主义者还要做出抉择：他们在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世界之前，首先要对世界有精确认知。现实主义者的行动既反对安于现状，把现实当作愿景；也反对陷入自我陶醉的梦乡，把愿景当作现

实。现实主义者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乌托邦。同样，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不是对立的，但与纯粹的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水火不容。责任伦理本身需要有信念，需要了解客观情况。行动要取得成效，这是必不可少的。阿隆主张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  
9 负责任的政治，既不是安于现状也不是犬儒主义。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但拒绝把这种理想当作认识现实的一个工具。

阿隆本人不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他在《回忆录》中讲到他在德国看到纳粹分子夺取政权之时如何明确了自己面临的选择。一位学德语的朋友决定倒向新潮，那位朋友对他这样讲：“你将永远是个旁观者，一个持批评态度的旁观者。你没有勇气投入群众和历史潮流的实际行动。”阿隆回应道：“他说对了。”人们不会同意这个德国人的判断。阿隆旋即勇敢地付诸行动，无论是1940年还是1945年，抑或1957年。不错，除了投奔伦敦那一次，他的行动主要是在知识领域，而并非政治行动。而且，只要他能呼吸到学术独立的空气，就永远不会再对等级制权力感兴趣。历代著作家深得他的推崇，从修昔底德到韦伯（包括孟德斯鸠），他们都是追求了解世界胜于改造世界的伟人。这种选择注定将使阿隆处于某种孤独状态，远离战友之间那种热烈的兄弟情谊。

同样，由于他没有明确地介入党派斗争，也就无须坚持这些党派的基本信念。但他可以对这些信念进行细致的分析。阿隆宣称：“我对社会深层力量的态度是明确的。我始终觉得自己被分割了，我对事态的发展，无论是远期发展还是近期发展，都感到没有把握。”当然，要想对世界有一个尽可能深刻的认识，并把这种认识当作进行判断的必要前提，就不能不明确这一点：人与社会是异常复杂的，一些良好的意愿却可能产

生灾难性的后果（反之亦然）。尽管伟大的原则可以是坚定的和无可争辩的，但具体情况很难符合善恶二元论的判断。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只有两种颜色。阿隆在《介入的旁观者》一书中写道：“永远没有善与恶之争，只有可取与可憎之争。”

因此，探索知识的研究工作绝不会是封闭的。对人类世界的阐释一定是多样化的，是相互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的。阿隆从来没有自诩掌握了最终真理和完整的阐释体系。因此，他提出的判断不是说一不二的，而是留有可供争论的余地。1940年，他在伦敦为《自由法兰西》——一份抵抗纳粹德国的法国流亡者办的杂志——撰写社论时，一方面对正在进行的战争采取鲜明的立场，同时申明杂志的目标是维护“自由和尊重各种信仰”（巴弗雷著作，第173页）。1955年，他为《知识分子的鸦片》这本论战小册子作序时，描述他的思想伙伴是“懂得战斗但不记仇的人”<sup>①</sup>。他对一些敏感问题——如停火与合作，维希与贝当——也提出了巧妙而平衡的判断。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要求残酷清洗的思想。萨特在谈到他这位同学时怒气冲冲，与之相比，阿隆在《回忆录》中对萨特的描绘则显得宽宏大度。阿隆对其他昔日论敌的态度也是如此。他始终坚持要从他所批判的理念中看到好的一面，从他为之辩护的理念中看到不足的一面，这种倾向在某些人看来就是小骂大帮忙，说他好出惊人之语，语焉不详，每次下个断语又加上许多限定词，最终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坚持什么。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不禁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反对善恶二元论反对过头了……

但并非如此。阿隆摆脱了善恶二元论和相对论的羁绊。恶

---

① Hachette-Pluriel, 2002, p. 11.

善混合说虽然曾滥觞一时，但并不妨碍他明确揭示出世纪性的政治弊端。他于1956年写道：“估量恰如其分并不等于真实，20世纪的专制暴行是无法估量的。”阿隆对恶的谴责毫不含糊，对善的前景则没有把握。

## 边缘化的阿隆

- 11 阿隆的思想今天已经得到公认，几位同代的思想界大家对他倍加赞赏，这可能会误导我们以为他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是公众舆论的代言人。其实根本不是这样。一个如此关切真理的人物，不可能长久地适合任一政党或任一机构的口味。阿隆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他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选择付出了代价——尽管他种种荣誉加身。卢梭深谙其中奥妙，他曾指出，“党同伐异，仅凭这一点，就会成为真理的敌人”<sup>①</sup>。阿隆对此也有自知之明，1965年的这幅自画像就是证明：“怪人一个，过分关心行为中的真理，过分关心思想中的行为。[……]这就是我，许久以来，无论在哪里，我都是一个边缘人。[……]一个无党派人士，他的意见不是冲撞这些人就是顶撞那些人，尽管他想竭力保持温和，仍然令人难以忍受。”（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338~339页）

阿隆首先是一个始终被政权边缘化的人。有人可能以为他是“君主的顾问”，因为他与第五共和国的各位总统（如夏尔·戴高乐、乔治·蓬皮杜、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都保持着良好的私交。他与第四共和国的政界人物也很熟。但他从来没有当过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官方顾问或半官方顾问。因

<sup>①</sup> *Oeuvres complètes*, Gallimard-Pléiade, t. I, 1964, p. 965.

为在他看来，为任何权力效劳都是可耻的，他坚决秉持其独立性，对各个政党的态度也是如此。1926~1927年他还是大学生的时候就加入了社会党。但自从他在德国思想发生转变以后，这种党派归属就不再延续了。在伦敦，从1940年起，他本来可能变成戴高乐派，但围绕在将军身边的个人崇拜和强迫追随者非黑即白地看待世界的做法把他激怒了。于是，他与之拉开了距离。“解放”以后，当戴高乐成为政府首脑时，他继续持保留态度。而一旦戴高乐远离政权，阿隆便决定向他表示忠诚，加入了他创建的法兰西人民联盟（RPF）。1948~1952年，他多少有点勉为其难地参加了这个党的几次活动。当将军重返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时，他又远离了将军，甚至严厉地批评了他的某些决策。他在《回忆录》中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当他的事业——法兰西人民联盟受挫的时候，我追随过他。”

12

他对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选择也是如此。战前，阿隆的精神家园属于非共产党左派，该派别中的多数人支持和平主义。他本人曾不断发出警告，反对纳粹德国所代表的军事危险。1945年，阿隆理应为拒绝与敌方的任何合作和旋即投入抵抗运动而自豪，但他对此没有任何炫耀。恰恰相反，他参加的战斗鲜为人知，这就是把苏联及其代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请下神坛。苏联以牺牲2500万人为代价换来了抗击纳粹德国的胜利，胜利的光环曾经使苏联人民的声望升到顶点。法国共产党令人尊敬和畏惧。巴黎知识分子在各种反法西斯声明中，在采取左派立场（实际上往往是中间派立场）的时候加大了自己的筹码，却忘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消极态度。左派在选举中并不占多数，但在大学中是多数。在那里，同情共产党的声音得到宣扬。阿隆成为教授以后，遭到来自学生和同事们或沉默

或明显的敌意。因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属于明白无误的真理。萨特主导了这场公众辩论，他已经不再搭理高等师范学院的这位老同学，而是大声宣告：“一个反共的家伙，就是一条狗。我不会带出来，永远也不会。”<sup>①</sup>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信念需要一定的勇气。整整一个时期，阿隆都形单影只。

13 人们可能会想，被左派抛弃了，右派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但这种传统也没有在他的身上应验。《回忆录》中最可怜的画像之一，画的是右派官僚。“我在法兰西行动派中又发现了一个叫我恼火的家伙，他让我再一次感到，这些民族主义者或反动派属于另一个我根本无法生存的世界。”戴高乐派对他并不比对别人更信任。阿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所持的立场招致右派中不少人的刻骨仇恨。他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也没有赢得左派的好感。

阿隆对现行体制的认同来得晚了点儿，而且并非毫无困难，显然也绝非偶然。1948年，他向巴黎大学申请一个教授职位，别人却宁愿给他一个离马克思主义不算太远又无须在报纸上撰写太多（歌功颂德）文章的候补职位。1955年他再次提出申请，刚好通过。然而，他并不适宜在大学里当官的生活，而且这种情况在教授的职业生涯中也不多见。1967年他辞去这个职务，仅仅在高等实验研究学校教书。他同巴黎政治学院也保持距离，只是偶尔参加一些国家科研中心（CNRS）的研究项目。1961年，法兰西学院的候补教席生变，出现了空缺。直到1970年，阿隆才得以入选法兰西学院，而别人到

---

<sup>①</sup> *Situations IV*, Gailimard, 1961, pp. 248 - 249.

了这个年龄已经考虑退休了（米歇尔·福柯与他同时入选，而年龄只有43岁）。他从来没有当上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尝试着为这些失意自我解嘲：“我不会循规蹈矩，任何行当都会藐视边缘人物。”

大学完全有理由藐视他，因为他不断在报刊上著文批评大学。他不是批评大学被左倾意识形态控制了，而是指责其考试徒具形式和经院气息，譬如资格考试。他指出，教授们的神圣自主权利只限于教授个人独享，他们的学生和同事则沾不上边；学校对科研缺乏兴趣。对于一个于1939~1945年亲身体验了战争的人，一个于1945~1955年在报刊上从事政治战斗的人，大学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场。“大学教员里的多数人完成他们的学业后只能从事教学工作。这是一个聚满孩子或青年人的柔弱世界，有可能一直维持某种稚气。”1968年5月造反的大学生们再次引用了他的许多批评。但是，阿隆已经得不到他们的认同，他只能在学校官员和资格考试委员会代表中活动。他听到身边有各种拒绝承认知识价值的言论，这些言论往往很能蛊惑人心；革命幼稚病也与他格格不入。“五月风暴”没有使他接近大学生，反而有点使他更加孤独。

人们可以批判阿隆的各种立场，但不能指责他循规蹈矩，也不能指责他随波逐流，追赶巴黎知识界一波又一波的新潮。他经常会对新思潮有所反应，只要这些思潮与自己的心灵一致。他甚至超脱了不按常规办事的常规行为，也就是说，他不挑战公众舆论，不根本反对社会共识，不标新立异。他参演的是一幕社会喜剧，但他自己对此也不太相信。但需要冒险时，他也在所不惜。

## 阿隆：西西弗式的人物

阿隆放弃了建立一个完整哲学体系的打算，放弃寻找一把可以打开各种锁具的万能钥匙。他为每个问题提供的答案都是部分的或临时的，从不认为自己的解释是最终的和排他的。他的行为至少是源于同一种精神，奔向同一个方向。他事先提出了必须尽可能地了解情况。当你雄心勃勃地要指导别人的时候，对世界的现实视而不见就变成了一个道德错误。他在答复1957年的一份评论时这样写道：“视而不见是软弱而不是勇气的代名词。”（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350页）人们随后强调，只有援引合理的论据，才是推动具有不同信念的个人之间的对话和表面上相互冲突的文明之间的对话的唯一手段。只要人类愿意寻求自身和解，理性观念就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因为理性观念与真理一道，具有普世意义。

- 15 在一篇评论列维-斯特劳斯论马克斯·韦伯思想的文章中，阿隆提出了以道德与科学为共同基础的普世观。阿隆写道，“即使我们承认‘ $2 \times 2 = 4$ ’从逻辑上讲是真理，这也不等于‘你永远不会杀人’是真理，数学平等的最后一个含义是面向所有的人，而禁止杀人的普世性属于另一种问题。理性主义道德的正式规则……是人文理想和人类大同社会的符合逻辑的发展，这是一个同科学真理的深刻含义不可分割的理念。”<sup>①</sup> 光凭经验，无法看到道德和科学的普世性。但这可以引起争论，甚至可以丰富争论，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法宝。

<sup>①</sup>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为马克斯·韦伯文选《学者与政治家》（10/18版本）所写的序言，1982年，第40页。



这一事实即使不是完全悲观的，也没有带来什么巨大希望。任何人只要选择了服从理性，就注定要面对西西弗一样的苦工。诚然，你可以用理性来分析最不理性的行为，但你很难改变这些行为。理性是诊断疾病的一个好方法，但要治疗疾病就略显不足了。我们把宝押在理性上，就要无尽无休地劳作，而且不要抱多大期望。清醒的斗士应该是一个没有奢望的斗士。1961年阿隆就曾说过：“我对理性的演说能够产生什么效果不抱幻想。”（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369页）为什么如此悲观？因为在最好的情况下，言辞也只能对言辞发生作用；而人本身是怎样的，并不能完全体现在他所坚持的言辞之中。阿隆谈到，他在“五月风暴”时郁闷地发现，“由于经历不同，很难有真正的对话”，为交流而交流的个人，谁也不可能动摇对方的信念。一个人可以撇开另一个人的论据不管，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能够改变另一个人的行为。“感性经常抗拒理念上的辩驳，而人正是通过理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使自己变得理性起来。”

把人类的行为归结于非理性，就会导致一种对人类历史不说悲惨至少也是令人泄气的看法。我们可以期待暴力在某个地方某个时段被阻止，但不能指望它被根除。在每个国家的内部，暴力可以被掌控，但不能被消除。在国际关系中，暴力将始终存在，可能掩盖在幕后。为了战胜暴力，有时必须使用暴力。阿隆在伦敦时有位战友，叫罗曼·加里（Romain Gary），他谈到自己在德国上空的飞行使命时说：“是希特勒逼迫我们杀人的。即使有完全正当的理由，也不能说是无可指责的。”<sup>①</sup>

16

---

① 《抵抗与流放》展示目录，1980年。

为了防卫他人的进攻，必须生产杀伤性武器。甚至在和平时代，任何技术进步的代价，都是摧毁旧的生活形式。因此，阿隆虽然善于揭露贩卖梦幻的商人许下的空头支票，但他没法扮演满怀希望的供应商的角色。他所捍卫的自由民主不是地上天堂，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妥协。

不仅是整个人类的未来不会服从理性，个人也不会服从理性，不论他如何忠实于自己的信仰。阿隆始终明白并且承认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正如1933年他写道——总有“客观努力必须让位于必要的义愤”（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88页）之时，即使他本人也不能例外。因此，他也不敢奢望自己的判断完全客观。1965年，阿隆在他的自画像中说，他把“他的激情掩盖在论据之下”（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339页）。下面这句话可能有点言过其实了：在大多数时间里，他的论据不是用理性掩饰感性。但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最令人吃惊的是阿隆对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之间“六日战争”的反应。他在1967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他亲以色列的立场，他说，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运动，来自何方无关紧要”。

17 16年后，阿隆提到这篇文章时曾自责“忘记或无视了力量对比”。可见，他忘记了他的第一条行为准则，即做事前要尽可能先了解情况。“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也本应保持头脑冷静。”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态势是明朗的：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明显高于邻国的，以色列国家的生存并没有受到威胁。

有人以为法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一家大报社的影响，这家报社的犹太裔作者们竭力为以色列的利

益辩护。就此阿隆有机会同列维-斯特劳斯通信，阿隆本着严谨的习惯，把信件收入了《回忆录》。面对史学家阿隆，这位大人类学家采取了普世主义立场。那些在报纸上散布假消息的人动机不纯，不能被原谅。但阿隆认为：“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个人或群体观察形势和事件的不同方法。”他们缺乏必要的“尊重事实”之态度，而这是知识分子的首要信条。列维-斯特劳斯对周围的社区十分熟悉，他从中得出了对两个人都有意义的教训：“迫害红皮肤的人<sup>①</sup>时，我真的没有感到肋上添了新伤口，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出事时，我的反应就大不相同了。”的确，在人类历史上这并不是第一次，一些“被迫害的和被压迫的人来到几千年来被弱小民族占据的土地上安家。因此，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取得胜利”。

这正是阿隆的想法——一般如此，但下述情况除外。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他对加缪的态度之严厉，实在令人惊讶。由于加缪不能忘却他的独特决定，“尽管阿尔贝·加缪想要主持正义，并表现得宽宏大度，也不能超越他那殖民者的立场”。加缪拒绝在他的母亲与公正之间做出抉择，在他看来，（1957年的）这个著名事件只是作者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然而，到了1967年，当法国的犹太裔知识分子选择了无条件维护以色列的立场时，他却这样解释：“他们与加缪有同样的经历。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左思右想，拿不准该反对还是赞成。他们对比材料，参照一些抽象的公正规则，即便如此，有时仍难以采取明确立场。他们要么噤若寒蝉，要么向妖魔伏首。”这里举个例子，面对阿尔及利亚，加缪选择了保持

---

① 泛指印第安人。——译者注

沉默，其他人则宁愿追随妖魔。

在世界进程或自己的思想进程中，要引入一点儿理性的确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阿隆从来不想掩饰这一点。“由于有人把我看成一部智能机器，最后可能大家都会忘记我也是个普通人。”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推西西弗的石头。

## 阿隆：约伯式的人物

约伯的故事是《圣经》中一个正直而幸福的人的故事，上帝为此甚至决定对他进行最严酷的考验。

阿隆的生活是在最好的庇护下开始的。他在一个友爱的家庭里长大，拥有出类拔萃的智力，走的是法兰西共和国青年的光辉道路。他于1924年进入高等师范学院，1928年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但历史给了他早期的打击。首先是1928年经济危机摧毁了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得不放弃一个光彩的职业，被迫去一家小食品企业打工，不久便病故了。随后，阿隆便决心要完成父亲想努力实现却无力实现的梦想。

阿隆在德国遭受到第二次打击，这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直到这个时候，他感到自己有时追随康德，有时追随普鲁斯特，但绝不会跟着政治跑：“对我来说，爱好政治等于有个弱点。”希特勒打乱了他的价值排列次序。此后，阿隆坚决把文学爱好撇到一边（他只是在1928年做过一次有关普鲁斯特的发言）。他虽然做过一篇历史哲学的论文，但在文中引入了对当代悲剧的认识，以致冲撞了他的一些导师，这些导师对大学安静的教室里出现的政治混乱感到诧异。在这次事件中，他言之有理，但只是得到小小的安慰。停战把他动员起来，也使

他受到冲击，他必须离开自己的亲朋好友，去伦敦继续战斗。他在枪林弹雨中经历了希特勒对英国发动的闪电战。

战争的结束本来可以使他安静下来，而情况并非如此。回到巴黎，他在《回忆录》中追述道：“我的情绪时好时坏。”他与别人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投入了战斗，那为什么他还会情绪恶劣呢？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其他人更严格。在战前他在服兵役的时候就参加了一个气象学班。在“奇怪的战争”期间，他应征入伍，进了这个气象兵部队。他曾经要求转为坦克兵，这是一个现代化兵种，更符合他那争强好胜的性格。但很快就停战了，他的要求不了了之。再度回到伦敦，他以为自己的梦想可以实现了。流亡者可以选择进入他服过役的部队。阿隆毫不犹豫，要求当坦克兵。他的请求通过了，但一个倒霉的消息等着他：他已35岁，作为入伍新兵的老大哥，年龄超过了坦克兵的年龄上限。于是他被介绍到部队的后勤管理部……重返伦敦却当了个会计，没有任何英勇可言。当有人推荐他担任法国人在伦敦办的《自由法兰西》杂志主编时，他马上就接受了。

抽象地讲，毫无疑问，对于法兰西的事业来说，阿隆作为杰出的温和派记者当然比当个会计更有用。但面对本人的良心法庭，他无法安下心来。他是不是在逃避行动？他可以找出各种正当的理由为自己辩解，他选择当记者并不是害怕子弹。“这样做既无损名誉，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同飞行员每次出勤都要冒生命危险相比，比如罗曼·加里，阿隆感到自己“远离火线”。“解放”的时候，他也曾责备自己过于追求超越“混战”，没有以更热烈的态度为戴高乐主义辩护。

出于一种为祖国法兰西尽义务的情感，阿隆激情满怀，情

绪高到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地步。国家的需要——他所理解的那种需要——远远超过了他个人的欲望。1945年他曾自付的  
20 的这些愧疚、遗憾和自责，导致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选择了不仅放弃文学和哲学，而且放弃了知识分子的慎独。阿隆结束了长达10年（直到1955年）的大学教师生涯，基本上把自己献给了新闻事业。在他看来，这是为国家效劳的最好方式。他为昔日限于纯粹的知识分子的无所作为而惩罚自己。他首先是在《战斗报》，接着在《费加罗报》奋笔疾书。出于同样的考虑，他于1947年加入了戴高乐派的法兰西人民联盟。

但是，他立即对此深感怀疑。他担心自己会精疲力竭，他父亲就是积劳成疾的。他也担心自己沉沦于这种急就章式的写作而不顾明天的短命生涯。1948年以后，他觉得难以承受这种职业记者生活了，试图进入巴黎大学。然而，那些“亲爱的同行”拒绝了他。后来，阿隆把这几年看作一种虚度光阴或一段幕间插曲。他在《回忆录》中称之为“十年虚度”。此外，他又遭遇了个人的不幸：1950年，一个染色体有问题的婴儿出生了。1个月以后，1944年出生的次女又因病夭折。阿隆遭到沉重打击。为了保持平衡，他更加疯狂地投身于工作，投身于他称为“魔鬼缠身的新闻工作”（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264页）。这两次冲击使他认识到，人是多么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无能为力，就不会再去追求普罗米修斯式的荣耀了。”<sup>①</sup>

由于出了下面两件事，阿隆很快走出了这个后来被认为是一事无成的时期。一件事是1955年他再次成为巴黎大学教授

---

<sup>①</sup> *Les Guerres en chaîne*, Gallimard, 1951, p. 490.

候选者。这次成功入选，把他同做学问连接在一起，而不再是以行动为主。另一件事是同年他出版了《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诚然，这是一本论战的小册子，但它帮助他超越短期争论而再次进行更深刻的思考。此书引起了巨大反响。友人的关爱帮助他个人悲剧造成的沮丧中脱出身了。“我从黑暗中走出来，可能预示着我将与生命和解。” 21

此后直到1977年，他的生活展开了一个新时期。他的许多大作都是在这段时间写成的。现在，也轮到他在公众中的声誉如日中天了。

这个时期，他继续同《费加罗报》合作，无论文章的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大众有目共睹的。在这段新闻生涯中，他写了约4000篇社论；他心里明白，他已经成为法国最优秀的社论撰稿人。然而，《费加罗报》社长皮埃尔·布里松（Pierre Brisson）于1965年逝世。在阿隆看来，报纸从此走上缓缓的下坡路（1977年，路终于走到尽头了）。而且，记者活动本身对阿隆也失去了吸引力。他虽然得到了补偿，但丝毫没有减轻他的怀疑：成就来得是不是太容易了？人们是否接受他的文章，是不是只看是否签署了雷蒙·阿隆的大名，而不是看文章本身的好坏？他后来承认，他曾试图像罗曼·加里那样采用一个笔名，然后隐姓埋名。他向这位因悲观失望而以自杀方式了却生命的人靠拢，这不令人困惑吗？

布里松留下了对记者阿隆的描写。他说，他平生很少见到“如此满腔热忱又不时充满忧患意识”（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445页）的人。尽管阿隆比其他人看问题更透彻，但日复一日地写政治评论总会碰到让人头痛的事情，因为历史是无法预测的，今天肯定的东西，明天可能就是错误的。阿隆逝

22 世20年了，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看到，阿隆对其主要观察对象之一——苏联的判断稍显不足。不管怎么说，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无情批判，反成了共产主义宣传的牺牲品。首先，阿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其次，他以为苏维埃国家利用这个意识形态不仅是为了行使政权，更是为了要符合一种理论蓝图。直到生命终结的时候，他仍然强调苏联对欧洲，甚至对美国的军事优势。他曾设想，在一个最近的将来，苏维埃的权力将控制欧洲，因为“美国已经失去了军事优势”。20世纪末的事件揭示了这些预测尽管有充分依据，但仍然是很脆弱的。

正常的教学任务使阿隆个人平和下来。他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投入了教学。然而，正如他曾自责在战争中未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现在他又担心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了。他担忧自己再也不能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于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新的考验：他于1962年发表了第二篇“博士论文”《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尽管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接着，他于1963年又发表了第三篇论文《克劳塞维茨论战争》。这些博大精深的论著确立了他在大学中的声望，却未能让他感到心安理得。他不停地扪心自问：“我的教学对青年真的有用吗？”

这个时期，阿隆发表了许多著作，但这些著作都没有达到他的期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著作中的任何一本都不能使我完全满意，甚至达不到我希望的水准。”除去几篇“博士论文”，确切地说，他发表的不是专著，而往往是文章汇编，或由第三者根据讲义改编或编著而成。但在他看来，这些都标志着他的写作历程，他将不再写书。著书立说，即使是非文学类的，对阿隆来说也是形同陌路。他对



此缺乏自信或缺乏自我估价能力。他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寻求一种思想的最好表达方式就是证明。阿隆用词准确，表达有力。他写的书一般都是独创的。阿隆杜绝任何口头归纳演绎、任何晦涩隐喻、任何引经据典以及任何窃取个人隐私的行为。可能正因如此，他在1967年的一次访谈中解释说，他甚至不敢过于贴近事实，“由于害怕自己搞错，我不敢动手了。我对想象力，无论是哲学的还是政治的想象力，都持怀疑态度”（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423页）。诚然，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可能给政治带来很大害处，但对于作家来说，难道不需要想象力吗？ 23

从阿隆这种所谓“我的愿望是能够使终言之有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著作——包括这本《回忆录》——都显示出，这位作者对自己也经常持怀疑态度：他担心自己流于草率，把激情当作论据，还担心自己缺乏勇气。他把这些心底的担忧掩藏在埋头工作和搜集理性论据之中。但最后，他还是认为：“我怀疑自己没有理性地度过职业生涯和研究工作。”

## 平和

阿隆在青年时代就决定自己要身随心愿，也就是说，他的身家性命来源于他的思考。他在1928年写给一位当年最亲密的朋友的信中，为只用非常空泛一般的词句来谈论自己表示歉意：“这并不意味着我拒绝相信自己，而是说凡是应该遗忘的东西，就应该用批评和意志来拒绝或摧毁它。”（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72页）两年以后，他又写给这位朋友：“我拒绝慎独和自省，因为我不愿再次陷入愚蠢的怀疑之中。这种怀疑就是一直向后看，不会有任何结果。而我仍然相当健壮，

不能让怀疑支配自己。”（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77页）年轻人有超越自我的尊严，1930年代发生的事件多少制约了他的生存状态。随后，个人意志和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塑造了他的公共人物形象。

24 1977年，当轮到阿隆与死亡擦肩而过的时候，事态发生了变化。心肌梗死——血栓进入了心脏——把他压垮了。患病初期，他的肢体不能动，他也不能说话了。另一次致命打击是1950年女儿病逝，这使他陷于极度悲痛和绝望之中。他从中悟到，任何控制命运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什么都比不上一位至亲的性命。血栓几乎宣告了他本人的死亡，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使他从一切恐惧中解脱出来，他放弃了任何控制的欲望，庄严地认了命。他停止了向世界或向自己印证什么。阿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理解了什么叫平和。

他曾因心肌梗死被送进抢救室，被救过来以后吐出的第一句话——不是用嘴说出来而是用左手笨拙地比划出来——是“死亡不可怕”。阿隆从来不缺乏勇气，但他没有面对死亡之前对自己不敢肯定。“我不知道，当我面对子弹呼啸和炸弹横飞时能否挺得住。”事实证明，阿隆一下子撇开了各种杂念，实现了身心合一。

发生的这些事情，首先改变了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他近半个世纪以来进行的不懈战斗，现在都失去了意义。“对我来说，论战的时代结束了。”他也不再没完没了地思虑其他人对他有什么看法。“我很敏锐，二十多岁时曾过于敏锐，现在已经降低到低于普通人的水准。”反之，他承认，亲朋至爱所占的地位应该是主要的。阿隆并非始终不承认这一点，只是现在当众承认了，并以某种方式顺其自然地流露出了对家庭、子孙、老

年朋友或青年朋友的挚爱。《回忆录》的最后几行是留给这些人的：依靠他们，他才找到了平和。

阿隆与自身的关系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心肌梗死痊愈以后，力量有所恢复。他曾自忖，利用自己的余热，先干点儿什么。现在他终于明白了，对他而言，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他提到过三项计划：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书；一本关于历史哲学的书——这两本书都已列入撰写计划；最后是写一本回忆录。他很快不再犹豫：“至少要对自身，或从反对自己的角度，特别下一番功夫。第三本是我必须选择的。不是出于自觉意识，而是出于本能，顺其自然。我希望回忆一下我的过去。”意志不再决定一切。个体的人是复杂的，不完美的。此前一直服从理性，现在，个体自身可以扮演头等角色了：阿隆全身心地投入撰写《回忆录》这项事业中。

25

在最终完成这本《回忆录》之前，阿隆先做了一个简写本和谈话录音。这就是他与两位年轻大学教师的访谈录，后来发表时用的书名是《介入的旁观者》。这具有时代的象征意义，阿隆与两位青年对话者本不属于同一政治家族；这两位青年对话者都参加过“五月风暴”，显然属于左派。但论战的年代已经结束了，即使是左派与右派的对立也有所易位。批判共产主义的恐怖，维护民主制度与人权，几乎所有政治参与都必须通过这个途径。阿隆已经不再是“右派”，他从此代表了一种民主共识。这本书深受欢迎也证明了思想方面的这种变化：与大众及不同政治流派的代表共聚同论，才取得了如此成就。

《回忆录》于1983年阿隆逝世几周前付梓问世，更为详尽地追述了访谈录中提到的各种事件和思想。因此，阿隆成

了他生前出版的这两本书的中心人物。他这样一个人，曾长期把个人放在一边，甚至在得了心肌梗死以后，我们也不能期望他写出像卢梭的《忏悔录》那样一部宗教戒律。一个50年来不屑内省的人，不会轻易改变主张。但他现在愿意成为自我探索的中心。书一页一页翻过去，他的形象也得以一点一点树立起来。《回忆录》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阿隆追述了20世纪法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细致地描绘了各种行为人的面貌。他把自身生活以及公共生活的周边环境都写了进去，而内心波动和事件起伏只是稍有触及。另一方面，他把自己的著述全部收集和归纳到书中，每篇著作的核心内容，他用几页提要加以说明。阿隆还补充了对其评论的各种反应，收入了赞同和反对的信件，以及他自己写的回顾性评论。从某种程度上讲，《回忆录》归纳了他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著述。

他为了驳斥诽谤和表明无辜，说了最后一句话：“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巴弗雷《雷蒙·阿隆传》，第13页）几分钟以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用这句话说明他的《回忆录》最好不过了。这本《回忆录》说出了他在20世纪经历的基本事实。他没有担任“君主顾问”，而是成为一个公众的服务员和解说员，一个带来光明的使者。他放弃充当贩卖幻想的商人，推动每个人去了解身边的世界并公正地评判世界，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做出了表率，但不愿意带领人们直达目的地，因为应该让每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和做出自己的选择。他没有带来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也没有提出一条真理，因此，没有任何阿隆主义可言，尽管有不少人认同阿隆的行为方式。与其说他要激励人心，不如说他要启蒙思

想。而且，他所带来的光明，不是一闪而过的闪电，而是不断点燃蜡烛时迸出的闪烁火花。人们经常赞赏阿隆看问题明晰而清醒；人们将记住，这个喜欢实话实说、厌弃善意谎言的人，从来不是为了解世界而了解世界。这表明，阿隆超越了任何悲观主义，对人类有崇高的信念，有深沉的热爱。

# 目 录

---

## 上 册

序言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 .....	0001
增订本出版说明 .....	0029
前言 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 .....	0030

### 第一部 政治教育 (1905 ~ 1939)

第一章 父亲的遗嘱 .....	0003
第二章 学习与友谊 .....	0030
第三章 发现德国 .....	0066
第四章 在拉丁区中心 .....	0110
第五章 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 .....	0147
第六章 浩劫之路 .....	0187

### 第二部 政治愿望 (1939 ~ 1955)

第七章 战争 .....	0229
第八章 没有抒情的幻想 .....	0277

第九章 记者和活动家 .....	0313
第十章 瓜分欧洲 .....	0355
第十一章 20 世纪的战争 .....	0402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鸦片” .....	0435

### 第三部 祸患之中的教师（1955 ~ 1969）

第十三章 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 .....	0477
第十四章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 .....	0506

## 下 册

第十五章 工业社会 .....	0561
第十六章 将军的宏伟计划 .....	0595
第十七章 和平与战争 .....	0641
第十八章 “他没有理解我们” 或 1968 年 5 月 .....	0667
第十九章 “自信与统治者” .....	0707

### 第四部 当官的年代（1969 ~ 1977）

第二十章 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 .....	0753
第二十一章 后戴高乐主义 .....	0789
第二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批判 .....	0823
第二十三章 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 .....	0866
第二十四章 论历史评论 .....	0902
第二十五章 西方的衰落 .....	0938

## 第五部 死缓阶段 (1977 ~ 1982)

第二十六章 心肌梗死 .....	0969
第二十七章 在《快报》周刊 .....	0980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插曲 .....	0994
第二十九章 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 ...	1015
第三十章 走向苏联霸权主义？ .....	1027
第三十一章 一代人的结束 .....	1037
结束语 .....	1084
作者书目提要 .....	1118
索 引 .....	1126
增订本译后絮语 .....	1141
译后记 (1992 年版) .....	1144



# 第一部

※

## 政治教育

( 1905 ~ 1939 )



## 第一章 父亲的遗嘱

29

我出生在田园圣母大街的一幢房子里，对出生地的印象已经荡然无存。我出生后不久，父母亲就迁居到蒙帕纳斯大街。我还能回想起那所房屋的若干情景：一条宽敞的门廊隐约地出现在我眼前，我们兄弟几人常在那里溜滑嬉闹；沿着墙壁并排放着三个巨大的书柜，上层装满书，下层堆放着纸张及小册子，柜门紧闭。将近10岁时，我就是在那里发现了父亲杂乱地堆积着的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史料。

我们兄弟三人——“三个小淘气”——年龄相差无几。老大出生于1902年4月，老二出生于1903年12月，老三出生于1905年3月。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阿德里昂都堪称一个真正的老大。我们兄弟三人中，最早离开家庭的——更确切地说，最早反抗家庭的——是他，而起初母亲最疼爱的孩子可能也是他。因为在阿德里昂出生的前一年，她的第一个儿子因她难产而死亡。她为此常常抱怨那个接生医生，认为那个孩子本来可以存活。要讲疼爱，阿德里昂也不见得比别人得到的更多。不过，父母亲长期供他吃住，由着他游手好闲，养尊处优。一提起他来，母亲就眼泪汪汪，父亲则为自己的示弱放纵而辩解。若不然，他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我未出生时，母亲认定我将会是她热切盼望的女儿。于是，正像阿德里昂享受着老大的优遇一样，我被看作老幺。母亲有时感到“大家伙们”（母亲这样称呼阿隆父子）态度生

硬。她经常拉着我的手，而我呢，也喜欢减轻她的孤独，与她  
30 在一片柔情中达成默契。至于父亲，则对我委以另一种使命，  
这对我整整一生的影响，超过了我在生命的最初几年中初步体  
验到的来自母亲的抚爱与温暖。

在写我的回忆时，首先应该详尽地谈谈阿德里昂。然而，  
无论是从我大学毕业到战争开始，还是从 1944 年我从伦敦回  
国直至他于 1969 年去世，他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未占据什么位  
置。那么，为什么首先要谈到他呢？约在 1950 年，我的一个  
表兄曾这样说过：“在 1940 年以前，每当别人问我‘你是阿  
隆的亲戚吗？’，他问的是我同那个网球或桥牌运动员的关系。  
如今，别人再问起这句话时，他关心的却是我同你的关系。”  
的确，在体育界，尤其是在巴黎体育界，阿德里昂颇有名气，  
至少也算得上是个有名人物。在 1920 年代末“四个火枪手”  
时期，他在网球运动员中名列第九，并且在法国四五名最佳牌  
手之中，可能也应该首推他与 P. 阿尔巴朗两人。他曾参加居  
尔贝特松队与法国国家队的比赛，那是他最为显耀的时期。他  
虽然不是这些比赛中的职业选手，却以此为生，尤其是靠打桥  
牌赢钱。1945 年以后，他放弃了球拍和纸牌，转而倒卖邮  
票——当然，这也算业余职业。他鄙视这个伪善虚假的社会，  
渐渐滑上玩世不恭的道路。直至离世，他都生活在社会的边  
缘。

1960 年代，我们极少再见面。他在动过一次手术（绞窄  
性疝）之后，曾经表示希望能够到位于肯尼迪总统路的我们的  
家里来往。我们犹豫不决，未能及时答复，这使他勃然大  
怒，不再与我们来往。我记得曾与他于 1968 年 5 月短促地见  
过一面；他对世态的反应依然如故，愤世嫉俗，孤芳自赏。

1969年11月，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的口气与其说是焦虑或悲伤，不如说是自嘲调侃，他告诉我说：“这回可跑不掉了。我觉得腹部有个硬块，可能是癌。”他没有弄错，癌症已经扩散了。在最后的十多天里，他变得暴躁不安。他一天要抽两三包香烟，咳嗽不止，即使是外行人听到那种声音，也会猜到这是吸烟过度所致。

他住在一家美国医院里，我天天去看望他，只有他还省人事的最后一天没能去。当时，我正在为竞选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职位而活动。阿德里昂的死与这种社会喜剧形成鲜明对比，因之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活动的滑稽可笑。阿德里昂从未在这种社会喜剧中扮演角色，也不为其种种浮华而悔恨。他以自己惯有的态度等待着生命的终结。他面无惧色，甚至焦急不耐，但他害怕挨受痛苦。他恳求我帮助他免除这种痛苦，还向医生要来一瓶阿司匹林药片，但没有吃。他并没有提前离开我们。痛苦煎熬着他，那种模样，惨不忍睹。他本人则敢于面对这样的结局，始终把持住自己，没有自责，而是以某种超脱的客观的态度对他的68年岁月做了总结。

31

他以满意的心情回顾了1940年以前他人生的第一阶段，但这种满足不是由于尽了某种义务或完成了某个使命，而是只关乎他自己：女人、金钱和体育上的成功，他想得到的，都得到了。在那个年代，他经常驾驶着一辆蓝旗亚轿车（曾多次借给我用），风度翩翩地出入于一些最豪华的网球场或桥牌俱乐部。他是一个典型的享乐派，从我的人生哲学出发，我对这类人蔑然视之。但是另一方面，他们那么轻佻自负，举止从容，我不免在心底又隐约感到一丝自卑，暗自对他们颇为欣赏甚至是羡慕。

法国的战败结束了他的青年时代。他突然间开始强调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这并不是由于他在亲人中发现有仇视犹太人的事，因而寻找机会发泄受压抑的感情。后来，他在医院的床头才向我倾诉了深埋心底的感受：他在体育界或娱乐界的朋友们（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这是几个真正的忠实的朋友）对犹太人的命运视若无睹（持这种态度最为有利），这使他感到吃惊，感到受到冒犯。

在一场痼疾之后，他中止了网球运动。又有一天，他在牌桌边突然感到疲惫不堪，于是放弃了桥牌。德国人占领法国时期，他开初在戛纳居住，随后迁居瑞士，在那里迷上了集邮。他对我说，他感到战后那些年的生活不如战前那么美满如意。的确，这个懒汉终日沉湎在整理邮票之中，以不亚于打桥牌的才能数小时不停歇地埋头苦干。他说，如果没有战争，他本可以通过这些“朋友”中的某位寻求到一种“地位”。这些朋友原来与他亲密无间，由于连年不断出现变故，他们分道扬镳了。

32 在最后那段时间，他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什么遗憾。他叹惜不以自己意愿为转移的客观现状，使他失去了生命最后几年中的某些乐趣。尽管如此，他认为自己已经活得够长了。总之，他还是保持了“能为人所理解的性格”。正如他生平的为人处世，对他来说，衰老并无所谓。这并非由于他远离亲人，才故意做出这种表示。实际上，就某种意义来说，家庭仍旧对他保持着吸引力。1934年，当父亲故世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父亲的遗体前痛哭不止（我想，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景）。他边哭边问罗伯特和我：“你们说，我有罪过吗？”因为1929年，我父亲曾由于交易所行情暴跌而失去了所有财产，而在我

们三兄弟中，只有阿德里昂有足够的钱来帮助父母亲。于是，我提议他这么做。他回答说，他仅仅是由于生活方式所迫，才维持着一种表面的阔绰。另外，即使他答应提供帮助，也无法预测父亲会怎样来对待。罗伯特和我尽一切所能来减轻他内疚的心情。

我遗漏了一个细节，可能这一个还非常重要：阿德里昂生来聪慧过人。但是，他将自己的才能都用在了桥牌和集邮方面。他在奥舍中学结束正规学习以后，进入初级数学专科班。几个星期之后，他表示对那里的学习感到厌烦。父亲赞成他攻读法学学士学位和数学学士学位。他果真攻读法学学士学位。在考试前的三个星期中，他几乎背熟了所有必学的课本内容，并用这种方法通过了三个年级的全部考试。但是，由于没有通过普通数学那门考试，他便放弃了数学。他对网球的兴致远远胜过数学。直至1930年代初，他一直随家庭生活。后来，他搬到马里尼安大街一幢楼房的一楼。那套小小的公寓是他的一个朋友布置的，其陈饰体现着1924年博览会时代流行的风格。自他搬去后，屋子被搞得杂乱无章，肮脏不堪，地毯和壁纸破破烂烂，处处表现出主人的马虎大意，但并非因为囊中羞涩。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临终。

桥牌和网球。我们家在凡尔赛的那座房子，是双亲在1913~1915年建成的。花园里有一个网球场。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在那里打几次球。在这方面，阿德里昂最有天赋，罗伯特虽然年龄居中，但天赋最差。另外，我在近10岁时，同大家一样也迷上了桥牌。有好几年，几乎每天晚上父亲与我们三个儿子一起打桥牌。父母规定，晚饭后的时间不必“用功”。直到阿德里昂在外边找到了别的消遣方法，家里晚间的牌局才停

止了。至于我，自从发现了哲学和思想世界的新天地之后，对网球和桥牌的热情也逐渐冷淡下来。

首先涌入我脑海的一些回忆——阿德里昂与他的“生存选择”——可能让我对我的家庭做了错误的描述。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感到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平凡的传统家庭，属于法国犹太人中等资产阶级。我从未见过面的祖父在洛林一个叫朗贝维莱的村镇里办起过一家纺织品批发商店，据说，18世纪末先辈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他和堂兄弟保罗（斯特拉斯堡著名生物学家马克斯·阿隆的父亲）合作经营，生意十分兴隆，后来商店被迁到了南锡。

关于祖父的事，我知之甚少，仅仅从父母亲以及一个曾在祖父手下做过事、后来移居墨西哥的洛林人那里了解到一点儿情形。我的祖父费迪南本来要让我这个继承其姓氏的小娃娃干一番大事业。<sup>①</sup> 1961年，我在墨西哥城遇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曾在“阿隆兄弟”批发店里做过几年事。他说起从老板那里得到的教训：“有一天晚上，已将近半夜了，费迪南突然表示要出门。他说，大家快去睡觉吧，还不算晚，明天早点起床。”我的祖父母是东部地区的犹太教徒，表现出一种毫不通融的爱国主义。我不信他们从来没有扪心自问过今天已经风行一时的问题：你首先是法国人还是犹太人？即使是我父亲，就我记忆所及，尽管从未有任何历史事件能像德雷福斯事件那样使他震撼，他的立场却始终如一。他年轻时是共济会会员，没有宗教方面的顾虑，从不践行或基本不践行犹太教教规教义，与那些出身天主教家庭或没有宗教信仰的勉强算得上左派

---

① 他们曾叫我雷蒙·克洛德·费迪南。



的大学同人相比，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不同之处。

据说，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是“有钱人家”，但也不是大富大贵。外祖父在北方地区拥有一座小纺织厂，母亲带来一份嫁妆。祖母家里在1914年以前有一辆大汽车，并有一个戴鸭舌帽的司机，这种排场倒并不是虚有其表。的确，我的父母从双方的家庭里都获得了几十万法郎。祖母去世后，父母亲继承了她的一笔遗产，便决定离开巴黎，迁到凡尔赛，先在马延大街租了一幢房子住。之后，他们又请一个搞建筑的朋友设计建造了一幢房子，然后搬进去住。这幢磨石粗砂岩的房屋位于哥拉第尼公园路，当时是那条街上最边上的一所房子，花园的墙外有一个足球场。

我的父亲依照犹太家庭的习惯，从年轻时起就不打算继承父业。他的学习成绩相当出色，在里昂学校名列全班第一。同学中间曾有一人是他的竞争对手，此人后来在巴黎大学教授法国文学。许多年之后，我曾见到父亲保存下来的当时的一些哲学课作文、讲演练习稿以及拉丁诗文稿。他在法科一年级时曾参加巴黎（也可能是全国）优秀大学生竞赛，并获得一等奖。但是，出于某些原因，父亲并未成功进入司法界。这些原因是后来我用尽心思才发现的。他改为参加预备教师资格考试，先报考罗马法和法律史。考试每两年举行一次，他在考试中取得了第二名。但是，那次考试只提供一个职位。一堂大课需要准备整整24小时，根据规定和惯例，他得到著名历史学家依西多尔·莱维（Isidor Lévy）的指导。他先在卡昂法学院任课，随之又决定放弃获取教师资格回到巴黎，在巴黎法律学院获得一个低于正式教师资格获得者的职位（这种职位在几年后被取消）。从此，他一直从事教学，并执教于高等商业学院和高

等技术师范学院。他大材小用，抱负付诸东流。本来，他应当进司法界。但是，他进了教育界，并且自以为找到了合乎禀赋的工作。他常说，这是世上最美好的职业。

35 难道他甘心如此吗？直至 1929 年以及大萧条时期，在我的记忆中，他仿佛一直是一个愉快坦然、境遇顺利的人。但是，我渐渐萌生了疑问。在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之前，他已有一些法律作品问世。自从结婚并有了三个孩子之后，他停止了“奋斗”，仅仅发表过一本无足轻重的小书《战争与法律教育》。他离开了巴黎，据说是为了躲避“现代化生活方式”。在凡尔赛，他也没有更好地利用闲暇，而是随波逐流，一无所求地打发着日子。当然，失意和压抑的感觉时不时地在他的意念中闪过。但是，在更多的时间里，他对自己和别人都这样说：他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了。我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渐渐了解父亲。在我的眼中，他强有力的形象已被受到挫败的形象取代了。我感觉到在自己的身上寄托着父亲青年时代的希望与追求，因此，我有责任使他重新振作起来。我要以自己的成功来消除他的失意感。我的女儿多米尼克的出世，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最后的快乐。可是，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与世长辞了。

回忆的思潮不断涌来，再次将我带回 1929 年至父亲去世的艰难岁月。那期间，他失去了一切，包括自己的财产和我母亲的嫁资。这时，父亲已是花甲之年，自从结婚以来，第一次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薪金收入生活。父亲本来属于时代转折时期的资产阶级，他的生活支出超过工资收入。这并不表明他花钱随便。那么，为什么不把资本收入花掉呢？但我担心父亲早已养成习惯，支出不会超出自己的薪金和补贴。我记得，早在噩

运降临以前，在凡尔赛时，母亲曾经提醒父亲说：“我认为我们的开支不再超过我们的收入。”父亲却答道：“不，我们超支了。”

我母亲不是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妇人；全家老小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方式——像个厨娘或女仆一样。1920年代，由于三个儿子要靠家庭补助金生活，担子更加沉重不堪。在战后通货膨胀时期，父亲养成在股市里投机的习惯。说“投机”未免言过其实，可能他先期买进，如果行情看跌就存放起来。渐渐地，他越陷越深，自己已无力负担。1929年各国有价证券市场崩盘，他同许多人一样遭受到打击。但是，他所受到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他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也因为他30年来，除了家庭幸福和孩子的前途，再无任何雄心壮志。 36

我们的父子关系依旧如前，我很少向他提什么问题。有一次，当我稍稍触及实质问题时，他回答道：“如果我把证券脱手，我就要破产。”其实，他早已破产，不过，他不甘心接受这个事实。于是，他留着证券，亏损加上税费，越亏越多。当时，罗伯特已进入巴黎荷兰银行做事，本来应该替父亲出主意，但是他什么也没做。父子二人始终没有换位思考，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忆及父亲在生命最后几年中的情景时，总觉得自己有罪，并且感到莫大的悲伤。他尽管咎由自取，但毕竟不该吃这样的苦头。任何一个“小散户”的几句花言巧语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他动心（我记得，一个投机经纪人曾把他拖进一笔交易，那一次他损失了几千法郎）。他完全不像一个身遭不幸的人，总是勇气百倍地出去兼课，当家庭教师或辅导应试。有

一次，我试图同他谈谈，他说：“我这是挣饭吃。”

我自小就有负罪感。战争期间，母亲收集了一套铅制玩具兵。如果我的记忆准确无误，她还特别喜爱收集各国同盟军人的军帽——我担心这项爱好花费太大。1922年，部分出于我的缘故，父母亲重新返回巴黎居住。随后，他们又移居凡尔赛，最终卖掉了房子（当时售价50万法郎），做了最后一次蠢事。当然，我未曾参与过父母的决定。但是，既然我们的意见能够对父母的决定起相当的作用，所以，我并非毫无过失。此外，罗伯特和我在读书期间都接受了父母的供养。有时，我向父亲要支票，交纳室内网球俱乐部的会费，他忍不住提醒我说：“搞这项运动太费钱了。”

“资产阶级”和“犹太人”这两个词，同样频繁地出现于我的笔尖。我的家是犹太家庭，但是否可以说它更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呢？我无法回答。也许，这个问题意义不大。母亲同两个姨母关系密切，父亲却同大姨母不太融洽（他对此有充分的理由），钱财的纠纷（涉及外祖父名下的小纺织厂）导致了他们关系的最终破裂。父亲与姑母之间也有“龃龉”，关系时好时坏，但这恐怕不应归咎于父亲，因为父亲一向为人大方。

如果我想扮演社会学家，我将会说，父母亲还都属于一种大家庭（在祖父母那一代，一家有6个孩子并不稀罕），兄弟姐妹都舍不得离开，彼此感情太深，绝不肯以路人相待。尽管他们有时也会“吵架”，但充其量是共同生活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至于我们这一代，似乎已前进了一步。除父母亲，我们在表兄妹之间，甚至在亲兄妹之间，仅仅选择合得来的彼此来往。

在钱的问题上，我只想在此略提几句。大学毕业之后，我在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财产，仅仅依靠薪金度日。偶有一次，在与阿兰交谈之中，我将老式的资产阶级童年与现在的状况，即齐格弗里德所说的一位毫无储蓄的资产阶级状况做了一番比较；我向他表示，我是自得其乐，更确切地说，是感到一身轻松；我无须为钱操劳，同工薪阶层一样，挣多少花多少，但毕竟利用了在学校积累的智力资本。阿兰接过来，我的运气不错，先享受了一个富裕家庭提供的有保障的生活，然后得到了每个人都可以从生身父母那里得到的遗产，别无其他。这是人品的遗传，不是财产。也许，我从来没有像其他经历过真正的贫寒生活的人那样，终日因“担忧缺吃少穿”而惴惴不安。同时，我也不至于念念不忘美国人所说的“跟穷人家的人一样阔气”。

阿兰确实言之有理。1944年，我从英国返国，身无分文。波尔多大学校长给我提供了一个社会学教席，并且向我保证，全体同事都将乐于与我共事。我未多加考虑，拒绝了这个好意。这使我推迟10年才返回大学，让我悔之不及。但这也反映出我惯有的既轻率（自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又自信的性格。除了教学，我还能找到什么职务呢？当然是做报社记者了。但是，我在战前没有写出任何一篇日常报道，虽然写有几本关于哲学的书，却晦涩难懂，显示不出任何社论作家的才华。

或许，我对钱财模棱两可的态度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可是，对于父亲，我还欠有一笔永远无法清偿的债务。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准备教师资格考试时，以为能不辜负父亲的期望，为父亲出一口闷气。因此，每当我朦胧地意识到，或是担

心自己将在生活道路上遭受失败，抑或未能尽己所能时，我就会想到父亲，似乎这将使他在生活中又遭受一次失败。父亲把平生愿望托付给儿子，要他为自己争气。然而，儿子出于性格上同样的弱点，再一次走上轻率之路、失败之路，这更加不可原谅。重复一遍，就更加不可原谅。这是因为，父亲尽管不成功，还能长期过着心安理得的生活，而我却办不到。

数年前，我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事前，我忘记了应当答复以色列教授向我表示的祝贺。头天，我在魏茨曼科学院发表讲演。那日上午，在乘车前往耶路撒冷之前，我匆匆忙忙地执笔作答（这是我最无准备而又最受欢迎的讲话之一）。我在最后一段谈到向自己的父亲致意，如果他在九泉之下得知我参加竞选法兰西学院教授，以及获得耶路撒冷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他会感到欣慰。我的朋友丹·阿夫尼（巴黎的记者们不会忘记此人）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上了一堂充满犹太精神之课，将授予儿子的荣誉奉献予父亲。犹太精神？可能精神分析家会对此做出另一种解释。在此情此景之中，我可能忆及50年来身上所负有的债务，并想使自己确信，我终于还清了债。

我是个典型的好学生。八年级时，我才进凡尔赛中学读书。在此之前，一个小学女教师拉朗德小姐教会了我读和写。关于这个教师，我只记得她曾在我参加竞选法兰西学院教授时给我写过一封信，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印象了。虽然我从私人教  
39 师那里学到的知识达不到八年级的水平，但是，我很快就追赶上去了。特别是从六年级开始，我总是雄心勃勃地盯着全班第一名的位置，似乎这个位置只应归我所有。简而言之，极端的

自尊心终日折磨着我，使我至今回忆起来，不禁感到羞惭。

我喜爱新的知识，愉快地学习着。但是，直至进入哲学班以前，我还未曾真正体会到知识的非凡魅力。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历史、地理，所有这些课程中没有哪一门能够占据我的内心世界，激发我的个人兴趣，让我感到愉悦。比起拉丁文或历史，自行车（我一直梦想当自行车赛冠军）和网球拍（为何不能得个网球赛冠军？）更能吸引我。可能正是由于我们居住在凡尔赛，所以我们不常出入剧院、博物馆和音乐厅，不过学校设有钢琴必修课。大致上快到15岁时，我才成为班级第一名（这里的中学，水平比巴黎市区要低一些），但课外知识比未来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少一些。我进入孔多塞中学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时，才体验到自己的落后和无知。

除了必修课，我是否读了很多书？在我十一二岁时或许如此。我记得曾读过《战争与和平》，当读到其中的一段描述安德烈王子躺在大地上，双眼盯着蔚蓝色的天空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此后，我曾多次试图重新体验，却再也不能够获得。那段极其引人入胜的文字所具有的魅力一闪即逝。我对这一段期待太高，一旦落空，整部书都失掉了魅力。其实，怔忡焦灼的期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我平生经历过不知多少次。我曾经私下朗诵奥拉斯和居里亚斯的对白，感觉到自己的精神不断升华，达到一种崇高壮丽的境界。在法兰西话剧院上演这出悲剧之前的许多天里，我终日憧憬着即将到来的时刻，想象着剧中那些角色美妙无比的音调，体验着无可言喻的快乐。我仿佛已经耳闻目睹剧中主角的表演，情不自禁地模仿他们巧妙的对白：“我再不和您来往了……现在还和您来往……”然而，神妙的境遇并未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导演不好，演员不行

(我想着保罗·穆内、埃斯康德还都健在)? 大概不是这个原因。多年之后,我拜读了普鲁斯特的著作,才懂得自己的失望是多么平淡无奇。生活不可能凭意志来完美无缺地享受。普鲁斯特给过我若干完美的时刻,然而,我现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不敢轻易重读《追忆逝水年华》之中的某些段落,生怕不能够再一次体验当初那种感受,甚至糟蹋了原有的美好记忆。

40 少年时期,我除了贪婪地阅读《三个火枪手》《战争与和平》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小说,还从父亲的藏书里,也就是从那些柜门紧闭的书柜里面,寻找到各种各样的书、传单、有关德雷福斯事件的报纸以及左拉写的小册子《我控诉》。我只顾沉湎在研究德雷福斯事件的来龙去脉之中,却没有注意到其中提出的关于犹太人及其在法国所处的地位的问题。在战争期间,父母亲同所有人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激情。能称之为激情吗?能,因为我的姑表亲长辈全都为国家贡献出大量钱财。战争爆发时,年已43岁的父亲应征加入了本土保卫军。他在图尔一个兵营中度过了几个月,1914~1915年冬季复员后才重操旧业。我不无羞愧地回忆起彼时的自己,那时,我对他人的苦难遭遇和战场上的血腥情景漠不关心。我当时真的是不闻不问吗?回答是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对学业和娱乐(在凡尔赛公园里的小河上滑冰)的兴趣超过对政府公报和新闻报道的。但是,当学校的教师对学生发起动员时,我也出于自然的民族主义感情,报名加入“海洋与殖民地同盟”。至于法国有殖民地,还负有在那里传播法兰西文化的使命,这个我就管不着了。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要求每个小学生谈谈自己将来愿意选择何种职业,我便在作文中诌



歌“小船长”的豪情壮举。

德雷福斯事件并没有扰乱我这个法国小人物的情感。父亲曾将战争和德雷福斯事件联系起来，很出乎我的意料。他认为德雷福斯事件较之于战争，更能检验和判断人性和人的个性。当然，我十分清楚，我是一个犹太人。我常常听到犹太教资产阶级口中的一句话：“就是那些人在制造排犹主义。”哪些人？就是所谓的普通人，他们在公众场所大声喧哗，放声大笑，举止无节，引人侧目。我有个姑姑，她就特别喜欢在我父母亲的亲戚朋友中侦查有无煽动排犹主义的人。我看在眼里，常常暗地为此感到气愤和难过。我到了懂事的年龄之后，甚至对此感到难以容忍。因此，1933年以后，德国犹太人大批来到法国，我对许多法国犹太人——所谓的以色列精英——的态度感到气愤，但不惊讶。无论如何，这是事实：他们是“德国佬”，其中大多数人曾经与他们的人民——他们认同的人民——共同生活在一起，同时又喋喋不休地说“让上帝惩罚英国人”。大多数法国的以色列精英对德国犹太人没有丝毫同情。他们并未认识到，也不愿意认识到自己的时代正在到来，因为他们已经被同化，丧失了自我选择的能力。

41

在尚未接触到希特勒统治以前的德国时，我仅仅感到自己是个公正而无偏见的法国公民，几乎从未想到自己是犹太人。也可能我在谈到那个时期的情况时，往往将自己形容得过分天真幼稚。然而……当时有个历史学教授，他的思想右倾，接近法兰西行动派。在高年级哲学课上，他谈论第三共和国，他说：人们在事后许久，仍然不了解德雷福斯是否确有罪过。这个问题实际上无足轻重，重要之处在于，该事件为那些敌视军队或宗教的人兴风作浪提供了良机或借口。接踵而来的是激进

派和“富豪”组成的“卑鄙”政府。我竭力同这个在战争中负过伤的教授争论，举出所有的实际情况：“蓝色电报”、爱国者伪造文书、雷恩诉讼案以及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教授用他惯用的话来回答我：“事情比你所说的远为复杂。”他还说假话：“最高法院无权审理案子的本质，它只是为了结束这场分裂我们民族的论战才受理了此案。”我记得，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谁都没有提到，或者始终未强调指出德雷福斯是犹太人，而我同样也是犹太人。在1920年或1921年的欧战时期，同仇敌忾的神圣联盟还有点余音绕梁。

自然，同学们不会不知道我是一个犹太人。对此，他们有何想法？当时我不得而知，或许，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想法。我十一二岁时，才开始对此有所体会。那一天，在放学后我正走出校门，突然听到背后有同学冲着我大声喊叫：“臭犹太！犹太鬼！”我受到突如其来的刺激，惊恐万分，回家后向父母哭诉。第二天，一个“大人”——我的哥哥阿德里昂把那些小家伙赶跑了。

《凡尔赛条约》签订那一年，我14岁，爱和家人大谈俄国革命、占领莱茵区等世界大事。父母亲让我们参加大人们的谈话，哪怕有著名学者在场。他们爱说：“我将孩子们视为平等的人对待。”他们天真地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孩子们“摆脱拘束”。其实，这使我们更加拘束。父母亲的一些朋友戏称我为“律师”，因为我能言善辩。至于在1918~1921年，即从13岁至16岁，我辩解了什么，现在却全然记不得了。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心智才实现了转折：以前，我仿佛处于一片漫漫黑暗之中，是哲学带给我理智之光。1921年10月，我进入哲学班学习。那时，国内的爱国主义激情逐渐回落，左派

正在重整力量和思想。胜利后幻想的破灭，冲击着天蓝色的议会。父亲又恢复了他以前的温和左倾观点。据我判断，他在1919年曾投票支持国民阵线，但在1924年，他确实投了左派联合阵线的票。那时节，他还订阅《国民进步报》（这家周刊曾在1924年的选举中引导着左派联盟的竞选活动）。他重新成为年轻时代的德雷福斯派，可是从来没有投奔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因为后者迟迟不能“帮他解放思想”。父亲逐渐摆脱了战争年代的影响，小心翼翼地采纳与敌人和解的主张。

1921~1922年那个学年，是我生活道路上一个决定性时期，最突出的历史事件是大危机、大战和大革命的最后震荡。尽管我对政治、经济、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卡尔·马克思等一窍不通，但仍然第一次隐约地窥见哲学思辨，或者更简单地说，窥见思想的奇妙天地。在此之前，我曾选择了A专业<sup>①</sup>，这与其说是出于对古典语言的兴趣，倒不如说是怕学数学。在我上四年级时，有一次，我对一道数学题根本回答不出所以然。老师在我的作业上用红笔批改道：如此简单的问题，为何回答不出？那件事在我的精神上刻下了一道伤痕，永远难以忘却。我在障碍面前退却了，换了其他情况，我可能同样如此，知难而退。发表一些短评，写作一些无足轻重的书，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躲避吗？

父母让我自己去选择应走的道路，甚至不想与我提及这方面的话题（轮到我对自己的女儿时，也并未更好地引导

---

<sup>①</sup> 在法国学校中，全部专业被分为四类：A专业即哲学，B专业即人文科学，C专业即数学，D专业即自然科学。——译者注

她)。我的哥哥和弟弟走的是一条标准的拾级而上的道路。他们选择了 C 专业，学习拉丁文和自然科学，既可以进哲学班，也可以进初等数学班学习，最后通过中学毕业会考。通常，那些优秀学43 生能够在同一年里同时通过这两门考试，获得两张文凭。选择 A 专业，则只能攻读哲学文凭，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数学的比重很小。通常，我的各门文学课成绩都很出色。此外，几何、代数以及其他基本科目对我来说也非难事。当然，有些时候我也会被一些作业难住。我感到自己运用概念比运用符号、数字或代号更为得心应手。

时至今日，我一直在思忖，为什么上法文课（即文学课）与上哲学课二者之间有一种中断的感觉。心理学在哲学班的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这种心理学十分奇特，它一方面继承了推理学的传统，因而属于半形而上学，另一方面又吸收了初期的科学心理学的内容，从而又属于经验主义。从 30 年前我父亲做学生时起一直至我为止，它的内容始终未发生变化。然而，就是这种模糊不清的心理学，就是这些从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那里学到的传统心理学的残骸剩屑，却已经足以使我明白，自己为何选择了这个专业，为何乐于去体验冥思苦索时清苦的感受。

艾莱特教授用一生的时间写作一篇关于法律哲学的论文，但始终未能完成（有一篇与他的论文主题相近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使他信心受挫）。他参照《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上一篇文章的内容，力图根据审判哲学而不是概念哲学<sup>①</sup>来解析和阐明法庭实践。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可以算作莱

---

① 即根据案情的特点来断案，而不是依照主观观念做出符合案情的推断。

昂·布伦什维格 (Léon Brunschvicg) 的信徒。艾莱特老师是一个善于深思的人，他在课堂上，当着我们的面思考问题。他不为某一套理论体系所禁锢，而是孜孜不倦地寻求更高的目标，艰难地探索着真理。有时，他讲解的内容模糊不明，学生们几乎听不懂，因而失去了信心。因此，有时我得为我的朋友列奥纳尔·里斯特和雅克·海玻（后来成为一个令人敬佩的外科医生）转述老师的讲解。然而，这种真正开动脑筋、努力探索的行动，提供给我们二十多个十七八岁的男孩的不是一种表演，而是人类的经验，它对我们之中的几个人具有独特的无可比拟的价值。在讲解问题时，起初，老师本人也不见得胸有成竹，他只是细心地探索问题的答案，他运用的是启发思考真理而不是灌输真理的方式。名副其实的学者们都是如此，他们传授业已获得的真理，但更注重传授获取真理的手段和方法。在中小学各学科教师之中，即便是最优秀的教师，也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引导学生接近未来科学的领域，或者向学生展示发现真理所需要经历的曲折过程。 44

艾莱特老师通过以上教学方式来启动学生思维的运转，推动学生不断完善思想。这种做法不无风险。哲学家们在探求真理时一般形成一种不良习惯，他们不做调查和检验，单单依靠思维这个工具；其他人不做科学分析和论证。但是，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与这个名副其实的哲学教授共同度过的数月中，他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集》、康德的先验推断法深深地铭刻于学生的思想中，并且传播给我们无法取代的知识。也许我对那个阶段做出如此评价有些为时过早。我将那一年的中学生活与以后四年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生活混为一谈了。报考高等师范

学院的决定，自然而然产生于哲学班。在这里能够称之为“决定”吗？我既然选了 A 专业，便进不了名牌理工大学，我也不知道可以同时到私立政治学院攻读法学学位。虽然那时我开始对公众事务发生兴趣，但是并不想一生从政。后来，我在高等师范学院曾不止一次试想走这条道路，但那更多的只是因为受到一种诱惑，尽管会遭受失败，也想要冒险尝试。其实对我来说，选择新闻职业同选择政治职业并无不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是认输的道路，是没出息的人置身避难的场所。

实践使我懂得掌握分寸，因而少年的自尊心得到升华和纯化。我在孔多塞中学上预备班，准备报考高等师范学院，还没想到要跻身于名列前茅的优等生之列。我只求能够踏入这座高等学府，便感到心满意足了。但是四年之后，在取得教师资格的毕业会考预测中，我已能够与萨特并列榜首。然而，当我在正式考试中真正获得第一名时（位于埃玛纽埃尔·穆尼埃和达尼埃尔·拉加什之前），我清醒而伤感地看出，自己的成功不过是学业上有点成效，不论笔头还是口头都没有任何独特之处。在那时节，教师资格考试一成未变，考生只显示一些哲学水平和舌辩才能而已。

45 是否可以这样说，我在哲学班的学习为我奠定了基础，使我得以自然而然地拾级而上，步入高等师范学院，最后终于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呢？我致力于智力运用，看来只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天赋比在其他方面高些。我觉得这样看待自己未免苛刻。我在读哲学班时就已懂得一条道理：掌握了思索这个武器，就可以摆脱在生活中的被动性，就能充实、丰富生活，并与大思想家琢磨、切磋。我用一年的时间潜心研读康德的著述。我从中受益匪浅，一劳永逸地（起码是从内心深处）去除了虚荣心

和自负感。在这一点上，我至今仍然感到自己同莱昂·布伦什维格的感受十分相近。1892年9月22日这一天，他在记事本上写道：“我幻想自己正从万能的哲学圣殿中被驱逐出来。”50年后，他对自己做出如下回答：“看来，我这个人可能没有过于违背这个警句：瞄准最高目标，精确估计自己。”在一封写给女儿阿德里安娜的信中，他引用了这一“亚历山大体诗”，并评注道：“这句话可以作为我的座右铭：对自己不存幻想，努力思考和解释人类最高的才华。”我不想为自己辩护，也不敢自诩如此专一，但是我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去“维护和高度评价”那些比我伟大的人。我心甘情愿地承认，我的某些思想尽管不是从他们那儿学来的，但在我看来是暗含在他们身上的，所以这些思想就该属于他们。

此外，为何哲学班使我转向左倾？1921~1922年，一直被民族激情压抑着的学院派与资产阶级左派不期而遇，重新振兴。可是我认为，哲学本身就教人懂得世界主义。人要思考，所有人都有能力思考。因此，应当教育他们，说服他们。战争否定人性，因为战争的获胜者除了拥有占压倒优势的力量和善于施用诡计，再也显示不出任何价值。所以，不管教师的看法如何，在一般情况下哲学班里的气氛滋养着左倾情感。

哲学课确实向我展示了思想的广阔，尽管课上讲到了笛卡儿，但没有教我掌握方法论，后来高师的“哲学家”讲的方法论弥足珍贵。要思考，首先应该学习和研究。巴什拉尔（Bachelard）曾在某本书中写道：哲学家先思考，后研究。我曾在10年时间中表明过一定的政治观点，我确实喜欢某些人而不喜欢另一些人。我对卑贱者、被压迫者深感同情，反对那些滥用手中文权力的豪强。但是，在哲学思想和我的情感之间存

在一段真空，这就是对社会的现实——可能实现的社会和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不甚了解。大多数我的同代人也如此，他们未能填补，甚至没有意识到应当填补这段真空。

我记得，我的第一篇“马基雅维利式”<sup>①</sup>文章用兰德豪斯街名署名，法兰西学院（德国）就坐落在那条街上。<sup>②</sup>萨特对这篇文章的反应简单明了，有一个与我们两人都相识的朋友告诉我，萨特说：“莫非我当年的小同学现在成了一个坏蛋？”就在那时，我发现，用哲学术语来讲，政治有其独立性。政治就是政治，与道德有本质的不同。我的读者看到此处将会说：“真是了不起的发现！”不错，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我从小学直至大学所接受的教育始终没有培养我去了解政治，了解欧洲和世界。在此之前，我出于学院式的唯心主义，谴责《凡尔赛条约》、反对占领鲁尔区、支持德国方面提出的要求，我倾向于左派政党，因为其言辞和意愿符合我的感情。也许这种感情来自我对哲学的爱好。但是，自那之后，我的感情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不太有把握，尽管我的理性——或我自认为的理性——逐渐支配了我的感情。

这样重构往事，记忆在其中占多少成分？我从自己经历中得出的思想或只是依样画葫芦，这占多大比重？我从17岁起改而接受哲学思想和左倾思想，思想有了定见，政治态度鲜明（我为左派联合阵线于1924年获胜而欢呼雀跃），对于有关法

---

① 一个朋友曾向我肯定，外行人不了解“马基雅维利式”这个形容词的词意。大家都知道“马基雅维利的”这个词的通俗词义为玩弄权术，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式即马基雅维利的，但没有贬义。它的词意为：只做现实世界上应当做的事。

② 这篇文章我找不到了。题目也许叫《谈谈现实政治》，发表在“自由谈”上。



国议会和世界史的各种事件，都在感情上以局内人自居。在这些方面，我不认为脑海中的记忆可以改变或者歪曲现实中的经历。然而，在此要得出结论尚为时过早。我只不过讲到哲学班、奥舍中学，以及出于避难就易、兴趣、学业水平和哲学上的启示，我怎样选择生活道路。那时，我是否梦想终身做一名中学教师？是否已经跃跃欲试想著述成名？抑或是按照常规，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之后再写论文？我现在无法说清，在17岁时可能更不清楚。在凡尔赛时，我更像那些最优秀的外省学生，来到巴黎只为参加考试，争取进入高等师范学院，最后通过教师资格考试，除此之外，别无他愿。只有在我补习备考高等师范学院以及在更后的时间里，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我才渐渐懂得将来自己会有些什么机会。不管有多少同学对我怎样赞许，我却害怕参加考试和竞赛，即使取得某些成功，仍然无法树立真正的自信心，即对于自己的创造力的信心。我十分羡慕萨特，因为他始终表现得信心十足。我在心底里认为，他的把握是有根据的，我的狐疑不决、怀疑自己，也是有根据的。可是，他却难以相信我真的怀疑自己。

在上述几段回忆中，我很少谈到母亲和兄弟罗伯特。怎样描述我的母亲呢？只谈些依稀记得的童年小事情，我不会，也不想那么做。

在我眼中，我的父母亲虽然是依父母之命成亲，却是一对白头偕老的和睦夫妻。母亲从小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她常常提到，一个年轻姑娘若是念到高中毕业，就会被大家称作孚日地区的“女业士”）。她难舍难分地离开了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一生当贤妻良母。但是，她对父亲的工作和事业无力相

助。我曾听说，她不习惯远离家乡，住在卡昂，一心只想重返巴黎，因此劝说父亲随遇而安，从事边缘性教学工作（那时候，边缘化比现在更厉害）。

旧时代的习俗决定了母亲只能成为命运的牺牲品。她小小年纪就泪眼汪汪地嫁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从此，她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希望孩子们太太平平地待在由她含辛茹苦地织就的茧窝中。可是，阿德里昂捣乱反抗，冷酷无情，家产又亏折殆尽，这一切都使得她十分痛心。她对父亲从无怨言，卖掉自己的首饰和戒指，倾尽囊中所有来帮助父亲。父亲于 48 1934 年去世之后，母亲没有收入，随儿子们过活，还想一如既往地“溺爱”孩子。她本希望从唯一的小孙女身上享受到应有的快乐，却未能如愿以偿。母亲按照旧有的生活观念，满心希望能够尽到一个祖母的职责。无奈她身单力薄，不能再为家庭尽更多的力量。母亲回到瓦纳，1940 年 6 月孤独地与世长辞。

我常常思索我们三个“小淘气”的命运。在我看来，两个兄长具有与我相差无几的天资。阿德里昂本来有条件进入巴黎综合工科学院。至于罗伯特，他才思敏捷，文笔优美。但是，阿德里昂将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仅仅用于打桥牌和收集邮票。他随意浪费着这笔珍稀的财富，我为此感到十分难过和惋惜。战前，我总是抑制不住从道德上责备他的生活方式。然而，他的行为并未违背法律，而那些经常同他打牌的人，并非不了解他出众的牌艺，所以，日子长了，总归是他赢钱。这些话交代过了，尽管阿德里昂所走的道路不符合道德规范，我一方面为他伤心难过，但另一方面仍旧当他是自己的同胞手足。他也手足情深，遇事殷勤相帮。在他弥留的日子里，我伴着他

平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

罗伯特胸怀两种抱负，既想在体育事业上奋斗一番，又想在学业上取得优异成绩。他左右为难，始终没有勇气去迎战起步时遇到的全部艰难险阻。他同时取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和哲学学士学位。当时，他本应当做出决定：或者准备参加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或者就离开大学，等服过兵役，寻求一个工作。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当机立断。他继续学习了一年，取得哲学专业文凭。论文倒很有价值：他对笛卡儿和帕斯卡尔两人进行比较分析，最后独抒己见，做了独到的解释。这篇文章后来发表于《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署名为罗伯特·阿隆，但该文时而被认为出自《维希史》作者之手，时而被认为出自我手，第三个阿隆却没人知道）。

罗伯特服完了兵役，在巴黎荷兰银行行长的帮助下进入该行任职。这个行长是我在该行的“巴黎巴”网球俱乐部结识的球友。他终生在这家银行里工作，仅仅在德国人占领时期一度被解雇，解放后他很快又重新回到那里。他的职务逐级上升，直至成为研究部门的负责人。在这条道路上，可以说他还是成功的。他一直未婚，我也不知道他是否有长久的女友。我不清楚他内心对自己选择和承受的这种命运有何种感受。他在同行中倍受尊重和敬佩（有些人告诉我，说是很感谢他），用个专业说法，他堪称法国第一流的金融分析师。

49

在如此庞大的机构中，人事关系复杂，尔虞我诈成风，要想站稳脚跟绝非易事，罗伯特是否应付有方，我不敢肯定。尽管埃玛纽埃尔·莫尼克（Emmanuel Monick）很赏识他的工作能力，多次委托他起草给股东大会的年度报告，但他感到自己只是被领导者使用，被盘剥，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他希望得

到的，不完全是金钱，而是地位。至于他与同事发生的某些纠纷，他对阿德里昂比对我讲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办公室的人才，忠于职守，可是一生不得出头。本来，他自以为能够担任分行经理，但老被别人捷足先登。他没有打通董事长的门路。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教师，因此，他总是以一个教授的身份对待本部门的同事。

埃玛纽埃尔·莫尼克离职以后，罗伯特多次遭受疾病袭击，日见虚弱，脑力大不如前。他在银行中的地位每况愈下，脾气也变得乖戾反常。我们越来越难得同他见面。当初，他也许是不想与我竞争，才放弃参加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打算。倘若一发中试，他应比我早一年通过考试。只是口试中要求翻译和评述一篇希腊语文章，他却从未学过希腊文。也许，我崭露头角，使他难堪。其实，他在金融分析方面显示的才能，并不亚于我之所长。一个人默默无闻，另一个人则颇有名气，这算不了什么。问题是他赤手空拳，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挣扎谋生，成功很少向他微笑，而失败却常常光顾他。

50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罗伯特是在郁悒的岁月中度过的。很长时期中，甚至直至战后 10 年或 15 年中，他好像一直同青年时代的朋友保持着往来，对我们兄弟三人唯一的后代多米尼克也十分钟爱。但是，渐渐地，他开始离群索居，像阿德里昂一样陷入孤独之中。他写了几本侦探小说，但是我在他死后一直未找到这些书。他还研究过 1944 年盟军登陆那段历史的真实始末，纠正官方某些错误的说法。他对生活和事业都感到失望，意志日见消退，精神日见萎靡。他越来越衰老，行动失灵，记忆恍惚，最后连意识也没有了。

我父亲的逝世，是由于心情内疚，加之工作上劳累过度，

因此受到致命打击。1934年1月，他的心脏病在短期内第二次发作，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我守在他的遗体边，欲哭无泪，一遍遍地喃喃自语：“他死得真惨。”我说的差不多是事实。而罗伯特的一生看起来似乎比父亲顺利，但实际上他们的遭遇相同。从表面上看来，罗伯特好像过得很正常、很平静。其实，他的精神很早之前就已死亡了。他那潜在的、不易为人窥察的内心处境与父亲那一览无余地袒露人前的生活情景并无两样。

阿德里昂死得其所。一切快乐已成过去之事。他形单影只，只想一个人孤独地待着，焦躁难耐地等候着最后时刻，只有他的三弟陪伴在旁。此时此刻，这个玩世不恭的人，尽管曾为邪恶所诱惑，却对弟弟流露出真挚的、略带敬重色彩的友爱之情。而我也同样如此，对哥哥感到无尽的依恋。

## 第二章 学习与友谊

51        1922年10月，我这个来到首都的外省青年，腼腆羞怯而又雄心勃勃地进入孔多塞中学，预备报考高等师范学院。为什么我没有选择路易大帝中学或者亨利四世中学呢？每年，那里培养出的学生，有很多考取高等师范学院。父亲是根据一些大学里的朋友的建议，才决定让我进这个中学的预备班。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当时我们家还住在凡尔赛，父母亲不愿意让我在外寄宿，我自己也不情愿，而这个中学距离圣拉扎火车站很近，便于往返。

在入校的头几个月中，我开始真正体验到预备班的生活。这对我来说，既是难受的，又是有益的。预备班里，一部分学生刚从哲学班毕业出来，另一部分学生则已经读了两年。在塞纳河左岸市区那些规模较大的中学里，低级预备班和预备班已经分为两个班；而孔多塞中学的预备班只有二十来个学生，大家在一起学习。通常，老生坐在前面，他们年底将去高等师范学院应试，新生只好坐在后面。虽然如此，我毕竟还能意识到自己在文化知识上的缺陷，拉丁文和希腊文十分生疏，但在哲学课方面，我很快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在任课教师中，我对伊波利特·帕里戈深怀感激之情。他在《时代报》上撰写专栏文章，坚定不移地支持莱昂·贝拉尔的改革措施，主张加大人文科学在中等教育中的比重。他为此常常与那些左倾文章的作者展开激烈争论。尽管爱德华·赫里

欧完全出身于文学，但是在人们心目中人文科学还是越来越显得右倾，甚至趋向反动。

当时，修辞班里有一个教师，他拥护和支持政府确定的有关中学毕业会考的安排和科目内容。我对这个老师自然不抱好感。但是，当时的中学几乎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因此，1922~1924年的那种激情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浅，似如一层薄膜上的花纹。1936年、1940年、1944年、1968年以及其他一些年份中激烈的气氛，在我的记忆中则大为不同。 52

H. 帕里戈老师教训过我一次，不知是告诫还是处罚，其内容已记不清楚。可惜我当时没有十分在意，后来才时常回忆起来。他说：要掌握写作方法，尊重语言规则，力求准确表达，不可粗心大意，在众作家中选择一个，坚持每天读其著作一页，并随读随做笔记。在那之前，我作文不太考虑写作风格，笔下缺乏才气。我过分控制自己的感情，以至于不能流畅自如地表达。此后，我在写作中仍旧控制自己的感情，借口只想与读者进行理性交流来宽恕自己文笔的冷峭朴质。

谈到 H. 帕里戈，我还记得两件事。第一学年第一学期中，有一次，他当堂宣读我写的一段作文，时不时停下来，对其中某些字词的用法、啰唆的句子、笨拙的表达方式、牵强附会的语句以及一些我记不起来的地方加以尖酸的批评。我哑口无言地听着，羞愧万分。第二次是在第二学年第三学期，我写的一篇作文（内容论及拉·布吕耶尔）受到赞扬，被冠以“天才苗子”的美称。H. 帕里戈要求我到讲台前去，给全班同学朗读其中一段。不过，他这次除指出两处拼写错误外，再未多加评论。以我今天的眼光来看，死抠拼写显得很荒唐。大概，皮埃尔·加克索特将会反驳我说，当时预备班要求严格，

学生不许犯拼写错误。

53 必须说，另有一个教师，他留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这个教师名叫夏尔·萨洛蒙，教授拉丁文。他曾是让·饶勒斯 (Jean Jaurès) 的朋友，其夫人是塞维涅学校校长，阿兰就在校任教。在今天，已经越来越难于见到他那种类型的人了。他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并获得教师资格，此后，终生任劳任怨地在中学任教，并且在这种被人认为枯燥乏味的职业中寻得小小的愉快和满足。他学识高，讲课既生动又丰富。他文思敏捷，非凡出众，聆听他讲解拉丁文，能令人感到获得了一种精神享受。他极善体会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区别所在，在此方面，他同帕里戈一样出色，甚至还略胜一筹。他耐心寻找准确的词语，假如没有，就代之以词义十分贴近的词。他对我很信任，但从未在我面前流露过这种感情 (我是通过他的一些同事方才得知)。在我考取高等师范学院的那年夏天，他曾与我谈过一次话，这是我们之间唯一的谈话。我们谈论着文学，特别谈论到保罗·瓦莱里。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 曾经问过我几个老师的情况。他对夏尔·萨洛蒙的评价是：“他会让你领略真正的才华。”夏尔·萨洛蒙在退休仅仅几个月之后即与世长辞。

在孔多塞中学的同学之中，我还记得几个人的姓名，这可能是由于他们日后的事业不同凡响。这几个同学是：雅克·厄尔贡、达尼埃尔·拉加什、让·莫格、奥利维尔·拉孔伯、雅克·沃莱尔斯和埃德蒙·拉尼埃。埃德蒙·拉尼埃后来在巴黎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年纪轻轻即进入大西洋轮船公司做事，大约 35 年之后升任该公司总经理。在上述同学当中，有两人一直同我保持着长久的从未间断的友谊。一个是达尼埃尔·拉加什，他年长我一岁，与人交往时风度高雅，随和可



亲。我生怕自己会做出什么笨拙举止，表现出愚昧无知，使他感到扫兴或者好笑。1923年，他报考高等师范学院落榜，于是进入路易大帝中学预备班再次预备应试。1924年，他与我当时同时考入该校，并于1928年同时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入学第一年中，萨特、尼赞（Nizan）、拉加什和我四人，定期前往圣安娜听仲马教授讲课。拉加什就是从中发现了自己爱好的事业，从此，他一边学习哲学，一边学习医学。我们分开多年之后，才在巴黎大学再次重逢。我从未忘记与他结识之初自己对他的怀有的钦佩之感——我们的友谊是相互的，但是，至少在最开始时是由我首先对他主动表示出热情的。

另一个人是让·莫格，他的名字现在只为少数人所知。F. 布罗代尔（Fernan Braudel）曾回忆说道，他身材高大，风度翩翩，好似一个“王子”，与巴西的圣保罗大学中那一大批最优秀的教员相比毫不逊色。他在高等师范学院时，比其他同学多花费几年时间才得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大家一致认为，他不顺利的唯一原因在于他的思想独特，反对学校的旧例习俗。毕业之后，他在卡诺中学教过一段时间，然后辞职。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遣往巴西，参加了1944~1945年的战争。战争结束后，他在外交部供职，曾多次出任驻外领事一职。后来，不知何种缘故他又返回国内，回到卡诺中学教授哲学。如果他能看到以上我所做的这些叙述，一定会从中感受到孔多塞预备班中友谊的回音，无论时间多么长久，无论彼此相距多么遥远，这种友谊将永恒不变。<sup>①</sup>

54

---

① 在写了这些往事之后，我看到了莫格写的《牙痛》，恍若与他重逢。此书十分精彩，他在其中述评了自己的生涯、失望和失败。这本自传中许多章节仿佛属于自我分析，作者从中寻求自我解脱。

学生时代中，在孔多塞中学度过的两年给我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生活虽说不上过得多么舒适惬意，但我在知识的世界里采得累累硕果。其实，这种说法也不确切。那时候，我学到的是求知，而不是采得累累硕果。我学习的课程中有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历史等。在法国学校里，必须学好以上课程，才能顺利通过从高中毕业会考直至教师资格考试的一系列考试。这样说，会间接贬低我曾就学的奥舍中学的教学水平。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当然，据我所知，奥舍中学的教师都具有教师资格。而相比之下，如果说我感到自己入预备班之前孤陋寡闻，知识库藏甚少，那么其中缘故可能不在中学教师而在于我自己。也许我是根据考试的成绩来估计学习的成绩。进入预备班后，情况就迥然不同，考试好坏一不刺激我，我便放松学习，专搞体育和其他活动了。

在我的印象中，凡尔赛的教师们大多很称职。他们所教的学生几乎全部是富家子弟。学校沿袭了拿破仑时代的某些作风。在课堂上，学生必须一连数小时一动不动，全神贯注听讲。课间休息时，他们列队鱼贯而出，去室外活动。记得有一次上德文课，老师进入教室时，看到全班肃静而坐，双臂交叉放在课桌上，于是表示非常满意，给每个学生都打了好分数。中学毕业时，同学们大多在 17 岁上下，19 岁的为数不多。

在多年之后的今天，我想对自己当时所接受的教育做一个尽量公正的评价。在现在的一代人，即我的孙子那一代的眼里，那一切已经非常遥远了。在 A 专业（拉丁文 - 希腊文）里，数学课所占比重小到荒谬的程度。不过，依然有许多出色的学生对这个专业感兴趣，这些学生理解问题和解答问题的能

力同其他专业的相比毫不逊色。而今天的情况已经迥然不同。A专业被看作一条死胡同，C专业一枝独秀，高居于其他专业之上，几乎所有年轻有为、前程远大的人都出自那里。数学成为考察、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标准，传统的人文科学教育则降到可有可无，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地位。

除去历史课和毫无意思的公民教育课，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简直一无所知。当时，学校里的教学内容和科目主要来自耶稣会学校的传统。名噪一时的莱昂·贝拉尔改革，倾向于让时光倒转，恢复19世纪中学的最佳教学方式。我青年时代，也包括我女儿青年时代的传统中学，是否应该受到彻底否定？在近20年来发生的“文化革命”中，古数学或现代数学取拉丁文和修辞学的王位而代之。这场革命有合乎情理的一面：数学是一种用符号表达的语言，应当尽早掌握这种语言的基础知识。然而，所有人，包括数学家，在表达、交流思想时，需要运用一种甚至多种语言。文学语言和形象语言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对形成思维缺一不可。当时中学与外界隔绝，我往往自忖，这是否利弊相等。教师应该以身作则，超然以仲裁人和中证人自居，根据真情实况做出评论和判断。在解释说明恺撒大帝关于高卢战争的评论时他可能毫不费力，而在谈论政治时，他却有些捉襟见肘。

56

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种极端主张是互相对立的：要么把学生圈在他们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当中；要么引导学生去阅读他们不会自发阅读的一些著述，我甚至可以说，即邀请他们做一次文化苦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少理由支持这个或那个主张。但第二种主张可能并不适用于中等学校，至少不适用于大部分中等学校。有一天埃玛纽埃尔·贝尔（E. Berl）对我

说，这好比把诗人马拉美介绍给比扬古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反过来说，在一年多的哲学课程中，如果教师用绝大部分时间讲解性，或讲解马克思主义，他必须有异常才能，否则，他的讲授就变成胡言乱语，既无助于获得知识，也无助于训练思维和判断力。

1920年代中期（1924 ~ 1928）的高等师范学院给我留下何种印象？这个坐落于古旧的圣灵修道院里的学府，虽然住宿条件很差，但在当时仍然保持着无可比拟的声誉。那时，国家行政学院尚不存在。学生中间的某些人，例如纪尧姆·金戴、多米尼克·勒卡，正在谋求财政部视察员的职务。阿尔曼·贝拉尔则除了准备历史教师资格考试，还打算进入外交界。但是，我们大多数人满怀高等师范生的爱校精神（抑或称之为同行业的虚荣心），不认为教大学以前先教中学是一条倒霉和落魄之路。至于要完成父亲生前对我寄托的遗愿，去巴黎大学教书就足够了。30年前，我还想象不到，高等师范学院将会走向颓败，一蹶不振。

我来到乌尔姆大街之后，第一个反应说来几乎令人发笑：我是瞠目结舌，五体投地。时至今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仍然会天真地讲出心里话：因为我想都未曾想过，在这弹丸之地，竟然聚集着如此众多的才智非凡的人物。就算这样，我仍然认为这些获得优等奖的好学生，将来并不一定全都能够在思想领域有作为。其中有些年轻人，我们当时不太瞧得起，但是，他们才学兼优，年轻有为。可能这些年轻人的才智，并不见得总能够经得住课堂上常规旧习和课下批改作业那一套办法，从而受到抑制。我不愿损坏他们在我记忆中的形象，因而回避同他们再见面。实际上，较之那些在自己专业中成就斐然

的人物，他们也不见得怎样逊色。

当我翻阅高师时期的照片时，许多同学的名字已经不大记得起来了。不去管它。让我们看看同一届毕业的两位高师人，我们大家都对他们寄予厚望，他们也确实没有让崇拜者们失望。其中的一个已经谢世，未能完成他的事业；另一个虽然失明了，但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仍然在黑暗中继续探索自己的道路，一条更多是精神的而非政治的道路。我并不隐瞒自己可能会做出错误的结论，萨特的形象有可能重叠在一起：一是大学生，二是教授（从毕业到成名），三是存在主义的祖师爷，四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五是左倾分子的庇护者。最终，他成为衰弱的老人，在格鲁克斯曼（Glucksmann）的搀扶下，来到爱丽舍，在我的身旁坐下。

萨特和尼赞，两个人都毕业于亨利四世中学，他们之间的友谊即便是在青年人中间也是罕见的。他俩志趣相投，都热衷文学和哲学，被同学们公认为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对自己的天赋也深信不疑，早就踏上了各自的征途（萨特比较自信，尼赞可能不太一样）。尽管这样，他们仍然愉快地参加师范学院的活动，丝毫没有把自己同其他同学分开。萨特很爱领头“嘲弄”新生，态度之粗暴，有时使我吃惊。在校期末会演中，萨特既是编剧，又是演员。有一次，他还扮演辅导教师默维埃先生，后来这个先生成了大家的笑料。无论是萨特，还是尼赞，尽管学习成绩出众，但始终不曾自异于众人。当时我们就推测，这两个人都会干一番事业，前途无量。

当我从别人那里得知，他们两人把我列为强者，而没有把我弃置于卑微之列，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对此我至今

记忆犹新。<sup>①</sup> 他们时不时重新审视同窗，并加以评定。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情谊，同萨特与吉耶 (Pierre Guille)、萨特与我，或我们这些人与尼赞的友谊相比，性质大不相同。但同窗两年之后，尼赞就离开学校到亚丁当了一个英国富豪的家庭教师 (他在那里写了一本书并带了回来)。他没有结束自己的学业，就与昂丽艾特·阿尔芬结了婚。就这样，在大学最后一年，也就是参加教师资格考试那年，我和萨特、吉耶住进同一个宿舍。从那时起，我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在这之前，上大三时，我就和尼赞成了知交。

关于保罗-伊夫·尼赞的传记已经出了好几本，我并不认为自己还能提供任何新的东西。除了一些不足挂齿的私事，我能写的，也仅仅是自己的某些回忆。

我同其他几个同学一样，参加了他的“磋商会”，议题是：我是否应该接受英国实业家的建议，以他儿子的家庭教师身份，到亚丁去做长期的停留？尼赞大概拿不定主意。停止学业、推迟一年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这在他父母看来，可谓是一个缺乏理智的决定，恐怕就连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尼赞提笔给某些颇有名气的文人写信，到他们家中拜访，征求他们的意见。他并不把长辈的话当回事。他以嘲讽的口气，反复引用乔治·杜阿梅尔的话对我们说：“如果你向一家之主询问你该做的事，那么我就会对你说：先去完成你的学业。但是，如果你向某个大人物请教，那么他就会对你说：出发吧，青年人，去大开眼界吧！在那里你将学到比书本中更多的知识。”尼赞在

---

① 得到萨特和尼赞的“承认”使我大为感动，也许超过了L. 布伦什维格在我陈述圣安瑟伦 (saint Anselme) 与康德之间的本体论争论时对我的夸奖。

内心深处即刻独自做出了决定。

拜访作家，虽然还是师范生的行事作风，但也预示了一个文学家的出现。在这些颇有捉弄味道的交谈中，与其说这个年轻人向成年人请教的是良心问题，倒不如说是个人的抉择问题。然而，这个师范生是以文学家的方式从这种捉弄中得到乐趣的。当时，我并不怀疑尼赞会成为一名作家。我认为，他在智力和哲学素养方面不如萨特，但在写作才能上略胜萨特一筹。

1927年夏天，尼赞请我去基伯龙住几个星期，为尼赞和阿尔芬两家的会面作陪。我们是一起乘汽车去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我们乘的是他的私家车）。油箱的指针指到零或快到零了，我几次要求他给汽车加油，他都拒绝了，这使我很恼火。好几次我以为油箱空了，而这种情况从没有发生。在基伯龙，我觉得很孤单，我对他们毫无用处。保罗和丽艾特<sup>①</sup>，尼赞和阿尔芬两家的事情我都派不上用场。

他们两个家庭的社会地位相距甚远。丽艾特的父亲是个银行家，或者在银行中享有相当体面的地位，但从兴趣和爱好方面来说，他又是个音乐家，他尤其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在战争中，他负了伤，失去几个手指，继而转向金融业，可能干得还不错。而他使用的唯一的运算工具是三率法（他对此非常得意）。丽艾特的母亲和丽艾特一样，精力充沛，对生活 and 他人充满热情与信任。阿尔芬和尼赞两家之间大概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然而，阿尔芬家族接纳了尼赞家族，或者说同他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这是因为他们看中了尼赞家的儿子。

---

<sup>①</sup> 昂丽艾特的昵称。

保罗 - 伊夫的父亲是不是很像安托万·布卢瓦依<sup>①</sup>? 我很难给予肯定的回答。我不能仅仅根据几次谈话, 就断言掌握了这个表面上逆来顺受、没有憧憬的人的秘密。身为铁路部门的一个中等水平的技师, 他出身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 大概由于家境比较贫困, 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工人阶层, 但是, 他完全具有在一个假日旅馆中同一个殷实的犹太家庭交往的本事。

一两年后, 保罗觉得他父亲由于他的激进主义观点而受到迫害。我父母认识一个在铁路公司工作的高级官员, 他们设法为他说情。这个官员告诉他们说, 这个技师是由于在工作中犯了错误而受到处分的。我当然无法断定这两种说法哪种更符合实际。

60 保罗 - 伊夫身上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那神秘的个性。他在一头扎进共产主义之前, 曾迷恋过法兰西行动派和乔治·瓦鲁瓦的蓝衣社。但在 1926 年或 1927 年, 政治观点是否一致对我们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影响。在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雅气质、幽默感和异乎寻常的敏捷思维之外, 有着令人不可捉摸的东西。人们猜测他有他的烦恼, 然而, 在他那不断表现出来的欢乐后面, 隐藏着一种以实际行动或严肃的思想来克服这些烦恼的决心。

就在他结婚那天, 他得了急性阑尾炎, 差点儿送了命。当时抗生素还没有被发明, 他的阑尾炎很快转为腹膜炎。我和丽艾特在他生命垂危的那些日子里, 轮流守护在他的身边。此后, 我们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毫无保留地加入了共产主义

---

① Antoine Bloyé, 尼赞一本小说中的主角, 也是这本书的书名。大家认为他是他以父亲为原型来塑造书中人物的。



的行列。在 1930 年代，我们很少见面，我喜欢并欣赏他的《亚丁·阿拉伯》这本书，但《看门狗》（我不能确定从头至尾地读过这本书）使我扫兴，或更确切地说，使我看不惯。我们的老师们不应该仅仅因为犯了不革命的罪而受到这些谩骂。为什么他们就一定得革命呢？

我常常想，为什么在萨特和尼赞还没写什么东西，或者说还没发表什么东西时，我们就对他们另眼相待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后来我就大学生的运气问题所做的回答是相同的。不管有无道理，人们是按“大估摸”来估量一个年轻人的能量的，预测他能否顺利地通过教师资格考试，或者相反，他得使出大气力。然后要看他们能否有一天发表一些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先天与后天相互影响的理论，我们至少对遗传学的因果关系是持否定态度的。一个人无论做出多大的努力，也不可能超越他的基因限制的范围。我听说，数学家自己就能够看出自己的限度。

当初我是否看准了萨特会成为哲学家、小说家、剧作家、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诺贝尔奖获得者？如果有人这样提问，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没看准。即便换一种方式提问；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大哲学家、一个大作家？我的回答既不会完全相同，也不会十分明确。一方面，我佩服他（现在依然如此）才思横溢、妙笔生花（那时我写东西很吃力，望着眼前空无一字的稿纸和笨拙难移的笔，经常心神不定）。我们常拿他落笔成章来开玩笑。不消三个星期，他就写出整整 350 页的手稿。我们常问这个小同学：“这是怎么做到的？”除了下笔如有神，他在思想上富于想象力和构思敏捷，这也使我眼花缭乱（如

今这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仍不减当年)。我也不是没有对他产生过一丝怀疑。有时,只是由于不能全面地把握住一个观点,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他往往要用很长时间才能说明或写清这个概念。他构架的一些理论,很容易被人抓住破绽。

我羡慕他的自信心。记得一次我们在离陆军部不远的圣日耳曼大街上散步闲谈。他既不炫耀,又不故作谦虚地谈了对自己的看法。他承认自己有天赋,认为要同黑格尔齐名,攀登的道路不会太艰苦,时间也不会太长,但要超过黑格尔,就要颇费些气力。他对我说:“对我来说,抱负可以具体表现为两幅景象。一种是青年男子,身穿白色法兰绒长裤和翻领衬衫,在海滩上,迈着轻盈的步伐,在如花似锦的妙龄女郎中间周旋。另一种是作家的形象,他举杯向站在餐桌周围身穿礼服的人们祝酒致谢。”

萨特想成为一名大作家,他实现了这一夙愿。然而,在这期间,他不再对晚礼服、宴会和虚荣浮华感兴趣了。那时,他虽然很少谈论政治,但他蔑视特权阶层,对利用权势和地位炫耀自己的“坏蛋”极为反感。他认为在勒阿弗尔的有产阶级中碰到的那伙人,就属于这一类。从1933年到1934年,我替萨特代了一年课,也曾有所耳闻目睹。在那里的网球俱乐部,专有两个球场是供那些“股票交易所的先生”消遣的。

美男子的形象,也是我们谈论很多的话题之一。他自己却其貌不扬,怎么办呢?萨特常常提起他长相丑陋(我也这么说自己)。可事实上,一旦谈起话来,他才气横溢,冲淡了脸上的粉刺和浮肿,丑相也随之消失。而且,他短小精悍,体格强壮,臂力过人,能以两条腿成直角的姿势爬到绳子顶端。他爬绳迅速,轻松自如,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不久前，在一次记者采访中，萨特声明自己没受过任何人的影响，或者严格地说，最多只受到尼赞的少许影响，但绝未受过阿隆的影响。这倒是实话。有两三年的时间，他乐于听我评论他的观点。从我们的交谈中，他大概有所受益，但这与影响是两码事。举例来说，有很长一段时间，精神分析法成了我们辩论的主题之一。萨特自始至终对它持否定态度，因为精神分析法与无意识混淆在一起。在萨特看来，无意识概念等于一个有棱角的圆，心理现象与意识是不可分割的。我终于放弃了辩论，不指望就概念问题能讨论出什么结果。但是我建议他，尽管可以撇开无意识论，也要撷取精神分析法中所包含的具体材料。萨特借用“恶意”这个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个概念，或许是意识到有必要把精神分析法的某一部分纳入他的研究领域，而不必将其一股脑地彻底排除。

萨特的另一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与我们的谈话有关。我在大学的学位考试题目是《论康德哲学思想中的永恒性》。这个选题既包括可理解的选择，又含有随时能发生的转化，人们因而能够自由地弥补过去的存在或者一下子改变这个存在。死亡排除了自由，使存在从此凝结为完命，在《存在与虚无》和萨特的戏剧作品中，多少有点这方面的内容。老实说，萨特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把可理解的选择和转化的自由这两种概念结合在一起。尽管他自己已经做了存在的选择，但仍然吹嘘自己每时每刻都在从头开始。他似乎拒绝成为自己过去经历的俘虏，拒绝对自己的行动和完成的著作承担责任。

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多少也能印证萨特从不求助于任何人的说法。那是在一次由莱昂·布伦什维格主持的讨论课上，萨

63 特在发言中初次表达了他对世界的看法，这些看法后来成为萨特自己的世界观。萨特回答的是一个有关尼采的问题。当时，莱昂·布伦什维格正在撰写《西方思想中意识的发展》一书，对其中有关尼采的一章不太有把握。他提出：应该把尼采看作一个严格的技术性的哲学家，抑或一个文学家？萨特选择了前一种说法。然后，不知道他怎样一拐，一下子把话题转到了“自在”与“自为”的对立概念上。他还说：各种事物，例如这些树，这些桌子，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它们长在这儿，放在那儿，没有原因，也没有目的。但是，意识无时无刻不有其含义，无时无刻不在使这些盲目的大量的现实具有属性。这些现实否定意识赋予它们的属性，而就是因为有了属性，它们才得以存在。

萨特的世界观只能属于他自己，但他显然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受益匪浅。他从前者那里得到的不只是一些语汇；他利用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亲身的经验，分析意识对客体的开放，分析自我的超验性。这样一来，“自为”转变为瞬间存在的主体，而不是我自己了。萨特借鉴了海德格尔对时间、烦恼和客体世界的阐释。可能通过梅洛-庞蒂的介绍，他也通晓了黑格尔的某些观点，例如，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评述过的关于爱情幻想获得自由的观点，主人企图得到奴隶的承认——但这不可能是真正的承认，因为奴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观点。毋庸置疑，只要这些观点能够为他所用，他就会信手拈来。梅洛-庞蒂在1945年曾私下对我讲过，他不愿向萨特透露自己的观点。

萨特在《词语》一书中，说他没有父亲（我的一个同学微笑地补充说：他没有父亲，母亲是处女，他是罗格斯式的人

物)。他断言自己没受任何人的影响，但同时并不否认自己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有负债之感。萨特借鉴、汲取和融合了以往的、同时代的哲学家们的许多观点、命题和论证方法。他否认“影响”这一概念，是因为它使人联想到受影响者处于被动地位，即使是部分的或短暂的也不行。

1928年，萨特在教师资格考试中名落孙山，这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正如我在这次考试中金榜题名并没有使我改变对他或对我自己的评价。那次考试我名列第一，比获得第二名的埃玛纽埃尔·穆尼埃领先十多分（7门功课的口试、笔试加起来总分为110分）。当然我对考试的成功也并非无动于衷，如果我今天否认这一点，那可不是真话。我身上还有一些优秀生的味道，知道自己的成绩只不过说明我是一个好学生，说得好听一些，是一个会学习的大学生。我的第三篇关于哲学史的论文（论亚里士多德和孔德）是我三篇论文中最出色的。前两篇都没有任何独创性。口试时，我抽签抽到的是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选段。口试还要评论斯宾诺沙的一篇拉丁文文章，我弄错了一个词的意思，在论证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错误。但在考场上，我是如此坚定地为自己的错误辩护，致使考试委员会也被我说服了。翌日，他们查找了这个词的含义和解释后，扣了我一分（我在预备班的老师安德烈·克雷松参加了考试委员会，他后来对我讲述了这段插曲）。

64

我要说明一点：作为一种选拔方式，其实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难易程度同其他学科是一样的。大多数合格的考生都取得了文凭。第二年，萨特终于为这次考试的失败雪耻了，他以高于我的成绩获得第一名。在1928年的考试中，他还没摸清考

试的路子，一上来就首先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第二年的考试，他听了我的劝告<sup>①</sup>，知道应该首先按主考教师的要求回答问题，然后再自己发挥。

尽管我一帆风顺地通过了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但并不感到值得炫耀。过了几个星期，我便去服兵役。18个月之后再回顾几年的高师生活，我未免感到一丝灰心失意。1928年那年，我23岁，到1930年春天，我已25岁。在此期间，我究竟添了多少知识？提升了多少能力？入学头两年，我是在随波逐流之中度过的。由于进入高师之前我未曾在巴黎大学学习过，因此我必须首先用两年时间攻读学士学位。我时间有富余，可以打打网球，浏览各种题材的小说，从历史名著到流行小说，无所不读，卢浮宫中时常留有我的足迹。我开始去法兰西学院听E. 勒·鲁瓦 (E. Le Roy) 的分析课，但浅尝辄止。我找来几本大部头民法书，只读了几个星期就弃置一旁。我又想研读数学方面的著作，终不免半途而废。现在看来，我在学校里后两年的学习较有成果。但在1928年或1930年，我的评价不一定如此。由于我选择了那样一个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所以必须系统地研究康德的一系列著述，从他写作《纯粹理性批判》之前的作品，直至《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每天，我用8~10小时读他的《批判集》。我读了不少书，但心中茫茫然。我努力理解康德的哲学，却不知道到底理解了多少。后来，我把留下的一份自己考文凭的论文拿给萨特和尼赞看（下一年教师资格考试题目涉及康德），结果论文下落不明。对此我并不感到十分遗憾，只是好奇心使我偶尔想到，大概这

① 他佩服我的考试技巧，前来向我求教。

份考文凭的论文只配由耗子猛加咀嚼批判了。<sup>①</sup>

我同这位哲学家相处了一年，每忆及此，总觉得既清苦又兴奋。我始终认为，康德让我汲取到的知识，远远胜过（当时被奉为经典的）德尔波（Delbos）的著作，也胜过其他一些教师教授的课。当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时，如果仅仅追求能使学生通过各种考试或会考，他自然会把成套哲学概念、摘要灌输给学生，从而大大节省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学生拿到手就可以用，犹如成衣铺里的衣服，立刻可以穿上身。然而，这绝对代替不了学生自己去细细钻研不易理解的文章。而即使对于那些将来不打算从事艰巨的哲学研究的学生来说，钻研也是有必要的。我感觉到，我研读过康德哲学之后，再读其他书时就不吃力了。我认为，书的水平越高，读它就越发需要集中精力。

为准备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我不得不研习亚里士多德、卢梭和奥古斯特·孔德。约在30年之后，为了帮助我的学生应试，我把奥古斯特·孔德的著作几乎从头至尾重读了一遍，因为这一年的试题里又列了孔德。哲学史在我们所从事的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而且至少在这个时代，这种状况不会发生什么改变。

在哲学考试的四门科目中，只有对其中一门——“逻辑学和普通哲学”——还存在争议。另外两门——“心理学”“伦理学和社会学”——已被列入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范畴。因此，哲学史较之逻辑学和普通哲学更能使我们接近于“长青哲学”。况且，还应当说，当时还没有“新哲学家”一说，

---

<sup>①</sup> 后来，洛特曼夫人在她的一堆旧纸中发现了另一份未被批改过的论文原稿，但我一直未见到此件。

66 否则，何以那些最优秀的教师很少出现在各大报刊显要的栏目中（柏格森是例外）？何以他们成为勒内·本杰明一系列讽刺文章的攻击对象？当我们要援引一位大师之言，当我们力图否定或者继承他的业绩时，我们除了莱昂·布伦什维格、阿兰和柏格森（他已不属于教育界）之外再无选择。莱昂·布伦什维格是巴黎大学领导教育官员的官员。这并非由于他身上有这些官员惯有的毛病，而是因为他比其他人行事更加“哲学化”。当我们拜读他的著作《数学思想发展各阶段》《人类经验和物质因果性》《西方思想中意识的发展》时，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虽然我们无法评价他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展示才能，但是我们（尤其是我）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兼有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他通过当时的数学和物理学来阐明当时的西方哲学。一方面，他并未与传统的思想学说分道扬镳，另一方面，他又避免陷入平庸刻板的唯心论或唯灵论。他不以伟人自诩，但始终与伟人们保持着频繁不断的往来。

如此说来，他到底向我们传授了哪些思想？为了尽可能少说行话和术语，我想这样说：他解释康德的哲学思想，力图将哲学拉回一种认识论。《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做出了决定性的论证，我们通过感觉、理解等过程，才能够认识现实。我们所认识的世界，不过是由我们的思想建造起来的世界，绝没有任何感知方式能够超越物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本没有什么形而上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只能是科学本身，而不可能是其他。分析派哲学家以另一种语言提出一个相似的论点：哲学思考的对象是科学或语言，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全部活动。它不会脱离科学或超过科学来向现实提供知识。

以这种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布伦什维格的思想可以被认为是



启发性的实证主义。但是，这种新康德哲学还具有我尚未提到的另一方面：它的依据是唯心主义，最终表现形式则是伦理学，它既不采纳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对各个认识过程所做的概述，也不接受二律背反的第三种结论（即内在决定论，超验性中的独立部分）。布伦什维格可被称为一个柏拉图学派哲学家、反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信奉者，他希望消除一切阻碍科学发展的羁绊，消除所谓“概念是永恒不变的”这一错误论断。爱因斯坦对空间和时间概念所做的新的论述，与康德哲学中关于感觉形式的概念毫不抵触，反而进一步论证了康德的思想：精神通过科学创建出实在，而科学的实质不在于制定概念，或是对概念进行推论，而在于识别和判断。

67

我做上述粗略概述，唯一的目的是想指出，初入哲学之门的人要避免被引导进死胡同。在凡尔赛时，我的哲学教师汲取了布伦什维格的思想，用以贬低法律概念而推崇判断力。布伦什维格的信奉者们在其他领域内，几乎也必然要将科学发展同哲学联系起来加以思考，或者进而研究认识论最根本的问题。

尽管莱昂·布伦什维格不赞同传统的形而上学，但他仍然常常使用宗教词汇，他的晚期著作之一《真假转变辩》即为一例。据此不禁令人发问：他到底是一个无神论者，还是一个笃信宗教者？说他是无神论者，我是很确定的：他对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基督教上帝和三位一体一概不相信，也不考虑死后灵魂如何得到拯救的问题。他对天主教教义以及犹太人同他们的上帝的姻亲关系毫不在乎。

那么，他为何使用“真正的转变”一词呢？或许因为他认为，“信仰”或“转变”不应为教会独家占有。我这样说，

也许会把他的思想简单化和庸俗化。真正的转变之意义在于，从私心和自我中心论中把每个人的思想超度出来，对每个人进行教导并劝人做这样的转变。由此可以解释为何布伦什维格如此坚持不懈地研读帕斯卡尔和斯宾诺莎的著述。真正的转变并不靠上帝的决定，而在于个人不断努力，超脱于自我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克抑本身的个性。斯宾诺莎提出永生的信念，归根结底，不就是掌握真理的信念吗？真正的转变不希望得到拯救，转变就是救星。

人类终于获知，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从而放弃了主观专断地观察事物，即全然不顾自己所处的位置而去衡量时间空间。同样，人类只有超脱自我，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对话：每一个人都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才能促进精神境界不断升华。学者的道德能够启发精神的转变，名副其实的学者态度能够导致公正平允。

亚历山大·柯瓦雷 (Alexandre Koyré) 曾对我说过：哲学严峻而淡泊，近乎苦行清修，如能以另一种语言表达见解，大可当“伟大”二字而无愧。莱昂·布伦什维格在法国哲学协会回答加布里埃尔·马塞尔 (Gabriel Marcel) 的提问时说道：“我不像马塞尔先生那样对自身的命运和前途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我也许可以说，他说这话时，已经宣布他要写《反回忆录》了。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信奉宗教的，但他信奉的不是已被创立的宗教，他对形而上学持否定态度。尽管他反对极端的刻板和偏执，他仍然是一种类型的哲学家的代表。只有思想能够做出判断，而种种概念只不过是掌握真理、建造实在的各个预备阶段。正是这样的思想，织出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人以恕道相待。有些人将这项巨大的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我应当

向这样的人指出，布伦什维克的著作和言论毫不夸张地暗含着过去的全部哲学。

在两次大战期间，正当莱昂·布伦什维格在巴黎大学称孤独寡之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却已经“超越”或转移了德国的新康德哲学。当时，法国哲学家们与德国同行之间几乎不互通信息，在今天看来，这是大为令人惊奇的。早在胡塞尔在法国发表题为“笛卡儿哲学沉思录”的著名讲演之前，乔治·古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已写出《当代德国的哲学流派》，莱昂·布伦什维格作了序。此外，除让·瓦尔（Jean Wahl）之外，现代英、美哲学在法国几乎同样鲜为人知。直至今日，这种情形难道已有所改善吗？为何所有的哲学家都要自设沟壑，对国外情况耳目闭塞？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其《理智的能量》一书中，既夸奖宗师官长，也赞扬痛斥宗师官长的保罗·尼桑。69 后来，在反法西斯时期，尼桑又同官长们言归于好。雷吉斯·德布雷写道，在德雷福斯事件时期、反法西斯时期以及德国人占领法国时期，大学人士始终不为外界所动，捍卫了全人类的准则。各大学以漠然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确实不假，但是它们至少避免了陷入反理性主义，而且学校里从未出现过那些歇斯底里的笔战和玄奥晦涩的文章。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所接受的大、中学哲学教育，我们有必要采取保留态度。康德学派之后的费希特和黑格尔学派虽然不算完全受到蔑视，但从未被列入教师资格考试纲要，借口是他们的主要著作没有被译成法文。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在战后几乎被奉为半仙半神的星宿下凡，但他们终未能够进入先贤祠，那里安息着为哲学班和教师资格会考编写教材的先师们。但在当时，至少一般的哲学

教师仍知道尊重原著，要求学生严肃对待。这三位半神半仙都才华横溢，无所不谈，也允许别人谈论一切。对学生讲解意识形态、无尽轮回、毁灭的本能等，确实很容易激发他们的兴趣。但是，这些概念出奇地含混，人们无法为之下个准确的定义。他们提出了一些别人无法驳倒的理念，或者像今天分析派哲学家用现代英语所说的，无法被“证伪”的理念（他们的真伪是无法被验证的）。讲解《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要旨仍有教育价值，有助于培养思想，而评述《权力意志》中的一些警句可以刺激思想，但无助于青年人运用理智进行思维。

除了莱昂·布伦什维格，我在学校时还同另一个哲学家阿兰常相往来。我曾多次前往亨利四世中学校门口等他，一路陪他回到雷恩大街的寓所。如果问我是怎样同他建立私人关系的，恐怕最初是他的学生介绍我们相识的。

我记得，阿兰的人品、性格，较之他的哲学思想，更能令我折服。战事方启，他便自愿从军。但是，他从第一天起就厌恶战争，只有与战士们在一起，才能够勉强忍受。在此之前，他从未背叛初衷，跟着别人叫嚣反德（柏格森却没有逃脱不理智的行动）。不过在当时，我们大多反对战争，不服前辈。在高等师范学院里，学生中信仰共产主义的寥寥无几，思想左倾的人或是参加社会党或是向其靠拢。天主教徒“塔拉”<sup>①</sup>则属于右派。阿兰同他的学生自成一伙，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党，而是永恒的左派，永世不会掌权，因为他们的本色就是抵制权力，认为权力的本质就是滥用权力和腐蚀掌权的人。

---

① “塔拉”（talas），高师学生的习惯用语，即天主教徒。—译者注

我想，对于他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尤其对于他拒绝军衔，我从来未能心悦诚服。如果我在这方面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我本可通过军训结业考试。那时，我对《战神或受到审判的战争》一书很为欣赏，此书文采斐然，但是，如果严格地说，作者的观点很不公正，至少可以说带有偏见。战争充满危难和风险，极其严厉残酷。尽管可能有某些军官认为在战争中可以满足发号施令、行使权威的欲望，从而使自己得到补偿，但那些步兵少尉、中尉和上尉却在同一条战壕中和士兵同甘共苦，在枪林弹雨下并肩冲锋陷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从发号施令的欲望出发来批判战争是不合理的，更直白地说，甚至是卑鄙的。在某些情况下，有些士兵喜爱作战，而有些军官虽然谈不上喜爱，却能够认真尽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1914年9月至1918年战线冻结，战局僵持，前方部队与后方参谋部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思想距离空前遥远。这种作战特点并不足以作为战争哲学的依据和基础。实质上，战争哲学的依据和基础是军事心理学。

我们凭什么对军人的威望如此心折？军人和我们全体教师不同，既拒绝加入救国神圣大同盟，又不反战。1920年代，我们在高师重新讨论结束不久的战时问题。某些异端分子提出异议，否认德国应当对战争起源担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sup>①</sup> 左

---

① 在这个问题上，莱昂·布伦什维格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他指出，奥地利向塞尔维亚提出无理的最后通牒之后，塞尔维亚答以表现出很大克制的复文。奥地利拒绝考虑，并开始轰炸贝尔格莱德。自那开始，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各国联盟连锁反应，必然引起大战。那时，我读了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Alfred Fabre-Luce）的第一本书《胜利》，作者竭力将战争责任分摊给两个阵营，结果舆论大哗，指摘该书为离经叛道之作。

- 71 派舆论谴责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鲁尔区，大声疾呼双方弃旧怨、结新好。先辈中某些享有盛名的人物在几年前发表的关于德国和德国人的言论，再也得不到青年一代的理解。在众人的一片狂热之中，阿兰至少保持了缄默。

阿兰以“反权力人士”自居，他这种政治观点我在心底里从未赞同，并在后来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的观点与我的知识分子气质也不合拍。但是，曾有一段时间，我对社会情况和国家经济情况毫无透彻的了解，仅从自己的某些感情出发盲目地观察和判断外界事物。我倾向于和平主义，厌恶战争，赞同左派观点，用世界主义来抵制前辈的民族主义。我对有产者和强权势力深恶痛绝，赞同朦胧的社会主义（激进党越来越不成模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而且是犹太知识分子，我应当对地位卑微之人的不幸和尊严感同身受。阿兰的政治观点能够吸引我，那是因为我从中找到借口，免得煞费苦心去认识现实，去设身处地为当政者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身为公民而反对一切权力，等于自己推却掉一切责任。当我一旦战胜了年轻时期左右着我的犹豫彷徨，摆脱了学院式教育的羁绊，我又立即改取另一种极端立场：我几乎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始终要求自己能够扪心自问“假如我是当政者，我将如何行动”。

战后，我对过去的自己，较之对阿兰，更感到不满和愤慨。因此，我写了两篇评述阿兰政治思想的文章，一篇发表于《新法兰西评论》，另一篇发表于《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我的错处在于未曾注意到阿兰对所经历的实战生活的感受。无数青年人渴望生活，但又命在旦夕，这种处境激怒阿兰，让他几乎没法再活下去，可是再生气也没有用。我在自己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佩剑的剑身上刻下古希腊人希罗多德之言：“明智之士

绝不会拒绝和平而选择战争，因为和平环境下由儿子安葬其父，而在战火之中却由父亲掩埋其子。”1914~1918年战争的惨烈超过了人类世世代代的悲剧，目击者中很少有人能以阿兰那样高尚的情操和深沉的同情来悲天悯人。时至今日，每当我重温阿兰1917年志愿参军以前对敌人发出的呼吁的最后几段，72  
我仍会敬畏地向他的浩然之气拜倒。

阿兰除他的政治思想，还向我们提供了什么？萨特也曾对感知、印象、意象进行思索和探研，得出与阿兰相同的观点，认为感知和意象有着本质的不同。他重新提起阿兰提过的一个问题，阿兰曾问那些从未正面观察却自诩看到了先贤祠的人：“您看到先贤祠的正面有几根圆柱？”在《印象》<sup>①</sup>或《意象》中也可以找到有关感知和意象的另类激进表述。

阿兰给过我什么帮助呢？他帮助我去阅读伟大作家的作品，尽管我并不赞同他的读书方式，也不欣赏这种方式的结果。他本人，或许是他的门生，曾这样说过：柏拉图、笛卡儿这样名副其实的哲学家从不犯错；他们在每件事上都或多或少抱有相同的认识。再以康德和奥古斯特·孔德为例，康德对权贵的礼遇仅限于脱帽，精神上连腰也没有弯。奥古斯特·孔德虽然承认实力统治，但力图通过公众舆论和妇女的精神力量来压制实力统治。这样，他织出了一条细带，发现了深刻的姻亲关系。他们各自思索、宣扬和传授的，归根结底，都是阿兰本人的哲学思想。

有一次，莱昂·布伦什维格带着一种与其说是奚落，不如

---

① 为萨特所著，篇幅不长，与《当代德国社会学》同载于《小百科全书》系列丛书。

说是恼怒的口吻，向我叙述阿兰的门生在考场上答辩的情形。试题为评述笛卡儿的一篇文章。他描述道：“阿兰的门生回答说，还是以不搞这一套烦琐的注解和评论为好，因为这样的做法会离文本越来越远。不如认真阅读原文，体会其中的实质内容。接着，这些学生还向我们背诵阿兰曾经教导过他们的话。”阿兰喜爱对历史采取蔑视的态度，并且影响到一批平庸无才的学生，助长了他们的蒙昧与无知。

73 其实，阿兰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爱说俏皮话，爱说话过火，动不动把人逐出教门。大概在1931~1932年，当我向他谈到我有意研究政治时，他答道：“我那些关于政治的话，你不要看得太认真。我对某些人深恶痛绝，所以故意说给他们听听。”他也不是不知道，由于他“缺乏”广阔的历史知识，才老爱谈什么人性是永恒的，主要特征是不变的。他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精神分析学持否定态度。难道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不理解？我不这样认为。他否定相对论，主要原因确实是出于不甚了解，但还在于他力图维护自己的精神信念：理智这座圣殿的根基绝不可动摇。精神分析学被他称为“猴子心理学”，这个词无论如何不能算用得适当。只是因为他不愿意拿低级东西来解释人类。他可能与安德烈·马尔罗的《反回忆录》的思想一致（但绝不同意马尔罗对英雄人物顶礼膜拜），他还可能对每个人内心深处可怜的“小小”隐秘嗤之以鼻。这个伦理学家著述的对象，仍然是数世纪以来的法国伦理学家。他还担任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的哲学教师，并且成为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思想宗师。

马塞尔·莫斯曾在私下评价他为“诡辩者”。这种评价并不带敌意、偏见和讥讽的意味。他确实是一个与学者，甚至可



能还与哲学家不太相同的诡辩者。他从可能性出发论述一切事物；他抛弃社会学，以便按照自己的一套方式来评价公共事业。他向青年人传授知识，启发他们去认识世界。在1940年代前夕，D. 布罗根（Dennis Brogan）曾经更为严厉地评价道：“阿兰这样的诡辩者所施展的魔力能使一个国家走向毁灭。”我在一篇关于阿兰的文章的题词中引用了这句话，该文刊载于《自由法兰西》杂志。然而，阿兰的同事埃利·哈莱维等人以及阿兰的学生安德烈·莫洛亚（André Maurois）等人则觉察到他身上具有天才的闪光点。我记得埃利·哈莱维常常说：“阿兰确实有点天才，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否运用好了他的天才之处。”还有其他许多直接与他相识的人或通过他的门生与他相识的人坚持他们的看法，对阿兰的才华深信不疑。我曾被邀请在电视台介绍阿兰的专题节目中做即席演说，我评价道：“这位预备班教师几乎是天才。”为此，那些专门研究阿兰的人对我啧有烦言，正如他们现在责备我曾经强调，阿兰的作品相对来说在国外翻译出版不多，读者较少。至今，我也不敢妄下结论。

我可以断定，他不愿接受那个时代某些新开辟的知识领域；他的思想同法国所有大、中学哲学教师一样，恋恋不舍地逗留在“永恒哲学”之中。然而，他写出了《美术体系分类》《思想与时代》《漫谈》（内容涉及修养与幸福）等作品，另外还写了好些书，谈他喜爱的小说家。尽管他的文笔在久读之后会使人产生厌烦之感，但是，这类具有哲理性的专题著作难道没有显示出一个作家所具有的素养吗？尽管他杂学旁收，以至于不能被视为一个具有独特见解的哲学家，但仍不失为一个伦理学家、一个有创见的作家，难道不是吗？

或许，乔治·康居朗称得上是阿兰与我之间的调停人。他

与我保持着牢不可破的友谊。虽然我与尼赞、萨特等人同样有着颇为深厚的友谊，但这两种友谊不尽相同。他曾在亨利四世中学接受过阿兰的教导，因此，他在那个时期有着与阿兰相同的信念。他尤其信奉和平主义。我正是通过他结识了阿兰的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师从阿兰，他们受老师的影响比其他同学受自己的老师的影响深远得多。1939年，我们在图卢兹重逢。当我因故外出时，他尽心尽意地关怀、照顾我那孤独的妻子，殷勤亲切，感人至深。他总是以严厉的总视察员的身份出现于大庭广众之中，只有此时此刻，他才显露出自己真正的性格和为人。1955年，我在巴黎大学再一次见到他。有时，他使学生们感到极其威严慑人，但他始终博得学生们的爱戴与敬重。他是一个医学博士，研究医学与生物学思想史。他从事研究、教学和编写工作（他的讲义全都是先写好的）。他出版的作品远不能包括所有成果。尽管他十分谦虚，但真正的读者仍然估量得出他所具有的价值，从而将他置于应有的位置之上。我这样讲较为恰当：如果我试图对他画一幅文学肖像，那将违背我们之间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挚友情谊，并将使他感到恼火和不快。

我在前面曾提到皮埃尔·吉耶的名字，不过仅限于一笔带过，这倒并非由于他后来走上宦途，当了众议院和国民议会的秘书。西蒙娜·德·波伏娃略略谈到过他，因为萨特正是经他介绍才得以与莫雷尔夫人<sup>①</sup>建立亲密的友谊。吉耶对大家颇具吸引力，这并非由于他有独到的哲学思想或政治见解，而是因

---

① P. 吉耶，其后 J.-P. 萨特，都亲自辅导过这位我们称呼为“夫人”的女士的儿子。莫雷尔夫人很有魅力，“夫人”的含义不同于今天人们使用的这个词。她的魅力在于聪颖多智，善与人交，亲切盛情。

为他本身极富魅力。同样，大家都喜爱他，也是因为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如果处在另一时期，他很可能成为一名富有声望的文科预备班教师，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学教师。我们的友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见淡薄；各自成立家庭之后，两对夫妇难得相聚。战后，我偶尔在拉丁区碰见他，在南方我们还相遇过一次。旧日亲密无间的气氛一去再不能复返。他在一封答复我的邀请的回信中写道：“如果你有雅兴，我们聚餐一次，但可能没有什么重要事需要交谈。”他这样复信并非想故意刺激我，只不过证实彼此疏远了而已。他去世前几年，我们一直再未见面。

75

高师人在政治见解方面划分为两个明确的群体：一方是社会主义者和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另一方是“塔拉”——天主教徒。前一个小团体是在吕西安·埃尔（在我上大一、大二时，他是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的鼓动之下结成的。该团体的活动分子中有乔治·勒弗朗克<sup>①</sup>，他后来在非共产党的法国总工会以及总工会干部培训学院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并且著有大量关于工人运动以及人民阵线的书；此外，还有让·勒贝尔，他后来成为第四共和国时期众议会议员。皮埃尔-亨利·西蒙则属于另一团体，即“塔拉”，天主教团体，该团体的成员右倾，也许仅从一定意义上才可以这样说，因为他们并不反对在法国被占领时期曾流行一时的道德观念和思想看法。

在那个时代，同萨特、吉耶等人相比，我身上的政治色彩更浓厚一些。我不时对议会中发生的事件表现出极大兴趣。在家里，我高谈阔论，发表对赫里欧（Herriot）以及法郎危机等

---

① 他发起组织了校友聚餐会。

问题的看法。一次，我的一个当证券经纪代理人的叔叔打断我的话说：“你如果谈论哲学问题，我愿意洗耳恭听，但谈到财政金融，你一窍不通，所以还是闭嘴为好。”讲到如此种种大失脸面的情节，我不禁联想起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旧日丢脸的场面再次浮现于眼前，或者说，我对过去的我产生了同情。可是，过去得意的事情，却从未引起这么浓烈的回味。

谈到我对政治的兴趣，可以零零碎碎举几件事为例：约在1925年或1926年，我报名加入一个拥护国际联盟的协会。通过协会安排，我在日内瓦住了两个星期，旁听国联的年会。我聆听了保罗-邦库尔（Paul-Boncour）的发言，他为人类共同的和平事业大声疾呼。这个遐迩闻名的演说家的口才使我折服不已。我在那里结识了贝特朗·德·儒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他仅仅比我大几岁，但已是一个出名的报社记者了。

1926年，我还参加过众议院的一次大型会议。当时，约瑟夫·凯洛在白里安（Aristide Briand）内阁任财政部部长，爱德华·赫里欧从议长台上走下来，推翻政府，另组新内阁。但是新内阁立即又被推翻。会场中气氛既热烈又嘈杂，而外汇行情是1英镑已超过200法郎，大街上人群云集，反对议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白里安在议会上发言，提请议会注意一个常识问题：外汇市场上法郎贬值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大资本家的阴险操纵，还应当归咎于内阁危机。他对现任财政部部长A.德·蒙吉的辩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并非完全由于白里安那有名的大提琴式的嗓门，而是他善于运用言辞掩盖事实和思想——作为一个政治家，可能必须具备这种演说和辩论的特长——然而对我

来说，这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埃德加·富尔的嗓门与白里安完全不同，可是，他也具有白里安的那种本领，擅长必要时巧妙地运用言辞将自己真实的思想包含在五里雾之中。

时常有一些政治家和作家到高师来举办讲座。我记得莱昂·勃鲁姆即为其中之一。他详尽地论述“执政”与“夺取政权”二者之间的区别，这是他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也是第二国际的特有论题。他认为，既不要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最坏政策，也不放弃大革命；终将有那么一天，资本主义这棵大树将会衰老、破败、蛀空、崩溃，而大革命和夺取政权的钟声将会响彻天际。听众们公认莱昂·勃鲁姆的讲演极富诱惑力。我反复思忖，为何上台执政可促使资本主义更快走向灭亡。直至战后，勃鲁姆在为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组织者的时代》（即《管理革命》）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承认，书中的假设使他感到震惊，他主张的人道社会主义竟然不能在资本主义寿终正寝时接下它的班。

爱德华·赫里欧曾于1925年与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晚上。当时，公共教育部部长弗朗索瓦·阿尔伯特办公厅的G. 塞尔被任命为法学院院长，取代了该院投票通过的人选勒·富尔，77这引起了持续几周之久的大学生骚乱。那天，赫里欧同我们一起唱歌、谈笑，无拘无束，随和可亲（乔治·勒弗朗克对我肯定地说，赫里欧来学校一事与弗朗索瓦·阿尔伯特事件毫无关联。他来的那一天是视察日）。

我还记得，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也曾来校做过报告，向我们介绍国联的情况。他在演说中尽力为国联辩护，大多数听众虽然心存疑惑，但并没有表现出敌对情绪。来宾中还有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他是《知识分子的背叛》一

书的作者。我在“自由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与他针锋相对的文章。有一个获得教师资格的青年专门研究高等师范学院文科预备班学生的发展情况，据他说，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之所以对朱利安·班达的文章提出异议，主要在于我认为种种历史原因并不都像德雷福斯事件那样简单明了、泾渭分明：一方是一个无辜受难者，另一方则是军队参谋部的声誉。知识分子有权参与是非未明的争执。当时我还不会使用这种词语，但意思已然流露于文中。<sup>①</sup>

至于应邀来校做客的人中那些当时声名显赫的作家，我却记不大清了。这并非因为我们对政治比对文学更感兴趣，而是因为负责组织此类讲座的人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那时，政治在我对未来的考虑中占据何种位置？我在议会旁听席上亲眼看到赫里欧垮台的那一天，我是否幻想过某一天我也荣登主席台？我认为不是如此。恰恰相反，那些演说家的舌战打动了，使我开始对那些活动家、积极分子、群众和党派人士产生某种程度的理解。保罗-邦库尔、爱德华·赫里欧以及后来的德阿（Marcel Déat），他们慷慨陈词，辩才无碍，很能感染我。我一边倾听着他们对对手的高声斥责，一边激动得不能自己，同演说者一样义愤填膺。E. 赫里欧在我眼中仿佛是一个被关入狮笼之中的无辜受害者。数年之后，我对金融机构有了一定的了解，才完全换以另一种眼光去评价赫里欧，评价当时的事件以及我本人的观点。

78 约在 1925 年或 1926 年，我报名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第

---

① 重读我在该文篇末对他的攻击和挖苦，我未免感到羞愧，因为我影射他新近在荣誉勋位团中的提升。说羞愧有些过分，说我自己觉得好笑更为妥帖。

五区小组<sup>①</sup>。要问当时的动机何在？我的回答足以引人发笑：我觉得自己应当为人民大众或为工人们干些事。为改善劳苦阶层现状而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我就不能不加入这个组织。我清楚地记得，我曾在日内瓦碰到一个叫布朗歇的同学，彼此很投机。我给他写过一封信，谈到我思想上的踌躇以及某种责任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参与的义务。在信末，我告知他我已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我曾在发表于《现代》杂志创刊号的一篇文章（短文，无足挂齿）中分析了社会主义的愿景。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心肠善良，选择了以文字为生，与那些仍然从事纺织品贸易或货币交易的亲友格格不入，几乎不可能不想成为、不自认为是左派。我对同行埃斯卡尔毕德进行上述分析时，受社会心理学因素左右，几乎脱口而出，我出身于左派。我一直留在左派当中，至少在我尚未获得自己的独立思想之前。我是否坚持到底了？

现在，我很少同社会要人、当权者、国有公司或跨国公司的经理往来。偶尔，我也去拜访其中某人，或者其中某人也来看我（这需视哪一方有此需求为定）。他们同普通人相比也没什么不同，依我看，他们身上的人情味不比其他人多，但也不比其他人少。大资本家不愿意别人一边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又一边批判他们的某些做法。当然，也不乏有些老板或政府人士自我感觉良好或庆幸我写的专著和文章所产生的影响。然

---

① 乔治·勒弗朗克向我肯定说，我从不曾被接受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我加入的只是“社会主义大学生”组织。但是，在一次上年纪的人的聚会时，我经过核查之后判定，我当时确曾经常出入该支部，只是从未有过党员证。

而，在这些掌握（政府与经济）权力的人物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之间，仍旧存在不可避免的无法逾越的沟壑。

79 我与“真正”的左派在某一方面（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方面）有着共同感受。我对那些自以为天生高人一等的人物极其憎恶。记得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我曾两次与人发生争执，直至白热化程度。一次是与一个银行家，另一次是与一个诺帕型<sup>①</sup>的外交官。银行家说：“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我非得亲自拿起猎枪，让他们重新老实下来。”那个大使在一次朋友聚餐时，当着 P. H. 斯巴克的面说道：“这些阿尔及利亚人，根本就不能将他们视为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说这些话时，既不在银行里，也不在会客厅中，不知我是否模仿出了这些巴黎人当时的语调。

我对体育的迷恋与热情始终未曾消退。足球队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但是，我很快醒悟过来，我不但得从头学起，而且绝无成功的希望。于是，我又重新对网球产生兴趣。在乌尔姆大街度过的四年时间里，我经常活跃在网球场上。我的球技不断取得进步，一直达到二级运动员前半数的 2/6。法国所有运动员，即参加联赛者，都向往着能够使自己的姓名载入这张全国统计表，并且名次不断上升。然而，我在哥哥阿德里昂出色的运动成就面前不免相形见绌，原有的种种空想不禁烟消云散。阿德里昂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比我高的天赋，他对打法做过细致研究，而且还接受过我从未获得的系统训练。在巴黎小小的网球界里，有所谓“棒”（bon）阿隆与“笨”（mauvais）

---

<sup>①</sup> M. de Norpois，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译者注



阿隆之说。这种称呼不无道理；我的打法基本上与阿德里昂属于同一球路，而水平却比他差得多。

今天，我回顾那些岁月时，应该做出严厉的自我批评；网球运动过多地耗去了我的精力和时间。我没有利用度假机会在法国各地或者去外国考察，却匆匆奔赴诺曼底海滩参加夏季网球联赛。乔治·格拉泽是巴黎综合工科学院的毕业生，曾任阿尔斯通公司总经理兼董事长，他与我配对打双打，我们合作长达数年之久。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宽容随和的人，因为发球和截击一向是我的弱点，所以我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双打运动员。然而，这种遗憾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在网球运动中求得的是极大的乐趣，对等级分类则漠然视之。据说，沙邦·戴尔马虽然身居波尔多市市长之位，却仍然十分计较他的网球等级。

### 第三章 发现德国

80 从1928年10月到1930年3月，我服兵役的时间达18个月。这一段时光，我就略过去吧。这段时间主要是在圣西尔炮台度过的，当时炮台被空军用来搞气象训练。我在麦茨的工兵团里待了几个星期后便被调去圣西尔军校学一些气象的基础知识。大部分学员出身良好，由教官传授知识。萨特到这儿来服役，也是我替他想的办法。中间我曾被派到大学街民防局当电话员，这工作没意思。我又回到圣西尔炮台，把我仅有的一点儿气象知识传授给两届新兵，课题是关于云彩的体系。我想方设法教学员分辨各式各样的云，如积云、卷云。

这段读书和普通生活之间的插曲，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段空白，一段名副其实的空白。我在高师上军训课，考试不及格。如果及格，作为高师毕业生，我便能进军官学校，兵役减为6个月。当时，我受了阿兰的影响，既不想考好，又没有下决心考坏；我看军用地图看错了好几处，当班长又当得糟糕，这就够了。

是不是紧接着教师考试，或者在服兵役以后，我才觉得——头一次觉得，肯定不是最后一次——自己在虚掷光阴呢？我是否要对不住自己，背弃自己的诺言呢？我早就在肚子里盘算：人必有为，方能自为（这句话大概是从某个哲学家那儿看来的）。当然，当学生的时候，我每年暑假一味逍遥，  
81 网球赛一串接一串，等到开学，内疚的心情总是压倒猛玩的趣

味。然而，从1928年秋天到1930年春天，我毕竟还能扪心自问，文凭不少，真知灼见却贫乏得可怜，我到底算个什么？

假定我把志向局限于到中学教一辈子哲学，我就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克服的障碍了。开头几年，我会当一名好老师，很可能是非常好的教师。我热爱哲学，表达也不吃力，讲比写还强。那时候，我有本事讲解哲学家最艰深幽晦的争论，连那些对此满不在乎，甚至厌倦腻味的听众都能弄懂。老师、同学和父母都认定我该走另一条路，当大学教授，或者当一名哲学家。可是，我年已23岁、25岁，高中毕业后又读了6年书，到底学到了些什么？也许学习能力有所提高；这样看来，我用来阅读哲学名著的时间还不算全无收获。但是，自己到底该思考哪方面的问题？选什么论文题目？选好选坏，可能决定人的一生。

我为什么先选中生物学，后来又独出心裁呢？我不愿意学许多同窗，甚至最出色的师兄弟，如雅克列维奇（W. Jankélévitch），去写一些风险小的哲学史文章。也许我会写出一本好书，谈谈康德或费希特。我在巴黎大学的唯一导师莱昂·布伦什维格是不爱搞什么形而上学，什么永恒哲学的。他的哲学虽然向往特定的真理，但与自然科学揭示的真理并不相符。这种真理的条件、方法和限度，都是自然科学揭示的。哲学到底凭仗什么仙法，竟能得出形而上的真理，基本上不同于科学知识，而且高于科学知识呢？

在中学课程里，心理学占主要位置。这是遗留下来的旧习。既然心理学还没有达到物理学那样精密的程度，而且可能永远也达不到，那么哲学是否应该全力以赴，填补科学知识暂时存在的一些漏洞呢？

82 柏格森也没有为哲学新进之辈打开门路。他自己也援引科学的真理，从批判某些科学成果出发，推演出一种形而上学。当时我们弄不太清楚什么叫现象学，什么叫分析哲学。大概我被精神分析家的作风所吸引。这种作风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可以说是见不着的。

既然哲学思维必须落实于一门科学，我便选中了生物学。其实，我并没有什么生物学方面的知识，而是因为生物学不需要数学素养。我不懂数学真是遗憾终身。这是在我服兵役以前还是以后呢？大概在以前，不过我没把握。我战前的全部稿件都在战争中不知去向。今天，我已经不太相信自己记忆中的事，而比较信赖思想的记忆力或者别人的记忆力。

有时候，我去高师的实验室；我读了好些书，结果碰上了遗传学。那时候，艾蒂安·拉博还在巴黎大学主讲生物学总论。他一举向几门学说同时宣了战：一向孟德尔主义，二向遗传学，三向醋蝇试验——这种试验得出了四种染色体的基因卡片。全世界已经承认孟德尔主义是学术成果的一部分，为什么法国人还要那么固执地反对？法国的科学家，如吕西安·居诺，早就做出贡献，重新发现了遗传规律。这到底是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去找深入的解释，T. S. 库恩的著名学说很能说明问题：染色体的结构、遗传体的结构以及组成基因的遗传原子，都与拉博的范例不相符合，与总的生命范例不符，与全部机体——环境的范例也不相符合。有一天，在卢浮宫门和塞纳河之间的公共汽车环形站台上，马塞尔·莫斯对我说：“我不信孟德尔主义。”可他一向是以精通科学自居的。至于C. 布隆戴尔（Charles Blondel）和C. 布格勒（Célestin Bouglé），他们都不相信精神分析学说，而且不屑讨论，根本

不承认这门科学。

在1930年，根本不消什么先见之明，谁都看得出遗传学为分析有生命的物体，为操纵——不管是福还是祸——人、动物、植物的遗传因素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然而，我越羡慕生物学的辉煌前途，对于自己工作的信心越一扫而光。有朝一日，遗传学家会反思自己的工作，讲得肯定比我好，对他的做法我还能说些什么呢？生物学教我们认识，或者将继续教会我们认识生物学上的人，我还能多说些什么呢？我也许可以走乔治·康居朗的路，而且走得相当出色：搞搞生物学思想史，制定一些概念，改变一些范例。但是，我都没有认真试一试便放弃了。理由有两个，这两个理由既大异其趣，又融会贯通。

1930年春天，经过法国外交部负责对外推广法语著作的让·马克斯的推荐，我在德国科隆大学谋到一个法文助教的讲席，为名教授莱奥·施皮策当助手。我要完成分内工作，讲课和参加研讨会，分量不轻，给自己剩下的时间有限，不够用来消化为完成个人课题所需要的知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倒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那就是我选择了存在主义的生活方式，这是1945年以后很时髦的说法。自从我上了哲学班，我学的并不限于学校规定的课程。先验推理要花费的智力劳动，远非翻译一篇拉丁文可比。不管怎么说，反正阅读名著，谈论唯心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只能激活我的思想而不能拓宽我的心胸。我对布伦什维格的不平之气相当影响我做第二次抉择，而第二次抉择却影响了我一辈子。布伦什维格的伦理观，就是苏格拉底的伦理观，也就是他和埃利·哈莱维讲解的那种伦理观：一要无所不包，二要来而有往。这是我毫不费劲就能接受的。直到今天，我仍然同意。然而，拿学者在实验室里的态度作为榜

样，作为立身之本，那可没法满足我。学者只能在实验室里实践他的伦理（而社会学家却戳穿了这种表述，这样来看待学者，实在太恭维他们了）。更进一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而不是什么学者；“真正的转变”不过是连环画中的传说。所以我才想找到一个思考的题目，能使我的情操和思想都感兴趣，同时又能叫我立志遵从严谨的科学态度，全身心投入研究。有一天，我在莱茵河畔，自己做出了决定。

84 我时常回想起这一番思考的过程，最后反而担心是否把对整个过程的重建同自己真正的切身经历混淆在一起了。可是我记得，我有了新发现，高兴得不行，便写了一封热情洋溢而又不易看得懂的信给我的二哥罗伯特。大体上说，我天真地幻想和发现的，不过是公民的历史命运，或者是人本身。作为法国人，作为犹太人，处在发展的过程中，我怎么能够认识全局呢？我不过是几万万个人里面的一粒原子。无论多么想认识全局，我也只能从某一观点出发，而其他观点又是无穷无尽的。于是我引出了概然判断，几乎是康德的学说：我到底有多大能耐去客观认识大写的历史——国家、政党、理念（它们之间的斗争连绵了多个世纪）——和“我的”时代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只得求教于历史知识或政治知识的批判。这种概然判断具有另一个范畴：主观追求客观真理，而主观世界却淹没在物质里面，它想考查物质，而物质却渗透了它。主观世界也淹没在现实里面，由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从现实中提取科学对象。我逐渐揣度到自己有两项任务：尽可能老老实实地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时代，永志勿忘自己知识的局限性；自我要从现时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个旁观者。后来，我成了日报的评论员，一味向往从长远处观察时局，指出世界的本来面

目，而不指出改变世界的办法。尽管如此，我还是激怒了好些读者。关于我新闻记者的职业，我后文还要谈。1931年春天，事情还早得很，我还在为德国的男女大学生们讲解《爱的荒漠》《给麻风病人的吻》《萨拉万的日记》。

1930年和1931年，莱奥·施皮策在科隆大学主持罗曼语系的工作，一些风华正茂的姑娘如同众星拱月一般围着他转，可说是热情洋溢、光彩夺目的年代。昂里科·德·内格里，尽管我们多年不见，却不失为我的知己；那时候他担任着意大利语讲师。他也是搞哲学出身，每天很早起床，翻译黑格尔的《现象学》。我脾气不好，小时候就爱发火，大了有时还忍不住，因此得罪了施皮策，错误完全在我。但总的来说，我很喜欢德国大学里的气氛。听讲的人（在教室听课的，特别是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很是热情，比较开朗，不像法国学生那样腼腆。因为我是犹太人而出了点儿状况，但具体的我想不起来了。其实，施皮策也是犹太人，就像人家说的那种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希特勒上了台，他夸奖我在《欧洲》月刊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比较温和的文章，但又怪我没有足够强调他和国家社会主义带来的“新文化”。

85

1930~1931学年，我在课堂上讲解法国的反革命派约瑟夫·德·梅斯特和路易·德博纳尔。我和学生们一道读克洛岱尔和莫里亚克的诗文，大多数学生都读得像我一样激动。尽管当时国家主义激奋强烈，但我在和这些青年的接触中只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和对德国人的好感。国家社会主义压倒了一种感情，但1945年这种感情又袭上心头。1953年，我去图宾根当了几个星期的客座教师，觉得德国大学生跟从前大不一样，但

又十分相似。至于希特勒的残迹，国家主义的余音，那是一点儿也感觉不出来了。我即兴为世界史下了“世界史是英雄行为与混账行为的混合物”这么一个定义，他们都热烈地表示赞同。

就是在科隆度过的这一年，我头一次读《资本论》。我也曾在巴黎大学讲过历史唯物主义，受到 C. 布格勒的责怪。也许他是有道理的。他大概怪我冲淡了马克思的思想，因为我引用了恩格斯并以他的概念为准。我也读了意大利作家蒙多尔佛 (Mondolfo) 和拉勃利欧拉 (Labriola) 的作品，我不情愿把“整体”的人类历史决定论的解释硬派给马克思。当时，我对马克思青年时期的文章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无法重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正如近半个世纪前，即 1976 ~ 1977 年，我在法兰西学院所尝试的那样。

1931 年，我在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还不足以理解和评估《资本论》的价值。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经常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大体上是经济问题：马克思的思想能否帮助我们解释经济大危机？其二，算是哲学问题：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的哲学，能否使我们摆脱在各党各派之中进行“选择”的负担，这个负担虽然沉重，却是我们人类的组成部分？如果未来已经注定、不可避免和必定得救，那么只有瞎子，只有利令智昏的俘虏，才会反对这种命运的到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时，通常最吸引我同时又最令我乏味的是他的历史哲学。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是否一定会通过革命或逐渐改良，把人类引向社会主义？经济大萧条泛滥全世界，德国受害尤为惨重，这是否证实了马克思有先见之明呢？这样是否一下子就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是有道理的，甚至苏联也是对的呢？请大家不要弄



错，我并没有到《资本论》里去寻找论据，证明我反对苏维埃主义是对的。恰恰相反，我希望能够证实，社会主义确实注定是即将到来的历史阶段。

今天的读者会觉得我提的那些问题相当粗浅。这是有道理的。可是在那时候，我才刚刚致力于社会科学。我们眼中的职业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危机既得不出一致的诊断，也开不出大家同意的治疗方案。他们想靠平衡预算来避免通货紧缩和经济紧缩，今天的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是头脑发昏，失掉了理性。可当时的旁观者倒并不都反对。罗斯福 1933 年当选总统，他的竞选纲领中就有平衡预算这一条。我在德国读了关于经济危机的文献，作者大都是评论家而不是专家。他们责怪德国的经济“体制”“过度工业化”和德国东部的农业。我在 1931 年和 1932 年谈论德国的文章登在“自由谈”和《欧洲》月刊上面，这两篇文章暴露了我在经济上的无知。为了写这一章，我把它们找出来重新读了一遍，既不觉得它们有趣，也不觉得为此而羞愧。既然想当一名正在形成的历史的评论家，我在那时候实在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我说不清这些文章在何种程度上忠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思和我当时的心情。我给“自由谈”写文章的时候比较倾向于阿兰派的思想，尤其倾向于米歇尔·亚历山大和他的夫人雅娜，我欣赏他俩对自己的老师及其理念的信服、无私、忠诚和始终不渝。不管怎么说，这些政治文章反正称不上有远见，随时都把道义上的评价同逻辑分析混淆在一起。

87

这些文章都贯穿着一种忧虑——担心德国的国家主义抬头。这不能说没有道理。我在科隆和柏林都预感到国家主义会不可抗拒地突飞猛进，国家主义的政党兼收并蓄传统的右派和

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政党一旦获胜，战争便如魔影幢幢，显示出不祥之兆。正如我在别处已经写过的，1930年春天，我刚到科隆便感到了冲击。就像汤因比说的：“历史会重演”。在1930年或1931年我直觉地感到，在大多数法国人里面我是比较清醒的。我比较能够意识到，狂风暴雨即将袭击整个世界。然而，这种正确的预感并没有让我马上去研究一种外交政策，来应付可能面临的滔天大祸。这种预感只启发我写了几篇议论战争与和平的文章。这些文章可以表明，我的思想正在进步，感性的反对逐渐为政治反思所取代。

我到德国最早写的几篇文章中，有一篇发表在“自由谈”（1931年2月第三期）上，试图纠正我今天所痛恨的、也是自从希特勒掌权以后我一直痛恨的各种现象和谬误。文章标题为《关于和平主义的几条简单建议》。比如拿第八条来说：“德国的和平主义者有权利，有时候也许有义务，敦劝战败者逆来顺受，凡事忍耐。而一个法国的和平主义者，却永远不会有这种权利。”想法当然不错，可从中又能得出什么来？我有理由设法抛弃这种宣传口号。法国和德国彼此对立，并非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而是胜与败的对立。胜利者要保持胜利果实，而战败者则要雪耻。说到这里，理论上的和平主义还没有叫我干蠢事。可是一谈到赔偿问题、裁军问题，我就只好摆论据，就每一个问题权衡必要与可能，而不能再说德国人的要求是被压迫的人对富有的人提出的要求，所以要求本身就有道理，因为是弱者提出的要求（尽管德国人不过只是暂时还算弱者）。

关于《凡尔赛条约》，情况也是如此。我只提些一般的说法。这些说法或许不错，可很难叫人信服。“就法国的政策来说，维持条约也不能作为必不可少的手段。”如果说“改约等

于战争”，如果说“从来没有不打仗而修改的条约”，那就等于承认战争注定要爆发。不改变便不能生活，今后要的是，不打仗也能有所改变。1931年，希特勒执政的前两年，不打仗又能改变什么？任何领土疆界是没法改变的。赔偿和不歧视政策构成了大家讨论的议题，这将关系德国是否有权重整军备。如果主动放弃赔款，也许比较合适。同意暂停缴纳赔款也是个办法，总比一味听从美国为妙。我们如果采取主动，就能在道义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史学家事后回顾，都非常怀疑当时要搭救魏玛共和国、阻止纳粹得胜，恐怕除了法国采取这一行动，再不会有其他办法。然而，从1930年到1933年这几个决定性的年头里，第三共和国什么也没做，一味听凭局势发展。不管怎样，“自由谈”的影响有限，我的文章本来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之所以要回顾一下早期所写的报刊文章，无非想指出我的政治教育前后经历了什么阶段。

1933年2月，我又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全面和平主义的思考》的文章，因为费利西安·夏莱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作《无任何保留的和平》。接着，F. 夏莱本人跟泰奥多尔·鲁森、G. 康居朗与让·马达夫等人讨论了这本小册子以及伯特兰·罗素和阿兰的文章。我在文章里区分了信徒的和平主义、哲学家的和平主义、革命者的和平主义。第一种人跟反对服兵役的人一脉相承。基督徒和康德派信奉绝对的信条：绝不杀人。不是逃避危险，而是拒绝违背自己至高无上的信念。第二种人是相信和平主义的哲学家：真抵抗和假抵抗。我用罗素的话加以概括，他说：“任何想用战争来避免的灾难，绝比不上战争本身的灾难。”今天看起来有点古怪的是，为什么我当时没有用非常浅显的道理来驳倒罗素的说法。

89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们意识到，有时候战败者的惨遇竟会超过战争的灾难。可是，我在那时候只用了一条抽象的论据加以反驳。我说：“还有必要提一提这样浅近的道理吗？像名节或自由那样的好东西，是既不能出价钱买也不能用尺子量的。问题在于向人们指明，国与国之间争夺的东西与真正的价值毫无关系。”我接着又说：“……人们不肯多想想战争的祸害，也不肯多想想遭受侵略的苦难……”我尽力不去直接冒犯阿兰，但我毕竟让人觉得，阿兰的和平主义是漂浮在皇天后土之间的。我从中看到一种“理智的反对”。我承认他的想法完全合乎逻辑（在这一点上，我搞错了），同时也认为他的主张起不了任何作用（这里我却看对了）。

至于（费利西安·夏莱和乔治·康居朗所标榜的）“革命者的和平主义”，我反对它。首先因为它是形而上学的，战争就是绝对的罪恶，内战外战都一样。“革命的和平主义者”如果仅因为战争是暴力而反对战争，那就是自相矛盾。他们该回过头来，做一番政治和历史的分析。然后说，内战和外战不一样。如果内战是为了正义，那也许是可以允许的。对外战争总是为了维护一种社会秩序、一种等级制，因此，集体的正当自卫从来不等于个人的正当自卫。而且，在国家冲突的丛林法则中，谁能准确无误地判断孰是孰非？战争中哪一方是完全出于自卫？说到头，任何战争都可以说是自卫（让邻国充当自己的缓冲国，难道不是防范的措施吗？）。

“也许要回到古时候，政治集体跟个人还相差不远，所以集体自卫和个人自卫还可以混为一谈。今天可无论如何不一样了。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个人甘冒莫大的牺牲，到底为什么，为了些什么集体准则？别人就很不回答。不好回答尤其

是因为说不出到底是为了祖国还是为了阶级？到底是为了人人生活得公平合理，还是为了国家独立？人们到底朝哪一方面才能看到公平合理的前景？今天有哪一个集体肩负着历史使命？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所以，鲁森和康居朗都在困难面前犯了根本性的错误：鲁森将任何战争都算作自卫战争，势必把非正义的战争也当作可以被允许的战争；康居朗既然说了杀人是绝对的罪恶，可是又允许打内战。” G. 康居朗是一个抗敌英雄。只有夏莱始终不渝地信奉自己的和平主义，但不能说没有危险的偏向。 90

1933年2月发表的这篇文章是在1月30日以前写的，仅仅略微谈了一些想法。过了不久，我又在《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关于拒绝服兵役的几点思考》，此文重新把上面讲的那些想法解释清楚。1972年，这篇文章被收进了我的文集《政治研究》。我处心积虑想把战争问题在思想里搞清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也许有点天真。我这种心情来自当代思想，来自时代精神，来自阿兰对于伦理的想法，这里面既有服从权力的一面，又有内心的不恭。

什么战争能像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长，那样残酷，那样无聊和无效？但人们的狂热让这场战争合理化了。1925年，我作为刚满20岁的年轻人，却没有那种激情，有时候简直没法想象他们上一辈的心情。我们这些年轻人，大多数只远远地经历了这场战争，没有吃到什么苦头。至于自己打过仗的人，或者是阵亡将士的儿女，他们都痛恨战争，特别认为战争是得不偿失的。胜利没有带给他们任何足以抵偿那样惨重的牺牲的东西。愤愤不平之气渐渐演变为反对军国主义的情绪，而阿兰正好用哲学来提炼这种反对军国主义的心情。这

种心情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军队士气的低落。

怀有这种心情的人要么走向共产主义，走向革命，要么奉行与德国和解的政策（反对占领鲁尔区，减少赔款，到1930年代初提前撤出莱茵区），要么干脆拒绝服兵役。拒绝服兵役有几种形式：一种是内心上反对打仗，一种是阿兰的方式（拒绝晋升军衔），还有一种是无政府主义。至于我，我的态度接近第二类，确切地说是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态度，因为这样合乎我的性格。阿兰的态度能打动我，但说服不了我。我写的一些文章都透露出思想上的混乱和感情上的迷惘。但这种茫然若失的心情在我1933年2月讨论和平主义的文章里便开始拨开云雾见青天。文章里有一句话说得相当动人：“政治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到了今天，我仍然会这么说。

91 当然，这句话也不免过于简单。在哲学上，政治作为问题，作为判断和行动，自成一个特殊领域。也许，归根结底，政治行为只有同广义的道德联系起来才有意义。我痛恨极权主义，那是因为极权主义能使一切邪恶的东西肆意得逞，大张凶焰，而其根苗则深埋在人的本性里面。任何政治，尤其是任何战争，都必须具有合乎道义的目标，或者有由道德准则规定的目标。但是，目的也罢，手段也罢，都不是考虑了道德然后得出来的，或者说，不完全根据道德而得出来的。权利平等意味着德国将重整军备。国家之间不能有歧视，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合乎公平正义的。但是，德国不接受《凡尔赛条约》划定的领土边界现状而要重振军威，那么和平将得到巩固还是受到损害？

1932年，爱德华·赫里欧重返外交部以后，埃玛纽埃尔·阿拉戈——他的兄弟跟我的兄长阿德里昂很有交情——经常在官场走动，他带我去见外交部的一个副部长，名叫约瑟夫·帕

加农。我曾经对阿拉戈倾诉过，我对德国的政治动向忧心忡忡。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感染上了国家主义。希特勒获得了权力，战云弥漫，欧洲岌岌可危。那个副部长请我谈下去，我便发了一通议论，纯粹是高师的派头，或许讲得有声有色。他听得很认真，看来我所说的还有点意思。等到我发完议论，他才回答：“根本问题在于思考。我一有工夫便爱思考，所以感谢您给了我那么些思考的题目。我们的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威望过人，人品出众。任何建树，此其时矣。您谈德国问题，实在精辟，谈到天边升起的危机，也着实动听，但请问如果您是总理，您怎么办？”他的话听起来一忽儿可笑，一忽儿相当中肯。我怎样回答他的，已经记不清了，反正，肯定是结结巴巴，不然就是张口结舌。该对他说什么呢？

这个部长给未来的评论员上的这一课，后来才开花结果。15年后，我有一天在《战斗报》报社向阿尔贝·奥里维埃（Albert Ollivier）提出一个问题。他刚刚写了一篇社论批评政府。我说：“如果你处于政府的位置，你怎么办？”他大概是这样回答我的：“这不是我的事情。该怎么做，由政府去想。我只管批评。”我经常想抱着另一种心情，来充当这个评论员的角色，老想向政府暗示，该怎么做，或者可以怎么做。有时候，我知道我的建议在短期内是无法实施的。但它至少能对舆论起一点儿影响，这也可以使我期待的事情更容易办一些（比方说，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我就是那么做的）。

92

从1931年写的文章中，还看得出我胸无成竹，在理想和现实情况分析中间摇摆不定。可是，重读1932年写的文章，就没什么难堪了。那时候已经是魏玛政权的最后一年。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我看对了，我不仅洞见当时的情况，而且预料到

不久以后发生的事情。

德国受了经济危机的创伤，国民情绪激昂。布鲁宁当总理，依靠社会民主党，同时向右派求援，试图同希特勒谈判，希望他满足于送几个同伙进政府。仅仅谈一次话，就足够让布鲁宁总理破除自己的幻想：希特勒要的是政权，对其余一切都不感兴趣。我在1932年2月号的《欧洲》月刊上写了一篇文章，先谈了德国总理秘密会见纳粹领袖的事，然后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希特勒忘不了他在1923年的失败，不会再搞一次武装政变（除非事前得到军队同意）。他最清楚不过，国家防卫军和警察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击败他那一帮人马。社会民主党求之不得想让他发动武装政变，只有这样，社民党才能得救，才能为自己辩护。等到建立起新秩序，希特勒将信守合法性的诺言。”随后，我对中间势力和纳粹的关系做出结论，我判断希特勒是个“不错的策略家，不会为了马上分得部分权力而牺牲党的统一。他即便加入布鲁宁政府，也不会放弃行动自由，我的意思是说，不会放弃他横行无忌的权利”。

93 在1932年年初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我既不小瞧社民党和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的没落情况，也不低估各种所谓国家党的得势，其中，希特勒的国社党人数最多，最凶狠，最可怕。我说：“首先，政权差不多已经到手，历届当政者急不可耐地与有国际主义（当然是十分温和的国际主义）嫌疑的社会民主党人达成一致，至少是表面上一致……”我列举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主义的不少事例：“据哈勒-维腾贝格大学的教师们说，学生起哄，斥责一个教授犯了和平主义错误，那是因为大学生都被国家意识浸透了……革命者、和平主义者已经遭到法



院追究。国家社会党人成了法官。”我在那时便这样讲也许有点过火，但颇能说明一个不太能够被否认的事实：魏玛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中缺乏共和派人士，这势必使它走向“国民大联合”，直至把政权的大门向所谓群众的党打开，以便对付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

兴登堡总统打发布鲁宁总理解政还乡，我不曾低估此事的严重性。我说：“兴登堡元帅是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以及资产阶级温和派选举出来当总统并抵制法西斯势力的，现在兴登堡元帅却粗暴地撵走布鲁宁总理而启用冯·巴本，以致胜利已在纳粹掌握之中……”（1932年6月“自由谈”）只此一次，我居然发了火，我说：“一帮不中用的贵族，觉得国家大计威胁到他们的家私产业，一帮将军，自以为要当拿破仑那样的角色，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拆掉了暂时抵挡纳粹冲击的最后一道堤坝。这些落后于时代的特权分子，无能无用，自私自利，睁眼瞎子，已亡的社会和已逝的时代的未亡人，幸存者，竟夺取了德意志共和国的政权。这些人很有可能作法自毙，让自己释放出来的魔力把自己砸烂。到了明天，纳粹党人会不会回过头来，整治这帮浅薄愚昧的反动分子？大家可以存疑，但这并非没有可能。可是，有一件事是错不了的：如果现在纳粹党人不来处决他们，日后终将处决他们……”

1932年7月，我在《欧洲》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口气不像以往那样激动，我说：“德国已经差不多没法用民主方式加以治理了。”然后我又预言：“专制政体”已经无法避免，但还不能说一定是国社党掌权。当时还有取舍抉择的余地：可以是施莱歇尔，也可以是希特勒，前者搞国家主义，后者搞国家社会主义。

1932年11月，国社党选举失败（该党丢掉200万张选票），莱昂·勃鲁姆认为这使希特勒失去了上台执政的一切希望，而我对此的评论却要含蓄得多。我说：“《柏林日报》用大字标题‘巴本和希特勒一败涂地’。不错，巴本没搞出多数派，希特勒丢掉200万选票，但我们不能不说，他们尽管吃了败仗，但仍将继续控制德国。理论上，共产党得胜了，但取得政权还遥遥无期，也就是说，革命还遥遥无期。”1932年11月的选举基本上没有改变局势中的主要条件。既然德国非由右派来治理不可，那么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是国家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是巴本或施莱歇尔，还是希特勒？到底鹿死谁手？难道还看不出国社党的前途吗？

然而，我的文章也有几个缺点。我本来应该分析分析魏玛共和国的宪法。这个宪法跟第五共和国的宪法不乏一些姻亲关系。直到1930年代和经济大危机，大家总把它当作议会制的东西。总理依靠议会多数的支持治理国家。他一旦失掉了议会多数的支持，便只得完全听命于总统。根据宪法某些条款，总统在必要时可以颁布政令（Notverordnungen），跟我国的法令相仿。这么一来，总统便成了真正的行政首脑，左右国内的政治斗争。兴登堡老元帅长久以来抵制住了希特勒的种种要求。在他的心目中，希特勒不过是上一次战争中的小班长、一个危险的革命党徒。他不肯背叛保卫宪法的誓言。他的左右亲信、他的儿子和冯·巴本都劝他先在春天打发布鲁宁，然后在秋天送走冯·施莱歇尔。到这时候，同国社党结成“国民联盟”，已经只此一着，别无他途。照宪法办事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在总统府里，一个年迈的元帅一向信奉君主制。右边是

“国家主义者”，他们深得（政府和经济部门）统治阶级中绝大多数人的同情。再往右去，便是国家社会主义党，这是一个新型的倡导群众运动的党，它有民兵组织，民兵大部分没有武器，该党赢得了几百万张选票。如果共产党不加入保卫宪法的行列，与中间派和社会民主党联合行动，魏玛共和国政府在议会便得不到多数代表的支持。1932年7月，巴本清算了普鲁士的布朗政府，拆毁了社会民主党仅存的最后一座堡垒。不管是演戏的还是看戏的，他们面前还有什么出路？要么依靠国防军，由传统的右派取得政权，一举歼灭魏玛共和国各政党与国社党（如果还有可能来这么一次大清算的话）；要么来一个所谓的“国民联盟”，把国社党包括在内，结果如何，谁也没法预测。至于在这个联盟内部谁会取得压倒性优势，那倒是谁也不会怀疑的。然而，到了1933年，希特勒已经当上总理，法国人和德国人还在柏林你问我、我问你：1月达成妥协的意义何在？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法国大使馆跟记者们谈过一次话。其中有一个新闻老手严肃认真地说：“墨索里尼绝对不会同意这样限制自己的权力。”我不相信从1933年1月31日开始我还会犯什么盲目乐观的毛病。

95

我们这一帮学院派的寓公，就是不理解或者不够理解布鲁宁在经济政策上犯的<sup>①</sup>错误。他只顾收缩通货，平衡预算。我缺乏经济学素养，怎能掌握好些部长、好些工业头头都掌握不住的东西？后来回到法国，我才添了些知识，责怪赖伐尔（Pierre Laval）只顾收缩通货而不让货币贬值，从而促成了人

---

① 我们也不理解，布鲁宁一心只想证明赔款无法缴纳，非取消不可。这一点，他倒的确做到了。

民阵线的胜利。

96 我们大家大概都犯了另一个错误：低估了希特勒。当然，我从心底里痛恨这个家伙，因为他是个反犹分子，而我是犹太人。这得算在账上，但不如想象的那么厉害。听他演说，我便毛骨悚然。他的嗓音能够叫某些人着魔，而我却一听就难受，几乎听不下去。我讨厌透了他那种伧俗粗野的语言。瞧着几百万德国人欢欣鼓舞，我只是目瞪口呆。希特勒浑身杀气腾腾，真是罪恶的化身。对我来说，他就是战争。

然而，谁能想到，不到3年，他便使600万失业者重新就业。到了1934年6月，危机在长刀之夜达到顶点，连素来具备远见卓识的人都认为希特勒的寿命长不了。6月30日，大血案第二天，我的朋友埃里克·韦尔（Eric Weil）偶然对我说：墨索里尼跟希特勒不一样，希特勒是个“混蛋”。我们那时候还没看惯“元首”那种忽而无声无臭，毫无动静，忽而活蹦乱跳，精力充沛。1934年春天，他的好些右派盟友发起愁来。他们本想靠希特勒建立一个保守的国家主义的政权，强迫英法两国给德国平等的权利，也就是说让德国重整军备。他们不相信帝国能活一千岁，或许也怕帝国能够活一千岁。

1933年秋天，我在《欧洲》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叫我不太好受，尽管这篇文章已经不像前几篇那样，同我在1945年以后写文章的笔法格格不入。对于德国危机暂时的结局，我的分析还算不错。我说：“布鲁宁下台以后，国家主义的革命已经没法避免。问题不过是，谁将取得领导权，谁将从中获得好处？”接着我又写道：“体育宫和威廉大街象征着两个敌对的世界：一方面是气势汹汹的群众，另一方面是旧秩序的代表。

等到体育宫的演说家被请到威廉大街去，决定性的事件便发生了。1月31日晚，希特勒的拥护者手舞足蹈，列队游行。在队伍后面，一个是他们的领袖，另一个是纹丝不动的幽灵。这个幽灵代表古老的德国刚刚为明天的德国让开了路。”

关于冯·巴本起的作用，关于“国家主义派”所抱的幻想，今天再来谈论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我当年似乎相信过，国民联合也许不一定会使希特勒称雄称霸。今天的史学家对此还有所怀疑。至少对我来说，国家主义或保守派革命跟国社党毕竟不是一码事。国社党革的是一切现代道德准则的命。1933年5月10日，我跟我的朋友戈洛·曼（Golo Mann）——戈洛·曼是托马斯·曼的儿子，今天已成为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目睹了一件怪事：戈培尔命令大学生把禁书往火堆里扔。我没有描述当时的情况，但上面所说的毁灭道德准则就是指此而言。我看到的现场情景并不发生在冲锋队的巢穴里，而是发生在离大学只有几步远的地方，而且场面十分寒碜，既没有人群，也没有热烈的气氛。也许有百把个穿制服的希特勒分子在听戈培尔讲话。他说：“我烧掉弗洛伊德的书（因为他夸大性的作用），托马斯·曼的书，穆齐尔（Musil）的书，还有好些作家的作品，不管他是不是犹太人。”戈洛·曼和我都不讲话，各自沉思默想。一个有文化的国家，一个有高度文明的国家，上一届统治阶级竟把复兴德国的使命交给这帮恶棍匪徒。焚书于菩提树大街，活像当年把亚历山大港图书馆里的藏书付之一炬。熊熊火焰象征着掌权者的蛮横无理。

对于这一场丑剧，我保留了原来的描写。1982年5月10日，《世界报》增版登载亚历山大·宗巴蒂叙述这件事的文章，我那时候还没有拜读。声讨颓废没落的作品或“非德国”

的作品，檄文是戈培尔写的，由大学生们宣读。现在我回想清楚了。我之前把大学生们的宣读和戈培尔本人的演说混在一起了。被焚书的许多作家里，我又把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错记为托马斯·曼。在这些细节上面，宗巴蒂显然是对的。总的来说，关于整个场面，我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记错，当时的气氛全无宏伟壮阔的味道。这跟宗巴蒂记的就不一样。

大概有不走运的作家的5万本书和一些手稿成为灰烬。书是毁于一炬了，可并不会在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里绝迹。也许，大学生们会在火焰的照耀下行进，黑夜里红光闪闪，颇为壮观，火焰熄灭时也可能好看，可惜戈洛·曼和我都没有亲历目睹。熊熊的火焰，大学生的宣读，戈培尔慷慨陈词，口若悬河，都苦在没人欣赏。柏林人没有到歌剧院门口凑热闹。我们站的地方离火堆不远，走开的时候也没有碰到很多过路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后，我时常听到狂热的人群咆哮呼号，而这一次，这样的人群却没有来，或者是没有接到召唤。这一场火灾缺了观众，只能使我们对它的象征意义心寒齿冷，对这个寒碜无聊的场面嗤之以鼻。

极权体制建立起来了。我列举这一体制运作的主要方式时力求客观，直到过火的程度。谈到仇视犹太主义，我一口气写了5页。文章写得离奇，我今天倒很想对它做一番心理分析。我自己是犹太人，要向法国读者——不管他们是犹太人或者不是犹太人——谈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所以我几乎从头到尾用了旁观者的口气，而当旁观者采取介入的立场时，他会保持几乎同样的冷静。我说：“不去谴责无益的暴行，当然不在话下，但是受人招募去向德国的野蛮举动发动‘道义的’或者爱国的圣

战，也不在话下。”我的亲德思想，连希特勒加上他的反犹主义也压制不住，我下意识地想作为法国人而不是作为犹太人來写这篇文章。关于残酷的暴行，关于集中营，我只间接说到。有时候，我也弄错。我说，纳粹分子要使犹太人沦为无产者，要把他们置于社会集体之外……我还没有说他们已经决计把犹太人撵出德国。我还在反复思考，还有没有可能制止纳粹分子消灭犹太部族。文章发表于1933年9月，大概写在我做客柏林的最后几天。那时候，希特勒上台已有半年。我谴责“合法的暴行”，“冷静的残酷，像集体屠杀犹太人一样令人发指”。

好几段关于仇犹的话都不中我的意。我就算不想替德国人开脱罪责，至少也想解释德国人为什么竟这样消极被动。我说：“德国人习惯于人祸，不再动情于道德声讨……”后来，历史却证明了，不再动情于道德声讨的不仅是德国人，还有叫我难堪的偏好超出常情的唯理主义。我说：“希特勒撵走犹太人使科学蒙受损失，到头来会懊悔的。”我还认识不到，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是不会理睬这种论点的。然而，我至少还比另外许多人少犯一些错误，我敦劝犹太朋友赶快出国。他们在纳粹德国已经不可能有像样的生活。我没能预见到“最终解决方案”。谁又能在1933年就想象得到这个方案？

99

叫我难堪的还有一件事，即德国和法国在犹太问题上大相径庭：“对一个德国人来说，民族中存在种族问题是正常的，而在一个法国人看来却不是这样。谁接受了法国文化谁便能成为法国人，这是理所当然的。迪亚涅<sup>①</sup>老说保卫‘咱们的文明’。在很多德国人，也许在大多数德国人的心目中，一个人

---

① 迪亚涅是塞内加尔的黑人，法国议会议员。

生下来就是德国人，不能后来才成为德国人。”这样泛泛而论，其中也许有点儿真情，但是我不会被流行的思想意识搞糊涂。其实最叫我为难的是，勉强忍住了不去痛斥我最厌恶的现实：既想“什么都能理解”，又不肯“什么都能原谅”，而且老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塞尔日·卡德律帕尼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叫《真理的不幸》。他批评了我写的这篇文章。他责备我在1933年春天在《纽伦堡法令》以前竟用那种口气评论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可是在那时候，我虽然没有预言最终解决方案，但至少还是确认第三帝国绝不会给犹太人留任何活路。我说：“国社党的居心是十分清楚的，国社党不仅要消灭犹太人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不仅要禁止他们担任公职，从事自由职业，而且非得把他们变成无产者不可。”从事后来看，我把希特勒的计划解释为“犹太人的无产化”显得乐观得很天真，可是在那时候，犹太人听了已经毛骨悚然，有人还会嫌我太悲观。

S. 卡德律帕尼责怪我写了一篇为犹太人辩护的“蹩脚辩护词”，还责备我写了这样的东西：“当然，犹太人不够谨慎。”今天，研究德国犹太部族的史学家，包括犹太裔史学家，例如F. 弗里德兰德，比我走得更远。他们深入探讨犹太人到底为什么会变成替罪羊，变成德国人怨恨的靶子。也许那100 时候的环境不允许我保持“客观”。那时候，我根本不该探讨猖狂反犹的原因。要是这样的话，每逢分析时事，就非得善恶分明，只能口诛笔伐，而不该致力于理解。可是，我自己就指出了理解的局限性。我说：“我们不必想方设法去预测，我只想帮助大家去理解。可是，有些东西，读者也许不愿意去理解……追求客观不该排斥必要的义愤。”

这个作家责怪我写的另外一些东西，今天我一定不会再写



那些了。我注意到希特勒毕竟找到了“解决政治问题的方案”。在那时候，在1933年以前，任何评论家，或者说差不多任何评论家，不管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观察到了德国社会的分裂，因此把“团结全国”的功劳记在了希特勒头上。但是，只要读读通篇而不局限于一句两句，我的意思还是清楚明了的。我说：“通过把暴力和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使用，他重新教会了德国人俯首帖耳：鼓舞与愚弄、责任感与无奈混杂在一起，叫人只得屈服于命令。”下文又说：“‘主体’起死回生。”“他在椴树下蓬勃吐艳，襟佩卍字徽，堂挂新圣像，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取代了帝君的翘须。”

有一段话比较容易被挑出毛病，也许是因为我对时代风气让了步：“健康的生命力鄙视风雅与怀疑，它不应受人鄙薄与揶揄。集体的信仰往往粗犷简单，摘其谬误并非难事，历史却不偏爱讲道理的文人学士。”不错，历史并不认为爱讲道理的文人学士最有道理，而更不幸的是，至少在20世纪，集体的信仰大多十分粗暴。我是在观察，并没有赞同。到了1935年，我又写了一篇相当严厉的文章，批判日耳曼人在“希特勒万岁”的叫嚣声中完成了表面上的统一。

反正从1933年起，我就再没有受希特勒和平主义宣言的愚弄了。我说：几个月来，尽管和平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但是头头们并没有放弃其野心。我认为托洛茨基对纳粹政策的解释是正确的，但我有一个异议。我认为，独裁者的计划并不是那么明确。不管怎样，我们的任务十分清楚：不论我们个人的感情倾向如何，我们必须帮助（和强迫）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选择和平解决的途径。托洛茨基的文章分析了1933年5月17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他在和平的言辞

以外看出新政权重整德国军备的决心。这一决心必然引起德国和法国的冲突。希特勒有了实力，便将公开他的野心：向东方发展。“纳粹反对同化，但不反对兼并，劣等民族被日耳曼主义压服以后，最好就此灭亡。”

我就这样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纳粹是既针对西方也针对东方的帝国主义。这位苏联红军创始人考虑到希特勒在争取英国同意德国重整军备时才如是说。我毫不怀疑“元首”的野心，但是怀疑他还没有确定实现“大战略”的每个阶段的详细计划。

我在《欧洲》月刊上发表了文章以后，再也没有写文章谈论希特勒，谈论德国和国际政治。直到战争爆发前，只有三次例外。一次是在《汇编》上登过一篇。《汇编》专门登载C. 布格勒主持高师社会文献中心召开各次会议的论文。一次是讨论埃利·哈莱维发表的著作《专制的时代》，文章被刊登在《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上面。最后一篇讨论“民主制度与极权制度”，是在法国哲学学会年会上的论文。

我本来把这一章的内容命名为“发现德国与发现政治”。这本来是同时发现的。我念念不忘的是和平主义、道德主义，这都是从阿兰那里接过来的。其中也有我自己的历史观念。我说：“我们国家对德国危机的特别关心来源于……一种深刻的本能，不管是否愿意，德国的命运就是欧洲的命运。”1945年，第三帝国一垮台，我就重新提出了这种看法。我接受歌德奖<sup>①</sup>的时候，

---

<sup>①</sup> 法兰克福市每三年颁发一次歌德奖。我在1979年获奖。1982年，恩斯特·荣格获奖。

拉尔夫·达朗多夫在颁奖时致贺词说：“德国是我的命运。”他这句话没有讲错。

今天，我想回顾一下，当年初次接触德国文化的时候，我到底有过什么样的感受。1930年春天，我一到科隆市便去钻研报刊，因为我不太听得懂施皮策教授、助教和学生讲的德语。读哲学著作还相当困难。从1930年到1931年，我在科隆度过了一个学年，在语言交流方面有了一些进步，跟人家交谈已经没有什么障碍。德国青年一代的苦恼，人与人之间的热情，都感动了我。哪怕是多多少少倾向国社党的大学生也不拒绝和我交谈。当时我在科隆和柏林接触的德国人，并不像今天所描绘的那种妖魔鬼怪。我们在莱茵河畔喝酒，或者在施普雷河边酬唱，蓦地友爱之情油然而生，江山暮色，为之改观。然而，倒不全是德国的青年就此吸引了我，而是德国的文化发挥了魅力。

102

这种震动乍看颇为使人惊叹。我和康德的作品整整一年形影不离。我对休谟研究得不深不透，限制了我理解康德的三部《批判》。尽管如此，我仍然消化了德国哲学中可贵的东西，也许是最可贵的东西。我永远忘不了，形势迫人乃是道德的精髓。这跟宗教差不离，不是理性能限制得住的。可是，我是在莱昂·布伦什维格的新康德主义中解释康德。康德的学说与法国非历史的世界主义（至少是巴黎大学标榜的世界主义）不难融为一体。

我阅读东西时很少认真考虑，往往摇摆在两极之间。一方面是社会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另一方面是西南德国的新康德学派的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我觉得两方面都蕴蓄着无穷的宝藏。法国作家一下子便相形见绌，几乎显得有点

贫乏了。半个世纪以后，我至少该说，自己还是保守一些为妙。德语中极其富有概念性的词句，加上德国的哲学传统，很容易叫人产生错觉。德文“有意义的整体”(Sinnhafte Zusammenhänge)译成法语“感觉系统”(réseaux de sens)便会失掉一部分妙处。当时，我十分佩服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今天，我自己都觉得奇怪。几年前，我为“意识形态和空想”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因而重新读了曼海姆的书，我心里纳闷，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名气。还是追溯一下过去吧。

西蒙娜·德·波伏娃说，我跟萨特谈过胡塞尔的学说，引起了萨特火烧火燎的好奇心。其实我同他一样。我学到了现象学，觉得自己仿佛从新康德派的体系中解脱了出来。可以说，那时候我已经克制住自己身上形而上学的脉搏。真正触动我的，倒不是形而上的现象学，而是这种学派的思维方法，几乎可以说，是现象学的观察方式。我潜心思考历史和人类现实的内在意义——人类现实是可以参悟的。我觉得威廉·狄尔泰缺乏胡塞尔那样的哲学思维，所以没能把他的预感表达清楚。我弄懂了发展中历史的各种意义，从而拿起或者重新拿起马克斯·韦伯的学说。我逐渐意识到韦伯学说的伟大，同时发现自己同韦伯存在一种心意相通。

为什么我一接触德国人，特别是马克斯·韦伯，便对社会学大感兴趣，而涂尔干却使我对社会学起了反感呢？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得重新使用已经用过的说法：出发去追寻我自己的过去，而同别人的过去比起来，我对自己的过去几乎同样生疏，同样缺乏客观性。

从1924年到1928年，保罗·福科内和塞勒斯汀·布格勒

在巴黎大学教授社会学。一个是涂尔干正统的门人，另一个虽也出自同一师门，但思想比较自由，不那么像社会学家，两个教授都启发不出什么志向来。他们俩没有助教。高师同学自以为高人一等，不屑去巴黎大学听课。我时不时去听听布格勒先生的课，上文已经交代过，我在巴黎大学讲过一次历史唯物论。

当然，我拜读过涂尔干及其门生子弟的巨著，但学术的火花并没有迸发出来。我在高师，时而大受康德的感染（受笛卡儿的影响也不小），时而醉心于普鲁斯特（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也那样醉心就不好说了）。就这样，我摆脱自己，摆脱心里的疑虑，摆脱受别人的判断的影响，单纯顺从自己的悟性或道理。我在《追忆似水年华》一书中，重新感到生活的艰难、由于念念不忘别人的看法而自己成为俘虏的事实，以及命中注定的种种令人丧气失意的事情。我虽然很多年没有重读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但对他仍然十分崇拜。康德或者普鲁斯特，形而上的推理，除了这两方面的感受，《社会分工论》《自杀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都没有拨动我的心弦，它们只不过是一般的研究对象，我于必要时拿来谈论谈论。我那时代的哲学良师什么都谈。

104

我担心自己又在简化内容。除了康德和普鲁斯特，还有政治。我几乎从来不跟萨特谈政治，跟尼赞，跟拉加什，甚至跟康居朗也不谈政治。我跟不太知己的朋友——比如时不时见到的罗贝尔的朋友——还稍微谈谈政治。可是，我酷爱政治。我从德国接受了政治教育，归来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每逢公共集会，我仍然同群众的激情有着深切的共鸣。我还记得1924年的一次集会，那时候，左派联盟刚冒头。保罗·邦库尔一出场

便是一片欢呼声。轮到赫里欧，“等他讲完了话，全场还在悉心恭听”，然后才欢声雷动。我很惭愧，但不能不承认，我后来居然对马塞尔·德阿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派头和保罗-邦库尔或赫里欧不一样，他论证多，感情用事少，而且口吐莲花，引人入胜。<sup>①</sup>话虽如此，我酷爱政治，其实对我来说是一种避难就易的恶习，阿隆一家人都有这种避重就轻的习气。

涂尔干搞的社会学，既打动不了我这个一心想充当形而上学者的人，也打动不了我这个普鲁斯特的读者。普鲁斯特的作品能帮我意识到人在社会里上演的喜剧和悲剧。涂尔干的警句“上帝或社会”，叫我反感或生气。联系统计数字来解释自杀，实在没法叫我满意。从社会出发，或者以社会的名义来搞道德教育，似乎是天主教教育的翻版。这是脆弱的，理由很简单：今天的社会已经不是严密一致的集体了。

105 目前，新涂尔干主义与某种马克思主义夹杂在一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最高决策者，代替了社会。这种社会学主张对集体生活进行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更接近于涂尔干。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元的，同样的价值观被强制于各个阶级。那些运用“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人，他们描绘的是一个阶级社会。他们强调统治的意识形态无所不能，同时贬低道德的威望，说它是特权分子和统治者的东西。涂尔干恰恰相反，他希望恢复道德对思想的影响，因为道德已经失去了这种影响力。谴责统治的意识形态往往叫我出神，而神化社会也同样叫我向往。同一个理论不能同时适用于极权体制和自由体制。

---

<sup>①</sup> 让-里查德·布洛克 (Jaen-Richard Bloch) 也佩服他的雄辩。

马克斯·韦伯跟涂尔干不一样，为什么韦伯有时候能够激起我强烈的感情呢？在1931年或1932年，我还没有一定的见解，而从1924年到1928年，我已经懂了一些事情。在高师上学时，我不过是个学生，对家庭，对法国，对大学的一些老生常谈还没有自己的看法。马克斯·韦伯也要客观对待人在社会里亲身经历的现实。客观对待这种现实，并不是“物化”这种现实。他按照方法论的原则，绝不忽略合理化，而合理化是人从自己的实践中，从自己所处的制度环境中体会出来的（事实上，涂尔干并不像他的方法论所暗示的那样忽略当事人的目的和动机）。他身上光彩逼人的东西，正是他的世界史观，他阐明了现代科学的特性以及他对人的历史命运和政治条件的思考。

他对各大宗教的研究真叫我着迷。这样来理解社会学，就保持了其哲学源流里最宝贵的东西。这样的社会学致力于恢复人给生活的意义，致力于恢复一些体制，而这些体制维护宗教的使命，把这些使命传下去或者变为仪式。历来的先知曾经动摇过这些使命，然后又加以刷新和改革。也许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并不像我在半个世纪以前觉得的那样，跟涂尔干的社会学背道而驰。但是，阅读马克斯·韦伯的书，我仿佛听见人声嘈杂，听见我们的文明嘎吱嘎吱的崩裂声、犹太先知的声音、可笑地回荡着的希特勒的鬼哭狼嚎。世代代来，官僚制度和哗众取宠的天授权威轮流坐庄。1932年和1933年，我首次觉察出良心的交锋和怀抱的希望，这都是一个社会学家兼哲学家启发我的。

106

涂尔干并没有帮我在社会学的启示下去搞哲学。他自己肩负起公民的职责，提倡以世俗的伦理来克服日趋衰微的天主教

伦理。把话说得婉转一些，这对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他为人严谨整饬，道义上一丝不苟，为人行事，一派康德作风，自然叫人肃然起敬。他认为，革命不能从深处改造社会就不过是雷声大，好处少。在这一点上，他也许有道理。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扰乱了我的心。国家社会主义威胁着法国和全世界的犹太人。不肯把革命当作悲剧的社会学，笼罩着我们的人生。马克斯·韦伯则既没有低估社会制度，也没有轻视决定命运之人，做出不可逆转和祸国殃民的决定。他凭仗自己的哲学意识，把持久的意义和短暂的意义结合起来，把社会学家和实干家的特质结合起来。多亏了他，我在莱茵河畔预感到的计划才得以孕育成形。

社会现实的内在意义和呼之欲出的政治关怀，是我亲附马克斯·韦伯的两条理由。另外还有一条理由是，他关心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专用的认识论。他也是从新康德学派里走过来的。他追求一种普世真理，即追求一种对所有追求这种真理之人有价值的知识。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人类现实的暧昧性，意识到史学家应向别人——向古人或今人——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问题的多样化说明随历史做出的解释日新月异，而马克斯·韦伯则很想限制这么多光怪陆离的问题。因此，意义相当 (Sinnadäquation) 和原因相当 (Causaladäquation) 的双重性得以产生。单靠意义相当满足不了思想，必须证明意义相当的真实性。德国人 (哪些德国人?) 投了国社党的票，动机何在? 各种动机中，哪些是决定性的? 这些动机是由什么引起的? 这样，一方面是以公众可信的方式解释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则需得出一条真正的解释，思想家在二者之间摇摆不定。我猜想，这种摇摆便是马克斯·韦伯思想的中心。我自己的学术著作，



我的两本论文，都是在这种摇摆中产生出来的。

我就这样意识到了自己为什么对涂尔干的社会学竟如此反感，而且发现了自己为什么对德国的社会学又如此钦佩。可是，当时的背景是，德国人民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而与此同时，纳粹蒸蒸日上。在这样的多难之秋侈谈社会学，要在我们高师设公民教育课，岂非太不合时宜？柏林的体育宫里，啤酒馆里，一场滔天浩劫正在白热化的群众集会中酝酿成熟。多么悲惨的讽刺！连马塞尔·莫斯也是这样想的。涂尔干的论点：宗教信仰产生于集体的中邪着魔，产生于火炬的闪烁红光。成千上万德国青年赤心膜拜他们的部族和领袖，而涂尔干的学说却不得不在纽伦堡低头服输。<sup>①</sup>

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天授真命领袖的概念，而且以价值中立的名义，把这一概念同时应用于犹太先知和美国的哗众取宠分子，如休伊·朗之辈。他会不会反对把希特勒和佛祖归入一类？我在那时候，会不会抨击有些人不肯区分价值和个人？我可不敢肯定。我在一段时间里曾经佩服过曼海姆，因此对于唯

---

① 马塞尔·莫斯于1936年11月6日写信给一个丹麦同人拉努尔夫先生说：“涂尔干和我们这些后辈，大概都是集体代表权力论的创始人。至于多多少少已经走出了封建社会的现代大国，竟像澳洲原住民那样跳着舞着就会着魔中邪，像小孩那样手牵手团团转，这实在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这样的恢复原始状态，从未让我们深思熟虑。我们满足于聊聊人群的情态，而现实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我们也只满足于证明，个人是在集体精神中为自己的自由、独立、个性和批判找到基础和养料的。其实，我们没有估计到新手段非同小可的作用。”

他在1939年5月8日又写了一封信，允许把前面一封信公开发表，并且补充说：“我认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悲剧。我们从前指出的东西后来完全得到证实。这也证明了，我们本来应该料想得到，证实我们看法的将会是祸而不是福。”

社会学论发生过兴趣。我先追随莱昂·布伦什维格，把思想者与超验的我混在一起，后来又急于用人所处的社会条件来解释某人的思想。为了彻底摆脱布伦什维格对我的影响，我写了一篇一百多页的长文向他请教。文章里，我提出了犹太的起源、法国环境和资产阶级生涯。他让我自己决定是否发表这篇文章。其中阐述他思想的部分，他表示赞同，至于对他提出批评的部分，他认为既蹩脚又讨人嫌。我没有发表，而文章在战争中不见了。他去世后，我在伦敦的法国研究之家悼念他，向他致敬。《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登载了我的悼词。

我在柏林大学并不常去听课或者参加学术讨论会。同窗赫伯特·罗辛斯基是头一个和我谈克劳塞维茨的人。通过他，我认识了一个怀有哲学思想的经济学家，名叫戈特-奥特里兰费尔德。我鼓起勇气，读了他两册的巨著《经济与科学》，但收益有限。

1931年和1932年，我往往扪心自问：我漫无边际的阅读是否分散了精力？后来回到法国，我才觉得学到了不少东西。

最后几年，我眼看着魏玛共和国在做垂死挣扎。我在科隆向一个德国中产阶级家庭租了一间屋子住下。我还约略记得，房东爱谈德国败于世界各国大联盟之手。房东太太则认识几家“相当得体的”犹太人家。第二次到德国，我租的房子很糟糕，房东有时候会半夜里酩酊回家（房东太太事前倒是告诉了我的）。随后，我租了个两居室，十分舒适，只是不跟房东一起用餐。我结识的是大学生和助教，并不是房东。

我在科隆结交了一个青年大学生，名叫鲁迪·施罗德。此人蕴藉风流，令我神往。他的父亲做雨衣雨伞买卖。他和我在

侨居期间，一直颇为亲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深恶痛绝。两年后，他来到巴黎，生活拮据，一直待到大战爆发。他投效了外籍军团。战后，我才从他妻子那里得知，那时候，他们夫妻俩早已离异，他到印度支那加入了胡志明阵营。有一天，我在《费加罗报》上读到多米尼克·奥克莱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党卫军上校鲁迪·施罗德》（题目里还有别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文章说鲁迪已经成了胡志明的亲信。我想设法跟他通信，但尽属徒劳。1946年，他的父母亲向我打听他的消息，一直到1960年，我才从德国人那里听说，他在莱比锡大学任教。要是他还在东德的话，我倒很想见见他。我怀疑生活会让他变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至于他从外籍军团开了小差，脱离了西贡或河内的法国统治，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诧异。我凭什么去责怪他？我一直天真地相信，我们俩终能重修旧好。

在科隆寄居时，我要上课、备课、读《资本论》、与学生谈话、经常光顾网球俱乐部（我名列第二第三）、参观丰富多彩的莱茵派画院，实在剩不下什么时间去观察失业工人或贫困现象。我在柏林的时候，大部分时间消耗在国立图书馆里。但在浩劫发生的前两年，我仍然亲身体会了魏玛文化。在思想方面，我认识了最根本的东西。一方面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说，另一方面则是第二国际的劫后余生——法兰克福学派和卡尔·曼海姆构成了政治哲学界的两极。1945年以后，法国思想界延续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在1930年代，它们统治了德国思想界。1923年，卢卡奇发表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追随黑格尔的胚芽作品。到了1950年代，梅洛-庞蒂重新发现了这部作品，稀奇古怪地称其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我们也亲身经历了当时电影和戏剧的耀眼光彩。我给名导演雷纳德上法语课。我们对歌剧《三枚银币》心驰神往，为《穿制服的姑娘》而动情。《布尔什维克文化》还在风行。宫堡府邸、古画展览以及克里和科·什卡的作品任凭欣赏。这是末世的气氛吗？狰狞的死神飘荡在魏玛这个没有共和人士的共和国上空，徘徊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头顶上，这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痛恨资本主义，却对纳粹不够警惕，从而不肯断然起来保卫魏玛政权。再过了几年，死神便降落在了法兰西。

我们晚上时常在法国研究之家聚会。我在那儿认识了很多：帕斯卡尔·科博和让·阿尔诺，他俩都当了文化专员或参赞，周历各大使馆；还有皮埃尔·贝尔特朗（Pierre Bertrand），后来于1943年我们在伦敦重新相会，他是《费加罗报》的特派记者，常驻伦敦一直到退休；安德烈·马尔蒂内，他学外语的才能叫我羡慕钦佩；让·勒雷，他是大名鼎鼎的数学家；罗日·埃罗，当代出色的日耳曼学家；还有朗之万（Langevin）的亲戚C. 萨洛蒙。

当然，我们都是同气相求，一致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大选那天晚上，我们都安静地倾听选票报数。我们也参加大型的公共集会：我听过好几次戈培尔和希特勒的演说。对于我的学生和许多相知好友，我的记忆已经属于历史，除了旧事陈迹，我还能带些什么给他们？聚在体育宫向希特勒欢呼的德国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大概各个阶级都有。其中好些人从衣着容貌看来都像是富有的资产阶级。有些还像知识分子。他们都点头赞成希特勒怒骂犹太人、法国人和资本家。有一次，我在这样的群众大会上碰见一个才华出众的大学生，名叫舒尔，他一向痛恨希特勒。旗手队伍穿过会场到主席台下集合时，他不肯起

立。他的周围掀起一片叫骂责令声，他昂然不动，倒也没有遭到殴打。1941年，他在德国驻苏联大使馆当随员，被征入伍后，阵亡于东战场。有一个外交官告诉我，他一直心口如一，直言不讳。大约在1958年，或者在1959年，我在巴黎大学讲完一堂课后，有一个德国学生上来和我攀谈。原来他是舒尔的儿子。他的母亲还保存着我写给他父亲的信。我碰巧也找出了舒尔在1933年以后写给我的信。原来舒尔也像成千上万人一样，为第三帝国效过忠，落了个不该落的下场。

我经常去洪堡大厦。那是大学生聚会的地方。就在那里，111  
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演了一出戏：《克诺克》剧中的一场。我扮的就是克诺克，演得非常带劲。演戏是我梦寐以求的，但又从来没有当真。我就是在洪堡学院见了赫伯特·罗辛斯基，并且和各国大学生切磋交流。

1933年1月，我们还在法国研究之家寄宿包饭。对我们来说，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反犹示威从来没有殃及我本身。我长着黄头发、蓝眼睛，不像纳粹心目中的犹太人。我的朋友苏西尼是科西嘉人，肤色较深，富有地中海风度，有时候当街遭人凌辱，我反而老是脱身事外。有一次，火车里一个女客告诉我说，我们是同道，因为她不喜欢希特勒的口号，说什么女人只能围着“教堂、厨房、孩子”转，可我是个犹太人。最使我震动的是，纳粹掌权后几个星期，人们几乎不觉得历史上发生了大事情。成百万柏林人一点儿也瞧不出有什么新东西。可兆头或迹象却不是没有：仅仅三天工夫，都城里大街小巷全都是穿制服的人。在学生会里，原先比较保守的同学忽然也穿上了制服。我瞧着倒并不觉得太稀罕。好些大学生从一开始便加入了国社党。其中有一个学生一直没有加入国社党，甚

至表示过反对，到这时候也声称要“跟着走”。他对我说，你将永远是个旁观者，一个持批评态度的旁观者。你没有勇气参加将给历史和群众带来胜利的行动。他说得不错。不过，面对希特勒，或者面对斯大林，那就非说一个“不”字不可。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些人写了一些不体面的东西，干了一些不光彩的勾当。我是靠了自己的脾性，才没有上这些东西的当，而有些人却着了历史的魔，上了历史的当。

112 还有一件事震动了我。反对派或嫌疑分子还没有成百成千地被送进监狱或集中营，而恐怖就已经弥漫开来。纳粹掌权的半年之间，新主子当然残害了一些人。千年的帝国搞些集中营来庆贺建国典礼。而集中营里也只是关了多于六七万的共产党人、自由派人士、犹太人和盗贼匪徒，但已足够形成恐怖的气氛。可是，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人物之中，尤其犹太人之中，还有广大群众中间，已经泛滥着无处不在、横死凶终的恐惧。银铛累累之灾，人人为之自危。我们呼吸的空气变了。1933年春天，库达姆大街咖啡馆露天座上风和日暖。我的犹太朋友和自由派朋友都说：“他们可抢不走春天。”

那时候，我的朋友马奈·斯佩尔伯（Manès Sperber）还在共产党内。他在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说，不管怎么样，他总在期待着工人党起来抵抗。不久以前，德国无产阶级还对第二国际引以为豪。至于我们这帮法国人，还有大使馆的那些人，却没有一个能想象得出老百姓会起来造反。希特勒当上总理3个月以后便是五一劳动节，工人、职员都在卐字旗下列队游行。在几个月前，就是这些人还高举红旗，结队游行，不管红旗上是镰刀铁锤，还是钢铁战线的三支箭。查科丁在他写的《强奸群众》这本书里说，这个钢铁战线还曾一度相当吃香。德国

的无产阶级究竟为什么这样一触即溃、一败涂地？几百万选民自始至终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票，这些人怎么一下子都销声匿迹了？

事后探讨是不费周章的：共产党员奉斯大林之命，打击“社会叛徒”比打击纳粹还要紧，那么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这两派力量，怎能团结起来一道搞地下斗争，一道采取武装行动？希特勒却不客气，一朝权在手，便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一律送进集中营。既然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就没能预先防止，后来又能干什么？人民大众解除了精神动员，人人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只好听天由命，这种思潮一时充塞弥漫，势不可当。这些经典的论据本身当然说得通，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社会党也罢，共产党也罢，领导也罢，群众也罢，谁也没想对警察和国防军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为什么不想？没有办法，没有武器。可是还有一条，社会党的选民，甚至共产党的选民，都是良民百姓，习惯敬重执政者，也就归顺了新朝。大概也有一些人，想等纳粹尝试失败后采取行动。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动摇的，也是当时最叫我们触目惊心的：纳粹的胜利竟然获得德国全体人民的认可，尽管在国会纵火、禁绝共产党以前，大多数选民一直没有赞成过希特勒。 113

今天，对于这一次集体投降，许多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都理解不了，更不用说谅解了。1月31日之后，尤其是纳粹火烧国会大厦后，我就有一种气数将尽之感，觉得历史在动，而短期内是势不可挡的。当然，褐色制服到处蠢动，恐怖活动盛行，危机四伏，反犹活动泛滥猖獗，胜利者趾高气扬，这一切都叫我极端厌恶。按说，仔细观察起来，革命是很少讲仁义道德的；在希特勒身上，我就嗅到了妖魔鬼怪的味道。许多德国

人还存着幻想。在领导阶级、贵族、经济界的领导阶层看来，上一次大战中的一名班长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应急的办法。然而，德国人的思想状况，广大群众的情绪，可以用一句德国俚语来概括：“与其天天害怕，不如一个恐怖的结局了事。”

是不是应该说，德国人民就这样认可了反犹主义？我怀疑，骂骂犹太人就能感染德国人民，把纳粹演说家的叫嚣丑诋统统当作货真价实的东西。我在一些明事理的人嘴里听到一些说法。在当时听起来，那些话倒也不见得没有道理：“他奈何不了普天之下的犹太人……他会激怒美国人……他没法撵走搞化学物理工作的犹太人。没有他们，威廉帝国在盟国的封锁下撑不过4年。”事后看来，这些说法显得有点天真幼稚，可是，谁也驳不倒它们。其实，任何旁观者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那种反犹主义已经不是什么宣传手段，不是什么竞选的理论。从1942年开始，“最终解决方案”中发表的极端反犹主义的114 观点，竟然没有马上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怎能相信不可思议的东西！

在寓居德国的岁月中，我结识了好些作家和塞纳河左岸《新法兰西评论》杂志社的人物。我在《欧洲》月刊发表文章，从而认识了让·格安诺（Jean Guéhenno）。他是我的朋友杜瓦尔（Jean Duval）伉俪的知心好友。莱奥·施皮策会请些名家到科隆做报告，其中有乔治·杜阿梅尔、安德烈·尚松（André Chamson）、安德烈·马尔罗。杜阿梅尔打动了听众，甚至得到了当地一家大报纸的欢心。他简直不带什么诙谐味儿地严肃地说，失去一种动词时态对一种语言来说比一个国家丢掉一个省份还要严重。马尔罗做的报告，题目我已经记不得



了，大致是谈各种文化的命运。听众对报告的印象很深。我对他说，他的话也许从听众的脑子滑过去了。他说，听众自始至终倾听不懈。他说得对。的确，马尔罗居然抓住了、征服了、震慑了他的听众。报告会讲到最后一句，沙漠里刮起了风，只剩下亡故的天神，圣洁的石碑在风沙里埋没了。

克拉拉（Clara）陪着她丈夫安德烈一道来，很有一股子挑衅的劲儿。她跟莱奥·施皮策聊天，开口就说：他自己愿意娶个犹太小女人。如果去掉这句话里的自反代词，意思很简单，就是：“他娶了个犹太小女人。”如果保留这个自反代词，那么话就说得有点粗俗了。意思是：他费了很大劲或下血本娶了个犹太小女人当老婆。施皮策把原话告诉我，我不只是觉得刺耳，更多是感到惊讶。这句话表明，那时候克拉拉半开玩笑半当真，故意在安德烈面前退避三舍，而实际上越发显得明慧动人。

我结识当时知识界的佼佼者倒不是在科隆演讲会上，而是在蓬蒂尼市举行的“十日会”上。1928年，我刚刚通过了教师考试，保罗·德雅尔丹（Paul Desjardins）便邀请我参加一次“十日会”。我做了一次关于普鲁斯特的报告，有幸得到安娜·赫尔龚的青睐。我很喜欢这些“十日会”，它们谈论的东西都相当有意思，并且每天只消花费几个小时。开会期间，社交活跃，大家聊得海阔天空，有时不免涉及一些闲言碎语。五十来个知识分子，名气有大有小。可以说他们平常都是闭门索居，而今彼此观察观察，恭维恭维，批评批评，仿佛在什么宫廷之中，朝堂之上，不同的只不过是缺一个君主。直到最后几年，保罗·德雅尔丹一直是群贤的中坚，其居所也是名流的聚会场所。大家都不知疲倦地欣赏意涵各异的艺术，既有真心实

意的，也有装模作样的，反正他都一一结识，而且也让大家彼此结识。

如果没有蓬蒂尼的“十日会”，我怎能跟安德烈·马尔罗相叙十天，从而结下长期深厚的友谊？罗杰·马丁·杜加尔每会必到，但从不参加辩论，只说：“他们一个个都那么聪明……”可是，他的慷慨大度，平易近人，吸引了女子高等师范学院的高才生——尽管她们已不再年轻——同时也吸引了一些心神不宁而又雄心勃勃的青年教师。我对阿瑟·芳丹也记得很清楚，他是高级官员，同阿尔贝·托马斯和保罗·德雅尔丹有交情，同时熟识许多政治家和诗人。他既关心企业经营，也关注工人的生活。他和安德烈·菲利普大概在1928年的一次谈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我指的当然不是谈话细节，而是主要内容——芳丹把他青年时代的工厂同现时的工厂做了一番比较。

正是在1932年一次出色的“十日会”上，我认识了苏珊·高松，并与她结为终身伴侣。那时候，她在维克多·杜吕伊中学读书，没有任何理由和这个知识分子的退隐场所来往。她的父亲出身农家，他家在村里经营一家旅店。他读过一点儿书，这有点偶然。他在海军当过机修军官，战事一结束便退伍，到一家工业公司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这家公司是液态集团的分支。苏珊在中学有两个同窗好友。一个是罗杰·马丁·杜加尔的女儿克莉丝蒂安，一个叫艾蒂·戈博。苏珊和艾蒂十分亲密。后来艾蒂到马达加斯加当了修女。杜加尔因为苏珊是他爱女的同窗好友，一直推爱于她。1933年9月，他首肯当了我们的证婚人。

苏珊跟西蒙娜·韦伊关系也很好，她们在中学同班3年。关于西蒙娜·韦伊，我拿不定主意写些什么。她是一个出类拔

萃的女性，是人们崇拜的对象。钦佩她是理所当然，她确实值得钦佩。如果说些两样的话，人家一定会说是不成体统，是大不敬。我头一次在高师碰见她，大概是在1928年，当时我正在参加教师统考，而她是来参加入学考试的。我们最多谈过一些关于学生生活的话题。一直到苏珊告诉她我们就要结婚了，她跟我没有个人往来。她对我俩的婚事并不热心。虽然不认识我，她却已经把我列入一批她撇开的人的名单中，因为我虽然通过教师统考，名列第一，但平日喜欢交际，思想要求不严。她拼凑一些印象，给我贴上一个形象。她答应苏珊消除对我的成见，因为她的至交已经选中了我。

我们的女儿多米尼克出世，她非常高兴，仿佛是她自己的孩子出世。后来我们也见了几次，苏珊和她青年时代建立起的友谊一直很深厚。当时，我非常钦佩她发表的一篇谈工人生活的长文章。还有一篇谈罗马帝国的文章，尽管史学家啧有烦言，但我仍然十分佩服。然而，无论如何，和她进行交流思想却几乎是办不到的。她似乎不知道什么叫作怀疑。虽然她的意见并非一成不变，但变了仍然是铁板一块，毫无商榷的余地。她本来是赞成慕尼黑会议达成的协议的，倒不是基于力量对比的考量，而是认为在欧洲抵抗德国称霸不值得牺牲一代人的性命。德军开进布拉格以后，她改变了立场，仍然坚如磐石：既然纳粹不满足于欧洲霸权的传统形式，既然他们要把欧洲当作非洲那样的殖民地，那就非抵抗不可了，代价如何，在所不惜。在1938年、1939年说这样的话，也许是有道理的，但其中不无可以訾议的东西。纳粹分子在1939年的所作所为，难道在1938年还瞧不出来？

那时候，关于她的宗教生活和信仰，她是讳莫如深的。而

有一天，在卢森堡公园里我看出了她的宗教气质。那是一个艳阳天，我们漫步园中，也许是带多米尼克散散心。园中景色明媚，真可以说叫人心旷神怡。西蒙娜·韦伊走过来，神色异常，竟要黯然泪下。我们问她为什么，她回答说：“上海罢工<sup>①</sup>军队向工人开了枪。”我对苏珊说，西蒙娜应该是超凡圣人；痛天下之所痛，这只有对信徒来说才有意义，甚至说得确切些，只有对基督徒。

1943年我们在伦敦重逢。那时她刚到伦敦，头一次谈了两个小时对各种事情的真实看法，谈的是战争、占领、伦敦、国外法国人的特优地位。这大概是她的本来面目。她的言谈中透露出一种“扎根”思想。

再回过头去谈谈1933年吧。1932年7月，苏珊到柏林来找我，我们返回法国，边走边停，顺路游览了班贝格、维尔茨堡。导游讲解历史古迹的壮丽动人之处，老把眼睛瞄着苏珊。苏珊也盯着导游，就是一句德语也听不懂。我向导游点明一下，导游说：“天下尽是漂亮姑娘。”

从德国方面来看，在1932年以前，法国似乎还能对时局有点影响。从1934年2月开始，局势发生逆转。德国有了一个新政府，十分可恶，毋庸讳言，但是稳定又强盛。法国虽然迟了一步，终究还是卷进了恶性循环的圈里：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加剧、革命政党强大（左右两派，彼此彼此），此外，温和派仿佛水土流失，空剩下嶙峋瘦骨，政权麻痹瘫痪。2月6日的事变把一个流亡国外的共和国前总统召了回来。议员共和国时不时会需要一个救世主，来平息此种共和国自己搞出来的

---

① 是不是上海，我没有绝对把握，也许是另外一个城市。

纷争不和，来克服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

至于我，我正在自己的政治教育中跨出一步，这种教育将终生伴随我。我已经理解并且同意，政治就是政治，绝不受道义的压制。我无论说什么，写什么，再也不想表明自己的清白和高尚。考虑政治，就是考虑行为，也就是分析他们的决策、目的、手段、精神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告诉了我，非理性力量的强权厉害无比。马克斯·韦伯教给我，每个人都有责任，但责任不在于他的意愿，而在于他的抉择的后果。

118

我曾经憧憬过自己能在法德和解中起一点儿作用，现在来不及了，将来这种追求仍会卷土重来。这时候，法国只该把火药晒干，让侵略者不敢贸然行动。一个法国犹太人提醒同胞们要警惕希特勒的祸患，免不了引起人家怀疑。这家伙到底是为法国人，还是为他的犹太同胞讲话？1933～1939年，近在咫尺的第三帝国使我国的整个气氛变得压抑。难民大批涌来。与此同时，我终于摆脱了疑虑，克制了我对眼前一张白纸的踟蹰忐忑。在1933～1939年这6年中，在既怕打仗又知道一定会打的心情下，我经历了也许是一生中最有成果的6年。作为人，我是幸福的，作为公民，我只有心灰绝望。

## 第四章 在拉丁区中心

119 我的思想一直处于战后状态，直至我第一次旅德。从1930年9月14日纳粹党首次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至1933年1月30日这一时期，我的思想渐渐由对过去的天平转变为对未来的预感，从战后状态中脱出，进入战前状态。尽管同样的思想准则仍然在深刻地影响和支配着我，但已不仅仅限于左派思想和反法西斯意识，使我日夜萦怀的已经主要是法国及其命运了。

到1933年10月我们在勒阿弗尔定居时，我的思想转变已基本完成。哲学班的教育以及战后气氛的熏陶曾使我倾向于和平主义以及定义模糊的社会主义，然而，自童年时代起就孕育着的、由家庭和所有先辈不断向我灌输的爱国主义思想开始重新占据上风。但是，我仍然以“左派”自居，不敢犯右派的嫌疑，免得被反对者们抓住把柄。这种胆怯心理来自一种抗拒政治逻辑的心情，这种心情与其说是思想上的，毋宁说是社会性的。比那更晚些，相距较长时间之后，每当有人指责我结交有问题的朋友时，我就回答道：对手可以选择，而盟友却无法选择。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快摆脱了萨特至死不疑的那个信条：“右派，全属无耻之辈。”用更学院派的话来说就是，党派的不同取决于各自成员和领导者的人性或道德水平的差别。或许，左派党派更注重吸收理想主义者（这里指该词的通常词义）。然而，当革命者成了过河卒子，还能不能长久保持其

高尚品德？每一个阵营都拥有品德高尚者，不过，每一个阵营中到底能有几个这样的人？

让-保罗·萨特在《恶心》中曾经描述过勒阿弗尔城之景象，我也发现它深受经济危机的祸害。资产阶级基督徒垄断着此地的棉花和咖啡交易所，在社会上占据显赫地位。由于他们的别墅都建筑在地势高的地方，因此人们称他们为“高坡”（côte）。这里的社会等级制度一直渗透到中学校园，深入校长的办公室。学校教师和行政部门对所有学生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我同“交易所先生们”一样被接纳为网球俱乐部的成员，这并非由于我在中学教授哲学，而是由于我是出色的网球运动员。在此地，法国二级网球球员资格胜过大学颁发的毕业文凭。

关于毕业文凭，该城教育界里那种冷酷无情的等级制度也使我十分震惊。并非所有中学教师都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与成功跨越了这道最后难关的人相比，那些落选者只得痛苦地永远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我与一个历史教员常有来往，他曾两次获准参加考试，但两次落第，于是不得不年复一年地遭受同样的耻辱：不能参加中学毕业会考判卷，也不能与我们一同去卡昂旅游。在来到勒阿弗尔之前，我从未十分看重我的教师资格，而只是对那一年备考生活怀有美好的记忆。在那个时期，我几乎认真阅读了让-雅克·卢梭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全部著作。到勒阿弗尔之后，我开始同情那些“落第者”，他们出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未能获得教师资格，但担得起这个称号，并且理应获得相应利益。约在30年之后，我主要根据对勒阿弗尔的有关回忆，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若干文章，以致我一度成为“教师资格获得者协会”的头号敌人。在今

天，形势已经不同于前。人文科学在中等教育中已经沦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持有哲学教师资格证者在未来的中学里也将面临被“流放”去遥远的高等师范学院的危险。教师之间由于青年时代的考试和竞赛结果所导致的不平等现象虽然依然存在，但从许多方面来看已经大为减弱。竞赛结果已不再具有一考定终身的作用，一部分教师可以凭借自己的教学水平和资历获得教师资格。

1933 ~ 1934 年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年。我完成了《当代德国社会学》一书的主要章节，以及综述有关德国哲学家的汇编《历史原因考证》的大部分内容。同时，我平生第一次教授有关传统问题的哲学课。由于对这些问题已经多年未做研究，我必须认真备课。至于讲义的质量有高有低，自不待言。那时，我并没有察觉出贝尔纳·吉尔曼的天赋和才干。今天他已成为哲学教授，著有不少评价颇高的教科书，特别是写出了引人注目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家》一文（这是一篇国家级博士论文，我是该论文评委会成员之一）。雅克-劳伦·波斯德（Jacques-Laurent Bost）、阿尔贝·帕尔（Albert Palle）和让·普荣（Jean Pouillon）三个同事与他交往甚密。波斯德于次年成为萨特的友好。数年前，他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就一篇关于智利政变问题的文章对我横加辱骂。我与帕尔至今保持着友好关系。他写过数篇小说，其中一篇获得了勒诺多奖。普荣如今在国民议会任职。他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下开始钻研人种学，但始终是一名让-保罗·萨特的忠实信徒。

我在中学里仅仅教了一年书。其间，我无忧无虑，与学生的交往甚至给我带来愉快的感受。但谈到整个教学安排，可



供研究的课题则十分有限，而教学所要求掌握的知识却像百科全书那样广泛；这种矛盾使我感到倍受约束，甚至感到教书职业几乎让人无法忍受。正像我们杰出的先辈人物亨利·柏格森或莱昂·布伦什维格一样，萨特曾经在学校讲台上待了十几年，阿兰从未离开过他的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并且睥睨所谓的高等教育。那么现在，我又应当怎样做？

1934年10月，我们重返巴黎。在那之后的几年中，我们的生活由于女儿多米尼克来到世间而紧张忙乱又充满光明，由于与杰出人物的亲密交往而色彩缤纷，又由于法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衰败、对无法避免的战争的恐怖心情和无论如何不肯屈服的意志而显得暗淡忧郁。

122

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社会文献中心的工作并不繁忙，有不少闲暇。院长塞勒斯汀·布格勒是一个布列塔尼人，观点与西南部激进社会党一致。他颇能博得同事们的尊敬和我们这些依然在世的人的忠心。他天资聪颖，见解独到，思维敏捷。但是，他滥用了自己的时间和才能，成果平平。他的关于印度种姓制度的著作至今仍为有关专家所推崇，他在这本书中表现出的分析能力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很少见。他的经济学基础比大部分涂尔干派更为薄弱。他常常将党派纠纷与民族利益纠缠在一起。但他真诚而乐观，善良而勇敢，使人没法怀恨。埃利·哈莱维和莱昂·布伦什维格是他的同学，后来成为他始终不渝的密友。埃利只愿意当热情的局外旁观者，塞勒斯汀却曾经数次以候选人身份参加议会选举。然而，两人彼此之间的往来信件透露出浓厚的人情味。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友谊往往经受得住政治上的分歧。像于贝尔·布尔甘

(Hubert Bourgin) 那样的事例几乎绝无仅有：他起初持左派观点，战后，开始转向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并且与旧日朋友展开激烈论战。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却不同，私人友谊被政治分歧破坏殆尽。这是否由于每代人先天不同？抑或由于所面临的历史挑战不同？我可能是出于社会学家的偏见，更倾向于第二种假设。

我是由布格勒推荐而担任社会文献中心的秘书的，但同他并不熟。这个中心已成立若干年，收有维克多·孔西德朗 (Victor Considérant) 的私人藏书，包括他遗赠的关于 19 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者的重要书籍。布格勒后来又亲自购进一批书，进一步充实了中心的藏书，为师范学院的学生们提供了适于他们阅读的当代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专著。中心也举办一些讲座（有 3 期讲座的内容被收编入三卷本《汇编》中）。有一年，我和罗贝尔·马若兰 (Robert Marjolin) 一道举办政治经济学基础知识讲座，但是，坚持听完全部课程的人寥寥无几。

相反，晚间讲座全都获得了至少是差强人意的成功。记得最为清楚的是，我曾举办过一期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的讲座，后来，它以《一场反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为题被收入《汇编》。我在讲课时首先介绍了自己对希特勒排犹主义的看法和我的犹太教观点。波雷夫人是学院里不可或缺又令人难忘的秘书，她告诉我，学生们对我发表的宗教信仰声明极为赞赏。但是，布格勒认为我的开场白过于冗长，几乎毫无意义，甚至令人反感。布格勒从未触及排犹主义问题，因此，他听到一个法国犹太人谈论排犹主义状况时，感到为难又恼火。这个题目在他眼中几乎是不正当和出格的。

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公开自己的犹太人血统。从1933年开始，甚至可能从我了解国家社会主义开始，我意识到，德国的排犹主义正在阻挠法国犹太人的正常生存。从此，我便永远选定自己认为恰当的姿态：毫不隐瞒自己的身份，不卑不亢，保持适度的自尊。

1936年，在讲座的后一年，我的关于反无产阶级革命的文章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终于摆脱了情感冲动和阿兰思想的影响，代之以一种简练、冷静的政治和社会分析的文笔。我在文章开头醒目地向读者写道：“希特勒主义一贯仇视犹太人，现在，它正在加剧战争的危險。我，怎样才能坦率如实地向你们表明自己的公正不偏呢？如果我对你们说，我将不做判断而首先力图理解和分析，那么请你们相信，我这个讲话的人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时是十分严厉的。”

在末尾一段中，我重新点明文章的主题：

在1933年，一些专门研究德国问题的法国人曾经确认，国家社会主义有助于振兴德国，这对我们欧洲大家庭不失为一件幸事。但在我看来，国家社会主义是欧洲的严重灾祸，因为它复活了各国人民之间近乎宗教式的敌意，因为它使德国重新回到旧日梦幻和以往罪孽之中：它口头上狂妄自大地宣称自己非凡独特，实际已经沉入关于自己和敌对世界的种种虚构之中……诚然，我们应当懂得并且寻求建立睦邻友好，然而，和睦相处要求两国具有共同语言并且相互信赖。我们能够找到这种语言，并给予这种信赖吗？若是不能，那么在强权和恐惧之上建立起来的和平，只能是一种脆弱的和平。

这里的“恐惧”，我是指对战争本身的惶然。

在开头段落与以上结论之间，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信徒和非无产阶级或反对无产阶级的群众所做的分析尚为有理有据（但没有独到之处）。至于1935年的德国人民为什么对于新政权毫不失望，反而想去投靠新主子，我对此所做的分析也还有些道理。但是，对沙赫特<sup>①</sup>掌管财政以及失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当时已下降50%），我所做的分析很不充分。当时我只看到，建设高速公路的唯一目的是备战。我夸大了重整军备对经济恢复的作用。我当时尚未完全理解在一个由于有多种汇率制而与外界隔离的经济体内，“点火”与“倍增”<sup>②</sup>机制有什么作用。

C. 布格勒曾经接管过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国室以及所刊《社会研究杂志》的工作。该杂志在法国由阿尔康出版社出版，而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都在美国活动。在某次旅途中，我结识了马克斯·霍克海默、T. W. 阿多诺和弗雷德里克·波洛克。他们想扩充法国书评栏目，邀我加入（在此以前，他们已邀请了另外几个可能是评介“论文”的合作者参加）。我欣然允诺，更何况，我刚刚获得教师学衔，文献中心付给我这个新手的工资并不可观，不允许我做任何不切实际的空想。

① 沙赫特 (Schacht, 1877—1970)：德国金融家和政治家，曾为希特勒理财，因参加谋杀希特勒而被关进集中营，1950年以后任叙利亚、印尼、伊朗等国财经顾问。——译者注

② 基本建设和大型工程直接使用劳动力，因此使得购买力上升。但是，就业和购买力的直接效果不断“倍增”，是由参加大型工程的企业订货所导致的额外就业决定的。“倍增”被称为大型工程或预算赤字的直接效果与经济整体的总效益之间的桥梁。

我与《社会研究杂志》合作，但是，我既没有转向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转向法兰克福学派。我写的书评铁面无情，往往不同于学院派的做法。当有些学术界的官老爷试图教训我懂得年轻人应当怎样做才对时，我也很不恭顺。我曾经直率地同历史学家亨利·奥塞（Henri Hauser）展开过辩论。后来，他在没有提出更多论据的情况下，撰文对《引论》进行全盘否定。几个星期以后，C. 布格勒在文献中心的一次行政理事会议上责备他没有介绍此书内容就急于加以驳斥。亨利·豪塞尔在某种内疚心理的驱使下，之后又为我说好话。科耶夫、柯瓦雷和韦尔这三人是我敬重的朋友，他们都不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哲学上有精深的造诣。我倾向于他们的评价。此外，我还要承认，我在30年之后对马尔库塞的才华也并不心悦诚服。当然，要补充一点，在我眼中，马尔库塞始终不失为一个“正派人士”，他彬彬有礼，从不咄咄逼人。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1968年5月初，值马克思150周年诞辰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马克思的讨论会。在让·多麦颂（Jean d'Ormesson）的巧妙安排下，我被邀请首次在正式会议上发言。我引用曾在论文里使用过的两个形容词作为发言题目：模棱两可（Équivoque）和用之不竭（Inépuisable）。三言两语后，我就单刀直入地宣布：马克思如果今天还健在，一定会反对类似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在听众席上就座的苏联代表团带着掩饰不住的恼怒听我发言。勒内·马厄（René Maheu）一直不能对我的那些言论表示原谅，因为这与他为之献身的机构所进行的伪善的、教派合一的大会是格格不入的。马尔库塞却对我——或不如说对听众——说，我鲁莽直率的言论是唯一能与他追求的目标相吻合的。

我同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虽有社交往来，但没有在思想和学术上做过深入的交流探讨。1950年，我再次见到霍克海默时，他已成为法兰克福大学校长，赫赫有名。显而易见，他在命运的恩赐下曾经荣幸地接待过到该市视察的阿登纳总理。在同一天子里，我应邀在这个大学做了题为“致德国大学生”的演说。

126 现在，法兰克福学派在英美世界享有相当名气，可以说富有声望。这种情形是不是在尊崇知识的社会风尚之下才形成的？1933年以前，法兰克福学派尚未走红，现在它是否值得推崇呢？或许是值得的。无论是由于佳运还是厄运的安排，作为魏玛共和国最后几年的目击者，又是法兰克福学派当今在公众之中享有影响的目击者，我倒想知道这个学派今日功成名就的原因，同时还想研究它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在德国的地位。

马克斯·霍克海默出身于法兰克福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波洛克和阿多诺两人也来自这一阶层，前者执掌研究所的经济大权，后者以学识渊博、精通音乐和文笔晦涩而闻名遐迩。所有这些人，包括当时尚未成为该学派头号人物的马尔库塞，都以不同的方式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信徒。从政治上讲，他们既不拥护社会民主党，也不拥护共产党。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设法挽救共和国，并且毫无抗拒地接受了被迫流放的命运。他们在美国重建社会研究所，并且进行社会学方面的调查研究，其中最为有名的两次调查是关于家庭和“权威人物”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两人并不是社会学家，而是哲学家，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考证和文化考证混为一谈。后来，马尔库塞也步了他们的后尘，并被1960年代的大学生奉为尊师，名噪一时。

无论是马克斯·霍克海默还是他的朋友，都没有任何一部著作能够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和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所引起的反响相比拟。曼海姆和霍克海默同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但彼此形同陌路，或者至少，彼此不抱倾慕之情。或许由于他们的思想隶属于相近的流派，或许由于他们信奉的理论始源于同一创始人，他们在同样意图的支配下，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而结论又往往截然不同。曼海姆的关系论——一种认识论，建立在从阶级立场出发的、对社会难免有根深蒂固的的认识的基础上——在今天已被人们遗忘，尽管关于社会意识的观点，关于知识的社会学（文化产品的社会学）依然像50年前那样具有现实意义。法兰克福学派总结的“批判理论”，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可以说，批判来自被各种矛盾搞得支离破碎的现实本身。阿多诺在同实证主义进行论战时，承认在来源于矛盾世界的认识论中存在矛盾。实证主义社会学希望根据经验和客观来解释世界，从而意识不到矛盾能够迫使他们的科学设想走向失败。

127

总的来说，批判理论有如《资本论》的副标题，同样以资本主义社会和它本身具有的完全错误的意识形态为研究对象。它可以被称为一种借助新的认识论重新思考而成的马克思主义。H.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社会化的论点始终坚信不疑，但他指出，在东方，这场经济革命没有引起理应随之而来的文化革命或人文革命。

1960年代，霍克海默对马尔库塞赞颂的学生运动持反对态度。这场运动由于缺少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参加而遭到“普遍拒绝”。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的阿多诺也因学生对他采取敌

对行动而伤心。

今天，尽管 J. 哈贝马斯仍然属于法兰克福学派，但他是新一代的代表。他曾经用“红色法西斯”这个词形容过造反的学生，从而同样招致愤怒的指责。在我看来，批判理论在今日德国仅发挥着有限的影响。而在英美世界，对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兴趣已经扩展到无产阶级运动的斜枝旁蔓之中。较之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经济剖析结合思想批判的方式更适合激进的美国人。

承蒙布格勒的再次推荐，我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基础部教授哲学；这所学校的别名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更为众人所知。我接替了纪德的内弟德鲁安的工作。他的名字在纪德的《日记》和书信中曾经不止一次出现过。这是一个出色的日耳曼学家，他呕心沥血，以毕生精力献身于教育事业。我只见过他两三次，不清楚他当时是否正在构思一部作品，或是由于教学繁忙和生活拮据已经半途而废。

该校校长叫奥克塔夫·奥里亚克。他同我刚一接触，就以纯粹基督徒式的品德感动了我。善良、谦虚、仁爱 and 诚实的美德在这个自由思想家和无神论者的身上闪闪发光。他的前任是在那个时代显赫一时的佩科 (Pécaut)。我和佩科仅仅有过一次交谈。他坦率地告诉我，他以前对我的文章有所反感（大概指《当代德国社会学》这部书），但现在对我本人不同。奥里亚克对我表示热情欢迎。但是，在任教一年之后，我觉得自己的讲学并没有像我应当能够做到的那样引起学生的兴趣，于是提出辞职。奥里亚克没有接受。他安慰我说，学生们从未对我有过怨言，无论如何，如果有人不能从我的教学中获益，那么责任更多在于他们自己，而不在我这边。



战后，我多次收到奥里亚克的来信。他的一个儿子在抵抗运动中牺牲了，他本人也双目失明。他虽然屡遭厄运，但并不低头屈服，依然故我，信心充沛，泰然自若。后来，他辞世了。我想，他也并不希冀在另一个世界里将会得到合理报偿。为了纪念这个世俗圣者和他的儿子，人们在阿里埃日省的小村庄圣西龙建起一座简朴而又庄严的纪念碑。那些不认识佩科、奥里亚克（Auriac）和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的人，永远不会知道这些创业者曾给教育界带来多么大的荣誉。

学生时代结束了，大家各奔东西；联系虽然没有断绝，但毕竟不像过去那样密切了。学生时代的自由自在，让位于职业上的约束，家庭生活也占去了一部分时间。在我的一生中，1930年代的友谊所占的地位丝毫不亚于1920年代的，只是情况已经不同以往了。

保罗-伊夫·尼赞已经成为一名作家和记者，完全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尽管我认为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忘记或者否认我们在基伯龙一起度过的那几个星期，也就是他婚后的那些日子，但学生时代的友谊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从来不讨论共产主义，偶尔谈到法西斯主义，而在法西斯主义上，我们的观点是相同的。我记得有一次他从苏联回来之后，在保罗·德雅尔丹的“真理联合会”上做了一次报告。报告的内容是介绍当时盛行的一个马克思主义或者近似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整体人或整体性的观点，这是一个哲学内容多于历史的报告。朱利安·班达当时坐在听众席上，十分欣赏这个报告。三十多年后萨特在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

从西蒙娜·德·波伏娃闯入萨特的生活那天起，我同萨特的关系就起了变化。她在书中谈起过我们之间的哲学讨论，西蒙娜比我能说会道，我甘拜下风；她的记忆力也比我强。拿起她的书，许多往事又浮现在眼前。例如，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我们曾围绕现象学和胡塞尔高谈阔论。其实，她认识萨特和我，是在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的事了。但她说，她有印象我们一有机会总是陷入无止境的争论中，最后，通常是我以惯用的方式对萨特说：“我的小同学，两者必居其一，或者……”也许她说得有道理，因为有她在场时，我们的辩论往往是以这种方式告终的。在萨特病倒和失明之前拍摄的一部影片中，萨特自己承认，他一向仅仅和“使他为难”的阿隆讨论哲学。但在学校时，我、萨特和皮埃尔·吉耶之间的友情更近似于其他同学之间的那种友情，并未预示我们中年以后的论战。有很长一段时间，萨特在探索自我，他很乐意告诉我他在当天或那个星期产生的想法。如果我把他的观点批得体无完肤，或者更多的情况是，指出他的概念的暧昧或自相矛盾，他总是接受我的批评，因为他那时的观点还只是处于酝酿过程中，没有成形。西蒙娜·德·波伏娃谈到的那个时期，可能萨特同她交谈时就已经验证过自己的观点了。总之，他为这些观点辩护，是因为他已经把它们看成真正是他自己的观点，而非偶然间从看到的一篇东西中获得的或者是心血来潮时产生的假设了。

认识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年，萨特在巴黎大学城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我那时正在军队服役。我们偶尔会面时，倒是像西蒙娜·德·波伏娃说的，常常乐于讨论哲学问题。后来我们在圣西尔炮台又见过面，当时我在那里任教导

员。不知为什么，那几个月并没给我留下什么愉快的回忆。虽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同大学时代的友谊相比，我们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

在1930年代，我们四个人见面不止一两次。关系是好还是坏？这要看怎么说。我们放弃了哲学争吵，在一起随便聊聊，不拘内容，时而提到西蒙娜和苏珊。我记得会面也有成功的时候。例如在慕尼黑事件后，有一次我和萨特、西蒙娜一起吃午饭，虽然我们之间出现了分歧，但由于处在历史悲剧时期，谈话的气氛仍很友好。我还记得1939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坐在离巴黎圣母院不远的河岸边的一个餐厅，暮色渐浓，壮丽的巴黎圣母院笼罩着圣洁的气氛。我们在等候尼赞夫妇共进晚餐，但他们失约了。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夜晚是我们相处得最好的时光之一。真是机遇难得，但这种缘分也使我们无谓地消磨了不少时间，或者不欢而散。离开高师后，我们的关系也就停留在这种偶然的巧遇上了。

我和马尔罗的友谊同我和高师其他同学——包括很要好的同学——的不一样。我对1930年（或1931年）我们在科隆的初次会面记忆犹新。那天，我冒着倾盆大雨伴送马尔罗回旅馆。路上又湿又滑，我们一边跳过一个水洼，一边热烈地讨论。两年之后，当我们在蓬蒂尼重新相聚时，他用幽默的口吻讲起那次雨中漫步和时断时续的谈话。

1932年，马尔罗已经发表了《西方的诱惑》《征服者》《王家大道》三部小说，而我还在面对白纸挥笔苦战。他仅仅年长我四岁，但是，我总觉得他属于另外一代人，特别是觉得他属于“高等级别”（这里的“级别”指体育比赛级别）。我感觉到他确实比我强。我承认这一点，但马尔罗很少谈论自

己，很少揭开他那“藏满秘密的小盒”。他已经将自己在《反回忆录》中表现的思想付诸实际生活中了。

131 萨特从未与苏珊有过任何来往，或者至少，他对苏珊始终不感兴趣。马尔罗却不同，他在蓬蒂尼初次同她见面，立刻对她产生了好感。直至西班牙战争时期，我们两对夫妇经常在友好的气氛中共进晚餐，或者共度良宵。谁也没有预料到安德烈和克拉拉之间会产生深刻的裂痕。克拉拉把“赌注”下在我身上（她后来这样告诉我），相信我（在社交界和知识界）会取得成功。她也非常喜欢苏珊。那时，无论是她们俩，还是我们四人，甚至还有我们两家的两个年龄相仿的女儿佛罗伦斯和多米尼克，都相处得非常融洽。自从1936年以后，安德烈越来越无法忍受克拉拉了。克拉拉对这方面的事有过大量记述，安德烈却谈得很少。所以，局外人很难对此发表意见。但是，必须坦率地说——这是本书不成文的规定——我们同情安德烈。这并不是为了证明谁有理或谁无理（在两人关系破裂的时候，“摆理由”毫无意义）。不过，我们在场时，常常看到的是克拉拉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她是有意这么做的吗？是对关系行将破裂有所预感，希望如此或是表示抗拒？还是由于痛苦心情的驱使？唉，我现在这样白纸黑字地寻求解答又有何用？

J. L. 米西卡 (J. L. Missika) 和 D. 沃尔顿 (D. Wolton) 在“介入的旁观者”节目的采访中曾询问我，如何与一个和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结为挚友。实际上，他们了解的只是1945年以后的马尔罗。那时，他为法兰西人民联盟大声疾呼，后来成为戴高乐将军手下的内阁部长，宽裕舒适地住在布洛涅一座小型官邸中。然而，当他还在巴克街居住时，他待人和善，语言幽默，不大热衷于权势和地位。可能在1945年以后，他才

逐渐对官宦之道产生浓厚兴趣。我们两人，或者两对夫妇相聚时，常常谈论政治、文学和其他这样那样的问题。同马尔罗谈话，我永远不会感到拘束。但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我听着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所谈的一切总是使我赞叹和着迷。尽管我不一定全部信服，但在他的那种神态举止面前很快就会打消讨论和争辩的念头。在我与萨特之间，这种争论却是家常便饭。我不认为马尔罗在哲学方面受过正规教育，甚至怀疑他是否曾翻阅过《纯粹理性批判》和《精神现象学》，是否读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尽管他在战前或战后有几次谈起过海德格尔。他在1945年或1946年，常常对《存在与虚无》一书（他果真读过此书？）大加评论。他经常读尼采和斯宾格勒的著作，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则研究得不多。我也无法证实他是否熟知梵文和亚洲语言。可是，每当旁人对他是否具有真才实学争论不休时，我总是充当他的辩护人而不是审查官。每当我遇到机会可以对他的才学进行验证时，我几乎总是对他的文学和历史知识的准确和细致而惊叹不已。在那个时期，他并不像后来在《沉默之声》或电视演讲《世纪的传说》中那样热衷于做文字游戏（例如，是非洲黑人艺术呼唤着毕加索，还是相反，是毕加索在呼唤着非洲黑人艺术）。

132

他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直至战争时期，他的语言和行动都表明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后来，我碰到一些曾在莫斯科待过的法国人（其中一些人在驻苏大使馆待过），他们都不满马尔罗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对斯大林那种毕恭毕敬完全赞同的派头。然而，克拉拉却当着马尔罗的面向我说过，在一次盛大的晚宴（或一场辩论）将要结束时，在苏联官员在场的情况下，马尔罗慷慨激昂地为托洛茨基以及他在1917年革命之后流亡

海外期间的所作所为大声辩护。

为什么我们在 1930 年代的友谊能够不为政治观点的分歧所动摇？这其中不乏原因。希特勒上台之后，左派在反对法西斯这一共同信念的基础上结成一种神圣同盟。希特勒使我们将斯大林属下的共产党视为同一阵营的盟友。马尔罗私下里从不以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路人的口吻讲话。他并不对自己和别人隐瞒那个制度的残暴和罪恶，但同时又为它所取得的社会成就歌功颂德。他对莫斯科“肃反”运动表示不能理解，也不愿放弃对托洛茨基的支持。约在 1935 年或 1936 年，我在马尔罗家里结识了马奈·斯佩尔伯。这个前共产党人曾在该党常设机构工作，拒绝公开背弃斯大林主义。他说，希特勒对我们形成了眼前的威胁，因此也是首要的威胁。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决定或者听任有选择地保持沉默：1936 年的沉默为 1945 年的沉默铺了路。

1930 年代，马尔罗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和评价如何，我对此只保留有一些零零碎碎的记忆。有时，他担心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国家和法西斯主义国家联合起来结成反苏同盟。又有一次，他对我说，苏联人让来访者参观他们国家的托儿所和学校，这种做法是失策的。我们这里的托儿所要讲究、豪华得多。不过，他们的托儿所数量大，有数千个。我想，纪德的《访苏联归来》一书并未激起他的反感。也许他只不过认为，在反法西斯时期开展反苏论战不太适宜罢了。

133 如果我们希望认真了解而不是盲目判断马尔罗的话，不妨再来看看《征服者》中的几页。在其中，作者对两种人进行了对比。一种人怀抱信仰，自认肩负着崇高使命，信奉宗教信条；另一种人则是实干家、“征服者”。他们不遵从任何学说

和教义，但与名副其实怀抱信仰的人一道共同奋斗。作者从不谋取党派身份，从不放弃判断的自由。然而，他促使众多的年轻人参与党派活动，以便寻找他们能够为之献身的事业。

直至1939年，安德烈·马尔罗始终将自己的命运同遍布五洲四海的革命运动（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或类似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紧密相连。后来，他将马克思主义留给那些被他称为“罗马人”的真正信徒。他并没有产生信仰危机。他想的只是脱离革命运动，逍遥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他并没有经历那些前共产主义者或前毛泽东主义者所经历过的思想转变过程，因为他从未被马克思主义征服。所以，他无须一位喀琅施塔得人或布达佩斯人来提醒他。

我甚至认为，比起他接近马克思主义思想来，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戴高乐主义思想要深刻和坚定得多。当然，他对民族英雄戴高乐本人的赞赏远远胜过法兰西人民联盟，甚至胜过戴高乐主义。战后最初几年，他仍然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纠缠和困扰。1945年年底，他在国民议会里曾说过一句被反共分子多次引用来反对他的话：“自由首先<sup>①</sup>属于那些赢得了自由的人。”他指的是共产党。他的通篇发言谈的都是共产党，仿佛其他党都不存在。1947年、1948年和1949年这三年中，他不止一次地认为，共产党能够用暴力取得政权。然而，他所向往的并不是做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或同路人，而是做它的反对者。

1945年以后，共产主义已经与苏联甚至苏联红军混为一体。而这支军队把一个与纳粹制度同样恶劣的制度强加给被它

---

① 引用这句话的人往往忽略了“首先”这个词。他是否确实说过？马尔罗几次三番向我肯定他曾说过。以我个人而言，我虽记不清实际情形，但我相信他的话。

134 解放的国家。同样的集中营关押的往往是同样一些“罪犯”。在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统治之下，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遭受着相同的厄运。马尔罗根据自己对历史演进的预感，比萨特更迅速和更深刻地意识到，革命的神灵将不会只存在于遥远的鞑靼，让波兰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服服帖帖已成为“现实政治”。斯大林置一亿欧洲人的意愿于不顾，将他的疆界向西推移，并强化和巩固这块前沿阵地。只有失去理智、受到强力诱惑的人，才会歌颂 1945 ~ 1946 年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安德烈·马尔罗推敲过，美国是欧洲的继承人和保护者，它到底该起什么作用。他认为，如同曾经繁荣昌盛于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文明一样，大西洋区域将开始盛行另一种文明。无论旁人有何评价，他的思考比梅洛 - 庞蒂的分析更具有价值。后者是到斯大林帝国的内部去探寻真正的现实性和历史原因。

受真正的自我意愿驱使，马尔罗返回法国。议会民主制使他厌倦了，而戴高乐将军却在平庸的民主制和充满诗意的历史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在他首次与戴高乐会面之前，他一反常态，询问我对他加入戴高乐派有什么看法：他是否应该成为将军忠诚的拥护者，但不必在君臣之间假手于什么党派说项？我想，他在准备同这位解放者进行首次会面时，已联想到歌德和拿破仑的会面了。25 年之后，当他拜访回到科隆贝双教堂的戴高乐将军时，他同样联想到了夏多布里昂拜访流放在布拉格的查理十世的情景。在一千年来缔造伟大的法兰西的历代帝王中，查理十世是最后一位。

在他看来，戴高乐将军使法国和法国的政治生活大为改动。他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第五共和国不等于第四共和国加



戴高乐。他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言之有理。新宪法已经改变了共和国的特征乃至实质。总统通过直接普选产生，大权在握。他亲自任命总理和行使政权，并且受到在这种制度下协商一致的绝大多数人民的广泛支持。同第三共和国以及第四共和国的议会制相比，第五共和国更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自由而民主的君主政体。但是，当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从1962年至1969年，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已经与不在他领导之下的第五共和国别无二致。或许，将军意在使他的内阁部长们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历史里，过一天算一天的想法是错误的。法非共同体并非牢不可破，非洲国家已经纷纷独立。其中一些仍然同法国维持领属关系，另一些则自我标榜已经归附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国正在按着时代的脉搏迈步向前。它不再是欧洲的病夫。在一个令人尊敬的政体终于形成之后，法国开始向世界揭开面纱，展示自己的成就。在此之前，这些成就一直被海外殖民战争以及政府官员走马灯似的换任所掩盖。戴高乐通过新闻界，以他独具特色的语言，将法国历史上这一光辉夺目的时期载入世界历史史册。 135

现在，让我们将话题转回1930年代的安德烈·马尔罗身上。这个和蔼可亲又令人着迷的伙伴常向我和苏珊讲述一些被阿兰称为“无足轻重”的轶事趣闻。他始终对我们表示出不同寻常的好感。我和苏珊也将安德烈和克拉拉视为挚友。我们向来不赞同罗杰·马丁·杜加尔的看法：“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同克拉拉结婚。”（安德烈也多次讽刺挖苦罗杰的婚姻。）克拉拉在与安德烈情投意合时，曾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完全不同于她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的反目时的情景。直至1940年，甚至那之后更长时间，安德烈始终同我和苏珊保持着当初在蓬

蒂尼相遇时结下的亲密友情。

除高等师范学院和伽利玛出版社之外，我还经常出入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我对亚历山大·柯瓦雷、亚历山大·科耶夫和和埃里克·韦尔这三个才子十分钦佩，不敢班门弄斧。在三人中，可能只有科耶夫的声誉已经超出大学教授和专家的窄小圈子。尽管他的个性和后期思想对我来说高深莫测，我仍然认为，在三人中他最有才华。

那时，我并不常听科耶夫的课，如今他已成为研究黑格尔  
136 《现象学》的名人。但在最后一年，我已经变成或几乎成为他的一个忠诚听众。这个听课圈子有二十多个学生，其中还有 R. 格诺 (R. Queneau)、J. 拉康、M. 梅洛-庞蒂、韦尔。G. 费萨尔·科耶夫在上课时，总是先对《现象学》中若干段内容进行解释，一个一个音节地说出其中某些词，接着开始讲授，不需讲稿，一气呵成。他的一口法语，文法完美无缺，斯拉夫腔调独具特色，颇能引人入胜。在座的高才生们一向以异议和批评著称，但听他讲课能听到入迷。这其中奥妙何在？在于他出众的才华和精湛的论证技艺。最后一年的讲课内容曾被收编成册，我不知道这本书是否完整无缺地再现出讲授者的艺术。这种艺术不是取决于雄辩的口才，而是取决于讲授的主题和讲授者本人。讲授的主题有时是广泛意义上的历史，有时是《现象学》中的内容。历史通过用《现象学》来解释而变得清楚无误。所有听众都沿着他的思路走，甚至那些不信历史气数的人，那些怀疑故弄玄虚的人，也抵挡不住这个魔术师的魔力。在听他讲课的时候，那些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一目了然，一听便懂，正足以证明他的方式对头。

我在这里不可能对科耶夫的思想做出全面介绍，从而使读者信服它具有重要价值。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学者经常引用和使用他的《黑格尔导读》。他们称赞他指出了“认识”这一概念在黑格尔的人类学中的重要作用，但很少谈论他对《现象学》的全部阐述，这种阐述表达出所谓的解释者本人具有的哲学思想。

厌烦某种哲学推理的读者可以看看《导读》中有代表性且集中重要论点的几页：

当人不再行动时，即不再通过生死斗争、创造性劳动来否定和改变自然以及社会现状时，历史也就停止了。而当现实完全符合人类意愿（德文 *Bebierde*，对人来讲，就是要世界普遍承认其独特个性的意愿，即德文的 *Anerkennen* 或 *Anerkennung*），使他心满意足（*Begierdigung*）时，人也就不再行动了。如果人真正地完全满足于现有状况，就不再存在任何实际意愿，从而不再去改造现实，同时也不再真正改变自己。他的唯一“意愿”——如果他是一个哲

137

学家——将是懂得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并通过言语加以揭示。“智者的科学”就是要对整体的现实做出恰如其分的描述，从而最终满足人（即使是哲学家）的需要：他将永远不会再反对智者过去的言说，正如智者也从来不会反对对自己描述过的现实。这样，智者不带辩证性（即不带惯于否定的方式）的描述就成为绝对真理，这个真理不再形成任何哲学的“辩证性”，永远不会成为必定引出一个反题的“正题”。

但是，怎样才能得知人是否真正地、完全地对知其然

心满意足了?

根据黑格爾的观点,人除了认识的意愿之外别无其他 (der Mensch ist Anerkennen, 参见原著第 20 卷,第 206 页,1.26),历史就是使这一意愿逐渐得到满足的过程,最终的满足则须在征服全世界的国家中实现 (黑格爾认为这就是拿破仑帝国)。但是,黑格爾首先必须预测历史的“未来”(历史的未来在本质上是无法预见的,因为未来是自由的;换言之,就是产生对现状的“否定”),因为他所企望的国家仅仅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清楚地知道,它距一个“经验实体”(Dasein)或“客观实在”(Wirklichkeit),甚至一个“现存实在”(Gegenwart)仍很遥远。接下来就是意义重大得多的第二步:怎样才能知道在国家中获得或由国家给定的满足确实是作为人本身的最终满足,而不仅仅是满足其各种意愿之一?怎样才能知道帝国中历史“运动”的稳定,并不是因暂时乏力而稍有停顿呢?根据什么才可以证明,这个帝国使人除了认识的意愿之外不再产生新的意愿,因此,它也不会某一天被斗争和劳动之外的某种否定行动或创新行动所推翻?

唯有通过一种假设,即认识的意愿将耗尽人类的“全部潜力”,来对此进行证明。但是,只有等到人类具有了全面的完善的认识,也就是有了普遍适用和最终 (“必定”)适用的认识,也就是“绝对真实”的认识之后,我们才有权利做此假设。然而,只有在历史终结时才能获得绝对真理。而需要加以明确的,正是历史的终结之时。

于是，我们被牵连进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黑格尔对此已做过充分和详尽的阐述。但是，他认为，在通过说明现实来获得绝对真理（在现实的准确和全面的特征中）时，在现实“进程”的终期（在人类历史最终停顿），他已经发现了一个准则。奇特的是，这个准则正是他所描述的循环，即“科学体系”。

再稍后一段：

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的论证面前，“所有的思维能力”已经枯竭。其他任何论证都无法同“科学体系”相抗衡，都只能是他已经论证过的内容之一，都只能是对前面所述体系某一部分的重新总结，这个体系是全部思维的构成要素。

让我们姑且搁下这个关于循环体系的最困难的论断，谈谈另外一个关于历史终结的论断。这两个论断密切关联，缺一不可。第二个关于世界帝国的论断让所有人都一目了然。一目了然却又出人意料！黑格尔是否在1806年的拿破仑帝国中看到了世界帝国的雏形，看到了可能实现这种帝国的尝试？因为这种帝国尚未成熟，哲学家应当对它的未来进行预测。可以看出，这将不是拿破仑式的帝国，拿破仑宣称要，或者已着手建造历史终期。应当促使这个体系逐渐完善和不断运行，从而体现出它的总体性。

我在《历史哲学导论》一书中探索的理论同科耶夫（或黑格尔）的思想存在相当大的距离。然而，威廉·狄尔泰和

马克斯·韦伯尽管属于黑格尔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却仍然解决不了自己提出的问题，解决不了自以为已经解决的问题。我这个晚辈只好目瞪口呆、疑虑满腹地聆听先师和创始者的教诲。

有一个问题我不能回避。科耶夫在1938年或1939年自称“地道的斯大林主义者”，此话是否真诚？更确切地说，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真诚？历史将引出一个和好的世界帝国，既然没有拿破仑，那就斯大林吧。这个帝国既不是俄国式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式的，它将囊括相互了解之下团结和好的全体人类。至于赤色俄国被丧失理性者统治，语言被庸俗化，文化被毁坏，他私下并不否认。恰恰相反，他一有机会就这样说，事情早已大白于天下，只有下愚不移的家伙才能无所知觉，也只有同傻瓜说话的人才感到有必要重复第二遍。他身上是否留有潜在的、合理的、热爱俄国的感情？我对此并不怀疑。当然，他一片忠贞，心甘情愿地做出选择，为祖国法兰西效劳，这同样毫无疑问。他不喜欢美国人，这个哲人将美国视为世上最彻头彻尾不重哲理的国家。当然，在他眼里，哲学已经与希腊人（前苏格拉底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德国人（康德、黑格尔）和两者之间的笛卡儿主义者混为一体。他抵抗来自美国的压力，维护建立共同市场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sup>①</sup>的条款，从而捍卫了法国和欧洲的独立自主。他在国际会议中被认为是一个令人生畏的谈判者。1971年，我曾同香港政府财政部部长交谈。他是一个英国官员，毕业于牛津或剑桥，以前是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他一直不能原谅科耶夫这个诡辩家或辩证

---

① 这个国际法规制定于战后初期，《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负责协调贸易往来，是制定贸易规则和成立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区的必需条件。

论者对这片英国最后领地之一所表现的敌意。他从未明白科耶夫的真实动机。

1946年或1947年，在一次午餐中，科耶夫简略地谈到了自己的历史哲学研究和个人经历。他说，他为法国和欧洲的利益着想，才在一个时期转向斯大林主义。在黑格尔之后，再也没有重要的思想出现。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已经停止了。哲学论证的环已经形成。但是，还要发生一些事件；在实现世界帝国之前将存在一些地区性帝国（或共同市场）的阶段。西欧联合组织就是这个阶段的产物。

1945年之后，他为什么决定进入政府机构，成为财政部中负责国际关系部门的一名官员？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想知道它（历史）将如何演进。”说实在的，我很难想象，他如果去法国某大学任教将是什么样子。他必须首先做一篇博士论文。审查委员可能会对他的某一成果，例如《论无神论哲学推理史》，做出尖刻辛辣的评价。在内心深处，他可能认为自己已经说出所有应当说的话，并且这正好符合他所主张的哲学的全部内容和结果。他想学柏拉图当专制君主的军师。他希望暗中能对奥利维埃·沃姆塞（Olivier Wormser）或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这样的头面人物施加某种影响。前者在《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sup>①</sup>中夸奖他的朋友科耶夫。说到科耶夫，我还记得他曾向我说，吉斯卡尔·德斯坦很尊重知识分子，特别是当他受科耶夫的启发而发表某篇演讲后，他竟然会问：“怎么样，科耶夫，你还满意吧？”我还想说一点：他十分看重自己的职务，当他的某个建议未被采纳时，他有时会大

<sup>①</sup> 《评论》杂志第九期，1980年春天。

发雷霆。他尤其热衷于争辩国际经济问题。对于他来说，比起政治或军事问题（至少是当代的）来，贸易外交更能准确地体现黑格尔 - 马克思主义理论。

1982年春天，我有一次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谈话时提到科耶夫的名字，讲到对他的钦佩之情以及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总统颇为惊奇，然而，他对这个说话曲里拐弯的谈判家留有清晰的印象，并且用十几个字来评论他的谈判手段。总统说：他总是选择一些迂回道路，但最终能达到目的。科耶夫尽管已经离开高等研究实践学院而从事外交工作，但并未抛弃他的辩证法。

我是否证明了我对科耶夫的天才判断确有道理？是否使读者信服了？我不敢肯定。他的著作《黑格尔导读》并不能作为证据，他以前发表的类似作品也同样不能。而且，这些书尚未被认真评论过，甚至未被认真阅读过。我应当向大家介绍这些书，它们代表了作者的一部分思想，我也应当再回忆一些内容。

141 我大胆做一个别人可能认为大不敬的比较，我认为科耶夫在某种意义上比萨特聪明。萨特的才智表现在大胆、丰富的想象力上，但他的道德观念重于他的激情，这限制了他观察事物的眼界。

苏联镇压匈牙利暴动一事暴露了苏联式统治的实质。但是，国际政治本就是那么回事儿，有什么大惊小怪？集中营制度引起人们的憎恶，苏联为维护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就必须在匈牙利恢复秩序。对苏联干涉匈牙利事件，科耶夫用寥寥数语就阐明了自己的看法，萨特却连篇累牍地加以评论，似乎他的世界观全被打乱。实际上，事件本身已经揭示出一个萨特早



就应当明白，并且能够明白的真理。科耶夫的拥护者可能会指责说，你举例不当，怎么能把他说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再跨出一步就要超过无赖的界线，说他不懂《精神现象学》，对芸芸众生的痛苦和愤怒无动于衷？然而，事实确是如此。科耶夫主动采取了一种白俄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至少，这种态度受到哲人意志支配，自以为高人一等，对芸芸众生赐以宽恕。科耶夫从不说蠢话，我很少有印象需要教他搞明白什么事情。尽管他不同于大部分知识分子，但当交谈者首先提出某一看法并获得他的认可时，他会以尊敬的态度听取对方的叙述。这是因为他自认已经掌握了黑格尔思想体系所包含的全部哲学和历史，可以带着哲人的超脱态度和高级官员关心下情的姿态对待当代思潮和事件。每当谈到政治和经济（这是我们的主要话题）时，他总是以权威性的口吻发表意见。他也多次询问我的看法，例如对 1958 年 5 月以及 1968 年 5 月形势的看法。这些事件涉及法国政治；也许，他缺少生长在这个国家的人特有的直觉和迅速理解的能力（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我很难准确地说明科耶夫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到底发挥了多大影响。他时常写些供部长和司局长参考的文件，并将其中许多份寄给我看。总的来说，他的意见都有所指，也有一些故弄玄虚。我记得有一份文件是这样写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福特曾经对马克思的贫困化理论进行驳斥，而现在相反，经济学家正在劝告实业家，为了自身利益应当援助第三世界，以促进自身发展。

这个曾指导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研究黑格尔理论的哲学家，在 1945 ~ 1968 年这 23 年间，却扮演起内阁部长和司局长的约

瑟夫神父<sup>①</sup>。虽然他只能在业余时间研究哲学，但著述甚丰，他的著作尽管没有全部发表，却显示出他的不懈努力。在一篇转载于《评论》上的文章里，他对亚历山大·柯瓦雷、马丁·海德格尔、雅各布·克莱因和埃里克·韦尔表达了感激之情，认为自己从他们身上获益匪浅。但是，他又用蔑视的口吻，斥责其中一些人后来偏离了唯一的正确道路，即《精神现象学》。只有他，科耶夫，说的才是定论，他重新审视了在他之前就已经预感到了这种结局的黑格尔。

我至今还摸不清他的把戏有多少是知识性的，有多少是存在主义的。他一劳永逸地抛弃了自然辩证法之后，是否还真正保留着黑格尔的全部哲学思想体系？他到日本旅游时经历了一次爱情奇遇之后，曾将两页关于茶典的内容加进了再版的《黑格尔导读》中。或许他认为，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这种哲学所揭示的真理千真万确，我是这种哲学的代言人而不是创始者；要么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嘲弄人的喜剧，尽管不时被同样嘲弄人的悲剧所打断。很久以前，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曾向我谈起科耶夫说过的一句话：“人生是一幕喜剧，应当态度严肃地演好它。”我还记得，他在无意中这样说过：“人类毕竟不会永无止境地自相残杀下去。”

埃里克·韦尔<sup>②</sup>生于1932年，同我在柏林结识。他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便离开了德国。因为他很快明白了等待犹太人的将是何种命运。战前，我们两人、两个家庭的关系十分亲密

① 17世纪路易十三世时代的人物，为红衣大主教兼宰相黎歇留出主意的参谋，又名灰衣大主教。——译者注

② 1938年或1939年，科耶夫、韦尔、波林（Polin）和我一同阅读康德的著作。科耶夫和韦尔时常开展漫无边际的辩论，双方都不知疲劳地据理力争。

友好。当然，由于极度的自尊心或政治观点的分歧，我们之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有时，出于一些混杂的哲学和现实的原因，他倾向共产主义一边。例如，《苏德条约》缔结之后，哲学之神非但没有防护他免铸大错，反而促使他走向歧途，我为此颇为气恼。战后，他从战俘营回来，重新宣称（尽管为时不久）自己是共产主义者（那时，科耶夫认为一个刚刚加入法国国籍的人持这种观点不太适宜）。

他的亲共思想很快消退了。他不喜欢巴黎，夫人又在布鲁塞尔欧洲共同体常设机构工作，因此便在里尔住下来。他很少来巴黎，喜欢别人去里尔，后来去尼斯做客。由于相距遥远，加上家庭中又出现悲剧，我们中止了会面。我们最后一次交谈是在电话里，他感谢我为他竞选伦理和政治科学院通讯院士所做的努力。

我更喜欢回忆这个曾使我为之奉献自己主要论文的人。他也常去听科耶夫的课，尽管他对《现象学》的理解与讲演者相差无几。他讲话不如后者吸引人，同他交谈也并不总能感到轻松愉快。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引导我走上了哲学思辨之路，至少应该说，是他使我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他对著名哲学家的思想有着深入透彻的理解，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认为，他跟科耶夫和柯瓦雷比起来毫不逊色。他在《论证》上发表的文章主题繁多，显示出作者具有惊人的学识。对这些领域内的问题，他都堪称专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主要著作《哲学逻辑》《政治哲学》《康德理论问题》在一些小圈子里享有相当声誉。到处都有他的狂热崇拜者。但在某种程度上，科耶夫的名望比他要高。是不是命运不公？他也写过黑格尔导读之类的书，不过或许是为了返回康德

学派。

144 柯瓦雷是我们这群人中最受尊敬的长者。他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本人从未谈过此事）。作为一个杰出的哲学和科学方面的历史学家，他涉猎极广，从德国的神秘主义一直到俄国 19 世纪思潮，以及各国对加利利学派的研究情况。他不爱高谈阔论，讲话轻声慢语，却能对所谈事件和人物做出准确和权威性的判断。他曾经提醒我警惕阿兰的反军国主义倾向。他也从不为共产主义思想所诱惑，尽管经济大萧条的形势似乎能够证实马克思的预言。在这些杰出的思想家之中，他不是以他的才华，而是以他的谦虚，以他一丝不苟和坚韧不拔地追求真理的精神，以他认真严谨的思维方式而引人注目。他对大学的工作认真负责，并且希望能在法兰西学院任教。而马夏尔·盖鲁（Martial Guérout）却先他人入选法兰西学院。其实，他们两人进入这座光辉的学府都是当之无愧的。

这个团体中还有一名成员叫马若兰。他是社会地位颇高，却没有受过中等教育、没有获得业士学位证书的十分罕见的法国人之一。他年纪尚轻就为生活所迫到一个交易所谋事，攒钱继续完成学业。他在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取得了同业士学位水平相等的毕业证书。在受到 C. 布格勒和夏尔·利斯特（Charles Rist）的赏识后，他才得以享受助学金，在美国一所大学继续深造。此后，他到夏尔·利斯特领导下的经济研究所担任秘书，在那里拾级而上，不费气力就取得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的论文探讨西米安（Simiand）长期计划的实施结果，见解独特，同当时研究法国经济的专著迥然不同。战后，他又获得了政治经济学教师的学衔。

此时，他已身居官方要职，不再从事科学研究，将全部精

力倾注于国际组织的工作之中。初步工作成果表明，他是一个有水平的经济学家。他更喜爱当活动家。我认为，他的选择有道理。高等学府中并不缺少政治经济学教授，而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以及欧洲委员会里，经济学家的任务与教师的任务相比，同样崇高，同样有价值，而且更少令人失望。

我阅读泽夫·斯特内尔的著作<sup>①</sup>时曾经自忖，当时自己是否对1940年借国家战败之机出现的民族革命的端倪有所觉察？我是否低估了排犹主义的力量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法国是否如同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充满了法西斯主义意识”？ 145

我对《我无所不在》《格兰瓜尔》《天真汉》等极右派报刊并未不屑一顾。不过，我也不按时看这些东西，看了让我如十指钻心。奥古斯特·孔德曾说，为保持清醒的头脑，少受刺激，就必须在阅读时自觉遵守一种纪律。这些报刊并非毫无才华，但充满仇恨，宣扬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包括以著名口号“宁要希特勒，不要勃鲁姆”为特征的思想。我同这种右派毫无共同之处。当然，该派成员相互之间也常常各执己见。即使我们在某一个特定的问题上看法一致，我同该派也不可能有任何来往。

1930年代，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每天上午为他的忠实听众讲授政治，听众中包括乡间贵族、海军军官以及一部分巴黎知识界人士。我多次试图对这个热衷君主制的空论家产生兴趣，但不能如愿。诚然，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

---

<sup>①</sup> 泽夫·斯特内尔（Zeev Sternhell）：《不左不右，法国之法西斯意识》，瑟伊出版社，1983年1月。

知识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他取得这种地位，更多要归因于同他对立的观点平庸无聊，而不是他本人的思想有多么丰富。他也不止一次对形势做过透彻的分析。据我观察，他既不拥戴君主制，也不拥戴自己的祖国。

尽管他（不无保留地）对萨拉查和墨索里尼表示过赞同，但对国家社会主义无丝毫好感，作为日耳曼人和浪漫派，他反对任何违背旧有秩序的东西。在他看来，旧秩序才是智慧和美的不朽典范。

文人墨客的政治主张飘忽不定，时而转向法西斯主义，时而转向共产主义。这既使我好奇和关注，也更引起我的蔑视。安德烈·纪德拥护共产主义事业，后来又发表了《访苏联归来》一书。这一切使我感到，他是一个更注意自身形象而不关心世界历史的作家。

146 我认识埃玛纽埃尔·穆尼埃，也不时拜读他编的《精神》杂志，不过受益平平。在我的记忆中，我在这份杂志上仅仅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一个法国青年致德国的一封公开信》。这篇文章写于1933年1月，即希特勒上台前夕，表述了我在旅德结束时的心情。“请原谅，我不知道我应以何种身份代表法国青年讲话。我，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国家主义者，更不是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我不知是否能够找到自己的同伴……或许，为了对抗德国的国家主义，我会成为一个法国国家主义者……”接着，我进一步阐述道：德国将受到右派党派的统治。我们两个国家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秩序与专制不同，理性与虔诚不同），再对此进行讨论已经毫无意义，任何一方祈求理想和道德的努力都是虚伪的行动。除了强大的国家各自本着自家利益达成协议，已经

别无他择。

《精神》杂志让我生气，主要是因为它的写作方法而不是它的价值观。我在杂志中发现一种地道的意识形态文学。这种文学不直接涉及政治问题，但它的文笔能使读者领略其中提示的答案或选择。无论是它的指导思想，还是对普遍性问题的多方面阐述，都使我感到这是德国文学，一种偶尔被国家社会主义所利用的德国文学。当时代的考验到来之时，当人们必须对重大事件明确表态之时，《精神》杂志派便于1938年和1940年7月相继发生分裂，第一次分裂是可以理解的，第二次分裂却引人深思。

我对阿尔诺·当迪厄（Arnaud Dandieu）和罗伯特·阿隆的著作没怎么当回事。他们都严厉批判议会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但否认自己与法西斯主义存在某种联系。至于马塞尔·比卡尔（Marcel Bucard）、乔治·瓦鲁瓦和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riot），他们在作品中公然自称推崇意大利或德国的经验，他们搞的是宣传，我看他们的文章只当看党派的报纸。

斯特内尔说，战争前夕的法国“充满了法西斯意识”。不管怎样，此话是否有道理？如果重新回忆当时议会和选举的形势，我并不否定自己对当时局势做出的诊断。共和国并没有受到形形色色的被人民阵线政府解散的团体的严重威胁。1934年2月的骚乱由多种意外事件构成，而不存在什么预谋。警察接到政府命令之后，立即不分左派右派对游行队伍开枪。那个政府虽然疲软无力，但依然合法。那些团体虽然发出挑战，但并没有使共和国陷入危机。

有人会向我指出，尽管第三共和国当时的处境已大不同于1930年代初的魏玛共和国，但是领导阶层也许确实“充满”

了法西斯意识。无疑,我将会认真考虑这种观点。不过,国民议会席位上许多右派议员并没有充满法西斯意识,至多只有极右派中的寥寥数人如此。因此,没有必要动员共产党、工人群众以及业已四分五裂的左派团结起来拯救共和国。虽然与资本主义紧密勾结的议会民主正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内失去信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将让位于法西斯主义。

试图将借鉴于社会主义的观点与借鉴于国家主义的观点相互结合起来的人确实四处可见。但是,这种或多或少取得成功的结合也不等于法西斯主义。一些脱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社会党右派从莱昂·勃鲁姆那里接过“我害怕了”(Je suis terrifié)这句话,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政府的合作者(如马塞尔·德阿、阿德里安·马尔盖)。在1930年代,社会主义者已经看到社会党国际一事无成。除非视而不见,否则他们就应当自动解散或者将行动局限于本国范围内。那些自称属于亨利·德·曼<sup>①</sup>的“计划经济派”的团体,不认为自己是、也不愿成为法西斯主义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它们致力于寻找某种能够解决世界危机和议会无能的出路。

毋庸置疑,1930年代末,来自莱茵河彼岸的思想开始在法国传播蔓延。19世纪曾经毒化法国和德国的排犹主义从希特勒的行动中得到精神支持,找到了某种合法性。特别是对德意志第三帝国外交政策上的纷争,使我们国家陷入严重的分裂。力主抵抗的一派被对立面斥为“好战分子”,希望与希特勒签订和约的一派则被怀疑是法西斯主义的同情者。不过,在

---

<sup>①</sup> 亨利·德·曼(Henri de Man, 1885—1953),比利时理论家和政治家,曾任比工党副主席、政府内阁部长。——译者注



一片相互谴责声中，双方都有说对的东西，也有说错的东西：拥护一党制的人士不同意名曰“保卫民主”的战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政权的坚定反对者很可能忽视了战争时期至关重要的因素：力量对比。许多右派人士对法国的军事劣势有准确的估计，许多左派人士则对希特勒的野心有清楚的认识。

第三共和国信誉扫地，这不仅使民族革命应运而生，还使惶恐的民众、领导阶层和法定社团不得不接受维希政权为了消灭共和国，为了在某些方面模仿希特勒而采取的法制化措施。维希的改革政策并未令我吃惊。1940年6月我即将离开法国时在图卢兹对妻子说过：“这些人起先拒绝战争，后又祈求停战。德国人占领法国之后，他们还会慢慢地被迫做更多事。”我的判断还过于乐观，没想到他们竟主动迎合纳粹的意愿。

继1930年代的意识形态论战之后，法国的战败进一步加速了维希政权的形成和民族革命的爆发。当然，共和国的宿敌法兰西行动派为这个政权的成立提供了部分人员和思想基础。某些其他人物和思想流派也与这个政权同流合污。皮埃尔·赖戈尔到底早就是法西斯分子，还是受了法国知识界论战的影响，这还不好说。法国知识界早已传播着一种专制哲学，既汲取了法国的传统思想，又借鉴了外国的经验。

我与一些团体（它们彼此之间几乎互不往来）常有接触，但并没有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派。当萨特还在为发表《恶心》寻找出版商时，马尔罗已经颇有名望。教授和作家平时主要在“真理联合会”和“蓬蒂尼十日会”等会议上相逢。我从这两种活动中获益匪浅。今天，我时常为没有一个像保罗·德雅尔丹创建的那种活动团体而倍感遗憾。

在我们之中，只有《今晚报》外交栏的责任编辑保罗 - 伊夫·尼赞参加了震荡左岸的意识形态论战，这场论战始于1933年塞纳河左岸，一年后进入高潮阶段。其余那些在战后统治了巴黎哲学界的人物当时都在潜心写作。他们的首批著作于1930年代末问世。卷帙浩繁的《哲学研究》杂志同1920年代的学术氛围，同我们那一代人曾经接受的教育截然不同。战后的哲学成熟于1930年代，置身于文化人之间的时代论争之外；今天，这种哲学似乎已接近尾声。

## 第五章 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

本章题目用的这两个形容词取自保罗·福科内的一句话。150  
那句话是1938年3月26日我在里雅尔大厅进行论文答辩时福科内当面跟我说的。事前几天，我照例先去拜会他，他既冒失又善意地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影响了我的论文。我忍笑对他说，局势岌岌可危，国家危机四伏，战争迫在眉睫，法国衰微没落……我请他对我的家务事放心，他叫我对国家大事放心。对的，法国的全盛时代当然已经过去，没落完全是相对的，任何国家都有这种经历，这既不足以为之辩解，也不足以说明我那种巨大的悲观绝望。这个社会学家无条件服膺埃米尔·涂尔干，只顾瞭望远方，搞科学搞得心安理得，对于大祸临头，几乎满不在乎。我虽然知道大祸已经临头，但也还搞不清楚大祸究竟有多大。而当时学术界里当官的都怪我杞人忧天，把什么都看得一团漆黑。

我在论文答辩的会上刚发言完毕，保罗·福科内便根据《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登载的摘要开言道：“我完成了一件慈悲为怀的事情，一件有信仰的事情，一件有希望的事情。我发慈悲，仍然向你表示钦佩和同情。我坚持我的信仰，信仰你所谴责的东西。我希望，希望同学们不跟你走。”场内听众的反应各不相同。

作为巴黎大学的纯种产物，实证主义唯理论的产物，或者说是新康德思想的产物，我在福科内的心目中——还不只是他

的心目中——似乎否定一切，不是革命者而是虚无主义者。过了几年，《存在与虚无》一书倒没有引起这些睡眠惺忪的学术大师同样的惊讶和气愤。

其实，福科内的反应虽然表达的方式近乎漫画式，但其实和论文答辩会上的其他评审委员的并无二致。一般来讲，1930年代的学术泰斗都大同小异。我的三本书《当代德国社会学》《历史批判哲学：论史学中的一个德国学派》《历史哲学导论》，第一本在1935年出版，另外两本在1938年问世。那时候，好几个德国哲学家住在巴黎，有的是被驱逐出来的，有的是逃出来的。《哲学研究》杂志登载了这些流亡者的文章。可是，这种和平的入侵却遭到了白眼。我既从中得利又感到难受。我的那几本书介绍了一种或几种概然判断，都取材于莱茵河彼岸。福科内觉得我批评历史的客观性的行为触犯了他。反正大家都诧异，怎么在我身上居然找不出他们从前的学生的影子。可是，他们在事前就把我当作他们学术家庭中的一员。更不用说，布格勒出于友情，其余的人忠于他们的道德观念，他们连一刹那也没有想要拒绝我返回母校。

为什么我那几本书充满了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的气息？

我在为获得高等文凭而研究康德（1926 ~ 1927）和寓居勒阿弗尔这两个时期，漫无边际地读了许多书。除了《自由论坛》和《欧洲》月刊，我没有在别处发表过任何文章。从1933年10月至1937年4月，我居然写出了上面提到的三本书。

我说“居然”并没有自负的意思，不是完成了什么业绩，而是感慨我曾眼瞧着一张白纸而惶惑无措的心情。我写文章本来是很吃力的。我不得不用好几年的时光，学会写读结合，在

阅读时酝酿写作，在写作中反复阅读。我通常在撰写一个章节、研究一个作家时并不去读作家的原著，只根据我以前阅读原著时的想法把作家的思想重新呈现出来，然后再引用他的词句补充文章。

《当代德国社会学》究竟有什么价值？不是自夸自吹，我敢说这本小书还是有点用处的，哪怕今天已经没什么用了。书中谈到的某些社会学家已经无人问津，而另一些人，如马克斯·韦伯，几乎占了全书篇幅的1/3，今天已经无须我来做什么介绍了。几代莘莘学子从书中汲取了知识，书的内容可能有些肤浅，但大体上正确地反映了德国社会学的几种倾向。可惜这门欣欣向荣的学问当时就遭国社党扼杀了。默顿（R. Merton）在国际社会学大会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这本小书出自无名氏之手，曾深深打动了。这本书后来被译成西班牙语和日文，战后又译成英文和德文。最近不知为什么<sup>①</sup>它又被译成意大利文，并在美国和日本再版。

1935年，我研究的德国社会学家大多还不出名。《社会学年鉴》报道过马克斯·韦伯的一些研究成果，特别是关于清教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两篇论文。在马克斯·韦伯方面，他从未引用过涂尔干的话，然而据马塞尔·莫斯说，韦伯家的藏书室里有全套的《社会学年鉴》。1935年，还没有一部书全面研究韦伯的政治人格和社会学人格。马克思以后的概然判断，比方说卡尔·曼海姆的概然判断，几乎没有触及法国的一些社会学家的思想。我的书是接着C. 布格勒的《法国社会学小

---

<sup>①</sup> 《社会学主要思潮》在意大利出版后，篇幅较繁，降低了《当代德国社会学》这本书的用处。

结》写的。出书时候的形势比较有利，这本书仿佛打开了一个人迹未到的新天地，多亏这本书，我结识了 A. 布罗岱尔森 (A. Brodersen) 和爱德华·希尔斯 (E. Shils)，并且彼此交好直至今日。而最叫我感动的则是 25 年以后，一个原籍波兰的社会学家安德烈斯基 (Stalislav Andreski) 公开承认我那本书启发了他。

153 我写这本小书是受布格勒之托。他答应我，第二年给我在高师的社会文献中心谋一个差事。这个岗位报酬不多，不能养家糊口，但似乎与教学有关。我本来还在写一篇论文，是他叫我不写了。我在他的督促下写了这本小书。事后想起来，我自己是否乐意呢？我想是乐意的。一直到今天，我还觉得用这本书来总结我在德国取经问道的收获，终究是值得庆幸的。

我不过延长了一段短短的传统：涂尔干和布格勒都访问过德国的一些大学，也都写了文章带回国，汇编成册。我没有周游各大学，只在科隆略为观察了一下冯·维瑞 (L. von Wiese) 一派的人物，在柏林瞧见过桑巴特 (W. Sombart)。跟那几个前辈先生一样，我只集中研究了狭义的社会学。我没有提交过什么研究报告或访学印象记，而是借助了“系统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对比，挥洒出一幅系统的草图。这样的对比除了实用和方便，还有其他价值吗？奥本海姆 (Fr. Oppenheimer)、阿尔弗雷德·韦伯 (A. Weber) 和 K. 曼海姆三个人无疑是一脉相承的。前面两位主张对历史有一个整体的观念，而后面一位则反复思考社会学家扎根于社会的作用。他们三位都深受卡尔·马克思的影响，而各人却都选中了自己的专题。奥本海姆选的课题是“社会等级制的起源：牧民压倒农民导致人剥削

人”。阿尔弗雷德·韦伯则研究文明与文化、技术与精神的二元论。卡尔·曼海姆研究的是一门新的科学，叫作科学社会学，他发展马克思的思想，认为各个阶级无不根据自己本身的观点、立场来观察社会现实。

在三个作家中，要算卡尔·曼海姆在1932年的名气最大。我在柏林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寄给他，又到法兰克福去看他，并且结识了埃利亚斯（N. Elias）。埃利亚斯批判文明的一些著作<sup>①</sup>最近在法国刊行，并受到热烈的欢迎。K. 曼海姆把我寄给他的文章弄丢了。大概那篇东西也只配这种下场。我写《当代德国社会学》时，已经摆脱了“意识形态和空想”的魅力。我评论他的那一章不够宽宏大量。1935年，我又在巴黎看见他。他风度翩翩，带点俏皮地向我道喜，说他“非常欣赏”我的大作，然后微微一笑，加上一句：“只有直接关于他的那章内容不在其内。”后生初出茅庐，刚写头一本书，便把名扬欧美的一个学术长官批得体无完肤，而这个长官非但不生气，还夸奖了这头初生之犊，正如英国人所说的，曼海姆是一个得体的人。大战期间，我在伦敦又见过他几次。

154

我这本书的第一章罗列了四个作家，也就是四个学派，每个学派都确有代表性、典型性。一派是格奥尔格·齐美尔和冯·维瑞，基点建立在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上。一派是F. 滕尼斯，强调“社会性”的主要典型，特别是著名的社会-公社的交替选择。第三派是菲尔坎特（A. Vierkandt），引用现象学说明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的意义。最后一派是奥特玛尔·斯潘（Othmar Spann），他推广一项哲学和科学的决定，主张世界主

<sup>①</sup> *La Civilisation des moeurs et la Dynamique de l'Occident*, Calmann - Lévy.

义，反对个人主义。总体先于局部而存在，更不必说个人只有在加入总体以后，才上升为人类。

这四个作家或学派并不限于搞一般的所谓微观社会学，而是在一起说明两个永远有意义的论点：一方面是“社会性”的主要典型（社会与共同体），另一方面则是探讨接近社会现实的方式或哲学模式。直到今天，我还不相信有人能用同样的篇幅说得更好一些、更多一些。然而，我给四个学派冠以“系统社会学”这一称号，今天看来，弄巧胜于说服。形式社会学、现象学、世界主义，这三者可以有逻辑地加以贯通。三者代表了三种哲学启示和诊断社会症结的三种作风。但是，滕尼斯的社会 - 公社对比论并没有指出特效的探讨手段，而其他三个作家则各自显了神通。所谓“系统”，无非是对社会性的各个变种或社会总体的不同部分严格规定形式，并尽可能一个不漏。这四个作家的确做了分类工作，但这种分类只能算一份清单、一种概念的工具，可以用来理解一切观察到的现象。系统学 - 历史学的对立在半个世纪以前是有用和方便的，但我怀疑这在今天是否还有用处。宏观社会学和微观社会学、共时分析和历时分析都掩盖了这种对立，或者抑制了这种对立。

探讨德国社会学的特征，探讨法国社会学和德国社会学的区别，在今天看来还是有意思的，但已经不准确。在 1930 年代初，把德国社会学“唯灵论”的气质（至少是最典型的）同法国社会学实验和科学的气质做一番对比，那是有道理的，哪怕这两种社会学在程序上虽有不同，在实践中却没有两样。的确，德国人对于文明 - 文化对比的用法和法国人不一样。最后，社会学家的“自我社会学”来自马克思主义思想，



对此，德国的社会学家比法国同行更为担忧。

今天，这种对比几乎已经销声匿迹。战前的法国并没有见过准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像 G. 卢卡奇和 K. 曼海姆那样的作家。法国现在却大有人在。虽然法国没有法兰克福那样的学派，但 L. 阿尔都塞和 N. 普兰查斯（N. Poulantzas）重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借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解释了现在。最后，1945 年以后的社会学越来越超出国界，尽管在实践中也许仍然保留着一定的民族色彩。共同的方式、研究课题、解释办法，似乎已是既成事实。倒不是说社会学家受的是同一哲学的启示，或者是同样地指出现实，而是说大多数学派都在各国内部出现，反对法兰克福批判论的人在德国则跟在别国一样多，或者也许更多。甚至对唯理社会的谴责，我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国便已经觉察出来，现在又由左派和极左派重弹旧调，在法国是这样，在别国也一样。

1953 年，这本书以德文出版，我写了一篇短序：《谈谈社会学概然判断现况》。我还预告了德国社会学的复兴：德国社会学从此将成为跨国社会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也能为这门学科做出自己的贡献，并以自己的传统丰富其内容。

这本小书会不会得罪涂尔干的门徒？我不太相信。德国社会学家很可能让涂尔干生气，如卡尔·曼海姆，我是为了驳倒他而提出来的。福科内相信，埃米尔·涂尔干想建立起来的社会学是一门正在形成的仍然新颖的科学。他宁愿承认这门学科未臻完善，还比较嫩，但用今天流行的话说，他不想由自己来把一个名叫涂尔干的社会个人变成社会学家的进程具体化。对社会学家做社会学分析是暗含在马克思主义里面的，而在涂尔干派的社会学里面则是不存在的。同样，涂尔干在表面上用方

法论中“把社会事实当作实物”的规则来排除对象的人性。事实上，这条规则主要旨在放下成见，通过社会学家解释的社会人来辨明各种制度的自然解释。我再说一遍，各种社会学在实质上并不像社会学家自己倚仗的各种哲学那样彼此间大有区别。今天，一个社会学家不必太费事便可以同时引用马克思和涂尔干。保留归保留，反正我没法不想起一个循规蹈矩而又视野有限的涂尔干派人士带来的冲击。社会学的进步，正如任何科学（如实证主义者当时设想的科学），是用一块一块石头砌起来的，一面把各式各样的事实和关系累积起来，一面改正错误，但仍把获得的知识纳入更广阔的全局。这是一种看法。另一种看法则如马克斯·韦伯想象的社会学，不断对永不枯竭的题材提出问题来自我革新。这两种看法的差别很大。发展中的人类世界不停地创造崭新的作品，从而引发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崭新的问题。这和第一种看法也差别很大。经过反复思考，我一下子动摇了，这就是科学进步的庸俗哲学。

历史理性的批判这一概念来自威廉·狄尔泰，我觉得后来它也引导萨特写出《辩证理性批判》。我现在暂时不予评论，只谈其中一个意义：为“精神科学”或“人文科学”制出一种理论，堪与另外一种理论相比拟，那就是为自然科学制出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一门理论如同康德的批判，  
157 具有两种功能：一在证实科学的真实性，二在限制科学真理的作用范围。对历史批判哲学家来说，重新研究康德并不意味着做另一种先验论的分析，而是反对黑格尔的体系。这些哲学家中没有一个人自称反对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只有马克斯·韦伯在钦佩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也明确

表示反对。狄尔泰用历史解释哲学，认为哲学和“世界观”（Weltanschauung）<sup>①</sup>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并不在“批判”里寻找代替整个体系的东西，而是寻找一种客观知识的基础，尽管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都扎根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也就是在许多社会之一里。

我把威廉·狄尔泰同格奥尔格·齐美尔、海因里希·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这三位作家排在一起，是不是人为的专断？或者是有一定道理的？三家的概然判断互相近似，三家提出的问题也仿佛彼此有姻亲关系。狄尔泰出世时，黑格尔才逝世两年，所以他和其余三位并非同一代人。其余三位都诞生于1860年代光景。第一个在1858年，第二位在1863年，第三位在1865年。四个学者中，谁都没有花毕生精力和大量著书来研究我提出的问题。狄尔泰本来是历史学家，后来才“批判”他自己的专业。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历史哲学问题》<sup>②</sup>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占多大的位置。李凯尔特的巨著《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sup>③</sup>大概在他的全部作品里最享盛名，但放进研究新康德思想的全部作品中，还只能算其中一个部分。两种科学的对比，本来不过是新康德思想的一个部分。最后，韦伯虽然一向关心他学术的模式不亚于关心他的学术本身，但他的威望毕竟还得归功于他作为社会学家的业绩。

我今天仍然觉得，把这四个学者列在一起还是说得通的。问题在于先明确研究对象的范围。我们要阐明的，不是狄尔泰

① 通常把这个德文词翻译为“世界观”（conception）或“对世界的看法”（vision du monde），我附上的德文原词比相应的法文词更通用更有含义。

②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③ *Les Limites de la conceptualisation des sciences de la nature*.

158 或韦伯的全部思想，而是比较他们对同一问题提供的答案。问题是否完全雷同？大概不是的，因为提问题的人各自都用某一种哲学的语言及背景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然而，过了那么多年，重读这本艰深的小书，我懂得了为什么我不管对还是不对非得说它有价值，为什么公众又对它有那么多不同的看法。

我首先认为《历史批判哲学》一书概括了我的主要见解。莱昂·布伦什维格读了这本书的手稿（我还没有加上后来改动的地方），对论文的批评十分严厉。他说得很对：如果我一心想做晦涩的哲学解释，我“会徒劳无功”，而且哲学解释本来是次要的。过了几个月，读了我的《当代德国社会学》，他又给我写了一封友好的信，部分否定了他以前讲的话，并且懊悔过去对我给他看的手稿批评得那么严厉。〔而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则恰恰相反，他对《当代德国社会学》批评得更加厉害。〕1935年暑假期间，我把《历史批判哲学》重新修订一遍，并且下决心再写一本书，阐述我对历史理性批判的个人见解，这本书将包含我的主要论点。

布伦什维格给我帮了忙，我应该感谢他，可是我当时却十分恼火，并且做了些可笑的事。我把手稿拿给安德烈·马尔罗看，尽管明知道他不太善于评判学院式的著作，然后又拿给让·杜瓦尔看，他只指出了几处他中意的词句（如“智慧是意愿的眼睛”）。我在真理联合会中曾反对过布伦什维格一两次，责备他不关心人类的命运，除了学者的道德，对其他道德一无所知。我从此摆脱了某种形式的新康德学派。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属于一个变动时期的社会。尽管他们想成为或应该成为学者，他们也必然留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

《历史批判哲学》还应该第二卷，讨论历史主义或唯史论，二者在过去比现在更加缺少区别。卡尔·波普尔爵士写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在英美世界传播一种观点，说马克思主义是历史决定论最完善的典范，自称能够预见——说得更恰当一些能够先知整个人类历史的前途。这本书创作于战争年代，跟《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样，都想把历史的各种哲学作为各种革命政策的基础和佐证。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第3页，波普尔概述他的首要目标说：“这本书致力于阐明先知的明鉴是有害的，历史的形而上学阻挠了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改革的诸多问题。而这本书也努力阐明，我们只要不再以先知自居，便能自己缔造自己的命运。”<sup>①</sup>《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为历史主义下了定义：这是各种信仰、各式各样生活和思想方式都以各个社会和各个时代为根据的相对性学说。这一定义在意大利、德国和法国都没有被人采纳。P. 罗西（P. Rossi）写的关于德国历史决定论的书称道并引用了我的书，并研究了我在《历史批判哲学》一书中分析过的四个作家，同时也研究了我打算在续编中探讨的另外几个作家。

159

我本来打算在第二卷中列入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卡尔·曼海姆，也许还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这四个作家彼此很不一样，并不像批判哲学家那样回答同一个问题。他们处在或自己觉得处

---

① “This book tries to show that this prophetic wisdom is harmful, that the metaphysics of history impe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iecemeal methods of science to the problems of social reforms. And it further tries to show how we may become the makers of our fate when we have ceased to pose as its prophets.”

在一个类似的历史环境之中，各自用不同的语言，申说同一个危机，而朝着完全没有出路的方向寻找出路。特洛尔奇把历史主义理解为价值的历史性，所以可能导致人类精神统一的破裂和思想的无政府状态。战后德国知识分子的迷惘失措，比他们的忐忑不安更加受到特洛尔奇学说的影响。曼海姆的科学社会学标志着一种思想方法的结果。这一结果正是“历史主义”一词的一种含义所指出的，也就是说，人及其思想都是社会背景所决定的。

160 马克斯·舍勒叫我感兴趣的是他构思出一门总的理论，指出思想和社会二者之间的关系。他的两个论点都需要探讨，至少需要对它们采取一些保留，这两个论点也都值得在这里提一下。其一是关于社会的三种典型，它们先后相承，规定了人类历史的次序。头一种以血缘和亲属关系为主。第二种叫作历史社会，以政权为主。第三种叫作现代社会，以经济关系为主。此外，根据舍勒的说法，物质因素决定不了思想，只能引导思想。经济—社会组织开通或堵塞渠道，而适应人的需要或符合人的憧憬的思想，都得从这些渠道通过。

斯宾格勒原该在解释这些著作中代表最高阶段，倒不像曼海姆那样是出于他出色的水平，而是像狄尔泰那样出于他的学识，或所呈现的社会全貌。古代数学与现代数学的对比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科学本身从属于一种文化的精神。

在第一卷里——其实我也只写了这一本——我采取的研究方法在论文答辩时受到责难。这个研究方法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的阐述不足，而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的阐述有余。我努力想从四个作家的作品中得出他们所提问题的答案，而且那些问题都是我认为具有关键性的问题。选择这些问题，是否理所当然？是

不是作家自己规定的？是不是他们的概然判断所规定的？我很想做肯定的回答，也许今天还想做肯定的回答，但是，这些问题和答案并不是他们中至少是某几个所提出的东西的关键。我说这话，心里想的是狄尔泰和格奥尔格·齐美尔。

狄尔泰是错不了的，他一辈子想的是历史理性的批判。他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设想这种批判。首先，他想到一种独创的心理学，这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甚至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唯物主义心理学相反，也与史学家、语文学家、传记作家最爱用的工具——心理学相反。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狄尔泰和格奥尔格·齐美尔也曾犹豫不决，终于发现绝不能“心理学化”对作品、事件和人物的理解。

狄尔泰的第二个尝试，（据他本人对外讲）是受了伯纳德·格罗修森（Bernard Groethuysen）的影响。这一尝试见于一些片段的表述中，汇集在全集的第七卷里。

狄尔泰寻求一种历史理性的批判，到底得到了什么结果？ 161  
他重新采用了康德的思想：人的思想构成自己的宇宙，但放到历史的宇宙中去，这个想法便不再具有同样的范畴和作用。感觉的各种形式、理解的各种类别，使科学认识和因果的解释成为可能。狄尔泰提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因为他关注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建设起社会事业和精神事业。这些事业包括建立一种社会、一种生活、一种时代，构成许多整体。要理解并渗透这些整体，就得反复往来，从个体到整体，再从整体到个体。个体被纳入整体方有意义，整体只有通过分析个体才能够发现自己。但是，人们一旦承认了连续不断的创造力正是根本的历史事实，那么再怎样去跨越我们历史命运的特性？

H. 李凯尔特写的书尚不为人所知（尽管他写过一本叫作《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的小书，此书20年前已被译成英文，并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作序，哈耶克对其赞扬备至）<sup>①</sup>，他不想只是另创一种批判，而是想借用康德的思想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分析，严格制定一项包含两种科学的学说。一种科学是在一套规律的体系内完成的，另一种科学则是在世界史的范畴内完成的。从尚未定型材料中提取对象，并进行加工或选择，乃是一切科学的前提。选择或加工有两项原则：一是通则，二是价值。所以，抽象的最高水平是科学目的的二重性。<sup>②</sup>

162 实际上，莱昂·布伦什维格对于狄尔泰一点儿也不理解，对于西南德国学派也一样。对他来说，历史和科学不过是哲学的实验所，但他又不太关心模拟重演历史的方式方法。我的书并不以介绍一门外国学派见长，而是把分析与讨论结合起来，用我提出的一些问题组织讨论。在讨论狄尔泰和格奥尔格·齐美尔的两章内容里，我细述两个作家所处的不同时期、他们的犹豫和自我批评。凡是不关心这两个思想家的人，不关心他们心中存在的问题的人，绝不会发现这本书的价值。价值固然有限，但倒是实打实的。

---

① *Science and History, A Critique of positivist epistemology*, D. Van Nostrand Company, Princeton, 1962.

② 李凯尔特的论点——或者说其中某些论点——的传播与普及，全仗马克斯·韦伯曾经予以采用。韦伯是不是以李凯尔特的门人自居，想考验考验这位哲学家的想法，或者是把《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作为起点？我在这里不下定论。我认为韦伯本人并不以搞哲学的专业人士自居，而喜欢倚仗一个像自己一样继承康德的哲学家。至于他是否深深地改变了李凯尔特的思想，那是没有疑问的。说他不当着李凯尔特的面宣扬其学说，那是可能的，但不容易证实。



罗西的书<sup>①</sup>不仅得益于过去，而且比我更加具备真正的历史目的。我的论文评审委员会中的一个委员责怪我不尊重历史的经典方法。他提供的证据是，我在参考书的目录里引用了韦伯的全集而没有列举他在某处某日第一次发表的诸篇文章。他是有道理的，但可以给出更好的理由。我没有像罗西那样试图写一部思想运动史，而只分析了四个作家的哲学见解，并且阐明了他们挣扎着想解决而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有时候，我忽然狂妄起来，觉得自己竟能够表达他们的思想胜过他们自己。不管怎样，我没有低估他们的中心思想：价值的相对性和历史认识的客观性。

莱昂·布伦什维格对《历史批判哲学》持有保留的欢迎态度，我预感到战争日益临近，这两方面促使我马上着手写这一本书。这是自从我在莱茵河畔构思以来，便盘算了几年要写的书。我既然以介入的旁观者自居，自当把历史学家与行动家之间的关系搞清楚，把认识形成中的历史与历史人物不得不做出的决定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搞清楚。于是我放弃了再写《历史的理论》第二卷的打算，并且把第一卷的手稿加工了一番，便于1935年10月或11月着手写作《历史哲学导论》。1937年复活节过后，写作事竣。

163

我不觉得这个计划是事前就设想好的。《导论》是我一面写一面定型的。今天我对这样的定型很不满意。《导论》一共有四个部分，其中三个部分有三章，每一章又分成四节。这种

---

① *Le Storicismo tedesco contemporaneo*. 1956 et 1971. (W. Ditley, W. Windelband, H. Richert, G. Simmel, M. Weber, O. Spengler, E. Troeltsch - S. Meuncke.)

烦琐的安排被论文评审委员埃米尔·布雷依埃指出，他责备我把文气弄得支离破碎，把题材割裂成一连串的问题，让读者去弥合碎片。我不乏傲气地回答说，文气的概念不属于哲学，哲学只消尽量把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就行了。今天，我很想肯定布雷依埃的见解。此外，我这本书还犯了另外一个毛病，那就是念念不忘骈骊对称。某些段落、某些部分和章节的结论，在我看来都是必不可少的。也许是阿兰的某些作品还在影响我的思想。

我既不想否定这本书，也不想为它辩护。书是在差不多半个世纪以前写的。至少在法国，这本书的历程也许还没有到头。以哲学为专业的人是这样看的。以大学里通用的称呼来说，我本来可以算作以哲学为专业的人。

介绍一本没法写出摘要的书，介绍它的要点，确实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不过现在已经告竣。我从《导论》（第60页）中摘一段谈到“自传”的话，作为我这本书的题词：

……我没法再像20年前那样想问题，至少，我只好探索前进，仿佛去打听另外一个人而不是我自己。有时候，为了找到从前的我，我还不得不借重自己的著作、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平时不太关心我们思想的发展过程，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我们经历中最好的东西。我们过去的智慧和思想，仿佛已经没有多大意思。如果还感兴趣的话，那也不过为现在着想。只有在反躬自问和自我反省时不是这样。

我倒很愿意把“反躬自问”改成自传式反省。至于其余，我的经验却倾向于保持这种分析。我屡次重提《导论》中讨

论的某些问题，比方说“历史意识的纬度”，但从不引用我在战前写过的东西。我估计自己心里保留着以往研究的主要成果。我之所以重读《导论》，那是出于写自传的好奇心，这才去寻找书里的东西。我今天再去回忆编撰的经过，已经十分吃力。若要再写这样的文章，那真是强人所难了。

我先找几个曾使保罗·福科内发脾气的段落，其中有些判断如今已经不会再冒犯任何人：

……一种进步的哲学……在于承认各种社会的整体和人类生存境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有时候，这种有规则的和经常不断的改善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这种改善主要是知识层面的，从科学到人和集体组织都会得到改善，值得乐观其成，因为论法论事，道德总是和智慧并行不悖。今天，对于这一学说，可以说什么反应都有。有人怀疑其真实性，至少是怀疑其进步的规律性。已经有太多的事实，指出所谓文明的不可靠。表面上最靠得住的成果，为集体的神话牺牲了。政治扯下了面具，便向天真汉暴露了本质。因此，有人论法论事，批评那种从科学到人再到社会而总结出的推论。实证科学的活动是分块分片的，其发展有它自己的节奏，无论思想还是操行，都跟不上其发展速度……何况，所谓进步，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公共社会自封为绝对的价值，自由社会追求扩大个人自主的范围，二者之间没有共同的评价尺度。这两种交替的社会是没法比出高下的，除非引用一种高于历史多样性的标准。但是，这样的标准永远是一种实质化了的投影，是特定的集体，本来就是那样，或者想成为那样的投影。我们这个时

代太多样化了。时代本身便显然带着多样性，不至于陷入闭关集团的那种幼稚和天真，也不至于自信到自以为比过去、比别人都优越、都高明……

16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认为进步的哲学大有问题，大概不会引起任何人太大的反感，甚至沉湎在社会学的信念之中的涂尔干派学者也不会对此产生太大反感。何况这篇文章并非《导论》的结论。文章反对的是相信进步的那种庸俗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建立在错误的事实之上，因为整个社会的改变既不基于科学认识的速度，也不基于科学认识的风格。其次，这种方式是建立在天真的想法上的，因为衡量进步只能根据超历史的标准。知识的增加有待观察。文化的提高有待判断。而谁又是不偏不倚的裁判员？

文化（或者是文明）的多元性在 1938 年已经属于时代精神。各家沙龙都念诵瓦莱里的一句话：“我们另外的文明，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是终有一死了。”反对纯理性的进步论，不管怎样，终究招致乐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的反感。当时，这种哲学还在巴黎大学占统治地位。顺便提一提，今天，世界性历史显得平淡无奇，大概要算在“绝望”的账上。

我们的时代，表面上赞同这样一种尝试 [书写世界性历史]，因为全球共命运，还是破天荒第一遭。有人会反对积累个人智慧没法消化的各种知识。有人会反对谴责胡思乱想的科学严谨。人们将会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今天还很松弛，人民之间共同的东西还较贫乏，在内外团结方面也还做得不怎么样。这些提法都有

价值，但都未击中要害。假如今天西方还相信自己的使命，人们便会这样写——集体写或者个人写——一部世界性历史，指出从各自单打独斗出发，任何社会都会逐渐达到当今的文明程度。

这样一部历史没法写，那是因为欧洲已经不知道究竟应该喜欢它所立还是它所破的东西。当欧洲威胁要摧毁单一价值观念时，它又承认各种创造和人生的独特性。

当时，温和的左派还相信法国或西方国家负有“传播文明的使命”。我当然是边缘人物中间的一员，至少在法国如此。在魏玛时期的德国，历史主义具有一些这样的含义：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意识到价值观的历史性，这就滋养了知识分子的悲观和惶惑。P. 福科内于1938年3月26日重新表明了他对于一些想法所持有的信念，而这些想法却没有经受住后来几年的考验。 166

涂尔干学派的一个社会学家大概会觉得这种分析特别咄咄逼人，因为这种分析直接针对涂尔干本人的奢望，想把教师的道德建立在新科学的基础之上。我有一段讨论历史的相对性（历史主义）的文字，其中阐述不同社会与其道德观之间的关系（黑格尔派的道德观）、道德义务的多样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我还接着说：

恰恰相反，道德与社会相互依存，证实我们个体的要求是有理的，如果从法律和事实上说，社会乃是一切义务的根源和基础。涂尔干的用意不就在于重振道德吗？而照他的说法，自从宗教信仰消逝，道德便发生了动摇……社

会学家、民主人士、自由思想家和主张个体自由的人，他们靠自己的学识证实了他们自动接受的一些价值观的合理性。在他们看来，现在他们所处的文明结构（考虑到其密度或有机的一致性）都要求有某些平等理念、个人自主权。个人的价值判断将占上风，不再像过去那样被推崇的集体判断所取代。人们满怀信心地用社会代替了上帝。其实，“社会”这个词含义并不清楚，因为它有时候指的是具体的集体，有时候指的却是这些集体的理念或理想。说实话，社会这个词只适用于一些特定的集团，自己把自己关在里面，但是，同祖国或国家比起来，毕竟不那么直接让人联想起明争暗斗，兵戎相见（人们很难想象，一个社会能够扩大到全人类）。“社会”这个概念隐藏着撕裂一切人类群体的种种冲突。这个词能使对立的阶级服从社会的团结一致，并设想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民道德。但是，如果这个概念剥离了一切外沿的威望，指的是一套并不协调一致的各种社会现实，那么岂不显得社会学至上主义贬低了一种无限相对性的价值，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现实多于精神现实的存在，只服从决定论，而并不向自由打开大门吗？

167 这样以寥寥数语推翻涂尔干珍视的想法，也就是说，用社会学来革新师范学校里的伦理学教程，那无疑会亵渎师门信徒，弄得他们精神恍惚。然而，我认为，总的来说这本书和其他几本书都冒犯了他们。我让这本书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我已经放弃了唯理论（日后我的行为却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又仿佛放弃了对进步的乐观主义，放弃了对科学的信念。在这方

面，评论者并没有搞错，但也不算全对。这本书本身的意义就不清楚，如果不说它暧昧不明的话。每一项分析本身也许是明白的，但是，总的意图和结论大可争议。书的形式对此负有部分责任，但我觉得还有其他原因。

我在序言中是这样概要地说出我的意图的：“就较高抽象层次而言，我们的书趋向一种历史哲学，既不同于科学的唯理论，也不同于实证论。”亨利·马鲁（Henri I. Marrou）在《精神》杂志上著文，首先强调反实证论，对一些历史学家做了无情的批判，因为这些历史学家抱有幻想，企图得出一种幼稚的真理，想复制出“符合过去发生过的”现实。这是利奥波德·冯·兰克（L. von Ranke）说过的一句名言。我在下文接着说明我的意图：“历史哲学从某种意义来讲也是历史的哲学，只要不下定义说是人类的全景，而说是联系存在的哲学观念，解释现在或过去。”或者说：“哲学在运动中发展，不断更新，从生活到意识，从意识到自由思想，从思想到意志。”尽管这本书汲取了唯理论，但在1938年，总的来说惊动了巴黎大学的老师们，因为他们从中嗅出了一种思维方式、一些考虑、一些思考题，这些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

我不打算就两种理论谈论太多，一是理解的理论，二是因果关系的理论。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在谈这两种理论，但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我一开头便区分了两种认识方式，并以简单化的事例来加以说明。在我使用的词汇里，确定一个行为的动机并不是说明其原委。当事人的理解力，是人们通过环境的逻辑和当事人的感情冲动来估计的。这种理解力与普通含义的说明并不相抵触。发生抵触的是对原委的解释。理解一种作风、一项工作、一种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探索对象内

在的各种意义及其可以理解的各种相互关系。我大概可以同意一个挪威哲学家“工作手册”里面的列举方式。他说：理解的对象是人、人的行为、人的言语、行为与言语的某些产物，一般来说，是人的精神表现（艺术、绘画、雕刻等），然后是人们称为有意义的对象、手段、工具等。我一开头便阐明的理论，同出了名的不合理的理解观简直是天南地北，各不相干。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意识能够从感情上进入另一个人的意识。我是指理解是认识一种解释，从内在到现实，这种解释曾经或者可能是由身历其境、亲自动手做过的人思考过的。

为了说明我的因果观念，不妨重新用我在上文已经用过的例子，即1914年大战的根源。对我来说，探索1914年大战的原因，不仅要找出当事人的意图——这些人由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而希望或者愿意打一场局部的或全面的战争——而且要确定是哪些事情，使战争在1914年8月非爆发不可，或者弄出了或多或少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定战争的原因，好比分析一场车祸的种种原因，如发动机抛锚、雪崩等。发动机停转，雪岩崩塌，服从的是自然规律，而专家则在事前的因素中，选用直接引起和立即引起事故的原因。或者，专家只引用一个事前的因素，这个因素完全可以预见到，以至于事故的责任应该由事前的全部因素来担负，不能只归罪于最后一个因素，归罪于雷管。专家也可以恰恰相反，引用一个没法预见的事前因素，因而事故似乎与环境无关。环境并没有使事故非发生不可，甚至没有弄出事故的可能性。事故不过是几种所谓的巧合聚在一起的结果。



至于1914年大战的根源，我觉得追寻探索是容易的，也是困难的。我们认为，毫无疑问，当时的危机以及人们害怕即将发生战争，都是由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引起的。但人们当然不能把这说成是起因，说成是引爆战争的雷管。然而，人们可以说，维也纳政府采取的行动有造成战争的可能性。事后盘算可能性永远得不出严格的结论，但可以通过比较做一些估计。比方说，比较一下，发生了事故情况是怎样的，不发生事故情况又会怎样。人们可以对每一个行动（此处说的是战争的事前因素）提出问题：当事人能够和应该预见的后果是些什么？此外，正如在人类事务中一样，因果关系与责任或罪责是分不开的。人们思考到什么程度，行为才成为主动的行动？这一主动的行动，是否符合外交世界的习惯和道德规范？当事人的用意何在？在我看来，最要紧的是通过动机或环境的逻辑为一方，通过分析因果关系为另一方，来区别对于人类行为的理解。如果事件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问题或者在于历史的因果关系，或者在于社会学的因果关系，用今天我爱用的词汇来说：或者努力确定能够解释事件的规则或规律（规律确定X事件发生在A、B、C环境之中，如果我们认为A、B、C已经确定，我们便认为X事件已经得到了解释），或者通过事后计算可能性，既不忽略规律，也不忽略一般，来努力衡量各种事前因素各自的因果关系。

169

分析1914年大战的根源困难不少，尤其因为危机仅仅在几天之内展开，而各种行动前呼后应。有些行动历经了专案调查，比方说奥匈帝国政府拒绝答复塞尔维亚，俄国总动员等。并不像有些读者想的那样，我的书探索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而根本的相对性影响了探索。我反而认为这并不影

响，但是，明确的、证实了的结果是探索不出来的。俄国既然以南斯拉夫人的保护人自居，那么根据当时的结盟体系，奥匈帝国势必会引起全面战争。但是，战争的危险性（或可能性）到底达到什么程度？维也纳的部长们究竟用心何在？170 维也纳的要求到底正当到什么程度？当事人绝不会公正不偏。史学家能做到不偏不倚，但他们无法像预审法官那样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

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具有普遍性的命题，而我正想展开我的研究来加以证实。我说：“理解联系着动机和思想的内在的可悟性。因果关系，首先旨在观察各种正常性而确定必要的关系。社会学家致力于发现因果关系，在这个范围内，他有正当的理由不去理睬，而且应该不理睬合理连续性的真实性。他对待历史现象，如同客体，或者用传统的说法来说，如同对待一些物体。”在不远的上文，我区分了三种意向性：裁判的意向性、学者的意向性、哲学家的意向性。裁判的意向性，可以这样来问：谁错了？什么错了？学者的意向性是，确定并存或接班的经常关系。哲学家的意向性在于，拉拢和联合上面两种研究，在整个历史决定论中把它们放在它们应有的位置上。

唯一值得重提的，只有讨论因果关系那一章的结论，也就是历史天地里的内在多元性。一个社会，一种发展，都算不了总体。同样，我们都抓不住一个人的最后意图，一个人的意向（或他的悟性），也不能够一眼便看透宏观世界、一种文化的全貌，甚至看不透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一桩宏观事件。这种多元性，来自人本身的多元性，来自生活，来自意识，来自思想，来自决定论的碎片性（决定论如果用来解释一桩事件就带有短暂性；如果用来重构规律就带有片面性）。但是，任何叙

述、任何解释，都同时使用理解认识和因果分析。片段的决定论挂在一种结构上面，这是事实和各种大局的结构，而因果关系则由可以理解的关系加以阐明。依据马克斯·韦伯的公式，也依据一切社会学家和史学家的实践，因果一致化和理解一致化是互相得力、互相证实的，尽管二者各自有其本身的意义。 171

我觉得拙作第二章论述的理解问题是没法概括的。然而，我仍然想试一试：根据亲身经历或者根据文献资料，描述构造对象的各种现象、自我认识、对他人的认识、对一场战役的认识或对各种思想的认识。我想弄清楚亲身经历和从中得出的认识二者之间的距离，也想搞清楚解释的多元性、来自人物对象的本性。我写道：

历史科学是一个族群自动采纳的意识的一种形式，是集体生活的一种因素，如同自我认识，是个人意识的一个方面，是个人命运的一个要素。历史科学的发展与当前形势有关，而当前形势本来就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历史科学的发展与学者的意愿有关，而学者既不能超脱自我，也不能超脱自己的对象……此外，史学家对历史人物来说是外人。作为心理学家、战略家、哲学家，他总是从外面观察一切。他既不能想他的英雄，一如英雄自己所想，也不能观看一场战役，一如一个指挥官所亲身经历、所亲眼见到。他也不能够理解一门学说，一如创始人所理解……反正，解释行为，或解释作品，我们都得从观念上重新加以构造。而我们却永远有权在各种体系中进行选择，因为思想是生活中固有的，同时又是生活的升华。在精神天地中，自在和自为的一切杰作伟业、法律的逻辑、经济

的逻辑，都存在于社会现实的内部，而高于个人的意识。

172 这种理解的多元性并不等于相对论。一部宏伟的杰作、一件艺术品，或者一部思想的作品，如果很含糊不清，谁也不能竭尽其全义，那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解释。解释的多样化象征着人类创作的丰富，而不是我们的学识靠不住。当然，实证主义的史学家可以反驳说，解释这些作品超过了真正的历史认识。然而，我觉得，绘画史或思想史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部分解释，而这与解释者的为人是分不开的，但不会因此而贬低解释的价值。同样，历史事件的解释可以被一种新的概念体系或史学家研究时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不断更新。有了新的观念体系，或者后来的史学家意识到了当时没有意识到的一些问题，原来的解释就该更新。一部《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并不一定歪曲现实，哪怕许许多多当事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史学家从中涉猎的一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派史学家帮助我们从另一个时期来看待雅各宾党人。反正，人生的意义只有到了最后一天才能下定论。一部国史的某段插曲，同样通过其较长的发展而最终改变形象。

建造历史天地，一如我所描绘的那样，并不意味着搞相对论，而别人老说我搞相对论（其实也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比方说“对象的溶解”这样的说法，今天看起来显然咄咄逼人，而且自相矛盾。但是，只消重新看看一个概括性的段落，印象就变得完全不再是一码事了：

在科学之前，没有现成的历史现实，只消一成不变地搞个翻版。正因为历史现实是关于人的，所以是模糊

的和无法穷尽的。为什么是模糊的，因为精神世界的多元性反映了人的生存状况，各种思想和初级行为在体系的多样性中占有重要地位。为什么是无法穷尽的，因为人对于人，作品对于阐释者，过去的事情对于连绵不断的现在，等等，这些意义是挖掘不完的。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都观察到，必须努力超脱，趋向客观。按照自己的主观爱好，选中一个体系，那么认识便是片面的（用合理性助其成长，用动机论去打压），就会忽视重建一个可以对行为人抱同情态度的价值体系或学识体系。同样，对于各种思想的理解，如果完全摆脱作者的心理，以至于借口把生命“还给”过去，或者从作品中得出永恒的真理，把各个时代跟宇宙混同起来，那么理解就将是专断的。

然后，作为结论，我说：“这种超脱和占有的辩证论，要肯定的不是解释的不可靠，而是思想的自由。”我认为拙作的开头解释克劳塞维茨的一章内容，谈的就是这个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但同时强调另一方面：做解释的人若要忠实于作者的意图，就会受到种种束缚自身的压力。

我自己寻思，哪怕像“理论先于历史”这样的说法也不见得像看起来那样离奇。如何解释一部哲学著作，取决于史学家自己的哲学观念。对于宗教史学家也是一样。当然，理论先于历史是逻辑问题，而不是心理问题。史学家解释一部作品，同时发现哲学的意义和作品的意义。但是，哲学的意义决定作品的意义。

同样，某些思想其实平淡无奇，仅仅因表达方式而显得离

奇：“在人生的历史中，青年时期对宗教的惶惑不安随着日后的演变而将具有不同的意义。我没有宗教信仰，事后认为这是青春期的偶发症状，至多只值得在回忆时，在记述中一笔带过。一旦有了宗教信仰，旧日的不安便会被排除，获得一种征兆或证据的价值。”虽然萨特在他的《存在与虚无》一书中重新摆出这一思想和例子，但并不意味这种思想有什么出奇，有什么别致。再举一个例子，这和政治史实有关：

自从希特勒取得政权以后，布朗热将军得势，便跟希特勒得势不一样了。第三帝国改变了1923年政变未遂的形象。魏玛共和国也成了旁的东西，因为国社党独裁<sup>①</sup>暂时给了魏玛共和国一种感觉，仿佛它就是两个帝国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人民阵线的经验逐渐向后来的史学家揭示出它的重要意义。后来，它被引向新的社会制度，或者被引向反动，它的形象将会真正地不一样，而正因如此，所以没有现在的历史。同时代的人不偏即盲，一如当事人或受害人<sup>②</sup>不偏即盲。科学所期待的不偏不倚并不那样要求感情的冲动应逐渐平息下来，也不那样要求文献材料应堆积如山，而是要求看结果。

我在上述引文里把一些有争议的话标为黑体，这些话也许是辩论的焦点。人民阵线的重要意义必然取决于它的结果，但这种意义难道不在事实本身以外吗？该不该说，魏玛共和国之

---

① 很久以来，我不再用“独裁”一词的这种含义。我用它来指古罗马的制度：绝对的、合法的、短期的政权。

所以真正成为另外一码事也是取决于它的结果？简而言之，我曾经间接肯定，史实的意义同史实本身是分不开的。40年后，我写了一本书，名叫《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世界中的美国，1945~1972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碰到了麻烦，拿不定主意，倒不是作为理论家拿不定主意，而是作为实践家拿不定主意。我一心想确实搞清楚怎样恢复史实的原状，就像当年的当事人和旁观者所亲身经历的那样，然后，搞清楚这些史实在共时的和历时的背景中所占的地位，最后搞清楚史实的意义。举个例子来说：我在书中陆续叙述一系列外交和军事决策，这些政策造成了1956年（或1961年）至1973年（巴黎协定）或1975年（美国撤军）的越南战争，并成了这场战争的里程碑。叙述本身就算不一定强迫别人接受某种解释，但至少提出了某种解释，暗示答复以下问题：美国的干涉是否出于实施其遏制学说？战争越拖越长，是否由于官僚主义的惰性？是否由于骄傲？是否由于无能，没有本事采取一项战略，没有本事锲而不舍？是不是因为帝国主义妄想控制全世界？最后，这一仗是否造成了美国历史的断裂？是不是同时造成了国与国关系的断裂？是不是美国世纪从此结束？是不是苏联就将上升至首位？

这个例子使我不能不改正上文强调过的话。史实的历史意义和作用会随其结果而改变。史学家则经常把这种解释插在叙事里面。但是，我认为史实及其结果在逻辑上是分得开的。何必再说什么过去变成另外一码事，我本来可以说：能从事后来看的人，在他们心目中过去会具有另外一种意义。而且，就大革命来说，任何革命史都离不开解释，因为不论是选择事实，或是选择概念，都要求恢复真相。所以，我愿意删去原来说的话，免得被误会，说我否定写现在的历史。今天有那么一种派

头，可以称为即时历史，或者叫现在历史，这类历史大体上只能为将来的史学家提供原料，但我并不拒绝给它存在的权利。

175 拙作不单为历史知识的认识论做一些贡献，同时也合乎我向读者表明的意图：“1930年<sup>①</sup>，我下决心研究马克思主义，为的是从哲学上对我的政治理念做一次修正。”分析历史的因果关系可以为一种理论（或者说一种理论的草图）——行动的理论和政治的理论提供基础或介绍。整整这一部书说明的是，我从那时候起就在用的政治思维方式。剩下的我要到暮年来加以说明了。我不免有点经院文风，把阶段一分为三：选择阶段，决定阶段，寻求真理阶段。

按逻辑说，最要紧的莫过于接受还是不接受现行的秩序，即赞成或反对存在的东西，这乃是第一次抉择。改良主义者，或者改革家，与革命家是对立的，革命家不愿改善资本主义，而要消灭资本主义。革命家摧毁自己的环境，争取调解自己的矛盾，因为不管是否愿意，人总是社会关系的俘虏。人和社会关系不协调，就没法跟自己协调……革命者没有纲领，要有也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纲领。说他有主义，也就是说，想象出另外一种体系，把现时变得一片神光，而且很可能无法实现。话虽如此，若要看清楚一场革命究竟是先见还是空想，还非等到这场革命完成以后才行。所以，如果一定要讲主义，那就会自然而然加入革命行列，因为革命家答应承诺的东西通常比别人多。想象的妙用必然胜过现实，甚至胜过使用谎骗手段歪曲或

<sup>①</sup> 我觉得说是1931年大概更确切。



神化过的现实。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知识分子胸怀偏见，总喜欢那些号称先进的党派。

在这一方面，我没有变。我之所以没有选择革命事业（在1937年，后来在1981年，这个事业是与共产主义事业，或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混在一起的），那是由于别人所说的我的悲观主义：“不必怀疑，直到今日，我们知道的任何社会都不公平（衡量的尺度是当今的公平观）。需要知道的是，如果有一个可以定义并能实现的公正社会，那么这是怎样一个社会？”我在法兰西学院讲授头一课时就自己承认，或者说得更好些，就宣布了一切社会种类之划分的失败。我今天还要补充说，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觉得社会不公平，甚于旧社会里的人对于旧社会的感受。理由很简单：现代民主社会提出的理想大体上都没法实现，而现代民主社会期望通过治国者之口来掌握自己掌握不了的命运。

176

优先选择拥护革命或反对革命，究竟意味着什么？最首要的便是要求尽可能严肃认真地研究现实，研究有可能取代现行制度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在我所理解的历史政治中，做出合理的选择不仅仅靠伦理原则或意识形态，而且靠研究分析，且越科学越好。研究永远不可能得出一个让人无法置疑的结论。研究固然不能以科学的名义强迫别人接受一种选择，却可以叫人警惕，避免陷入唯心主义的或者一厢情愿的陷阱。反过来，当然也不能说政治抉择不考虑价值观或道德。说到头，人们选择自由的和资本主义的民主，而不选择共产主义的方案，并不仅仅因为人们认为市场机制比中央计划更为有效（经济机制是否相对有效，当然是判断制度优劣的标准之

一)。但选择的标准还有很多：机构的效率，个人的自由，分配的公平，也许最重要的标准是，一个制度将会造就怎样的人。

当时，我对通达政治和理性政治做了区分——在此之后，我有好几次引用过这种区分方式。

通达政治家——马克斯·韦伯和阿尔——主张维护某些利人之举，如和平与自由，或者追求达到唯一的目标，即在杂乱无章不断更新的形势下保持国家伟大富强。他像一个领港员，心中无数，不知道该去的港口是什么模样。奉行手段与目的，现实与价值的二元论，既不把握现时的整体，也没有最终的前途，对他来说，每时每刻都是新情况。理性政治家则恰恰相反，他至少能预见短期的演变。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资本主义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问题在于使战术适应战略，让为未来制度所做的准备与现行制度相调和。

177

我提出通达政治和理性政治两种类型作为理想的类型，它们在现实中彼此不相排斥：“绝没有不服从长远打算的一刹那间的行动，绝没有无意的知心人，不去窥伺一些唯一的机会……政治艺术在于既能做出无可挽回的选择，又能制定出长期的谋略。”最后一句话几乎不加修改，便可适用于新闻记者或评论家：解释时事有价值，仅仅在于既能抓住事件的独特性，又能知道事件在总的体系和前途中的地位。

行动的第二步，我把它叫作决定，也就是个人在政治选择中的担当。

对一个真正的人，选择不是一种外在行为，而是决定性的行为。通过这一行为，我介入并且判断我认为我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环境。在历史中的选择，其实同对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混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决定的根源和目的都在于我本身的存在。

我把拙作中的这一节内容命题为“历史的人：决定”，可以说是提高了政治的身价。政治的历史的决定，也就是各人对自己做出决定。

在罕有的太平时期，私人生活在公共事务的边界外进行。各人搞各人的职业，对政权既无所期待，也无所畏惧，或者说，差不多无所期待，无所畏惧。政治似乎是一门专业，由以政治为职业的人去研究。这一门工作不过是各种工作中的一种，可以使人激动，但没人太认真对待。非得要打起仗来，人们才会重新认识到自己是一名公民，不单单是个人。不管是阶级还是政党，集体有权要求每一个人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国防，或献身于革命。个人是属于历史的，一定要冒最高的风险。

我在1937年写了这几句话。当时，人民阵线政府正在叫法国人互相对立，而第三帝国的战争魔影正在移向并逐步笼罩法国。法西斯还是共产主义？抵抗希特勒还是向他屈服？固然“政治选择有可能引出某种死亡的选择，但也总意味着某种生存的选择”。既然有希特勒和斯大林，我就有理由一再肯定，政治抉择会引出对整个社会的选择，而且决定不仅关系到当

事人，同时关系到他的处境：“人们在追求某种社会秩序的时候，也在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我发现了我的处境，但是只有接受或反对这一处境，我才承认这真是自己的处境。换言之，在确定我所要求的处境时，我才承认它是我的处境。选择处境是对自己做出决定……决定与选择具有同样深度的历史性。决定创造出我的精神天地，同时也确定我在集体生活中要求的位置。”不管政治的悲剧性如何使我念念不忘，但我已经意识到了政治彩头的局限性。我说：“革命不会把什么都打乱。事物的一贯性总归超过了着魔着迷的人的想象。思想不会完完全全当共同命运的俘虏。”同时，我又指出那种不可避免的悖论，或者应该说是担当的绝对性与事业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我说：“在我们这个盲目信仰的时代，人们比较希望人人能记得自己追求的具体目标不是别人揭示的，而是根据大的可能性拟订的，而且不应该像形而上的宗教那样把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治体。人们想强调舆论的不可靠，而不怎么强调站定立场的绝对性。只要还有讨论的余地，那就最好记住，若无宽容忍让，便不可能有人类。人们还得记住，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完完全全的真理。”然而，“为了一项历史任务，每个人都应该担起风险，而对他来说，风险胜过一切”。

拙作的最后四节中阐释的哲学暗示了关于人的某种理念，这个人首先是要主动介入，通过他对已然融会贯通的客观精神的判断自行其是，努力使自己的处境符合自己的选择，从而做出自己的决定。我写道：

人意识到了自己是有尽头的，认识到了自己只活一

次，而且生命是有限的，那么如果他不放弃生活的话，就该全心全意致力于自己为之献身，从而为之增添价值的事业……所以，这不是向流行一时的悲情哲学之风让步，不是把某个动荡时期的恐慌同一种常态混为一谈，也不是沉浸在虚无主义里面，而是提醒人们怎样确定自己，提醒人们人的使命是与虚无拼搏。所以，恰恰相反，这是肯定一个人有力量创造自己，判断自己的处境，并且选择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个人才把自己承担的历史变成自己的历史，而后纳入真正的自身。

179

还剩下一个主要问题：如何理解历史——现实？各种人类社会算在一起，成不成一个统一体？能不能把成千上万种人类群体汇集起来，从旧石器时代的群体和新石器时代的部落，到当代的帝国和民族，都纳入历史这一概念？我只谈七千年中发展和繁殖起来的各种集体单位和精神宇宙。我可以肯定——当然有点大言不惭——人有一部历史，或者说有“一部没有写完的历史”。这样的提法大概含有对康德的怀念。

我觉得，最后几页内容显得有些紧张，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紧张。一方面是我的思辨，另一方面则是我对历史经验直接的和感性的反应。“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对自己是无法替代的，对有些人也是无法替代的，有时候，对人类本身也是无法替代的。然而，历史给人们带来可怕的末日。只要不用暴力便没法改变社会，那就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为历史的终止而牺牲人，而历史终止在人间。“历史之高，直拔魔域，欲凭道义来裁判当事人及其作为，未免肤浅可笑。如凭爱的规律或凭善心的要求来衡量历史，那么历史便该

被全盘否定。当领袖的人或当主子的人，该不该按常理来要求他们？领袖也罢，主子也罢，既然是众人里面的一个人，那又怎能说不该？如果说这样的人要对事业成就负责，对后世负责，而不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就只能说不该按常情来要求他们。”

180 人的命运既然是历史性的——人生有尽，而功业不朽，人生立志，超越人生，超越白驹过隙的年华——那又怎能不问问，历史的终结何在？不是人类宇宙论的终结，也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终结。人类已经没法在大陆上生存，自然势力或人的丧心病狂已经把大陆弄得没法住人。所以我指的是康德或黑格尔设想的终结。就是说，人类会达成他们的使命，也可以说，会实现人人所追求的真理。

这个真理应该超越活动和价值的多元性，否则，真理便会重新堕落到与个人意志互相矛盾的水平。真理应当是具体的，不然一如伦理准则，将处于行动以外。真理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有如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目的。人取得了应对自然的力量，也逐渐取得了相等的力量，来应对社会秩序。有赖于参加这两项集体事业，国家把个人变成公民，文化使人人都能接触到共同的收获，人才有可能运用自己的禀赋和履行自己的天职：调和人类与自然界、本质以及存在的关系。

我还补充说：

理想大概是不明确的，因为对于参加与和解，人们

的想法很不一致，但至少，理想不是天使式的，也不是抽象的。

我在后来的一些著作里尽管还保留一些怀恋的情绪，但很少提起这种对于理性的想法，也较少提及历史的终结。战后，我责备萨特和梅洛-庞蒂混淆了个别的目的与历史的终结。因为这样一混淆，就助长了狂热主义，这样一混淆，便神化了阶级斗争、党派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有穷尽的，不是永恒的善和恶的斗争。也许最后几句话的笔调在今天看来太过凄怆：“存在是辩证的，也就是说，是戏剧性的，因为存在活跃于矛盾的世界之中，不顾时间长短，投身世务，寻求真理，而真理却逃之夭夭，除了片段的知识、形式的思考，别无其他保证。”我既不幸灾乐祸，也不灰心丧气，我只不过提前体验世界大战，而在里雅尔大厅里审判我的人，却不觉得战祸正在逼近。

伯纳德·格罗修森却清醒得多。他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写道：

雷蒙·阿隆及其同代人的历史观，是不是比较接近狄尔泰的历史现实主义，而不怎么接近齐美尔、李凯尔特和韦伯……他要揭示历史的奥秘……这是整整一代人要通过了解历史的奥秘来探究历史的命运，或者说得恰当一些，克服其命运。阿隆的书体现了新一代人的慷慨悲歌。有些事情在发生，而我们却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今后到底会出些什么事？阿隆是有作为的，所以跟他的时代连在一起。对于这个时代的事情，他担有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作

品往往显得感情冲动。表面上，感情冲动是知识性的，但其中总让人觉察出一种公民的忧思和不安。

那时候的我离战后的我已经相当近似了。莱昂·布伦什维格在一次博士论文评审会上对我说：“这本书包含一个要耗一生的计划大纲。”他说的是真话。这个计划大纲是无限的，永远完不成。

战争在即，我要赶在战前把书写出来。我恰好收到了两封信，这两封信不仅感动了我，而且给了我写书的信心。一封是亨利·柏格森写来的：

我亲爱的同寅，我的健康情况迫使我停止通信达几个星期。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我没能及早向您道谢，感谢您惠寄大作《历史哲学导论》。我一接到书便倾心拜读，只觉妙绪泉涌，大获启迪。若必欲加以责难，只能说它迫使读者思考的问题过于广博。当然，这不过是“快乐的过失”。职是之故，若不拜读再三，实难窥其全豹。只消一有可能，我定要重新拜读一遍，并以尊见与鄙意不谋而合之处作为索引，特别是探讨交切对证与时后回顾的效果。此是后话，现在，我首先要向您写出此大作一事道贺，并向您表达我的友情。

亨利·柏格森每逢接到作者赠书，无不作答，而且对于作品，总是十分宽容。所以，这封信不一定体现出这个哲学家对于这本书的真正评价。我的堂兄埃米尔·阿隆医生在战时曾护理过柏格森。他向我保证说，柏格森对我这个青年哲学家确曾



寄予厚望。

另外一封信是让·卡瓦耶斯写给我的。他是高师全体师生一致敬佩的对象。几年后，这个卡奥尔区抗敌领导人来到伦敦，在我家住了几个星期，从此我们成为莫逆之交。他书中说：

蒙惠书，多谢。暑假奉读，精彩异常，不胜钦佩。大作分析精辟，笔力面临全局，始终如一，捧读之余，乐不可支，尤于诸多变局，揭示真谛，察微烛幽，而悉心务求真实，令我益深感佩。至于种种区分（首先是理解与因果的总体区别），对韦伯决定论的批判，对于概率的阐述，可谓光华夺目，诚为学术中盛举，意欲把晤详谈，故未及早奉复，继思如无真知灼见，晤谈亦无大益。及今之计，首在拜读之余，先表感激之情……至于书中第一节，认识自己与认识别人几段，尤为哲学的中心，多年所读法文著作中，当推此为魁首。 182

吕西安·列维-布留尔和我本不相识，居然表明渴望同我约见。与他的长谈使我肃然起敬。他本来致力于哲学，后来虽然改行研究社会学，仍不失为哲学家。许多年间，法国哲学教席大多由他决定任命。他公正不偏，不论是亲故知交，或是学杰同气，哲学观点近似他的实证唯理观点，从来一视同仁，绝无厚薄，这是任何人都深信不疑的。我们的谈话内容大部分关于战争。他虽然是和平主义者，痛恨战争，但对于战争临近，既不怀幻想，也不至绝望，明知惨祸即将来临，但仍保持了精神上的信念。不幸几星期后他便谢世。我觉得他留心世务，待

人接物，友好而并不吐露衷曲，蕴藉含蓄，绝无丝毫凌人  
之气。他年事虽高，但容颜未变，只觉粹气凝然。他毕生治学，  
功业已就，但自知学无止境，求知依然孜孜不倦。这一次晤  
谈，我得益匪浅，终身永记。他气度非凡，不愧学术泰斗。可  
惜，当时我错误地认为他和我的意见时常相左。

## 第六章 浩劫之路

从1934年到1939年，我没有参加任何政治讨论或学术讨论，但对于时局非常关心，可以说忧心如焚，寝食以之，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追记一下这些患难深重的岁月。我内心上感到国家被撕裂的痛楚，预感到滔天大祸正在窥伺着法国人，而法国人互相对立，哪怕国难当头也不肯凝聚在一起。 183

这一时期的伙伴大都已经不在人世。今天的知交已都属于另一世代。他们对于战前的东西都是从书本上认识的，他们不容易懂得法国的衰败没落。年纪轻一些的，连冷战年代的巴黎气氛都不甚了了。我有一些朋友比我晚二三十年才去思考一些政治问题，这几章内容就是为他们写的。

从1929年到1931年，法国没有太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像英国和德国那样饱受大规模失业之苦。1931年，英国国民联合政府不得不决定开放并挽救本国的经济，一面同意让英镑贬值，一面听凭币值随市场涨落。当时，绝大部分原料都以英镑作价，所以各国的原料价格都随之下跌。举法国为例：法国还没有改变本国货币与黄金平价的情况，或者说，还没有改变与世界市场上主要货币的汇兑平价的情况，其实两种平价本是一码事。

雷蒙·庞加莱在1926年没有算准稳定法郎的汇兑率，把汇率定得太低，以至于国家存积了许多黄金。从1931年开始， 184

又起了倒流的势头，货币增值，黄金外逸，其恶果为害迅速。受到保护的部门，也就是说与世界经济没有竞争的部门，维持住了本部门的价格，而对外开放的部门却失掉了市场，只好到帝国内部寻找市场，代替失去的世界市场，从而不得不降低产品的成本和售价。从1931年到1936年，历任政府，从温和的左派（1932年）、中间派到右派，不管风向如何，潮汐如何，无不坚持这一政策。等到赖伐尔上台执政，他仍然彻底推行旧政策，断然下令全面削减公职人员的俸给、预算支出、生产成本等。他的顾问，首先是雅克·吕埃夫（Jacques Rueff），劝他把法郎贬值，作为辅助措施，但是他不肯采纳。历任政府——杜梅格政府、弗朗丹政府、赖伐尔政府都对法国的经济惨剧负有责任。1931年，法国坐在黄金堆上，逃过了经济大危机。1936年，总罢工震撼全国，国家似乎正濒于内战。在所有工业国中，只有法国没有从1936年的危机中解脱出来，而生产再也没能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历任政府，除保罗·雷诺一任外，始终没有明白这种货币政策上的爱国主义是多么荒唐。

这便是罗贝尔·马若兰、好几个朋友和我自己心目中的时代背景。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以及历任政府——政府部长和负责国家经济的人不肯做出决策来应对英镑与美元的贬值，弄得我国的经济长时期在物价低落中挣扎，使得国力日益不振。通货紧缩影响工人生活。劳动者经常受压，不得不拼命生产廉价商品，这种压力愈来愈大，问题不尽在老板不人道，而在币值过高所产生的压力。我们眼看着这种自杀性的错误却无能为力，焦急气愤全不顶事。

前台上演的是党派竞争不绝，报纸上大事渲染财政丑闻，

使党派仇恨白热化。1934年的暴动并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法西斯党在鼓捣煽动。斯塔维斯基的丑闻，警察厅高级官员调任法兰西话剧院的怪现象，拉·罗克上校铁十字党游行示威，治安人员时而袖手旁观，时而大打出手，这些事共同造成了2月6日的历史事件。这真是法国的拿手好戏。1968年5月事件再一次证明法国在这方面大有可为。我当时在勒阿弗尔市，远远观察这些戏文一幕幕上演，而日夜为之不安的，已经是外患日迫的凶兆。我当然反对法西斯，但是如果政府单单依靠半个法国，那又怎能抵挡希特勒的气焰？

1930年代，我拒绝参加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防范委员会，主要的理由一共有两条。其一，按意大利和德国两个先例来说，法国并不存在这样的法西斯祸乱。拉·罗克上校只像一个退伍军官的头头，并不像能哗众取宠、煽动群众的愤怒的人。其二，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的组织聚拢了阿兰派（首先是和平主义者）、共产党人或者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不褪色的社会党人。这些人都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但在关键问题上，即对于第三帝国的态度，意见却不一致。从1935年起，赖伐尔访问莫斯科，两国政府发表共同宣言（斯大林在其中肯定说他理解法国在国防上的要求），法共取消了《人道报》的“牛嘴”栏，清算了原始的反军主义，高高挂起三色旗，加入了反法西斯联盟。如果重新用莱昂·勃鲁姆的字眼，我们早已领教过这种“外国国家主义”了。对其盟友的意图持怀疑态度的不只是阿兰的拥护者：他们的用心所在，究竟是防止战争，还是把战争推向西方？苏联同德国并没有共同的国界。波兰和罗马尼亚固然怕西方的潜在侵略者，但也怕东方的所谓保护人。

我对任何党派都不赞成，对它们的建议也不赞成。每一件时事，诸如德国恢复兵役，阿比西尼亚战争<sup>①</sup>，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区、1938年开进维也纳，《慕尼黑协定》，都引起了大辩论，正中法国知识分子的嗜好。这里面既有国家利益的考虑，也有意识形态的激情。

186 1935年年底，墨索里尼远征埃塞俄比亚，迫使法国外交做出惨痛的抉择，象征了政治的伟大与屈辱。赞成或宽恕意大利的侵略，势必动摇法国对外活动一贯主张的道德原则，否定国家领导人在日内瓦的发言和声明，否定为国家与和平事业发表的种种言论。而采取有效措施，制裁意大利的侵略罪行，又会打破1934年形成的统一战线。那时候，陶尔斐斯总理在维也纳遇刺，从而促成了这一战线。同时，对意大利的制裁也会把意大利的法西斯推向德国的纳粹势力。而英国政府忽然信奉起了集体安全说，要动员国际联盟声讨意大利，维护国际公法。法国政府也怕跟英国分道扬镳。

不管怎样，反正这一次危机引发不了战争。意大利法西斯没有本事反击石油封锁或英国皇家海军的干涉，后来的大战证实了这一点。如果英、法联合起来成功鼓动国际联盟声讨意大利，法西斯能否幸免？大家争论了半个世纪，都认为很有可能，但毕竟没法证实，道理是，法西斯丢不起脸。

所以，知识界的争论还早于外交界。意大利的军队一开进埃塞俄比亚，《当代》杂志便在1935年10月4日刊登法国知识分子的宣言：《保卫西方与欧洲的和平》。这里摘录数语如下：

---

<sup>①</sup> 即埃塞俄比亚抗意战争。——编者注

目前以制裁威胁意大利，足以发动空前战祸，我等法兰西知识分子，执意向全体舆论宣布：我等既不要制裁，也不要战争。

换言之，宣言上署名的人，以亨利·马西斯（Henri Massis）为首，居然把制裁与战争等同起来，而至少战争是不太可能的。

肩负国家命运的人，当其行为危及文明的前途时，凡是致力于精神思想的人，理应大声疾呼，呼吁理智。有人要鼓动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反对罗马，不惜借口去非洲支持一伙野蛮部落的独立，而把意大利当作罪犯，从而鼓动大 187  
国自相残杀。这样的联盟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败坏西方世界的正当利益，而使整个文明世界同受挫折。能作此想，已显得精神有病，同时暴露出传播文明精神者竟甘心自暴自弃……

下文又说什么“文明成果”，“一切无政府主义，一切乱党，结成联盟，打击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 15 年来肯定了、提高了、组织了并壮大了高级人类德行的精华”。这样吹捧法西斯德行和西方传播文明的使命，这样的文章假定还有余孽幸存到今天，那也只能躲藏在边缘的阴暗角落里，而在那时候，却表达了右派的思想感情，加布里埃尔·马塞尔、让·德·法布雷格（Jean de Fabrègue）等人，都在黑名单之中。

左派天主教徒或基督教民主人士发起另一号召，反驳上面那个宣言。引用的论点不一样，结论却如出一辙，反正是不应

采取一些加剧战争危机的措施：“……应当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世界没有力量以武力干涉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如果硬要去做，势必惹起祸事，比这场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可以说，他们已经承认，不用武力，制止不住意大利，而对意大利用兵，必将燃起欧洲的战火。基督教左派也说什么传播文明事业的完成“不是没有犯过重大错误”。又说：“人们应当认为这是精神上的大失败，因为西方殖民事业的恩惠在殖民地人民看起来情况再清楚不过，破坏手段的优势只为暴力服务，而人们居然还说，这一场违法的战争不过是轻微的过失，因为这是殖民事业……也有必要揭发种族不平等的诡论。如果人们要说，某些民族的文化不如另外一些民族那样先进<sup>①</sup>，这只不过是指出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是，由此而暗暗肯定，一种本质上的不平等决定了某些种族或民族必须向另外一些种族或民族称臣效忠，改变了公正与不公正的准则……”他们对于马西斯宣言做出的道义上的谴责确实毫不含糊，可惜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行动，与右派所提出的泾渭分明。文章只排除武力，而制裁两字，连提都不提，根本没说若不动用海陆军，制裁或许也能生效。反正，全体基督教知识分子众口一词，拒绝使用武力，拒绝打仗，甚至拒绝冒战争的风险，因此异口同声，写些虚无缥缈的妙文。

至于左派的反驳宣言，则有《争取尊重国际法》。文中言道：

署名人……不禁十分诧异，在法国人的笔下居然会读

---

<sup>①</sup> 这种说法暴露出历史的“进步论”哲学。



到，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想法完全违背我们的传统，在我们知识界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显得那样不齿于人……署名人一致认为，法国政府有责任同各国政府通力合作，争取和平，争取尊重国际法……

防范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们赞成最后这一项建议，因为这只要求尊重国际法，以保障和平，同时小心翼翼地规避反驳另一方面的论点：是否应该运用威胁或武力，迫使人们尊重国际法？大概是在拥护真理联盟的一次讨论会上，我分析了集体安全所要求的各项条件，让·瓦尔马上敬而远之：武力之物，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概拒之于千里之外。在这一点上，一切知识分子都是人以群分，既不能在采定立场之后，服从立场的逻辑发展，又不能承认每每承担眼前的风险都可以预防几个月以后或几年以后严重得无可比拟的风险。

埃塞俄比亚的危机尚未结束，德国军队又开进了莱茵区。希特勒不顾军师们的意见，派出几支国防军，开进非军事区，同时不免对指挥员做了保证，只要法国军队以保卫《洛迦诺公约》的名义做出反应，德军立即撤退。这时候，萨罗政府离大选只有几个星期。陆军部长摩兰将军声称，法军干涉莱茵区，必须先行动员。一个号称大国的执政者，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影响祖国和世界的命运。希特勒在 1935 年已经恢复了征兵制。不到一年工夫，一支小小的精锐部队要改变成国防军，显然不大可能一蹴而就，德军总部也不可能同意仓促相并。当然，莱茵区本来属于德国，希特勒再次援引排除歧视的原则，而原来的战胜国已经再也不敢反对。然而，公约是德国自愿签订的，重新占领莱茵区乃是破坏公约的行为。莱茵区的

非军事化并不等于割掉帝国的一个省份，也不剥夺居民的自由权，其用意只在于预防万一。德国总理在执政前不是早已宣布过他的种种计划吗？

知识分子对此是怎样做出反应的？德军开始行动后一两天，我在圣米歇尔大街遇见莱昂·布伦什维格，我们谈到了时局。他说：“这一次，还算好，英国人使劲叫我们别太冲动。”（那时，外交部部长弗朗丹正在伦敦。）我尽力想向他说明莱茵区重新军事化的重要意义：我国结盟政策全部落空，从此不能再救援捷克和波兰，暴露出我国军事体制的矛盾，也就是说，军队旨在防御，而结盟政策却要求进击。这种矛盾是我们小组的人谈论最多的。布伦什维格听罢，将信将疑，有点心灰意懒地取笑自己说：“幸而我的政见根本无足轻重。”30年后，在一次博士论文评议会上，朱利安·弗伦德（Julien Freund）和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也这样自我嘲讽。做政治思考并不难，但有一个条件，必须从中得出规律，而后服从这些规律。我可以同意思想家让别人去吃力不讨好，去思考行动，但是，他们又不甘心弃权。

法国知识界的正式代言人做出的反应，是不是具有较高的思想质量？E. 贝尔于3月11日在《玛丽安娜》上发表的文章颇不乏常识常情。文章的题目叫作《独裁者与讼师》，说的是希特勒的过河卒子已到了法国，而法国则还在斤斤计较如何打官司。他说：“希特勒先生一面向我国边境进兵，一面却向我们提出和谈。我们也应该一面提出和谈，一面部署兵力，要求盟国履行诺言，出兵相助。最坏的情况就是，一面刺激德国人的好战情绪，一面御之以浅沟低垒。”

而最下功夫、最有代表性，同时也最叫人惊愕的，要算里

维（Rivet）、朗之万和阿兰共同主持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防范委员会发表的文章了。我不想照录全文，讨读者的厌恶。文章一开头说：“片面废止《洛迦诺公约》，不管用什么理由来为自己开脱，反正在政治、法律和道义上，都是没法开脱的。”下文又说：“当前的争执并非德、法两国之争，事实上一方是德国，另一方却是《洛迦诺公约》的全体签约国和国际联盟。”文章从第一点到第七点提出：“几任政府对事态的发展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乃至形成目前的局面。”文章劝告法国“以最坚决的态度，一改长期因循苟安的错误习惯，而其为害最烈的，就是占领鲁尔区”。那么，结论是什么？“唯一的解决办法，既能维持各方面的尊严，又有利于和平，只有让德国在权利义务绝对平等的基础上，重返国际联盟……”接着，文章的第九点，为了顾全共产党的要求，明确提出：“……即使民主的法国能够克制自己对希特勒政权的深恶痛绝，为和平的大局着想而同意在国际联盟的范围内与第三帝国进行谈判，也不能承认第三帝国有权以西方文明的捍卫者自居，并拒绝与国际联盟的成员国苏联进行接触。”

这篇宣言文笔出色，论点充实，让·格安诺说它是“绝妙”佳作。而正是这篇宣言说明，反法西斯知识分子面对时局是何等天真。1936年3月7日，法国政府必须表明态度了：是或否，行动或容忍。除此之外，尽是空话，空话，空话。什么“第三帝国重返国际联盟”，空话连篇，毫无意思。思想运转空对空，无非是下意识地想掩饰自暴自弃。除了法国，各国政府官员大都理解局势的关键性。我以为，波兰政府已经表示，只要我们开进莱茵区，波兰军队就立即开进德国。然而，左派知识分子就是不懂，或者假装不懂。大家不妨再读一读让·格

安诺3月13日在《玛丽安娜》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他说：“第一次警报过后，全国重新恢复了理智……这样一篇宣言（防范委员会的宣言），只要法国终于有人能够起来代表发言，只要法国真的要，那么这篇宣言就能使这一次危机，使（希特勒的）倒行逆施，使这些暴行有可能产生和平，最终产生真正的和平，产生‘欧洲’。”多亏祖国儿女献出了130万条生命才取得的唯一和平保障，居然被唾手断送，根本没人想加以捍卫，而知识分子却齐声赞美，说这个国家的人民在警报过后一个星期居然恢复了“理智”。

也许应当引用一下莱昂·勃鲁姆的话。我当然绝不低估他的勇气和德望，但为他树碑立传的人往往掩盖了他视而不见的东西。他在4月7日的《民众报》上写了些什么？我们不妨来读一读：

《洛迦诺公约》的条文是毫无疑义的。德国军事占领莱茵区，等于没遭人挑衅而进行侵略，等于入侵一国的领土。法国政府完全有权认为，德国正规军开过莱茵河就是现行的暴力行为，就是战争行为，而且我要再说一遍，就是入侵。然而，法国政府没有这样做。我不相信法国政府曾有片刻想这样做。<sup>①</sup>我没听说任何政党、任何负责民意的机构，曾经责备政府没有这样做。政府不发护照给德国大使，不下动员令，不正式要求担保国立即履行它们无可推卸的军事义务，而只去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到底该用武力直接解决问题，还是通过国际行动，按

---

① 这话不对。内阁会议曾考虑过军事反击。

照程序，和平解决？法国政府成竹在胸，毫不犹豫。法国舆论也如出一辙。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不必稍存幻想，这是时代的特征。这证明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而社会党可以自豪地为自己请功。

莱昂·勃鲁姆难道从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吗？他身为一名国家领导人，却牺牲本国的利益，甚至牺牲本国的安全，来成全自己的幻想，把自暴自弃当作新世界的特征，难道他竟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战败后，他被捕入狱，在1941年也只承认了一半的错误。他说：

因为法国具有和平的气质，所以但求能够相信，“平安相处”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欧洲的民主国家与在那里扎下根的战时专制制度是可以相安无事的。法国为了这种可能性做出了越来越昂贵的牺牲，结果只能降低自己在国外的信誉，破坏国内的团结，从而越发加剧了国家的危难。

我不止一次听说，夏尔·莫拉斯和《法兰西行动报》的人，都属于马上看出1936年3月7日事变的严重性的少数人。但是，只消读读德军开进莱茵区以后的几期《法兰西行动报》登载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事实恰恰相反。这家报纸继续谴责对意制裁，谴责政府批准法苏协定。于是，这家报纸在8日的报上对法国人发出号召，文章标题为《你们想以假乱真吗？》。文中写道：

他们要为了一件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事，干涉盟友意大

利。他们要为共济会出气解恨，打击他们痛恨的法西斯。要为英国出力。要俯首听命于苏联，帮助苏联，利用战争，发动世界革命。为此，共产党人、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心甘情愿让法国去冒一切风险……他们刚刚投票通过法苏条约，让和平听凭莫斯科的摆布，听凭莫斯科的利益的摆布，听凭莫斯科的争吵的摆布。只消8天工夫，头一批恶果就已见分晓。希特勒撕毁《洛迦诺公约》，违背了《凡尔赛条约》最后的条款，莱茵区恢复军事化，德军直逼我国边境。

《法兰西行动报》和左派报纸异口同声“捍卫和平”。前者反对国际联盟投票表决对意制裁，后者反对用武力解决德国破坏《洛迦诺公约》一事。这些论战体现出了倒运年代的气氛。英国的舆论则迫使政府破天荒地认真对待集体安全论，甚至想  
193 拿来对付意大利搞的殖民战争。可是，殖民时代已经完结，而蒸蒸日上的的是德国的威力。法国不肯跟英国走。等到希特勒撕毁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一下子打乱了欧洲的均势后，英国人也就立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应对莱茵区恢复军事化，既不采取军事手段，也不采取经济制裁，只声称对于法国在中欧和东欧缔结的联盟不感兴趣。3年过后，英国却为了救援波兰而投入战争。其实，1936年3月7日以后，西方民主国家已经没法保护波兰。英国的外交并不比法国的外交值得宽恕。

3月9日《法兰西行动报》上有一段莫拉斯的文章，可以说是一种动员令：“整整两个星期，先是班维尔（Bainville），后是《法兰西行动报》，向共和国政府表示，时刻迟早总要到来，面对德国的得寸进尺、步步侵犯，应该说‘不’。这一时

刻果然到来了。这种残酷命运在劫难逃。”文章接着历数往日所犯的“错误和罪行”，特别是败走美因茨，并且初步总结说：“劫数是惨痛的，而且有可能非常惨痛，这是因为，职责愈重，尽职尽责的手段愈少，要用有效的行动，足够有效的行动来对抗昔日的战败国对战胜国的肆无忌惮变得困难了。”莫拉斯跟政府部长们一样，根本想象不到希特勒虚张声势，只想唬人，只消法国一出兵，他便鸣金收兵。除此以外，文章剩下的篇幅只表示国难当头，法国人仍然不可能精诚团结，同仇敌忾。文章说：“……政府要求法国人做出政治上的牺牲，而政府血淋淋的胡作妄为，所犯的血淋淋的错误，老百姓是从未沾边的，既然如此，政府就该以身作则，做出该做出的牺牲，走它的清秋大路：萨罗滚蛋！弗朗丹滚蛋！邦库尔滚蛋！凡是在法兰西皮肉上蠕动的蛆虫，像肖当（Chautemps）、让·扎伊（Jean Zay）那帮狗才，都滚蛋！”

3月10日，莫拉斯把话说得越发明确。他一开头就说：“首先，不要打仗。首先，我们不想打仗。不得不说这样的话，写这样的文章，特别是发表这样的文章，实在太令人伤心……”

随后几句话，说的是可能和应当发生的事情：“……星期六下午，希特勒的决定才刚刚发表，一个稳定的、协作的国家政府绝不会觉得事情棘手，因为这样一个政府手里肯定有军队，有装备，也有军火。凭合法的权利，凭公约，凭条约，这样一个政府肯定会在事态留给它的极短期限内，占领鹅步师团还没有来得及侵占的莱茵区各个要地……”莫拉斯接着又问，政府为什么不动，然后总结说：“48小时过后，事已至此，呜呼！呜呼！三呜呼！只剩下一句公开的劝告，奉献共和国政府：首先不要打仗……然后请诸公整顿军备。我们武装起来！”

武装起来！武装起来吧！”从这一天起，莫拉斯站稳立场，反对“好战分子”，反对“抗敌分子”，因为他已经预见到，法国必败。当然，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没有搞错。

我又援引两份报纸，一份是《秩序报》，另一份是《巴黎回声报》。在前一家报上写文章的是埃米尔·布雷（Emile Buré），在后一家报纸上写文章的是亨利·德·凯利里斯（Henri de Kerillis）。他们两位都以对希特勒的祸害认识得最为清醒而出名。前面一位正确地分析了局势，1936年3月8日，星期天，他写道：“领袖说，他背弃在凡尔赛和洛迦诺许下的诺言，是因为法国与苏联签订了协定。这个借口是毫无道理的。不幸的是，法国的一部分舆论被党派之争弄得对其视而不见，竟然同意这种说法……这是一场实力的较量，现在的问题只在于知道谁能成功。各国面临臣服德国的危险，会不会让领袖求之不得地从东方腾出手来。果真这样，我们就真的回到了1866年。”有人说，布雷跟苏联大使馆有往来。可是，他主张的不是进行军事反击，而是国家团结。他对前途已经有所预感。“今天破坏《洛迦诺公约》，明天搞奥匈帝国，然后这里来个突然袭击，那里来个突然袭击。他何乐而不为呢？一方面是拳师挥拳，另一方面却是讼师挨揍。”（1936年3月11日）

凯利里斯于1936年3月9日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人民阵线的罪状》。他说：“最荒唐的政策莫过于依靠莫斯科的共产主义，不管莫斯科在法国的代理人怎样阻挠军事拨款的通过，怎样破坏国家的防务……这样荒唐的政策只能把国家弄到今天这条绝路上来，国家还要蒙受历史罕见的奇耻大辱，直到滔天大祸的边缘。因此，我们前天曾苦苦哀求议员、爱国人士，万勿投票通过协约……”然后，他又谴责“可憎的制裁



政策”，“为了一桩殖民小事而破坏斯特雷萨阵线”。他又号召反对萨罗政府，成立国民联合政府，“摆脱共产党的精神和压力”。过了几天，他又在一篇文章的末尾说：“外御敌患，内肃奸谍，神圣联盟万岁！”

在事变以前，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曾发表文章，饶有见地，我至今记忆犹新。他告诉我发表文章的日期和地点（1936年1月25日，《新欧洲》杂志）。文中有些段落见解中肯，事后为历史和史家所证实，我摘录几段如下：

维持莱茵区的条约地位对我们而言性命攸关，而且是《洛迦诺公约》的根本所在。战后的英法合作关系体现在公约里面，而建立欧洲体系的其他方面也都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个公约作为基础。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表现出坚忍不拔的精神。只有坚忍不拔，方能保证和平……废止《凡尔赛条约》中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四条，对于战后的德国来说，等于在1914年把图尔和凡尔登送给德国。不过也有不同之处。德国在今天如愿以偿，要比以往容易得多，因为它要拿的东西本来就在它的国土上。所以，它觉得要干就干，不必征求我们的意见。其实，这是一种姿态，意在问问法国，如果东欧发生战争，法国将会采取什么态度？军事上毫无反应，将被认作足够清楚的表态。从此，德国在没有新情况时，可以不必再理睬我们而去准备东进战争。大概它还有这样的把握：有鉴于战争条件的改变，法国舆论竟会起来反对干涉。所以，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要赌一赌国运。最有害的幻想，就是一面妥协让步，一面妄想仍然对欧洲的现状起保证人的作用。最荒谬的东

西，莫过于自己情愿吃亏受屈，坐视莱茵区重新军事化，却还想在东方发生战争时进行干涉。莱茵区重新军事化，当然就是东进战争的序曲。再说，我们既然不能干涉，就不该再让欧洲各国人民仍然以为我们会进行干涉……

法布尔-鲁斯在1936年就采取了这个立场，那么，他在1938年赞成《慕尼黑协定》也就不足深究了。

德国国防军开进莱茵区几个月以后，人民阵线政府上台执政，不久便爆发西班牙内战。再一次，采取外交立场总是离不开意识形态之偏好；国家利益的概念在狂热的叫嚣声中销声匿迹。

我跟西班牙共和派人士心心相印。在我周围的人，做抉择是不成问题的。安德烈·马尔罗和爱德华·科尼格里翁-莫里尼埃 (Edouard Corniglion-Molinier) 马上动身前往西班牙共和国首都马德里。我在大学里的朋友罗贝尔·马若兰、埃里克·韦尔、亚历山大·柯瓦雷、亚历山大·科耶夫，他们做出抉择也都是不成问题的。将军们发动一场未遂的政变，然后进行内战，并从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希特勒的德国获得援助。乔治·贝尔纳诺斯 (Georges Bernanos) 是爱德华·德律蒙 (Edouard Drumont) 的门生，他曾写过一本狂热反犹的书，名叫《思想纯正者的大恐怖》，这时候，他又写了《月下大坟地》，控诉西班牙共和派。马尔罗和贝尔纳诺斯把各自亲历过的罪行做了比较。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 (Salvador de Madariaga) 后来跟我相熟，这时候，他超然居于论战之上，深信无论哪一个阵营取得胜利，反正在西班牙将没法生活。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没法生活，在共和派的西班牙照样没法生活，因为共和派已

经感染了共产病。在佛朗哥背后，出现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身影。共和派背后则是斯大林和他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他在战争的后方很活跃，而且已经在搞清洗了。

不干涉外交把人民阵线分为两派。一派是社会党人和激进党人，另一派是共产党人。安德烈·马尔罗那一帮人对于莱昂·勃鲁姆的政策固然批评多于谅解，但我得益于约瑟夫·帕加农（Joseph Paganon）的教导，设身处地为政府总理着想，从而得出与他相同的结论。一个民主政府的首脑能不能替国家采取包含战争危险的行动？何况半个国家都认为，这样做是不符合国家利益的。科耶夫在布伦什维格家（布伦什维格家每星期天上午接待客人）曾经谈到过，苏联人有所顾虑，不太愿意在地中海活动，怕引起伦敦政府不安，惹它向柏林靠拢。这个辩证家既打不过学术权威的怀疑论，也打不过结帮成伙的青年哲学家。但在关键性的一点上，他的确没有看错：张伯伦政府确实不愿意共和派得胜，因为共和派吃亏在受共产党的控制，从而也受苏联的控制。

197

最近，我的朋友戈洛·曼告诉我说，他跟好几个右派朋友翻了脸，因为他认为，在那时候，在1936年，西班牙还不够条件搞议会民主。佛朗哥临御久长，是出于悲惨的劫数。内战后40年，佛朗哥扶保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国王践祚登基。佛朗哥自己是一刀一枪杀出天下来的，偏偏由他立嫡正位的储君，为西班牙建立了议会民主。民主制还相当脆弱，这不假，但患难的原因不在军人，而在巴斯克（Victor Basch）的恐怖主义。然而，不管怎样，西班牙即将加入欧洲共同体，与自由欧洲相依为命。

我不熟悉西班牙的情况，过去的情况不熟悉，现在的情况

也不熟悉，所以没法判断当年西班牙的内战，也没法评论我当时的想法。哪怕事后发发空议论也不行。西蒙娜·韦伊曾经就近体验和咒骂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为。抵抗力量的最后堡垒——加泰罗尼亚便实行过这种莫斯科式的手段。单凭这一手，我们就算对于共和阵营抱过幻想，也会被它一扫而空。然而，佛朗哥投靠了法西斯阵营，完成了对法国的包围。对法国的第三条战线有可能形成。事实上，佛朗哥的西班牙没有帮法国打胜仗，但也没有帮德国打胜仗。想想看，如果西班牙共和国成了事，它在1940年会采取什么态度？不错，西班牙内战是欧战的序曲，但它是1941年战争的序曲，而不是1939年9月战争的序曲。

1936年，人民阵线得胜。几个月后，莱茵区便恢复了军事化。这是通货紧缩政策合乎逻辑的后果。1932年选举出来的议会支持皮埃尔·赖伐尔大胆盲目地把这一政策执行到底。2月6日民变，爱德华·达拉第被逐出政府，随即与多列士（Maurice Thorez）的党结成联盟，出力促成人民阵线。我和我的朋友们，如罗贝尔·马若兰，对双方的计划都不同意。

马若兰和我都知道，另外几个小团体（比方说“X危机”<sup>①</sup>）也知道，人民阵线如果突然之间立刻实行它的计划，那么事前就可以预见，尝试必归失败。增加计时工资，限制每周工作时间为40小时，拒绝货币贬值，这些事调成了一杯鸡尾酒，但国家经济喝不下去。莱昂·勃鲁姆原以为40小时工作制能解

---

<sup>①</sup> 这是一个经济研究小组，发起人是一批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生，如J. 古特罗（J. Coutrot）、J. 俞尔谟（J. Ulmo）、A. 索维（Alfred Sauvy）等。

决几十万人的失业问题。政府一方面推行经济增长政策，另一方面却削弱生产的物质能力，因为连年收缩通货，投资不足，产业设备老化。赖伐尔的政策确实曾引起物价跌落，其实，只消稍微把法郎贬值，就可以把物价抬高到国际水平，从而加速在人民阵线执政以前便开始的经济复苏。勃鲁姆对于世界物价和国内物价一无所知。对于世界物价和国内物价的关系，他也不甚了了。他不知道，可能他的顾问们也不怎么知道，40万到50万的失业者中到底有多少人能够重新就业。马若兰提了些建议给总理办公厅，同时也在《新欧洲》杂志上写文章，支持保罗·雷诺。塞勒斯汀·布格勒十分恼火，说这是一位年轻人对他的背叛，因为社会党人张开臂膀欢迎马若兰，并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布格勒说这话完全是出于诚意，他对经济的无知可以为他开脱。他在这方面对别人的意见的判断不是根据现实，而是根据党派之见。我把他弄得太生气的时候，他便预言我在《辩论报》当经济评论员就要当不下去了。这话是波雷夫人<sup>①</sup>告诉我的。也许是这份报纸中途夭折，才使我幸免于难。

199

几个月以前，弗朗索瓦·果格尔（François Goguel）对我提起我在《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1937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文章，名叫《探考法国经济问题》。他对我说，他当时读了便觉得文章分析得入情入理，而且论理十分坚定。我找出来重新读了一遍，觉得有点失望。这是我头一次练习评论时事，可是跟我在“自由谈”上发表的一些通信比起来，这篇文章却还略胜一筹。

---

<sup>①</sup> 波雷夫人是高等师范学院校长的秘书。她1914年以前就从事打字工作，为高师的学生打过数不清的论文或学习证书。她对高师无所不知。大家都认得她，她几乎成了知名人士。

文章开头谈知识分子，今天看来，也还不怎么不入眼：

知识分子当然有道理干预政治斗争。但可以看得出，干涉分两种方式：一些人的行为（或主张这样的行为）像教士，一味护卫神圣的价值；另一些人则加入一个党派，宁可由此而受种种役使。我觉得两者都有合法性，但必须是自觉的。但实际上，像教士一样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或人权的阐释者的举动仍然有派性。这种偏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绝不能老有德雷福斯那样的事件让大家都能够明辨是非、去伪存真。知识分子如果要作为知识分子每天发表自己的意见，那就一定要在经济、外交、政治上是内行……要通货紧缩，还是要通货膨胀？要同俄国联盟，还是要英法协商？要集体合同，还是要有利的工资？反正，要紧的是效率，而不全是公平。此外，在任何党派里面，作家、教授仿佛都是宣传员。要他们做的，不是去启发思想，而是去煽动感情。他们煽动了激情，然后为它辩护，但是，罕有致力于净化激情的人。他们是集体意志的号手。群众信任他们，可是不知道，某某物理学泰斗、某某大手笔、某某大名鼎鼎的人种学家<sup>①</sup>，这些人对于经济复苏的条件并不比路上行人懂得多一些。搞一门科学并自诩为实证论者，还不足以让人不再相信神话。

200

其余的探讨，都是当时大家爱议论的东西，不过已是明日黄花，没有什么现实意义。阿尔弗雷德·索维写的《两次大

---

① 指的是保罗·朗之万、安德烈·纪德、保罗·里维。

战间的法国经济史》比我在1937年写的东西更能为读者说明问题。然而，拙作也可以说有个优点，即着重指出了莱昂·勃鲁姆尝试失败的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不肯让法郎贬值，其次是坚持40小时工作制。

1933年有所好转，而到了1934年、1935年，法国的经济情况重又恶化，其根本原因——经过认真研究——归根结底仍在于法国的物价与世界物价差别过大。这不仅影响输出，而且使整个经济受到通货紧缩的压力……下面一个事实到了今天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货币一贬值，所有维持金本位的国家的情况很快就有实质性的好转。批发价格迅速而有力地上涨，超过零售价格，这有助于消除国内价格失衡，也有助于减小国内价格与世界价格之间的差别……

政府不肯让货币贬值，至少部分是由于共产党的反对。至于40小时工作制的法律，我把它算在人民阵线的账上，那是不对的。人民阵线的纲领中本来没有这一条，而是共产党的纲领中有这么一条。我当时对这一措施的论断，时至今日已为大多数史学家所赞同。

人民阵线在纲领中载入了新规则（40小时工作制），但事前未做任何必要的研究，也没有采取任何必不可少的预防措施……而法律便雷厉风行到每一个经济部门。人们过高估计了法国工业的生产能力，毫无凭证便下断语，说法国工业能够用40小时生产出以往用48小时生产出来的东西。而事实上，是经济复苏受到了限制。

201 受普查的工业中，劳动时间平均在 45 小时左右。勃鲁姆在里昂受审时才听到这个数字，而像我这样的老百姓，也还能知道每周大体上的工作时间。

当然，这篇文章今日再来重读，一定有些地方需要修正。我低估了货币贬值的初步后果和对恢复经济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执行既削弱了经济生产力，同时又加快增加工资速度的 40 小时工作制，经济本来是可以复苏的。不仅如此，文章虽然只谈勃鲁姆在经济方面的尝试，但我仍然应该强调指出，改革的精神作用还胜过社会作用：半个世纪过去了，左派不改初衷，仍然歌颂勃鲁姆的经验，歌颂他的惨败，歌颂带薪度假。

当然，我说服不了那些大学人士，尽管他们论理应该懂得这些道理。莫里斯·哈布瓦赫虽然是涂尔干派团队里的经济专家，却和我进行了友好的讨论。我的论点仍然没能使他动摇。只有莱昂·布伦什维格——他的夫人还是政府成员——在勃鲁姆下台后的一个星期天对我说：“没有一个聪明人相信他会成功。”

后来，莱昂·勃鲁姆的人格逐渐被神化，成了有如饶勒斯在两次大战中间那样的超凡圣人。他在里昂受审判时表现出的浩然之气，审判官的不齿于人，他从德国回国时受到的人民的一致爱戴，弄得没有经历过 1930 年代的人几乎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对第一次人民阵线政府的内阁总理做出论断。那时候，右派对这个大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犹太人恨之切骨，这种仇恨的心情是战后年代的年轻人没法理解的。因此可以说，我们简直没法就事论事，白白地为右派提供论据。而我们和那帮人或那些党派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所以，我才把批评人民阵线经济政策的论文托付给内部刊物《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



左派只记得，而且只想记得那些有历史意义和存活下来的一些改革：带薪度假，集体合同，还有现在已经成为习惯的工会跟厂主的谈判。而事实上，法国的劳工法和社会设施还落后于欧洲其他民主国家。资本家和大资产阶级分子给工人占据厂房一事吓破了胆子，切齿痛恨那个虽然替他们避免了一场革命，但不免动摇了企业主帝王般的权力的人。勃鲁姆的错误抵消不了他的功劳。他的错误是不可否认的，他的功劳也是没法否认的，而他的伟大人格也同样是无可争辩的。

好些情况不能全怪他。法国在那时候还没有商情研究所。失业统计数据可以由大家各取所需。在人民阵线纲领的委员会里，“防范委员会”所起的作用也许跟党派代表不相上下。不明情况的人并不都是搞政治的人，经济领导人也不见得更加清醒。不管怎样，保罗·雷诺听信了伊斯代尔（Istel）的劝告，揭发了历任政府的谬误。伊斯代尔是在美国执业的法国银行家。只有保罗·雷诺一个人说出了简单的实情。勃鲁姆的学问和判断力都不见得比领导阶层中别的人更加高明。一年之后，参议院结束了这一番尝试，而社会党虽然留在政府里面，但不再掌握领导权了。

人民阵线首次执政失败，局势的发展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激进党的卡米耶·肖当起而代替社会党执政。通货继续膨胀，第一次贬值来得太晚，接着又来一次贬值。共产党趁两家工会联合会合并的机会，占了总工会的各个要津。在国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同第三帝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38年春天，希特勒决定吞并奥地利，除掉许士尼格（Schuschnigg）总理。1934年，陶尔斐斯总理遇刺殒命，许士尼格便接任了总理。

这时，法国没有政府。墨索里尼虽然在几年以前出力防止发生这样的事件，但是这一次他忍下了。德军开进维也纳那一天，捷克的问题便浮出水面。过了几个月，便是慕尼黑。

203 巴伐利亚这个都城名在全世界的政治词汇中已经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普通用语，一个象征。慕尼黑指的是在实力较量面前为了苟全性命而牺牲盟友，是幻想侵略者会满足于不战而取得的胜利，是不讲抵抗而讲委曲求全。所谓慕尼黑政策在今天意味着，既是道义上的错误，又是知识上的蠢举，意味着贪生怕死，想推迟一下战争，结果被打得更惨，越发在劫难逃。我不想修正这种说法。反正，不管事实是多么清楚，历史学家至今没能排除雅尔塔会议瓜分世界的神话。

从1936年到1939年，大多数法国人，或者说搞政治的人和知识分子，都加入了这个或那个阵营：赞成或反对意大利法西斯，赞成或反对征服埃塞俄比亚，赞成西班牙将军造反或者赞成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总的来说，左派不理解重占莱茵区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均势。我们的军队守在马其诺防线后，没办法去救援德意志帝国东面的盟国。从1933年到1936年，左派不提倡整军，反而宣称军备竞赛必然输给别人。从西班牙内战开始，左派转而信奉抵抗希特勒，甚至是军事抵抗。在1936年3月，抵抗希特勒还不冒什么大风险。今天，我们知道一点儿风险也没有，而在那时候，我们也该知道风险不大。干涉西班牙内战不是没有危险，至少对于国家的团结不是没有危险。1938年9月，如果德国出兵攻袭波希米亚四境，我们就会不得不履行盟约义务，向德宣战。而这一次，进行抵抗只会导致打仗。如果不抵抗，那就只好强迫布拉格投降，也就是说，割让苏台德区，同时放弃当地的要塞和物资。希特勒向全

世界表示，他兵不血刃，大获全胜，战利品丰硕无比。

从国家领导人到小老百姓，人人都问：希特勒到底是虚张声势，吓唬人，还是真下了决心，捷克如不屈服就马上出兵？如果希特勒确是虚张声势，那么抵抗也是和平。如果不是虚张声势，那么抵抗就会引起战争，引起局部战争是肯定的，引起全面大战也是很有可能的。凡是虚张声势论者，都问心无愧：204 壮壮胆气，不战便得和平，何乐而不为？这种说法当然十分巧妙，但在我看来，很不正当。慕尼黑事件的第二天，我在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讲课，先用半小时谈了我对危机的想法。我评论了勃鲁姆所说“懦夫的宽慰”，同时声斥阿兰所说的那些“安眠贩子”。这些人一面鼓动法国人坚毅不屈，一面又叫他们放心，当这种英雄好汉，花不了多少代价。

我那阵子常跟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交往。他跟德国军队里的一些人和反对元首冒险的一些保守派人物还保持着联系。他好几次告诉我，有几个将军密谋推翻希特勒；如果希特勒下令进攻“捷鸡”（Tchéquie）——这是希特勒称呼捷克的用词<sup>①</sup>——德军各司令员将实行倒戈。《慕尼黑协定》签署以后，我领了劳施宁去见保罗·雷诺的办公厅主任加斯东·帕列维斯基（Gaston Palewski）。帕列维斯基听了这个前但泽市市长讲的话，显得不太相信。确有密谋之事，哈尔德（Halder）事后谈起过。但直到今天，史学家还争论不休。军事首脑们都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事到临头，他们会反抗命令吗？他们会推翻领袖吗？

反正，谁也不能断言希特勒是在虚张声势，而我们今天已

---

<sup>①</sup> 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希特勒是否已经用这样的称呼，我可不敢肯定。

经知道，他确实不是虚张声势。他甚至还表示遗憾，悔不该误听墨索里尼的劝告，没有血洗捷克。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既然承认了战争来临的威胁，并且对盟邦许下的诺言有待履行，那么他就应该同人民一道，掂掂战争的代价，掂掂缓兵之计的好处。如果说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希特勒不管自己所做的庄严的宣言（《最后的要求》）而一意孤行，非要落实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的各项计划，实现他在1937年向全军将领宣布的方案，那岂不该盘算盘算，到底在1938年打合算，还是在1939年打合算？这种理性的考量被过激的情绪排除在外。

205 知识分子受到了这样的批判，我自己也在这些知识分子之列。我在那时候倒并不认为希特勒是在虚声恫吓。我也反对慕尼黑，就像别人说的那样，我是个反慕尼黑分子，但我不过是感情用事，既没有太认清当时的力量对比，也没有认真考虑过“缓兵”也许是一条妙计。英国在德军开进布拉格以后改变了外交政策，反慕尼黑派击掌欢呼，这也是感情胜过理智的表现。这是任何外交家当时就该明白的，然而我到后来才懂得。英国同波兰缔结互助条约，等于毫无补偿、平白无故地给苏联下了保证。

历史会开玩笑，情绪激动会叫人疯傻：慕尼黑分子成为罪人，而1936年3月赞美法国人“明智”的人，却从未遭过责备。人云亦云之风，促使萨特都在《缓刑》一书中把慕尼黑分子当作“王八蛋”。而他自己，出于和平主义，赞成四国协定。1939年3月，英国改变政策，谁都不对此加以讨论，仿佛这不算劫数里面前前后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之一。

谁都能按自己的方式编写并未实现的史事，并且总结说不

如在1938年就打，或者做出相反的结论。捷克的军队优于波兰，但希特勒是引苏台德的案子来打官司。既然法国人一向主张民族自决，那么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就有权实行自决。那时候大家还说不准，到底仅仅是德国居民回归祖国的问题，还是别有帝国主义野心？而且，当时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还不能够提早一年就打英伦的保卫战。不错，在慕尼黑派里面，后来肯定有许多赞成停战、拥护贝当元帅的人，但也许其中有些人认为，1938年抵抗希特勒已经太晚（因为莱茵区已经让他占领了）。也有人认为，抵抗希特勒为时尚早，因为苏联与第三帝国并不接壤，西方争战，苏联大可擐甲执兵，坐观成败，然后伺机一击，开疆拓土，称王称霸。

我撰写本章内容之际，刚刚读了《本世纪的游客》，作者是贝特朗·德·儒弗内尔。在1939年以前，我几乎还不认识他。他从事新闻和写作比我早得多。我还在吃力地摆脱阿兰的教诲时，他已经周游欧洲和全世界，常跟法国和英国的政治人物打交道。由于他父亲和他叔叔罗伯特的关系，他一出生便属于第三共和国那一辈人。他在母亲的沙龙里认识了那些创建“凡尔赛欧洲”的人。1919年签订《凡尔赛条约》的时候，我也住在凡尔赛，只不过混在人群里瞧热闹，看着那些战后建设世界的人招摇过市。而他，大约已经在凡尔赛宫殿的明镜廊里走动了。 206

我们在霍什中学读书，相差两岁，他16岁，我14岁，差别还不算小。但过了五年，两岁的差别就不算什么了，反正是同辈。然而，他已经当了记者，接触到了造就历史的政治。而我还在大学里，或者在德国，继续传统的求学。他在回忆录里叙述过的人——佩服过的人，跟他同辈的朋友——我差不多都

不认识。我只遇见过一次《现实主义一代人》的作者让·吕塞尔。当时谈的话，我恍惚还记得。我告诉他我正在操心的几个哲学问题。他回答说，从未听说像我这样年轻的人会关心这些哲学问题。贝特朗说他很有才华，可是我倒没有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也许贝特朗的夸奖是出于慷慨大方吧？1930年代，我见过法布尔-鲁斯好几次。我经常读他同让·普鲁沃斯特(Jean Prévost)和皮埃尔·多米尼克(Pierre Dominique)合办一年的《活页》杂志，后来又读路易丝·韦斯办的《新欧洲》，他在那里当总编辑，叫我去帮忙。就是在他那里，我有一次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Derieu La Rochelle)。此人的才华是我一向钦佩的。安德烈·马尔罗曾对我说：“在我们所有这些人里面，真有作家才能的只数他，那是天赋。”他们两人虽然在政治上南辕北辙，但始终以朋友相交。德里厄跟儒弗内尔是朋友，但儒弗内尔跟马尔罗不是朋友（在敌占期间，他们二人曾在科雷兹省跟贝尔相处过）。

我跟这一代人一样，痛恨战争，反对庞加莱的政策，主张与魏玛共和国释怨言和。儒弗内尔提起这代人，总是十分难受，认为他们是堕落深渊的一代人。我同他不一样，与捷克并无瓜葛，与《凡尔赛条约》建立的欧洲，与国际联盟，都没有什么渊源。原则上我本来认可这个国际组织，但去了一趟日内瓦，正当国联在开大会，我的心情就复杂起来了。德国还没有参加，美国也躲在一旁，国与国之间这种议会式的关系，似乎表现得有点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矫揉造作。

一直到1930年春天，我的感情、我的看法，基本上还跟儒弗内尔的朋友们差不多。我们谁也不讳言，欧战战胜国建立起来的秩序十分脆弱，昔日盟友，随即齟齬，法国对待战败国

的外交办法也叫人看不惯。就在1930年这一年，我在德国狠狠地接受了教训：经济恐慌冲击德国，美国取消了给德国的贷款，德国受了侮辱，心怀不满，抱怨法国。这次教训震动了我，并且引起预感：祸患又将露头。次年，即1931年，法国躲过了经济危机，仿佛在欧洲享有主导地位。而美、英、德等国的人异口同声谴责法国，说法国赖在黄金堆上一动不动，一应罪责都该由它负担。也就是在这一年，国社党蒸蒸日上，历史的风暴正在酝酿，不祥之兆也越来越多。从1931年到1938年，7年之间，整个体制崩塌无遗。法国成了孤家寡人，空剩下自己的人口和工业。就人口数而论，法国只占欧洲的7%。法布尔-鲁斯写文章指出这点，居然弄得舆论大哗。法国已经别无选择，要么打一仗，可是法国人不愿意打，要么俯首屈从，却又不知道要屈服到何年何月。

在这些没落年代，我们忧心忡忡，老惦记着怎样能使法国得救。只有在这种国事蜩螗而党争不息的气氛中，人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儒弗内尔和德里厄·拉罗歇尔居然会与雅克·多里奥之流为伍。后者是圣德尼市市长，其演说很得人心。他的主张虽然后来成了法共的主张，可是在那时却不被接受；他被开除出党。他本人，我从未见过，他的话，我也从未听过。反正在共产党里，话说对了，若是时候不对，就会犯弥天大罪。多里奥和他手下的人宁可脱离党也要跟他走。他便创建了一个法兰西人民党（PPF），这个党成为当时各种小组里面唯一可能走法西斯道路的组织。结果，他在德国被盟军的飞机炸死了。

208

1930年代的作家们，哪怕是不问政治的前辈先生，也逃不脱历史的浪涛。几乎谁都想引用这句话：政治是命运。据说

这句话是拿破仑说过的。问题已经不再在于在两位爱德华之间进行选择<sup>①</sup>，也不是要白里安还是要庞加莱的问题。从1933年开始，也许从1929年开始，法国人已经没法逍遥自在了。国外起了风，刮东风，也刮西风。好些大知识分子对于列宁、希特勒、现代经济都不太熟悉，也弄不明白美国有多大能耐。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跟另外许多人，都还把意大利当作强国。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震惊的是，民主政体瘫痪疲软，而希特勒的德国则兴旺发达，有如风起云涌。苏联公布的增长率也着实惊人，相形之下，触目惊心。哪一国的政府顶得住这样一番较量呢？除非这个国家的政党在议会里要把戏，耍得晕头涨脑，长了眼睛也不肯张开来看看。出生率越来越低，生产萎缩，国民意志消沉。我有时候不免要想，也许不免大声说：如果只有专制才能救法国，那么就来它个专制，尽管大家心里极不愿意。

我和德里厄·拉罗歇尔或儒弗内尔不一样。我绝不会由于失望而做一些荒谬举动。这倒不完全是我的犹太教情结、我周围的人、我的思想方式和我坚持拒绝一党制统治下的两种制度在保护我。

显而易见，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让法国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念头，而另一方面的诱惑，倒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亚历山大·科耶夫不是自称“紧跟斯大林”吗？安德烈·马尔罗不也以共产党的同路人自居吗？但是，在我的眼里，不管怎样，科耶夫终究是个白俄罗斯人。他也许抱着世界史的动机当了共产党员，但跟党毕竟有很大的距离。至于马尔罗，他从来没有游说我，也许他认为我这个人，天性只会主张温和。

---

① 指爱德华·赫里欧和爱德华·达拉第。



我自己呢？自从留学德国回来，我已断定，只要希特勒掌握着政权，那么搞什么法德和解，不仅是徒劳的，而且会祸国殃民。而我在1933年1月以前，本来是一向主张法德和解的。1934年2月，国内冷战开始，我只从旁观察，没有参与进去。我曾经这样写过：我不信法国有什么法西斯危险，因为一无哗众取宠的魁首，二无涣散解体的民众，三无喜功称霸的热欲，简言之，不具备任何构成法西斯危机的因素。反法西斯人士追逐一个摸不着的敌人，而对待真正的敌人希特勒，却抓不住要害，在采取什么手段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

我对德国的情况记忆犹新。体育宫的演说使我深信，第三帝国的领袖有本事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来。历史证明我是对的，但我得承认，我的判断只是根据一种心理的或历史的直觉，要证据却没有。1938年9月，绝大部分德国人都投靠纳粹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已经做成了几件大事：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了军备，创建了大帝国，不战屈人就吞并了奥地利和苏台德——表面上的丰功伟绩，超过了俾斯麦。<sup>①</sup>如果在签订《慕尼黑协定》以后，奄然物故，他不就成了名垂青史的德国伟人了吗？当然只是风光一时，因为他身后既没有留下一个制度，也没有创建一个法治国家。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已不复存在，而第三帝国的宪法还没有出世。而且，希特勒已经颁布了《纽伦堡法令》，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一个看得见的但毫无力量的少数民族。就是在慕尼黑会议以后，戈培尔发起了全国性的仇犹运动，名叫“水晶之夜”，借口是德国驻巴黎

---

<sup>①</sup> 塞巴斯蒂安·哈弗内尔（Sébastien Haffner）写了一本出色的书，叫作《希特勒评传》，书中以生花妙笔谈了这个问题。

大使馆秘书遇刺，德国予以反击。任何人出来接希特勒的班，都不必费劲就可以克服政治上的混乱局面。行政机关原封不动，正规军将兵权在握，非纳粹军官所能敌对。1938年以后，  
210 如果没了希特勒，第三帝国会怎么样？谁也没法知道。但起码可以说，在1938年10月，如果没有希特勒，德国便不一定会发动欧洲战争，后来再发动世界大战。

1937年春天我写好了论文，居然问心无愧地松了口气，打算逍遥一番。我们两口子尽管觉得战祸不远，仍然决定生活到最后关头，仿佛前途依旧还可以做长远打算。我盘算着要写一篇社会科学的导言，修正我原来的《导论》，因为别人指责它过火地引用了相对论。同时，在时局的启示下，我爱上了马基雅维利和他的权术论。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写些研究凯恩斯总论的东西。幸而什么都没有剩下，否则，至多不过是些老生常谈。同时，我也写些研究马基雅维利的东西，留下了三十来页文字，但这些文字没有多大价值。我对马基雅维利的事业，认识还不够深入。

1937年到1938年，我往来于巴黎与波尔多之间。教育部部长（皮埃尔·贝尔多在部长办公厅工作）任命我到波尔多大学执教，代替马克斯·博纳弗斯（他也像德阿一样，是布格勒的高足）。他后来在维希政府当了一阵子供给部部长。当时我写的三篇东西在今天看起来倒还有点意思。不是文章本身有什么意思，而是三篇东西足以说明我那时候的心情。一篇论帕累托，登载在法兰克福学院的校刊《社会研究杂志》上面。一篇论埃利·哈莱维的选集《专制时代》，这部选集是我和布格勒跟弗洛伦斯·哈莱维一道整理出来的。还有一篇法国哲学

会公报提要发表于1939年6月，那之后几个星期便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在一篇评论《专制时代》一书的文章里，发现好些对极权制的分析，与我在1945年以后做的分析颇有些相似。这些分析总不免有点拐弯抹角，因为不管怎样，我对苏联毕竟怀有宽恕的心情。我说：

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地排除一切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公民投票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闹剧，借此叫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主权托付给总揽大权的主子大人。其次是个人自由：德国公民、意大利公民和俄国公民，都没有任何办法对滥用权力的行为提出申诉。公职人员、共产党党员、地方上的纳粹头头、法西斯支部书记，都是上级的奴仆，可是对老百姓却如豺狼虎豹。再就是思想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科研自由，一切自由都销声匿迹。在英国的民主生活中，有这么一句值得钦佩的话：反对派是为公众服务的，而在极权国家，反对派则犯了罪。 211

这样做对比虽说得过去，但太过火了。意大利的极权制，甚至希特勒的极权制，在那时候还远不如苏联的极权制。这可以从极权的两种意义来讲：一是国家吃掉公民社会，二是把国家的意识形态变成教条，强迫知识分子和大学信奉。不仅如此，我在文章中稍前几行，指出了苏联制度的优越性。我说：

就无所不为的现实主义来说，共产党与法西斯相比毫不逊色，至于引以为荣，则还有点程度上的差别。共产党

竭力让大家都读书，而这些人将来就不会仅仅满足于读《资本论》。何况，单一的意识形态不是仅有一种含义：共产主义是模仿救世的宗教，而法西斯则不知道什么叫人类。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判断呢？是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借重苏联来对付第三帝国？也许是的，也许还有更加深刻的动机左右着我的笔锋。我们这帮人深受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的浸润，加入共产党没什么大不了的，而加入法西斯或法民党，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这帮人中间，我反共最坚决，信奉自由主义也最坚决。从1945年起，我才摆脱了一切左派的偏见。

我讨论战争都引用埃利·哈莱维的话，可惜我认识他太迟了。我们俩真叫一见如故；在他去世之后，我继续把弗洛伦斯当作知心朋友。哈莱维真正主张自由，所以热爱和平（他有一天对我说，只有贸易自由论者才有权以爱好和平自居）。然而，他却不是和平主义者，既不像阿兰，也不像法学家，既不想靠条约，也不想靠个人反对。他是作为历史学家兼哲学家来思考战争问题的。战争有不不变的条件，那就是：“人并不总是由共同体验和个人利益构成的。人有这么一种本性，如果没有值得他献身的东西，他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有人问他将来的局势如何，他也是用史学家的身份作答，而不是采用伦理学家的观点。1935年年初，他在一次报告会上说，战祸似乎尚未临近，但再过六七年，危险就迫在眉睫了。又过了一年，我对他谈起他的预言，他回答得很简单：“我太乐观了。”从此以后，时局越来越证明他的忧虑是有道理的。如果我的文章写到此处为止，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可是我又添了这么一段话：“时局也显示出，和平的力量是强大的：任何资产阶级都勾结

反动专制势力。在民主国家，精神腐烂坏过物质腐烂，而欧洲各国人民眼见大祸临头，覆巢之中绝无完卵，争取和平的决心越发增强。”

我已经觉得战争无法避免，但总说不出口，正如身患不治之症，却依然怀有希望。为什么不准希望诊断错误，不准希望有灵丹妙药？

法国哲学会上讨论的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提要列举的八点，有几点在今天和在40年前一样，似乎是根据确凿，无可争辩的。比方说，今天人人都承认，即使法国和英国当时在经济上向德国让步，也绝对不足以平息希特勒。然而，在那时候这样说说也不无好处。因为很多好心人相信或者自己要相信，德意两国缺乏空间和殖民地，外贸困难，不得不向外扩张，只消慷慨解囊，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同样，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几年前为一本书<sup>①</sup>作序时，也抱有类似的幻想。他认为，苏联同西方通商，时间长了就能使苏联起变化，转而信奉我们的价值标准。反马克思主义的重商派民主人士，情愿借重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为自己解嘲，对真情实况却一窍不通，根本不知道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三人想的都是一样东西，尽管各人具体的想法不一样，但终究想的都是政治。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也是一样，国防预算占国民总收入的15%，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们到底是怎样分主次的吗？

213

我再说说第八点：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这绝不是命中注定的。我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不一样，从来没有认为在劫难逃。我对此进行评论的话，今天仍然要写。我

---

① 书为比萨尔（S. Pissar）所著，题为《和平的武器》。

说：“大得不合理的、漫无限制的权力，加上系统的技巧，哗众取宠的宣传，不过是以漫画的笔法，刻画出一幅可能出现的、没有人味儿的社会肖像。”

至于提要的其他各点，我都在旁边注上“对的，不过……”。我曾经决定拿帕累托的精英论作为起点，来说明那些我称为极权主义的制度，也就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勒的德国。基本上，我好像是说对了，至少对第三帝国是说对了。不说最根本的事实，只说根本事实之一，就是：“由精英组成新的领导班子……这些人生性暴烈，有半吊子知识分子，有冒险家，有玩世不恭无所不为的人，有精明强干、擅长权诈的人物。”莫博朗是共产党干部，他反对我说，这些新精英都为大资本家服务，希特勒始终受命于克虏伯家族。也许至今还有共产党人有此想法。除了他们，今天谁也不信这种调子了。而我不太能区分希特勒的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原先的经济领导阶层、教会、王朝，仍然在意大利保持着有实力的地位。墨索里尼很像拉丁美洲的武将临朝，并不怎样像历史上的魔王，如希特勒之流。

关于第二点，我说：“极权制度首先敌对民主制度，而不是共产主义。”言下之意是批评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什么法西斯或民主，都不过是上层的政治建筑，背后都隐藏着同一的大资产阶级统治。我要说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发动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革了价值准则的命，革了体制的命（对意大利来说，这种提法就值得商榷了）。1933年我在柏林的时候，法国研究之家的法国人都在讨论，希特勒如果当上了总理会不会发动革命？我当时就冒冒失失地提出了上面那个论点。

我说得还要过头一些，好些人听了很不乐意。我说：“极

权制度真是革命的，民主制度本质上便是保守的。法国和英国，富有饜足，自然只想维持原状。”我指出这种情况，是想扫除这种幻想：以为一无所有的人，只想闹根骨头啃啃便心满意足。但从另一意义上讲，问题比较深刻，可惜我讲得不够透彻。我说：“民主制和议会制保存了价值准则，保存了欧洲文明的原则。”而纳粹党则“摧毁了旧秩序的道德和社会基础”。我今天仍然这么想，因为民主政体的保守主义并不排斥改革。哪怕是下面这句话，只消换个方式写一写，仍然可以说得通：“就此而言，再没有任何东西更加古怪：法国和英国的保守派，竟会那么长时间地同情国家社会主义。”其实，这伙人不懂得，希特勒的雄心壮志并不限于消灭社民党和共产党，他也威胁着英法保守派，甚至威胁德国的保守派。1945年以后西欧领导阶级一致投效民主政体正足以说明，右派革命的教训使他们懂得了怎样正确估计代议制。

有一种说法是，外交冲突并不产生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更值得争论。其实，我要说的是，希特勒饶不过民主的法国，哪怕是法西斯的法国，他照样饶不过。在这一点上，我是对的。纳粹政权，本质上就是要侵略扩张。相形之下，墨索里尼也许缓和一些。就这个意义来讲，这种政权体现的就是战争。艾蒂安·曼图（Etienne Mantoux）是苏珊和我两口子一向爱重的。他的智慧足以做大事，他阔大的胸襟赢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友情。他写给我们一封很有道理的信，现在照录一段如下：

可以正确地说，相反的意识形态如果纯粹限于本国，那是可以并肩相处，不至于弄到诉诸武力的。而苏联的极 215

权主义却不是那么回事儿，它在本质上以往是、将来也许仍然是要向全世界传道的，所以是要侵略全世界的。

如果避而不谈苏联，势必歪曲对形势的分析。

有些话冒犯了我的读者或听众，这倒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曾说：“不幸的是，反法西斯运动一直在加剧民主制度的缺点，政治缺点和精神缺点，这些缺点正足以把最妙的论据奉送给各种专制政权。”下文又说：“进步论、抽象的道德论，或者是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一些想法，应该拿出来重新考虑。极端不合理的现象并不足以取消这种考虑，而且恰恰相反。民主保守派和唯理论一样，只有自新才能自救。”

针对反法西斯运动的那句话，反映出我对人民阵线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批评。我把双方应负的责任很不公平地归罪于一方。我说进步派和民主保守派的问题应该重新讨论，与其说是我经过深思熟虑才产生的想法，毋宁说是主要出于感情冲动。事实上，我想的只是战争已经临近。在我的思想里，既然要战斗，就得掌握战斗的本领，这正是极权国家所独擅长而民主国家所应掌握的。

我在会议一开始所做的报告中又谈起一些想法，后来，历史研究对这些想法的印证多于否定。我曾说，我们对革命的看法不对头。我们认为革命的本质是解放人类，而20世纪的历次革命，似乎不是奴役人的革命，便是推行专制的革命。革命建立的政权比旧政权更加管得宽，更加严厉，专业官僚组织越发壮大。我本来可以引用托克维尔的话，同时修正并缓和19世纪的革命与20世纪的革命之间的矛盾。18世纪的革命确实怀有自由哲学与个人哲学，但是，从大革命中产生的国家比君



主国家更加强大。君主国家一直沉陷在形形色色的特权和豁免之中，挣扎不脱。不仅如此，我还得强调指出另一相似之处，指出一个“新的现象”。我说：“从人民群众里招募来的领袖，可以跟着旧领导阶级代表人物的脚印走……”好些史学家最近坚持指出，纳粹政权推动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民主化。我也许夸大了一些，但我说这话并没错，我说：“纳粹执政六年，做到了社会民主党用半个世纪没有做到的事情：消除人们对传统权威的敬畏。” 216

报告结束后大家进行了讨论。维克多·巴斯克的发言引起了青年一代的恼火和讥讽。而与我不同辈的雅克·马利丹（Jacques Maritain）和夏尔·利斯特倒同意我的看法。今天，根据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发现这个善良的人的话里有些可歌可泣的东西。他说：

我倾心细听了先生您讲的话。正因为您讲的话我一句也不赞成，所以我听得越发用心……我要说，您的悲观主义不算英雄气概。我要说，在我看来，民主国家注定要胜利，而且一定会胜利，过去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今天恰逢低潮，我们正处在两峰之间，深谷之底，是不是？那么，我们又往上走了，一直上升到顶峰。然而，正唯其如此，才越发需要加强对民主的信念，而绝不该用您那样雄辩而强有力的论点来摧毁信念。

直到最后一天，到伪治安队逮捕了他和他的老伴并且杀害了他们之时，他始终还是坚信不疑，民主国家必定胜利。

艾蒂安·曼图驾驶飞机，于1944年向起义中的巴黎散发

传单：“挺住，我们来了。”他又到德国的高速公路上空执行任务，在胜利的曙光中为国捐躯。他当时回答维克多·巴斯克说：“只有肤浅地理解历史，才能那样漫不经心地对待民主制胜利后的那些年代……我要反对的是我们前辈的那种盲目乐观，正因为我不肯辜负青出于蓝这条规律。”然后，他用一句至今仍然有力量并且十分动人的话赞成我说：“我和您一样，我也相信，只有自由派才能保存我说的那些价值标准，但绝不是那种抬不起头来的、自惭形秽的自由派。能成功的自由派有决心捍卫自由，不仅是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经济上的自由。”

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协议，把共产党人搞得手足无措。凡是跟共产党合作反对法西斯的左派人士，也被弄得六神无主。就我个人来说，我的想法以及我采取的立场，倒也没有什么需要从根本上加以更改的地方。但是我的反共立场，一度由于朋友们的关系，由于需要苏联支持抵抗第三帝国，曾略见松懈，这下子可向外爆发出来了。谁要不肯谴责斯大林，不肯声讨《苏德条约》，我便深恶痛绝。有一次，我从部队休假回来，我们两口子 and 马尔罗两口子一起用餐，我整整花了3个钟头，想劝马尔罗同共产党绝交，并且公开发表声明。

当然，局势的演变使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重建联盟。1939 ~ 1941 年的那段插曲不再有人提起。可是我却始终耿耿于怀。倒不是说“外交上这一手”特别体现得出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告诉我们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些。但是，我想把思想逻辑追索到底的念头，从此一去不复返。科耶夫所谓的“正统斯大林主义”（他在1945年以后也不再表示出来），在一段时间里竟叫我迁怒到哲学本身。

## 第二部

※

政治愿望  
( 1939 ~ 1955 )



## 第七章 战争

221

希特勒和斯大林订条约的消息，我们是在瓦昂德雷得知的。瓦昂德雷是阿摩尔滨海省的一个村子，布格勒家在那里有一座紧靠大海的大房子，布格勒在经历过癌症扩散的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就是在这座房子里去世的。我们向一个渔民——退休的海员租了一所小别墅，远远地注视着法英代表团和苏联当局的谈判。<sup>①</sup> 当一个朋友惊慌不安地给我们带来了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赴莫斯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电讯时（当时秘密条约只是受到猜疑，但并不为人所知），面对这种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战争的无耻交易，我最初的反应是惊愕不已，随即感到有点幼稚的愤怒，接着，我对此进行了思索。两个强邻对波兰的瓜分重演了历史的悲剧。1939年6月，我在法国哲学会上提到两个极权制度有可能成立联盟，但我判断它不可能即时实现。然而，我错了，我很快就明白了这是“两种革命碰到一起的”必然结果。

苏联并没有与第三帝国的共同边境；罗马尼亚、波兰则拒绝同意红军为与德国武装部队作战而进入它们的领土；它们对

---

<sup>①</sup> 在休假前，我曾会见过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马塞尔·莫斯。前者极为严肃地指出，战争将在数月后爆发，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莫斯则悄悄对我说：“总参谋部预期在秋收以后。”我们当时真应该关注莫斯科外交发生变化的复杂信号：利特维诺夫（Litvinov）被莫洛托夫（Molotov）取代，以及一些细微的言辞变化（“我们不会为他人火中取栗”）。

222 来自东方的“援”军和来自西方的人侵者都同样抱有疑忌。至于斯大林，他尤其害怕希特勒和德国人。伦敦和华沙结为联盟，让斯大林廉价获得了他本来想以高价换取的保证。法国和英国对波兰承担了为之作战的义务，等于默认了对苏联也承担同样的义务。斯大林一味利己的如意算盘是按战争将在西方持久进行的假设筹划的，但是，法国的迅速战败使斯大林的打算落了空。

1939年8月，我已无心再去探讨这幕外交上的戏剧性突变的下文；像大部分法国人一样，我充满了对斯大林的愤恨，是他给我们带来了无法避免的战争，同时又撒手不管，听任整个负担压在我们民主国家身上。今后我再没有任何理由规避对苏联的制度做出自由的、无保留的解释。9月初，我到兰斯的动员中心报到，几天以后，我就动身去比利时边境了，因为国际气象组织必须在那里建立气象台。

1939年9月，这个气象台有二十来个人，这个数字与我们所承担的任务是不相称的。领导气象台的是一个空军上尉，原业航空工程师，当了几个星期后，他作为后备役军官接受了新的任命。接着，便轮到继任他的中尉得到了新的任命。于是，我作为中士，就成了气象台台长，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成为依靠经纬仪追踪气球的专家。

直到第二年的5月10日，我空闲的时间并不少；我对马基雅维利进行研究，校订埃利·哈莱维的《社会主义史》一书，这是与弗洛伦斯·哈莱维联系后早就定下来的。这部遗著的编辑工作<sup>①</sup>是由雷蒙·阿隆、让-玛丽·让纳内（Jean-

---

① 我们仅有哈莱维本人所写的概要及一些学生的笔记。

Marie Jeanneney)、皮埃尔·拉罗克、艾蒂安·曼图、罗贝尔·马若兰等旧日门人或朋友承担的。

我经常在星期天去沙勒维尔吃饭，在那里多次遇见吕西安·维达尔-纳盖。他是希腊史学家的父亲，我们住在凡尔赛时，他曾多次住在我们家。在德军占领期间，他把自己送给刽子手，表现出近乎过火的勇气。当维希政府的法律禁止他从事律师职业时，他公开表示抗议。人们告诉我，他在法院里对他的同行中被迫执行维希法令的人表示了蔑视。在马赛——他岳父住在那儿——他住在一幢被德国军官占领的房子里。他既不隐瞒他的出身，也不隐瞒他的观点；一天，盖世太保来人把他和夫人抓走了。他的两个孩子由于母亲的勇敢和冷静而得以逃脱，另外两个孩子则多亏了他们的女厨的忠心和机智而得救，并多亏女厨通知了他的朋友而得到了朋友们的保护。

只要奇怪的战争还在继续，我就能因我享有的独特条件而不受干扰。但自战斗正式爆发以后，情况就全然不同了。依靠工具观察天象，用电话，必要时还可以用无线电来传送天气预报，这种活动——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变得可笑和不值一提。我曾天真地给让·卡瓦耶斯写信说，我相信这是在为陆军部提供数据；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它就始终是为一个战斗部队服务的。我问卡瓦耶斯，我怎样才能脱离气象台而被编入另一支部队，哪怕是坦克部队也好。我没有料到几周以后，或更精确地讲是几天之后，仗就要打输，法国军队就要被摧毁。

在沙勒维尔附近，我看到一些北非骑兵，骑在矮种马上向东方驰去。几天之后，他们衣冠不整，狼狈而回。漂泊不定的生活就要开始了，从5月13日（或是14日）起，撤退的命令

就下达了，我们立即被淹没在科拉普部队的乱军之中。从这一天起，左拉描写过的1870年大溃退的情景就常在我眼前浮现。我听不到新闻，无法按时看到报纸，一两个星期之后，我全部的希望都破灭了。事实上，我不可能逐日地回忆起我们从沙勒维尔到波尔多途中的情况。我想起从敦刻尔克撤退到索姆河战役的间隙，在布利贡特-罗伯特度过的几天。我母亲是6月初在瓦纳市去世的。在这之前，我曾经给领导过气象台、后在空军参谋部任职的莱格利斯上尉打过电话。他先是拒绝批准我回瓦纳市。但几分钟后，他又给我打来电话，交给我一个任务，使我能在已经处于昏迷状态的母亲去世之前赶回去。我的妻子经过长途跋涉，终于从图卢兹赶回瓦纳市，并在那儿见到了我。从5月12日（或13日）起，我就赶回气象台，但已纯属徒劳。我们运走已经没有探测目标的探测工具，以及剩下的几支破枪——只有在德军飞机低空掠过时才用得着它们。

我们渡过卢瓦尔河到了日安小镇，目睹敌机轰炸大桥，但至少在那一天，桥并没有受到破坏。我看到，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对空袭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些当初在沙勒维尔一看到德国斯图卡轰炸机出现就拼命向防空洞跑去的人，现在平静地坐在卢瓦尔河陡峭的河岸上，几乎是带着好奇的心情注视着在目标周围爆炸的炸弹。

将近6月20日，我们来到了靠近波尔多城南的一个地方。我穿越城区，去波尔多大学拜会文学院院长达尔邦。我在为马克斯·博纳福教授代课的几个月里就熟识了这个院长。我们都被这突然降临的灾难弄得惊慌失措。安德烈·达尔邦院长，是代表着波尔多大学荣誉和信仰的老派教授之一，尽管与祖国生死与共，目惨心伤，但执行起任务来仍然鞠躬尽瘁。



我听过贝当元帅的讲话，并且在很长时间里都认为所听的原话是“应该努力制止战斗……”。但是，按历史学家的说法，原文并没有“努力”这个词。我周围的人听了贝当的讲话，都松了一口气，认为这一决定体现了人心所向。在日安，混乱中我们弄失了被炮弹片炸伤的无线电士官。我们从北往南穿越法国，生怕成为德国人的俘虏。人们总是在说，德国人距离我们宿营的村庄只有几公里。我和我的战友们谈论着两种可能：或者是军队投降，法国政府转移到北非，或者停战。第二种可能是符合我周围人的感情的。当我到达图卢兹，就一夜，我就感到了这儿的气氛和别处完全不一样。 225

尽管难民蜂拥而至，图卢兹仍然保持着往常的面貌。在我眼前，仍然是一派逃难的场面，成千上万的平民和士兵混杂在一起。富人们的汽车，农民们的小木车，老百姓，溃军的士兵，在公路上混杂在一起，就像没头没尾的毛虫在法国的各条路上蠕动。我在图卢兹的朋友们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没有应征入伍，却已经冷静地选定了立场：反对元帅，拥护将军。他们已经听到他的号召。在这些人当中的某些人，如我的朋友乔治·康吉汉（Georges Canguilhem），已经准备秘密地参加不起眼的抵抗运动。虽说不起眼，其实它达成了辉煌的业绩。

从感情上讲，我和他们是一致的，但是，我的政治判断迟迟未决。我并不肯定法国政府迁到北非和军队为停止战斗而投降是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当时，在我头脑里萦绕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由于军队投降，几百万士兵就要成为战俘。假如战争再延续几年，国家失去这么多成年男子将会怎么样？另一个是关于北非的资源，那儿没有军火工业。如果没有了英国，美

国能够给地中海另一侧的法国军队提供军需给养吗？

我和我的妻子对将要做出的决定进行了讨论：或者留在法国，或者去英国（我们认为英国会继续打下去的）。停战的决定虽然还没有做出，但可能性很大，这对我们的考虑没有太大影响。正在与第三帝国谈判的政府处在仆从国地位和独立国家地位的两种选择之间。曾经谴责过“好战分子”的人物和政党一一上台，他们想干什么已经不言而喻。虽然贝当元帅也好，皮埃尔·赖伐尔也好，并没有转而信奉纳粹主义，但是，战败了的、与第三帝国和好的或者屈从于它的法国不会再有犹太人的位置了。我们面临两种可行的选择：或者和我们的分队一起留在我的岗位上，直至随着停战而很可能出现的遣散复员，然后回到图卢兹去，等待时局发生变化；或者马上去英国，在那儿参加戴高乐将军的部队。我的妻子懂得，联合王国不会放弃斗争，而我虽然微不足道，却一定要参加这一斗争。和某些军政大员的想法不一样，我并不认为丘吉尔会和希特勒缔结和约，也不认为他甚至会在可预见的登陆企图被挫败之前就承认战败。要想胜利侵入 11 世纪以来从未遭侵略的英伦三岛，非得采取一种与在斯图卡轰炸机的支援下，依靠大规模装甲师突破的闪电战完全不同的手段。

我坐在诺尔省一个原业机械师的士兵所驾驶的摩托车后面，从波尔多南面回到了图卢兹。我跟这个战友的关系不错。<sup>①</sup> 回到分队后，我就向战友们告别（他们中有些人在等着德国人到来之时还换上了新制服），向巴荣纳和圣让德吕出发

---

<sup>①</sup> 战后他来看过我一次。他经营着一个小小的阀门厂，给我看了他生产的许许多多类型的阀门。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实行标准化前，他好不容易才摆脱了困境。

了。我躺在一辆和装着巴黎交易所证券的火车挂在一起的货车上。我只带了一个帆布挎包，里面装着盥洗用具、剃须刀、肥皂，（我想）还有一本书，我体会到了一种轻松的奇怪感觉。多少重要的东西，家具，甚至书，所有一切都被抛在九霄云外。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妻子、女儿和朋友们了。凭着对他们的眷恋，我使自己活下去。只要这些都还在，灾难本身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第二天，大约是6月23日，我和其他一些人在圣让德吕港口东奔西走地寻找一艘去英国的轮船。我听说有一师波兰兵要搭一艘“埃特里克号”客轮渡过海去，这艘船停在离港口几公里的地方。我脱掉了空军的蓝大衣，穿上了步兵的黄大衣，最后找到了一条小船，它把我带到了“埃特里克号”上。在我们这些或者仓皇出走或者自愿离开的人当中，有一个是福煦元帅的远亲。假如我没记错的话，他谈起过犹太人，当然他把我算作例外。

227

在船上我遇到了勒内·卡森（René Cassin）；我还和一些波兰军官聊天，其中有一个奉劝我：要随遇而安，要高高兴兴地接受失去家庭的孤单未来。战争将是艰苦的，谁知道要进行几年？但总有一天，我们将回到自己的祖国。而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来一个花开堪折直须折。

在这次渡海旅行中，有两件事值得回忆一下。我站在一张桌子边收拾餐具，擦洗着漆布和餐具。我已经记不起来一个上了些年纪的英国人是怎么和我谈起话来的了。他问我当老百姓的时候干什么工作。我告诉他，如果不是军队征召我的话，我还在图卢兹大学教授哲学。他突然愤怒地斥责了法国和英国的政府，他好像是冲他夫人说的：“我早就对你说过，执行这种

愚蠢的政策，我们就会失掉一切。距上次战争胜利已 20 年，我们居然弄到这种模样。”大学教授成为洗碗工人，在他看来是社会颠倒的象征，也是法国人和英国人自作自受。

船上的组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千名士兵轮流掌勺做饭。没有“票证”，也不用查账，大家互相信任，不用提防营私舞弊或揩油的人……在“埃特里克号”上，我第一次呼吸到了英国式的空气，立刻感到了安宁和自在，尽管我过去对英国的海员、士兵，甚至几乎可以说对英国的知识分子都毫无了解。

我们所有人都来自一个兵荒马乱、成千上万人在路上逃亡、到处是全线崩溃和轰炸景象的国家。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英国的和平气氛、农村的优美风光。战争一下子被忘却了！那茵茵草坪丝毫没有因为战争而辜负它的美名。和女皇陛下的臣民们一开始交谈，我们便无言对答而唯有一腔感激之情。我住在一个可爱的村舍小屋里，一个个子不高的汉子对我说，圣诞节时你们就能回到祖国了。英国的上层人物并非不知道危机四伏。人民也同样知道。他们等着敌人空袭和可能的登陆。工厂全力以赴地加紧生产，民兵也组织起来支援军队，而这支军队的干部已被遣返回国，但重型武器都丢了。这里给人的印象相当离奇：国家信心十足，而有些地方又几乎毫无行动。我们在船上就已得知停战协议已经签署。我们看到一个几乎就要遭到暴力侵害而尚未遭受破坏的国家（这种暴力刚刚打翻了一个强国纸糊的城堡）；死亡的威胁在向它压来，而太阳——1940 年春天的太阳——却依然照耀着这一片充满安宁、奢华和快活的田园。

在伦敦，我在奥林匹亚厅碰到几千名法国士兵。我们除了

吃饭、（徒劳地）收拾我们的破屋子和聊天，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做。为了分析当时的时局变化，我们经常展开讨论。奥林匹亚厅的法国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政治派别。停战，还是政府转移到北非去？同样的讨论在海峡两岸展开。大部分法国人已经采取了一种比较简单化的立场：要么认为元帅及其追随者出卖了法国和同盟国，要么是将军及其追随者脱离了民族。而我个人则不止一次在与偶然碰到的一些人的谈话中，试图验证一下我那表面上似乎矛盾的观点。我当时谈到，只要英国人赢得战争，元帅的决定就未尝没有好处。其矛盾在于，在波尔多的人押德国胜利的宝，在伦敦的人则押英国胜利的宝。事实上，英国人的胜利会导致戴高乐将军掌权。但是，停战使几百万法国人免进俘虏营；非占领区的存在改善了剩下一半的法国人的处境。为了避免法国人再流血牺牲，这是能够合乎情理地对国家领导人的思想产生影响的。1980年6月底，我见到一个老先生，姓名已经记不起来了。他对我追叙了在奥林匹亚厅的谈话。他当时对我的论点十分吃惊，随即问我何许人也。他得知我的学历和职业之后，意外之情也随之消失了。

在伦敦的最初日子里，我又遇见了罗贝尔·马若兰，他是让·莫内（Jean Monnet）班子里的一个成员。<sup>①</sup>他刚在水深火热的敦刻尔克过了两天，并陪着未来的“欧洲先生”去过波尔多。现在他打算回法国，这并非因为他对自己的阵营抱有怀疑，而是他真心认为在那样一个时刻，首先必须要找到他的家

---

<sup>①</sup> 我这时才知道，关于建立法英共同体的建议已经提交给撤退到波尔多的法国政府，因而我没有机会马上思考其可能性。

人，他的母亲。

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改革俱乐部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现在成了罗宾斯爵士）、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其他一些人。在战争年代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四都和他们一起吃晚饭。我们最初谈论的是关于英国的命运。罗宾斯比我乐观，他坚持认为只要在未来几个月里登陆的企图被打破，西方就有希望了。只要度过目前这个最危险的时期，英国——在美国的援助下——就会变得不可攻取了。其他各种力量也会起来反对第三帝国。这样借用戴高乐将军的号召做出分析是无可非议的，并且这种分析为时局的发展所证实：假如英国拒绝希特勒的甜言蜜语，假如希特勒不给被占领的欧洲国家可接受的和平，那么仗就必将继续打下去。在1940年年底，人们还在提问：希特勒或者是利用苏联的中立企图粉碎英国，或者是利用美国的中立，让他的军队向共产主义发起冲锋。在这两种情况下，法国的战败便只能算一段波折。在一个扩大到全球范围的世界体系里，法国已不再是强国俱乐部的成员了。

我访问了一个我在瓦朗热维尔认识的英国人的家庭，他就是A. P. 厄尔贝特，他很幽默，是小说家、剧作家和航海家。1931年我在瓦朗热维尔度假期间，尤其和他夫人有过十分友好的往来。那时我坐在海滨的峭壁上读着《存在与时间》，她在旁边梳头；我们建立了友谊。在以后的几年当中，我曾不止一次读《存在与时间》。

230 有一次，我到奥尔德霍特的一个军营里，向一个由两三个英国军官组成的委员会报到。该委员会为每个人提供下列选择：重返法国，加入自由法国力量，或者仍然留在英国。绝大

多数士兵都选择了回法国。<sup>①</sup>至于我，则选择加入自由法国力量的坦克部队。我在那里已经显得老了：不算军官，大部分士兵都是刚过20岁不到30岁。

我没能进入坦克部队，而负责起管理一支部队的账目来。我成了计算镑、先令、便士的内行。关于兵营的生活，有一个插曲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在一个星期天，刚过中午，来了一个准尉军官。我的房间里有张空床，他就被安置在那儿。我们闲聊了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用尚未睡醒的声音问我钟点，我告诉他“7点差20分”。我听到他答应了一句：“已经7点差20了！”我离开房间去盥洗室；等我回来，他已经死了，一支左轮手枪搁在他床边。他可能是事先决定好7点钟的限期的。他从摩洛哥来到英国是为了继续战斗，为什么会自杀呢？调查是当着验尸官的面进行的。我由一个助理医生——医学专业的大学生弗朗奈瓦·雅克陪同做了证词。验尸官的结论是自杀，准尉军官的自杀行为是在精神分裂的状况下做出来的。

在我们登船出征达喀尔的前几天（计划已是公开的秘密，因此我对消息灵通的维希当局及时向达喀尔派遣军舰并不感到意外），我去了一趟伦敦，到卡尔顿花园自由法国力量总部去。安德烈·拉巴特（André Labarthe）约我到那儿去见他。这次访问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它对我是福兮祸兮？

在卡尔顿花园，我见到了安德烈·拉巴特和他的两名合作者：勒顾特尔夫人和斯达尼斯拉·西芝兹克（我们叫他斯塔罗）。勒顾特尔夫人是华沙的犹太人，斯塔罗是泰申地区的波

---

<sup>①</sup> 他们都是从敦刻尔克撤回的。

兰人（这个地区是在1938年慕尼黑期间并入波兰的）。拉巴特自我介绍说他曾在巴黎大学讲授过力学。三人都向我疾步走来，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友好热情和说服才能。拉巴特领导着参谋部底下一个尚有名无实的部门；他接近将军，将军从一开始就对他有好感并让他负责创办一份月刊杂志。他向我表示他曾读过《历史哲学导论》，他恳求我放弃在坦克部队计算军饷的工作。他的理由，读者也能猜到。很多人都能够替我做会计工作，但眼下在英国，有多少人能够撰写文章呢？斯塔罗带着嘲讽的口吻对我喊道：“如果你想要英雄般地死去，你有的是时间，战争是不会马上结束的。”拉巴特是属于戴高乐主义运动组织的；军人们没有阻止他把雷蒙·阿隆中士调入参谋部。

在整整三天里，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在头脑里嘲讽地责骂自己。我离开家庭和法国，不是为了避难（从这一点看，美国是最安全的），而是为了和继续战斗的人们共同战斗。法国战败，令人感到耻辱的经历现在还留在我的头脑里。我不知道能否经得住枪林弹雨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只是个孩子，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体力上说我还年轻，那么我为什么要接受拉巴特的提议？我只能想起给自己找到的理由。我希望当一名坦克兵，人们却让我去做文书工作。今后我将和真正的战士在一起，但不算他们当中的一员。此外，拉巴特催我做出的决定，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杂志也许不会维持多久，或者会不再需要我了。我犹豫不决，是因为担心这个选择今后无法逆转。

对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而言，领导一个流亡法国的代表性杂志的编辑部并不可耻，也没有什么光荣。1943 ~ 1944年，和那些在每次任务中浴血奋战的飞行员 [如于勒·鲁瓦



(Jules Roy) 或罗曼·加里] 比较起来, 我觉得自己是“远离火线的军人”; 那些视死如归的人的目光每天都使我感到不安。但在 1940 年夏天, 甚至在 1940 年秋天和冬天, 我并没有感到这种内疚。可能是因为当时激烈的战斗正在英国进行着, 伦敦已是德国空军袭击的目标。

不管是人们已习惯的所谓闪电战——1940 年与 1941 年之交的冬天, 每天夜里伦敦都要遭到轰炸——还是 1944 年 V1 飞弹的袭击, 都算不上是战火的考验, V1 甚至更不是。在闪电袭击时, 除了一两个夜里, 我都照常躺在床上睡觉。按丹尼斯·布罗根的话说, 我们是“处在概率论的保护之下”。在那个时候, 至少在表面上, 在图卢兹的法国人作为旁观者远远地注视着战局的起伏变化, 而伦敦的志愿军却忍受着敌人的猛烈攻击。由于我问心无愧, 我比往常睡得更香。一天夜里, 为了保持人民的斗志, 英国人加强了防空炮火的力量, 高射炮震耳欲聋的声响, 超过了敌机炸弹的爆炸声, 弄得我好几个小时睡不着觉, 但我还是平静地半醒半睡地入眠了。当时我住在女王门区的法兰西学院的一所房子里, 这个学校是由克雷先生领导的。克雷在一些著作中努力澄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实情况, 他描写了战斗场面, 如步兵在战斗中的真实遭遇, 还澄清了一些错误的传言 (比如说关于肉搏战的情况)。这些书使他闻名遐迩。在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 他组织人轮流守护着学院里的寄宿生。1943 年, 在俄国战役爆发后不久德国飞机对伦敦的几次罕见的疯狂轰炸中, 学校的房屋被摧毁了, 他也在一次轰炸中被炸死。

1944 年 V1 飞弹的袭击只吓坏了那些神经脆弱的人。飞弹的威力只限于它引起的气浪。甚至房屋为气浪震垮, 一张桌子

便能使人免遭纷纷落下的木头石块或者玻璃铁片的伤害。飞弹推进器越近越响，但快慢不一。当声音戛然而止时，人们能够知道飞弹着点的大概位置。在最严重的时候，仅一天之内就有120枚V1袭击伦敦：头脑冷静，甚至满不在乎，都不足以测验一个人肉体的勇气。

在1940~1941年的冬天，伦敦在世界人民的目光里似乎成了抵抗希特勒的象征。如果只是强调一种象征，这个说法是名副其实的。其实，伦敦从来没有被破坏得像后来的德国城市那样。

233 我对安德烈·拉巴特有了浓厚兴趣。他无话不谈，出口成章，很有魅力。他时常提到他演奏小提琴的才能，他8岁时就已是演奏高手了。他的母亲很贫穷（是个女佣），父亲则可能很有名望（人们私下议论说是梅特林克），他往往为自己科学家的称号申辩。他曾经供职于人民阵线政府的航空部部长皮埃尔·科特的办公厅，被人认为是个左派人物。在1940年投奔将军的人当中，他显露出一流的人品，在戴高乐主义运动中，他将会前途无量。但由于他志向太高，由于一些我可以指出的不正常的地方，由于他有偏执狂的倾向，所以他的打算很少有对的时候，几乎总有些地方摇摆在对与错之间，这使他浪费了很多机会。

当我认识拉巴特时，他与将军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在第一次和英国人发生的严重的不愉快事件中，即米塞利埃海军上将因泄露了远征达喀尔的秘密而被英国警察逮捕，拉巴特表示坚决反对，态度不乏浩然之气。他去觐见戴高乐并为他的朋友米塞利埃提出担保；将军对其态度很是赞赏，因为他居然有这么一次没有什么政治上的盘算的行动。

事情过去很久以后，可能是1979年或是1980年，亨利·弗里内（Henri Frenay）向我证实说，拉巴特在临死之前曾经承认他是苏联情报机关的人员。我始终不相信这一点。如果他是苏联谍报人员，为什么放过在自由法国力量中收集情报的机会呢？他那马马虎虎的工作方式，经常发脾气，在沙龙里高谈阔论，爱好幻想胜于说谎，所有这一切没有任何地方符合苏联谍报人员的举止行为。<sup>①</sup>

既然让·穆兰（Jean Moulin）和共产党的关系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特别是亨利·弗里内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我就不能不提一下让·穆兰和拉巴特过去的友谊（他们两人过去同时在皮埃尔·科特的部长办公厅里任过职）。在斯塔罗这一方面，他常常夸耀自己曾向皮埃尔·科特求过援并从那儿得到过大量的资助，作为报答，他利用早饭和晚饭的时间，向他提供各种意见。让·穆兰来到伦敦时，一直避免碰到拉巴特。后者以为穆兰是不愿意受他的牵连，因为那时候大家认为他已经在戴高乐那里失了宠。

234

拉巴特的“参谋部”包括斯塔罗和马尔塔（Martha），两个都是个性鲜明并且因脾气古怪而接近边缘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塔罗在1918年后参加波兰军队之前，当过奥匈帝国军队的炮兵军官。他长期参加共产党（是波兰的还是德国的，我不知道），在苏联住过，并在魏玛德国开展过积极的活动；他和著名的芒曾伯格<sup>②</sup>很熟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起什么作用？他什么时候和它脱离关系的？这些我从来都

---

① 除非他在战后因郁郁不得志而做了苏联间谍，但我对此也是怀疑的。

② 芒曾伯格（Münzenberg）是共产党的活跃分子，在苏联宣传组织和受共产党操纵的左派运动中，在西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知道。但当我认识他时，我肯定他已经摆脱了一切关系，至今我对此仍确信不疑。他喜欢卖弄一种激进的、玩世不恭的派头。他说过，共产主义就是下级军官式的法西斯主义；而法西斯主义也就等于军人执政。不管怎样，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尽管有时他在语言表达上很吃力，甚至讲德语，讲他所受文化的语言也是这样。在我们刚开始合作的时候，他往往给我五十多页不成模样的原稿，由我打字加工成二十多页。关于法国战斗的文章经过这样的修改，再送给戴高乐将军阅读，将军会在边上写下他的评论。渐渐地，他的德文原稿开始接近一篇文章所要求的篇幅和文笔了；而我的工作则近于翻译。应英国新闻部门的要求，我们一起写了一本名叫《关键的一年》的小册子。这次他只是简单地写了一些想法，大部分都是我写的，因为自1940年以来，我已经开始研究起战争问题来了。我们对所有人过去对战略和战术的无知感到气愤，如同人们对经济的无知感到气愤一样。

斯塔罗尽管也很聪明，但并不具有我的法国朋友们那样的水平。他读过许多克劳塞维茨的书，这是肯定无疑的，但他没有读过多少哲学著作。可能是出于傲慢，他看不起谨小慎微的人和搞烦琐哲学的人。在他看来，将军从1958年到1969年的执政，与其说是否定了他的断语，倒不如说是证实了他的断语。他曾说：“将军是个法西斯分子。”不论是在共产党党内的时候还是反对共产党的时候，他都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给许多报纸撰稿，获得了广泛的知识。尽管他脾气暴躁爱发火，尽管他玩世不恭，我还是觉得——至今仍然觉得——他是三个人当中最好的一个人，这不仅仅是从智力上来看。

勒顾特尔夫夫人——勒顾特尔在法国某地生活过，她就在那儿入了法国国籍——当然也不乏机灵、活力、才干和智慧。在编辑部里，她负责审稿工作，她细心地审阅所有文章，并认真地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或者是改进意见。此外，她还管拉巴特和杂志社的交际工作。她对校对工作的喜爱程度，超过了这门工作应该受到的重视程度。可是，话说回来，她那些鼓舞人心的活动大概是必不可少的。

在杂志周围还聚集着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和边缘人物。其中为首的是巴葆格男爵夫人，她出身于爱沙尼亚的一个日耳曼贵族家庭，年轻时候非常美丽，很有魅力，为某些重要人物所崇拜，其中便有威尔斯（H. G. Wells）。后者我见过两三次，临死之前还在与疾病做着顽强的斗争。我还记得他说过关于巴葆格男爵夫人的一句话：“人人都喜欢她，因为她是如此的可爱。”英国政府的部长布鲁斯·洛卡德（Bruce Lockard）在俄国革命发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曾在那儿待过，他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过“穆拉”怎样闯进了他的生活。对她的崇拜者来说，她脸部的线条能燃起他们还不曾完全熄灭的爱情。她家每天晚上都有沙龙小叙，在那儿，人们可以碰到许多上流社会的成员，但最高阶层的人是难得光临一次的。

《自由法兰西》杂志的创刊和成功，应该归功于它的四名“专职人员”，其中有两个还不是法国人。斯塔罗和我一样，也是不可少的人物，因为他负责构思和撰写每个月的军事形势分析和战略分析。这些文章比其他所有文章更能为刊物在知识分子圈里赢得声誉和权威。然而斯塔罗不能没有我。而我们两个，斯塔罗和我，又不能没有马尔塔，她负责鼓舞人心和对外联系。我们也不能没有安德烈·拉巴特，他不乏慷慨忘我的气

质，而其雄心壮志却有点天真幼稚。没有他，杂志便不可能存在，虽然他署名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是他自己写的，杂志也由于他的过失而失了方向。

我很难在强调杂志的成就时避免自我吹嘘的嫌疑。现在已时过40年之久，我对杂志的感情已经比较淡了，再不至于回想当年，得意到发笑的程度。我斗胆引用亚历山大·柯瓦雷的评价，他在战争快要结束时给我的信中写道，在国外的法国人出版的东西不多，只有《自由法兰西》是流亡国外者编得最好的刊物。

我曾经送给萨特一本六个月的杂志合订本，他在《战斗报》上写了一篇颂扬文章（应该考虑到当时的环境和我们的友谊）。我在这里摘录一段如下：

《自由法兰西》表现得最为沉着、最为冷静和最为平稳。首先，在时局捉摸不定，火热的发展本身难以预料的时候，这份刊物似乎是始终与历史保持一定的距离来看问题。这些人被流放国外，离开了他们的家庭，在法国被人咒骂，而内心又受到希望和悔恨的折磨，他们怎能保持这种不带偏见的客观态度整整四年之久呢？四年前写的军事文章，事过境迁，到了四年之后，读起来照样令人感兴趣，这样的文章多吗？各种关于维希政权、法国局势、意大利舆论或德国的报刊、国际法以及军官或士兵叙述战况的报道，可以分成三个均衡的专栏。所有这三类文章都显示出惊人的才华胆识：雷蒙·阿隆（署名勒内·阿沃尔）的专栏文章为我们分析国家社会主义，他的分析像光谱那样层次分明，光彩夺目。一个匿名作者的军事评论文章，

善于从世界角度来分析这场全球战争的各个战役和战略问题，并说明军事的成败与经济斗争是多么息息相关。最后是经济学家勒内·瓦歇（罗贝尔·马若兰）的文章，他研究的是战争和战后的各种问题。<sup>①</sup>

我每月为“法国专栏”写一篇关于法国时局的变化和现状的文章，以及一篇关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分析文章，我还将斯塔罗的文章译成或改编成法语的。有时候，我还写一篇以拉巴特署名的编辑部文章。在文学方面，我们发表过茹勒·罗瓦和阿尔贝·科恩的作品，但这些文学作品往往不太出色。萨特有一次读了科恩的一篇文章，大为光火，对其文笔感到厌恶。他对我说：“这个阿尔贝·科恩是谁？”这是一篇关于德国军队遭遇俄国的冬天而无法动弹的文章。茹勒·罗瓦也写过一些质量较高的文章。我在伦敦还看到过罗曼·加里《欧洲的教育》一文的手稿，当时我就看出他要有辉煌的文学生涯。在我回到法国以后，1946年，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的一篇文章使我深为感动，尤其因为他从前曾在私下严厉地批评过拙作《导论》。他评论了我的两本书，在这两本书里，我收录了“法国专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文章。<sup>②</sup>

237

他评论说：

……交代过了这一点，雷蒙·阿隆的这两本书对我们

---

① 萨特读的是1941年下半年六个月文章的汇编。罗贝尔·马若兰在这一时期定期为杂志撰写稿件，只是在海军上将米塞利埃事件后，才有理有据地与杂志脱离关系（米塞利埃当时在海军参谋部）。

② 即《反抗暴君的人》和《从投降到全民举义》。

历史学家来说更加值得一读。文章写于英国；作者全面论述了动乱时期的法国、法国的反应和责任。这些文章甚至并没有借用分居两区的法国人好歹还有的那些少得可怜、以各种方式和出于各种动机而被断章取义和弄虚作假的消息。但正因如此，雷蒙·阿隆更多地面向外国，特别是向盟国的读者解释他的祖国，而不太管那些不可能弄到手的详细资料。他的意图就是使国外能理解“法国的全部现实”。那么，我们留在法国的人，身临其境，经历过那些时而使我们激奋，时而又使我们消沉的重大事件，我们的理解是否与他们的解释始终一致呢？如果不是，那我们在哪一点上不同呢？这儿有一个杰出的历史心理比较研究的问题。我希望人们不要错过机会，也希望有人会想到为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若要认识法国人（因为有各色各样的法国人），这项工作是最关紧要的。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处境大不同的法国人做出的反应是，感情根本一致，而在感觉上却显然有差别。

我无须说，执行这项棘手而又诱人的任务是不会徒劳的，而且事前便从兴趣中得到报酬……雷蒙·阿隆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成功的，他的研究是透彻的、细腻的和具有罕见洞察力的……他既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又是政治评论家，并且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打开这些赤诚之作，人人都会一口气把它们读完，并且像作者所希望的那样去进行思考。

35年以后，让-路易·米西卡——国家电视二台的两个制作节目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对我的“法国专栏”的文章



的口气和我们对犹太问题的含蓄表示惊异。利用这些访谈的机会，我又翻阅了40年前的几篇旧作。

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文章只是一种明证，或者是一种资料。我掌握着两个地区的法国新闻。在被钳制言论的报刊中，消息仍然是有的，但德国档案部门提供了许多其他消息；或许，法国档案部门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时过多年来看，使我不安的是，这是一个三十来岁信仰犹太教但又不是严格教徒的法国人提出的隐约批评：为什么这么冷酷？为什么只有一两节中的三段内容谈到了犹太人的地位或冬季赛车场中大举搜捕犹太人的事？

关于这些专栏文章的口气，我是可以辩解的。《自由法兰西》的价值和成功之处，恰恰就在于它不是战争文学。某些近似战争文学的文章，反而受到我们最好的朋友的批评。前不久，在我在牛津大学做完讲演后的午餐会上，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理查德·戈贝提醒我说，他曾经见过我两次，第一次是他到《自由法兰西》编辑部来拜访我。他说：《自由法兰西》是他当时能读到的唯一的法国刊物，它着重文化，不做宣传，不做过激的论战，真是一份法国式的杂志。

确实，我们避免使用那些为今天的“哲学家们”所喜爱的形容词。把反犹太主义叫作“下流的蠢货”，这似乎十分可笑。对我们来说，反犹太主义并不是残酷的回忆或无所不在的威胁，而是现实。我们是否必须在我们的“法国专栏”中予以更多的论述？今天，我当然会说“是的”。但在1940年和1943年之间，甚至可能到解放的时候，我更多地关心的是维希人物亲德或反德的心情，而不是他们在内政上的主张。在戴高乐派里面，也有反犹的。1940年秋天，一个第四共和国的

部长——我不想说出他的姓名——对我说过：“只要德国人不侵占我们的国家，我就不会那样反对维希的国家革命。”

我不需要在一个坚持不懈地捍卫民主的法国杂志上增加对维希分子的痛斥，以证明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维希分子，至少在上层班子里，确实并不一直是按德国人的指令行事的，他们在实践他们的某些理论；我知道，他们是靠战败掌握政权的，但是，我也知道他们的某些思想是在战败之前就已经有的，而在胜利之后还在坚持着的。为了重建法国，当然就应该尽可能地少把“叛徒”清除出去。作为敌伪的叛徒应该清除，作为国家革命的追随者而成为叛徒的，显然不该清除。冷静地想起来，今天后悔清洗没有打击到所有拥护国家革命的人是想挑起内战的人。哪怕在1941年，我都没有沉溺于这种卑鄙的情感。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种指责：我在专栏中没有用足够的篇幅来谈迫害犹太人的问题。我对于维希政府的法律（但不指它的实施）比较冷漠，理由很简单。假如德国赢得了战争，犹太人在法国和欧洲就将会消失。假如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维希政府给犹太人规定的地位也不会得以维持，而是随着战争而消逝。剩下的就是法国警察根据德国占领当局的命令所进行的大搜捕，还有犹太人从德朗西集中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命运。我们知道，占领体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西方到东方，是有很大差别的。希特勒的种族观念大体上决定了占领的模式。在整个西方，尤其是在法国，小学、中学、大学的工作几乎是正常进行的。在波兰，占领者禁止办高等教育，仿佛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必须把他们的土地奉送给优等民族，或者在那儿为他们的主人的荣誉，按命令出力效忠。我们不是

不知道抵抗者的活动，也不是不知道盖世太保的镇压和犹太人的流放。但是，在伦敦，自由法国的机关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懂得犹太人被遣送到东方与抵抗战士被捕后的流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呢？在伦敦，人们窃窃私语，含含糊糊地提到大社党<sup>①</sup>的两个领导人自杀的事件。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为了提醒世人，正视欧洲东部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而除教皇外，能够发表讲话的两个人物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却一言不发。

假如我们掌握了这些必要的材料，我们能在《自由法兰西》的刊物上加以利用吗？我们不受什么新闻审查的约束，我们实行的是文责自负。我们的杂志不能陷入德国人在1914年为了诋毁协约国控诉他们暴行的宣传而编造出来的德国式反宣传。我们认为，希特勒政权、盖世太保及其暴行已为举世公认。其余就不用细说了。1944年法国解放后，我就不再参加杂志的编辑工作了。例如，现在被人们视为经典著作的《最后的秘密》<sup>②</sup>，我却一点儿也不知道，或者说是一点儿也不想知道。我说“一点儿也不想知道”，是自己的良心问题。我还记得，当时人们在报纸上曾隐约提到那些不愿回国的苏联人。

有一个疑问至今仍使我费解。我们在伦敦是怎么知道种族灭绝<sup>③</sup>的？英国报纸提到过吗？假如它们提起过，那么是假设的，还是肯定的？扪心自问，当时我知道的差不多只有这些：

---

① 波兰犹太人组织的社会党。

② 这本书是一个美国外交官写的，其中谈到，所有留在西方的苏联士兵与平民应一律送交苏联当局。英美两国为此在雅尔塔会议上做出了承诺。

③ 人们习惯用“宰牲”（holocauste）这个具有宗教色彩的词，但我觉得“种族灭绝”（génocide）这个词更为准确一些。

- 241 集中营是残酷的，牢头禁子不是政治犯，而是从犯了刑事罪的罪犯中招募来的。在那里死去的人的数量是惊人的，但是我承认，对于煤气室，对于屠杀工业化，我并没有想到过，因为我无法想象，我对此便无法知晓。

几年前，雅克·阿塔利 (Jacques Attali) 在一次电视节目里谴责了战前的年代，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毫无预见，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创造自己的命运，去避免纳粹党为他们安排的命运。这种谴责虽然不是针对我而是针对一代人的，却也使我感到不快。虽然因为缺少个人财产和结交势要，我没能德国犹太人做很多事情，但是我还是帮助过他们中间的若干人。汉娜·阿伦特没有忘记过我对她所能做出的微薄帮助。我的朋友和我们都明白，自 1933 年以后，希特勒德国就不再有犹太人的立足之地了。尽管我自己也是个“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但我仍然憎恨那些“以色列子民”把逃难来的犹太人看作“德国佬”，看作新反犹太主义的机会 (或原因)。我曾给法国研究之家的一个同事写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因为当时他写道：用法律约束刚从波兰来的尚未同化的难民倒是可以接受，因为这样可以使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就已定居的犹太团体幸免于难。法国的以色列子民努力将他们的命运和“波兰佬”的命运分开的做法使我感到恶心。但是我不认为，哪怕是希特勒分子，竟然有“最终解决方案”的想法：冷酷地将几百万男女和儿童宰尽杀绝，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如此残忍地屠杀同类，谁敢预想得到呢？据说，苏联的土地集体化造成了更多死亡。一个暴君出于狂热，坚持用暴力把一个农业国家改造成庞大的帝国，农业集体化作为一个意识形态政党的方案尚能有幸得到一位普通人，一位 1930 年代的欧洲人的理解，那么，种

族灭绝计划的实行，也不能使我责备自己没有预见到它会实施，并责备自己没有《自由法兰西》杂志上写过一点儿有关的东西。

一旦停战协议签订，法兰西的部长们（包括最反对德国的人）就只能等待着重新拿起武器的有利机会，等待着盟国可能会向他们提供的机会。但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首先是对这场全球战争的性质判断错了；他们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打算与希特勒德国缔结和约。同样，他们对时局的发展也做了错误的估计，他们对希特勒的计划存有幻想，并且在战争进行当中或是战争后期都对法国的分量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242

法德停战并不叫他们非喊国家革命的口号不可，更不必主动去制定犹太条例。我远在伦敦，宁可相信维希政府最丑恶的言辞行动都是因为“战胜者”的逼迫，而并非出于法兰西国家主子们的意愿。今天的材料已不再能允许做出这种解释，至少在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反英、反盟国和反犹太的宣传表明，海军将领们、反革命知识分子、法西斯分子或准法西斯分子的偏见与情绪使他们由于打了败仗而互相接近起来，尽管各人的志向不尽相同，但是共同的仇恨使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维希分子通过这种宣传，完全不去号召法国人重新起来斗争，反而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他们在土伦港炸毁自己的舰队便是一例，可谓荒谬绝伦。

当叙利亚、北非和其他殖民地遭到英国所谓的“侵略”时，维希政府居然命令那里的政府或军队司令官抵抗到底。事后，他们又解嘲说，他们之所以下这样的命令，那是害怕海外的法国人过于轻而易举地投奔英美，会致使德国人报复国内的

法国人。只有奥弗昂 (Auphan) 海军上将拍拍胸脯, 给达尔朗 (Darlan) 海军上将一份电报, 肯定元帅本人心里是愿意和英美“入侵者”达成协议的。我怀疑对德国报复的畏惧会使维希分子认为, 把在叙利亚打的一场面子仗变成决一死战才是最好的出路 (假设打面子仗是不可避免的)。1943年, 马达加斯加仍然抵抗了英国人达几个星期。维希历任政府没有一个把停战的代价压缩到最低限度。

243 政治生活并不只限于被占领的半个法国, 在此之外, 政治生活仍然继续进行着。在维希, 等待派和合作派争权夺利, 彼此都在努力赢得元帅的宠信, 而元帅的威望对它们来说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达尔朗海军上将还是皮埃尔·赖伐尔, 都始终不想深深陷进希特勒的冒险事业。不过后者在等待派中最为亲德, 然而二者都经常与战胜者进行谈判, 时而因设想德国的胜利而想争取领袖希特勒的宠爱, 时而是为了减轻占领当局的严厉镇压。维希人物来自各个阶层, 有第三共和国的追随者、极右的空论家、专家治国论者及亲法西斯知识分子。巴黎的人攻击维希人物, 指责他们停留在两个阵营之间。1944年有德阿或多里奥参加的维希政府, 与1940年有诸如拉斐尔·阿利贝尔 (Raphaël Allibert) 那种保皇分子参加的维希政府相比, 已经大不相同。

虽然让·莫内或安德烈·莫洛亚去了美国, 但在伦敦的大多数法国人决定返回法国。他们各有各的想法, 却往往是值得尊敬的。某些人对盟国事业的信心永不衰弱, 但愿与家人同担未来岁月的艰辛。另一些人则认为, 尽管勒内·卡森在《自由法兰西》第一期上发表文章谴责, 不过与一个目前几乎拥有一切合法地位 (是否有合法性则仍将让人争论不休) 的政

府断绝关系的时刻尚未到来。被委派到法国政府来的苏联和美国大使就驻在维希。6月18日，戴高乐将军的举动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或许是时势造就，他在战后得以主持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即使他没有马上激烈地要求一种与流亡政府极为相似的地位（许多被占领国家的政府的地位）。

1940年在将军亲自授意下创刊的《自由法兰西》杂志，从来都不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的刊物，而是属于自由法国人的运动。它的第一期就使将军感到失望，并且还可能使他有点儿恼怒，因为他的名字仅在括号里出现一次。<sup>①</sup>他曾微笑着向拉巴特提到这一点。几个月后，他给杂志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了对他的老首长保罗·雷诺的尊敬。1941年年初，拉巴特还没有打算和将军断绝关系：他希望将军承认他自己加给自己的功劳。

244

对夏尔·戴高乐的个人崇拜是与运动本身同时产生的。停战协议成为所有的维希人物最终丧失威信的原罪。当时，戴高乐派立即宣传攻击这个向敌人出卖我们部队、武器装备和我国港口的“偶然产生的政府”（仿佛军队投降后，德国人会什么都拿走）。戴高乐在他最初的某次演讲中，曾指责或怀疑维希政府想把舰队出卖给敌人。

当时，我并没有掌握所有必要的材料，来对停战协议加以裁判。但是，我倾向于相信，停战是无法避免的。不管怎样，我并没有觉得这些签署或承认停战协议的人因此就声名狼藉。法国政府能在北非接收些什么部队、什么装备呢？元帅和赖伐

---

① 在第一期中，勒内·卡森谴责了停战，并对贝当元帅政府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提出了异议。

尔宣布他们不会离开法国，如果去北非，多半是要组织政府的。但是飞行员和水兵们会听从什么样的政府呢？有多少身着军服的人要被送到德国人的集中营里去呢？法国政府迁至北非的事情最迟也必须在5月底定下来，在6月初就组织好。临时仓促组成的政府，对同盟国的事业是有利还是不利呢？当然，这些最后在波尔多执掌权柄的人物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而并没有认真盘算军事投降和停战协议两者之间的利弊得失及其严重后果：他们对民主感到灰心，对法国感到失望，他们寄希望于一种“复辟”或一种专制制度。将停战协议强加于人的是一个政治派别，因此，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同时，戴高乐派便揭露他们是“法西斯分子”（这个停战，人们称为“投降”，而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投降，即军队投降的决定，却被魏刚将军坚决拒绝了）。

245 时至今日，争论并未结束。对贝当元帅的案件进行预审的法官们，并不接受起诉要点中的停战问题。戴高乐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对法官们拒绝受理对停战的起诉一事并不原谅。既然将军自1940年6月18日以后就要求权力的合法性，而在1946年1月又带走这种合法性而隐退科隆贝双教堂，那么停战就应该是桩罪行，而将军的号召才真正表达了法国的意志，不过当时法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后时局的演变也证实了这种合法性的传说，但是在1940年年末，整个法国，包括法定社团、军队、海军、空军，都是奉元帅之令行事的。不应该排斥一切维希分子，而应该把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引到法国和盟国的事业上来。

在清除了第三共和国的遗老之后，第一任维希政府——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以拉斐尔·阿利贝尔为代表的第一批维



希分子，就明确地宣布了他们的反革命立场。这批人接受了莫拉斯的思想。这种反动可以与1871年保王党在国民议会取得多数相比。从1940年6月起，维希和伦敦两地的广播——直接受德国人控制的巴黎电台不算在内——便以一种不可调和的敌对语言相互攻击。但是，法国人并没有全体参加这场殊死的搏斗（许多人一直认为贝当元帅和戴高乐将军是在唱双簧）。直到1942年11月，法国还保持着避免发生内战的局面。

在伦敦时，我们经常讨论北非的命运。与我争论的人当中，大部分人引用的论据都非常简单，他们认为：“既然德国人允许维希保持其在非洲的权力，这就说明他们从中得到了好处。”这种论据是以希特勒分子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观点为基础的。我反驳的理由是，战争双方都从这种中立中得到了好处：德国人省去了为直接控制北非而必须派遣的占领军；盟国则可以等待它们能够拥有登陆工具的时刻。后来我在克劳塞维茨的书里读到过关于敌人之间存在默契的英明论断：占优势的一方本应进攻，但优势尚不足以抵消守势内在的好处。北非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论断。最强的一方，德国，对它而言，去担负这块领土的责任还无利可图，因为战争胜负全取决于俄国战场。和法国的停战协议一签订，德国和盟国便都乐于维持现状了。按照这种分析，维持现状是有利于能够动员法属北非的那一方的，也就是说，有利于盟国。正如丘吉尔1942年11月在阿尔及尔对J. 乔治将军所说的：“归根结底，这样是最好不过了，因为在1940年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既缺少军队，也没有装备。”当然，这句话遭到了辟谣，但我相信是得到验证了的。

246

在1941年和1942年，我们经常猜测，盟军一旦登陆，局势将会是什么模样。我不止一次和加拿大大使皮埃尔·迪皮伊

谈到这个问题，他经常来往于维希与伦敦之间，就算不是正式兼任，但实际上，他既是驻维希政府的大使，也是驻自由法国的大使。他分析了维希的不同集团，虽然没有肯定维希分子终究会归顺盟国的事业，但也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可思议。1942年11月，魏刚将军<sup>①</sup>、一些部长以及J. 博罗特拉 (J. Borotra) 哀求元帅去阿尔及尔。我们知道，劝告并无结果。元帅绝对不肯离开祖国；他自以为，只要有他在，就能够保护法国人民不受占领者特别严重的迫害。因为元帅不在，北非的官兵最终就会承认将军的权力。维希的反英宣传特别使得海军向盟国的倒戈推迟了。而在1940年至1942年，戴高乐派的政策和宣传也不利于推动海外两个法国的联合。

我希望——但不认为能成真——盟国在非洲登陆的时候，法国人团结起来，剥夺维希政府最后的武器、军队、舰队和帝国，并剥掉其合法外衣。在叙利亚，听从元帅的部队曾顽强地对自由法国和英国军队作战。在战斗结束后，大部分士兵宁愿被遣返回国，也不愿归顺自由法国。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北非登陆，是对戴高乐将军保密的。或许是因为他们怕守军抵抗自由法国更甚于抵抗盟军，或许是因为出于对将军本人的敌意。美国人寄希望于吉罗将军，错误地认为他能够使北非的力量归顺到盟国方面来。“权宜之计”——按罗斯福的话来说——即海军上将达尔朗所扮演的角色，倒并没有引起我太大的反感，因为他结束了法国人和盟国的交战。他在元帅和将军之间起了过渡作用。我不喜欢内战，并且不太赞成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偏激情绪。

---

① 至少是在最初的日子里。

不管停战协议是否可以避免，维希与伦敦之间的冲突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双方都有人以法国正统政府的化身自居。正如在1941年的一个晚上，勒内·普利文（René Pleven）和我单独在一起吃饭时对我说的，从一开始，戴高乐将军便面临着两条选择道路：或者建立一支志愿军，在这种情况下，他什么也不能代表，与这场全球战争比起来，这些兵力是微不足道和作用有限的；或者建立一个负有将来成为法国政府使命的政治组织。在这两条道路面前，他并不犹豫，而且，在戴高乐将军与英国政府在温斯顿·丘吉尔指使下达成的协议也是无可怀疑的：这些协议保证了自由法国的独特地位，对外代表了法国的利益，并使戴高乐将军成为愿意继续战斗的法国人的领袖。而戴高乐则应谴责贝当元帅的“骗局”。1942年11月，从某些戴高乐派拉长了的不高兴的脸上可以看出，一些维希分子半归顺的举动，已使他们害怕失去在抵抗运动中的垄断地位了。

我想，在1940年7月，将军不可能选择别的道路，但是，他有可能降低反维希政治斗争的调门。他没有必要劝英国人打叙利亚：局势的演变只能对他有利。即使元帅在1942年11月迁都阿尔及尔，戴高乐将军大概也是会作为元帅的继承者登上权位的。然而，将军却不愿意，说是为了法国，其实也是为了他自己。

从1940年6月起，他就认为自己是合法权力的执掌者。在他自己看来，他的使命一下子变得神光焕发。表面上看来，他好像是为他自己，其实他所追求的是为了法国。如果说他把在英国军队中进行战斗的法国人看作逃兵，那是因为只有他代表了法国，因为在他看来，对付盟国的外交斗争和反对敌人的战争同样重要。他“不顾一切”争得人们对他的地位的承认，

这对法国是有利的，而正是由于他并通过他，法国才始终没有离开自由和胜利的阵营。史诗般的英雄形象，历史传奇，他都并非不可推辞。

自从海军上将米塞利埃和戴高乐将军发生争吵以后，不属于戴高乐派但接近戴高乐运动的《自由法兰西》杂志便被认为是反戴高乐主义的了。与海军上将关系密切的安德烈·拉巴特必然在这场严重的危机中占有重要地位。米塞利埃海军上将用他的口气谈过这个事件，将军在著作中也谈过这件事，这都足以说清事件的来龙去脉。我没有本领再添新东西。

A. 拉巴特没有对我讲过他所做的一切，而他所说的也并不总是准确无误的。1941年12月，根据将军的命令，海军上将米塞利埃夺取了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如果人们喜欢更正统的说法，他在这块法国领土上挂起了洛林十字的三色旗，并赶走了维希政府的代表。这次行动是秘密进行的，没有通知英国人或美国人。按照将军的说法，美国人和加拿大人本来计划要夺取这些岛屿上的电台。

美国人的反应极为粗暴，当然还只限于口头上。他们反对自由法国插手该地区，因为这是美国人与元帅默契达成的规定。在某种条件下，法国在西半球领地上服从维希政府的行政当局，不应遭到损害。表面上，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事件破坏了这个协议。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满怨恨地称呼这些人为“所谓的自由法国人”。这个称呼在新闻界和美国国会的某些阶层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其实，他倒帮了将军的忙。即使国务卿不乏抱怨的理由，但他却把自己放在理亏的位置上，并得罪了美国的亲法舆论。

至于戴高乐，正如他当时的来往电报及他后来的《回忆录》所证明的，他丝毫没有怀疑他的行动是正当的。在其《回忆录》的《书信、批示和笔记（1941年7月~1945年5月）》一卷中，我发现了一句话，流露了他当时的思想：“如果我们的盟国出于一些权宜之计的理由，接受法国全面的或局部的中立，我们是不会同意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尽一切努力来阻止这种不管我们愿意与否的中立，我们将在各个方面采取力所能及的、或文或武的措施，来制止这种中立。”他又补充道：“此外，我们认为这是出于对共同利益的考虑。”换句话说，对维希当局的斗争（包括使用武力），乃是原则问题。<sup>①</sup>

美国人的愤怒并没有动摇将军。更确切地说，倒是后者带着艺术大师的神色，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场他掀动起来的风波。英国人并不埋怨自由法国的领袖把石头投进池静蛙鸣的水塘里，也不埋怨他捉弄这个国务卿，因为他一直搞他的“维希赌博”。“维希赌博”是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sup>②</sup>说的。

对于海军上将执行将军的命令，完成使这些岛屿归顺自由法国的任务的方式，将军表示了赞扬。但是，海军上将本人并不赞成将军强迫他对美国人采取的咄咄逼人的做法。当他回到伦敦后，岛上的民政事务由阿兰·萨瓦里负责，军事指挥则由路易·德·维尔福斯负责，他这么做，似乎试图改变国民委员会的运行方式，以避免将来重大的决定只由一个人做出而不经过程协商。（在这种条件下，是否能做出与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sup>①</sup> 1940年，他向志愿人员所做的不与法国人交战的承诺，已经成了明日黄花。

<sup>②</sup> W. 兰杰。

有关的决定呢?) 通过将军的《书信集》和《回忆录》，人们可以看到危机的几个阶段。海军上将辞去他的国民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同时希望保留自由法国海军部队的指挥官职务。但是，几天后，将军撤销了他的指挥权，而任命海军中将奥博瓦努接替他的职务。海军做出的表示是与海军上将米塞利埃站在一起，尤其是在参谋部里。英国政府也向将军施加了压力，首先，将军不应该辞退海军上将，其次，如果将军坚决不改主意，也应该为海军上将保留与他军衔和功勋相符合的地位。在250 被邀请离开伦敦去外地休假之后，海军上将拒绝了将军的召见，并与之断绝了关系。他拒不接受自由法国军事力量监察员的头衔和职位。

在这整件事情中，在这桩往往被人叫作“阴谋”的事情当中，安德烈·拉巴特经常起的真正作用是什么？无疑，他推动了海军上将起来反对“权柄独掌”，但是，照我看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造成海军的“分离”或“分裂”。不管许多军官对海军上将个人有多么爱戴，这也是不可能的。追溯以往，米塞利埃和拉巴特的企图显得幼稚可笑，在国民委员会内，海军上将孤掌难鸣。英国的支持，他们倒是并不缺少，或许他们就指望着英国的支持，但是将军傲慢地拒绝了这种对自由法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这完全是法国的内政。在事情平息下去之后，将军对英国政府做了个让步——我已经提到过——他建议给海军上将一个没有实权的荣誉职务，但人家宁愿挂甲归田。

路易·德·维尔福斯 (Louis de Villefosse) 素有贵族气质和无私精神，依然如故地效忠于海军上将。海军上校莫雷 (他的真名叫穆莱克) 同样如此，而且和拉巴特一道搞了些小动作。至于米塞利埃和拉巴特，归根结底是希望扩大在运动内

的地位，限制将军的无限权力，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被排除在外了。这次危机在《自由法兰西》编辑部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自由法兰西》由于主编的政治活动，照样被认为是反对戴高乐的。

到了1942年11月，戴高乐派政府与《自由法兰西》之间的距离更远了，当时，英美部队已经在北非登陆，那儿的维希当局打了一阵子面子仗而归顺了盟国的事业。杂志的一篇社论措辞暧昧，号召全体法国人联合起来，结果遭到将军御用机构的严厉批评。雅克·苏斯戴尔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没有保存下来，他在信里指责我们没有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并且破坏了战斗法国的原则。

如果不是海军上将米塞利埃和安德烈·拉巴特到北非去投奔吉罗将军，听他调遣，这次决裂很可能不至于弄得不可挽回。根据我的记忆所及，当时杂志并没有追踪将军们内讧的全部曲折发展，但是，总编采取的立场使《自由法兰西》站在吉罗将军一边，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吉罗将军下台后，杂志就置身于非戴高乐主义或反戴高乐主义者之中了。特别是我在1943年发表的文章《波拿巴的阴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纷纷，因为这篇文章一方面将波拿巴主义与布朗热主义做了比较，另一方面又与法西斯主义做了比较。我列举了公民投票的恺撒政体的各种特征。我写道：公民投票体制可以提供机会，使得一个人，或者简单的一个人独揽民心，资产阶级归顺恺撒，议会威信扫地，共和派分裂，人民群众莫知适从。从布朗热事件的根源中，我发现了一种相同现象之间的联系：“共和国反对议会，在资产阶级的恩准下鼓动群众。将军既是共和派，又是复仇派，凝聚在他名字周围的是由于战败而感到蒙受

耻辱的爱国主义激情，以及对民主浪漫主义的期望。”

我反驳了反对将 19 世纪的波拿巴主义和 20 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做比较的两种不同意见：一是在 19 个世纪是农民起决定性作用，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根源在于经济危机。我认为：

农民的作用是法国波拿巴主义的特点之一，但除此之外，也存在城市的波拿巴主义，即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甚至工人的波拿巴主义者，还有易于受征兵号召感动的激进分子、民族主义者、投石党分子，他们既是共和分子，同时又希望建立强有力的政权。此外，一种对民族英雄的幻想所形成的各种极端分子的结合，一个维护秩序的政党报效群众所爱戴的冒险家，对真命天子的热情的爆发，游移不定的人群挺身而出，所有这些构成了法西斯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共同特征，并证明这种比较是对的。

至于第二点异议，即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社会经济情况根本不同，我可以用一个问题来反驳：

为什么法国在其他所有欧洲国家之前，便有了人民的恺撒主义的特殊形式？……由于对“财产均分”的恐惧，在农民群众当中形成了一支恺撒主义的后备军。农民因为有了家业，已经变成了保守派。1930 年后，对无产阶级化的恐惧也使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当中形成了同样的恺撒主义的后备军。

分析的结论如下：



波拿巴主义既是法西斯主义的前身，又是法国模式的法西斯主义。说它是法西斯主义的法国前身，是因为政局不稳、国家受辱而激起的爱国心、对社会福利的追求——其中夹杂着对用革命手段争取政治待遇的不关心——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在一个国家里多次形成了一种全民投票的局势。说它是法国模式的法西斯主义，是因为一旦时机合适，总有成千上万的法国人聚集在一个时势造就的人物周围，以补偿他们平时因感情冲动而对当政者采取敌视态度的行为。还因为在法国，一个专制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借重第一次革命，要口头上歌颂民众的意愿，采用左派的语言，自称超乎党派而面向全体人民。

文章的意义在于号召读者提防再出现这种情况，这几乎是不存在疑问的。“无论全国人民如何一致渴望自由，但只要制度没被改变，总有铤而走险的可能。饱受屈辱的国民将会易受一种敏感的爱国主义的鼓动。”我的分析之所以演变为论战，是因为我用路易 - 拿破仑住在伦敦，确切地讲是住在卡尔顿花园时写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铭文，那句话就是：“民主的实质在于由一个人来体现民主。”莫里斯·舒曼认为这是“做坏事”，丹尼斯·布罗根则对文章大为赞赏。一个专门研究第二帝国的英国历史学家对文章的肯定，证明我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今天，我有所后悔的是文章里的某些影射，而不是文章本身。

我所后悔的过错在于什么地方呢？将军、路易 - 拿破仑以及所有谋求最高权力的人，都有着明显的相同之处。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认为，路易 - 拿破仑“相信他比法国诸王

的后裔更有合法性”。将军则赋予自己一种他在流亡期间和隐退时都极为小心地维持着的不可剥夺的合法性。他在1958年重新执政时是根据他6月18日的行动，尽管法国人民当时并非都谴责停战协议，也没有全部接受6月18日的号召，把他当作法国复兴后仍然继续存在下去的个人合法性的创造者。戴高乐和波拿巴叔侄俩一样，讨厌政党和派别；他是直接向全体国民进行对话的，并且像路易-拿破仑所做的那样，利用全民投票的方式。与那些吹捧者所肯定的事实相反，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使命局限于军事上的胜利；他设计的蓝图（为什么因此而对他苛求呢？）是为法国提供“完美的制度”。

但是，出于民主的信念，他事先就对他的权力进行了限制，或许这也是为了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他的共和国的正统性。他拒绝了抵抗运动的某些成员——如亨利·费雷内、皮埃尔·布罗索莱特——提出的建议，即为了防止旧政党卷土重来，将各抵抗运动团体组织成一个政党，或至少是暂时的一党掌权。然而，他回到法国时带来了一个协商会议，一个洗刷了1939~1940年错误的合法的共产党。当然，他并不希望恢复第三共和国。出版《法兰西日报》的激进党人和社会党人有理由认为，戴高乐主义者的共和国同议员的共和国并无相似之处。当人们已经意识到后者的种种缺陷时，凭什么事先就拒绝这种前景？

我今天重读《波拿巴的阴影》这篇文章，感到毛病在于它的遗漏，而不是它已提出的问题本身。戴高乐将军既不是蒙克（Monck）将军，也不是政变将军，他希望制定一部按他的设想制定的，并且在他以后能继续存在下去的宪法。1958年，他实现了这个目标。

在美国，如同在英国，反对维希制度的法国人并不都支持戴高乐。在纽约，安托万·德·圣艾克絮佩里便招致戴高乐主义者的愤怒，把他视为卖国贼，而他本人则认为后者的宗派主义是无法容忍的。在英美联军登陆北非以后，他为一切诚心抗敌的法国人的和解感到十分高兴。但是，雅克·马里坦给他写了一封严厉责备他的信，使他大为伤心。<sup>①</sup> 一个不是戴高乐派（就算不是反戴高乐主义者），另一个则是戴高乐主义者。前者看到的是维希政府被占领军掐住了喉咙，为了保住“孩子们的奶”而不得不向占领当局妥协让步；后者则不遗余力地声讨停战协议，根本不能想象自己这派人竟可与曾在维希政府中担任过职务的人和解。一个是拒绝谈任何政治，只希望重新战斗；另一个则号召战争必须是要有领导的，而此任非将军本人莫属（在这一点上，马里坦言之有理）。这样，旅美法国人的两种主要的思想，两个卓越的思想家，便发生了冲突。圣艾克絮佩里虽然去了非洲，但并没有参加抵抗运动，他认为阿尔及尔的宗派分子与纽约的宗派分子都是一丘之貉。他颇费周折，不顾规章制度，获准驾驶一架闪电式飞机。后来他在法国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殉国。

254

另一个法国知名人士圣琼·佩斯（亚历克西·莱热），也坚持着他在一开始就声明过的主张：任何在国外成立的政府，即使是临时政府，他一概绝不参加。他拒绝了将军向他提供的重要职务，继续靠美国国会图书馆文学顾问一职给他的薪水，过着拮据的生活。当时图书馆是他的朋友——诗人阿奇博尔

---

① 我在1982年为圣艾克絮佩里的《战争期间作品选》所写的序言里，力图让人理解这个把一生献给祖国的飞行员兼作家的态度。

德·麦克·利什 (Archibald Mac Leish) 在负责。

拒绝参加戴高乐主义运动的法国人，大多数——比如在伦敦用法语出版的日报《法兰西日报》的编辑们——是出于和亚历克西·莱热不同的理由。他们完全同意戴高乐主义者的历史观点。他们把贝当元帅和莫拉斯当作叛徒。他们情绪偏激，经常指责维希人物，用词尖锐，以至于他们的宣传染上了反法色彩。我想起了一次午餐会，一名报社编辑邀请了几名捷克人，其中有里普卡。谈话涉及哈查 (Hacha) 总统，他签署了一份捷克向德国请求“保护”的文件。里普卡 (Ripka) 小心谨慎地用一句含糊其辞的话回答道：“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过了一会儿，那个法国记者激烈地攻击元帅及其内阁部长和党徒，仿佛他们之中没有一人尽了最大努力，都是心甘情愿、诚惶诚恐地为占领当局效劳的。

255 编撰《法兰西日报》的那一批人，皮埃尔·科曼、夏尔·贡博、路易·莱维，都来自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阶级；他们始终对戴高乐将军不信任，以致他的举止、他与法兰西行动派类似的行为以及他对已被废除制度的严厉言论都遭到怀疑。

电台上“法国人说给法国人”节目组的人则分为几派。让·马兰被认为是严守教规的戴高乐主义者，皮埃尔·布尔丹就其派别正统性而言则还有一定差距。领导这个小组的是雅克·迪歇纳，专业演员雅克·孔波的侄子。如同许多《法兰西日报》记者，他对第三共和国绝无怀旧之情，他不喜欢将军周围盛行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人当中，最有天赋的是皮埃尔·布尔丹。1947年他才刚开始辉煌的政治生涯，便毫无意义地溺水而死了。

盟军在北非登陆之后，北非、英国和被占领的法国之间的

航班增加了，伦敦的法国侨民也增多了。自由法国的抵抗战士、政治家和高级官员也多了起来。然而，戴高乐将军在1941年还当着我的面感叹优秀人才的缺乏。

罗贝尔·马若兰原在摩洛哥担任埃玛纽埃尔·莫尼克所在的留守处的主任。在德国人的要求下，莫尼克被召回法国，马若兰便于1941年来到伦敦。他认识魏刚将军，并对他深感钦佩。但是，他很快就明白这种感情是不利于那些担保他的人的。来自维希的外交家或政治家大都支持戴高乐，他们是对的。从此便出现了两个法国，每一个法国都体现为一个在自己看来是代表法国的集团。不再有第三者，除非是些游兵散勇。此外，新加入的人也很快得知，前维希分子只要被戴高乐主义者正式承认，便比那些在戴高乐主义范围之外为盟国事业效过力的人更容易受到重用。

当时，我对戴高乐派洗礼的功用很为反感。戴高乐派排斥英军中的法国军人或抵抗运动中与英国部门有直接联系的人，这使我感到不快。今天，我多受了一些政治教育，已经比较宽容这种（我始终能够理解的）内战逻辑了——如果有人愿意，也可以说是绝对民族主义的逻辑。法国的事业不能与盟国的事业分开，但也不能混为一谈。只要法国的军队被击败，法国被占领，法国对胜利的物质贡献就只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尽最大可能增加这种贡献。一切为盟国事业所做的努力，如果不能对法国本身有贡献，特别是不能对戴高乐主义有贡献，那就是对国家民族失职。

256

对于我来说，根本谈不上是否支持戴高乐主义，因为这个运动已是胜利的运动。政治从伦敦转移到了阿尔及尔。安德烈·拉巴特去了美国。面对维希政权的衰败，戴高乐将军无可争辩

地成了合法领袖。然而，政治生命并未就此结束，相反，它走出了流亡时期的浓雾，重新进入了现实。

战争期间，各个被占领国的流亡政府都汇集在伦敦这个未被占领的欧洲首都来了。自从希特勒入侵苏联以后，第三帝国的战败已在预料之中，对于以后的形势的展望，这是人们谈论的主要内容，各国的政治家已在洽商谈判之中。我们的杂志一直与在伦敦的波兰人有着友好关系，我们曾多次发表作家们在波兰流亡政府授意下撰写的文章。

对波兰人未来的考虑，是在一个不现实的氛围里进行的。他们设想一个组织能把中小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苏联和德国。因此，他们不但要防止两个大国结盟，也要防止它们的冲突。这个设想纯属乌托邦，因为它等于是地理学家 H. J. 麦金德在 1919 年设想的《凡尔赛条约》的翻版。在苏联和德国之间设立缓冲地带的想法，在付诸实践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障碍。被指定的国家要一道建立这个不参与各帝国之间冲突的缓冲地带，那就必须是充分团结的，以确保在一场与其某一邻国的冲突中，它们当中的任何一国都不会求助于某一大国，让其出面做仲裁。这种团结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从未实现过。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要求收回特兰西瓦尼亚；波兰在《慕尼黑协定》签订以后也加入了角逐；不论是波兰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都有少数民族抗议或诉求。此外，尤其是欧洲领土的划分要取决于苏联。假想中的缓冲地带，各成员国并没有足够的力量使别人尊重它们不参与冲突的立场，来履行它们作为东西方之间双重栅栏的使命。

波兰人和捷克人尽管已达成协议，但并不同心协力。波兰

人并不掩饰他们的担心。毕竟他们还没有忘记“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没有忘记两个帝国的军队瓜分了他们的领土，也没有忘记苏联军队在卡廷（Katyn）森林杀死约 1.2 万名波兰军官的暴行。这个暴行，他们是通过几个大屠杀的幸存者提供的情况、可靠的情报以及难民的报告而得知的。接近西科尔斯基（Sikorsky）政府的知名人士还得知：几千名被关在苏联战俘营里的波兰军官在希特勒军队到来之前就已经失踪了。德国武装部队官方公布发现万人坑，波兰流亡政府便呼吁成立一个包括中立人士在内的调查委员会，所获证据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也否认不了的。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在私下的交谈中，捷克人——至少是经常与我来往的所有捷克人——都对波兰的所作所为持批评态度。他们都同意贝奈斯（Benès）的论点。苏联将控制东欧，这实际上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布拉格将要成立的政府，首先必须和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在慕尼黑事件上，贝奈斯及其全体人民体验了因他们的盟友的软弱无力而导致的悲剧。由此他们得出教训，西方永远也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从此，他们将要依靠莫斯科的友谊了。乍一看，这种推论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仍然有弄巧成拙的危险。如同在 1919 ~ 1939 年，贝奈斯一直受到奥匈帝国的幽灵的纠缠，而危险却来自第三帝国。同样，在战争期间，他采取了预防德国帝国主义复活和西方背信弃义的措施，但他寻求的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保护。

贝奈斯并不相信这个帝国。可以说，他向大盟国拍了胸脯，保证苏联的用心。苏联在其西部边境容忍怀有敌意的国家，一旦面临来自西方的入侵，类似 1941 年 6 月的入侵，就有可能加入侵略军。但是，除了波兰东部居住着不同民族特别

是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的几个省份，莫斯科政府，按他的说法，既不打算侵占领土，也不打算用武力将其制度强加于人。这个日内瓦美好季节里的明星，这个睁眼瞎的国家领导人，继续做着他已经开始的传播假消息的工作，如在1936年他通过自己的情报部门，把从德国特务那里获得的“情报”告诉斯大林，致使图哈切夫斯基（Toukhatchevski）被处决，其他将军也在大清洗时期被枪决。

捷克人私下里对波兰人的议论，不免叫我感到不快。当然，捷克人再一次表现出他们是有道理的。既然苏联已经控制东欧，那么决定与苏联合作当然是明智的。战争结束后第二天，贝奈斯高踞于布拉格王宫的城楼上，慷慨地环指全城，对来访者说：“请看，这就是我拯救下来的。”布拉格，就其物质的存在来说，是由于1938年9月的投降而得以幸存下来的。他当时曾口诛笔伐，不过内心可能也存有希望，特别是可以把责任推到盟国身上。

捷克人的话最使我生气，他们往往采用高波兰人一等的腔调，总是那么天真烂漫，总是不能估计力量的对比，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何必还要死灰复燃，老提过去的事？当然，许多波兰军官已被处死，但是，每一天也有和卡廷俘虏营里的尸体一样多的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倒在战场上。应该考虑未来，特别是考虑莫斯科。我们能说些什么呢？我们能相信斯大林吗？能相信苏联吗？苏联变成和其他国家一样了吗？它的帝国主义既没有超过沙皇俄国的限度，也没采取甚于沙皇俄国采取的手段吗？实际上，捷克人和波兰人一样，都没逃脱苏联的控制。苏联第一次借助共产党在布拉格掌握了权力，而一兵一卒都没有越过边界。20年后是第二次，这就是当捷克共产党领导人本



身试图搞自由化时，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便使一个制度恢复了“正常化”。

在这些年里，我是生活在法国人当中的，但也深入了英国社会。改革俱乐部和自由主义者团体，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都曾慷慨地接待我，对此，我想起来仍然深表感激。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任教的卡尔·曼海姆不止一次地邀请过我。同一学校的著名社会学家莫里斯·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在战争快要结束时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一个职位，而且告诉我说我可以很快成为一个正教授。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建议。尽管在那些年里，我基本上都是说法语，总是和法国人交谈，但是我还是取得不少进步，足以使用英语演讲和教课，用英语演讲和教课不再叫我感到害怕了。关于我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可以这样说：我从来不想换祖国，如果我不当法国人，我就失去了祖国。

当然，我可以生活在另一个国家里，英国或美国，并且也会成为一个好公民。但是，祖国是不能被代替的。语言、各种象征、各种情感、各种回忆，所有这些使个人从属于一个共同体的联系，都是在这个人生下来的最初几年里就建立起来的。一旦这些联系被破坏了，我们就会感到我们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割裂了。许多法国犹太人对法国犹太人条例并不予以原谅；或者更好的说法是，这个条例把他们从他们的法国，从他们如此熟悉如此向往的法国离间开了。至于我，可能是想避免使我心碎的思考，我相信这个犹太人条例是德国人直接或间接地强加于维希政府的。后来，我断然宣称，维希政府不过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插曲，一个战争的插曲。

我认识许多住在伦敦的法国人，其中有一个是法兰西学院

的，他叫路易·维利埃，我和他有很深的、美好的友谊。在许多曾在非洲工作过的、后来又来伦敦的抵抗战士当中，我又见到了爱德华·科尼格里翁-莫里尼埃将军。他是安德烈·马尔罗向萨巴（Saba）王后的首都进行空中远征时的驾驶员。他是尼斯人，常常讲一些“惊心动魄的奇闻轶事”，但从来都不是瞎吹牛的。与多数法国人相反，只有他一个人在两次大战中（1914 ~ 1918 年和 1939 ~ 1940 年）担任过歼击机驾驶员，而从来不谈他的功绩，不谈他击毁的敌机。他更不愿提及他的音乐家和小提琴手的天赋。他对自己的优点缄默不语，而对别人的成就则大加赞赏。他对我和苏珊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朋友——忠诚，热心助人，公正无私。

有幸的是，多亏了安德烈·拉巴特和美国人的关系，苏珊和多米尼克在 1943 年 7 月 14 日来到了伦敦。1944 年 6 月 18 日，我们的女儿埃玛纽埃尔出世了。爱德华做了她的教父。我们租了两间邻近的小别墅。一间是科尔尼利翁和他当时的女朋友住，另一座给苏珊和她的宝贝住。解放并没有使我们就此分手，他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多次出任部长时，仍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几个参加过第一批登陆的自由法国部队突击队的法国青年，经常到克温斯蓓丽旅馆的小房间来。在我们被迫搬离克伦威尔旅馆的套房后，苏珊住到乡下去时，我便独自一人住在那个房间里。在那些青年人当中，有两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便是居伊·哈图（Guy Hattu）和居伊·富歇（Guy Vourch）。后者现在已是著名的麻醉专家。我们难得见面，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几年里结下的深厚友谊。

正是在克温斯蓓丽旅馆的这个小房间里，我和让·卡瓦耶斯一起度过了好几个星期。我在高师时便认识了这个“统考

状元”（最早期的第一名）。我们对他都十分钦佩，因为他是准备攻读数学学士学位的，与他来往的都是科学家。关于在学校的那几年生活，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关于他的事：他跟爱弥尔·布雷伊埃（Emile Bréhier）交涉，叫后者不要辞职。爱弥尔·布雷伊埃由于某些学生没有正常参加他为学校的哲学老师们举办的学术讨论会，得罪了学校的哲学老师（主要“罪魁祸首”是萨特和尼赞）。卡瓦耶斯试图说服教授重新考虑他的决定时那种慷慨热情的口气，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年以后，他通过了执教考试，辅导应试的学员。他邀请我给他的一个研究班讲历史课。他给我写了一封信，盛赞我的学术观点。在战争爆发前，我们一起在埃尔曼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丛书。这套书其实只有一本书，即让-保罗·萨特的《激动的理论》（*Théorie des émotions*）。

261

在伦敦期间，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给我讲了他的家庭、他的姐姐加布里埃尔·费丽埃思。我无保留地赞赏他的数学哲学成就、他的精神力量和坚定的道德观念。我们在一起制订计划、憧憬未来。但是，他在被盖世太保逮捕后惨遭枪杀。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法国的哲学界和知识界就会大不一样，我也可能少犯些错误。

在伦敦，我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别人也知道我是犹太人。但是，尽管传说在戴高乐主义者中间有一些人有反犹主义倾向，我却从未发现有来自上层人物的微小迹象。从我个人来说，我不想在电台上谈论这个问题，以免为反犹宣传提供原料，除非有特殊情况，例如在柏格森去世的时候。我宁愿默默无闻、一贫如洗地回到法国，一如我从法国来时一样。从这一

点来看，我是做到了。

1944年夏天，法国已经解放。在回国以前，我的精神状况怎样呢？我如何做一总结呢？我既感到内疚又感到问心无愧。我虽然没有在一个战斗部队里出生入死，但我为一项必不可少的事迹做出了贡献：在法国的呼声受到压抑，或者说更糟的是遭到了歪曲的时候，我们创办了一份向全世界发行的法国文化杂志。按某些人的意见，这份杂志必须证实戴高乐主义最为正统。我没有这样做，今天我仍然坚信这是正确的。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法国人并不是无条件地分成元帅派或将军派。这份杂志对整个戴高乐主义立了功，至少到1943年。杂志如果照将军的信徒们那种笔调和口气写文章，就起不了这样好的作用。

262 同时，我也审视我自己，审视我深居简出的习性。我是否有必要永远找到根据，或多或少巧妙地避开芸芸众生，超脱于所有党派运动之外？我记得一个德国大学生曾在1933年指责我无能“参与”（mitmachen），无能投入运动。

流亡生活越发突出了搞政治最令人不快的特征：阴谋诡计层出不穷，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口蜜腹剑明争暗斗。对前途和各种可能性的争论没完没了。伦敦的经历已经成为我的政治教育的最后一课。在某种意义上，它尽管是第一次，但使我接触了许多搞政治的人物。我是由浅入深地学习这一课的。我对正在形成的历史中的所有神秘观点都有些过敏，这就决定了战后37年来我自己的命运。当一脚踏上法国的土地，心房怦怦跳动时，我才懂得这一点，但仍不及今天明确。我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来认知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来分清楚在我身上做研究分析工作和介入实际行动各占多大比例。

## 第八章 没有抒情的幻想

我用这个标题命名本章是讨论大战告终以及战后最初几年的情况。“没有抒情的幻想”是反其意借用了马尔罗的一句话（“抒情的幻想”），他指的是一场革命的初级阶段。当时，法国刚解放不久，侈谈革命成风。《战斗报》头版标题下面，赫然印着一条口号：“从抵抗运动到大革命”。乔治·皮杜尔（G. Bidault）也提出了“依法革命”的口号。这些文字游戏毫无意义。

戴高乐将军本人在战争期间已决定支持各党重建。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是英明的决策，也是大势所趋。反正，共产党转入地下后从未停止活动。从1941年6月开始，它便积极参加对占领军的斗争。戴高乐将军既然许下诺言，把发言权交给全国人民，换句话说，就是要举行选举，那么面对共产党，自然有必要让其他党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能够公开活动。莱昂·勃鲁姆和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劫后余生，绝不甘心把自己融入以抵抗运动或共和国为名的总体中。法国注定要陷入即使不是制度对立也是党派对立之中。这种斗争被共产党采取的策略所掩盖和扭曲了。当敌对战争继续进行时，共产党一直支持戴高乐政府，一面动员工人忘我劳动，一面利用肃逆运动，清洗工会联合会内部反对总工会的旧共产党积极分子或者工团分子。共产党人当上了部长，便起用自己人充任要职，有的至今还身居要津（如马塞尔·保罗一直主宰着法国电力总 264

公司)。

在我看来，抵抗运动的团结一致是骗人的。占领罗马尼亚、波兰和德国部分地区的苏联当局之所作所为，叫人对斯大林的用心不再有片刻怀疑。他和吉拉斯 (Djilas) 谈话时，用过这样一条公式：每一支军队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从 1945 年 5 月开始，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决裂已经不过是时间问题。戴高乐将军拒绝把关键性的部长席位交给共产党人，表明他对共产党和其他党抱有根本不同的看法。三党制——共产党、人民共和党以及社会党三大党联合执政——绝不能持久；三大党联盟一旦瓦解，这个三党执政的体制必然难以幸存。

党派斗争与肃逆运动，同样把刚刚恢复的民主时期的气氛搞得乌烟瘴气。在战争年代，不甚猖獗的通货膨胀突然抬头，仿佛脱缰之马。侵略者虽然被逐出国土，国家被肢解的创伤却未能豁然痊愈。恰恰相反，旧怨新仇，不同阶级、不同党派的不同倾向，越发泛滥成灾。普普通通的法国人在黑暗年代抱着种种希望，越是如此，等到现实不符人愿，人们心情便越发忧郁。5 月 8 日、9 日两日，首都气氛阴沉，我对此至今记忆犹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和于勒·鲁瓦谈到过这种古怪的氛围：到处见不到丝毫奔放的激情。至少对欧洲来说，大屠杀业已终止，法国居然厕身胜利者之列，可是人民并没有团结起来，我们已经对前途充满了问号。1918 年 11 月 11 日，我只有 13 岁，父母带我们三兄弟到巴黎去。停战协定才刚刚签订，巴黎市民欢欣鼓舞，这场面使我毕生难忘。住宅、工厂、机关里的人一齐涌上街头，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市民和工人混在一起，男男女女彼此拥抱，四面八方都高叫着“我们胜利了！”“他们被打垮了！”。这样的国民大团结不过是昙花一现，

可是至少表现出人们为法国人的英勇献身感到自豪，而对屠杀的终止感到宽心。我参加过不少示威活动，没有一次比得上1918年11月12日那一次在巴黎举行的示威，没有一次能把身份不同的法国人全体团结起来。这一天，他们并没有游行，只不过走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该不该补充这么一句话，虽然法国人在1914~1918年经过超群绝伦的大考验而奋发图强，但1940年兵败之后的崛起则更让人欣慰？

1940年7月，我在卡尔登公园遇见安德烈·拉巴特，这决定了我在战争岁月中如何生活。

另外一个决定是在既未反省又几乎没有认真考虑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个决定也影响了我一辈子。波尔多大学文学院院长劝我申请担任社会学教授，因为当时有空缺的教席。他保证让我获得全体同人的一致支持。我本来已经当选为图卢兹大学文学院讲师。后来，我失踪，从1940年到1943年，我的薪金都由妻子领取。其实，院长并非不知道事情真相。那么，我早就该去图卢兹，向院长和老师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的家属的照顾。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原因何在，只有天知道。

1938年，我替波拿夫教授代课。整整一个学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图卢兹和波尔多两市之间来往奔波。这种做法如果没有特殊理由（比方说，夫妻二人分居两个城市），至少在纸面上是不允许的。可是，院长和行政部门都视若无睹。回想起来，这个院长约我任教，并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居住条件的问题。也许是1938年我在波尔多任教时给他留下的印象不算太差，也有可能是因为犹太人受够了迫害，在某一时期，居然在

某些阶层中获得优遇。在大学里，同情敌伪的人屈指可数。可是，在别处可不一样。哪怕在德国的战俘营里，好些信奉天主教的大学人士都或久或短地拥戴过贝当元帅。让·吉东 (Jean Guilton) 便是此辈中人。

1939年8月，我受命在图卢兹正式任教，颇为踌躇满志。

266 1944年，我本来可以在图卢兹和波尔多两市中选择一处。我以往由于犹太人的身份曾被除名。这时候，我如果提出申请，理当恢复原职。但是，我自我剖白，把问题归于居所。因为我和巴黎的友好相知中断联系已有五年之久，担心远去波尔多近乎流放，新交同人，除极少数，几乎素昧平生。1938年，我对院长安德烈·达尔蓬是敬重的。1940年6月，我乘船去英国以前，曾简短地和他谈过话。罗马史学家威廉·赛斯顿 (William Seston) 和我经常来往。他信奉基督教，跟我谈得来。我之所以不愿意在波尔多定居，也因为生活与教学分在两地，来往奔波，未免腻味。每星期拿一天半用于教学，够吗？合适吗？

这些道理，到底是否体现了我主要的动机？说得粗暴一些，我是否感染了政治病毒？不能说我一回到法国，便做梦也想从政。我平生所学，本该任教于大学。自己的向往，父亲的遗教，也都使我倾向教学，然而，我却决计改行，之所以如此，无非是我这个人变了。在伦敦的年月，我从事新闻工作，常与大人物接触。这逐渐改变了我的性格。其实，我所认识的大学生活，以及预先猜想得出的大学生活，都让我感到厌倦，这是我对自已也不肯承认的。向几十名大学生讲解《自杀论》与《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在1938年的时候的感受和后来的回忆迥然不同。在1938年，我在之前的四年写了三本书，



完工以后，休息休息，并不亏心，好比电池需要充电。成果虽然微不足道，可是，父亲如果多活四年，肯定会十分高兴。1944~1945年这两年，我另有雄心，暂时放弃了今天我所谓的天然归宿。我是想参加全国性的辩论，为祖国效力，免得国家再度没落，徒增愤激。国家方获解放，正当百废待举。

我在伦敦曾经力主建立自由的民主体制，而这是我在法国哲学会猛烈抨击过的。新建的共和国能否摆脱遗传的顽症，免蹈前车的覆辙？对于经济的无知，会不会再使执政诸公重犯类似1930年代的错误呢？法国怎样才能适应帝国时代，适应新的国际关系，使这种关系不再局限于欧洲，而将以世界为范畴？我不认为事隔37年，我还是在吹嘘自己。我当时立志积极参加祖国的建设，绝不是写一本《社会科学导言》，或者写一篇论马基雅维利的文章。今天正值盛年的三四十岁的朋友们，很难想象我这一代人胸中夹杂着羞愧和民族志气。戴高乐时代并没能洗净1940年的亡国遗恨以及从前的败落年代。第三帝国的败灭给了法国一个机会：这个机会，绝不可与之失之交臂。

267

该不该再归罪于新闻工作的诱惑力呢？伦敦和“自由法国”年代，给我尝到了新闻工作不太费力的甜头。写一本严肃认真的书，需要花几年的工夫。公众的反应，要过好几个月才能传到作者的耳朵里。尽管我真正的雄心壮志尽属知识方面，可是在一个时期中，毕竟敌不过为国效力的梦想和政治的感染。

我很少自问，如果在波尔多任教，然后调到巴黎，不在1955年而在1948年就调来，那么我的一生和事业又会是怎样的？凡是我写的书，几乎全都体现出我对时事的关注。《大分

裂》一书之所以问世，无非因为在评论国际政治时必须纵观世界，才能有那么一种背景认识。《大分裂》一书，继之以《连锁战争》，一方面回答批评，另一方面更深入地研究世界局势给我提出的某些问题。我比较喜欢另外几本书，如《知识分子的鸦片》《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但这些书仍然离不开正在形成中的历史，尽管我在写这些书的时候，老想超然退举，不甘心局促于亲身的经验和嗷嗷赳赳、反反复复的时运和世道。

交代过了这些情况，我也并不能肯定假如 1945 年仍回大学任教，我就会单纯地重操旧业，捡起战前最后几年的研究工作，仿佛战争仅仅是一个括号内的内容，并没有对我本身起到什么改造作用。到了 1944 ~ 1945 年的我，很难想象再会写什么社会科学导言了。1939 年我喜爱的，也许会酷嗜的科学认识论，到了 1945 年几乎再也引不起我的任何兴趣了。激发我的哲学好奇心的，不再是接触现实的方式方法，而是现实本身。在战后年代，要我摆脱时事动态，非得下一些自我强制的工夫不可。时历 10 年，到了 1955 年，事情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我想重回大学，已经不是贪什么在巴黎大学任教的名望，而在于借此摆脱全部或部分的新闻工作。我在《费加罗报》搞了几年，又觉得和父亲一样，自己正在分散精力，走向绝路。

在我看来，我从事新闻事业，要到 1946 年 3 月加入《战斗报》才算开始。《战斗报》产生于抵抗运动，社长是帕斯卡尔·皮雅 (Pascal Pia)。1944 年秋天，我回到法国，过了 18 个月才到该报工作。这 18 个月只给我留下一些杂乱无章的回忆，很难清理，回想起来，我甚至有一种虚度了光阴的感觉。最初

几个月，重归故土的乐趣以及“自由幻觉的破灭”都给了我浓厚的感觉，因而我向《现代》杂志投稿，重新用了原先的标题。

西蒙娜·德·波伏娃记叙了萨特跟我重新交谈时双方是多么激动。从此以后，我们不再谈论哲学，但气氛总是充满了友情，真是久别重逢，一见依然亲密无间……

萨特为《自由法兰西》写了一篇美不胜收的文章，题为《占领下的巴黎》。因为我限期很紧，他便服了兴奋剂，把文章一夜写成。就在那当口，限期放宽了一两天，可我没来得及告诉他。等到他来交稿，我才跟他说了。他回应了一句：“混蛋！”当然，是我的不是（也许那时候，我没法跟他通话）。可我也不免为之一震——倒不一定全为这件事——觉得他的反应多么像个道学先生。他仿佛天生的康德派，老计较人的动机，却不怎么考虑事情本身。他把别有用心派给别人，不管对或不对，老是一语定讞。

另一件快意事是故交重逢，我在前几章里还没有提过这一番友谊。这绝不是说在我心坎里和生活中，它并不怎么重要，我该说恰恰相反。科莱特和让·杜瓦尔二人都同我的研究工作没有多大关系。科莱特在跟让·杜瓦尔结婚以前，便和我在夏蒙尼山的普拉兹村初次相逢。通过她，我才结识了让·杜瓦尔。我在孔多塞中学的同学菲力普·希沃勃（Philippe Schwob）跟科莱特的哥哥有交情。他叫米歇尔·勒热纳（Michel Lejeune），研究希腊文化。菲力普也许跟勒热纳的另一个兄弟——让·艾菲尔（Jean Effel）也有交情。让·杜瓦尔和让·艾菲尔既是同事又是朋友，而比一切都重要的是，他为人十分可亲。他那样蕴藉风流，如果不用幽默的风度把内心

的情意和对人的胸怀悄悄地掩盖起来，那我一定会自惭形秽，觉得不如多瑙河畔的一名耕夫。让·杜瓦尔和科莱特真是天生的一对。只消跟两人中的一个成了朋友，必然也会跟另外一个结为知交。那一年，我家住在勒阿弗尔，他们两位来住了两天。有时候四个人一起谈，不过常常是两两攀谈：让·杜瓦尔和科莱特中的一人和我们夫妻中的一人谈天。

战争期间，他俩一直住在原来定居的太子街，现在他们的儿子安德烈住在那儿。他俩都参加了人文博物馆的抗敌组织。他们幸免于难，纯属奇迹。盖世太保探听到太子街有约会的场所，便叫一个嫌疑犯沿街走过，只要这人稍露声色，神情稍异寻常，约会地方便马上露馅。可是，那个被俘的嫌疑犯经住了考验，救了他的同志们。

马尔罗也认识杜瓦尔一家，并对他们很为看重。有一天，他跟我从杜瓦尔家出来，他议论他们说：这两人人品高尚，职业必定也高尚。他俩学识优长，洁身自好，不陷入政治或文学的丛林法则、世俗斗争，而只想把文化遗产一代一代传下去。他们的儿子安德烈是“文化革命”和人文品格扫地的牺牲品，他不再像他的父亲那样热衷于这件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传世工作。他父亲虽然以文化积累为己任，但也不肯把身心全部投入。他谈诗绝妙，门生子弟爱他，佩服他。而他呢？他念念不忘写一本书论维克多·雨果，可是，赍志而歿。他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经常写心得笔记，但不是每天都写。马尔罗认为，心得笔记慢慢地吞噬了作家。但这不足以解释杜瓦尔的情况。他与妻子情深义重到极致，工作顺心，与知交往来密切，虽然苦于内心矛盾，却连自己都不肯承认，既乐此不倦，又暗中肠断，矢志不渝，毕其一生。科莱特为儿童写作，引人入胜，国

外传译，不可胜数。她孀居多年，始终心曲相通，青春常在，好与孙辈为伍。我时常责怪自己最后几年与他们谋面不多，然而，每逢叙旧，时间呀，远道呀，顷刻烟消云散，叙旧倾吐积愫，交谊愈深。

萨特发表了《恶心》一书，文名鹊起，但在1938年，声誉还限于文学界。到了1944年，他的思想、生活依然如故，但已名扬天下。《存在与虚无》问世，继《苍蝇》之后，《禁闭》剧本得以发表了，戏剧受到了观众的大加赞赏。存在主义红运开始，圣日耳曼德普雷的咖啡馆也应运而生。萨特非但不唾弃政治，而且断然投身其间。他想结识共产主义，但又有点保留。他虽然投之以桃，对方却很少报之以李。安德烈·马尔罗变了，但对知交未改故态，反正对我一如既往，情谊蕴藉，态度坦率，但他对于共产主义的反感，叫我十分惊讶。这种反感简直可以说是仇恨，而他却从来不肯说明是因什么“改变信仰”。

在战争期间，我只接到过他的一封短信。那时候，他住在法国南方，在写《斗天使》。记得信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当然是意思而不是原字原句：“有人说我要加入巴黎的《新法兰西评论》，这事连谈都谈不上。”他到1944年才参加抵抗运动，但从未受到合作派或维希派的诱惑。1944~1945年冬天，他时不时来巴黎，劝告抵抗运动的联合组织要对共产党的策略提高警惕。他那时候还没有决定拥护戴高乐将军，或者说，还没有选中戴高乐作为自己的领袖。他有点鄙视文坛扰攘、刊物蜂起（萨特筹划创办《现代》杂志，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我自愿脱离大学，继续与《自由法兰西》杂志合作，一

我，甚至向我表露情谊。他能演戏，断断续续也有些真心实意的时候，他对我的情谊，充其量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罢了。我不过是企业里拿工资的人。在他没法不答应我的要求的时候，我并没提出要什么特殊待遇。1943年年底，我和他在政治和个人方面的分歧愈演愈烈，拂袖而去已是我唯一的出路。那时候，吉罗将军彻底失败，想沐猴而冠，模仿《自由法兰西》杂志在美国办一份英文杂志。我为《自由法兰西》杂志出过不少气力，对这个刊物很有感情，一旦离去，心中很不是滋味。在今天看来，那时候的牢骚未免可笑。负责一家杂志社，分量可不轻。事业虽然昙花一现，我却付出了许多时间与精力，其实，我本可以而且应该腾出时间，搞一些更有内容的工作。

就政治而言，在这期间，我是局外人，或者是边缘人物，已经没有什么反不反对戴高乐主义的问题。戴高乐上台执政，得到了重建起来的党派和各个抵抗运动的支持，所以，联盟内部最占优势的是左派思想和组织。戴高乐以双重面目出现：一是能把法国人民团聚起来的人，一如四年前，在1940年法国大多数人也曾团聚在贝当元帅的周围；二是顺应民心，重建国家，抵制共产党人。那时候，共产党利用肃逆肃反，借口执法申冤，清除异己。

我当时似乎已经认定，一旦搞起选举的把戏来，抵抗运动不会有多大影响。各个政党却将很快扮演其传统角色。我在两篇题为《革命与革新》的文章里<sup>①</sup>表达了我的这种看法。“革命”这个词1944~1945年在巴黎十分时髦，可我却撇开了这

---

① 见1944年10月号 and 1945年8月号的《自由法兰西》杂志。

这个词，因为在我看来，根据法国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关于抵抗运动，我在1944年10月号的《自由法兰西》中写道： 272

在开始阶段，抗战运动正起着或者将要起第一流的作用，它将支持政府，正如政府也将依靠它。但一旦举行选举，它就将碰上各党各派……把“战斗组”和“解放组”变成政党，这是走方便的道路，大概会搞得一塌糊涂。把抵抗运动搞成独一的政党，那是纯属幻想，因为同心同德为法国战斗的人，在政治上并不一致……抵抗运动不会带来新的政党，只会生出新的人员……

1945年8月，我说明了为什么法国并不是处在革命的前夕。至于共产党呢？

我深信在西欧当前的历史阶段，共产党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它只能够利用重新争得的合法地位以及各种形势，提升自己的地位，保持队伍的热情，安定队伍急切的心情。至于抵抗运动呢？某些成员往往爱讲些极端的话，旦夕之间，他们会不得不把赞成和反对翻一个个儿。昨天最关心的是隐蔽和神秘，今后却需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宣传。地下活动的规矩是神不知鬼不觉；搞政治的规矩则是越出名越好，姓名不能经常见报的人便不是从政人物。

此外，我大致勾勒出必不可少的革新的轮廓，不用革命，只在议会制度的范围内进行。

正是在一份画刊《观点》周刊上，我发表了试搞新闻工作的处女作。只要一回想，我便觉得不好意思，甚至感到羞愧。我为什么肯在这样一份刊物上写社论呢？必须回忆一下解放几个月以后的巴黎，然后是第三帝国的投降。除了《费加罗报》，战前一切报纸都已经停刊。新报名称一一出现，有的把原先有名的报名割开来，保留一部分（例如《解放了的巴黎人》《法兰西晚报》等）。《战斗报》原来是抗敌组织的一份地下刊物，这时候公开成为日报。在这时候，报纸的销路极好，不少抗敌人士也出来办报。就是科尼格里翁-莫里尼埃和马塞尔·布路斯坦（Marcel Bleustein），他们两人劝我为《观点》周刊写文章。这家刊物的东家叫吕西安·拉希林（Lucien Rachline）。他原以制造床垫、床褥为业，后来在地下斗争中担任过指挥员。皮埃尔·戴卡佛（Pierre Descaves）担任总编辑。不管他们给了我什么名义，反正我扮演的角色很快就只剩下写文章。文章的规模和性质，大致跟我后来在《费加罗报》上写的没有什么大差别。

我重新看了一些自己写的而且已完全忘掉的文章。其中有些想法在今天已经平淡无奇，也许不如说，在今天已经家喻户晓，可在当年却与舆论有抵触。首先，我屡次致力于说服法国人，别再对德国老是那么梦魂不安。因此，我在1945年4月4日写道：“咱们法国人仍然一提到德国问题便梦魂不安，仿佛世界仍然在绕着欧洲转。弗拉季米尔·多麦颂（Wladimir d'Ormesson）先生劝我们不要再犯1919年的错误，他建议退后三个世纪，重新瓜分德国。1945年将成为德国的1815年。”停战几个星期后，我便揭发占领军当局禁止士兵跟当地居民讲亲善。我说：“西方态度严厉，变本加厉，特别是在口头上。



荒谬绝伦的反亲善禁令竟想保持下去。戈林（Goering）也罢，罗森堡（Rosenberg）也罢，都还没有被审判，而英军、美军的小伙子们却不许向5岁的娃娃笑一笑……”

惩罚德国吗？这正中希特勒的下怀。面对残破的城市、毁灭的经济、成百万的难民，胜利者肩上有历史赋予的重任。不管愿不愿意，必须把打倒的敌人扶起来，并且承诺给他们一个前途。“疯狂至极的希特勒比一个强硬的‘范西塔特男爵’式人物更残酷地重创了本国人民。据《新苏黎世报》，轰炸德累斯顿造成了20万伤亡<sup>①</sup>。”（1945年5月4日）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信谁能恢复德国的统一。“每个人所等待的，不是统一，而是旁的东西。英美希望分界线上关闭了两个多月的铁幕终将有一天能被揭开。可是，俄国人却认为有机可乘——正可以借此机会，把自己的观念、自己代表们的行动推行到西德。274 是谁的收获大呢？”这时候，“铁幕”一词尚未流行，我认为，丘吉尔尚未使用这个说法。

我觉得，德国的分裂为期必长，故而法国与西德接近，势所必至。这种想法尽管出于最基本的理性与常识，可在当时却听起来近乎诡辩，或者是故作惊人之笔。绝对的反德情绪至少在表面上还在鼓动着法国舆论界。所以，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发言人都要求仿照苏联在东境的所为，对德国的西境再来一次瓜分。过了几年，戴高乐当上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主席，还照旧拾起“永无帝国”这个口号。安德烈·马尔罗也拥护这一观点，并在与詹姆斯·伯纳姆的公开谈话中接过了这个口号。

---

<sup>①</sup> 实数高达30万。后来，英国人也谴责这一不人道的举动，认为这一举动在军事上无法辩解。

我在《现代》杂志上写了三篇文章：《自由幻觉的破灭》《事态以后，历史以前》《社会主义的机会》。最后一篇为法国社会党指出了一种远景，或多或少有点类似英国工党选举获胜后的前景。我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一个想法，尽管在当时是真的，而且在今天仍然是真的，我却宁可把它忘掉。社会主义在法国没有真正的机会，除非它一厢情愿，不与共产党结成联盟，宁可成为社会民主党。在《自由幻觉的破灭》一文中，我重新回顾了对戴高乐将军外交政策的头一次评论：“在物质上，我们将主要依靠我们的美国盟友。所以，对我国的独立的‘外来’威胁，来自西方而不是东方。由于这种感情上的逻辑，法国政府标榜自己有绝对的主权，厌恶妥协让步，尤其对于自己最需要依靠的人。”这些话吞吞吐吐，亦写得别别扭扭，针对的是法国外交政策的反美立场，而这种立场正是受戴高乐将军启发授意的。

275 时当1945年10月，我从此发表的想法便遭到各方谴责，并以有亲美之嫌出了名。我说：“我们真正的独立自主和行动自由，首先要求振兴祖国，而不是什么主权问题，因为不管怎么样，我国的主权在法律上是完整无缺的。对于国家前途来说，国家的振兴比一些外交上的成就更加重要。”

可是，在当时，只有美国才具有必要的资源能提供我们奇缺的原料和机器。我说，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友谊对我们起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在千疮百孔的法国，反对美国的“侵害”的宣传却已经掀起。今天，大家都已经明白，到底是谁说对了。正是美国的“侵害”加快了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

算我有造化，所谓“清洗”运动，我一点儿也没沾边，或几乎一点儿也没沾边。教育部成立一个委员会处理大学教师

的案子，我奉命参加，但发下来的案情文件很少。我只记得有一桩莫里斯·巴尔戴希（Maurice Bardèche）的案子，可又转到中等教育委员会去了。<sup>①</sup>然而，我仍然写了两篇文章，论说清洗运动的原则与矛盾。一篇文章论贝当的审判案，登载在《现代》杂志上。另外一篇则作为《法国纪事》的结论，以《末记》为名，登在《自由法兰西》杂志上面。

贝当审判案的几页文字却在先期挑起了论战，从战后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一种说法：审判和清洗运动，一并属于“革命公正”，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公正。“临时政府产生于起义，并非人民选举出来的。临时政府所控告的人，却掌握了由法国人民选举出来的最后一批代表授予他的立宪权，这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下面又说：“当国土沦陷之际，侈谈一国元首与敌人斗智，可谓纯属空谈法律。”

276

第二种说法：要么在起诉方面，谴责维希政府的政策有损名节；要么指控这项政策违反了国家的利益。起诉人选用了后一种理由，辩护人便大做文章，渲染被告贝当元帅如何尽心竭力保护法国人民。要不是颠倒是非，谁能相信贝当元帅投靠纳粹，为的是残害百姓？

第三种说法：起诉人虽然没有把停战议和作为罪状，但是，证人证词却谈得很多。他们中间某些人企图证明这样一种说法：当时有一种阴谋，即乘丧师覆国之机，拥立贝当元帅掌握政权。可是，这些人只能提出一些泛泛的猜想。老人默不作

① 我很想查看清洗运动的档案，结果白费气力，因为这些档案还没有向研究人员开放。

声，“与其说他负有战败的责任，倒不如说他是战败后让人推举出来的头面人物”。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人物则提出一些缺乏说服力的自我辩解。

第四种说法：到了1945年，赞成与反对停战议和的不同论点还像1940年那样继续交锋。军事投降坐使全军沦为俘虏。北非几乎全无装备，那它有无力量进行自卫？相反的论点则强调，海军、空军和帝国属地还可以参加斗争。而我提出的论点，今天往往已为人们所遗忘。我说：“人们根本没法知道希特勒会不会通过西班牙往北非进军（如果法国政府退守到那里）。也没有人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坚持守住’。就算守住了，希特勒到1941年能否放手让英法联军控制地中海而去进攻俄国，也大可怀疑。如果停战议和间接使红军的介入提早了，那么对于盟国的大局来说倒是有利的。”我还大胆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就事实而言，决定停战议和在事后看来是可以辩解的，因为后果是良好的。”但是，我毕竟补充了这么一句话：“……法国的声誉和精神团结受到停战议和的打击，却始终没有完全恢复。”

第五种说法：关于犹太人问题，贝当元帅的辩护人都主张两害相权取其轻。“当然，非占领区曾经庇护了许多以色列精英……如不停战议和，犹太人大概会吃更大的苦头。但是谁敢说这是札维埃·瓦拉（Xavier Vallat）、夏尔·莫拉斯或达尔吉埃·德·贝尔布瓦（Darquier de Pellepoix）等人的用心所在呢？”人们又碰上了动机与后果之间的暧昧关系。

277 第六种说法：关键时刻不在1940年6月，而在1942年11月。如果贝当元帅在1942年驻节阿尔及尔，那么许多惑于他的威望而误入歧途的善良法国人就会重归祖国，抵抗敌人。可

是他逗留在法国，不断向政见不同、从事抗敌之人发出谴责，这就断送了全国人民的大团结。他骗德国人已经不行，骗法国却余焰未烬。

我在《末记》一文中，进一步详论“从停战议和到全民起义”，指出有必要将对悲惨年代的当事人的两种判决区别开来：一是历史的判决，二是法庭的判决。不论停战议和是不可避免的还是十恶不赦的，拯救海军和海外属地终究是当务之急。爱国志士理应坚守岗位，以便阻挠通敌合作之事，促使法国重整旗鼓，投入战斗。犯罪的是那些从1940年到1942年11月为通敌合作特别卖力的人。至于追随一个显然具有合法性的政府的人，却不能一概而论。

我只想顺便提一提我和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彼此通过的信。因为我在两篇文章里点了他的名。我在伦敦的时候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有关亨利·德·蒙特朗，一篇关于雅克·夏尔多，一篇关于法布尔-鲁斯。

到今天冷静下来，这三篇文章我是一篇也不会写的。这几篇文章收在美国出版的一部文集上，文集叫作《人类反对暴君》，由雅克·马利丹主编，解放后在巴黎出版。后来，法布尔-鲁斯一再阐明他从1940年到1944年采取的立场，先后出了三卷《法国笔记》。当时，第三卷尚未问世，我只议论了前两卷。至于1941年年底出版的《新欧洲文选》的序言，我如果在伦敦的时候就能拜读，不免会义愤填膺。后来，我俩经常在同一阵营中相会，我觉得大可不必重提往日的论争。勒南(Ernest Renan)认为善于忘记是政治上必不可少的美德。我希望鲁斯的善于忘记和我一样不费气力。

毫无疑问，我在《观点》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拙作，没有

在巴黎的文坛与政界引起任何注意。安德烈·马尔罗把我从误入的死胡同里拉出来，约我去他的办公厅主持工作。这是  
278 1945年12月戴高乐将军在制宪会议选举以后设立起来的新闻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官。这官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新闻部职权有限，办公厅主任更不足道。可是，必须补充一句，该部的秘书长是沙邦·戴尔马。用这样三个人搭班子有什么意义，真算得上是以牛刀杀鸡！

这个部的寿命不过两个月。12个月后，马尔罗制定的计划一个也没有来得及实施。1945年年底，中心问题仍然是：批准刊物出版，分配纸张，处理被勒令停刊的刊物以及解放后被封闭的印刷厂。对于那些以敲诈为业的报馆，特别是在外省营生的，我是毫无好感的。旧东家被抄了家，抗敌分子接管过去，旧东家也许是咎由自取，不过其中好些人并没有过堂吃官司；抗敌分子难道就该借此发迹，只消把战前独霸一方的报纸稍微改一改名，便坐享其成吗？地方大报本来是法国报业中办得最兴旺的，新东家接管过去，只把原名略加改动。有时候，抗敌组织把企业的股份一分了之，并没有从中得到实效。也有另外一些情况：抗敌分子将原来的业主取而代之。

安德烈·马尔罗来到弗利埃朗街的办公处，乱哄哄的报馆易主已为既成事实。除去少数例外，战前的报纸都已经换了人，改了名。《巴黎晚报》改为《法兰西晚报》，产权不归让·普鲁沃斯特而归了该报的头号人物皮埃尔·拉扎雷夫（Pierre Lazareff）。让·普鲁沃斯特则经《法兰西晚报》驻伦敦社长柯迈尔（Comert）的批准，创办了《巴黎竞赛报》。新刊物出版伊始，度日维艰，后来蓬勃发展过一阵子仍归没落。这个雄狮般的报业巨子，临终时不得不把他的宝贝卖掉。买主

悉心经营，重新做成了一笔好买卖。这件事并不怎样中我的意，也和我毫不相干。有几个吃过亏的人来找过我，其中有雅克·沙斯德奈（Jacques Chastenet）。我毫不含糊地对他说，《现代》杂志已经不复存在，《世界报》搬进前者的办公场所，279 取代了它的位置。我不想对这个取代本身做什么判断，我只是肯定，这事已成定局。

办报刊需拥有出版许可证和配给纸张，这马上引起了论战。有人说，办报刊要得到批准，这是退回到第二帝国时代，也许会后退得更远。有一天，总理办公厅指示我们，准备取消这项规定。动机当然值得赞扬，但不能为恢复正常的自由制度而排除真正的障碍，这个障碍就是纸荒。只要纸张仍由官方配给，取消出版许可证就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新的刊物一领到出版许可证，便自动有权领到一定数量的纸张。我就是在新闻部的办公室里认识了路易·加布里埃尔-罗比内（Louis Gabriel-Robinet）。当我提前一天告诉他戴高乐将军决定引退，他显得十分吃惊。马尔罗和我商量好了，准许《费加罗文学报》重新出版。

我在新闻部宛如过客，只做出过一个比较重要的且我认为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决定。当时，马尔罗并没有过问，可是决定已经太晚。加斯东·德费尔（Gaston Defferre）接任新闻部部长，推翻了我的决定，另采取解决办法而我认为这些办法不合情理。其后果可想而知。几百家印刷厂被公家没收了，有的就眼睁睁地被一些或真或假的抗敌组织没收了。新闻部一个法律专家主管新闻法，他倾向社会主义，拟了一项计划，由我审批，可我认为，他的办法非常简单，但也十分不合时宜。他的主张是，把这些印刷厂一律收归国家所有，组织一家公司独自

经营。我反对说，这家准国有公司恐怕完成不好交给它的任务。它需要维修和更新复杂多样的设备，由独家经营，相隔太远，消息不灵。我建议制定一条完全不同的法律，把印刷厂都卖给新的报业公司，国家逐渐卸下这副担子。我们既然要恢复新闻自由，那么把印刷厂收归国有，就是和我们计划的精神不相符合的。新闻部的那个法律专家的意见和我的相左，却在德费尔那里得到了支持。

280 这短短几个星期给我留下些什么印象呢？首先是我每天不得不接见那么多人。也许，求情请托的人那么多是因为新闻部的权力过滥？其实，说这些人求情请托，未免冤枉，因为他们要求的往往不是什么恩宠，而是一些方便。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方便本来是用不着恳求乞讨的。可不可以再补充一句：我觉得在部里工作 10 小时，反不如读 4 小时《纯粹理性批判》。另一个印象也许比较平凡，然而我却难以忘怀：机关衙门或者部长办公厅里，不同成员之间，彼此倾轧，争面子，争办公室，争汽车。新闻部匆匆成立，机构臃肿，大概是漫画式地刻画了一般政府机关的常态。是否还得补充一句，部长办公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也膨胀起来？曾经在抵抗运动中领导过情报二处的阿隆 - 勃吕纳梯尔 (Aron-Brunetière)，跟我们相处几个星期以后便回去重操医业。在戴高乐将军辞职的前几天，让·勒卡努艾 (Jean Lecanuet) 来此就任或就任未成。

关于新闻部部长，我还有一句话要讲。从 1958 年开始跟他一起工作的人，对他的认识比我清楚得多。但是我的一些简短见闻，也还可以引起某些人的兴趣。马尔罗走马上任时，对于运用公共权力的知识还不如我，大概连法律与法令和部令的区别都一无所知。才短短几天，他便懂得了自己该知道些什



么，于是便同样飞快地熟悉了文件，尤其是那些新闻记者最爱探听的文件。他为自己规定了严格的时间表，照预约接见记者，分秒不差。他有根有据地答复记者提出的精细而明确的问题。一般的记者都感到吃惊，而像乔治·奥尔特曼（Georges Altman）那样的记者，却为马尔罗只掌握无关紧要之事而感到遗憾。尽管他有点神经质，但对于部下从不发急。有时候，他也不免叫我为难，因为他答应给这个人安排工作，给那个人好处，然后让我负责执行，不至食言。可是，办得到办不到却不尽在我。

这便是我和罗曼·加里“反目”的缘故。我在伦敦认识了加里的才华，与他有了交情，而马尔罗和我一样，想请他担任法国驻伦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按照马尔罗的习惯作风，他告诉加里说：“事情已经办妥。”殊不知此事尚待征求戴高乐将军办公厅的同意。主任加斯东·帕列维斯基认为加里过于轻率，或年纪太轻，不宜担任这个职位，而由我去通知他本人。一天上午，我的工作特别烦琐，我拿起电话来，口气生硬，很不应该。我对他说，伦敦的事不用打算了，还是同意给你另做安排吧。好几年来，他一直错怪了我。罗杰·马丁·杜加尔在几封书信里提到加里讲的关于我的一些话，但在加里去世前好些年，这个误会早已烟消云散。

281

戴高乐将军第一次执政结束后一个月，我进了《战斗报》，它在当时是巴黎文坛和政界最负盛名的报刊。阿尔贝·加缪写的社论声誉鹊起：此乃一个真正的作家在评论时事。编辑部里聚集了知识界名流，抗敌甫终，大家还没有重返各人的自然岗位。比方说，阿尔贝·奥里维埃。还有雅克·马尔洛 -

邦蒂 (Jaques-Merlean-Ponty), 他是莫里斯的堂兄弟。他写了《20世纪宇宙论》以后, 在南代尔大学教哲学。又如皮埃尔·考夫曼 (Pierre Kaufman), 也在同一大学教哲学。还有亚历山大·阿斯特吕克 (Alexandre Astruc) 及罗杰·格尔尼埃 (Roger Grenier) 等作家和哲学家。编辑部一隅之地, 居然容下了这么些人杰, 真是人地太不相称! 我对新闻部也有同感。大概这些作家教授都怀着和我类似的心情, 一时不肯回大学任教。

至于这班人马的头头, 却与流行的看法相反, 从来也没有轮到阿尔贝·加缪, 而是帕斯卡尔·皮雅, 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 就其外在形象和公开行踪来看, 谁也猜不透他曾经干过些什么, 将来还能干些什么。他和马尔罗交好, 马尔罗曾将一部少年作品题赠给他。他的文学修养深厚, 虽不善于创作, 评论之才却罕有伦比。大家都敬重他, 可正如雅克列维奇所说的“不知为什么”。要说他在抵抗运动中的资历吗? 别人并不比他浅。是谦虚吗? 也许。他是报社社长, 理论上, 实际上也是。他正如我们大家所说的, 从早到晚, 孜孜矻矻, 一个标点符号和错别字也不放过。是不愿意“发迹”吗? 尽管《战斗报》给人那么多机会来露头角、显身手, 而他却一味只想隐姓埋名。为什么那样留恋幽谷? 我们这班人马对此颇有议论。有人说, 他擅长史学, 深知盛名不足为凭。他见过一个作家, 身后萧条, 而其作品精髓却为另一名家剽窃成书。这种解释过于言之成理, 反而不太可信。我实在对其难测高深, 而许多人对他比我熟悉得多, 也不见得比我看得更透。

加缪比他年轻, 曾得到他的保护。1947年年初, 《战斗报》度日维艰, 加缪却回来了。他俩的关系逐渐紧张起来。

加缪励精图治，对报社的前途发表意见，仿佛他是社长或创办人。这不算侵犯皮雅的权力，因为皮雅根本不用他的权力。后来，报馆的产业一半转让给一个突尼斯商人，名叫斯马贾，由克洛德·布尔岱（Claude Bourdet）担任政治领导，他俩便一同离去。帕斯卡尔·皮雅先走戴高乐主义道路，然后在《十字街头》上写文章。这是阿摩利办的一家周刊，一天一天地靠拢极右派。他在加缪接受诺贝尔奖时，跟一些人大加指摘加缪，也和别人一道指责我，说我想把“黑脚”（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居民）打进集中营，因为我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也许，他在自己选择的幽谷中日子过久了，不甘被冷落。也许他痛感自己的才能未能充分发挥，从而把对自己的怨气向别人发泄。今天，我想重新提一下帕斯卡尔·皮雅在1946年3月的情况。在那时候，群英云集的一套班子公认他是社长，而他却欣然致力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让别人露头角，自己则躲避名声且唯恐不及。

正因为帕斯卡尔·皮雅的邀请——可能出于马尔罗授意——我才开始经常为《战斗报》写文章。<sup>①</sup>我为该报写的开头几篇文章谈论了1946年的各党各派。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这几篇文章居然引起了注意。阿尔贝·奥里维埃和另外许多人向我祝贺，意中不无惊讶，于是在新闻界的小圈子里，他们一下子便给了我地位，而战前我写过的书却不为多数记者所知悉，所以也不可能为我在新闻界取得什么地位。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社论作家，而不再是什么“专栏作家”。社论由奥里维埃和我轮流着写。还有一个记者也写，但不如我们俩多，他署名

283

---

① 由于帕斯卡尔·皮雅的邀请，我从1944年10月起为《战斗报》写文章。

为马塞尔·吉蒙。我写的社论登在头版左行。

1946年春天，围绕制宪会议起草的宪法、共产党与其他党的关系、经济的困难、跟胡志明的谈判以及大到本土和法兰西帝国——那时已被称作法兰西联盟——的关系这样的话题，辩论展开了。

关于宪法问题，我为P. 维亚奈的法国防务出版社写了一篇论文，题名《法国人面对宪法》。论文的前一部分由一个青年法学家——我并不太认识他——简单地叙述了1789年以后法国历次制定的宪法。第二部分则由我更加简短地谈谈即将制定的新宪法。我对这篇东西十分不满，所以最近20年来，我的这个或那个助手都没有把它列入著作清单。几天前我找出来重新读了一遍，感觉还不错，有点儿出乎意料。

我倒不是说这篇文章有什么独到之处。一些见解不外乎空中楼阁，在当时相当流行，而且制宪诸公也未加采纳，例如：通过选举的方式，加强共和国总统的权力，总统不需要获得参议院同意，有权解散议会，政府有权终止议会讨论，并且有权加强对议会工作的监督。对于两轮制记名投票，我虽然赞成，但并不坚决，想不到后来居然成功了。我还借用了一些贾吉埃-布吕耶尔的建议，也就是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和埃玛纽埃尔·莫尼克他们俩的建议。

我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没有开宗明义地指出制宪时期的政治背景，即一返回法国便展开的三角战斗，以及战争年代和敌占时期的后遗症。表面上，从解放到选举一届制宪会议，戴高乐将军是在三大党——共产党、社会党、保卫新共和联盟（MRP）的支持下治理国家的。保卫新共和联盟得到了温和派与激进党的多数选票。第三共和国时代的中间派和右派从未插

足其间。在抗敌运动全国理事会内，还曾有右派人物的席位，但民选以后，保卫新共和联盟独握最好的一些王牌并以将军的部曲自居，捧出不可争辩的抗敌功臣为党魁。若要抵挡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的冲击，仿佛非它不可。

这一新的星群掩盖了两大根本性的矛盾：共产党反对其他一切政党，几乎也反对戴高乐，而戴高乐则从未认为全国解放和选出制宪会议后他的使命便告完成。他抱有雄心壮志，想为法国建立各种坚实的制度，并至少用几年的时间加以治理。1946年年初他辞职解政时，本来打算过几个月便重新上台。我记得马尔罗见过将军，回来说：“六个月后，我们再回来。”

为什么辞职要在1946年1月？他觉得政党治国行不通，制定出来的宪法也不会让他在共和国内获得令他满意的地位。所有的政党，连保卫新共和联盟也不例外，都多多少少地看得很清楚，将军不会不让政党存在，但绝不肯从政党手中领取政权。他不肯以总理的身份治理国家。不是不能，恰恰相反，他天生就有在议会内纵横捭阖的才能。我有一次在议会亲聆他发言，辩论安德烈·菲力普提出的建议<sup>①</sup>，让人预感到他去意已定。他的发言虽然没能改变议会的态度，但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从1947年开始，各党各派便分成共产和非共产两大阵营，但归根结底，未来投票通过宪法时，还是会团结一致。而这部宪法却是戴高乐认定与国家的利益和本人的雄心无法并存的。

285

前期的《战斗报》只办到1947年春天，在殖民地问题上

---

① 大概是削减国防预算。

采取左派立场，用的也是左派言辞，但有几个编辑，如皮雅和奥里维埃，在1946~1947年越来越以戴高乐派自居。在我写的社论里，我主张反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支持制宪会议所通过的宪法条文。等到第二次修正的宪法条文交给国民议会审议时，我才勉强建议赞成。第二天，奥里维埃就反问我，为什么不再反对？

1946年12月，印度支那战争爆发，越盟突然袭击河内的法军。我写了一篇论文。萨特认为我言语“支吾”。我后来重读了一遍，倒不觉得太惭愧，也不太懊悔。在伦敦时，我早就主张放弃印度支那。经过战争年代和敌人占领，法国民穷财尽，无力再经管散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属地。但到了1946年12月，我国士兵幸免于难，我在社论里不能不支持莱昂·勃鲁姆的社会党政府，该政府决定派遣援军。我的文章之所以写得那么别扭，是因为我的立场别扭。

我先说：

……我们的军队遭到对方蓄意的和奉命的突然袭击而进行自卫，我们对于在远方作战和牺牲的法国人感到关切和心连心。

但是，我马上又改正说：

满足于此，毕竟难免被人视为怯懦。在目前情况下，诉诸武力，甚恐无法避免。即便为了今后的谈判，眼下也无法不拿起武器。但又怎能不承认，真到这一步，终究标志着辛酸的失望和失败，打击了我们大家在解放翌日所抱

的希望。刚刚通过的宪法隆重宣称，法国绝不采取任何行动侵犯任何国家民族的自由。我们承认越南在法兰西联盟的范围内独立自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的代表们打算推翻这项原则，所以，目前的战斗越发显得可悲，因为

286

我们不成心也不能成心用武力重新征服越南，而时至今日，越南也从未否认我们的权益。

我并不区分越南和越盟，因为胡志明代表的是越南。既然河内事件的前因并不清楚，我就不肯把责任分加于各方面的当事人。我在结尾处呼吁议会重申法国的理论：

我们并不怀疑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肯定“维持”的决心，但是法国真正的立场绝不可与低微龌龊的利益混为一谈。国家下决心要拯救的立场绝不是单凭武力所能保持的。用暴力来维持，而不是维护法兰西。

尽管文字别扭，意思却不见得含糊。用武力重新征服是不可能的：我们既力不足，也心不从；只好履行诺言，让越南独立自主；法国所要保持的并不是旧日的殖民制度。第二天，奥里维埃社论的口气和我的不同，但引用了勃鲁姆在议会上的发言。其主要观点直接引用了这个社会党总理的话，他说：“目前，人们只能记取，在武装的压力下拒绝谈判，或者，有如勃鲁姆所正确指出的‘在和平秩序尚未恢复以前（拒绝谈判）’，因为和平秩序是履行契约的基础。”

作为过渡政府的首脑，勃鲁姆不能不担起这一局势的责任，也许他心里并不情愿，同时也很清楚责任的严重性。然

而，他终究用了“恢复和平秩序”这一表达法，给连年战祸种下了祸根。恢复这个秩序等于用武力重新征服，而在其他场合，他却又自称绝无此意。国内的民族意识——姑且不用“国家主义”这一暧昧的字眼——十分强烈，又看不清力量的对比，故而做出的一些决定使法国渐渐陷入越南这一陷阱，这可以作为解释，但绝不意味着原谅。我在1947年1月29日写的社论里评论马刘斯·穆岱从越南回来后的发言，在今天看来，我的口气未免过于温和，但毕竟提到了不应出兵而应谈判，不应仅仅跟我们卵翼下的人谈判，而应首先和民众信任的人谈判<sup>①</sup>。

除了经济时事文章，我写得最多，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社论，都不外乎是德国问题和宪法问题。1947年1月26日至27日的社论标题为《还有没有德国危机？》，在这篇文章里，我再一次分析了新的事态：整个欧洲在全球政治层面上没落；国家处于两大阵营之间，势单力薄，情势危急，一方面是苏联，另一方面是其他西方民主国家。过了几天，我又强调，德国重振经济和工业乃是势所必至，同时批评了一些限制德国某些工业部门生产的“天花板”。最后，在1947年2月7日，我曾提到“另一类德国”，“如果德帝国或者另外一个德国不回到一个和平的集体中来的话，欧洲的复兴，也就是说介于俄国和大西洋之间的民族国家的复兴是无法想象的”。至于法国的政策，我说，在接受欧洲的经济一元化的同时，还得接受某种形式的政治一元化。“没有任何东西反对法国论点的成立，这一

---

<sup>①</sup> 1947年3月20日，在议会讨论印度支那局势以后，当天的社论并没有增添任何东西，只坚持指出拉马迪埃政府政策的暧昧模糊：到底要跟谁谈判？“绥靖”还要推行多久？



论点既积极具体，又有建设性，目的在于在和平的欧洲重建德国……我认为，如果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重建德国不由我们，那就将不利于我们。”

我重新读了以往写的关于宪法的文章，倒不如说，关于先后交给人民表决的两份文本。对于头一个文本，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都反对第一个宪法草案，因为它在我们看来十分可憎，只有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共产党和社会党支持它，而且社会党是舍了命、咬着牙才支持它的。草案被否决后的第二天，我写了一篇社论，标题为《因失败而得救》，指的当然是社会党人。

由于戴高乐将军的干预，讨论第二个宪法草案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1946年6月16日，将军在巴约市发表了有名的演说，从中不难看出后来1958年宪法的主要思想。关键性的公式前后未变：权力分开，所以执行权并不授自于立法权；总统（由扩大的选举团体选举）选任总理。并无明文规定政府需向议会负责。戴高乐在后来发表的演说中澄清了这一基本要点的模糊之处。

288

戴高乐心目中国家元首的形象在下面这段文字里比任何文章都描绘得清楚。他说：

因此，执行权只能授自于国家元首，因为他处于各党各派之上，由扩大的选举团选出。这个选举团包括议会在内，但广泛性远胜议会。其组成方式应使国家元首成为法兰西联盟的主席，同时又是共和国总统，拥有共和国的执行权。在选人用人上，国家元首负责使普遍利益与议会推行的方针相协调。国家元首负责任命政府部长，当然，

首先是任命政府总理，由他来领导政府的政策和工作。国家元首的职责在于颁布法律和决定法令，因为法律和法令是面向整个国家的，是对全体公民负责的。国家元首有责任主持国务会议并施加影响，保证持续性，这是一个国家必不可少的。国家元首被赋予超越各种政治力量的仲裁服务，或者在正常情况下出之于劝告的方式，或者在严重混乱时，邀请全国通过选举表达人民的最高决定。如遇祖国垂危，元首有责任保证国家独立和履行法国缔结的条约。

波旁宫的议论和将军的方案，二者之间，颇难折中。在巴约市勾画出的制度并未对议会民主判决死刑，而是对议员治国（或政党治国）判了死刑。共产党和社会党从未同意在戴高乐理论的影响下制定的宪法，由此导致了一个共产党人跟其他一切人等之间的“大分裂”，以及所有政党跟戴高乐将军之间的  
289 “小分裂”。短期内，我不相信将军能战胜所有政党。莱昂·勃鲁姆针对他在巴约市的发言立即进行反驳，社会党对于将军的立宪思想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无可怀疑的。

6月18日，将军在巴约市发表演说后两天，我写的社论的结尾是这样的：“从此以后，在现行的体制以外，至少还存在另一种可能，而没有任何人对现行体制表示满意，连领导这个体制的人也不满意。戴高乐将军规划的总统制和英国的议会制，二者折中，制定出来的宪法看来在太平时期是不能成活的。但至少会有一天，人们可以看到各党各派迫于形势虽然不愿意，但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士仍会勉强同意尝试一次。”我不该说这样的政体在太平时期不能成活，而应该说，它只有在不

太平的岁月才能起作用。到那一天，各个政党迫于形势，不得不退位。12年后，阿尔及利亚战争唤来了这么一天。

在埃皮纳勒发表演说以后，戴高乐立场明确，反对第二号宪法草案，我当即声称，各党派在即将举行的公民表决中将会获得胜利。“如果发生较量……结果大概毋庸置疑。各党派的宣传不提宪法的优点，而提个人专权的危险。参加表决的人数见少。第一次表决，赞成票仅占48%，到了第二次表决，便会变成多数赞成。”

1946年9月10日，我问道，怎么办？跟5月的情况比起来，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政府依然是国民议会委派的。第二议院连要求延期的否决权都没有。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也没有部门监督……共和国总统实际上没有选任总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根本没有规定说某个重要措施可以于必要时推迟几个月实施，或者由新的投票加以修正。没有任何掌握实权的机构能够超脱党派博弈，也就是说，能够超脱各党参谋本部的意志。”

我总结说：“对公民来说，弃权大概是唯一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表示自己要求摆脱临时状态，而对别人强加的宪法表示不满。”就在1/3登记选民通过宪法的同时，一个“修正派”的政党——法兰西人民联盟出世了。

290

共产党联合其他党反对戴高乐所主张的宪法，甚至加码抬价，要求一个强大的单一的国民议会主宰政府，使之充当议会的仆从，执行议会的意志。甚至在共产党退为反对党以后，“解放者”与政党之间的分裂依然十分明显地持续着。一直等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戴高乐才得到了他一回国就盼望的机会：议员们的共和国退位，由一个“立法者”毕其功于一役，

创建了一个共和国，无以名之，只好叫作“执政官”的共和国。保卫新共和联盟是一个讲究忠诚的党，如果始终不渝，也不会通过第三次制宪会议投票赞成将军所主张的宪法。事实是，将军首先要求的是，共和国总统不向议会负责而掌握高于议会的权力。1958年的宪法是战后时期任何一届议会都不会投票通过的。

出版界和大学的好些相知友好曾经向我探询当了37年记者的经验。我没有把在《观点》周刊的经验算在内，因为我在那里什么也没学到，根本谈不上在本行中登堂入室。到了《战斗报》社，大家对我开诚相见，我记得顶多只出过两三次毛病。自从阿尔贝·加缪抱着挽救报纸的希望重新回到报社，分工写社论便比较困难了。此外，有一个记者在当时还是“没有职称的小记者”，而今天已经成为高级的自由从业的记者。他名叫勒内·达贝尔拿，用独擅的方式描绘当时有些人对我的不快，因为我写社论、评论都特别快，所以议论起来的态度不是都那么包容。与其说是针对我的文章，毋宁说是针对我这个人。我听了将信将疑。《战斗报》的编辑部有点叫我回想起当年乌尔姆街的师范学院：同学们不谈政治、文学，便互相议论品性。在这方面，我大概在这个团队里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

1947年，财政情况逆转，我跟编辑、领导、印刷工人参加过许多次会议。经理让·布洛克-米歇尔既不算职业记者，也不算企业家，只能归入作家知识分子一类。他学过法律，比别人更加宜于担任报社经理。印刷工人跟他（和皮雅）照例争得十分厉害。他们并不怎样同情这伙爱好社会主义管理的新

手。他们对抗敌知识分子和对剽悍资本家提出的要求完全一样。我还记得，一个工会干部在冗长的讨论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快来一个真正的老板吧！”

为什么初期的《战斗报》尽管拥有皮雅、加缪、奥里维埃、格尔尼埃、纳多（Maurice Nadeau）这么些人才，仍会夭折得这么快呢？我们彼此间谈论过这个问题。人们在巴黎说：大家都看《战斗报》嘛！我回答说：“可惜所谓的大家只不过4万人呀！”那些享有战前名称的报纸都逐渐脱颖而出，而《战斗报》却正是人们在1939年以前所说的那种舆论报。舆论报的发行量是永远不会大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在一个时期里，《战斗报》曾经发行过20万份，1946年便渐渐少下去。有些编辑抱怨奥里维埃，说他的戴高乐色彩不合左派读者的口味。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并没有经过民意测验。大概也有另外一些人讨厌我写的社论。今天和37年前一样，我的诊断从不归罪于一个人。《战斗报》是一份抗敌的报纸，在党派治国的新闻界，它是没有地位的。

1944~1945年，战争还在进行，纸荒严重，报纸只印正反两页。文章的质量和抗敌的团结气氛吸引了形形色色的读者，但不过是应时凑集的报纸。战争结束后，随着法国人重新走向选票箱，政治分野重新出现，因此，一家没法归类的报纸便陷入了致命的危机，因为它不可能完全满足任何一个特定阶层的读者。各栏目的编辑各抒己见，往往彼此矛盾。最具有象征性的插曲，可算是对宪法草案第二稿的民意测验。

292

当然，一部分读者允许一家报纸的编辑彼此之间进行自由讨论，报纸的努力方向在于报道而不在于灌输学说。在政治不稳定甚至上演悲剧的时候，谁敢吹牛说自己掌握了真理呢？把

自己的真理说成绝对真理，到底算不算不太老实呢？<sup>①</sup> 这种说法不可菲薄。大多数读者会回答说：“我们可不需要我们读惯的报纸，它们把人弄得莫名其妙。记者对自己搞不太清楚的事，不如免开尊口。”不仅如此，根据《费加罗报》从1947年到1977年这30年的经验，许多读者所期待的，不仅是些新闻消息，而且是一种安全感，也就是说，期待报纸能够证实读者自己做出的判断。罗伯特·拉叙利克（Robert Lazurick）办《震旦报》，一直办到他失事遇难，他很情愿出一期专刊，谈谈新闻自由。他说：“我差不多整整一辈子都在‘卖身投靠’的报纸上写文章，就是说，报社的东家——金融家和工业家一碰到直接关系到他们事业的时候，便显得十分敏感。除此以外，他们像仁君一样让我们过太平日子。现在，我办的报不依靠任何人，只依靠读者。如果我写这写那，他们就要停止订阅，或者不再买来看。”换句话说，每一家报纸都觉得自己是读者的俘虏。皮埃尔·布里松停止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为摩洛哥苏丹发起的运动，因为读者的抗议信多得超过了决裂的界线。只有《世界报》依赖本身的特殊地位，竟敢触犯这个或那个思想派系。<sup>②</sup>

293 据我所知道的情况，皮雅主持的《战斗报》至少从1946年3月到斯马贾接办为止，搭配了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半截戴高乐主义（或者说，隔一天搞一次戴高乐主义）。社会党人嫌它戴高乐色彩太浓，温和派嫌它过于反对殖民主义，保卫新共和联盟嫌它的措辞太左。各党派的边缘人物

① 有一个朋友反对说：“那该怎么办？”

② 《世界报》的特殊地位来自好几个方面：公认的裁判权；为一切政治人物开设的自由论坛；大学师生赋予它的作用。

都很中意该报，但是，报纸就是找不到一个中心，找不到一个核心的忠实读者群。不错，忠实的读者是有的，对一份舆论报来说，人数不算少，但对一份全国性的报纸来说却不够。也许由专业人士来办，该报能不顾一切地打一场胜仗。

在第一班人决定放弃的前几个星期，问题在于寻找财源。我跟两三个银行家谈过。他们就这一点或那一点批评报纸的路线，特别是路线中的反殖民主义。其实，我很怀疑原来的班子是否会容忍我当领导，至少是当部门领导。在这一点上，布洛克·米歇尔不容我置疑。他也许说得不错，尽管他和我的关系比其他许多人都好。

在斯马贾和克洛德·布尔岱接管《战斗报》的时候，我也跟于贝尔·伯夫-梅里（Hubert Beuve-Méry）和皮埃尔·布里松两人接过头。我在战前并不认识他们二位，只听说过前者是如何在慕尼黑时期辞职脱离了《时代报》。至于布里松，是我在新闻部的头两个月结识的。我在《战斗报》做过一年，在巴黎政界心目中成了记者或社论作家。这时候，我又得进行抉择：不是进大学或者进新闻界，而是进《世界报》还是进《费加罗报》。

两家报纸的经济条件都差不多。问题在于一家是早报，一家是晚报；一家是战后更新的历史性报纸，一家是战后办起来的报纸。我跟伯夫-梅里的关系很好，而在1947年，中立主义和大西洋主义的全国性争论还没有展开。那时候我还看不清楚，这两家聘请我的报纸会在两年以后成为法国非共产主义思潮中的两个极端。

我听从了马尔罗的意见。他说，你跟皮埃尔·布里松比跟于贝尔·伯夫-梅里更相处得来。我也是那么想的。我看不出

《世界报》会给我什么样的职位。《费加罗报》的社长有着坚定的信念：反共，捍卫议会民主和欧洲统一。他的信念和我相同。所以我无法预见，该报的路线和我个人的主张会发生严重的分歧。总的来说，这种先见后来都为事态所证实。只有几个例外：法兰西人民联盟，非殖民化，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管理经济的功绩。

布里松在解放时是戴高乐派，他于1958年正式加入戴高乐派，后来居然狂热地反对法兰西人民联盟。1960年代初，他勉强接受阿尔及利亚独立，追随了将军本人的政策。

1977年春天，我心脏病发作，在科香医院病床上接到伯夫-梅里的来信，这封信深深感动了我。我们俩的年纪都使我们能比较超脱地来回顾往事。他重提1944~1945年的梦想，并且总是怀着念旧的心情写道：“初期的《战斗报》失败后，我原想见到你参加《世界报》这一奇遇。而我这一番希望又怎么样了呢？撇开一切分歧和小买卖人的争吵，当时可能发生的困难，其性质会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也许会这样。我不敢肯定。参加《世界报》的奇遇能维持长久，但争论了那么多年，他这样表示友情，实在感人至深。



## 第九章 记者和活动家

295

我差点儿在这页纸的上端写下“十年虚度”。战争爆发时，我才34岁。自从服完兵役，我很是下了些工夫，觉得还可以用十一二年的时光来丰富知识，甚至从事发明创造。从1939年到1945年的6年中，我认识了另外一些人、另外一些事情、另外一种思想和生活方式。大多数大学教师都是读完书便教书。他们的天地软绵绵如棉花，其中只有儿童和青年，弄不好他们会脱不了稚气。我比大多数政治学家更近地看到了实际政治，这是我引以为幸的。可是，现场分析活生生的政治，非但无助于哲学思考，反而会使之麻痹瘫痪。哲学家碰到了议员和新闻记者会有这样一种感觉：自己会受奚落，或者掉进井里。

我当了10年职业记者，而不是大学教授，在报上写文章，归根结底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甚至1948年我在巴黎大学遭受的挫折，我自己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因为我给好些未来的同事这样一种印象，仿佛我关心《费加罗报》胜过巴黎大学。倘若二者不可兼得，我也不会放弃新闻业。乔治·达维就是这样解释我在申请教席时说过的一句话。不知他是单纯还是怀有恶意，他在教授会议上重新说了一遍，因而决定了一场紧锣密鼓的选举。<sup>①</sup>

---

① 我不太愿意回忆大学生生活中的片段。事实上，当时有三个候选人：G. 古尔维奇、J. 斯多蔡尔和我。J. 斯多蔡尔明确指出，他不和我竞选，但是哲学系主任J. 拉包尔德中意他。在正常情况下，斯多蔡尔在第一轮选举中所得的票本来应该归我。可是，大概由于达维的一番话，有几票便投给了古尔维奇，把他选了出来。

我记得跟勒·塞纳 (Le Senne) 的一次谈话。他是学院派唯灵论的典型代表，为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一点儿也不反对我从事政治活动，也不反对我去《费加罗报》。他对我说，我的做法是光荣的、必要的，他不怪我，但在他看来，大学教授不宜搞新闻工作。大学教授应该自甘寂寞，置身于纷扰的世事之外，以传经授业为毕生的使命和生活的全部意义。他又十分坦率地说：他和我已经不同道<sup>①</sup>，但无论如何，他仍然会投我一票。因为古尔维奇不仅法文不行，更不配接替前任阿尔伯特·巴耶。巴耶也是当记者胜于当教授的人物，他刚刚离任不久。

1947年春天，我进了《费加罗报》。那时是皮埃尔·布里松在办报，和1977年我脱离它的时候迥然不同。在第四共和国时期，该报也许在国外还不是声誉最高的，但在国内则肯定对政治界具有最大的影响。皮埃尔·布里松对政治人物施加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具有的威力，远胜于贝尔·伯夫-梅里。表面上这是怪论，然而这是事实。《世界报》一向是反对派的喉舌，反对大西洋同盟，反对德国重整军备，赞成欧洲的统一——显得软弱无力这一说法；它对舆论有影响，尤其对青年有影响。至少在表面上，《世界报》反美甚于反苏，它变成左派知识界的《圣经》，左派人士喜爱它的批判态度，不管它对时事是否有直接影响。当权的政治人物不得不照顾“海五星”<sup>②</sup>的论断，因为这是铁面社长的御旨。皮埃尔·布里松则大体上适应第四共和国的政策，经常与部长议员们往来，所以大家有点

① 我肯定是把原话简化了。

② 伯夫-梅里的笔名。——译者注

怕他。有时候，反而是他召见政府部长。等到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情况当然就不一样了。《费加罗报》反对过法兰西人民联盟，因而从此沦为遗老的报纸。但是，我必须向布里松表示敬意，他从来没有对他的统治感到后悔。作为正直的法国公民，他和我一样欢庆祖国终于有了像样的政府。法国原来充当了欧洲病夫，忍气吞声，日子久了，他和我一样感到这是自己的耻辱。

我为《战斗报》写的一些文章，以及我在共进午餐时做的分析（比方说，我在几个月以前曾对他讲过，大家应当准备迎接一个不再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打动了。于是，他在1947年春天友好地坚请并且说服了我每月为他写几篇文章。在他生前，我一直按字数领稿酬。

皮埃尔·布里松生活在他的报社里，为他的报社而生活。他不愿脱离报社老板戈德拿雷努夫人。她是高蒂的前妻。她离婚分家时，分到了《费加罗报》的股份。布里松一方面尊重老板的权利，另一方面坚持全权管理报社。他在承认业主的一切权利的同时，懂得完全自主地管理报社。他的主张（“对资本既一致又独立”），戈德拿雷努夫人——确切地说，是她的小叔子——不同意。这个人在美国主持高蒂公司，劝他的嫂子要求行使业主的全部权力，也就是说，不仅要过问报社的行政，而且要干预报社的政治方向。皮埃尔·布里松拒绝这些要求，理由是，政府批准的出版权是给他本人和他的团队的，不是给《费加罗报》报社的。国民议会通过一条法律，叫作《布里松法》，这条法律完全针对《费加罗报》，并且把经营报社的权利交给获得许可证的人。1947年，官司还没有打完，直到1949年双方才做出让步，定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有效

期为 20 年。这个办法是马塞尔·布路斯坦想出来的。

布里松找了些朋友出钱组织一家承包公司，经营《费加罗报》这个招牌报社。让·普鲁沃斯特取得股本的半数，皮埃尔·布里松掌握 1/4。承包公司和报社的两个董事会，都由他一个人兼任董事长。办法非常特殊，比《世界报》的地位显得脆弱。但是，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倒不会出现大的波折：298 头一个条件是报社兴旺发达，第二个条件是布里松长命百岁。可是不到 20 年，布里松去世。25 年后，另外一个条件也似乎消失了。

在战前，《费加罗报》的发行量很小（大约 8 万），之前办得十分出色，也出过一次丑闻。<sup>①</sup> 当时，主持报社的是吕西安·罗米埃和皮埃尔·布里松两人。罗米埃在 1943 年当上了贝当元帅的部长，战争还没有结束便去世了。布里松在德国人占领非占领区以后，便毁掉报社，投入地下斗争。解放后，他被批准重新出版《费加罗报》（《时代报》则被拒绝，尽管它也自己拆了台，只不过晚了两天）。由于战前的报纸都已经销声匿迹，学院派的《费加罗报》见赏于上流社会，数月之间便一跃而为全国性的早报。皮埃尔·布里松立了非凡之功，确可引以为豪。他放手行使社长的职权，外边对他和他的编辑部流传这样一句评语：独裁治下，乱得有趣，编辑放任，冲淡专制。他的威权是无可争辩的，也没有人争辩。他向安德烈·希尔巴赫请教，跟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商讨问题，新闻记者都认他是自己人。

---

① 1914 年，报社社长被卡约的妻子谋杀。报社采取了不齿于人的手段，公布了这个夫人的私信，结果法院判她无罪。

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巴黎人，也是老派的法国人，除法语以外不懂任何语言，也没有去过外国。他的修养和事业纯在文学方面。在革命大动荡时期，由他来领导一家全国性的而且兼有国际气质的大报，为它制定路线方针，本来是不适宜的，幸而，他采取的一些立场事后证明是正确的和明智的。然而，大部分知识界人物对于宏大政治比他精通得多，都强烈批评他：反共，对德和解，倾向大西洋同盟和欧洲一元化。不错，他有时候为了反共发表过一些无益而可笑的东西。在国民议会投票反对欧洲共同防务后的第二天，他写了一篇措辞激烈到不可思议的社论（标题为《我惭愧》）。

我费了大气力，好不容易才说服他，《费加罗报》驻美特派记者应该住在华盛顿而不该住在纽约。他跟让·普鲁沃斯特不一样，后者让雷蒙·卡杰每年环游世界一次，而他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让我出国走走。我每次出国都不是《费加罗报》派的。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派我去采访旧金山会议，商谈对日和约。我屡次劝他采用民意测验，可始终是白费气力。后来，民意测验泛滥成灾，周刊也罢，日报也罢，类似起哄。不仅如此，新闻记者评论民意测验的结果并不都讲规矩。每一次都得一再劝告他们不要越出理性常识：如果去问别人几个月以后想干什么，或者在某种未来的情况下将干什么，他们的回答必须十分慎重地对待。在卡特和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肯尼迪刚正式宣布竞选，几乎朝夕之间，卡特的比分便一落千丈。而卡特还没有正式当候选人的时候，记者访问的人之中有好些都说对卡特不满意而倾向肯尼迪。一旦当真要投票选举，选民们便马上想起，查帕奎迪克事件是令人无法忘怀的而且是不可饶恕的。

1965年，布里松去世，《费加罗报》已经在走下坡路。在报社的收入中，广告费占85%，这造成了报纸内容上的不足。读者人数见少，但发行量掩盖了不景气，靠的是免费赠阅，赠送旅馆过客。主要的问题在于，报纸没能更新换代。订户还有十来万，老主顾、社交新闻里的人物、学院院士大体上依然忠于该报，逝者却缺乏接班人。1960年代的资产阶级已经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有时候看看《费加罗报》，但已经找不到各人想看的東西。慢慢地，《世界报》取代了《费加罗报》的地位，哪怕不能作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起码要算知识界地位的象征。

300 一些人酷爱自己的事业，简直不设想，如果没有了自己，其事业会怎么样，所以根本没有培养接班人。布里松就属于这类。他曾经对普鲁沃斯特说，他想任命L. G. 罗比内为副社长，可是他又说，日常的助手不能提拔得过高。后来，弗拉季米尔·多麦颂写信告诉我说，布里松认为他去世后，我将是最有资格接任社长的。但是，布里松从未向我露过口风，也没有跟他的儿子让-弗朗索瓦说过。不管怎样，我想我是不会答应的。如果他把对多麦颂讲的话当面告诉我或者写信告诉我，情况一定会大不一样。1965年，我不敢存此雄心，原因之一是怕报社的领导班子抵制此举（布里松本人当然不在其内）。编辑部也有一部分人不会同意。如果布里松公开指定我当他的接班人，那么反对派至少不得不为之缄口。

古怪的是，这个巴黎佬不存幻想地放眼首都的人物及其风尚，竟不肯考虑普鲁沃斯特的正当期望。我屡次跟他谈起这个问题，他只有一句话，就是让我不用操心。他说：“普鲁沃斯特对《费加罗报》不感兴趣，他会保持现状的。”我觉得不可

思议。普鲁沃斯特对自己新闻记者的身份的认同胜过资本家身份，怎么肯掌握了报社资本的半数而永远不想过问报社的事情？报社和编辑部拒绝了普鲁沃斯特，便接受了罗伯特·艾尔桑。我在这出荒谬剧里，无法否认我的部分责任，可这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1947年，有三大名人在报纸上写文章：安德烈·希尔巴赫、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安德烈·弗朗索瓦-庞赛。就内容而言，莫里亚克写文章没有任何界线，希尔巴赫也是这样。只有庞赛不大爱谈经济时事，我是指通货膨胀、物价、工资等需要引用理论或方案的问题。他大概没有读过凯恩斯的著作。他是地理学家出身，善于描绘国家及其风景，也会分析它们的兴衰升沉。他会说明英国在20世纪的危机或严重的不景气，但口气像社会学家、人种学家，而不用经济理论的工具。弗朗索瓦-庞赛希望包揽国际关系——这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却不肯不管。这种专业之争，不调自解。庞赛去德国接任科尼格将军的职位（当了占领军主任，后来又调任驻联邦德国的大使）。

我在皮埃尔·布里松的领导下在报社工作了18年，从未跟他发生争执。但是，我采取的立场并不总是和报社的路线相符。有两件事关系最大：先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后来是非殖民化。我虽然加入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但并不因此而完全服膺将军的论点。我照常用自己的笔调分析经济问题和外交事务，并没有转变立场接受戴高乐将军的观点。关于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论战，以及奥里维埃对《费加罗报》的攻击，弄得报社成员中加入人民联盟的克洛德·莫里亚克和我十分尴尬。人民联盟在战争年代的《费加罗报》里发掘出了几篇麻烦的文章。

1940年年底，有一篇文章肯定会牵连布里松本人。这篇文章列举出已经实行或者正在筹划的各项改革，其中有一项犹太人待遇法。我读了也不禁一阵心酸。维希政府检查新闻，大概会禁止批评犹太人待遇法，但也不见得会强迫别人去加以歌颂。<sup>①</sup>

302 布里松是否一贯反对犹太人？当然不是。《费加罗报》呢？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但不过是一种沙龙式的、学院式的反犹风气，远不像希特勒分子那样仇视犹太人。哪怕跟莫拉斯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布里松本人一向憎恶莫拉斯，并且从1940年到1942年，不断和他舌剑唇枪，交绥不绝。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犹太人待遇法完全是维希政府一手炮制出来的。这一举动并未引起什么抗议，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并不是绝对不可抗议的。甚至好些受过共和国的大惠、对占领者抱有敌意

① 1940年12月19日版，以整整一版贡献给标题为《法国史中的六个月：贝当元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成就》的文章。摘要如下：国家改革，法院，公职人员，共济会和秘密结社，民族工业，救治失业，农业，管理法国国籍，职业规章，股份公司及法兰西银行，经济与货币政策，保护种族，教学改革，遗产，家庭，经济纪律，电影，救济战俘，战士联盟，青年与体育。在“管理法国国籍”这一章，对犹太人待遇法的主要条文简述如下：“除曾为国家效力者外，犹太人不得从事行政，教学，军队，新闻，广播，演出工作。犹太族外国人得送进特殊营地（10月18日）。剥夺阿尔及利亚土著犹太人的政治权利。”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综述。但是，皮埃尔·布里松署了名，这就无可置疑地揭示了《费加罗报》报社社长当时的心情。

“1940年6月17日，贝当元帅执政，我们认为，将10个月来在他启发下完成的各项改革列举出其名称，不无裨益。凡此改革莫不出于必要性的现实感觉，而证明整顿和重振精神的决心，这种决心的力度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最关键的考验。180天以来，元帅日夜操劳，顶风冒雨，毫不示弱，悉心致力于救国大业。歌功颂德似属多余。元帅深知，与胜利者协作，必须互相尊重，而协作之首要保证，厥唯精诚团结，信任全体法国人民。”



的作家也会写关于犹太人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使我深信，从战前到战时，反对犹太人的风气已经泛滥到了我在当时没有想到的地步。倒不是我对维希特别宽厚，而是为了自己精神上的宽慰，所以我不肯承认某一个法国政府会把我逐出法国社会。我在伦敦猜测贝当元帅是在釜底抽薪，预防德方的压力。这种幻想聊以自慰。维希的法律与《纽伦堡法令》不相上下，其穿凿附会、搜寻先河的水平与《纽伦堡法令》不相上下，其排斥搜逐、唯恐不尽的能耐，同样与《纽伦堡法令》不相上下。

我在1945~1946年认识布里松的时候，不觉得他对犹太人怀有任何特殊的同情或反感。他的相知友好中，一向不乏犹太人。其中一人还为他立传。我在流亡国外时读《费加罗报》，特别欣赏文学栏目，因为这里蕴蓄着自由思想和抗敌情怀。对莫拉斯进行不懈的论战，捍卫和发扬法国文学，抨击合作派的作品，这是任何读者都不会弄错的。我曾经在《自由法兰西》上一再向《费加罗报》致敬<sup>①</sup>，加入皮埃尔·布里松的班子，我完全问心无愧。伊佛娜·萨尔赛和阿道夫·布里松等一帮“年鉴派”与19世纪末期的共和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时候中间偏右，有时候中间偏左，看情势而定。

1956年，出征苏伊士运河导致了一塌糊涂，我指责举动本身，于是皮埃尔·布里松引用陈腐的道理责难我采取的态度，一开口便是：“既然你是犹太人……”我严厉地说：“我不是以色列人，我是法国人。”在不同的情况下，也有读者会

303

① 《从投降到全国起义》一书中，第91~102页的《文化与社会》一文中写道：“……费加罗报作为流放贬逐中的知识界的喉舌，光荣地针对种种威胁进行不懈的宣传。”1941年6月15日文。

责备我帮以色列说话。

1947 ~ 1951 年 (或 1953 年), 皮埃尔·布里松大举攻击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辩论中, 我说将军出山执政是指日可待的, 在温和合法的气氛中上台, 比在混乱中被拥立要强得多。他就是不信法兰西人民联盟能够获胜。后来的事实证明是他看对了。1958 年, 将军乘兵变之机, 黄袍加身, 布里松兴高采烈, 比我高兴得多。

我们俩在非殖民化问题上, 特别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争争吵吵, 但这并没有使我们彼此疏远。我重读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谈的问题是蒂埃里·莫勒尼的调查报告。他说阿尔及利亚等于法国的西伯利亚、美国的中西部或加利福尼亚。信上的日期是 1957 年 5 月 4 日, 其中反映出我们两人的关系以及他对我的看法。至少, 他绝不相信我心胸枯狭, 唯利是图, 牺牲阿尔及利亚只不过是因代价过高。他写道:

亲爱的朋友, 蒂埃里·莫勒尼调查报告的结尾使我很感动, 尤其是他下的结论。他谈问题, 动了真感情, 动感情当然不够, 但没感情更将一事无成。这你比谁都清楚。有时候, 你简直是一团烈火。纯粹从政治上算计, 只盘算利害是错误的。人的因素, 感情的因素, 会把算盘打乱, 甚至打碎。想想看, 贞德从出生地栋雷米动身, 甚至梅加拉跑向马拉松, 照专家估计, 他们能有多大的希望获得成功呢? 不错, 拿例外作根据是发疯。但排除由信仰而产生的决心, 排除信仰的部分作用, 等于自己抛弃了人身上毕竟是最美好的东西。我可不是在这里说经济学家的坏话。其实, 你也不见得比我更加醉心于经济学。我并不打算到

巴黎大学去接你的班。但由于你思维敏捷而严谨，你是一个绝对派，一个火辣辣的绝对派。干嘛跟你唠叨这些呢？亲爱的朋友。我这里，周围都是意大利的蔷薇玫瑰，角落里满是回忆和遗忘。为什么呢？要怪，就怪我对朋友的情谊吧。正因为出于友情，连我自己都不敢承认，我只想向你再说一声：同意，我便可以放心地认为自己看对了。 304

皮埃尔·布里松依然相信神话：几百个雅典人居然打败了蜂屯蚁附的波斯人。这是细节，无关宏旨。当然，没有信仰是什么也搞不成的。但此外，还有一种信仰：阿尔及利亚驻军军官发起叛乱时，人们抱着信仰对数据揭示的胜败消息打了一场赌。也就是说，几百名战士奋起打击表面上还很稳固的政权。1954年11月的暴乱导致阿尔及利亚火势蔓延，其速度远非7个历史领袖始料所及。即便我同意皮埃尔·布里松，也谈信仰，谈灵魂，我的结论却是不会变的。在20世纪中叶，几百万穆斯林为独立而战斗，他们是必定能取胜的。不靠勇气，也可凭仗自己的耐力。因为对方已经不再相信自己有什么传播文化的使命，也不再相信自己有什么权利把自己的主权强加于一个寻求身份认同的民族。

1947年或1948年，我加入法兰西人民联盟，惊动了当年在伦敦看过我写的《波拿巴的阴影》、听过我一些更加强烈的言辞的人。他们回想起来，非但觉得出乎意料，甚至怀有共愤。我揭发过的潜在危机，难道事到临头，我自己居然忘得一干二净？从1945年到1982年，整整37年，为什么中间夹的一段时间，我当起了活动家、积极分子？在其余的岁月里，我

尽管不算纯粹的旁观者，至少是个不投靠任何党派的旁观者。与此同时，马奈·斯佩尔伯对我加入这样一个运动表示遗憾，因为这个运动不管怎样表明心迹，它的作风和宗旨在他看来毕竟不太民主。

人们一般将我的反常行为归咎于我和马尔罗的交情。连马尔罗自己也这样想。不能说他错，但没有触及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对伦敦年代的怀念，另一方面则是第四共和国的无能。

请大家理解我，我绝不背叛自己而去追悔自己曾经拒不接受戴高乐的神话，拒不接受他从1940年6月18日起取得的合法正统，拒不接受他归隐科隆贝双教堂村以后仍旧保持着的合法正统。我并不追悔，直到1942年11月，我一直没有排除维  
305 希政府迁往阿尔及利亚的可能性。如果真迁了都，后来的除奸肃反运动至少不会搞得那样激烈。相反，自从盟军在北非登陆后，吉罗将军缺乏命世之才便为世所公认，那么，由戴高乐将军出任临时政府首脑便是众望所归、不可避免的了。至于法国解放后将军毫无解政归山的志向，而且策划了一个与第三共和国全然不一样的共和国，当时，我们就是这样想的，而且并没有看错。然而，即便不加入戴高乐运动，最晚也该从1943年年底开始，便把戴高乐看作国家命运的无可争辩的临时负责人。

1946年或1947年的戴高乐派，与1941年或1942年的戴高乐派已经不大相似。除了将军本人大概依然故我，领袖周围的人以及追随他的人，与当年几十个从1940年就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忠实追随者，已经相去甚远。在伦敦，将军偶尔邀请我赴宴，有一次他亲口评论自由法国。他既无恶意，也不随和，只认为自由法国人才稀少。不是说《自由法兰西》那份刊物，而是说在伦敦的法国人。他不是不知道，我把一些人叫

作“向上脱离阶级的人”。在巴黎，戴高乐分子和抗敌分子融为一体。安德烈·马尔罗和爱德华·科尼格里翁-莫里尼埃都成了他的“亲信”，这个神秘的团体在本质上便是可憎的，因为说领袖的毛病都落在它身上，还不如说正是它在为虎作伥。

我在几个重要问题上不同意将军所交代的政策，特别是对德国的态度。我记得相当清楚，1945年在拉·都尔-摩堡街多明，即我会修士那里，我和莫里斯·舒曼发生过一次相当激烈的争论，主题是：法国对于世仇的外交政策到底目的何在。俄国人——我偶尔用一次将军常用的称呼——割走了德国的东疆，自己割据了东普鲁士，把奥德-尼斯河以东的疆土划归波兰。法国人为了维持平衡（什么平衡？），也得照样割下莱茵河左岸（不予归并），建立一个鲁尔区高级行政专署来管理生产。同时，法国人必须在柏林<sup>①</sup>和在西方范围内，反对有利于重建德帝国的一切体制。这种成堆的保障在我看来未免可笑，而且是德国人无法接受的，因此绝对不利于法德两国的和解。而戴高乐呢，他既要保障，又要和解。莫里斯·舒曼为戴高乐派的论点辩护，其激烈与雄辩一如既往。然而我没有太费气力便说服了大多数听众。以埃蒂安·吉尔森为首，他们认为法国方面的野心必将为英美断然否决。西方战胜者对于苏联的军事进展以及红军解放的地方立即苏维埃化早已怀着戒心，所以要重建一个德国，它将既具有生命力，又能够挡住东方卷来的狂澜。可是，莫里斯·舒曼断然说，戴高乐派绝不让自己的计划与行动听命于盟邦。可是，讨论会的判断不取决于雄辩而

306

---

① 四国占领军代表在柏林开会，试图创建一个总辖四区的中央行政总署。法国代表对一应类似的企图使用了否决权。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代表也许为整个西方的利益出了力。

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将军的态度经过战斗法国的代言人的加码，引起了法国和英美的尖锐冲突，不无令人懊丧之处。对英国，是叙利亚问题，对美国，则是斯图加特问题和阿奥斯特河谷问题。

将军回到法国，仍坚持自己的哲学，将对外政策列为首要。这种外交优先权并没有什么特色，不过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主要是德国史学家搞出来的教条和硬信条。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同意，因为“首先要生存”，这是常识。无论如何，民族的安全或国家的独立是否将附属于私人 and 集体利益而不论这利益到底如何呢？然而，外交的优先地位如果只限于改变一些无足轻重的国界线，那就会把宏大的政治降为恶棍打官司。法国刚刚解放就迫不及待忙于恢复与俄国的联盟，这是头一次表现出戴高乐派外交的一贯主张，或者说是戴高乐将军的世界观。这位将军看不出，或者不愿看出欧洲刚刚自拔于狂风暴雨便分割为两个对立的政治文明区域，然后又分裂为两个军事集团，而戴高乐却经常跟苏联人一样斥骂集团政策，仿佛不知道东欧苏维埃化等于形成了共产集团，从而促成了对等的西方集团。视而不见，岂不怪哉！可是必须补充一句，在法兰西人民联盟时代，即1948~1952年，他反苏、反共之激烈程度却远远超过执政的各党派。

假如1946年以后将军继续执政，他会不会赞成英美的政策，正如第四共和国的部长们，特别是像乔治·皮杜尔那样咬着牙逆来顺受呢？将军大概不会无限期地反对成立波恩共和国。但是我很怀疑，在他的统治下，让·莫内能够说服部长们，并通过他们发起煤钢联营，由国民议会投票赞成《罗马条约》。今天的法国人已经不记得让·莫内和罗伯特·舒曼，

将军及其追随者所反对的体制为法德和解扫清了道路。这种体制以权利平等为基础，莫内他们并不通过这种体制反对法德和解这一目的，而只反对戴高乐派政策所用的手段。再也谈不上模仿俄国的政策，分割西德人保持下来的领土。1958年，第四共和国人士留下了既成事实，将军也没法再走回头路，反而补充了共同市场，尽管他自己是不会发起的。理性的狡黠帮助了我们。不然，将军不会签署该条约，而第四共和国则不会有力量付诸实施。

使我接近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当然不是将军的对德政策，而是因为他拒不接受“政党政体”（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是使重新恢复起来的民主制，再次陷入曾经让第三共和国惨遭灭顶之灾的实践中而垮台）。在战后第一个阶段恢复起来的比例选举制有利于三大政党——共产党、社会党及保卫新共和联盟在选举中获胜。1947年，三党制经受不住国内的紧张局势和苏美冲突在国内的反响。不久，共产党人便成为碰不得的人。联合政府越来越像第三共和国的历任政府。连最坚决拥护民主制的评论家也不会不权衡一下，在完成国家的任务与部长们手中的权力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否根本无法保障他们的仕途。

308

在戴高乐主义的种种化身中，法兰西人民联盟受环境的支配最尊重议会，也最坚决反共。正是戴高乐将军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苏联的军队离我们只有“环法自行车赛两个阶段”之遥了。也是他自称反共反苏最为彻底，但在他的心目中，“第三种势力”，执政的政党，都像当年的维希政府一样介于亲善派和抗敌派之间（这种说法显然说不通）。

作为人民联盟的活动家，我到底有些什么活动？克洛

德·莫里亚克在巴黎五区的一家礼堂里主持会议，由我演讲国际局势。一小帮高师学生决定不让我讲（我错怪了安德烈·杜瓦尔<sup>①</sup>，他是好友科莱特和让·杜瓦尔夫妇的儿子，我还以为他和那些人混在一起）。他们不用费劲便达到了目的。会场没有维持秩序的人，十来个小伙子一定要打断发言人的每一句话，任何发言人终归会忍耐不住的。克洛德·莫里亚克不住地低声叫我：“讲下去，讲下去。”讲了三刻钟或一小时，会务处取得我的同意，认了输，宣布休会。

领导党的宣传工作的安德烈·马尔罗照理做出了反应。他组织了一次规模更大的会，预先布置好纠察队，但纠察队并没有派上用场。社会党和共产党内反对我在事前通知会务处，说绝不扰乱会场。我刚从一场大病中康复，回想起来，那时我体力不怎么样，讲的也不怎么符合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特殊理念，安德烈·马尔罗却对这一次报复行动表示满意：我们坚持发言，证明有力量迫使对方尊重我们，并且只要我想，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举行集会。但是他心里真的不满意，我的演讲很少体现戴高乐派的特有思想。我大谈自己的主张，谈西方或欧洲联盟，却没怎么表达将军的意见。

309

另有一次，我出席人民联盟在互济大厦礼堂举办的演讲大会，到场好几百人，是一次联盟内知识分子和支持知识分子的集会。与会者有的是同情者，有的是出于好奇。伽利玛出版社的人马坐在第一排。皮雅首先发言，没有掀起风暴，连一阵轻风也没有吹起。接着是儒勒·摩纳罗发言，确切地说是念了一

---

<sup>①</sup> 他告诉我说，他并没有加入这一帮人，而且对老两口讲过。而我却误以为他和捣乱分子混在一起。



篇稿子。稿子写得很好，但是太文绉绉，在这种场合不大吃得开。四面八方都有人打断他的话，尤其是楼上包厢角落里的一小批人。我接着他讲话，仍然有人打断我。幸而我驳斥了《狙击手报》，甚至指摘我的朋友 G. 奥尔特曼犯了中立主义。我责备他们不肯表明立场，固执地拒绝抉择，而共产党却旗帜鲜明，遵从他们“非友即敌”的原则。《狙击手报》在当时正充当《人道报》的理想靶子。我便转身向插话的人说：“我还以为指摘《狙击手报》可以博得你们的宽恕。”一句话掀起哄堂大笑。随后，整个会场都平静下来。我自以为用了一句豪言壮语来结束我的发言。我说：“戴高乐主义的奋斗，也就是法国的奋斗。”据统计，后来两个发言人——雅克·苏斯戴尔和安德烈·马尔罗所获得的掌声次数都没有超过我。

我定期参加每周举行一次的学习委员会。我在会上遇见了加斯东·帕列维斯基、阿尔宾·沙朗东、乔治·蓬皮杜。蓬皮杜的坦率、善良和无私深深打动了我。<sup>①</sup>我跟沙朗东很谈得来（至少我这样想），他不无遗憾地提到，由于机缘不凑巧，没能进入高师。关于学习委员会的工作，我没有留下记载，但凭记忆所及，学习委员会主要研究的是时事问题，讨论还没完，所讨论的事已经是明日黄花。

310

将军指定我参加全国理事会。其成员只开过几次会。每次开会，将军都来分析国内和国际局势，十分出色。有一次在万

---

① 根据蓬皮杜的回忆录，我弄错了他对我的想法。他怪我预测失误，大概是有关 1948~1949 年克耶（Queuille）政府稳定经济方面的成就。我跟帕列维斯基打的赌却打赢了。我说将军上台既不会在 1950 年元旦，也不会 1951 年元旦。苏斯戴尔不相信党派联合选举，我的看法跟他相反，但没能说服他。

森区议政厅开会，这是在1952年发生的第一次分裂。国民议会的人民联盟党团中的一部分人违反将军的意志，投票赞成安托万·比内。其实，不管怎么样，问题已经在1951年选举后有了定夺。因为从原则上便反对的只有共产党和戴高乐派，构不成多数。由于这两个反对派的威胁，第四共和国的各党各派不得不联合起来，拯救了共和国。

比较稀罕的是我在1949年奉命为人民联盟在里尔市举行的全国会议草拟了一份报告，讨论“协作”问题。当时是将军这样说的，后来才叫作“参与制”。将军真诚地相信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在野蛮竞争的丛林法则与章鱼式的官僚制度之间，在生产资料个人所有与企业国有化之间，可以找出一种中间模式，消除阶级斗争，而不需要给整个社会戴上一具国家至上的刑枷。他深知这条中间路线的头衔、用意和目的，但不知如何下手。我却尽我所能使“协作”思想具体化，并指出各种可能的方向：参加管理或分摊利润。30年前已经有过尝试，但不如今天，成就有大有小，诸如工人参与劳动的组织工作、工会参与企业管理和雇员参与分红等。

我尽力而为，但没能使同伴们觉得我的信念和他们的一样强。我的悲观多疑受到指摘，但指摘未必得当。到底什么叫作“相信协作”？“协作”是不是一种学说，能与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并驾齐驱？是逐步改革，还是定出制度？如果协作能与社会主义争胜，我就不能算作协作的信徒。戴高乐派执政11年，只让议会投票通过了至多不过几条法律，提倡这种或那种参与方式，而且还都是我们在人民联盟时代所考虑过的那几种。

然而，我在两点上应该让人责备我悲观多疑。在过去与现在的法国，改革企业这一最优的生产单位往往撞上两种阻力、

两种势力：一方面是工会，特别是与共产党联盟的职工组织，另一方面是资本家。前者不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息阶级斗争，后者则怀着戒心，不愿自上而下由官方强迫推行改革。我并不反对国家提倡，但不放心那些条条款款不经当事人同意便普遍实施于一切企业。

我的第二项保留意见则来自对当时法国经济正在经历的阶段的理解。时当1940年代末期，好多经济学家对那些该诅咒的年代心有余悸，唯恐法国经济再次衰落。可我却不一样，比较倾向乐观。尽管通货膨胀，政府不稳，马歇尔计划推动的基本建设却蒸蒸日上。可是，经济重建——也许已经可以称为经济增长——需要高投资率，也就是说需要企业的利润用于再投资的比率很高。雇员参与分红可能会减少再投资，同时也使利润受益者灰心失望。

那时候谁也不知道15年后一个名叫鲁瓦硕（M. Loichot）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校友将要传播的学说：用来再投资的利润，应该公平对待产权与雇员，一并计入资本。如果每年的在投基金构成资本增长，这些资本要分归雇员，那么若干年后，雇员便自动成为本企业的业主。有人对我说，戴高乐将军十分高兴地说：“这就是我多年来所追求的参与制！” 312

我的朋友路易·瓦隆也十分为之倾倒，并叫我想起了莱昂·布伦什维格最爱说的笑话：“在阿隆家族中，有两个杰出的哲学家和两个网球高手，但他们只是三个人。我有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的朋友从来都不曾找到答案。”在一个现代化企业里，资本的价值表现为股票的行情，首先要看生产的能力和 sales 销售获利的能力。还可以说，企业是生产最大值或增值——销售总额与投入总额之差——的机器。年度再投资不会自动增加最

大值。除掉折旧费，再投资用来更新设备，并不自动保证增加资本的价值。只有综合理工学院的高才生才会出于信仰，认为利润再投资的价值会同样带来资本价值的增加。

现在再来说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拉巴特与戴高乐将军的关系破裂以前，将军曾两次邀我吃饭。头一次，我记住了两件事：他称赞我在《自由法兰西》上写的文章。他夸奖我的话也许有人会说是普普通通的，但里面既有客气话，也有认真严肃的东西，这是他对周围人的特点，他对任何来客都是如此。席间，他即兴分析了法国的敌占制度，分析得十分精彩。他说，德军想依照国际法，用传统方式占领法国，但是盖世太保偏用酷刑，另外还有像阿贝茨<sup>①</sup>那样或真或假赞成法德合作的人。这三种人一道决定了法国人的处境。而随着抵抗运动的发展，盖世太保的势力必然会越来越大。

在这次饭局中，也许是另一次，我们还谈到了维希政府。他说维希政府当时有所保留，不愿彻底合作，并且尽量改善居民的物质条件，而不给敌人以政治上的好处，否则就会激起华盛顿方面的强烈反对。我含糊其辞地说，贝当元帅和他的顾问  
313 参谋在他们的处境中没有其他办法。将军听出了我的话中之话，并且让我懂得，他不同意这种解释，或者说这种宽恕的想法。这天晚上，或者是另外一次，他分析了局势，仿佛顺便说了一句：维希的人终将在合作的道路上走到头。我根据常理提出反对：海军舰队和北非乃是世界政治中的一笔赌注，也是维希手中最后的王牌、最强的借口。失掉了它，元帅便只好束手听命于占领军了。他自己何苦要干这样的蠢事呢？显然，哪怕

---

① Otto Abetz，德国驻维希政府的大使。——译者注

是在非正式的谈话中，戴高乐将军也十分憎恶维希玩的那套把戏，仿佛他宁愿局面黑白分明。

又有一次，正是美国国务院发表那个大名鼎鼎的公报说什么“所谓的自由法国人”那天晚上，我们集会庆贺海军上将米瑟利耶率领舰队解放了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群岛，将军在客厅里怒气冲冲地来回踱步，嘴里一再说：“好哇，我们这些盟友！”他是法国的化身，而这样称呼美国自然而然把自己提高到了天下第一强国的行列。他这样自言自语，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人民联盟年代，我见过将军好几次，即使我能够追述这几次接触，也并不能够为关于他的传说增添什么东西，他在传说中早已是一个“历史英雄”了。1950年年底，我们夫妻俩正遭受丧女之痛：我们的幼女不幸死去。她是在1944年出生于伦敦的。我们接到将军寄来的一封悼唁信，措辞和口气远远超过一般的慰问。我马上请他接见，而过了几天，在谒见时，他对我讲起他的女儿安娜，说“孩子发育不正常”。他谈吐含蓄，仿佛不好意思表现出自己为孩子而伤心激动，同时又让人感受到他的感情，或者不如说他的脆弱。他并不怎样安慰我，但他在诉说自己的不幸时，对我更加感同身受了。

就在同一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跟他长谈了一次国内形势和世界形势。我在谈话中问他：“您打算怎么办？”他回答说：“我能怎么办呢？我手下没有亲兵，就算有，要派用场，你也不会跟着我干的。”接着，他便议论第八军匆匆忙忙从朝鲜退到三八线一事，同时回想起艾森豪威尔将军曾下令退兵，如果这个撤退令当真执行下去的话，这几乎会断送斯特拉斯堡，使得它听凭纳粹分子血腥报复。他说，美国人有这么

一种倾向：保留超出必要的距离。

这些细节的意义有限，但多少能说明在人民联盟期间我和将军本人的关系如何。1951年，我曾考虑参加人民联盟在巴黎的竞选。马尔罗在领导机关提出这个问题时，最重要的位置的人选早已内定。将军做了解释——他的理由是完全对的——说我从来没有向他表示我的意图。其实，与其说意图，还不如说犹豫。职业记者兼任不定期的教学工作，这种生活已使我感到厌倦。有时候倒觉得政治活动是条出路。但在逐鹿场中犹豫不决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就要，不要就不要。夜长梦多，梦却更长。幸而，不用多久，我连梦也不做了。

不是我脱离人民联盟，而是人民联盟自己不存在了。我对它贡献多而收益少，却也足以自慰。1953年，我在上马恩省度假，离将军寓居的科隆贝双教堂村不远。我去将军私邸按了门铃，将军不在，我便留下了名片和住址，过了几天就接到他的请帖。我们夫妻俩居然有缘拜谒将军私邸，并且看到了那里的仪注习尚：用过了茶点，将军便把我带进书房，念了一段《回忆录》——那一段描绘了贝当元帅——然后我们到园中漫步。他提起一次演讲会，是他主持的，我在会上发了言。演讲会是谁组织的，我记不清，只记得将军在我发言之后讲的话。我谈了法国的经济情况，提出了相当平凡的想法。我说，法国人时不时来一场革命，可从来不会改革。将军很中肯地修正了我的说法，他说：“法国人只是在一次革命时机到来时进行一些改革。”于是，他叙述了解放后完成的各项改革。

315 我在1959年《论证》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别了，戴高乐主义》。后来有人告诉我，将军曾对马尔罗说：“他从来不是什么戴高乐主义者。”他说得有理。我从来没有

像马尔罗那样与他维持一种君臣关系，也不像莫里斯·舒曼，尽管他在人民联盟年代并没有追随过将军。我和将军的关系一向暧昧不明，在人民联盟年代也是如此。动机如何？可说是既幽且深。

将军在《回忆录》中吹嘘自己毫不妥协，直至跟维希宣战，与盟国也弄到剑拔弩张的境地。他靠丘吉尔的支持取得英、美同意，在德国弄到一个占领区。而斯大林却认为法国不配。可他，一回法国便向斯大林大献殷勤。维希政府嗾使法国舆论反对盟国，他也用他的方式，嗾使战友反对英美。除去人民联盟那一时期，他从未终止与英美进行外交战。不错，他是捍卫了法国的利益，但在北非登陆时，他指摘英美没有让自由法国的队伍参加，那他捍卫的就不是法国的利益，而是他个人的正统了。在叙利亚事件中取得的经验证明，维希的军队宁可投奔盟军，也不愿投奔戴高乐。

我访问将军私邸，是最后一次和他谈话。直到1958年，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和他毫无接触，连信都没有通过。也许我逐渐疏远马尔罗，不知不觉影响了我对将军的态度。也许是人民联盟寿终正寝，我想从挤进去的党派政治中脱出身来。1955年，我重返大学任教，而第四共和国在最后几年，正受着非殖民化的冲击。在戴高乐派中跟我最亲近的，除了马尔罗，只有米歇尔·德勃雷。他不仅反对第四共和国，而且为法国保有阿尔及利亚作为殖民地发动了过于激烈的论战。1957年，我表明立场，拥护阿尔及利亚独立，而绝大部分戴高乐派分子主张法国维持在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我固然没有把戴高乐和他的追 316  
随者等同起来，但也不敢求他接见。

我的一些最知心的朋友宁可忘掉我加入人民联盟的那几个

年头，认为除开这一段曲折，我的经历是一条直线。另外一些朋友则很想忘掉我对1968年5月事件的态度。就这两件事来讲，我却不甘心认错，至少应该让我辩解一番。

将军创建法兰西人民联盟是错误的吗？他回到法国便碰上他在抗抗运动时期帮助重新建立起来的党派。第一次选举便标示出向左转的势头。这是一场战争以后的规律。共产党和社会党都反对将军的制宪思想，尽管后者是经过一番犹豫的。为他自己，同时也为法国，他要一位强有力的总统作为共和国的柱石。如果他肯当内阁总理，也许会把国家治理下来。然而，尽管他完全能够在议会斗争中战胜一切对手，却一分钟也没有考虑过玩玩这一套把戏，尝尝党派政治的毒药和甜头。他是法国的化身，绝不肯贬低身份，当一名党魁，浪费人民对他的信任这一笔莫大的资本。

他虽然在1946年辞职，但心里从没有向政治告别，也从没有认输。他以为各党派绝没有能力治理国家。它们彼此之间争吵得瘫痪不灵，终将请他出山，正如在1926年它们向庞加莱求救，在1934年向加斯东·杜梅格求救。这种盘算不久便为事实所推翻了。然而，将军精通战略，一向在炭盆上准备着两块烙铁。他自动引退，摆脱了党派之争而成为国民的靠山。他保持了自己的正统地位。他归隐不等于遭受遗弃。那么，他又该怎么办呢？他春秋鼎盛，年方五十有五，就将索居孤村，只写写《回忆录》，不参加任何活动了吗？还是以元老自居，口笔齐用，向当局不断提供高见呢？他就不该想想自己，考虑考虑自己的出路吗？他住在科隆贝双教堂村，心里却急得好似一匹千里骏马只想咬断嘴里的嚼子。既然各党派顽固地不肯登门敦请，他便只好移樽就教。当然不是出来纠正它们的不足之



处，而是加重它们的病情，加快第四共和国本来就不可避免的断气身亡。

他一上擂台，便成了一党之魁，跟勃鲁姆、莫里斯·多列士、乔治·皮杜尔之流半斤八两，有可能失掉自己真命天子的神光。他不是不知道这种危险性，所以把自己的党叫作人民联盟，以修改宪法为国民交给自己的使命。他如果继续执政而不下野，这一场斗争也许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宪法草案第一稿没等将军出面便遭否决。第二稿则不顾解放者的反对，居然通过，不过是以十分微弱的多数。其实构成多数的是故意弃权和反对的票。将军创建人民联盟的时候，内忧外患，不谋旦夕。在国内，共产党与其他党派剑拔弩张，在国外，苏联与西方世界的矛盾一触即发。 317

1948年，戴高乐将军果真创造出条件，迫使各党各派屈从于他，同意改制，这是否算自己背叛自己呢？10年以后，他的际遇让他得以“为所欲为”，我却非常看不顺眼。在1947年，既没有什么谋反的阴谋，也没有什么火箭炮，人民联盟批判的宪法，根本没有人为之辩护。至于议会搞的把戏更是有辱国体，而人民联盟的目标却很明确，无非是想在国民议会中掌握足够的议席，以便迫使各党派妥协让步，达成协议。这种做法不至于使共和国蒙耻含垢，像1958年那样弄得国民议会向叛军和贵族军屈膝投降。

至于我，甚至在1930年代，便一向主张自由政体，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右派闹革命。但是，我和任何爱国者一样，痛心疾首于共和国的没落，以及祖国经历的那些该死的岁月。我参加过一次冷处理的修正运动，并不算违背自己一贯的主张，而面临热处理的修正运动，我便既不能参加，也不能反

对。那些捧将军上台的人，大多数都坚持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因而把我排除在外，因为我一向主张阿尔及利亚有权独立自主。不错，有人告诉我，将军在私下谈话时，说我是对的，而苏斯戴尔是不对的。但在这时候，我搞政治活动的念头已经烟消云散，一去不返。归根结底，我对当过人民联盟的活动分子一事并不感到惭愧，但这也不足以引以为豪。

从1948年到1952年，我当人民联盟的活动分子，同时也为欧洲共同体的团结奔走呼号。公共集会、座谈会、学术讨论会，蝉联不绝，不可胜数。冷战年头是这样，之后几年也是这样，我对这些都记忆犹新。

在这些既当记者又当政治活动家的年代，我有幸走出法国国界，不仅屡次访问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而且几度横渡大西洋，还到日本和印度逗留过几个星期。不管怎样，反正我是个专栏作家，或者可以说是一名足不出户的评论家。

老实说，我觉得这种准政治活动相当有意思，有时候又觉得无聊。也许今天比在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更加觉得无聊一些。在战后几年，一直到斯大林逝世，我们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战斗，其成败关系到人的心灵和思想。

今天，这类活动叫我想起“争取文化自由大会”，我既没法不追想它的作用和影响，也没法不提到它的丑史。我们认为，大会是由美国基金提供津贴的。《纽约时报》调查中央情报局，在报道中提到这个大名鼎鼎的情报局花钱搞的组织，并且说不是就此一家。基金不过是一种外衣。于是，我便脱离了这个大会。后来大会改了名，又由福特基金维持了几年。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问题。丹尼·德·鲁格蒙、马奈·施佩

尔伯、皮埃尔·埃玛纽埃尔和其他许多人，凡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在大会的范围内搞过工作的人，都有这样两个问题：我们应不应该知道，至少应不应该猜想到？假如知道钱的来源，我们会不会完全拒绝合作？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我们实在过于缺乏好奇心。许多迹象都应该唤起我们的警惕，但是基金资助是说得通的。无论如何，我参加座谈会也罢，为《论证》写文章也罢，都是想什么写什么，反正没有拿过大会的钱。大会只给了我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在当时，这些意见需要有人来表达和辩护。

319

第二个问题是：倘若我们知道，还会不会拿中央情报局的钱？大概不会，尽管说到头，不拿是不合情理的。我在《论证》里写过不少文章；我和在其他刊物上也一样，任意表达自己的看法。大会还在英国发行一份期刊，名叫《对垒》，此乃最好的英文月刊。前者和后者如果都像美国特务的喉舌，那就肯定不会吃得开。大会若要完成它的使命，便只好乔装打扮，或者用避而不谈的手段来骗人。可是，大会确实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一想起大会，便想到骗人。尽管我还情愿回想罗德斯的研讨会、莱茵费尔德的研讨会，以及很久以后大会改了名称、不再拿中央情报局的津贴后在威尼斯召开的研讨会。<sup>①</sup>

在今天看起来很古怪的是，凡是跟大会没有接触过的知识分子，提起大会来都没有什么敌意，有时候还公开赞成它，用它作为借口来反对类似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新近由《评

---

① 后面两次座谈会都发表过文件。最后一次文件题为《人类学与未来学之间的历史》，跟政治问题全不相干。

论》的总编辑诺曼·波道的夫人密奇·代克特创办的。我尽管有点犹豫不决，可仍然答应担任这个组织（“自由世界委员会”）的名誉主席。<sup>①</sup> 这个委员会完全是在另外一种背景下诞生的。大会 1950 年在柏林诞生时，正需要动员知识界而不是用武力来抵制苏联。到了 1982 年，至少在法国，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中最著名的人士都不会再受苏维埃主义的诱惑，也不会受 30 年前、20 年前甚至 10 年前同路人的进步主义的诱惑。当然，马克思主义或泛泛的马克思世界观仍然在法国影响着——二级教师中的大多数人，大学助教中多数最活跃的人还没有放弃多少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信念。凡是经历过战后 20 年的人，都能衡量出发展中的差距。

让别人去为大会做总结吧。我并不后悔曾经参加过这个组织，因为它曾对欧洲知识界起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就我来说，我尤其记得几个人物。迈克尔·乔塞尔森 (Michaël Josselson)，原籍爱沙尼亚，既是大会的创始人，也是中央情报局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介绍人。我们可以说他欺骗了我们，但是，如果向他追根问底，他也许会向我们承认这一点。不过，他很可能会补充一句：不然，怎么办？我至今仍然对他怀有敬意。他这么做是出于信念，也以此为生，但凭他出众的智慧，干别的也行。他胜过一个间谍，有别于一个间谍。从活动能力上讲，他是一个有天赋的知识分子，他肩上负有双重责任，一是把大会办好，二是搞他的原始骗局。他引退后写过一本书，讲一个帝俄将军，名叫巴克莱德托利，在侵俄战争中与拿破仑进行过较量。他长年患心脏病，已于几年前去世。

---

① 现在我后悔了。

我在大会的活动中屡次遇见乔治·凯南，我将在另外一章里叙述我和他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年度讲座结束后的一段对话。1950年，我在普林斯顿头一次碰见他，和他一道参加关于法国的座谈会，该会的发起人是米得·厄尔（Meade Earle）。我们俩的私交良好而不深。如果我没有弄错，他看重我思想活跃，爱争辩，善于鼓励来自天涯海角的人彼此交谈。我在莱茵费尔德和他相处过短短几天，十分欣赏他的彬彬有礼，学问渊博，且全无虚骄之气。他为人含蓄，几乎近似冷漠，道学却不浅薄，与出众者为伍而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对于美国的感情日趋淡薄，因为美国民众主义日益发展。他署名某某先生的文章，联系到他今天的立场，恐怕和他与祖国日见疏远有关。他在《外交》季刊上的文章对美国的外交影响久远，打下了“遏制论”的基础。之后，他不断追悔他一鸣惊人的时刻，一直为他所起的历史性作用自怨自艾。我在1978年写了一篇文章<sup>①</sup>，答复思想转变后的乔治·凯南，但至今没有机会和他当面探讨。

321

罗伯特·奥本海默也参加一些集会，如1960年纪念大会成立10周年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他明净的蓝眼睛与他神经质的动作和谈吐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内心烈焰燃烧，心灵交战，往往把平生任何片段不仅看得十分认真，而且当作悲剧。我记得，在他的屋子里我和他们夫妇俩一道进行的最后几次谈话中，我觉得他坐立不安，他还对谈话的平淡无奇感到抱歉。我跟他也超越不过初交的圈子。他和凯南相反，他给人的距离感不在于要求严格，而在于他明显的内心撕裂。他发明了原子

---

① 文章发表在1978年夏天第2期《评论》杂志上。

弹，反对制造氢弹，受了过去和不慎的累，精神上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哪怕不像他活剥了皮那样敏感的人也难以忍受。

有赖大会的机缘，我结识了好些大知识分子，最可敬仰和爱慕的要算迈克尔·波兰尼 (Michael Polanyi)。他的经历不同凡响。他出身“硬”科学，是最高等级的物理化学家，目标是诺贝尔奖，而他却突然改行，请准大学让他教哲学。人世最需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明智。与其不断积聚知识，不如认识自己。他写了许多书，讨论经济和科研的自由。作品中光辉而伟大的要数《个人的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该书虽为少数人所赞赏，而绝大多数人却视而不见，满不在乎。他的认识论暗藏着一种哲学，甚至还有一个宗教性质的结论，这种认识论处于当时所有英美学派的边缘，不论是逻辑学派还是分析学派。他想象现实的不同水平，他的反还原论，他在接受真理中给予个人选择的意义，都在字里行间把读者引向一种信仰——信仰精神，也许是信仰神圣的精神。我曾经听见以赛亚·伯林

322 揶揄波兰尼的经历说：真古怪，这些匈牙利人！一个大学者，放弃诺贝尔奖，而去搞一门蹩脚的哲学。到底蹩脚不蹩脚，尚待考证，哪怕是真蹩脚，贝林的话也忽视了也许是最主要的东西：人的纬度。

波兰尼放弃科学研究，为的是求道、得道、造福于人。他觉得为人己，捍卫学者和普通人的自由，胜过取得一项科学发明。反正他不搞，迟早总会有人搞出来。他自身的成就不靠任何专家认可，不管是化学家还是哲学家。他靠意识和内心呼声的认可。所以跟他打交道，既叫人心平气和，也叫人觉得充实和丰富。这正是我们在他身上觉察到的精神存在。当然，他为人和蔼可亲，时时刻刻都不失态，其他高明人物也有这种品

质，而他却别有天地。他的和蔼可亲，不是泛泛地对待随便什么人，而是只要对待某一个人，这个人就会感觉遇到了知己。我们俩谈心的次数比较多，交情见深。在庆贺他七十寿辰的文集中，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马克斯·韦伯和迈克尔·波兰尼》。大概他喜欢这篇文章，特地写信道谢。这封信我还珍藏在家。我们在牛津大学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那是在我接受名誉博士的第二天。我拿到了证书便即席发言，根本没有讲稿，而且讲的是英语，讲得十分蹩脚。波兰尼夫人聪明贤惠，他俩真是天生一对。她夸奖我的演讲，而她的丈夫却默不作声。真情实意不容许凑合，尤其对朋友不能凑合。他告诉我，世人应该寻找什么，哪怕找不到也要找。我以为他说了：上帝。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写过上帝这个词。

在一本谈论共产主义同路人的书中，一个英国作家<sup>①</sup>就“争取文化自由大会”同法共创建和操纵的知识分子组织做了比较。双方都由声名显赫的人物出面主持，一个是卡尔·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另一个是约里奥·居里，或者说，战前，一方是安德烈·纪德，有担当的作家和学者，另一方是党的活动家。形式上的类似掩盖了根本性的差别。我们在大会上从不系统地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或美国社会辩护。1955年在米兰，两种意见在我们中间交锋。一种意见强调并且差不多要热烈赞赏苏联的经济成就，而另一种意见则怀疑那种趾高气扬的统计数字。我们在《论证》杂志上写文章，也在别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我们确实有某些共同点，即拒绝共产主义。但这是个多元的反共，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也有保守派，各趋极

---

① 大卫·柯德（David Cauter），《共产主义同路人》的作者。

端。这就跟知识分子的亲苏组织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通过一种假意的反对，亲苏知识分子注定得粉饰真相。

现在再来谈谈我在《费加罗报》当记者的一些活动。同美国的专栏作家<sup>①</sup>比起来，我的旅行机会比较少，即便在当职业记者的10年中也是如此。我有一次提出这种情况，皮埃尔·布里松便叫我去到现场去采访了一天的旧金山会议。那是在1951年，讨论对日和约。这场所谓的外交折冲作何下场，谁也不会怀疑。到会各国，除了苏联的卫星国，当时无不唯美国马首是瞻。苏联代表也不存任何幻想。美国报纸用头版整整六栏，横标出：“100:3”。记者们互相询问，苏联人为什么要到这儿来讨败仗吃？我半开玩笑地对《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说：“因为他们没有忘记列宁在《共产主义幼稚病》中的教导。”那名记者连笑都不笑，问道：在华盛顿，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本宝贵的书？

324 我很体面地通过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现场报道考验，还算不错。主要的困难是我不太会打字。我的朋友尼古拉·沙德兰，常驻华盛顿的记者，一贯助人为乐，主动帮了我一把。说实话，三天的会议给我的感受，还不及我从旧金山飞往达拉斯途中所得印象之深。部分法国代表团飞回华盛顿，中途横遭风暴，整整几个小时，乘客都成了失魂落魄的残渣，难受得连害怕都顾不上。只有德·波旁·布赛一对伉俪，紧紧抱在一起，经受住了颠簸摇荡。飞机像洪波一叶，奇迹般坚持在天上。

前一年，1950年10月到11月，我生平头一次踏上新大

---

<sup>①</sup> 李普曼除外。



陆，我的身份是双重的，既是新闻记者，又是大学教授。邀请我的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由 J. R. 奥本海默领导，我的访问为期几个星期）。皮埃尔·布里松劝我别离开报社那么久，时间短一些，由报社出钱。我同意了，在普林斯顿只待了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华盛顿。我先在詹姆斯·伯纳姆家下榻，他是《管理革命》一书的作者。我后来又住在中学同学雷奥纳尔·李斯特家，他在世界银行工作。

我借这个机会结识了好些记者，如沃尔特·李普曼、约瑟夫·阿尔索普等人。我大大地长了见识吗？不大好回答。华盛顿真是个怪地方，我居然和它混熟了一些。这地方几乎完全沉湎在政治里面，传说和谣言无时无刻不在耳际嗡嗡。从总统到最普通的新闻记者（尼克松不是被两名年轻的采访记者打倒的吗？）成万人在东寻西觅，玩弄手段，交头接耳，钻空觅缝，打听参议员和远方君主的命运。这个乡土气的城市，从此与世界各地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对和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的谈话的印象最深。时当 1950 年年初，关于“结束战争的攻势”<sup>①</sup>的噩耗开始如雪片飞来。国务卿对我说，他本人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不赞成麦克阿瑟的决定。但他又说，我们毫无办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乃是美国的传统（可是，他却不提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于仁川登陆也毫不赞成）。他并不怀疑，美国出兵朝鲜毕竟保全了美国的联盟体系。如果听任金日成的战车踏平韩国，那么谁还能相信美国的诺言呢？除此以外，他只好等着第八军打了败仗后撤退。

325

---

① 口号来自麦克阿瑟，意思是说，以攻势获得最后的胜利。

1953年，我去日本、香港、印度、印度支那的旅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教育了我。这是破天荒头一次，我不靠书本，直接去考察与我们不同的文化，而其差别之大，远远超过法国文化与德国文化之间的差别。我在法兰西学院开课的第一讲曾举纳粹为例，说它是“另类”文化，治愈了我们幼稚的人类中心论。我说错了。纳粹不是另类文化，而是我们的文化害了病。在东京，在加尔各答，在新德里，这里是字体，那里是服装，都让我一眼便看出是外国。还有不止一次触动我，而且叫我不舒服的是，薄薄的一层西方表皮有可能把真正的现实掩盖起来，给我们造成错觉。

“争取文化自由大会”在日本有分会。在东京的会员们通常都讲西方语言，讨论政治都用美国词汇。我和日本大学生通常谈论民主和民主所必要的条件。日本首相吉田茂接见了我们，我们的谈话时间相当长。他很有风度地跟我讲，传统的等级、安全意识以及前辈给后辈的教导是多么符合民主的真谛。他用新的字眼翻译日本的传统准则。在印度，最叫我不舒服的是，在一个什么“圣者”的嘴里听到关于“美帝国主义”的陈词滥调。在新德里，我认识了法国大使奥斯特洛劳格伯爵。我对他马上产生敬爱之情。他原籍波兰，人品高尚。我和尼赫鲁谈了半个小时，毫无所得，尽管我跟任何人一样，为他的人品所打动。历史给了他出类拔萃的命运。

在日本，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在不同领域代表着西方。1953年，美国一般占有统治地位。不过，法国文学也许最为人所熟悉，胜过其他国家的文学。有时候，在大学校园里，我用德语和一个现象学或海德格尔学派的哲学家谈话。可是在印度，西方就是英国或美国。我没法不佩服日本人，他们从根

上保住了日本文化，在家庭里，在举止上，在信仰上，都是如此。日本人抱着雄心壮志，而黩武梦早已破碎，他们不得不采用现代的技术和经济，却又绝不松懈继承自己固有的文化。既然不想再用武力争取首席，那就在和平技艺中卓然自立。

我和日本的知识分子交谈，不觉得陌生。当时，他们对于美国优越论的反应使我产生一种感觉，仿佛那些反应都是我见过的和听过的。美国人相互之间关系比较松散，而在永恒的日本则恰恰相反，这里人与人的关系差不多是礼节性的。当然，日本儿童在很多方面上，行为举止就像美国孩子，他们喜欢打垒球。可是，我后来再去，便觉得传统的东西逐渐在压倒外来的影响，而我心里不能不盘算，日本大学生造反到底是为了什么。1960年代，日本大学生闹事闹得特别凶猛。

至少在这一时期，在印度，赤贫的人群、苦难的惨状向刚到的旅客迎面扑来。我从香港到加尔各答，行装甫卸便在心中思忖，这里的特权分子怎能对别人的苦难习以为常。夜里，赤裸的身体横陈于街道之上；几十万男女老少挤在贫民区里，他们一无所有。我自己过了几天，也就见怪不怪了。只在偶然发生的一事中，我才发现了于我而言意想不到的乞丐们的规矩。我走出一座庙的山门，给了一个孩子几文钱，说时迟那时快，一群年轻的印度人马上号叫着把我围住，索取我该给他们的钱。倘若我一毛不拔，谁也没有意见；但只要给了一个人，其余的人便觉得有权索取人人有份的东西。跟我一起游庙的人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们向我解释这一现象，引用了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实在跟印度的现实格格不入，也跟他们自己的行为大相径庭，尽管他们的行径是社会强加于他们，而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我在日本逗留期间，所见所闻，没有不是以往从书本里知道的。无论是和人交谈，欣赏风光景色，参观名胜古迹，还是和人群接触，加上自己的旧知新识，都使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仿佛这些都是本来就熟悉的。我们原来知道的东西，现在仍然知道，可是方式不一样了。我们不想再像孟德斯鸠那样发问：“怎么能成为一个波斯人？”一个拉丁学家，为了回到纪元初年帝国时代的罗马去生活，哪怕只活一天，他有什么代价不肯付出呢？

除了常去美国，我历次的出外旅行，是否对我这个“不出门而能知天下事”的人大有裨益呢？我可不敢那么肯定。基本上，我手里的消息跟读者们掌握的没有两样，一概来自新闻社的电报。所以，一切要看怎样认识事件发生的环境及其来龙去脉。比方说，在1973年，埃及军队横渡苏伊士运河，《费加罗报》的几个同事居然中了以色列大使馆人员的毒。罗歇·马西普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圈套》，说是埃及人中了以色列人的巧计。第二天，我做了一件从来不做的事：我写了一篇社论，直接反驳马西普。我坚信，倒是以色列人被人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为什么呢？我知道，其实大家都该知道，巴列夫防线，守兵不过数百，而苏伊士河不难强渡。六百来名以色列国防军兵士，稀稀拉拉摆在几百公里的防线上，怎么能够抵挡一支大军渡河呢？至于消灭埃及人的桥头阵地，以色列还没有下令动员，又怎能马上办得到呢？以色列军队在平时人数不多（当时大约只有3万人），这些士兵分布在3条前线，绝不可能立刻采取行动对付主要的敌军，即埃及大军。我毕竟还是搞错了一部分。以色列人居然不等兵力集中，便向埃及部队的桥头堡派出一个机械化旅进行反扑，结果全旅覆没。那么我错在哪里呢？错就错在我没想到，以色列司令部竟能如此低估对方，铸此大错。

在另一次事件中，我闭户深思，倒比听华盛顿的谣言靠谱得多。报道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的电报一到，我就肯定杜鲁门和他的班子绝不能坐视韩国覆灭。韩国不仅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成立的，而且还有美军驻在那里。那时候，在法国和欧洲，谁管他什么朝鲜呢？而朝鲜的举动等于向美利坚共和国挑衅。如何对待挑战，势将决定全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帝国挑不挑这副担子？我对此并不怀疑。我不仅表达了这种意见，而且在6月27日《实力较量》一文中<sup>①</sup>表示赞成。而让-雅克·赛尔旺-施莱贝尔（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却从华盛顿发电报给《世界报》说：“美国不会跟朝鲜打起来，正如美国轰炸机被击落在波罗的海后双方也没有打起来……”我的文章则有根有据地强调美国对韩国做出的诺言。我说：“……韩国的安全与繁荣乃是亚洲各国人民的信心的最良好的基础。”（见杜鲁门宣言）“……我希望，在这里逗留的日子能进一步证明朝鲜并没有遭受遗弃。”（杜勒斯在侵略前一个星期的声明）。让-雅克·赛尔旺-施莱贝尔认为，美国不进行军事干涉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他总结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全盘都得从头改订，并予以明确。”如果美国没有奔援韩国，那就得从头重新制定它的外交政策，让-雅克·赛尔旺-施莱贝尔的话也就说对了。正是美国实行的外交政策，让我有理由预料到杜鲁门果真做出的决定，而在美国当地观察此事的人，反而还在狐疑不定。

在近东，我也在两种情况下，有机会衡量推理论断所冒的风险和言而有中的机会。1956年春天，我第一次访问以色列，东道主是耶路撒冷大学。我发表演说，谈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

329

---

① 读者可以在下一章里看到这篇文章的一些选段。

危机。边界武装冲突日益频繁，阿拉伯游击队不断袭击，以色列军队则频频反击报复。人们有的在害怕，有的在希望，反正都在等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我却说，这些军事行动只消几天便将由大国出来制止。

问题马上就来了，阿克金教授问我，大国会留给交战双方多少日子，让他们停止交战，甚至强迫他们停战。我说最少三天，最多不过八九天。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固然改变了以阿战争的背景，但总的来说，大国的做法果然不出我的预料，特别是美国。这并没什么了不起，当时，在1956年，美国正控制着国际局势，可以使用自己的势力叫人干这样，不干那样，特别是美国在可能的范围内，反对和防止使用武力。

1966年，10年过去了，我又到了以色列，东道主是国防学院。这是军方办的，旨在补充培养军官的战略和政治才能。在我之前，去讲过课的有托马斯·谢林、亨利·基辛格和H.卡恩。我去时恰逢以色列建国纪念日，以色列每年都在建国纪念日举行阅兵仪式。之后，我同几个将军共进午餐，和魏茨曼将军搭上了话。他时任空军司令，一年后离开了部队。我把10年前在大学答复问题的经过告诉了他。他说：“您既然那样善于诊断，那就请您告诉我今后几年将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以常理而论，纳赛尔在没有大大地改变力量对比以前，不至于再发动一次战役。现在，埃及有一股兵力，陷在南也门的泥沼里。如果事态会按逻辑发展，那么以色列在今后几年中就不会遭到什么危险。”这位空军司令用英语回应道：“这样的话，我们将会过一段沉闷的生活。”现在，司令员已变为和平鸽，参加了和萨达特的谈判。下一个年头，“六日战争”发生了。纳赛尔居然没有照常理办事。他的

军事顾问隐瞒了埃及空军的脆弱，而他自己，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资本。就我而言，我也低估了像近东那种爆炸性的地方到底有多少发生意外事故的危险。

我还记得另一次错误，这次错误比上一次更难以饶恕。1962年，中国人跟印度人在喜马拉雅山边境发生军事冲突。我一时认为这绝不会扩大为一场真正的战事。两国动兵，既无好处，又没有必要的手段。不仅如此，我如果研究过中国的军事和外交传统，我就能够马上抓住冲突的实质，抓住中国以讨伐为“教训”的实质，那么我就不会猜测，战事不久后即将停止，也自然想象不到中国军队竟然长驱直入。<sup>①</sup>于是，我便下决心研究中国的外交和军事传统。

不用多说，在一家日报上分析内外政策，目的不在预测事态的演变，甚至短期的演变也不属分内之事。分析工作的任务在于把事态纳入较广较大的局面，然后加以理解。要搞清楚美国做出的一项决定，必须掌握华盛顿当局的想法，以及他们受到的种种拘束和压力。若要解释苏联干涉捷克这件事，就非得弄明白苏联的制度和世界观，以及克里姆林宫中人物的行动准则。尼采曾做预言：20世纪的大战将以不同哲学的交锋为借口，以统治世界为目的。半个世纪以来，这话在我们心目中已经得到了证实。世界政治的分析家，尤其是法国的政治家在1930年代犯了错误，正因为他们固执地把欧洲看作世界的中心，把第三帝国当作威廉帝国另一并无特色的模式。他们固执地不肯相信，苏联在本质上不同于沙俄。今天的新闻记者的新闻学校里学到的当记者的一些本领、窍门、技巧，都是只消实

<sup>①</sup> 见1962年11月21日《费加罗报》登载的文章。

践几个月，谁都能学会的。然而，这些学校教的都不是最要紧的东西，如各国人民的文化和历史，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美国宪法的职能。照黑格尔所说的，当代人以读报为早上的祈祷。而新闻记者则有沟通世界史的任务，尽管不敢以高水平自居。一个记者应该能够将一个事件置于全球大背景下，同时指出这一事件的含义及其作用。

戈洛·曼曾对我说——当时，我正于心有愧地沉湎在新闻事业中——马克斯·韦伯曾经训斥他的“教席教授”同事们，煞煞他们的傲气，提醒或教诲他们，说他们不见得都能够马上代替别人写社论，甚至代替不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评论员。大学教授作为大学教授蔑视作为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我看是没有道理的，甚至是可笑的。知识精深的学者不一定是通才。甚至职业经济学家也不见得用四张纸就能分析一种形势，得出一项论断。能其大者，不一定能其小者。当然，一份哲学教师资格考试的考卷所需要的文化素养，要比写一篇《世界报》或《费加罗报》的社论更多。但是，大学教师不一定写得出好社论。可是，一个中等水平的记者尽管昂然对教师做睥睨之色，他心里却仍然不免觉得和大学教师比起来，自己还是吃势利眼的亏。有一天，我对拉扎雷夫说，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太叫我恶心，我得回去重操旧业。他瞪着我，仿佛当我要去上吊，嘴里嘟囔说：“哟！可别呀！别来这一手呀！”

在战前，罗杰·马丁·杜加尔为了我好，对我暗示，我有搞政治新闻的必要本领。我也向他暗示，哲学比新闻有意思。他没有再说什么，但仍觉得教师名微利薄，不如到社会里去占另一种位置。他觉得这样对我好一些，对苏珊也好些。



不用说，我一旦到了这个位置，便和大家一样雄心勃勃——而我比别人更甚——要得高分。可是我在《战斗报》和《费加罗报》都未能摘下这个桂冠。因为理所当然——事实上也是如此——桂冠非阿尔贝·加缪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莫属。他们俩都文才出众，而我只能望洋兴叹。可是锦心绣口的文采与经济、外交的严格分析，却又有点格格不入。话虽如此，满足虚荣的机会倒不算少。我甚至可以说，这一行业的诱惑力一部分在于，一篇文章问世，夸奖往往超过其真实价值，而出一本书却是道路崎岖，强手四伏，数不胜数。

第四共和国的一个部长（贝歇）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对我说：“在我认识的人里面，就只你一个人纯粹靠笔头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是靠不住的、渺茫的、不好捉摸的。我和拉扎雷夫是朋友，尽管我俩的友情是断断续续的。他在1960年2月25日写给我一张小条子，上面说：

亲爱的雷蒙，我从不写信——这一恶习出于时间不够用——为一篇我欣赏的文章向作者“叫好”。不然，你写一篇文章，我就得给你写一封信。可是，今朝这篇文章，既叫人信服，又有益有用，完全合于我的预感，我也觉得实在是危机四伏。所以我忍不住要告诉你，钟要敲个不停。思想斗争是可以的，但还得是自由的，否则，正如我在电台上对阿德茹贝所说的，把“冷战”变成“冷和”，名变而实不变，徒然加深危险，因为“冷和”不如“冷战”那样叫人提心吊胆。幸而我们有一位雷蒙·阿隆先生。我是这么说，也是这么想的，拥抱你！

沃纳·鲍姆加特纳不止一次告诉我，他差不多每一次都猜得中我当周的经济文章会谈什么问题。他经常阅读这种文章，并且看中我的一些分析和警句，比方说：“苏维埃是电气化加上美国西部的小麦。”

333 这种浮光掠影的自我满足，不消几年便让我感到不安和酸辛。也许，从1947年进《费加罗报》到1977年离去，中间我有了些进步。也有可能，胸中的火焰逐渐灰冷，经验消磨了想象力。在我看来，毁掉记者行业的，是一鸣惊人容易，循序渐进很难，跟作家和学者不一样。当然，新闻记者也不能不自我更新，无论如何不能赶不上动态，不能死揪住过去的世界观。

我始终不怎么醉心于新闻，可新闻毕竟是记者的专长。我钦佩拉扎雷夫这个超群的鼓舞者，佩服他的才能与风度——这都是与我无缘的。如果不为耸人听闻，如果不急于比别人早几个小时采访到最新的消息，如果消息的确重要，推敲的时间总会有的。如不重要，又何必大惊小怪呢？何苦呢？

我是不是有点瞧不起职业记者呢？也许。可这肯定不对。为什么笼笼统统一股脑儿瞧不起这些男士和女士呢？我倒爱叫他们姑娘和小伙，因为在我看来，从行业的角度来看，他们显得那么年轻。在我常去的编辑部里，有人中我的意，也有人差一些，有人喜欢我，有人不喜欢我。我领导《费加罗报》小小的经济班子时，班子里的人倒不怎样嫌弃每周一次的碰头会。马西普主持外政栏，和我的班子每天都能发生摩擦，然而大家相处得很好，仿佛青天上竟没有一点儿云翳。在《费加罗报》报社里，我最不能容忍的是M. 加比利和J. 格利欧先生，我觉得，他们对我也无可指摘，除非责怪我为什么竟是这么一个人。

## 第十章 瓜分欧洲

第三帝国一投降，我就对欧洲局势有了总的看法，如果说 334  
还不能对全世界的话。我在《观点》杂志社对别人说，德国分裂将至少持续一代人的时间，听者都表示惊讶。20年后，我仍然爱跟人打这个赌。不仅如此，法国人在1870年和1945年所认识的德国危机已经属于过去。德帝国地处欧洲中心，强大而又为欧洲之冠，老觉得自己处于包围圈中，同时又威胁着东邻和西邻。这种威胁并非虚构。分开来对付，它完全可以压倒每一个邻邦。因此，法国便不得不缔结反制联盟，以取得对德的均势。可是由此而结成的法俄联盟，跟着与英国人、美国人以及俄国人结成的大同盟，像钢箍一样，紧紧箍住了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1945年以后，德国在东面割让了一块土地，并且部分人民被纳入苏维埃体制，其人力物力也就再也超不过东邻斯拉夫了。苏联控制了昔日德苏之间的所有缓冲国。德国已经不像在1940年那样能够压倒法国，甚至压倒英法联盟了。不仅如此，从此以后，美国加入了西方联盟。德国成了西方的尾闾，在新大陆的巨人面前已经不够分量。

就短期而言，至少20年左右，不管法国人愿不愿意，德国 335  
必然和法国一道属于西方民主阵营。法国人和德国人将不可避免地有着共同的命运。这将是理性与情感的交战。我在战争年代难道写过什么文章，可以说是反对德国人而不仅仅限于反对希特勒分子的吗？即使有也很少。我也许写过一些文章，事

后看来，不免无聊，说什么警惕先前的“德国祸患”。但是，一经解放，反正战争一结束，欧洲分裂，铁幕森严，波兰扩大到奥德-尼斯河一线，我便一下子摆脱干净了过去的陈旧观念。青年时代的梦想油然而生，法德两国又可以言归于好了。这是理智的狡黠又给了我们一次机会，可不能再坐失良机了。1946年，我首次重访德国，十分憎恶占领制度，对于“分区轰炸”感到愧悔。这是违反战争规则的，城郭为墟，一片焦土，居民家破人亡，于军事却全无补益。

1946年，我到法兰克福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周围瓦砾遍地，居民食不果腹。我在那里遇见汉斯·迈耶（Hans Mayer），他还没有投奔东部地区（几年前又碰见他，他已经重新回到西部地区）。最触目惊心的，是集中在我身上的仇恨目光。那是在火车站，我利用占领军的特权，越过德国人排的队，到售票处门前买票。几年以后，我在突尼斯也以同样的直觉，痛恨殖民制度，而这里的殖民制度还不算是最坏的。

从这个原始而又根本的分析出发，我一贯支持美国人和英国人采取的措施：先分两个占领区，再分三个占领区，然后化零为整，建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由其重整军备，享受平等权利。事态的发展，一如我所预料，一如我所愿。法国虽然抵制抗拒，毕竟影响甚微。然而，我也应该扪心自问，假定情况不是这样，我该不该去推波助澜？

336 请大家回想一下戴高乐将军在1945~1947年的观念。法国代表在柏林投票否决任何措施，只要其用意在于把四个占领区合并为一个总的行政机关，1947年公开宣布反对三国决定成立三国占领区，然后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这时节，将军对于恢复德国的想法，都拒之于千里之外。他向往一个各邦

联合的邦联。他紧紧抱住班维尔和莫拉斯的论点，而在我看来，在战后的形势下，这些论点说得再轻，也得说是搞错了时代。至少在表面上，将军讲的道理——仿佛德国依旧是潜在的捣乱分子——再明显不过。在无法预定的时期内，捣乱分子这个角色将由苏联去扮演了。

我在1947年11月12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听到戴高乐将军对德国问题的主张。这个招待会是为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的一次演说而召开的。现在摘录其中最关紧要的几个段落：

恢复欧洲经济，乃经世志士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经营起来的世界里，人人应能安居乐业，甚至享受世界和平。从这方面看，法国不能想象原来的德国竟不参加那必须倡建的经济协作。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法国从未怀仇记恨，想把德国人摈斥于欧洲经济之外。但这并不妨碍法国为己为人，绝不愿再看到德国重新成为威胁——尽管法国曾屡次遭其威胁，几近灭亡。德国人必须以参加人类复兴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参加欧洲共同努力的身份重获新生，而且永不振国力以致形成威胁。为使德国不再成为威胁，法国建议了一项切实可行并经受过历史考验、合乎事物本质的办法：德国不应重新成为帝国，也就是说成为力量集中的统一国家，否则，德国必然会使用一切手段进行扩张。我们不要德意志帝国。

将军考虑到两种可能性：一种是盟国达成协议重建一个德国，另一种是盟国达不成协议。但是，不管达成或达不成协议，

337 最高的原则仍然是绝对不能重建德意志帝国。“即便德国必须从此一分为二，西德也应以这种方式重新组建。”什么方式呢？“我们考虑的德国的前途，是由各邦组成德国，而不是德意志帝国。而且我们看不出各邦联合会有任何弊病。各邦的权利曾遭受帝国践踏，而今后各邦终于能享受各自的权利。联邦由‘盟国联合监督，免得再出毛病’。特别需要对鲁尔区进行监督，并按条件为其供应煤炭。这样的联邦完全可以体现出德国的未来。法国将能毫无困难地和各邦缔结经济条约：这是事物的本质。”条约到底是同各邦缔结，还是与联邦缔结？反正将军请法国不要“放弃自己手里掌握的质押”，换句话说，不要答应三个占领区合并，如果德意志帝国还有复活的可能的话。

将军的高见显然类似班维尔和法兰西行动派的主张，可是，“永无德意志帝国”这个观念本身便是暧昧不明的。既然德国各邦可以成立联邦，那么这个联邦和帝国又有什么不同？不错，“帝国”这个词有它的历史反响，如此而已。到了1946~1947年，联邦也罢，帝国也罢，反正成立一个德国就是了。

将军反对德意志帝国，非常认真。马尔罗也时不时对我说：“他们——第四共和国的人——要把什么都放弃了。”将军却绝不松口，1948年6月9日他发表的宣言就足以证明。宣言是对伦敦会议各项建议的答复，是对有关西方占领区的前途的建议，换言之，就是成立三国联合占领区，并于次年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将军预料到，俄国人也将以他们的方式建立德国。但是，他认为两个德国之间的争执对和平和法国都隐藏着致命

危机。<sup>①</sup>他说：“只有一个问题势将笼罩德国和欧洲，那就是：‘两个德帝国里面，到底由哪一个来实现统一？’因为人们已经做出结论，并且公开宣布‘统一是德国的前途’。”我们可以预料，在柏林与法兰克福之间将从此爆发怎样的国家主义的竞争，并将造成怎样的国际气氛。如果由于两个德帝国的争执而引起的德国人之间和列强之间的震荡还不至于很快导致战争，那么人们至少可以猜想出，两个德国阵营里面，谁在内部足够强硬、足够严厉，谁在国外得到足够强大的支持，从而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甚至可以想象，有朝一日，德国会再一次依靠普鲁士实现统一。可是这一次将是怎样一个普鲁士呢？一个极权的普鲁士，像中欧和波罗的海那些人民国家一样，跟苏俄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英美则疲于奔命，出于孤岛意识，或者幻想作祟，竟会把这种结局当作“绥靖”。

鲁尔区归了德国，赔款没有保障，军事占领的期限仅有泛泛的规定：“法国便将经常处于险境。”下文又说：“我们如临深渊。”宣言控诉完毕，便提出了目标：“不能再有德意志帝国！因为德意志帝国将自然而然成为德国称霸本能的动机和工具，尤其是这种本能会同其他企图结合起来。”将军再一次竭力强调德国的各邦，说：“各邦将有各自的制度、个性、主权，可以相互结成联邦，加入欧洲某一集团，只要能够从中得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和手段……”德国各邦的主权同联邦的概念，从词义上讲似乎是有抵触的。而将军的结论是：建议拒绝伦敦协议，重开谈判。

我既不同意控诉的状词，也不同意提出的建议，而坚信德

---

<sup>①</sup> 参见1948年6月9日宣言。

国分成苏联的德国和西方的德国势将成为长局。对一个肢解割裂的德国要求安全保证，在我看来是不现实的。对一个孤苦伶仃的西德这样做，则未免有点儿可笑。至于预测东德将不可避免地赢过西德，我在当时就不以为然，直到现在这预测已为国际事态所推翻。1958年，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才算英明地放弃了他那些跟不上时势的主张。

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国家根本法终于得到占领军当局的批准。戴高乐将军在他的演说和宣言中，依然坚持他的批评和意见。可是，这时候，关于大西洋同盟的争论已经压倒了对重建德意志帝国的议论。在美国，公认的政治评论泰斗沃尔特·李普曼揭露美国在欧洲推行的政策。他反对以假设为基础的政策。两个德国，一归苏联，一归西方，这不过是假想，德国人绝不肯让国土被劈成两半。李普曼做此论时，自信心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30年后，我重读沃尔特·李普曼在1914年春天写的文章，发现这文章倒可以作为教训：谁干那吃力不讨好的一行，非得谨慎小心。对时事做出反应，并在事态继续发展以前立刻指出其意义，真是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我摘录这些文章中的几段，它们既可以追溯当时的议论，又可以测定我当时的立场。1949年4月1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怀着知识分子的傲气教导人说：“在华盛顿达成的军事协议等于结束了军事占领：这一切都说明，自主政府和军事占领没法交融，如同水与油。只要西德继续被占领，我们便不必指望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能治理西德。我们必须预见到，如果我们没有能力依靠谈判解决终止占领的问题，那么我们业已授权德国的议会和政党组织政府就会与东德谈判，终止占领。” W.



李普曼说得还要严重一些：军事协议连一个临时的解决办法都算不上。

10天以后，W. 李普曼又以同样的语调断言：“我们宁可承认这样一桩根本性的事实：德国人不相信我们建立西德的主张。我们倘若把这样一个国家强加于他们，他们就会千方百计运用政府机器，摆脱我们的控制，而同东德和苏联政府一起按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获得四国的同意，解决德国问题，那么俄国人倒有另外一个办法，直接同德国人谈判来解决问题。”次月，W. 李普曼更加造次。不管思想大师怎样先知先觉，言必有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眼看着硬要诞生。评论家不动声色，居然想象出一些秘密的、未得到承认的原因，这些理由跟现实完全对不上口。“波恩会议进行的辩论是没法理解的，除非先懂得西德和东德同时也在进行秘密商讨，而东德则经常与苏联有联系。只有抛弃我们原来的想法，才能理解波恩会议的辩论。我们原来认为，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共产主义，现在应当回顾，过去俄国与德国的协调曾经建立在国家的利益上面，而今后的关系，也将建立在国家的利益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我们再引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摘录，这句话摘自1949年5月20日文章中的某个段落：“《波恩宪法》显然是一份暧昧的文献，目的在于同俄国人谈判……”

340

一个人这么有学问，这么聪明，怎能错到这等地步？为什么他执迷不悟，还要想出乌布利希跟阿登纳秘密谈判呢？当时，任何人不管怎样不认识这两个人物，也知道这种谈判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倒觉得这些疑问不难解释：李普曼不肯看事实，也不肯看人，因为事实也罢，人也罢，都跟他的整体历史

观格格不入。他的观点乃是国家重于意识形态。而我们呢？我们承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纽带的力量，但又犯了相反的错误：迟迟看不清苏中分裂，或者低估了事情的重要性。

341 W. 李普曼执迷不悟的事例直到今天，仍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只消到德国去看一看，就可以避免某些差错。1950年，我在法兰克福给大学生做一次演讲，那时正当总理出访（这事我在上文已经提过）。我阐释我的论点说，德国分裂是和欧洲分裂分不开的。欧洲分裂多久，德国也将分裂多久。第二天，《法兰克福汇报》批评我，说我把东德人念念不忘的事情硬派给西德人。败仗打得那么彻底，生活那么困苦，西德人一心只想重建家园，国家统一问题，一时是谈不到的。也许有不少德国人怀疑无法在占领军的阴影下建立共和国，但是没有任何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任何人会想到，东德统一工人党的书记会同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阿登纳进行什么秘密谈判。按理说，一个莱茵省的人担任党派的领袖，不会太热衷于普鲁士的传统，也许能使天主教徒与基督徒的势力相对均衡，以利于联邦共和国的成立。不管怎么样，四强在德国问题上的分歧木已成舟，英美除了建立西德，还有什么办法呢？30年过去了，西德至今忠于大西洋同盟，绝不牺牲自由去搞合并统一，尽管社民党本来反对成立联邦共和国，而今又有点受到东方的诱惑。

我认识一些法国官员，他们在1945~1946年曾和俄国人打过交道，至今还认为分裂并非不可避免。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强调法国人的责任，因为法国人对实施雅尔塔和波茨坦决议原则的任何措施一概投票否决。这些措施就是在柏林成立总管四个占领区的中央机关。当然，法国人曾为苏联人提供方便，但是，事实是不容置疑的。苏联人把德国共产党人带来统治国

家，并马上尽力造成既成事实，其中两件事既有象征价值，又有政治价值：一是社会党和共产党合并，二是进行农业集体化。第一项措施预示了多党参与制被消灭，尽管非共党派在法律上和书面上依然存在。第二项措施则开创了苏联模式的社会秩序。而在奥地利的苏占区中，这些事情连一件也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一直深信奥地利能重新统一，而德国则绝不可能。

1947年，法国政府勉勉强强同意英美的对德政策，参与创建三国占领区以及波恩共和国。回顾过去，有点令人诧异的是，法国的决定竟然是受了斯大林的影响。斯大林拒绝接受法国对萨尔区提出的要求，其中包括产煤区与法国经济搞联营，（今天还有谁管它什么萨尔不萨尔呢？）也许是G. 皮杜尔抓住了这个机会，把法国从戴高乐推进去的死胡同里拉了出来。久而久之，法国阻挠再建德国，自己却什么也捞不到，硬要什么安全保障，什么惩处办法，而自己则没有任何力量来强制执行。

战后第一次大辩论是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爆发的，一方主张接受《北大西洋公约》，另一方则主张中立。两个问题互有联系，但又不能混为一谈。拒绝《北大西洋公约》，并不等于中立。在中立或中立主义上，埃蒂安·吉尔森跟《费加罗报》（包括我本人在内）、于贝尔·伯夫-梅里和皮埃尔·布里松展开了辩论，但这场辩论有点近乎一场混战。

战后时期的过来人都还记得那桩“吉尔森事件”。我被卷了进去并且知道了一些内情，这实在不是我自己愿意的。首先我只谈谈有关文章。吉尔森在《世界报》上发表了好几篇文

章，我只记得其中三篇。头一篇发表于1948年12月25日，标题为《公正的人民》。第二篇发表于1949年3月2日，标题为《抉择》。第三篇发表于1949年3月6日和7日两天，标题为《暧昧》。头一篇文章猛烈抨击美国报纸对待法国的态度。美国人扬扬得意、道貌岸然地遮盖它那些机会主义的决策。比方说关于中国：“更加奇妙的是，报纸、杂志正在道义上判处中国以死刑，并且证明其理应以夷制夷。官司必败还不够，非得要说成是一场无理的官司。其实这么说，岂不省事得多：事情已经不可救药。可是人们不肯以此为满足，非要证明事情本来就不值得救药。特别是他们觉得自己也在里面搞了些名堂。这种心情是常见的。”类似的评论在越南战争后期也可以说得通。

吉尔森从美国报纸上觉察出类似的信号，美国要对法国和欧洲来一个“放手不管”。他说：“他们可以放手不管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用处。但是，当他们开始向我们证明罪责原在我们时，那就是准备放弃我们的可靠信号。”在结论部分，这个哲学家自己也表达了法国人的怨气：“1914年和1939年，我们在前线待过。我们已经学得相当油滑了，不愿意别人再跟我们来1939年那一手。如果明天美国要打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打先锋的绝不会再是法国人和英国人，更不可能是德国人，只好轮到美国人去打了。”

这种怨气和这种结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是天然的，并非来自诡计或自私。美国也不该对1914年的战争承担什么责任。战争是欧洲人自己发动的，只不过战争是经过美国参战才得以决定胜负的。可是，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政治上，美国人并没有义务参加战斗。我们到底

应该责怪他们来得太晚，还是应该回想回想，没有他们，我们就可能吃败仗呢？1939年，希特勒威胁法国和英国，可没有威胁到美国。所以谈不上什么“1939年那一手”。1949年的问题如出一辙。苏联到底先威胁到欧洲人，还是先威胁到美国？

第二篇文章谈《北大西洋公约》本身，并且用了一众人等反对该公约的论点，明明白白地表示反对：美国是守信的，但不会越过自己的诺言做善事。然而，约文颇为含糊，不然美国的参议院便通不过。这样的约文本身便没有任何价值，对苏联人也没有任何价值：“范登堡先生天真到十分危险的程度，他说，只消正式承认这样一条约文，便足以保证打不起仗来。这条约文说‘大西洋共同体遭到武装攻击时利害一致’。这是他的幻想，他以为俄国人不会和我们一样看透这条约文的含义。”

344

由此，文章便做了结论说：“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要么美国做出必要的明确诺言，不是道义上的诺言，而是军事上的诺言。要么美国人拒绝到欧洲来打仗，这是他们的权利。而拒绝为美国人卖命，则是我们的权利。”《北大西洋公约》签订后一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道义的诺言成了军事的诺言。无论如何，吉尔森说“美国出钱买我们的血”，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过火的。对也好，不对也罢，反正欧洲觉得自己受着苏联的威胁；欧洲自己要求美国保护。是否只消和美国断绝往来，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第三篇文章发表于1949年3月6日~7日两天，再一次议论公约的确切内容。美国参议院不愿意让自己的国家受公约的约束而出兵反击北大西洋地区的武装侵略者。吉尔森便采用

了这样一个中立思想：我们不要西方再遭受第三次侵略，“其代价与前两次相比，前两次竟好比两场游赏取乐”。

中立论的代表固然是埃蒂安·吉尔森，但更突出的还是于贝尔·伯夫-梅里。与其说是中立论，也许不如说是反对《北大西洋公约》，更广泛地说，是反对法国加入英美集团。我们之间的分歧要追溯到大战告终之时。苏联占领东欧，包括德国的苏占区，所用的方式方法马上就使我确认，苏军将留在划界线上，除非被迫后退，而在我看来，这在当时是不大可能的。伯夫-梅里在第三帝国刚刚破灭的时候，便担心我所预见的事情，即两强各据一块德国。早在欧洲战事结束以前，还在敌占时期，伯夫-梅里便写文章透露了他的思想，成为他外交立场的先河。这些文章后来转刊在《1932 ~ 1952 年政治思考录》中。

这部文选里载有一份报告，不是 H. 伯夫-梅里写的，而是他的一个朋友写的。这个人由他从敌占下的法国派去阿尔及利亚，然后又回到法国。我从这份报告中摘录几行如下：

对法国来讲最危险的是美国人，他们所带来的危险不像德国对我们构成的威胁，或是俄国将来可能形成的威胁。美国之患，患在经济和精神方面。美国人会阻挠我们进行必要的革命。他们的国家主义还不如极权的唯物主义，后者倒还有一些悲剧性的气魄。尽管美国人一向崇拜自由思想，但一时一刻也不觉得有必要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

于贝尔·伯夫-梅里评论这份报告说：

这是一篇证词，不需要我做任何补充，从中便可以看出今后政治的轮廓：国内非革命不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兼收并蓄民族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有价值的东西。非得要有联邦式的国际大组织，各个集体才能够发扬光大，才能经历崎岖曲折、隐患重重、时时令人灰心丧气的道路，向前迈进，直到获得最大的自由，同时又是最大的统一，逐渐开辟 20 世纪人道主义之路。

这个观念受到基督教民主思想的启发，近似《精神》杂志的观念，讲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历史观念。因此，《世界报》的社长差不多一直只得在野当反对派，因为后来的事态走了全然不同的道路：德国分裂导致欧洲分裂，而中立论则过了时，失了效。

从 1945 年 10 月 19 日开始，H. 伯夫 - 梅里便在《现代周刊》上明白提出，为法国，也可以说是为欧洲规划的目标是：“强大的西方协约组织，足以与美国和苏联抗衡。这一协会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处于两大国之间，与它们维持相等的距离。打这么一个赌，论理是合乎逻辑的，是众望所归的，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然而，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个新组织必须独立自主，既不靠华盛顿，也不靠莫斯科。” H. 伯夫 - 梅里 346

不久便看到自己反对的大西洋联盟逐渐形成，对此，他提出三条主要的反对意见。第一条，他不喜欢美国和美国的经济制度，尤其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无能。许多欧洲人对此不可避免地感到厌恶”。第二条，他担心，法国在两大阵营中选择一个，这会破坏国家的统一。他说：“欧洲分裂将使法国受制于一股肢解它的势力，而这股势力是绝对不容它进行任何

真正的建设的。”“法国既不能够，也不应该选美国的资本主义。它深知这种资本主义的毛病将来会使法国吃大亏，因为欧洲资本主义已经把它害得好苦了。”最后，伯夫-梅里认为，法国投靠一个阵营势必增加战争的危險。“也许，归根到底，欧洲仍然没法制止战争，但是，如果滑向这个或那个阵营，那就几乎可以肯定会加快战争的到來。”<sup>①</sup>

从1948年开始，伯夫-梅里已经不再存什么幻想：“欧洲保持本真面目的可能性已经不大。相反，欧洲大有可能迅速美国化，大概由于美国人的活动，美国人的有钱有势，但也由于欧洲人自己往往急于乞讨那些本应抵制的东西，而且也是能够抵制的东西……”下文又说：“美元赏给的自由是珍贵的……宗教、历史、爱享用、爱自由，促使岌岌可危的欧洲向美国靠拢……”算来算去，要说选择，《世界报》的社长终究是要选西方的，尽管他对美国害了过敏症，因而时常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的劣迹，而很少揭露苏联极权主义的残暴不仁。谁要提起斯大林的罪孽，他便不禁要说对方是“反共专家”，而过不了几年，倒轮到赫鲁晓夫起来揭发斯大林了。

1949年的事态演变，恰恰与伯夫-梅里的看法相反。欧洲中立看来已不可能。就在马歇尔计划一周年纪念日，《北大西洋公约》签订了。然而，评论文章不免在这里或那里夹进一些伯夫-梅里的观念。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既向苏联挑战，又措辞含糊，不肯保证美军立即介入欧洲。他说：“《北大西洋公约》本身就是过失。它不承认会迅速导致德国重整军备，弄得俄国人悚栗不安，同时奉送俄国人一个极妙的宣

<sup>①</sup> 过了35年再来看这句话，我越发觉得比当时更加说不通。



传口实，真算得上在事实面前闭目摇头。”（1949年12月13日）

我屡次反驳吉尔森和伯夫-梅里，但总的来说，先是在《费加罗报》（1948年12月21日，1949年2月21日、2月23日、3月21日，1950年2月17日）上登载的几篇文章中，后来是在《精神自由》月刊（1949年4月和1950年9月）上登载的两篇文章中。我一直保持诚心诚意辩论的口气，没太露论战的锋芒。

本来，在1948年和1949年，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北大西洋公约》会掀起这么激烈的争论，更不明白为什么至少是那些对斯大林主义并无好感的法国人会对马歇尔计划那么反感。因此，在签约以前我就想减轻一些这种反感，倒不是出于策略，而是出于信念：“局势不会在短时期内起大变化。特别是在莫斯科，没人不知道武装侵略欧洲将会招致美国的干涉。美军驻扎在德国，本身就是保证。”我说美国一胜利便会裁军是错的。马歇尔计划帮助并加快了西欧的复苏，《北大西洋公约》也起了类似的作用。我主张西欧有限度地重整军备，以便与苏联谈判，但不主张“无限”扩军。我说：“主宰一个强大帝国，好大喜功，绝不可逼以扩张为信条的导师们铤而走险，也绝不可示弱招侮。”我在这篇文章里下的结论，在今天看起来不无可惊讶之处。我说：“《北大西洋公约》和马歇尔计划一样，最终目的无非在于自趋无用。”马歇尔计划只消3年便没有用处了，而《北大西洋公约》则经历了三十多年且依然存在，其作用虽削弱了但还是少它不得。

1949年，吉尔森的文章——我在上文已经摘录过几段——掀起了法国人一向热衷的大辩论。我在《精神自由》月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据理立论，而该刊的戴高乐派编辑却有

点迟疑不决。但是，将军本人阅读后至少同意其中一部分。

我这篇文章是否说服了他不再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照克洛德·莫里亚克在他写的《另一个戴高乐（1944 ~ 1945 年日记）》中所叙述的，这倒是有可能的。

1949 年 3 月 17 日，莫里亚克曾对将军说：

雷蒙·阿隆把他要在第三期上发表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的文章送给我看，我只用几句话把文章的主要意思讲给将军听，因为我怕文章的意思违反将军的政策，也违反人民联盟的政策。因为这篇文章相当激烈地批评了吉尔森的两篇文章，说什么美国人出钱买法国人的血，并且责备《北大西洋公约》没有向法国人提供任何保证，即如果俄国侵略西欧，美国应在何时何地出兵干涉。

将军叫道：

当然是吉尔森先生说得对。我们必须懂得，美国基本上奉行孤立主义，原因很简单，美国是一个岛，从来不觉得跟欧洲有唇齿关系。说实话，欧美确实彼此远隔重洋。1914 年和 1940 年一样，美国参战并非因为巴黎可危或者被敌人占领。如果伦敦在 1940 年沦陷、被占领，美国肯定会和巴黎沦陷时一样感到懊丧。这一次倘若伦敦或巴黎被苏军占领，美国也不会出兵解救，而将消消停停地选择对自己合适的时机。所以，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中小心翼翼，不谈美军何时何地出兵干涉。问题的实质是，美国掌握了现代的武器，认为没有必要长途跋涉，仗可以

安安稳稳地在家里打。只消用用空中堡垒，用用火箭就行了。苏联人占领巴黎和法国，在美国人看来当然十分遗憾，但是，单凭这件事不足以要求美军登陆。

过了几天，克洛德·莫里亚克深信将军看了文章还要大加反对，于是写道： 349

这样把原文登载在《精神自由》杂志上是否合适？而将军一见我就说的话，却在我意料之外。他说：“看来，这篇文章，倒真写得不错。”

事实是，几天内，将军似乎大大改变了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的看法。

他告诉我他要说明问题在哪里，我心想，他大概忘记了他已经把他的观点详详细细地告诉了我，也许我将大体上再听一遍。可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应该肯定，雷蒙·阿隆强调这一点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哪怕诺言不够明确，毕竟将使斯大林三思而后行。我不是说斯大林从此就一定不出兵，反正，他现在已经知道，若要占领西欧，必然引起战争。我们可以确信，倘若1939年就有这么一个公约，希特勒大致不会到波兰去冒险。显然，阿隆如果强调，法国越强，战争的可能性越小，这样自然更好。克耶和他的政府班子为了切身利益自然要叫我们相信，公约以它现在的方式就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可是，有这么一个公约，毕竟聊胜于无。正是在这一点上，雷蒙·阿隆说得很对，他揭示了吉尔森论据的弱点。”

谈到最后，将军下结论说：“你现在已经知道我对问题的看法。文章登不登，当然随你的便，不过我不愿意让雷蒙·阿隆认为我不同意他的立场。”

将军不愿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新闻检查官，文章不对他的路便不能发表。但也得补充一句，他先前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而所谓美国的孤立主义，显得那么不切实际，倘若有人用正理提出反对意见，大概他也不至于坚持这种说不通的东西。350 不管怎样，他一面接受《北大西洋公约》，一面又对约文不满。10年后，他对约文也完全改变了看法。

这一次大辩论，我看是正当的。也如 H. 伯夫 - 梅里在 1951 年一次演讲会上所说，人心深处，彼此是相近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分歧之处仅在于用什么办法最便于实现共同的目标。

至于反对共产党的人则倾向于赞成公约，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共产党反对公约。所以，令人高兴的是，一个天主教哲学家居然写了一篇振聋发聩的文章，打响了真正辩论的第一炮。我与吉尔森先生的看法毫无共同之处，我把他的某些说法斥为失去了理智。然而，无论如何，我却乐于看到一个作家竟有勇气在万马齐喑时公开说出自己的忧虑和疑窦。

H. 吉尔森反对的一条主要理由——我在上文已经指出——是针对约文的。他认为约文不够明确，不足以对美国形成约束（戴高乐将军对此也提出过同样的批评）。我的答复则是，明

文规定缔约国的义务到底重要不重要。只要美军还驻扎在德国，那么，事实的保证便优于任何约文条款。《北大西洋公约》既改变不了美国人的行为，也改变不了苏联人的行为。

就我来说，我认为《北大西洋公约》不会怎样改变现实的形势。西欧明天受到的美国力量的保护，将和今天一模一样。《北大西洋公约》不会在斯大林熟知的东西以外再告诉他任何新东西，也就是，武装侵略旧大陆就是启衅的理由。约文把互援的义务规定得越明确，美国越可能自动参战，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主义者便越受到震动，在这一点上，我们情愿对吉尔森先生的论点做些让步。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也不可能写在约文里。近则有美军驻防德国为象征，远则有工业和原子弹的威力，目前正是这些东西在保证法国的安全。今后，只要近处的情况维持下去，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潜力超过假想的侵略者，那么，法国的安全仍将得到保证。

351

话虽如此，我得承认，一旦战争爆发，《北大西洋公约》并不足以保护我们免受侵占。那么，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万无一失呢？吉尔森主张武装中立。可惜西欧并没有武装，如果拒绝美国的援助，那就越发没有力量武装自己。西欧不会通过《北大西洋公约》投靠美国而刺激苏联，惹火苏联。西欧不中克里姆林宫的意，那是因为东欧国家在自称红色军队的监护下进行苏维埃化，而眼睛却老盯着西欧。

一年后，1950年9月，我重唱对台戏，而口气不像以前那样客气了，因为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人也对我们很不

客气。《精神自由》1950年9月号登载了一篇文章，标题为《中立的骗局》，主要论点有二。其一，主张以另一种思想代替中立派的世界观。文章说：

苏联的宣传机器集中攻击美国，因为在苏联看来，美国是它的主要敌人。打倒了美国，称霸世界便不再有任何阻拦。但是，目前苏联的野心在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那些自觉不自觉的斯大林主义代理人向我们暗示，只消这些国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苏联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敌意便会烟消云散，或者大为减轻。这是骗人的话。斯大林声讨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以至于任何形式的欧美互助并非被认为威胁或挑衅，而只是苏联征服世界的妨碍。反之，如果美国不再关心欧洲，保留四分五裂虚弱无能的欧洲孤零零地面对苏联帝国，那么欧洲就将亡于渗透，亡于绝望，亡于讹诈。

第二条论点致力于阐述两强的对比：

352 人们先画一张艾比那尔式的民间画，画上两个巨人怒目相视，然后在两大蛮夷之间、两大唯物论之间做出种种比较。而作为第三势力的欧洲便成了文化中心，一方面遭受苏联秘密警察的威胁，另一方面可口可乐泛滥成灾……在我们看来，西方并不是什么力战黑暗魔王的光明天使……作为法国知识分子，我虽然主张齐心协力，同美国一道反对斯大林的勾当，但并不眉毛胡子一把抓，认为美国文明十全十美……此外，尽管我们对斯大林怀有戒心，

可是，上帝保佑，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有权表达自己对杜鲁门的为人处事的看法。

姑且放下这些辩论——尽管不幸得很，它们至今仍未有定论——而回过头来看看，E. 吉尔森和 H. 伯夫 - 梅里到底出于怎样一种情感？我觉得前者的情感是强烈的、正当的、可以理解的，是对命运不公的愤愤不平。美国打了一仗又一仗，越战越强，欧洲人则越战越弱。1914 ~ 1918 年大战中法国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1939 ~ 1945 年大战中，英国继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就将轮到美国。迄今为止，H. 吉尔森的愿望实现了。在西方国家中，美国的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最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美国打的，万一发生大战，仍将由它担任主角。而地理位置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 1949 年或 1950 年，欧洲因与苏联帝国接壤连壤，显得最为岌岌可危，战争一旦开始，欧洲将不可避免地遭受侵占。吉尔森以为，只要坚持要美国在白纸黑字上排除一切疑窦，做出明确的担保，就能逢凶化吉。然而，任何担保都不能有效地保护欧洲，防止苏军长驱直入。中立也保护不了什么。

至于伯夫 - 梅里的心情，则已经表露在我援引的几篇文章里面。我如果不把他的这种心情叫作反美主义，至少也得说是对美国社会的反感。不过，这是他想象的、不认识的美国社会。伯夫 - 梅里是天主教民主派，长期在中欧工作，一向憎嫌美利坚共和国所象征并传播的重商文化。

围绕大西洋联盟掀起的一场论战，今天还剩了些什么？谁也不再记得，当时由于约文不够确切，大家曾经批评、反对、议论得多么激烈。也许戴高乐派倒会说我有点先见之明，因为

353 我在 1949 年 3 月 23 日写了以下几句话：“硬性的约文不会立即给我们什么好处，同时防止不了美国舆论出人意外地倒个个儿，当然，这是不大可能的。不仅如此，缺少这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反而在某些情况下让我们有时间思考思考，来得及选择策略。”法国自从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便暗自庆贺幸好约文不尽如戴高乐将军当时的要求。

我没有找到我和 H. 伯夫 - 梅里进行笔战时写的文章。而他在《政治思考》中选载的文章已经体现不出埃蒂安·吉尔森当年古怪的激情。比方说，在 1949 年 6 月 25 日的文章里，我读到这么一句话：“所以，引起争论的主要点并非公约的正当性，而是其时宜性和方法的恰当性，其实就是它所导致的哄闹和蠢举倍受争论。”文章承认，“东方公约缔成已久”，然而又怕《北大西洋公约》显得意在挑衅，那么，为什么不尽力对老百姓说清楚呢？下一段文章里又说：“就目前而言，订约以前是这样，订约以后也是这样，最可靠的和平保障依然在于欧洲人立志不让自己‘斯大林化’，不为甜言蜜语所诱惑，同时在于美国的威力施加于未来侵略者的威胁。”这话说得没法再好。我在《费加罗报》上也没说别的。归根结底，《北大西洋公约》把当时理所当然的东西说得明明白白，既肯定了美国应该留在欧洲，也保证了美国将永远留下来。

在 1951 年 5 月 8 日的一次讲演会上，伯夫 - 梅里分析了积极的中立和大西洋主义。文章把两种态度写得十分近似。比方说：“美国必须懂得，牺牲欧洲则美国迟早自身难保。欧洲也应该懂得，6 年以来未遭侵略主要靠、几乎单单靠美国的保护。欧美双方的辩论点，不在于目的——目的大致相同——而在于分工和手段的选择。就这一观点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当



时最好不要签订那样立意和撰拟的《北大西洋公约》。今天，354  
公约已经存在并且开始发挥功用，再退出去很可能加剧混乱，  
坐使对方获利。但是，欧洲人不是不可能保持一种即使没有  
《北大西洋公约》也该采取的基本态度。”这么说来，联盟已  
经获得认可，但并不排斥欧洲人团结起来肯定自己的固有文  
化。“大西洋派想极力发展大西洋联盟，既肯定它的功用，又  
不规避分内的牺牲，这和积极的中立十分接近，而积极中立则  
更加强强调欧洲的本位个性。”

我回应 E. 吉尔森的文章时，态度是客气的，我也许有点  
激动，但从不涉及他的作风和动机。过了几个月，“吉尔森事  
件”爆发了。我在美国逗留（1950 年秋天）时，接到圣母大  
学（天主教学校）瓦尔德马尔·古利安（Waldemar Gurian）  
教授的一封信，信中他对我不能去做约好的演讲表示遗憾。他  
补充说：“埃蒂安·吉尔森在圣母大学说您是美国收买的间  
谍。有人可以证实他的指控……”这封信出乎意料，但并没  
有使我特别激动。古利安并没有亲耳听见这些话，而且在冷战  
气氛中，任何形式的论战都是可能的。几个星期以后，我的小  
女儿去世，这些知识分子间的争论便减少到本来该有的分量。

1951 年 1 月 27 日的《费加罗文学报》发表了瓦尔德马尔·  
古利安写给埃蒂安·吉尔森的一封公开信，古利安指摘吉尔  
森“散布失败主义的阴暗经典”，“毫不含糊地指控一个声望  
卓著、受人尊重的法国作家和学者，说他被美国人收买……  
我很清楚您并不致力于帮助扩张共产主义，您不过根据当前  
的力量对比，相信共产主义扩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您肯  
定说没有美国的援助，欧洲的前途便会一片漆黑。您预言法  
国不会作战。这一切只会帮世界共产主义的忙，哪怕您自己

并不情愿……”就在这时候，埃蒂安·吉尔森从法兰西学院  
355 退休，到多伦多主持中世纪哲学研究所。人家就说他逃出法国，到大西洋彼岸去避难了。他获得荣誉称号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教授大会没肯给他。

1951年2月17日，E. 吉尔森在《费加罗文学报》上发表了她的答函。他纠正了古利安的一些差错。他在圣母大学讲的是邓斯·司各特，而不是政治时事。他从来没有写过或公开讲过“中立主义”，自称受了一场诽谤运动的害，诽谤来自“美国某一阶层，幸亏他们人数有限，但仍然为害甚烈。他们痛恨稍有名望的天主教徒，只要他们不肯把讨伐俄国当作神圣职责。这里所谓的神圣，完全是就严格的宗教意义来说的。既然这是‘上帝的谕旨’，那么，越是使一场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这项政策就越是基督教的政策”。最后，他明确指出他在1949~1950年的想法：“……（他）心想，在某一时期，也许可以重振法国，甚至重振军备，而不必受制于一种无法应对的对外政策，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迟早被卷入一场战争……”

W. 古利安和 E. 吉尔森的论战继续进行，问题在于吉尔森在私人谈话时可能讲过的话，指控他的人却并没有亲耳听见。古利安便邀请传话的同寅出来作证。主要证人是柯尔贝特 (J. Corbett)。他基本上并不否认谈话的内容，但猛烈谴责 W. 古利安用的手法，责备他利用吉尔森与朋友叙谈时表达的个人意见，居然发动了一场对吉尔森的公开攻击（1951年4月21日《费加罗文学报》）。这位圣母大学中世纪研究所所长无保留地支持 E. 吉尔森，反对 W. 古利安。

1951年2月22日，《世界报》上发表了 E. 吉尔森写的一

封信，又在1951年3月4日~5日发表了W. 古利安的反驳信，这才结束了这一场论战。我自始至终没有参与这场天主教徒之间的争执。《费加罗文学报》转载的W. 古利安的公开信到底是否受了天主教“好战分子”小集团的指使，后来又是否为上级所制止，我确实一无所知。至于W. 古利安不该把朋友叙谈小题大做，搞成轩然大波，那倒是毫无疑问的。

356

E. 吉尔森退休脱离法兰西学院，是否因为害怕战争，害怕法国再一次沦陷，我也一无所知，任何人也不能肯定，因为他在法兰西学院任教，也在多伦多大学任教，完全有权选择后者。

这些都已经交代清楚。好些与他和我都很熟识的相知好友，都并不隐讳这个哲学家一向十分悲观的事实，也不隐讳从他嘴里听到的一些话，不管是不是俏皮话。他预测苏联的战车将长驱直入法国，如入无人之境，而美国人则将再一次抛弃法国。之后美国人也许再来解救法国，但是精英人物一经斩尽杀绝，法国还剩下些什么？简言之，在朝鲜战争引起的恐慌氛围中，他跟好些人一样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从1950年8月开始，他不再主张中立（中立主义则是他绝口不谈的），因为他认为结果显而易见，大西洋主义已经得胜，他便在写给《费加罗文学报》的头一封信里就谈到了“迟早将把我们投进战争”的政策。

关于所谓E. 吉尔森对我的指控，我几乎无法置信。我们俩来往不密，但都是哲学教师圈子里的成员，尽管政见不同，却从不在切磋异议时失礼。1945年，他参加过我和莫里斯·舒曼在拉·都尔-摩堡街多明我会修士座谈会上的辩论，他赞成我的意见，并且说了些夸奖的话。过了几年，中立危机已经

过去，他主动对我说，他买《费加罗报》仅仅是为了读我的文章。W. 古利安传布一些并非本人亲耳听到的话未免轻率，因为吉尔森始终没有停止过辟谣。

我重新找到了亚历山大·柯瓦雷在1950年7月15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他从不过问政治，敬佩这位举世无双的中世纪哲学史学家。他来信说：

357

我给您写信，首先是向您道贺，因为您反驳了《世界报》和我们的<sup>1</sup>大师吉尔森所宣传的失败主义。大体上，吉尔森号召我们不抵抗，只要面子上过得去，便免掉夸夸其谈而向斯大林屈膝投降。我觉得您最好反驳得更加决绝一些，戳穿他们那个荒谬的中立主义的气球。我不愿意冤枉吉尔森，说他哪怕在一刹那之间相信了“孤立的法国”能够保持武装的中立。至于解除了武装的中立，我认为《世界报》的先生们很知道这里面有些什么货色，无非是被占领和俄国化罢了。如果由民主德国指挥战斗，那就来个日耳曼化。如果他们<sup>2</sup>认为占领无论如何不可避免，不战而屈优于战败而屈，那么就请他们把话说清楚好了。更何况，吉尔森已经说过：我国军队的政策只有投降。他有权这样想。任何人有权自杀。任何国家有权放弃独立，自甘灭亡，也许法国已经弄到这步田地，但话得当众说明。吉尔森和《世界报》是否已经成为天主教进步人士了？

我引用这封信，用意在于把惶惶不可终日的年代和当时那种氛围作为历史陈迹，向没有经历过冷战的读者呈现出来。

在安德烈·马尔罗同一时期（1950年7月）写给我的一

封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班维尔的话有道理，但如今对大家来说并不正确。有些人（比方说您和我）认为，国家陷于危亡的现象并不少。真是个古怪的国家，它相信要打仗，以至于大量囤积沙丁鱼罐头（这是巴黎人主要忙碌的事）<sup>①</sup>，却不去管国家防务。您谈时局的文章，那篇关于丘吉尔的文章，还有第二篇，都写得十分出色。但愿您是自己找了不自在而已。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此后，关于大西洋联盟的辩论完全改了口气。不管怎样，《北大西洋公约》都会促成西德重整军备，而亚洲的热战至少缩短了旧敌对国重新建设和重新武装二者之间的时间。外交辩论扩大了范围，包括了美国的世界政策和欧亚之间的关系。

杜鲁门总统做出的决定还没有公开，我便主张美国出兵朝鲜，而且主张立即出兵。照我惯用的笔法，我先一一列举相反的论点：“有人会说，北朝鲜打的不是邻国，而是本国的另一部分。”尽管南方的共和制保持了自由选举，我却并不保证它行事的道义性。我说：“李承晚的统治是‘反动的’，这是可能的，但是，阿登纳总理同样受到东德的恭维或谩骂。任何反共政权都该有这份荣耀。话已经交代清楚，这不是到世界良知裁判所去打官司<sup>②</sup>，给南北朝鲜算一本善恶功罪的总账，而是一场实力的较量。”

358

① 彼时，安德烈·马尔罗住在孔卡尔诺市。

② 这句话触犯了皮埃尔·布里松。

我不否认，南朝鲜并不容易抵抗住共产党的进攻，但在在我看来，搭救南朝鲜在政治上是刻不容缓的：“如果南朝鲜不出几天便沦陷，如果美国当局不出兵，或者只让安理会采取一些不起作用的决议，美国便将把脸面丢尽。远东地区已经广泛认定实力在于它们一方，今后这更将成为普遍的信念。”我并不低估抉择的严重性：“要么到遥远而邻近敌方根据地的国家去介入内战，要么含耻忍辱，弄得群众丧气，盟国灰心。”我的结论完全说明了我的判断：“有一个同行在他文章的结尾中用一句话概括了1933 ~ 1939年的法国外交。这句话便是：‘最迫切的是等待。’但愿美国外交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最迫切的是行动’。如果在1950年容忍了这样一种侵略行为，到了1952年或1953年，就会招来新的侵略。到那时候，和平将绝无希望。”同年12月，在我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一次谈话中，359 他为他给杜鲁门出的主意辩解，用的论点正是我在文章里阐释的道理。

时间逝如流水，根据后来得到的情报，该不该修正我当时的看法呢？我们今天已经知道，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人出兵时并不完全清楚金日成的打算，斯大林也不知道他的计划，但很可能是斯大林批准了而不是建议或挑动金日成这样干。同样，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中国人事前曾两次警告华盛顿政府，叫美国军队不要向鸭绿江进军，警告无果之后中国人只能遗憾地参加这场战争。<sup>①</sup> 我们大家都曾倾向于赋予这一事件一种世界意义。其实，当事人在一开始并没有这样打算。

---

<sup>①</sup> 请读者参看我写的《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世界中的美国，1945 ~ 1972年》，1973年由卡尔曼·莱维出版社出版。

当然，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就觉察出苏联与中国之间有分歧。苏联人硬要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所用的手段却似乎要达到相反的效果。我感到遗憾，美国出于军事考虑，竟然去保护台湾，宁可去维持一个假象——一个被逐出大陆的国民党政府号称代表的中国——而不去和北京建立正常的关系。种种盘算都为历史所讥笑和推翻。表面上，美国逼得毛泽东的中国不得不去跟莫斯科联盟，然而从1960年开始，苏联人便撤回了派到中国的技术人员，扔下了160项开始施工的工业计划。

除了共产党，美国出兵并没有在法国引起谴责。<sup>①</sup>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而对中立重开论战，或者使论战重趋激烈的，则是美国人一定要欧洲重整军备。这就引起了顾虑，唯恐军备会给美国以无可争辩的优势，会引起美国“好战”的欲望。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人，昨天还在悲叹约文的约束力不够强，今天又在害怕被火暴急躁的美国拖进一场跟自己不相干的战争。 360

我把《大分裂》这本书的头一章命题为“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太可能”。直到1950年6月25日，这句话仍然表达了我许多评论文章的指导思想。6月25日以后，我曾将这句话写进《连锁战争》这本书里。但在之后几个月里，我一直担心爆发战争的不大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这得看什么日子，看我当时的心情，我便怎样去估计另一种形式的“不太可能”）。我跟某些美国评论家不一样，从来没有把朝鲜战争当

---

① 有人责怪艾奇逊怂恿侵略，却不提南朝鲜是美国必须保卫的亚洲基地之一。

作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拟定的全盘征略计划的第一步。美国人的反击驳斥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者的一个论据：美国人在朝鲜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超过了白纸黑字所规定的义务。美国最初几个星期的军事失利，11月中国“志愿军”出动后继续失利，这在欧洲引起了失败主义，有时候甚至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东德和苏联报纸威胁阿登纳总理，说他将与李承晚落个同样的下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当局已经组织了警察队，警察队往兵营里一住，简直就是一支军队。南北朝鲜两支军队力量悬殊，不得不将东德西德的两支“警察队”也做一番比较。美国、欧洲和德国三方重整军备问题几乎同时被提上日程。

美国重整军备的道理，无须费力便为全体法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共产党人当然不在其内。在1950年，美国只有寥寥无几的几颗原子弹，而经验证明，一个紧跟莫斯科的共产主义小国，单靠核威慑是不足以迫使其放弃发动任何形式的侵略的。科幻小说描写一种从恐怖中及庞大军队退出舞台中得来的和平，可是历史只消一次就把小说里的主人公搞得惊慌失措。大战结束后5个年头，美国兵又到远离祖国几千公里的地方，去打他们原来的盟友装备起来的半个国家。华盛顿当局从中汲取了教训：原来自己一直是在错觉中过生活的。几枚原子弹加上美国的工业潜力，并不足以在世界各地维持和平。美国这才发现自己的帝国地位有其当尽的义务。美国不能不放弃自己的传统：平时少养兵，一旦战争爆发便实行全民总动员。剑拔弩张的和平，部分从英帝国那里接手过来的国际义务，都迫使美国不得不维持强大的军事机



器的常态。

欧洲重整军备一事所提出的问题，却掀起了另外一些争执。欧洲各国恢复经济，该不该享受优先权？大规模扩军势必拆建设的台。象征性整军在未来的战争中起不了作用。有些批评家重新亮出了参议员塔夫脱的论调：美国无须订互助条约，只需单方面宣布保证欧洲的安全。这样一来，欧洲人在美国的卵翼之下，便可以先不致力于防务而马上搞好经济建设。这一番道理得到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某些人的支持，但在1950年6月以后，便再也没有人听这一套了。本来，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主要理由无非是：美国也许会解救我们，但防止不了我们被侵占。现在有了朝鲜战争为实例，塔夫脱提出的办法便越发吃不开了。

欧洲国家政府曾经发起缔结《北大西洋公约》，至少可以说，曾经要求美国当局搞一个类似的条约，同时也和美国人一样，希望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包括总指挥部在内。这就提出了欧洲重整军备的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整军备的问题。

1950年秋天，迪安·艾奇逊亮出了西德重整军备的计划。那时候，美军正对苏联装备起来的朝鲜军队艰苦作战。勒内·普利文和罗伯特·舒曼先后领导的法国两任政府，在面临这一紧急关头时都千方百计地规避说一句响亮话，规避直截了当地说一声行还是不行。他们有理由认为，法国舆论不会同意德国重建国防军。盟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打败德国才不过5年。此外，他们又犹豫不决，不想拒绝一项合乎形势、合乎逻辑的举

措，这可不是美国当局心血来潮。成立欧洲军的建议曾引起华盛顿当局的疑惑，后经西方外交一致采纳，杜勒斯甚至在

1954年威胁法国说，如果国民议会拒绝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势将引起“痛苦的变局”，而我们的友邦政府都已经批准了这个条约。

由让·莫内倡导并为之不懈奋斗的欧洲统一运动在1950年5月正式启动，那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爆发。德国重整军备问题被提上议程时，气氛和同年9月完全不一样。艾迪安·希尔赫（Etienne Hirsch）对几个新闻记者说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他绝口不提苏联的威胁，也不提西欧的防务，只强调美苏争胜必然将把全世界引向战争，只有欧洲人起来插在两大国之间，才能防止两大强国惑于冲动，直奔深渊。莫内的这个僚友既不提第三势力，也不提确切的中立，只说建设欧洲旨在缓冲两大国的对抗，并不加强任何一方。他说的话看起来是诚恳的。这样把计划摆明，肯定会消弭一些可以预料的反对。这样的讲法可以揭示计划可能起的作用。

统一欧洲的想法和宣传并不诞生于煤钢联营。马歇尔计划迫使欧洲人（包括德国人）齐心协力分用美国人赠送的或借给的资金。1948年的海牙会议开了欧洲议会的先河。议会厅内，战前战后的政治巨子比比皆是，令人印象深刻。有一些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

早上，我在街上闲逛，看见爱德华·达拉第踽踽独行。出席会议的代表们似乎忘记了他，或不愿理睬他。可他在1938 ~ 1939年曾叱咤风云，肩负左右乾坤的重任。我走过去跟他攀谈。这时候我只代表《费加罗报》，是一个与他几乎不相识的记者，他对于我的这一举动也不无感触。大战中的名人如温斯顿·丘吉尔、保罗·雷诺等参加讨论，似乎相当有热情。保罗·雷诺主张以普选方式产生欧洲议会。英国人则以邓肯·桑

迪斯为首反驳说，哪怕议会毫无职权，他们也不干哗众取宠的事。他们不会赞成这种办法，因为绝无成功之望。保罗·雷诺不动声色，把斗争进行到底。结果不出所料，他只得了少数票。最后一天，一小批联邦主义者拒绝投票通过最后的动议。W. 丘吉尔出面讲话，语气竟到慷慨激昂的程度，议案方获一致通过。

我虽然到场，却不参加讨论，因为这样以舌辩争雄实在没劲。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委任，至于那些由什么运动、什么党派来的人，也只能代表他们自己。各委员会里，得多数，得少数，全无意义。整场会议尽是宣传，说漂亮点，就是“非地下的劝说艺术”。

这是即将实现的、理想中的、统一的欧洲的明媚春天。哪怕最不喜爱乌托邦的人，也不禁满怀热望。谁还记得米歇尔·德勃雷的小册子？里面号召建立欧洲共和国，又提出了宪法条文，规定欧洲合众国主席当然由戴高乐将军担任。这是诚心诚意的信念，还是给在野党加码？小册子是米歇尔·德勃雷在抗敌时期与 E. 莫尼克合作写成的，把大西洋的团结一致放在首位。

这个提倡欧洲共和国的人到底转了些什么弯子，又出来反对欧洲共同体呢？而当时这个共同体还只涉及煤钢联营，只在这上面出让一丁点儿国家主权。1950 年问世的小册子今天读来叫人目瞪口呆。小册子谴责欧洲迟迟不得统一，责任该归执政诸公。该不该说，黑变白，白变黑，就看戴高乐掌不掌权呢？德勃雷满怀激情，爱把一时的主张推向极端。他毫不犹豫主张欧洲各国组成一个联邦共和国，尽管后来又鸣金收兵，因为需要国家出让一部分主权，尽管自己对大西洋和欧洲一时的

主张终究是迁就了他的雅各宾派思想。<sup>①</sup>

国民议会批准了煤钢共同体，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议员们却没有同意。然而，戴高乐将军并没有像前两次那样向舆论发出警报。前两次，第一次是为了伦敦会议的最后宣言，宣布成立三国占领区，也就是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二次是为了创建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条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欧洲军队。

让·莫内和勒内·普利文都不主张把欧洲统一跟德国整军结合在一起。他们俩迫于形势终于不得不这样做，但仍衷心希望推迟有关德国整军的决定，以便在拥护欧洲统一的人士中选出一些议员作为生力军，在国民议会内投票批准德国重整军备。但是，事与愿违。反对整军的人反而添了一支生力军，一支反对超国家机构的队伍。他们认为，超国家机构会剥夺法国国家独掌的军队指挥权，而把“欧洲”武装置于一个美国将军的麾下。

我个人却从 1952 年 11 月 22 日开始，便提醒我的一些“欧洲派”朋友说，照我看来，德国重整军备势在必行，但是选用的方式显然不无可以訾议之处。既然搞不成一个欧洲政府，军队就得听命于一个非欧洲人的司令，事实上当然是美国人。法国怎么能够同时拥有两支军队，一支听命于欧洲委员

---

<sup>①</sup> 戴高乐将军于 1950 年 8 月 17 日宣称：“我们必须让欧洲联合起来。现在的斯特拉斯堡理事会是办不到的，因为它没有得到欧洲的有效委任。必须以法德协调为基础，因为一切战略的和经济的可能性都基本上存在于欧洲。欧洲的体制也应该由欧洲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在经济和防务方面，掌握成员国托付它的一部分主权。最后应有一项共同的防务制度，正常地由法国拟订方案并指定领袖。正如这个卓越的地位，在太平洋地区属于美国，在东方则属于英国……”

会，而另一支则完全由法国指挥从事海外活动呢？只顾提心吊胆，生怕德国重建军队，那么什么时候欧洲防务共同体才能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具有战斗力的整体呢？

在私下交谈时，我用的言辞要激烈得多。显而易见，外交局势决定了德国整军势在必行，但德国整军既可以纳入欧洲范畴，也可以纳入大西洋范畴。我老对美国朋友说，与其无保留地力主欧洲防务共同体，毋宁公开宣称，应由欧洲人自己在欧洲防务共同体或德军归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二者之间做出抉择。第一个办法很有可能通不过，因为反对超国家欧洲的人将会同反对德国整军的人联合起来去反对。至于第二种办法如果在第一种办法以前提到国民议会，那就也有可能通不过。如果议员们先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那么也许会勉强通过第二个方案。

欧洲的紧跟派对我的满不在乎感到奇怪，其中有一个说我采取的立场不可捉摸。戴高乐将军于1953年2月25日抨击欧洲防务共同体，说它不能不触动老百姓，上至议员。他说：“要有欧洲军，也就是说要有欧洲的军队，首先必须存在一个欧洲，它是政治的、经济的、财政的、行政的，尤其是精神的实体，并且必须是生气勃勃的、公认的、稳固的，这样才能获得百姓由衷的爱戴，才能有自己特有的政策，才能于必要时有成百万人之为之捐躯效命。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吗？没有一个严肃的人敢说一声‘是’。”将军追述他在战时所完成的一切，无不凭仗一个能指挥军队的政府。他说：“科尼格将军不会出现在比尔-哈克姆（Bir-Hakeim）；朱安（Juin）将军不会在意大利起人所共知的作用；勒克莱尔（Leclerc）既拿不下费赞，也不会节骨眼上冲向巴黎；德·拉特尔（de Lattre）不会守

366 住阿尔萨斯，也不会强渡莱茵河和多瑙河；拉米纳（Larminat）不会消灭德军在大西洋边固守的袋形阵地；杜阿彦（Doyen）不会拿下腾德和拉·布利格；远征军永远不会被派去印度支那……”

关于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争议在两年多内悬而未决。从公布约文，一直到国民议会投票表决，整整两年有余，而国民议会连方案的实质都不肯讨论。由于几乎瘫痪了的爱德华·赫里欧的慷慨陈词，多数派总算通过了一项先决问题的议案。欧洲防务共同体从此盖棺入土，拥护它的人再也没有机会起来为它辩护了。

《费加罗报》在皮埃尔·布里松的亲自指挥下发动圣战，要求欧洲统一，要求维持欧洲防务共同体，要求实现让·莫内的主张。我跟后者的个人关系非常好，但并不讳言我不赞成欧洲防务共同体，不赞成欧洲军的方案，因为这个方案大概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在目前反而会分化大西洋的多数派。我有一天对罗伯特·舒曼说，恰恰也是为了欧洲防务共同体问题，“您不要德国人当盟友，偏偏要他们当同胞”。他听了愣一愣，说：“为什么不可以？”

这次大辩论再一次激起了某些法国人的反德情绪。从阿米尼乌斯（Arminius）到俾斯麦，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历史的遗恨重新表面化了。戴高乐派以雅克·苏斯戴尔和米歇尔·德勃雷为首，对欧防体发动猛烈攻击。听说苏斯戴尔是跟共产党人一道举行公众集会的，德勃雷则发明了耸动人心的论战口号：欧防体重建德军，拆散法军。

可以说，这场辩论倒成了一帖发散剂，发泄了法国人胸中的浊气邪气，清除了几百年的争吵所累积起来的“世仇”怨

气。等到国民议会通过赞成建立德国军队，将其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时，政治阶层和公众舆论都不再争辩了。归根结底，法国人宁可让德国建军，也不愿意让法国军队并入欧洲军。如果这两个方案同时提出，或者把提出的先后次序倒一个个儿，你说能通得过吗？

1950年代的论战到了1980年代，还剩下些什么触动法国人的东西呢？除了欧洲军，争论的还有“德国之患”。就算不至于立见分晓，起码也是长久的隐患。论点虽然五花八门，中心思想却只有一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其他西欧国家不一样，它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国家，既不满意，也不满足。一方面要求统一，同时又要求收回波兰在奥德-尼斯河一线以东占去的疆土。雅克·苏斯戴尔在反对欧防体运动中发现并强调指出，布雷斯劳市本属波兰，几百年来日耳曼化了，直到1945年才重新成为弗罗茨瓦市。

367

剧本有两套，时至25年后的今天，一套看起来难让人信以为真。据说，联邦德国要把法国拖进战争，唯一用意在于收复1945年失去的国土。西德就算有了点儿军队，可算不上强国，更谈不上超级大国。要说波恩共和国的念想，就其1954年表现出来那副模样（哪怕它到了1982年），要凭武力收复失地，那真叫异想天开。

相反，另一套剧本却发人深思。联邦德国出于民族利益，与莫斯科渐行渐近，在1953年，祸患还未迫在眉睫，但从长远来看，却不算说不通。历任波恩政府，除了莫斯科，还能指望谁来改善东西两德之间的关系？反对欧防体的人提出来的理由，真叫异想天开。不是来一个新的《拉帕洛条约》，便是再来一个德苏联盟，或者再来一次瓜分波兰。我可不敢苟同。我

认为占总数 1/3 的德国人在民主德国受着苏维埃式的统治，这既能保护莫斯科不受西方的袭击，又可以将莫斯科作为出击西方的难能可贵的基地。克里姆林宫若非万不得已，绝不会牺牲潘科区，正如波恩绝不肯牺牲自己的自由。有些史学家认为，斯大林刚死，贝利亚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曾经考虑过建立一个统一的中立化的德国。1982 年，联邦德国并不想脱离大西洋联盟，但因不想得罪苏联而犹豫不决。苏联手里抓着几百万人质。再者，1955 年重整军备，无论在哪方面都丝毫不影响波恩的外交，也不影响莫斯科的外交。

368 关于《北大西洋公约》、欧洲整军（包括联邦德国重整军备），一场争吵在 1954 ~ 1955 年已告结束，而印度支那战争和北非乱事则一跃而登前台。孟戴斯·弗朗斯在莫边府的阴影下谈判《日内瓦协议》，立了一功。欧防体被否决，他又设法搞了一个替代方案。

我重新读了我在孟戴斯当政的几个月里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看看是应该肯定还是消除当时有关我尖锐批评孟戴斯的传言。事实是，我大体上是赞成他的。皮埃尔·布里松动笔赞赏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洋洋大观的突尼斯之行，说这预告了突尼斯内部自主。我自己也一直赞同当时的“开明”路线，即对北非几个保护国推行新的政策。《日内瓦协议》签订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打赌赢得好》，向孟戴斯道贺，赞扬他获得成功。按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协定各款委实好得不能再好了。<sup>①</sup> 不仅如此，1954 年 10 月 28 日，我认

---

①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孟戴斯的提议使他愉快地感到惊讶，因为他没有预料到提议会这样好。这样来谈当时的局势，很叫我心服。



为欧防体在议会遭否决一事，孟戴斯的责任有限。而政府多方活动，争取议会通过替代方案，同意德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范畴内组建军队，我对此完全赞同。

至于我的保留意见和批评，那都是针对所谓 30 天的打赌（孟戴斯说，《日内瓦协议》将于 30 天内达成，否则，我回来向诸位辞职，或者派兵去印度支那）。孟戴斯若是不打这个赌，也许就得不到议会授予谈判的全权。当然，打赌是危险的。法国政府的去留，就得取决于北越人，或者取决于苏联人和中国人。赢了，孟戴斯就会受大西洋派或欧洲派的猜忌，说苏联人会助他成功，让他搞垮欧防体。事实是，而且特别是，否决了欧防体，他就失去了阿登纳、莫内派以及保卫共和运动的信任。我当时也责备他在议会讨论欧防体的时候置身事外。我的批评是不太公平的，但我很快就于 1954 年 9 月 3 日写了一篇文章来弥补我的过错。我说：“孟戴斯出任总理时，欧防体已经奄奄一息，危在旦夕，如果他求之甚切，大概可以起死回生……”今天，我可不敢再这么说了。当他试图争取五方的答应再对条文做一些修正时，欧洲派群起而攻之，从而把最后一点儿希望也扑灭了。孟戴斯最坚决的拥护者都反对欧防体，甚至反对德国建军。别人也没法要求他无保留地为公约奋斗。何况，在他的思想深处，他大概根本不赞成这个公约。我责备他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亲英疏德。

369

孟戴斯下台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为《联合的失败》，当然不是对他个人，也不是对他这个政治家表示不满。我说：“孟戴斯为国立了功。他缔结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深孚众望。他主动与新立宪党谈判——确实是壮举，这是没法回头的，因为舍此别无出路。但是，关于法苏关系，关于欧洲

政策，这都和非洲一样，左右着我们的国运，人们却不知道他是否胸有成竹。人们根据实际经验，仍不知道他有些什么深谋远虑。”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一个第四共和国的总理表示过这样的敬意。我后来解释说，他做了“一伙政治狂热乌合之众”的牺牲品。我写道：“在他周围聚集了各式各样的反对派，其中有的要印度支那和平，有的要改革北非，有的要跟莫斯科谈判，有的要清算欧洲一体化，有的要加强政府的权力。各有各的主张，彼此毫无合理的联系。大西洋派和中立主义者都没有理由赞成关于摩洛哥苏丹的办法。”我指出了孟戴斯是自己庞杂的多数派的牺牲品，然后做结论说：“叫人伤心的是，他再  
370 也没有机会发挥他过人的才华了。”孟戴斯一蹶不振，只能怪他自己，而不能怪他的对手。他始终不同意戴高乐通过一次疑似政变重掌政权。他始终不肯承认第五共和国的宪法。《费加罗报》无可奈何，我也无可奈何。

到了1955年，以1944年马歇尔计划为开端，以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为发轫的局面已经结束。西德恢复了主权和军备，并且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东德则根据《华沙公约》，在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正式组织东欧各国军队的统一指挥部……27年以后，两大集团依然对峙称雄。我们是否错过了机会？我尽力支持的政策是不是唯一的政策，是不是最好的政策？

今天还有人怀念欧洲防务共同体。欧洲人反对成立自己的军队，反对欧洲军，而看中了美国的军队来保护欧洲，由此一举而长期出让了自主权。可是，当时的争论意并不在此，因为让·莫内和勒内·普利文主张的欧防体意在一箭双雕，既可以

推迟德国整军，又可以使法国舆论同意欧防体。再者，市场和莫内派人士认为，这个办法可以推广几个月以前由煤钢联营体现的欧洲观念。结果，欧防体落空了，原因在于反对德国建军的人和痛恨欧洲军的人结成了联盟。当时，法国军队还在印度支那打仗，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乱事即将爆发。我国的主力既然不在本土，那么怎样能够和德国的军队结成共同体呢？

拥护欧防体的人如何作答，我是知道的。比方说赫尔维·阿尔芳（Hervé Alphand），他的经历和脾性都使他不会向往乌托邦。要紧的是思想、原则、方案，而不是琐碎的条文。条文是可以在实践中逐渐修正的。纯粹的德国军队的大小强弱不是条约的条款所能长期限制的。军队的效率终将战胜外交官的折中妥协。在纸面上，欧防体仿佛是大西洋部队的一部分，而大西洋部队则由美国人指挥。从事后来看，谁会臆想欧防体会是欧洲防务的根苗，会一点一点地摆脱美国的指挥？直到现在我还难以承认，欧防体的失败是历史性事件，标志着欧洲人自暴自弃，情愿无限期地受美国人保护。

371

至于欧洲两个军事集团是否会凝聚起来，我倒不敢那么肯定。最好先回忆一下1958年1月争取文化自由大会所组织的一次辩论会。根据乔治·凯南的《回忆录》<sup>①</sup>，丹尼士·希利、约瑟夫·阿尔索普、悉尼·胡克、理查德·罗文塔尔、卡罗·施密德（Carlo Schmid）、丹尼·德·鲁格蒙和我都参加了会议。我还记得这一次圆桌会议，但还应以凯南的说法为依归，因为他肯定有会议记录。

G. 凯南在英国广播公司主持过一次里斯讲座。讲座每年

---

① 参看本章末尾的《回忆录》节选。

举行一次，主讲人都是声望卓越的人物。他发表了一个离经叛道的主张，声称驻德美军撤出德国的条件是苏军撤出东欧。美苏双方同时撤兵，便是这一次讲座的中心议题。除了宣读论文，他还提出建议，所提建议往往不无可以訾议之处。比方说，欧洲人不把军备扩充到苏联那样的水平，而准备游击抗敌，劝阻苏联人放弃任何侵略的念头。

凯南在他的《回忆录》里，摘录了我提出反对的两项主要理由。我当时说，局势的确不正常，甚至是荒谬的，但界线分明：谁都知道界线在哪里，当铁幕那一边有什么动静，这一边却风平浪静。欧洲清清楚楚地一分为二，看来不管对或不对，总比其他任何办法少一些危险。换句话说，含混不清的局面比不正常的局面更加危险。

372 当时，G. 凯南还在从事外交工作，他抱怨波恩和华盛顿当局言行虚伪，口头上自称以统一德国为宗旨，而事实上则很愿意维持现状。凯南的气愤直到今天还使我诧异。西方政治家没有任何办法能强迫苏联人容忍在民主德国的国土上举行自由选举。同时，他们认为从法律或政治上正式承认维持现状，就是承认苏联在离莱茵河 250 公里处驻兵既无必要，也没有好处。他们在原则上反对分裂德国和欧洲，但并不是不知道反对分裂恰好有助于保持分裂。几年以后，戴高乐将军极力想终止这种保守主义。我写道，维持现状一经承认，局势便会发生动摇，失去稳定。西德东方政策和《赫尔辛基协议》的后果，充分证实了我的分析。自从战后的欧洲疆土规划正式确定下来，德国人和施密特总理便把目光转向东方。

我和凯南辩论时，只说在两患之间取其轻：其一是分裂之患，其二是克服分裂的政策。我又说，我对于危险的估计，

“只这一次，竟然站在当局一边，而不站在凯南一边。真是十分意外，十分遗憾”。

我的第二条反对理由关乎苏军撤退的意义与美军撤退的代价。根据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教训，我觉得显而易见，苏联军队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撤出后，如果这个与自己有共同信仰的国家的政体危在旦夕，那么重新出兵是绝不犹豫的。凯南写道：“这条道理尽管与我的发言相反，对我触动却不大。因为就个人而言，我也不会同意双方撤兵，而事前没有确保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以及万一出事，应该采取什么制裁手段。但是，从事后来看，我不能不承认阿隆有了不起的先见之明。他提出的看法比事态早了10年。他所提出的正是勃列日涅夫的传统提法。373 1968年捷克局势十分紧张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自己也公开说过。阿隆说：‘我把俄国人的新学说，叫作神圣同盟。’”神圣同盟的含义是有权“无私援助”任何面临“反革命”危机的共产党政府。我在1958年讲过的话不太值得凯南的夸奖。有了匈牙利的经验，已经不需要什么料事如神的先见之明，就可以料到苏联的决心。叫我动容的倒是凯南竟会那么信赖美苏达成的双方撤兵的协定。协定绝对不会正式遭到破坏，因为总会有一个“工农政府”出来向《华沙公约》的同盟国求救。

尽管如此，但我今天重读在“里斯讲座”上的发言，发现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1949~1955年的美国的全部政策是受了欧洲人的启示。既然缔结大西洋联盟，自然就要组织欧洲的防务，然后由联邦德国重整军备，最后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的长期对峙，并保持德国的分裂和欧洲的分裂局面。抉择已定，绝无回头的余地，那么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以采取呢？

不妨再想一想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签订的日子：西

欧各国，有的战败，有的筋疲力尽，剩下一片真空。苏联也是战祸惨重，论理不会再冒险对美国发动一次大战。交战国中只有美国一国，不仅元气未伤，而且越发强大。这些道理虽然在当时很有说服力，但未能消除一切疑虑。苏联人强迫东欧各国采用苏联的制度，接受它的威权。既然这些国家望风披靡，为什么苏联人自己裹足不前？美国单方面正式宣布，并经国会批准给西欧以保证，难道还不足以让欧洲人放心，还不足以劝阻苏联人进行任何形式的侵略吗？事后的反对不太有说服力。我们可以想一想吉尔森的文章、戴高乐将军的讲话，它们都责怪《北大西洋公约》签字国的义务，特别是美国的义务，没有被足够明确地载入约文。请问批评公约的人，假如当时不签公约而发表一项正式宣言，那么诸公又会说些什么？

这些都是咀嚼过去，而起码的理性常识却往往被人遗忘：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政策，都是西欧人的光辉业绩。至于法国，尽管老打殖民地战争，但也参加了旧大陆波澜壮阔的经济复兴。能不能说这样一条欧洲政策是牺牲东欧各国，听任它们自生自灭呢？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欧洲人的消极被动不能归罪于《北大西洋公约》，而是因为美国当局不肯过问。正当匈牙利人以身作则，破天荒地进行一场反极权的革命时，法、英两国却去征讨苏伊士运河，这当然不会有助于美国的外交。然而，就算法英两国没有上演这么一出荒谬绝伦的闹剧，美国也八成不会采取另外一种态度。从1956年开始，美国当局尽管一味夸夸其谈，讲什么“解放”而不谈“遏制”，却已不考虑使用军事手段，支持在东欧反对苏维埃统治、持异议或揭竿而起的义民了。正如历次宗教战争后期一样，政治与信仰弄得难解难分：分界线以东，马列称王；以

西，则自由民主居尊。

我选中 1955 年作为形成两大军事联盟的关键年份。我也可以选 1956 年。在这一年里，匈牙利举事，法英出征，苏美勾结，至少在表面上勾结，两强各自整顿盟友。匈牙利人通过武力实现解放的希望完全破灭，英国则大梦方醒，从此不能再跻身于大国之列。

1/4 个多世纪以后，西方人是否追悔自己在 1949 年和 1955 年做出的决定呢？由此而形成的世界，至今还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如果再想一想“光辉的 30 年”，经济扩张空前，何苦还盲目地自怨自艾呢？30 年的成就，证明政治决策有当。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冻结 1/4 世纪以后，大西洋联盟的情况和西方的情况，都不会埋怨当时缔造者的功业。在大西洋彼岸是杜鲁门、艾奇逊、艾森豪威尔，在我们这边则是让·莫内、罗伯特·舒曼、阿登纳和加斯贝利。 375

有人会责备美国人，说他们在军事上占绝对优势的时候丝毫未设法“解放”东欧。但是，当时欧洲怕的不是自己的保护人消极被动，而是怕其穷兵黩武。除此之外，当前叫人悲观失望的事情绝不缘于冷战时期做出的抉择。越南战争、水门事件、苏联扩军无度、美国放松国防，都与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和联邦德国重整军备全不相干。

在英国广播公司“里斯讲座”的节目播出不久，我收到了 G. 凯南的一封十分友好的来信（是手书，他很可能已经忘记了），在此摘录几段：

我刚收到从国会转来的您对“里斯讲座”节目的回应，赶忙给您写信以表达深切的感激之情。我的几次演讲

有不少反响，您的评论思考最深，最为理性，最有渗透力；在我的相知好友中，只有您体察到了我演讲中的精髓；您探讨问题的方式也是我衷心期待的。

我不认为俄国人会从一次协同撤军中比西方得到更多的东西。从政治上讲，这是肯定的，至于军事力量，无论如何，他们是最强大的。

我认为，有一点应该达成一致，即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任何一方的军事力量，每次进入部分领土换防地区，并不意味着将其过去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也加以转让，就像今天这种状况。因此，我还设想，一旦发生苏联对波兰或匈牙利的军事干涉，美国必将立即返回西德。

我认为，西方很多人十分不了解俄国人，从他们对匈牙利的决策来看，这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

其一，美国在西班牙驻军和美军近在咫尺。

其二，危险不在于匈牙利人脱离了《华沙公约》，而是因为他们最终会申请加入大西洋联盟。

376 其三，对他们来说，事实是，俄国人已经有效地占领了国家，有一个合法的基础，而西方列强从未对其缘由提出质疑。因此，俄国人认为，威胁要脱离华沙条约组织就是对其占领权和政治军事威望的直接而公开的挑战。

为了达成一项协同撤军协议，这些因素至少要被大大压缩，大家可以想象到，在东欧拥有众多保护国的俄国人对这一地区出现的事变可能采取更为缓和的立场。

凯南随后承认，他给西欧人提供了一个军事组织的错误理念。错误之处不是关乎用游击队代替正规军，而是建议把民众



抵抗力量和预备役军人补充进正规军。

这封信的一段内容过去令我惊讶，现在仍令我惊讶不已。信中写到，俄国人将得到一些东欧国家的保护。欧洲没有美国军队，苏联人就不会对其卫星国的正统性持同等程度的担忧。在这一点上，凯南与我的根本分歧显示出来了。我认为，苏联领导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于此，他们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是扩张主义的。不言而喻，匈牙利（1956年）或波兰（1980年）出现的歧义，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没有华沙联盟的军事部署受到质疑那么难以接受。但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美国军队进驻欧洲，苏联人会适应其保护国出现异端邪说。依照我们对莫斯科寡头政治家的了解，我认为，这与他们的现实思想状态似乎相矛盾。

## 第十一章 20 世纪的战争

377 1944 ~ 1945 年，我选择了新闻业，但并没有放弃教学。我在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和政治学院教授一些课程，还到外国大学讲学，特别是曼彻斯特大学和图宾根大学，这都说明我对教学的怀念和遗憾。在 10 年流亡或者 10 年逍遥的岁月中，我总是想方设法不要跟哲学和社会学失去联系，而时局和自己的职业都不断鼓动着我的激情。法国和欧洲在纷纭汹涌的宣传声中的重建对于我而言是首要的。因此，我没有做到把《费加罗报》上的文章和“学术”著作彻底分开。我放任自己，流于浅易。我写了两本书，一本叫《大分裂》，另一本叫《连锁战争》。这是一种尝试，我想为正在形成中的历史搭配一门应用哲学，作为我每日每周写评论和表明立场时的背景和基础。

每逢重读或翻阅这些书的时候，我总不免有不快之感。我心想，我为什么听凭自己去写这样的东西呢？说实话，在那时候，这样的文章还不像现在那么洋洋大观。《大分裂》一书于 1948 年出版，在知识界和政界引起了一些反响，因为这本书粗略勾画出了世界政治和法国政治的轮廓。批评家罗杰·凯洛瓦（Roger Caillois）说，《大分裂》是三本书，或者说包括了三本书的内容，一是两强的全球对抗，二是马克思主义堕落为  
378 苏维埃主义，三是法国民主制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讲，著作本身便是教育。法国政局是借外交形势和思想分裂之光来照亮自己的。我想叫法国人懂得，法国虽与外界隔绝 4 年之

久，归根结底仍属于西欧这个整体，而西欧则属于安德烈·马尔罗说的大西洋文明。法国在世界史中扮演的角色，从本质上与它在欧洲事务中的重要角色不同，但我们的外交并不因此而变得无足轻重。欧洲不能没有法国，也不能没有德国，或者说得确切些，不能没有这两个就重振国力而言重归于好的国家。

我的警句“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大可能”击中了要害，尽管西方还有不少政治家至今不太搞得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或者说，由于“缓和”，他们认识不到长远的真相，我试引自己的话：“已经没有欧洲协调，只有世界协调。”（第 14 页）“政治舞台扩大了，国力所占的比例也就改变了。一个国家在欧洲是大国，在世界上只算小国。”（第 15 页）“德国哪怕能在几年内，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恢复统一，毕竟仍将是二流国家。”故而我把对德和解政策建立在理性上，并写文章为此呼吁。

外交领域已经扩大到全球，外交政策变成全面外交。“和平的传统观念意味着外交受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是国家逐鹿，筹码需有限度；另一方面是炮火声息，手段需有限制。今天，一切都成了问题。经济体制、政治制度、精神信念以及统治阶级的存亡都成了问题。一枪不发，一个国家可能由于共产党得胜而遭受失败的考验……今后，真正的国界划在原本团结一致的人们的正中间，一分二为美国派和俄国派。选举图和战略图难分彼此。”（第 19 页）这个形式把 30 年前已经复杂化的局面简单化了，但仍表达了部分真相：正是在各个国家内部，并不一定通过选票，共产主义与其敌对势力的斗争进行着。斗争蔓延至全世界，尽管世界上有些地区似乎比较稳定

(例如欧洲), 国家之间的冲突, 国家内部的争斗, 当然并不能全都归咎于两大国的对抗。1947 ~ 1948 年, 两大国在欧洲的较量可以说包括了其他一切争执。

“和平不可能”这句话, 并非仅仅因为有了全面外交: “不管有没有(共产)国际, 也不管有没有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共产党都代表了一种旨在开辟苏俄帝国主义道路的不断谋反。目标无限, 战争不断, 用这两个特征来定义莫斯科帝国主义, 本质上是指苏维埃, 不是指俄罗斯。只要俄国人民还被禁锢在愚弄谎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牢房里, 只要他们还像围城中人那样忍饥挨饿, 行动不得自由, 那么冷战尽管有起有落, 和平则仍然是毫无希望的。”

我又补充说: “没有和平, 不等于战争。每逢发现了从来无人知晓、从未派上用场的新能源, 照例会开辟一个军事艺术的新时代, 同时也就开辟整个文明的新时代。但从试验新武器到可以应用, 中间有一段距离……谁也说不清原子弹是不是绝对武器, 什么时候才算绝对武器, 也就是说, 单单用上它, 敌人就不得不投降。这便是为什么均势虽然靠不住但又不排斥长期拖下去的可能。”

380 这本书的最后两部分“法国的分裂”和“改革”比较容易引起宗派争执, 因为我明白, 表示拥护法兰西人民联盟也就是表示拥护戴高乐派。莫里斯·迪韦尔热 (Maurice Duverger) 在《世界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想从根本上证明我不是真正的戴高乐分子。他倒没有看错。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就申明, 作者党同伐异, 不是学者。迪韦尔热却说, 他认为《大分裂》是一部学术著作, 是一本当代政治社会学教科书。他又说:

“在阿隆身上，党派气息远不如学者气息浓厚。他是杰出的社会学家、蹩脚的党徒……他不仅缺乏耍赖的本领，而且缺乏信仰。”

这是批评还是恭维呢？我说不好。我什么时候向往过党派活动家的本领呢？事后来看，能不能说事态的演变已经证实了迪韦尔热主要反对的东西？他问道：民主的戴高乐主义有没有可能？在他看来，我写的书无非想证明，温和的戴高乐主义是有可能的，但他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在有一点上他是对的：一个政治运动的风格比什么纲领都更能体现这个运动的真实性质。将军本人的戴高乐主义和《大分裂》一书中的戴高乐主义，中间就那样隔着一条鸿沟吗？也许是的。但从定义上讲，享有特殊威信的领导者的风格与评论家分析的风格并不一样。法兰西人民联盟垮了台，争议仍无定论。然而，1958年将军上台时已没有人民联盟，以后的体制倒很像温和的戴高乐主义，而政治学家迪韦尔热却预先将它断定为不可能，并且认为戴高乐主义只会步步升级，直到威权主义的极端。

我在书的末尾“知识改革”一章的最后一页上写道：

经历过 [1948 ~ 1950] 危机，人们将重新发现法国问题的基本前提：法国不会屈从于一种威权制度，尽管在我们这个时代，威权主义制度多少会蜕变为极权主义制度<sup>①</sup>，但是，法国如果自甘陷入多党制的无能和混乱之中，那么国家将一蹶而不能再振。国家的复兴、政府的稳

---

① 这种说法有必要采取各式各样的保留，顾及细微的差别。

定、行业机构的限制、行政技术的改良、经济的专业化管理，凡此种种改革，尽管没有一项能叫人耳目一新，也没有一项能够单枪匹马，却把我们向目标推进，去实现一种温和而有威权的政体。<sup>①</sup> 国家应该强大，但不能没有限度。政党和工会应该自由，但不能掌握大权。议会应该立法和监督，但应该放弃行政。经济应该有方向，但不应当是管制经济。

直到1981年，第五共和国倒有点像这个“乌托邦”了。如果法兰西人民联盟得胜了，会不会得到相同的结果？谁也无法得知。但在1948年，我们就可以想到，有一种温和的戴高乐主义起来接替第四共和国，“它在它现在的形式下……有长生不老的本领，而没有除旧布新的能力”。我们还该说，1958年的宪法经过1962年的修正比我原来想象的宪法要彻底得多。可以说宪法本身就带动了我指望的某些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将军一执政，再没有一个人说怕一党专政了。

我在伦敦的《自由法兰西》上表达过担忧，甚至将人民联盟与波拿巴主义相提并论。我说：

法兰西人民联盟是属于波拿巴运动类型的。从拿破仑一世，经过拿破仑三世，一直到布朗热将军，法国在19世纪，每当议会制弄得国乱民愁而又没有可能恢复帝制时，便会出现这种波拿巴运动。现在又一次看到，人

---

① 不知是我还是排字工人，在书中把“温和”写成阴性，那就变成了温和的威权。其实在我的思想里，温和是形容政体，而不是形容威权的。

民围绕着一人联合起来，而这个人政治轨迹是从左到右，先恢复共和国，然后集合自己的队伍，组成议会内右派的多数。但是，人民联盟和 19 世纪的波拿巴运动不一样。人民联盟有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当领袖。戴高乐将军已经执过一次政，尽管犯过些错误，管理经济和后任比起来，既不见强也不见差，但他对法与权，等量齐观，一并关心，不分轩轻。他没有议会活动家的嗜好，不爱他们那股钻牛角尖的劲头，也不喜欢无限度、无定规的权力。他设想的制度是近似总统制的民主制度而不像专制制度。

A. 法布尔 - 鲁斯责备我是伪君子，投靠伪装的法西斯。我认为这样来责备我，至少应该说是过火的。我的书中有一段，归纳和简化了我对当代史中关键问题的看法。我说：

针对共产极权主义的威胁，法西斯分子除了采用反共极权主义以外别无他法。他们用伸张国威来代替解放无产者的神话。帝国的幻梦做得把世界抛进血渊火海。嘴里说要团结欧洲，而实际上却分裂欧洲，将其弄成一堆断垣残砾。就算戴高乐派也想来这么一手，他们也不可能再搞一次法西斯，因为各国人民已经不会再受民族激情的鼓动了。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1945 ~ 1946 年，整个西欧都在发问：能跟共产党人一道治理国家吗？到了 1947 年，大家又问：能不跟共产党人一道治理国家吗？到了 1948 年，大家提出：怎样才能在和他们对立的情况下治理国家？

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后任执政者都在表面上反对共产党，而对苏联则不免有点迁就。由于一阵一阵地吹反美风，迁就苏联便显得格外突出，再者与此同时，共产党正在西欧的冷战中吃败仗，至少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的战线上吃败仗。

《大分裂》一书于1948年出版，那时候，反对第三帝国的大同盟还没有最终破裂，关于《北大西洋公约》和中立主义的争吵还没有开始。《世界报》由莫里斯·迪韦尔热署名，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我赞扬备至。<sup>①</sup> 我不胜惊讶，而疑虑并未打消，真不知道这种新闻哲学还有此等功劳。他说：“……所有困扰当代人的基本问题——不论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都在这里被赤裸裸地提出了。一团乱麻般的前因后果，以严格到几乎苛刻的清醒明晰都给理顺疏通了。但愿公共舆论最终会经常引用我们对时代的总结，真正地解解毒，开开眼界。因为在说法上自相矛盾、在骨子里也同样荒谬不通的口号，已经蒙蔽了公众的双眼。”

我冒昧再摘录两封信，因为它们都来自当今的两位思想泰斗。他们两人各自在信中表达了法国知识界两种对立的反应。一封出自亚历山大·柯瓦雷的大手笔，他的精神威权和知识威权并驾齐驱。我从这封信里，摘录一段如下：

多谢您的大作《大分裂》。我们俩都读得兴趣盎然，不忍释手。趣味纯粹是知识性的，因为您对欧洲局势的分析，尤其是对法国局势的分析实在不怎么有趣。人们不禁要问，（欧洲）战役是否已经不战而败？在苏联的

① 赞扬的是学者而不是党派活动家。



欧洲面前，我们可怜的欧洲是否还有一线生机？为什么欧洲是苏联的？因为人们不能不看到，20年后，所有卫星国都将成为苏联整体的一部分。正因为想抵制这个计划，所以季米特洛夫才沦落为离经叛道，铁托才走向分裂。我们这个可怜的“大欧洲”，本来应该同仇敌忾，锲而不舍，发挥人力物力无穷无尽的优势，而结果居然弄得四分五裂，畏首畏尾。内则让共产党第五纵队钻进心脏，兴妖作怪；外则兵戎相见，国事瘫痪，大中小国彼此明争暗斗。国之“俊彦”，疲软荒唐，愚昧浅薄，这样的欧洲难道还有什么幸存之望？我欣然看到您对我们的朋友说了几句真话，对《精神》杂志社的朋友，对《现代》杂志社的朋友，对亲爱的梅洛-庞蒂说了几句真话，他是要一举而百废齐举。您对一帮蠢材也说了几句真话。这帮人，叫他们蠢材可以，叫他们“善人”也可以，反正，他们那本《选择之际》<sup>①</sup>倒给我们提供了有点意思的选择……

有人分析，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或充当同路人到底动机何在。在他们看来，“入教要人走红的教，好处大得很。走红的教门，既能降福布施，又能赏赐神俸神禄。还有……人是一种有信仰的动物，尽管如此，亚里士多德除了思考，什么都不厌恶。正如我们的朋友约里奥·居里曾经对我的另一个朋友说过：‘入了党真妙，再也不用思考了……’除此之外上帝也好，开天辟地的英雄也好，历史也好，难道不是都

---

<sup>①</sup> 《选择之际》论文集最近才问世，署名的人有 L. Aveline、G. Friedmann 等人。

站在斯大林一边 (上帝是永远站在芸芸众生一边)? 因为从 1918 年起, 就有人千方百计地用最辩证的手段来挽救他, 推崇他”。

吕西安·费弗尔没有看过我的书便写信给我, 据他告诉我说, 这是因为第 8 页上有一句话伤透了他的心:

您说, 美国的影响, 既不包含同化问题, 也不包含帝国统治问题。哎! 我们的“法国文化”可怜哪!“美国的影响”那样蹂躏它, 围攻它, 追击它, 我们多么想跟您一道行动。还需不需要申明, 这是出于信仰还是出于希望?

384

数到今天, 已经 3 个年头, 不管教科文组织召开什么国际会议, 我们法国人都不能不抵制“我们的美国朋友”横蛮的旨意。在科学方面是这样, 在文化和教育方面也是这样。现在已经三年了, 我们一直让美国的政策挡住去路。这种政策前后一贯, 有条不紊, 要消灭我们的语言文字, 扼杀我们的思想见解……当然, 您讲的摩尼教那种善恶分明、水火不相容的想法, 在我的心目中才是今天最危险的东西。正是它把世界弄得岌岌可危。若要有效克服这种偏见, 那就一定得正视这两种祸水, 它们归根结底是不分轩轻的。只要是法国人, 只要能够意识到什么是法国, 那就应该同心同德, 起来同这两种祸患搏斗。我说这些可没怀什么政治偏见……尽管很不幸, 但我不能不深信, 绝不是在一条战线上, 而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如果还来得及的话——方才能够在世界上救出一些精神自由和有批判力的智慧。

吕西安·费弗尔早年服膺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也就是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搞的茹拉联盟所标榜的东西。他的为人处事恰恰与斯大林分子相反。像他这样的人说“这两种祸害，归根到底不分轩輊”，那就有了重大意义，起了象征作用。在许多法国人看来，“美国的因循守旧”和“斯大林主义”彼此彼此，不相上下。教科文组织在战后头几年的确唤起过并且培养过反美情绪。我在 1950 年参加过一次教科文大会。一个知识分子眼看着法语和法国文化每况愈下，不免凄惶痛心，而这样走下坡路，哪怕没有“美帝国主义”，也在劫难逃。吕西安·费弗尔的反应体现出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情。这到底是肤浅的反应，还是深信不疑呢？反正，我国大部分学者和科学家都是战后在美国进修或转业的。一年之内就发生布拉格事件和马歇尔计划两件大事，难道还能把两个超级大国或把两条战线视为一丘之貉吗？

上面摘录的两封信各自提出了要害问题。一个是外交问题，另一个是文化问题。除此之外，我还接到了许许多多称道赞许的信和文章。所有拙作都从未受过这样的重视。我至今还在思忖，这样过火的夸奖到底理由何在。部分理由在于当时出这样的书，越走运，就越红不了太久。有人说这本书是长达 347 页的“政治总和”，有人说是“哲学家和新闻记者的鸿文巨著”。这些评语也许说明了这部书潜在的雄心壮志。在 1948 年，这样的综论正好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因为当时的公众还不太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后果。到了今天，我谈过的那些问题都还有人重新论述，作品之多，浩如烟海，拙作被挤了下来，成为一本时政读物。

385

我在《大分裂》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书中既没有 20 世

纪战争的理论，也没有极权政体的学说，既没有议会民主的理论，也没有资本主义演变的学说。”我还补充说，希望另用比较严谨的方式阐释这些理论。果然，过了几年我就进行了尝试。1951年出版的《连锁战争》，就包括了我在1948年预告的那些理论的轮廓。

这部书的头两部分被命题为“从萨拉热窝到广岛”和“历史的十字路口”，用意无非在于借用孔德和库尔诺（Cournot）的笔法，对20世纪过去的50年做一番哲学上的评解。为什么1914年的欧战在开始时和历次欧洲大陆上发生的战争没什么两样，而后来却发展成为一种超级战争，正如费雷罗（G. Ferrero）说的那样？新的科技怎样出其不意地把文官武将搞得手足无措？在自由资产阶级时代，现代社会竟在国家的领导下把自己全体动员起来，整整好几年，把武器和军火供给几百万战士。1914~1918年，欧洲逐渐经历了总体战争和物资战争。马恩河之败，德国人深入国境，双方对等的兵力，凭借战壕，长期对峙，杀戮之惨，罕与伦比。仅为几公里地的得失，甚至一里地的争夺，往往在枪林弹雨下，杀人如蝇如蚁。

第二次世界大战越打越大，却遵循了另一进程。从1939年到1945年，希特勒初期的战果使战火蔓延到全世界。1918年，是战车帮助盟军取得胜利。1945年，则是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尽管20世纪两次大战的发展进程不一样，战略战术作风不一样，但结果很有相同之处：一是穷兵失控，二是踏平战败国，三是累积结果即改写世界地图。

A. 汤因比和 A. 蒂博代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做过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欧洲各国的共

和制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结束了欧洲的优越地位。欧洲以外的国家则跃居首位。其中一国自称信奉 19 世纪的一种意识形态，师尊为德国一个知识分子，此人出生于一个改变了信仰的犹太家庭。另一国却忠于启蒙时代具有英美色彩的哲理。苏联与美国都要求继承欧洲的遗产。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显得难以避免。它们一道在旧大陆国家的尸体上取得了胜利，虽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研制成功，深刻地改变了战争的实质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这本书的其他部分讨论现在的局势，也讨论前景。我致力于分析将会发生的情况，汲取了以往用来说明前半个世纪的研究方式。这一尝试是有雄心的，可惜很难成功。观察了过去，我尽己所能，想辨明哪些是必然的，哪些是偶然的。我转而观察未来，同样的区分一律变成了问号。主要的问题是在第 19 章提出来的：冷战到底在准备打总体战，还是可以代替总体战？我倾向“代替说”。迄今为止，历次事实都证实了我的看法。不幸的是，我没有满足于分析冷战的规律和西方采取守势的战略，偏偏用百来页的篇幅，谈论欧洲能否重新振作起来，团结自卫。我分析来分析去，搞得尽是一些深浅浓淡上的微妙差异，对未来则不厌其烦地强调缺乏把握，把读者弄得相当失望。

在这本书的末尾，我又添了几章，其中一章（讨论“极权主义”）深得汉娜·阿伦特的欣赏，这一章内容也许正是她启发我写的。反正，书越写越厚。有几章内容被我命题为“中原之鹿”，更加突出了这种感觉：书是一篇篇文章凑出来的，编排得既不明白，也让人不大看得清其中的一致性。所以，我今天可以不太保留地同意我的朋友马奈·斯佩尔伯在一

封信中对我做出的批评，也可以同意莫里斯·迪韦尔热发表在《世界报》的一篇文章对我的批评。他说：“说实话，这不是一本书，而是按编年体汇集拢来的文章集。可是，这里用编年体并不合适，而且和你的主要论点是矛盾的。<sup>①</sup> 不然的话，你绝不会这样重复……我的好朋友，你的傲气几乎赶上了我，可是这一次，你简直低估了自己，屈从了新闻记者的规矩。你讨论的东西，都是新闻记者最多只能报道而不能拿来教导人的……”这样严厉的批评却另有补偿。宽容的话比批评的话多得多：“书中第一部分（共497页），特别是第250页，以及第三部分第二节（‘欧洲束手’），都十分精彩，用德文来讲，真是一个时代认识了自己。还有第247页，那真是出色的报纸文章、今天的杰作，但显然是老调重弹，强调过头了。”

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文章在当时很叫我不高兴，今天看来却显得很有道理。他说：“从技巧上说，《连锁战争》这部书叫人联想起克洛德·莫奈画的那幅《睡莲》。莫奈拼了命想把光的浓淡深浅全都表现出来，分析光的五光十色，如晚霞，如彩虹，瞬息千变的光和彩，连难以捉摸的反射也不放过，结果只见金光闪闪的雾气，事物的基本状貌反而融化于其中，被冲淡了、隐没了。雷蒙·阿隆始终坚持削弱原始的肯定，一而再，再而三，拿一条又一条知识的带子，把原先肯定的也捆绑起来，结果弄出类似的效果。”<sup>②</sup> 他对有些章节讲的恭维话，我就不谈了。

这本书在美国不仅受到了重视，而且还相当受欢迎。1980

① 我不同意这一点。

② 文载于1951年10月21日和22日的《世界报》。

年秋天，我听说美国一家出版社打算于再版时换一个书名，叫作《总体战的世纪》，这倒大大出乎我意料。这也许比法文的书名稍微通俗一些。亨利·古耶（Henri Gouhier）一向对我很有感情，这一次仍然十分友好地写信给我说：“我觉得《连锁战争》更加具体地说明了尊作《历史哲学导论》一书的内容。论述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篇章以及书尾几个段落，体现出前后两部著作是一脉相承的。”他又说：“我阅读孔德的书，弄懂了‘历史分析’一词背后的全部含义。这就是我在大作中学到的东西，可是笔下精辟，不受三阶段法则的约束而怀先入之见。”

我们从30年战争中得出的理论概括，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表述的列宁主义理论是对立的。我书中的第一部分，标题为“从萨拉热窝到广岛”，我并没有把这两种对立的理论作为讨论的中心，也没有作为写书的目的，而只想就一桩特定的事例，说明我在《历史哲学导论》中阐发过的一些想法，一些关于历史决定论的想法。反驳列宁主义的论点是在分析过程中逐渐搞清楚的。20世纪的两次大战都刻上了交战国社会本质的烙印，而战争又反过来改变了社会。然而，两次大战的内在原因、发动战争的导火线，以及两次大战的赌注和彩头，都不在于资本主义大国在经济上的争逐。 388

我在这部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都阐明了事实经过的偶然性。日期、形式、细节一概都有其偶然性。同时，我推论出“内在的原因”或者“全盘条件”，会使事件大有可能发生，但不是非发生不可。至于在什么时候发生，那是无法预见的。这种事件与已经发生的事件，是可以比拟的。“外交失

误”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当时的国家执政者没有一个人直接地、有意识地要打仗。而科技方面的意外因素又延长了战争。原来，交战国双方一直认为，战事几个月就会结束。没想到守势方对攻势方取得了暂时的优越性，战况变得胶着，工业动员和全民动员竟把仗越打越大，革命运动由此产生，欧洲各国人民也全都打得筋疲力尽。

389 如果考虑到两次世界大战不过是一整套东西里一些不同的成分、同一斗争中的不同片段，那么人们便不会只援引“永恒的德国”，而会考虑这场悲剧的因果关系，也会考虑暴力本身具备的能动性。任何一无论，比如片面责怪德国人民、谴责资本主义，都是幼稚的。从历史观点出发，这种理论很像古代以神话代替科学，因为那时候人类还弄不懂自然界力量的作用……历史的意义充其量是根据当时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事后指出最主要的概况，但从来无权宣称事件的结局是可预见的。一场局部战争由于对均势外交的运用，变成了一场欧洲战争，又由于工业、民主及双方兵力大致相等，越打越大，直到绷断欧洲这根链条上最弱的一环。革命冲进了帝俄。欧洲君主的宝座，连同由许多民族组成的最后几个帝国一齐崩颓。资产阶级民主的欧洲，还有好些独立的欧洲国家，身旁贴着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竟想回到1914年以前的世界，并且硬说那才是正常的世界。1929年的危机炸崩了经过惨淡经营、勉强恢复过来的货币经济体系。失业打开了闸门，革命运动激起了德国群众的狂热。于是，欧洲成了三种对立思想的逐鹿场所，加上国与国之间传统的明争暗斗，事态



只得很快滑向一场滔天浩劫。德苏同盟于 1939 年打响了浩劫的头一炮，接着便瓜分波兰。这一次，战火席卷全球，同时煽旺并且扩大了另外一场从 1931 年起，或者说，从 1937 年起便在进行的中日战争。6 年后，战火熄灭，而欧亚两洲已成焦土。第一颗原子弹震天动地的巨响还没有完全静下来，两家真正的胜利者已经各自腰佩横剑，准备算一算总账了。这一段历史如此一目了然，而当时竟没有人料想到，事后回顾，倒仿佛有点不可思议。然而，今天更要紧的是，要根除那种把事情当作命中注定的幻想。30 年来，已经有过好几次，人类的命运仿佛悬在空中，可以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马恩河一战，几个兵团之差便会改变战局。法国覆灭后，不管俄国和英国采取什么政策，如果德国完全战胜了西方，二战大概会缩短。欧洲在 1870 年和 1871 年还不知道打超级仗。如果上面的假设成事实，欧洲就会依然不懂得什么叫超级战争。

更加清楚的是，如果在俄国革命前夕，一种折中的和平得以实现，就会体现出双重的远见：一是德国认识到，单靠奥匈臂助，以兵力制服全欧洲是办不到的，二是盟国也意识到自己无力压服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不再注定要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局面之所以显得命中注定，在劫难逃，那是因为各式各样的蠢事和坏运气都凑在一起，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英国人抬出拿破仑的阴影，其实晚了一百年，那是因为庞加莱恶狠狠地捍卫法国的权利而不重视制裁的经济后果。法国外交对于魏玛共和国，既爱吹毛求疵，又显得专横粗暴。如果能够肚量大一点儿，大家一道把破碎的欧洲重新建设起来，那

就会合算得多。面对一个只懂得武力，只下决心使用武力的德国，欧洲又显得软弱懦怯，甘心逆来顺受，尽管希特勒执政以后，仍然有好些机会可以转变命运。1936年3月，如果动兵制止德国军队开进莱茵区，至少也会使事态不至于那样急转直下，弄得好，甚至能促使希特勒政府倒台。英法两国如果在1938年进行了抵抗，德国反希特勒的将领也许会付诸行动。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我不太相信。在战争期间，英美不妨和反希特勒的势力维持联系或取得联系，设法打败德国而不予毁灭，不要把仗打到头，把战败国完全消灭。因为灭掉了战败国，盟国之间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盟国既然靠不住，宽恕敌人从来都是最英明、最稳当的手段。这是马基雅维利给我们上的最出色的一课。

我用同样的笔法，粗描出一系列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借用库尔诺的话)这就产生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这部拙作。书中说：“繁星般的时局结成星座，正处在三道交叉点上。第一道通向全球统一和外交两极制；第二道走向世俗宗教，传播到亚洲和欧洲，而两强之一自封为这门宗教的发祥地；第三道通向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制成投产和总体战争。鼓舞总体战的，既是现代科学，又是原始人的狂暴本性。冷枪手和原子弹，都像是无限暴力的极端形式。”我又说，上面讲的两条道，都包含了一部分逻辑和一部分偶然。若要解释，就得采取克洛德·莫奈的手法——这是迪韦尔热的话。我能明确社会的深层力量，但对于或远或近的事态演变，我就左右为难，举棋不定。

安德烈·卡安（André Kaan）向我书面提出一连串完全属于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的是怎样解释历史决定论。这些问题旨在阐明事后思考和事前查勘二者之间存在差距。我把信中的话摘录几段，因为值得摘录，同时也出于对一个当代最纯正的人物的怀念。安德烈身材不高，外表瘦弱，并且有点病恹恹，动作和言辞都有点笨拙。他参加抗敌运动，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押往集中营。他的哥哥是抗敌积极分子，也落得同样的下场。盟国胜利后，安德烈幸免于难，而他的长兄却死于伤寒症。他们兄弟两人根本不知道打什么政治算盘，心里只有道义，自私、卑鄙的念头连影子也没有，真是哲学在战斗中的理想化身和典范。他们兄弟二人中，我和安德烈比较熟识，觉得他有一股子圣贤气息。我在这里引他一段话：

我觉得在贵作中发现的东西，就是对历史的必然性这个问题不能做统一的答复。因为要看从什么角度对待这个问题：是从现实出发，还是从形式出发。您也许不一定同意我这种看法。从现实出发，毫无疑问，任何必然性都是具体思想抓不住的，稍微有点理智的思想也抓不住它。而历史的目的和宗旨——如果这两个词还有点意义的话——对我们来说和在开天辟地时一模一样，仍然可望而不可即。然而，人们没法不认为，冲突的方式从相当早的时候开始，已经遵从不可避免的必要性，向着总体战的结局发展下去。如果像您说的那样，马恩河战役促生了总体战争，但马恩河战役如果结局相反，那就会推迟总体战的到来，而国防政府试图舍命抵抗，却可把总体战提早几十年。

安德烈·卡安在这一段话中似乎把偶然性限制于日期上，换句话说，限制在事态发展到必然结局的日期之上。

然后，他不认为偶然性是许多系列历史的产物。当然，科技进步是一个系列，西方社会民主化是另外一个系列，二者不相为谋。他说：

392 ……上文有了交代，剩下还有这个问题：如果两个系列原因朝同一方向起作用，如果两个系列中的一个系列能够单独导致两个系列配合起来所能达到的结局，那么，不相为谋的原因的独立性并不能确定偶然性的结局。事实上，科技的进步似乎确实具备足够的自主权，以致人们完全可预见它的发展方向，肯定它从总的来说是不可逆转的。此外，两个系列是相互助长的……简言之，从大作中可以看出，尽管每一特定事件的偶然性使结局的迟早和程度深浅都没法确定，但是，国际争端都朝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则是服从总的必然性支配的……我想征求足下同意的是，20世纪初，凡是能够限制使用暴力的因素，是否很可能被看作过去仅存的一些残余，迟早要被完全消灭。

卡安信中最后一段话是面向未来说的：

面向未来，如果没有把握，那就很难限制总体战争。在这里，我还是担心再一次碰上一对矛盾，一方面是我的哲学意识启示我做肯定的答复，另一方面则是目前星座般繁杂的各种现实条件。

接着，安德烈便一清二楚地指出，我的书到底叫他担心些什么：

人们能不能让绝对意志为相对真理服务？……我寻思，我们这个时代如果在发展进程中越来越多地接受社会主义，会不会越发冲淡希望，越发冲淡对于自由事业的信念……实际上，最理想的是把社会主义和世俗宗教拆开来。社会主义只算一整套专门管理经济的技术。这种理想的可能性已经由英、苏对立予以证实。但是，我仍然担心，极权主义竟然对相信社会主义学说的人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是否别有深刻的原因，是否因为这种学说在思想上和在感情上特别引人入胜？

他写道：没有社会等级的多元化，就没有价值观的多元化。他的结论是：

穷苦无告的无产阶级，不平则鸣，向奴隶世界发出号召，而就在这时候，哲学家却力图把两件事合在一起，这真叫我百思莫解：一方面是要要求在无穷无尽的生存方式中进行选择；另一方面则是拒绝异化，仿佛异化不是从对生存方式的选择中产生出来的……不管怎么样，只要社会主义忘记了自己是社会先于国家的产物，那么，社会党就会一直束手束脚，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感到自卑。

这些想法很有道理，可以说指出了我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正如上文已加分析。各系列的原因与事件的偶然性二者之间的

区别，是否同样可以用于事前的勘察和事后的思考？这到底行不行？反正我办不到。而批评家没有重视全文，只评论某些章节，并且各有取舍，莫里斯·迪韦尔热抽出几章内容，说是“非常出色的分析”。这几章内容是：论共产主义的改变，论工党的演变，论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马奈·斯佩尔伯则喜欢另一部分，论“欧洲束手”。我都不同意。在我看来，开头两章“出人意料的技术”和“战争的能动性”远远胜过其他章节。有一个出色的读者是同意我的，名叫让·杜瓦尔。

差不多就在那时候，我为《原子科学家通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半个世纪的有限战争》。发展到了极限，冷战便出世了，两个超级大国明争暗斗，同时把一个历史性问题提了出来：核武器的革新（正如安德烈·卡安在他信中提出的）会不会在最低限度引起一种突变，使极端的暴力下降为有限的暴力？而下降的代价是，暴力的扩散和经常化。传统的和平消失了，总体战争也没有了。

历史哲学启发了两本书。其实，历史哲学在马克思和斯宾格勒之间徘徊不定。这里与其说马克思，还不如说圣西门。战争固然是由国家的激情引起的，这种激情搞垮了奥匈帝国，煽动了日耳曼群众和希特勒本人。但是，养成 1914 ~ 1918 年战争的妖魔的，毕竟是工业动员出来的生产力。正是这种生产力保证了美国在日本帝国和希特勒帝国崩溃之后掌握了世界霸权。科学本身是技术的基础，正是科学，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插进了一个新的影响因素。

全球技术化这一论点，既来自圣西门和马克思，也来自斯宾格勒和海德格尔。这个问题战后就被提出了，现在仍然是一

个问题：技术革命的前途如何，技术革命将如何决定西方的命运？在马克思的思想里，科学本身便是生产力。一旦资本主义为它自身的矛盾所毁灭，科学便将开创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斯宾格勒的想法则是，技术勃兴将使城市增多，民主发达，群众或盲从之辈数量增加，同时，文化形式解体。我对这两种哲学观点一个也不同意，并于 30 年后，针对它们写了《为衰落的欧洲辩护》一书。开明的哲学，谦虚而有自知之明，既不会像普罗米修斯那样骄傲，也不会陷入生物命定论；既不会认为有了胜利的把握便万事大吉，也不会发出一声绝望的嚎叫，就此盖棺论定。所以，在科技革命问题上，既不能凭推理而一味乐观，也不能一味悲观。

书中有一章内容谈欧洲的前途。我在这章的末尾几行，预测欧洲的各个帝国都到了末日。我写道：

缺乏为集体创造的空间，有如人缺乏氧气。只要俄国军队的驻地只离莱茵河 200 来公里，西欧就觉得自己有窒息的危险……不论是经济进步，还是思想交流，西方人是不怕在这些方面无所作为的，因为西方人人数虽少，可是地位优越，手里掌握的生产资料和技术知识远远超过其他人……欧洲人要卓立千秋，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完全不需要统治什么殖民地，划分什么势力范围……欧洲人该害怕的，不是帝国解体，而是新独立的国家仇视它们的旧主子。

我毫不留情地谴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我说：

我们引起了（或者说没有能够避免）我们最该担心

的事情，即对共产党在印度支那领导的抵抗运动打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越共不仅领导抗敌，而且联合了绝大多数的民族主义者。从一开始，我们便有两种办法可供选择：一种办法是痛痛快快地答应胡志明提出的主要要求，即同意印度支那独立，三国联合，大体上参加法兰西联盟；另一种办法是，如果我们认为没法跟胡志明打交道，那就促成一个国民政府，把我不肯给斯大林代理人的东西基本上交给这个政府。可是，我们并没有下决心选择一项政策贯彻到底，而是一味地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我们承认胡志明是民族抵抗运动的领袖，并于1946年和他进行谈判。我们正式接待他，但是，一方面由此提高了他的威望，另一方面却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我们在玩弄两面派手法。我们应该希望印度支那独立友好……也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度支那获得了独立，也许会由共产党统治。但从法国本身的利害得失来看，无论怎么样，总比打仗所失要少。

下文又说：

法国连保卫国土的本领都没有，却去浪费国力，铤而走险。严格地说，就全世界的反共外交而言，也许可以解嘲说说，但拿法国的国家利益来说，那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

我在伦敦发表过言论，毫无保留地议论印度支那问题：我希望法国同意半岛三国一律独立。1946年12月16日，战争



爆发，我在《战斗报》上写的一篇文章丝毫没有隐瞒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书中另有一章就引用了这篇文章。

从 1949 年起，主要从朝鲜战争开始，法国陷进了罗网。昨天，美国人还在批评法国，现在忽然又支持法国。法国与属国和保大结下了不解之缘。除非迎头一棒，一战而溃，否则，我们已经没法扔下越南的军队不管，因为这支军队本来是我们创建、组织和装备起来的。从 1950 年边境兵败开始，第四共和国的历任政府便没法再存幻想，而只想寻找机会撤兵。政府派让·德·拉特尔·塔西尼到印度支那去，本来想他打一个报告回来，让政府彻底转变政策，如果做不到，至少也可以稍做改变。

可是，戴高乐将军却没有让政府的事情好办一些。他派了一个神父兼海军上将乔治·蒂埃里·达尚留去印度支那当总督。这位仁兄抱怨将军们“不肯打仗”，并秉承巴黎的指令，成立交趾支那政府，而就在这时候，G. 皮杜尔正在枫丹白露与胡志明谈判。1949 年 11 月 14 日，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法国应该留在印度支那。留下来是为了印度支那，因为没有法国的援助，印度支那便很难独立，很难安全，很难发展。而且，时间过得越久，越能看得出印度支那事件不过是全局的一部分。其实，问题在于亚洲能否保持自由。既然自由世界该跟自由的亚洲协作，我看不出法国凭什么不跟印度支那合作。”

396

1950 年 3 月 16 日，他又表示，1945 年就派远征军去印度支那，那是他决定的，应该归功于他。法国军队不去，胡志明就会得胜，“胡志明的印度支那就只能从属于众所周知的欧亚体系。所以，法国和法国军队必须在印度支那呆下去。为此，必须有行动的手段”。他甚至补充说，全仗法国军队

被派到了印度支那，“法兰西联盟才在全世界心目中成了实体”。

次年6月22日，戴高乐又列举了四种军事解决办法。他说：“可以撤退，也可以仅仅守住几处防浪堤。这些都是失败的办法。至于我，我都不接受。”第三种办法是第四共和国采取的办法。第四种办法则是“增派人员和装备……只有具备这两种条件，我们才能用武力彻底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戴高乐将军难道当真相信武力解决吗？真是这样，那他的错觉简直不可思议！

当然，在一切问题上，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我从未犹豫反驳将军的论点。至于赞成“胡志明方案”，我更是不假思索。因为1946年我跟安德烈·马尔罗在新闻部共事的时候，老听他对我说：“要用10年和50万人，才能恢复法国的统治。”勒克莱尔·奥特克洛克将军也同意这一看法。其实，马尔罗还太乐观，10年远远不够。这是事实证明了的。再者，我也从来没有听见他宣传印度支那战争，而只用一些不用争辩、顺口溜式的词句来应付相关话题。例如：“如果政府选择打仗，就该给远征军提供必要的物质手段。”

就在这个年代，我已经在酝酿一本书，后来名叫《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另外，我还写了好几篇文章，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式，分别是：《历史社会学关于紧张与战争的观点》《对外交事务的分析》《若干历史比较》《论没有胜利的和平》《寻求一种对外政策的学说》《在原子时代，能限制战争吗？》。<sup>①</sup>

<sup>①</sup> 所有这些文章，都汇编在《政治研究》一书里面（伽利玛出版社）。

从《大分裂》和《连锁战争》两本书中的历史分析，到《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一书中抽象的或一般的看法，这些想法可以说是做了桥梁。

头一种想法屡见于上述几本书中，本来是答复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或者是以这方面问题的专家自居的人所发表的论点的。他们说：“战争是在人的思想里开始的。”<sup>①</sup>我不同意那些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家、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而主张深入研究，应该以这样的战争作为起点，即战争是“两个政治上独立的单位之间的武装冲突，用的手段是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而目的则在于推行一项部落政策或民族政策”。这种特定的现象是任何文明中都有的，尽管形式很多，但都可以认得出来。换句话说，我是主张搞历史社会学的。

我列举了六个问题，答案则该由对外交事务的分析来提供。前三个问题属于一类，都是政治家随时该想到的：什么是外交的活动范畴？在这个范畴内，力量关系是什么模样？各国政府根据什么样的战争技术，来估计各种地位和各种关系的重要性？

我提第一个问题，显然是出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经验。执政者或军事领袖把人民带进 1914 ~ 1918 年的大战，但并没有想到美国会变成主角之一，更想不到它会是全剧的主角。法国在欧洲及其属地的有限范畴内是一个大国，但在全球范围内，却算不上大国了。 398

第二个问题来自外交范畴的两极化。这是第三帝国灭亡以

---

<sup>①</sup>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也会叫人误入迷途，认为心理作用和教育能够消灭战争。

及日本“共荣圈”被消灭后才产生的两极化。19世纪的欧洲集体，或者是1914年以前的20世纪欧洲集体是建立在大国多元之上的，彼此的实力不相上下，合纵连横便可防止一国独霸天下。回想当年的欧洲集体，我们就可以看出力量对比的理想典型。美苏为一方，其他一切政治单位为另一方，双方的差距标志出另一典型，即两极化的典型。

能否扩大外交范畴取决于两项因素：一是国家的大小，二是军事技术的高低。正由于行动手段，或者说，交通运输的发展，美国才能够在1917~1918年决计到欧洲参加战争。麦金德已经对20世纪初在南非和满洲发生的两次战争感到吃惊。帝俄在一万公里以外，凭仗仅有的一条铁路为作战部队提供给养。英国也是一样。它掌握了制海权，向效命海域的远征军运送军需。那么，革命性的武器革新——核弹的使用又将怎样改变国际关系？

这三个问题基本上都是政治战略问题，所以我还得加上三个政治意识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交战国到底能在何种程度上体会到对方跟自己差不了许多，所以，逐鹿不过是为了解决一些疆界问题，谈不上亡人国，灭人种？第二个问题是：内政的作用与执政者的决策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三个是：执政者怎样理解和平、战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399 第一个问题针对帝国战争和民族战争的抉择。克劳塞维茨曾经写道，在拿破仑以前，君主不相信在欧洲能搞什么兴邦灭国的大名堂。可是出了拿破仑，又出了希特勒，打仗简直要决定某些国家的存亡绝续问题。一些国家不被承认的事例在不同的情况下都发生过。如果胜利者要战败国臣服于自己，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不配享受独立，或者交战国认为对方的制度和意

意识形态都跟自己无法相容，那就要消灭对方的制度，清除敌人的意识形态。

第二个问题关系到内政的研究。美国总统主持国外的活动跟共产党政治局主持苏联的国外活动，方式并不一样。美国的社会学越来越研究利益集团、压力集团、新闻界和议会的作用。这些势力限制了总统和幕友们的活动自由姑且不说，国家各种组织之间明争暗斗，对于外交决策他们都有各自的发言权。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受了局势的启发。克里姆林宫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谈时事，不用华盛顿领导人惯用的词汇。照莫斯科的看法，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政权是人民摆脱美帝迫害的一个里程碑。苏联的外交奉行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成为历史全景中的一部分。美国外交则拿法制和道义的理想主义搭配一些现实主义，而这种现实主义往往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过了几年，我又在另一部著作中重新提出这六个问题，作品名为《对外交事务的分析》。这六个问题是我用来弄清楚战后局势的。我特别注意区分各色各样的不承认主义。1950年代初，西方国家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美国甚至不承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小国。在苏联心目中，不存在大韩民国，而在西方国家心目中，不存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我在第三个问题里面补充了对外交技巧的研究，这势必引起对国际关系新模式的研究，例如联合国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等。正如研究了兵器技术，就势必接下去研究核武器的历史后果。德尔布鲁克的概然判断论比任何时候都来得时新：战争的历史只有在政治关系史的范畴内才可以理解。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看出实力关系——范畴的界限，力量结构，军事技术——与国家之间和平或武力交往的意识形态含义。这种意义同时来自多种因素：内政与外交之间的联系，国家彼此承认或不承认，不同国家信奉的外交哲学。一方面是实力关系，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含义，这便是国际外交的两种形象。如果一切国家都给外交以同样的意义，外交便会趋向一种历史的典型：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使国与国在交往和抗衡时不给对方制造内乱。在党派斗争或教会斗争的时代，这种斗争同国家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把事情弄得格外复杂。欧洲打完了宗教战争，找到了一条出路——搞密室外交，迫使教会和宗教信仰服从国家大计。在革命战争结束后，欧洲再一次恢复了一种国家正统，作为传统外交的支柱。自从1917年以后，欧洲进入了意识形态的一个新阶段，直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而且还把全世界都拖了进去。我在日内瓦参加一场博士论文答辩时发现了一些我寻找的概念。我本来想用这些概念来界定国际关系的两种典型：一种是同质关系，另一种是异质关系。同质关系是各国奉行同一正统的关系。异质关系则是各国各自信奉对抗性的正统，服从各自意识形态和宗教，不作实力的盘算。这篇博士论文的作者帕帕利古拉斯几年前曾在希腊政府担任部长，该政府的总理是卡拉曼利斯。

401 20 世纪的两次战争也叫我再三思考“越打越大的战争”——这个名词是费尔罗起的——思考那种一打到底的决心，为的是强迫对方接受命令式的，但也不一定是迦太基式的和平。同时，我觉得朝鲜战争是一个转折点。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头一次放弃毁灭性的胜利。总体战打了半个世纪，开创了下半个世纪的有限战争。我就使用这个意思作为题目，在《原

子科学家通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命名为《没有胜利的战争》，于 1951 年秋天发表。那时候，中国出兵朝鲜，已经把战线在 1945 年划定的分界线附近稳定了下来。折中妥协、不分胜负的局面业已在望。我把这篇分析文章重读一遍，发现它并非毫无新意。就华盛顿而言，“通过协商实现和平，乃是大国为自己规定的最低限度的目标。不管代价如何，仗必须打下去，一直打到敌人让步，也就是说，打到敌人放弃大获全胜的野心”。对方又怎么样呢？“按理说，只消克里姆林宫的人认为，中国已经打得够吃力了，以后要听话一些，那么中苏便将结束朝鲜战争。”从这时候开始，我已经不相信苏联与中国会和好无间。我还得补充一句，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马立克<sup>①</sup>还没有代表苏联在联合国提出建议，促成板门店谈判。

于是，交战国双方没有一方再想取得决定性胜利。谈判和平或者谈判停火，已经势在必行。而折中妥协的结果，无非维持两个朝鲜的现状。“当前的事实和思想似乎仍然叫人认为，打了一年多仗，完全恢复了过去的地位，这样的结局实在太过荒唐可笑了。”可是，朝鲜战争已经打了两年多。美国人一开始谈判，便停止了军事活动。中苏方面的意图则至今搞不清楚，它们在战俘问题上拒绝让步：战俘无法选择自己的去向，归韩国，还是归朝鲜，归北京，还是归台湾？斯大林死后几个星期，它们便让步了。这起码会让人联想起一些东西。

在我看来，朝鲜战争的结局成了东西冲突全局的象征： 402

---

<sup>①</sup> 时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

“冷战等于有限战争，双方都只使用一部分力量，但是，一双想的是大获全胜，而另一方只想局部获胜。西方阵营若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只想取得在朝鲜取得的那种胜利，既不想灭掉苏联，也不想推翻斯大林政权，而只要苏联放弃向全世界扩张。”我看对了没有呢？当然，我不主张黩武战略，这是对的，但是，美国在当时显然处于优势，那么该不该满足于打个平局？该不该坐视欧洲被分割？可不可以说，斯大林假装决心要征服西欧给美国造成错觉，仿佛让民主自由国家在分界线以西稳住阵脚便是胜利？其实倒是斯大林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不就是让在苏军强迫下成立的诸国人民民主制度获得稳定吗？

我还要谈一谈另外两篇文章，它们都是在朝鲜战争以后，在《没有胜利的战争》发表以后写的。一篇文章登在1953年的《论证》上。我在文中问道：“人们在原子时代，能不能打有限战争？”我主张在地理上限制战争，主张执政的人克制一些，免得各趋极端，尤其是主持战局的人和主持国政的人，千万别为自己规定一些不灭他国便达不到目的的规矩。然后，我谈到全面战争。在这上面，限制的可能性也不能在事前就被排除。当然，“在欧洲打仗，两个阵营全面交战，不可能不用原子武器，但也不见得交战双方一定要抛出全部的毁灭手段。论理，双方都想毁掉对方的反击手段。原子武器越来越多，在军事上的用途和花样也越来越多，火箭也在发展，这些都促使人们不能不设想，一仗打开了头就会一直打下去。但是，这并改变不了我们认为是最关键的想法”。“两个阵营都有相等的能力向城市进行核轰炸，而理智却禁止它们这样做。核力量的对比达到了平衡，自然会重新把敌军作为头号目标。”这样的推



论全未失掉价值，也许还越来越有说服力。然而，古怪得很，美国人在 1970 年采取了一种名叫“保证同归于尽”的原则。换言之，美国人把威慑政策局限于两大国互相毁灭敌我双方的城市。这样的威慑政策无法解决问题，对于本国国土遭受的任何攻击，只要没有使用核武器，便毫无办法。美国人的这门学说，前提便是我在这篇文章里所批判的：只要一跨过核门槛，必然会发展到总体战争的顶点。

也许，我登在《原子科学家通报》上的文章概括了我在当时的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半个世纪的有限战争》。文中并不列举限制战争的手段，甚至一些已经使用了某些核武器的战争也不在其内。文章只集中谈两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首先向美国公众说明一些相当清楚的道理：为什么苏联人没法接受巴鲁克 - 利连撒尔的计划——把核武器和核工业国际化？我心想，现在或将来，两大国在核武器和运载工具方面若实现了均势，那么将会怎么样？威慑政策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住手，不然我就叫你化为灰烬。”这个方式比另外一个更能触动那个假想的侵略者。另外一句警言是：“住手，不然咱俩就同归于尽。”1956 年，美国还掌握着可观的优势，其水平就是今天大家说的“中央平衡”。这些话，我说得太早了。我讨论的是今天所谓“保证同归于尽”这一学说能牵连的东西。第一次攻击过后，交战双方各自保留着反击的工具，足够给侵略者以毁灭性的打击。尽管毁灭的程度不完全相等，至少在大体上差不多。就是从这里出发，我提出问题：哪些地位，如若没有核反击的威胁，便没法保卫？哪些地位，应该在地方上进行局部保卫？因为对方不会认为核威胁确有弄假成真的可能。我接着谈到两种争议，它们现在越来越流行：到底该不该保留

威慑的极端形式、原始形式，抑或恰恰相反，把威慑（也就是说把威胁）分清层次，与彩头的大小成正比？我主张后者，也主张加强常规力量，以应付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不易取信对方的情况。

结论相当正确地反映了局势。热核武器不仅用于相互制约抵消，而且用于防止侵略一些特别重要的地区。热核武器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用的外交工具。至少对于下一历史阶段，政治观察家与物理学家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而物理学家则追悔，科学家竟把这种恶魔般的武器交给政治人物支配。当然，谁也不能排除，错误或疯狂会引起一场滔天大祸，其残酷残暴将远远超过有史以来的任何战争。然而我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全面的和总体的战争大概不至于发生。

萨拉热窝一枪打响，发动的连锁反应直到对广岛、长崎进行原子弹轰炸才算结束。今天，我们难道不正面临一场相反的经历吗？从空间上限制冲突，放弃用一切武器来取得绝对胜利，这种倾向不也是我们今天都看到的吗？所以，这些有限战争加起来，便成为一场无限制的赌博，总有可能引起一场自杀性爆炸。

我时而咀嚼上半个世纪，时而推测下半个世纪。自从回到大学任教，我便想写一部书，把新近的教训，把对于当前局势的分析，把对执政者的忠告，一概结合起来。我既是旁观者，而又介入其间，所以一定要拿一门行动的理论来做结论。

##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鸦片”

如果 19 世纪俄国军队在中欧长期驻扎，定然会使英国人和法国人感到惊慌，卡尔·马克思也一定会更加尖锐地揭露沙皇的帝国主义和西方的怯弱被动。面对如同沙俄那样的传统政权，美国人和欧洲人也会做出迟钝而温和的反应，成立唯一不可缺少实力机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俄国已经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辩论的范畴就完全不同了。 405

重读冷战时期许多极有责任心的作家写的文章或著作，不免叫人觉得茫然不见头绪：为什么这些才智超群的人，尽管既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谈到苏联问题时，便会讲那些失掉理性的话呢？简单得犹如“ $2 + 2 = 4$ ”那样的真相、道理、常识常理，所有这些检验标准，尽管并不夹杂意识形态上的偏激心情，难道都那么脆弱无力和不堪一击吗？

我想起《费加罗报》的一个学识渊博、躬于实践的经济专栏作家，他曾严肃地评述过苏联要实现免费供应面包的可能性。为什么他没有考虑过——即使不提苏联的农业危机——免费面包，也就是小麦，会因为被作为动物饲料浪费掉而稀少起来呢？我并非想说那些作家的文章是受恐惧心理的驱使，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形势分析是他们在不自觉地试图证明他们的思想解放和“进步观念”。他们一味要承认一 406

个社会组织的功效。而出于其他原因，他们又反对这样的社会组织。

进步人士和大西洋派之间的论战，是围绕着苏联制度和美国式民主的优劣展开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浩如烟海，我们实难选择。我不想引述共产党人的著作——他们要尽他们的责任——我只想引述那些从未加入共产党，并且今天和我站在一边的人的文章。

我曾在 1950 年 1 月的《现代》杂志上读到过关于联合国讨论强迫劳动的文章。上面写道：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劳动的尊严都不如在苏联那样受到尊重。在那里，强迫劳动已不复存在，因为人剥削人的现象早已被消灭了。工人们享受他们自己的劳动果实，而不是被迫为某些资本家剥削者卖命。强迫劳动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劳动者被他们的资本家雇主当作奴隶对待……法国和黎巴嫩的代表不知道，在苏联制度下，劳动者能够做到自觉地工作，而不需要有严厉的纪律来管制他们。在苏联，每个人都有工作的愿望，劳动英雄和战斗英雄具有同样高的地位……

另一处写道：

美国监狱里对这个国家的黑人民族所实施的各种非人道的措施，与苏联集体劳动法的公正和合理的规定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个劳动法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镇压

的观念来制定的，其目的是要把刑事犯罪分子改造成遵纪守法的公民。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罗歇·斯丹芬纳。<sup>①</sup> 1953年4月，我在《精神》杂志上读到的一篇文章说：

我们的战斗和1938年、1940年、1942年的战斗有着同样的意义，这就是穆尼埃在慕尼黑之后所说的“欧洲反对霸权”。当初，欧洲反对的是德国种族主义的霸权，而今天，欧洲反对的是两大集团的双重霸权。首先，我们西欧反对美国及其中继者德国的霸权……

其文作者是J. - M. 多梅纳克 (Jean-Marie Domenach)，今天他显然不会再坚持这种类比了。

人们在阿尔伯特·贝甘 (Albert Béguin) 的文章里读到：“人们鼓吹一种反共论调，这种论调恰巧掩盖了一种不理睬主义，不理睬社会正义的呼声，它不择手段地将社会正义的呼声一概斥为苏联授意的诡计。”紧接着，他在提到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人时又承认：“刻板的斯大林正统观念就像一个西方劳动者披上一件制服，他的姿态动作变得十分僵硬，他不再像具有古老文化的人。”然而，当“我们的古老文明对他无所作为，在法国的环境内给不了他精神和物质食粮”时，我们怎能抱怨他呢？

---

① 我想补充一点，罗歇·斯丹芬纳很快就从这种是非莫辨的思想混乱中摆脱出来。他后来在法国关于非殖民化的辩论得到了人们的尊重。我明确指出这点，是因为这篇文章不像他的为人。

在进步人士笔下，北大西洋联盟的拥护者，不管是不是天主教徒，都变成了通敌分子（假如他从前不是通敌分子的话）。《北大西洋公约》和德国的重新武装就意味着战争。一个美国教授说，美国人制订马歇尔计划是“心甘情愿地破坏自己的优势”。阿尔伯特·贝甘断言，这种结论是荒谬的。然而，20年之后，美国事实上已经感到了欧洲（尤其是日本）的竞争力。

在此，我引述一篇萨特致美国人的文章，该文章发表在1953年6月22日的《解放报》上。他说：

你们只在一点上是赢家，这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以恶报恶。你们鼓动人们对我们藐视和厌恶，而我们却不想制造仇恨。但是，你们无法使我们同意把判处罗森堡夫妇死刑，说成是一桩“令人遗憾的事”，也不能说成是“审判错误”。这是一次合法的谋杀，它使整个民族沾满了鲜血，同时也明白地宣告了《北大西洋公约》的破产和你们无力担任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但是，如果你们陷入这种罪恶的狂想，同样的疯狂还会在明天把我们抛入一场混乱的毁灭性战争中……是不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犯一些宗教仪式式的罪行，以求人们原谅他们结束了一场战争……你们还记得纽伦堡审判战犯和你们的集体负责制理论吗？好啊，这就是你们今天应该践行的理论。你们对罗森堡夫妇之死都是有责任的，一部分人是因为怂恿了谋杀，另一部分人是因为对这种罪行听之任之，你们容忍美国成为新法西斯主义的摇篮；而你们辩解说，这种个别的谋杀是不能与希特勒的大屠杀相提并论的，这种辩解是徒劳的。法西斯主义不是由受害者的人数来确定的，而

是看它的杀人方式……你们杀害罗森堡夫妇，仅仅是企图通过人类的牺牲来阻止科学的进步。仙术、降妖镇魔、火刑、祭品：我们看清了，你们的国家得了恐吓症……等着瞧吧，如果我们欧洲从这一端到那一端齐声吼叫，请你们不必诧异：注意，美国让疯狗咬了。我们要断绝与它的一切联系，否则就会轮到我們被咬而发疯。

此文尽管作于斯大林逝世之后，却仍然不失为超级斯大林主义的文献。什么也不缺，包括宗教仪式的谋杀。美国人在萨特的魔鬼学中的地位，如同犹太人在希特勒的魔鬼学中的地位。

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索维的某些见解——这些见解的大部分是关于苏联的，或更确切地说，是关于苏联的未来的（萨特的文章不属于“正规的”文学作品）——今天仍然使我们感到出乎意料。在《政权和舆论》（1949）一文中，他是这样阐述国家与人民的关系的：

没有必要歪曲事实和凭想象杜撰事实，只要选择一下就够了，就像经过彩色玻璃的过滤一样……苏联封锁新闻不仅出于感情，因为它目前不可能达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而苏联领导人决心通过最快的途径来接近这个水平。但这个速度本身就必然迫使人们节衣缩食。

为了加快资本的积累而节衣缩食，这种观点是司空见惯的；相反，斯大林的新闻政策就是“过滤”事实，而不是歪

曲事实，我们的修辞学老教授肯定会把这叫作“妙手得之”。

我承认，引述某些句子是痛苦的：

409

正如为了保证明天的舒适生活，今天要让工业设备的投资超过福利的投资一样，在这让人不快的时期，今天对真相的隐瞒同样是为了明天能充分地展现真相……从这个角度来看，共产主义是一种广泛尝试，其真相将来才兑现，其自由也是赊欠着的……在通过暴力实现共产主义的各个国家里，整个舆论在下一代才会是共产主义的，宣布从现在开始就是共产主义，那仅是一种预言。

人们现在还期待着真相和自由兑现的结局。

几年之后，他又在《世界报》（1952年10月30日和31日）上撰文，提醒欧洲人注意苏联的经济发展。他这么说是道理的。1952年苏联经济的发展快得使人喘不过气来，因为苏联将其国民生产中相当可观的部分用于投资。因此，我们担心苏联的国民生产可能会由于大量的投资而超过欧洲。但是，阿尔弗雷德·索维也未免说得过于轻率了。他说：“就个人来说，我们相信目前苏联工人的生活水平还低于法国工人，但差距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大，而且还在逐步缩小。再过几年，所谓的差距恐怕会颠倒过来。假如铁幕对工人、职员或知识分子的旅游团体打开，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是否需要在我们这一边再拉上铁幕呢？”事实上，直到1952年，苏联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还维持在1928年的。

我在1954年11月8日写了一篇文章，不是为了回答索维，而是为了回答那些大肆宣传“所谓苏联兴盛的威胁”的人。我的



第一个论证是：反苏主义与生活水平没有关系，土耳其、韩国比苏联更穷，但它们对苏联比对西方更为敌视。第二个论证是：按不受限制的食物的质和量的标准来衡量，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水平要远远低于法国。在苏联，人们忽略了整个国家的工业设备、通讯体系和加工工业。“人们没有权利想象在另一种投资分配方式下得到同样的增长率；人们没有权利从按人头算的收入平等过渡到生活水平的平等。将煤、钢、坦克的生产能力……和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生产能力混为一谈是错误的……” 410

第三个论证是：假定苏联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接近了欧洲。那么两者必居其一。或者铁幕依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能改变什么呢？宣传丝毫缩小不了现实与吹嘘的差距，“说大话改变不了事实”。或者铁幕揭起了，苏联人可以自由地来法国走走，法国人也可以自由地去苏联。到那个时候，苏联将会开放，冷战就会结束，和平也有可能了。

结论是：这些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该轮到法国或西方放下它们的铁幕的人，患上了统计数字幻觉症。我不能不首先引用这些统计数字幻觉症患者的一本书来说明问题。这本书就是《革命是法国的最后机遇》，出版于1954年，时值斯大林去世不久，正是冷战最激烈的阶段。作者A. 索维和M. 卢勒是这样阐述的，苏维埃制度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威胁：“假如我们的分析符合事实，即俄国的生活水平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提高，那么到1960年代末，它就应该达到和我们同样的水平，并且能够很快超过我们的。那么，我们就将失去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最有效的保护。”<sup>①</sup> 1954年，斯大林逝

---

① *Révolution, dernière chance de la France*, Paris, PUF, 1954, p. 48.

世不久，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于 1928 年土地集体化之前的。如果这些粗略的比较还有一定意义，那么在此书出版后的 1/4 世纪之后，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仍为法国人民的 1/3 ~ 1/2。法国最有学问的学者之一 M. 卢勒认为，苏联购买力的增长对法国来说是一种现实的危险。作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他是长于计算的。在税后的全部纯收入当中，一个西方人用于储蓄的是 10%，而一个苏联人用于储蓄的则是 15%<sup>①</sup>，并且在集体储蓄的形式下，国家还要再从中收取 15% 的储蓄，另外，还有 10% 的纯收入因用于额外的军事支出而被榨走了。在可能的纯收入当中，一个苏联公民只能有 65% 用于自己的消费（一个西方公民则是 90%）。如果按人口生产水平相等来算的话，苏联生活水平将低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 28%。要达到与西方国家相等的生活水平，苏联公民的纯收入必须超过西方公民的纯收入的 38.5%。即使苏联人均生产按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而西欧的增长率不超过 2%，也得 5 年工夫才能得到这种结果。苏联的优势将为每年增长 7%（人民的额外增长为 1%）。“如果苏联在这期间继续维持与目前同样的装备和军事负担，那么在 1962 年或 1963 年，苏联的生活水平就能够赶上西方的。”（第 66 页）

为什么这些看来是非常精确的计算却得出了被事实证明是非常荒谬的结论呢？首先，M. 卢勒假设的苏联在 1953 年的生活水平是大大超过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其次，他以人口平均生产作为出发点，采用的是官方统计数字，而没有进行核实；他似乎不太了解美国评论家对苏联统计的批评。他按 65% 来

---

① 他怎么知道的？

估计，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收入中最终分配给苏联消费者的比例。就算在战后初期，苏联实现国民生产按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卢勒却既不考虑产品的性质，也不考虑体制的特点。几十万辆拖拉机，出厂便算入国民生产的账目上，但是，假如它们成批成批地抛锚，那么它们给生产者的劳动究竟带来了什么好处？生产的增长首先是因为庞大的投资和重工业的膨胀发展。煤炭和钢铁并不是靠指挥棒就能转化为生活资料的，甚至也变不成工业资料。

最后一点，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错误，M. 卢勒肯定，在工业部门，撇开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不说，苏联的生产率一直保持着——一个特别高的增长速度：至少每年增长 10%（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增长率是 3%，法国在 1.5% 左右）。然而，卢勒对法国生产率的增长估计错了，在战后的几年当中，法国的生产率一直在 4% ~ 5%。他对苏联的增长率也同样估计错了。苏联工业生产的增长率是靠集中大量的投资和充足的劳动力来实现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的人均生产率是由于设备的现代化而取得进展的。<sup>①</sup>

412

当然，M. 卢勒也并不否认苏联的发展迅速慢也因起点比西方国家低。他承认，甚至在俄国生产率达到美国的水平之前，俄国的步子就会放慢。不管怎样，他在主要问题上产生了错觉。关于农业，他认为：“苏联政府办事迅速敏捷，可以使它将特别强有力的计划经济手段运用于提高生活水平。这种强大的经济手段的效力业已在重工业的发展中得到证明。”他补

---

① 当时，另一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生莫里斯·阿莱也研究了同样的苏联生产和生产率的问题，他的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和 M. 卢勒的估计不可同日而语。

充道：“……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力，但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实现。”在斯大林逝世后的一些年里，农业生产确实有某些增长，但是，这是从非常低的水平上开始的增长。我们知道，今天的情况依然如此。

换句话说，他根据错误的数据进行推理，不承认苏联制度固有的弊病。他描述了工人们由于有了共同的思想观念而紧紧围绕在这个制度周围。对于法国，他也只看到解救的办法在于产生新的价值观念和共同的价值观念，认为这些观念将会治愈因回忆和意识形态而被撕裂的法国躯体上的伤疤。

莫里斯·卢勒并不因为我引用了这些过去的文章而责怪我，他知道我一直钦佩他“发明”了增值税。在1/4世纪过去之后，既然当年的思想泰斗竟能闹出这样的笑话，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就不难想象，当初有多么荒诞的东西充斥了被称为舆论的报纸。

413 纯粹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是否更有意义呢？读者自有公论。我不想再挑起争端——这将因为有了辩论对手而显得十分可笑且令人不快——但是，这可以唤起我本人的回忆，同时，也使那些既未经历过这些事情又未得与这些辩论者谋面的人了解这些可能是20世纪特利索丹式<sup>①</sup>的论战。

我想，第一次冲突是在1945年，这次冲突使我与萨特和梅洛-庞蒂产生了隔阂，我们从此分道扬镳。当时，我在《费加罗报》——也许是《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

---

① 特利索丹 (Trissotin) 是莫里哀喜剧《可笑的女才子》中的人物，头巾气十足，自以为才华横溢。——译者注

章。在这篇文章里，梅洛-庞蒂谈了萨特和存在主义。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指出，同共产主义的意见分歧不过是“家庭内部的争吵”。他们很快就将懂得，同斯大林主义者搞“家庭内部的争吵”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第一次与梅洛-庞蒂的辩论，就是关于他的《人道主义与恐怖》（我先不谈我在让·瓦尔主持的哲学学会上做了题为“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的讲演之后他所说的一段话）。

使我自尊心受到伤害，或者更确切地说使我感到非常生气的，是梅洛-庞蒂在1947年发表的一篇评论。评论的中心便是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在《零与无限》一书中描述的莫斯科公审速记案卷。这是评论的对象，或者说是起因。罗巴科夫（Roubachov）简直就是布哈林，而后者成了存在主义者。我从不会读到下面的话而不感到愤怒：“那种荒谬感、那种分裂、那种焦虑、那种决心，到处都有存在主义的痕迹。《莫斯科辩论速记记录稿》有之，库斯勒的全部著作中同样有‘存在主义’。”奇怪的是，诉讼被叫作讨论，仿佛维辛斯基和布哈林是两个哲学教授，在讨论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和偶合性、合理性和偶然性的各个方面。作者和读者终于忘了这种诉讼是事先炮制的，角色是事先安排的，所有的一切，判决和起诉，都是事先写好再照本宣科的。我的感觉与那个多瑙河的农民差不多，他的本能反应如同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著名的报告中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没有拷打折磨，被告为什么会承认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也许梅洛-庞蒂是知道这一点的，但同样可能的是，这个哲学家认为，这些具体的因素丝毫不能消除他对讨论反对派的责任的兴趣。

此书使我感到反感的还在于它喋喋不休、白费口舌，去反

驳辩论对手已不再坚持的观点。梅洛 - 庞蒂驳斥反共宣传的善恶二元论。从各个方面来说,暴力都是存在的。自由世界或自由化世界与共产主义世界,并不像真理与谎言、法律与暴力、尊重良知与宣传鼓动那样截然不同。就算如此,既然人们同意这样的论点,即所有的斗争在某种程度上都值得怀疑,那就该把这些程度区分一下。如果说任何外交政策当中都有计谋和暴力的成分,那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希特勒或斯大林为一方,丘吉尔或罗斯福为另一方,二者之间不存在道德上的差别。梅洛 - 庞蒂写道:“英国的道德文明和物质文明意味着殖民扩张。”他似乎认为,这已经是理所当然的定论。他轻易对一个还在打官司的问题下了结论。英国丢掉了它的帝国,并非丢掉了它的道德文化。对法律的尊重,或许可以为美国警察提供借口而对罢工进行镇压,但显然不能解释“美利坚帝国在中东发展帝国的势力”这一情形。

我本人非常愿意承认,合理性与偶然性纠缠在一起,给个人的决策留有余地,然后让个人冒被否定的风险,甚至冒被历史谴责的风险。当事者往往想不到自己的行动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后果,也弄不清楚他们的行动本身的意义。如果他们反对执政当局,结果却帮助了敌人的事业,那么事后看来他们便犹如背叛。使我反感的倒不是这种辩证逻辑,这种逻辑本不稀罕。所有反对派在事后看来都可能像是叛徒。但是,历史上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应该放在它所处的时代和背景下来判断;假如历史学家有权力、有义务考虑到一个决策会带来无意的或无法预料到的后果,那么这些后果就不应当由道德学家来评判,更不应该由法庭来判决。

总之,在我看来,梅洛 - 庞蒂的历史哲学一方面是传统的

观点（合理性与偶合性），另一方面则几乎是幼稚的：“细想一下，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随意的、明天就可以被另一种假设所代替的假设。它只不过提出了一些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有人际关系意义上的人类，也不会有历史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是一种历史哲学，而是一门独一无二的历史哲学。如果抛弃了它，便是一笔勾销历史理性。抛弃了历史理性，便不会再有梦想，也不会再有什么奇遇了。”<sup>①</sup>

梅洛-庞蒂的非共产主义或等待主义的立场，是建立在怀疑之上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随之倒退。以事物仍在发展为理由——革命仅仅在一个国家进行着，而在世界其他地方，革命则是停滞的，历史是倒退的——苏联并不表明，马克思曾经说过的无产阶级历史的伟大日子已经到来。”不久后他又写道：“在一个似乎熟知世界历史的上帝看来，也许还有另外一种辩证法。一个人处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就像‘处于一定世界历史的人’看不到执政的无产者。”

用通常的话来说，梅洛-庞蒂的思想并不算精妙得出奇。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在一片喧闹和狂热当中建成的；世界大同之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仍然有待来日。如果历史断然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作用便将随之消失，剩下的只有一部分人治人，另一部分人治于人而已：“重新回到这门独一无二的哲学来看，‘历史的理性’似乎都是失败的。”但是，需要等待多长时间呢？就像神学家那样，对于不可知的未来，寄希望于最后的审判吗？

---

<sup>①</sup> 前引述第 156 页。

几年以后，梅洛 - 庞蒂对历史现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前景二者之间的统一等得不耐烦了。朝鲜的侵略改变了他对形势的判断。他非常诚恳地做了自我批评，我将努力提纲挈领，谈一谈他的自我批评。

416 他对自己的大部分指责在于我曾非常激烈地批判过的各种观点中的一种，即马克思主义的绝对价值，尤其是作为历史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只此一家能够给人类的存在以意义。可以说是超历史的标准，因为“所有历史的理性与马克思主义比较起来都是失败的”。然而，梅洛 - 庞蒂发现了他先前的思想方法本身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怎样不超出马克思主义规定的范畴，保留它否定性的真理，而拒绝它行动性的真理呢？“如同我们所做的那样，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的或否定的理论仍然是对的，而作为行动的或积极的理论则不然，这将把我们置身于行动之外，特别是置身于马克思主义之外，也就是用非马克思的理由来为马克思主义辩解，最终只能搞成一笔糊涂账。”人们不能只保持批判而放弃行动：“不可能将共产主义一分为二，在否定的时候认为它是有理的，在肯定的时候又认为它没有道理，因为具体上，在它否定的方式中，已经存在肯定的方式了。”最后，他进行了彻底的忏悔。他回顾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当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可能的失败和历史哲学本身的失败本是一码事。他在下列文字中对自己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观做了评论：“这种马克思主义，不管怎样，终归是真理，既不需要考验，也不需要检验，这并非历史哲学，而是一种经过改头换面的康德主义。在革命是绝对行动的概念中，我们最终发现康德。”我很懂得梅洛 - 庞蒂的意思。他事后认为，他过去的哲学是康德哲学。这种哲学把历史视为一种正在行动着



的绝对真理，无产阶级是世界性的阶级。但是，康德本人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在他的理性概念中，并没有犯梅洛-庞蒂在他《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所犯的那些错误。

一旦不再谈什么绝对的无产阶级，梅洛-庞蒂就重新拿起一些相当古典的社会学命题。任何革命消灭了一个领导阶级而把另一个阶级抬上了领导地位，新上台的阶级对人民搞民主，对外、对人民的敌人搞专政，这仅仅是一种空想。如同在社会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中间寻找一条道路是困难的，“任何革命都是相对的，它只是一种进步”。“革命的特点便是认为自己是绝对的，而正因自认为绝对，所以不绝对。”“今天的捷克无产阶级是否比战前更幸福了呢？”

梅洛-庞蒂甚至大胆提出“新自由主义”概念：“如果人们谈论自由主义，其含义在于共产主义的行动和革命运动只被当作可以利用的威胁，被当作不断的警告，但人们并不相信工人阶级或其代表的政权能够解决社会问题。人们期待的进步是一种有意识的行动，能同反对派的判断进行比较和对证。”关于这种自由主义，因为我和他的观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所以不管他是怎么说的，也就很少展开论战，我很同意这个说法：“议会是唯一既能够保障最低限度的反对派，又能保障真理存在的机构。” 417

在《人道主义与恐怖》和《辩证法的历险》两部著作之间，梅洛-庞蒂跨越了一个很大的距离，但是并没有到赞同我的地步，不过他同我的观点已经很接近了。公开地说，他的修正仅限于从向往苏联的偏见转变到非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他的态度是完全中立的，没有暗含任何共产主义的痕迹。资本主义的弊病继续存在，他仍然揭露资本主义的弊

病，但他承认，这种对资本主义毛病的片面批判，又会滑向暗含共产主义痕迹的形态。朝鲜战争也缩小了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之间的距离。“马克思主义的等待主义对我们来说已经不过是一种空想，而且是一种沉重的空想。”简而言之，为了批判反共产主义，他明确表示，他在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中是完全独立的，拒绝选择一方，变成了选择双方都拒绝。

梅洛-庞蒂的书几乎是和《知识分子的鸦片》同时出版的，当时的共产党作家（如克洛德·罗瓦）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对其口诛笔伐。梅洛-庞蒂和我本人的关系从未闹得很僵。相反，萨特则通过西蒙娜·德·波伏娃之笔对他的朋友大张挞伐。实际上，他们的分裂一方面是因对共产主义，同时也是对苏联所采取的态度不一致而引起的，另一方面，可能是更重要的一方面，他们的决裂基本上是在于对阶级和政党关系上的哲学观的争论——阶级和政党的关系包含着实际经历和建党、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我接下来将先分析双方的政治立场，然后再谈这场哲学论战。

如同我在1956年写的一篇文章<sup>①</sup>所指出的那样：

人们有一种类似芭蕾舞或四组舞中男女交叉换位的感觉。1955年梅洛-庞蒂的“新左派”就像1948年让-保罗·萨特的“革命民主联盟”。前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等待

①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之后，我在《论证》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来回答我认真对待的批评我的人。这两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辩证法的历险和不幸》和《盲目的崇拜、谨慎和信义》。

主义比起《辩证法的经历》一书所表现的非共产主义更接近共产主义观点。简言之，梅洛-庞蒂在写《人道主义与恐怖》时，对共产党一味歌功颂德，而在《经历》一书则予以摒弃了。相反，萨特在与大卫·鲁塞的谈话中严厉地斥责了共产党，后来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一文中又接近了鲁塞的观点。

萨特与鲁塞的谈话公开地结束了我们之间青年时代的友谊。梅洛-庞蒂看过这些攻击我的谈话之后曾提醒萨特注意，这些攻击显然要导致我们两人关系的破裂。萨特几乎是立刻做出了回答：“是的，但已无可挽回。”也许他言之有理。

我们之间第一次有异见，发生在拉马迪埃政府时期。当时萨特获得了在电台进行专题演讲的机会，他与他的一些朋友自由对话。在最初几次演讲的一次中，他谈到了戴高乐将军。和他一起谈话的人当中，有一个人长期拿戴高乐将军与希特勒相比（“眼皮下垂……”）。当然，这种比较激起了公愤。当晚，我被邀请参加萨特与他的对手在电台上的辩论。我置身于被激怒的戴高乐主义者之间，其中有亨利·托雷斯和贝努维勒将军，他们对萨特进行了粗暴的、近乎漫骂的指责。我一直沉默无语，因为我既不能据理支持萨特，更不能加入“咒骂者”的行列。几个星期以后，我才得知，萨特不能原谅我在他孤身一人被政敌包围的时候保持“沉默”。

1974年，他在与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谈话中提到了这个场面，他是这样向她描述的： 419

至于阿隆，就说来话长了，这涉及戴高乐主义和在电

台的一次对话。那时，我们每星期有一个小时在电台就政治形势进行讨论，当时我们都强烈反对戴高乐。一些戴高乐主义者希望我当面回答他们的提问，特别是贝努维勒，还有一个，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于是，我就来到了电台。在对话开始以前，我们是不能见面的。对话开始时，我突然发现阿隆也来了，我以为是我事先请他来为我们进行仲裁的，因为我相信他会和我站在一起。阿隆装着没看见我的样子，他和别人坐在一起；我想他可能是在观察别人，但没想到他会扔下我。从那时候起，我就明白了，阿隆是反对我的。我认为，他与戴高乐主义者站在一起反对我，就意味着在政治上我们一刀两断了。我跟别人绝交，总有重大的理由，但最后，每次都是我决心翻脸的。<sup>①</sup>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指出几点。“我们都强烈反对戴高乐将军”，这么说是解释不了什么的，他们把戴高乐将军与希特勒乱加比拟，而且进行人身侮辱，我能因为友谊而同意他这样做吗？其实，在这几个月前，我还曾在他不登场的时候为他辩护过。当时，加布里埃尔·马塞尔指责他将法国占领印度支那与纳粹占领法国相提并论。根据我的回忆，我是应电台邀请去的，不是他个人发的邀请，这都无关紧要。在我到达时，贝努维勒和托雷斯正在滔滔不绝地大骂萨特，并且宣称，同这种进行卑鄙攻击的人没有什么可讨论的。萨特对这些责骂未做出回答，他向来不喜欢面对面的争吵。

当然，我本来也可以采取另一种态度，设法一方面表明

<sup>①</sup> *La Cérémonie des Adieux*, p. 354, Gallimard.

我对他的友情，而又不必支持他在头一天晚上的演讲。我回忆起这一短暂的场面时，确实感到是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刻：一方面是我对戴高乐主义者毫无好感，另一方面是萨特面对辱骂不动声色，而我本人则保持着沉默。然后，我们分手自去。

这些情况表明，萨特说对了，友谊之花不可避免地自己就凋谢了。在高师的最后两年，我们的友谊之所以得以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精神上的默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同窗之情。第一个因素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而对于第二个因素，萨特于1974年同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谈话则给出了最好的解释。从高师毕业以后，萨特越发喜欢与女性交朋友；对他来说，男人之间的谈话似乎是贫乏的，并且很快使人感到厌倦。我们那时只要不写书，便在一起讨论哲学。萨特读过《历史哲学导论》，他对我说，在写《存在与虚无》之前，他重读了我那本书。但他无意同我一起讨论《导论》一书，也不再请我评论他的“大作”了。至少有一次，我主动与他谈到虚无，指出他没有区别这个概念的两种不同含义。按照普通的词义，虚无，一方面表示不存在，另一方面，把为己，或者把意识与事物的密度、静止性相比，而称为虚无。他回答说，这两种含义归根到底是可以合二为一的。我们不谈论政治，因为我们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也不谈论哲学，因为他再不以辩论为趣事了。他本来可以像德桑蒂跟克拉维尔那样，要么两人之间什么都没有，要么就像最普通的朋友哪怕相对无言，仍以聚会为乐；可惜，这种幸福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

当我得知我们之间出现了“齟齬”时，有一天，我和马奈·斯佩尔伯一起去萨特府上登门造访，我试图解释我的态

度，特别是想减小这段插曲的不良影响。他勉勉强强接受了我的解释，说：“一言为定，过几天我们一块儿去吃饭。”谈话按惯例就这么结束了。然而，后来我们并没有一起吃饭。我后来参加了法兰西人民联盟，而他和大卫·鲁塞一起创建了革命民主联盟。两个朋友在他们的《政治谈话录》<sup>①</sup> 中把一些我从来没有公开主张过的观点强加在我身上，比方说，“阿隆的空想就是认为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社会的解放”。即使我真有过这种想法，苏联的例子也会使我打消这种幻想。萨特则从我们的谈话中，而不是从我的文章中，找出一些观点来挖苦讽刺我。我在《精神自由》中对他进行了反驳，但是我并不认为有再次进行争论的必要。

在他看来，最严重的问题是我的“不太明智的犬儒主义”，这表明我接受了战争“宿命论”的观点：“如果认为和平仍然是有可能的，那就太浪漫了。宣布战争不可避免，人们就可以加速战争的爆发……”然而，我在《严重的分歧》一文中强调的恰巧相反。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萨特感到有必要论述自己的政治立场，他便乘机揭露我的政治观点。确实，梅洛-庞蒂的“新左派”在1955年还没有丧失某些合理性，但我对革命民主联盟已很不以为然了。从这些词的一般意义上讲，民主和革命是矛盾的。<sup>②</sup> 想在法国鼓吹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共产党象征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与其说是革命浪漫主义，不如说是天真或无知（我曾谴责过鲁塞和萨特的革命浪漫主义）。况且，革命民主联盟的遭遇，是历史在事前就为之

---

① Gallimard, 1948.

② 我在行政师范学院所讲的课中，就有一讲的题目是“民主和革命”。

安排好了的。

最后指出一点：鲁塞和萨特逐渐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们不赞成这些人民共和国。我们不赞成它们是有明确的理由的，特别是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些国家的制度符合劳动者的基本利益。我确信法国总工会在罢工中的大部分战略是出于长远的军事目的，而远非出于长远的社会目标。”<sup>①</sup>

革命民主联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共产党的、戴高乐主义者的攻击，甚至也没有得到执政的温和派的支持。据我确切的回忆，梅洛-庞蒂有一天曾经认真地对他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伙人将来到底能不能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形成一个强大的运动？布尔什维克在当初也只是一小撮人。

1948~1955年，我写了一些文章，它们多少还算成功之作，其中一部分是论战性的，另一部分是分析性的，大都收入《论战》汇编。其中有一篇是《历史和政治》，最初发表在《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上，它较好地避免了岁月的侵蚀和知识界讨论的枯竭。 422

与前面说的那本文集不同，《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对我来说是意味深长的。我在1952~1954年花了很长时间撰写它，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也许是感染了新闻记者避难就易的毛病，但更主要的是个人在当时遭受的不幸，1951~1955年，我在连续不断的、繁杂的活动中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以用功当作消遣来逃避现实，假定“用功”和“消遣”两个词语并不矛盾的话。我感到多亏了《知识分子的鸦片》我才得救，

---

<sup>①</sup> 此处引的这段话是鲁塞说的。Entretiens sur la Politique, J. - P. Sartre, David Rousset, Gérard Rosenthal.

才治好我的病，或许这不过是幻觉。对这本书的攻击，于我而言几乎不足以介意。我从黑暗中走了出来，也许我会同人生言归于好。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针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感兴趣的问题，从而针对那些我更愿意面向的进步分子和准马克思主义者。第一部分包括“三个神话”，即“左派”的神话、“革命”的神话和“无产阶级”的神话。我并不否认人们在国民议会里可以分出右派和左派。但我否认一成不变的、贯穿不同历史阶段的、受同样的价值观点鼓舞的、为同样的愿望而团结在一起的左派。在法国，“左派统一”的神话抵消不了，也掩盖不了不可调和的争吵。自大革命以来，这种争吵使一派反对另一派，雅各宾派反对吉伦特派，自由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者。从意识形态上看，左派从来就不是清一色的，它时而反对国家，时而讲组织性，时而又是平等主义的。当然，它也可能既希望自由，又有组织，而且是讲平等的，如果天真地相信这些目标可以很容易协调起来的话。

有些思想，如民族主义，曾从一个阵营转向另一个阵营，历史学家一般都承认这一点。也有一种悲观主义的左派，如阿  
423 明过人，这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这种怀疑派的自由主义属于左派，那么这种左派与急于要把权贵或富人置于政权的监督之下的国家主义与计划经济派，还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而这些国家主义者、计划经济派都没有意识到，治人者更需要受到监督。

同样，关于革命和无产阶级，我力图将意识形态的诗篇引



向现实的散文。工人阶级是否成为“真正的主体”？它能成为领导阶级吗？当一个政党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专制，却剥夺了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争取到的、相对的局部解放，特别是剥夺了保障这种解放的手段时，工人阶级还能算得到了解放吗？为什么这样的革命倒成了一种善行？“革命的神话成了乌托邦思想的藏身之处，成了现实与思想之间神秘莫测的调停者。暴力本身不是被摒弃，而是能吸引人，能叫人着迷。工党政纲和‘没有阶级的斯堪的纳维亚式社会’在欧洲左派，尤其是法国左派的眼里从未享有俄国革命那样的声誉，尽管俄国革命有过内战、集体化的惨况和大清洗。应该说‘尽管’，还是‘正因为’呢？”

我无意充当以加缪为一方和以萨特与《现代》杂志社诸公为另一方之间的论战的仲裁人。但在关键的一点上，我同意加缪的观点，或不如说同意他的质问。他说：“你们是否承认，革命的计划在苏联制度下已经得到执行？”对此，让松（Francis Jeanson）——我想他是萨特的代言人——回答说：“在我们看来，波及世界的斯大林运动并非真正的革命，但是，尤其在我们国家里，它团结起了无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我们既反对它，因为我们不赞同它用的方式方法，同时我们又赞成它，因为我们不知道货真价实的革命是不是纯粹的黄粱梦，是否恰恰应该由革命事业首先通过这些道路夺取政权之后，再建立某些更为人道的社会秩序……”答案莫名其妙：一个意识到自己处境而抱有历史观的人，不会认识不到他在采取立场的同时却又不知道他的行动或他所拥护的历史运动最终会得出什么结果；避而不谈对苏联的判断，或既表示拥护又表示反对，这显然违背了采取立场的必要条件。

424 我用有些傲慢的口气，表示同意加缪在和萨特及萨特主义的论战中的基本论点。我说：“在激起《现代》杂志的愤怒的一些观点上，加缪的思想虽然不算独树一帜，却是有道理的。假如不平之气使我们发现了怜悯的必要性和对于苦难中的人的同情，那么斯大林式的革命事实上背叛了打抱不平的精神。他们深信自己顺应了历史规律，是为了一个既是不可抗拒又是有益的目的而工作的，因此，他们问心无愧地成为刽子手和专制暴君。”

萨特同样也没有明确回答加缪的质问。他用的是和弗朗西斯·让松类似的笔调。他既不说反对也不说同意。他自以为在批判斯大林运动，但跟斯大林运动又很接近。甚至在匈牙利革命被镇压之后，萨特也没有看到，除共产主义运动之外能体现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计划。顺便提一句，让松曾经估计到，真正的革命可能是一种纯粹的空想。但他没有注意研究这种可能性，或者不管怎么说，他没有从中得出办法。至少到1970年，他仍然坚持基本上符合萨特思想的这种假说：也许革命的计划必须经过这些过程，才能结束史前原始社会，或至少达到比他们要打倒的社会更好一些的社会。梅洛-庞蒂把这种说法称为神学，从而加以驳斥。他说，历史将对今日当事人的功过做出最后的判决。

该书的第二部分讨论“崇拜历史”。在第一章里，我分析了“教士”和“信徒”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我分析了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共产党人接受党的正统观念。亲共人士，或者进步的基督教徒（边做工边传教的教士），他们如同梅洛-庞蒂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所分析的，同意基本信条（无产者的使命，由无产者自己拯救自己），但不是

字字句句都赞成党的正统信念。接下来的两章，我受到《历史哲学导论》的启发，讨论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说法，一般来说就是两种对过去的解释模式：一方面是过去的意义，从人类行为的过去到人性的异化；另一方面是驱使世事之演变并能预见阶级之间和国家之间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后果的决定论。 425

最后一部分是比其他部分更为大胆的尝试，它试图将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做比较，比较他们对待祖国的态度，以及这些知识分子中每个人特有的争论。我决定不强迫自己限定知识分子的范畴；按照不同的国家和时间，这个范畴包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非体力劳动者，或者说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事思想、文化的创造或传播工作的人。在发展中国家，所有具有文凭的人都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19世纪的沙皇俄国广为流行）。在工业国家，非体力的职业的数量增加得很快，但下层的职员——在以前的时代，人们称之为抄写员——则不再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举例说，在苏联，组成知识分子的是各种“专家和文人”。在西方，我们可能是倾向于限制知识分子范畴的扩大。难道不管什么样的小学教师或中学教员也要冠以知识分子的称谓吗？我们不能要求考虑他们的生存状况和行为吗？

至于法国的知识分子，我认为他们具有一种倾向，即把我国本身的问题变成全世界争论的问题。出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工人的很大一部分（ $1/3 \sim 1/2$ ）都投共产党的票。这样一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萨特、梅洛-庞蒂和勒福（Lefort）没完没了地谈论阶级和政党的关系，政党是否有权自以为代表阶级，争论一旦脱离现实，就有滑向中世纪经院式的或神学式的争论的危险。在英国，几千名共产党活

426 跃分子当然代表不了英国工人阶级。在法国，共产党只代表一部分工人阶级，党的对头并不就是工人的对头。东欧的情况本可以消除笼罩着的迷雾，把哲学带回平凡的现实。党的干部在夺取政权之后，变成了所谓无产阶级制度中的政治英豪。梅洛-庞蒂鲁莽到提出这样的问题：捷克工人留不留恋他们过去所受的资本主义的和他们工会的“奴役”。他简直在冒天下之大不韪。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一名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的处境而写的众多书中的一本，它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几个批评家把它与《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做了比较，有的借朱利安·班达的名著把它贬得一钱不值，有的则相反，不但加以赞赏，而且把它置于大作之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评价表明了两大集团通常的竞技状态。除少数例外，自命为左派的人对我大张挞伐；自认是右派的人则赞成对“名士要人”进行论战。《快报》周刊在两大集团中采取了超脱的态度，它仅用一页篇幅介绍了此书的主要观点。编者按语是这么写的：

雷蒙·阿隆的新著《知识分子的鸦片》以其所提问题的现实意义、某些分析的精彩独到和作者的个性，而成为有必要引起我们读者注意的一本政治读物。在此，我们本着完全客观的立场，将此书的基本论点做一概述。对于书中的许多论点，我们并非完全赞同，例如，作者所谓的“左派的神话”。雷蒙·阿隆对进步知识分子做了很有意思的批评，但是，他是根据什么来解释他对左派的谴责

的？对于左派这个概念，他下不了定义，这就很说明问题。

《快报》的这个编者按语至今仍使我感到十分可笑。既然斯大林和共产党都算左派，那怎么还能给左派下定义呢？不过编者对书中的某些句子的引用，倒是十分恰当的：

左派的神话是 1789 年和 1848 年相继失败的虚假补偿……左派、革命、无产阶级等时髦的概念，是原先用来激励政治乐观主义的进步、理性、人民等伟大空想的复制品……左派的团结与其说是对政治现实的反映，不如说是对政治现实的掩饰。

自称为“中立者”的，还有一些天主教人士。吕西安·吉萨在《十字架报》上写道：“我们只数数双方的胜招和败招，我们不持立场，但能以基督教的方式来认识只能在以后的实践中表明出来的价值。雷蒙·阿隆的论著不仅仅是一部论战之作——尽管它始终没有摆脱论战的弱点——而且是年度重要著作之一。” 427

我的朋友杜巴勒在《精神生活》（1955 年 8~9 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却不仅限于数数打击次数：这位神父感觉到了书中某些关于边做工边传教的教士和进步天主教人士的章节所提出的质询。《十字架报》的批评者宁可不听我向基督徒所提出的问题。杜巴勒神父抓住了基本点，或至少是抓住了他和基督教人士心目中的基本点。

杜巴勒神父写了一篇对深浅把握得很好的文章。他在文章

的第一部分里认为我是对的，但接着在第二部分里，又部分同意那些说我错的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他那大度包容的评价：

《知识分子的鸦片》是批判性论著，尽管被它冒犯的人会感到不快，但它仍是一部成功的论著。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分析了所谓“左派”思想，指出这种思想被证实有不少神话，有相当多是故弄玄虚……其实他的观点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可以肯定，最近的一些知识分子却过于忽视它。我们必须承认，他在论战中获得了胜利。还可以肯定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等词（只要人类之间的倾轧还实际存在，只要“反动”现象也继续存在，那么这些名词就是名副其实的用语，随便说它们过了时未免太草率了）已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英雄史诗中的象征，它们已不属于严肃的欧洲实用主义的范畴。最后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从人类经验和理智的高度，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的、现实的、具体的历史——并不是以其梦幻般的传说来蛊惑那么多当代人的心的神灵世俗代用品……

在这一段引文中有两点需要指出。……所谓“左派”的观点包含着许多神话和故弄玄虚，指的究竟是我的观点，还是观点本身，也就是杜巴勒神父的观点？他在引述“他的观点”时（虽然肯定其为合情合理），却给他自己的思想留下了不必要的疑云。对于一个精通语言学的人来说，使用“被证实”一词意味着根据“他的观点”做出的分析和批判是可靠的，然而他在括弧里的一段话里引述“无产阶级”和“革命”两词时，却又谨小慎微，叫人诧异，甚至似乎另有所指。我当然

没有否认“人类之间的倾轧还实际存在”，但用杜巴勒神父精彩的说法，这些词却变成了“意识形态的英雄史诗中的象征”。

更使我感到有趣而又莫名其妙和难以理解的是，杜巴勒神父先向基督教徒提出询问，在得到他们的答复以后，又向《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作者提出了询问。他承认历史不是神的代用品，基督教信仰和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天国是不可混为一谈的——或者说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真的毫无共同之处吗？对话就是在这一点上开始的。我从根本上区别了世俗历史和宗教历史——它们之间的区别乍一看是那么显而易见，似乎再加论证会显得庸俗多余。但是，反复思考之余，这种区别难道不是违背了一个基督教徒的历史命运的复杂性吗？“从信徒的意识来看，基督教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永恒与现世的实际交往。”对于这种交往，非宗教人士是不理解的，但他根据基督教徒的观点，并不否认其重要性。杜巴勒神父并不推断，教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拥有绝对的权威，但这个基督教徒“不断呼吁，急需得到某种程度的同意，让永恒和神圣之说对世俗的躯壳具有某种影响”。“人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论战似乎的确不可避免的一面，这场论战关系到精神——如基督教——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基督教往历史里引进了神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说是暧昧关系，所以，承认这种规避不了的复杂关系会比生硬地取舍，硬把逻辑强加于一切事物，甚至强加于怀疑派来得有用一些。”

杜巴勒神父的结论里含有发问和纠正的意思：“一个基督徒是否可以向阿隆先生提问，问他是否同意，关于永恒的宗教

说教同时可以赋予人类现世的未来，所以它对人来说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不过是次要的和相对的。”对这个问题，我并不感到难以回答，显然，这个基督徒并非不关心人类现世的未来。两千年来不乏种种历史的神学，但我不知道杜巴勒神父信奉的是哪一种。罗马教皇、教会、东正教徒和新教徒对现世的未来不是不感兴趣；他们的说教受到基督教教义之伦理原则的启发而不同于任何一种党派，尤其是不同于一种关于现世的未来的哲学，这种哲学竭力宣扬人类命运的最高真理与宗教的永恒没有任何关系。

我把这位开明派神父的质疑批评叫作纠正，而在前几页我曾认为这种批评是平庸的：“基督教不是现世的宗教，但它含有现世的某种努力，并在这一层面上承认历史的一局。”“历史的一局”，这是什么意思？下面的句子解释了这个说法：历史的一局和否认历史的结局，能否联系到一起而不相互抵触呢？通过“历史的一局”这个概念，杜巴勒又提到了历史的结局，而人们却不知道这个结局是属于宗教的，还是非宗教的。

接下来，这位进步的神父又来了几句美言：“阿隆先生从进步基督徒中看到的是一个被世俗宗教所拐骗的永恒的人。他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进步基督徒也冒险参加了现世的一局，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参加。他尽力而为，但是搞得不好，这是我们很愿意承认的（我略过了一句更为晦涩难懂的句子）……就这样，对人的精神提出了一项要求，马克思主义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而且进步基督徒的基督教相信能够同化教徒和令人满意，当然太快了一点，但是完全不会搞错。”这个要求就是历史结局的要求，既是世俗的要求，也



是神圣的要求，同时也是一种我们的意识不得不接受的感受设想的要求。

杜巴勒神父的争论并没有过于“生硬”地规定取与舍。进步基督徒是搞错了，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探索中是有理的。他们轻率地参与了历史的一局，但基督徒是应该参与历史的一局的。当我想到历史的一局使进步基督徒成为历史上最残酷的专制制度之一的同盟者或代理人时，我就想起了朱利安·班达的一句话：知识分子的最大背叛，就是愚蠢。我们说，应该是盲目。这不算原话，是我凭记忆引用的。

杜巴勒神父的结论很接近于在一次由天主教知识分子所组织的关于《知识分子的鸦片》的讨论中一个发言人<sup>①</sup>的观点。按照他的意见，相信天国在人间的观念，是属于基督教的。仅一步之差，就回到了工人教士，或其中某些人的立场上来。我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引用了《1940~1952年的历史和信仰》中的一段话：“假如有一天，工人们来跟我们谈论教会，甚至要求洗礼，我相信，我们首先要问问他们，是否考虑过工人贫困的原因，是否参加了他们的同志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我是这样评论这段话的：“最后一步迈出去了：人们使福音服从于革命。进步教士自以为叫工人信基督教，而他们自己却信了马克思主义。”

除了《快报》，整个左派对《鸦片》一书射出炮弹，冲锋在前的是莫里斯·迪韦尔热。他在《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与我在另一章里提到的他对我前两本书的分析截然不同。这一次，他像个死对头，并不满足于讨论一些思想，他从文章的题

<sup>①</sup> 勒诺布尔（Lenoble）神父。

目开始就对作者进行了指责，其文题曰《知识分子的鸦片还是文人的背叛》。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该文的分析部分，或称为论战的部分。这一部分使用了两个主要证据，而这两大证据却是互相矛盾的。其一是将马克思主义者及进步人士的信仰比作基督徒的信仰，同时认为对左派神话的驳斥并不能咬住人们的思想，因为信仰是顽强的，即使在真理的反驳面前也不会动摇。他说：“对马克思主义的阿隆式的驳斥，有点像盛行于1900年前后唯理论者对宗教的驳斥。阿隆先生会不会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卢瓦齐<sup>①</sup>呢？他的雄辩很动人，但并不能说服人。这架奇妙的智力机器运转非常正常，但都是在打空转，跟实际挂不上钩。他跟卢瓦齐一样，卢瓦齐是没有触动宗教的要害，阿隆先生则是没有触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在创造世俗宗教这一概念时，我暗自承认，高级知识分子中拥护马克思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出于感情用事者多，出于理性者少。我从未耽于幻想，认为“我的雄辩”能使信徒的信仰发生动摇，可是信徒们自己要使他们的信仰理性化。他们把信仰当作理性，甚至当作一种科学。正如帕累托<sup>②</sup>所说，驳倒分洪支流并不能致剩余物于死地，只能久而久之地使它们衰弱下去。<sup>③</sup>

此外，紧接上文，迪韦尔热先生发现了知识分子的进步思

① 卢瓦齐 (Loisy, 1857—1940)，教士，因改革经典的解释而被逐出教门。——译者注

② 帕累托 (Pareto, 1848—1923)，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学说中所谓“剩余物”，指的是经济、社会中的非理性现象，这些现象实际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译者注

③ 某些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承认，《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曾经使他们产生过动摇。

想的理性基础，他说：“阿隆先生所摧毁的——他说得很对——正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主义；但人们不能因为驳斥了《现代错误学说汇编》或废除了宗教裁判所，就认为基督教也随之消亡了。”迪韦尔热先生的进攻改换了阵地，因而我也会打不中真正的靶子。因为真正的靶子不再是知识分子的感情或激情，而是“马克思主义永恒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为当代这种不公平现象提供了唯一全面的理论。人们待遇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才能或努力的差异，而取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中的世袭特权”。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立足于事实和推理，而不再指责那些对教条和讲义的批评空疏无聊，喋喋不休，侈谈神学。知识分子倾向于进步思想或马克思主义，是因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并不认为他们的职业仅仅在于理解。他们必须判断曲直，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他们总是或多或少地相信自己负有一种使命，或至少负有一种责任。他们目睹社会之不公，觉得自己有责任同这种不正义进行战斗。他们天性倾向于扶弱锄强，站在牺牲者一面反对刽子手，站在被压迫者一面反对压迫者。左派有魅力，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因为左派是弱者派、被压迫者派、牺牲者派”。不幸的是，迪韦尔热继续写道：“压迫并非单向的。”“在政治警察、极权体制和流放营存在的同时，社会不公、资本主义统治和殖民主义也同样存在。”怎么办？

伦理学教授能给不负使命的知识分子提出什么办法呢？简言之，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就各种情况确定自己最有效的态度。整天揭露集中营“并不能使流放犯的解放早一分钟到来（而且，在某种情况下，反而会加剧集中营和犯人之间的紧张

关系。主张永远搞集中营的自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势力跟犯人越对立，犯人便越吃苦头)。相反，毫不松懈地揭露社会的不公和资本主义在法国的统治，却能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结束社会不公和资本主义的统治”。这一次，迪韦尔热先生如果没有说谎，便是他弄错了。西方的抗议者曾经解救了苏联多少受迫害者。在两种制度的竞赛中——这种竞赛于1/4世纪以前已经展开，并且一直在进行着，今日不过也是依样画葫芦——西方知识分子不应该对自由民主制度的缺点缄默不语，更不应该闭口不谈极权制度内在的阴暗面。

该文以“阿隆先生的书沁人心脾，哀感顽艳”，即我这个文人的背叛，作为结束。我简直恨透了左派知识分子，据说，因为我已经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迪韦尔热先生又写道：“他把思想演变跟他不一样的人，指摘得体无完肤，其实意在假借别人的罪孽，衬托自己的清白无辜，反正是为自己开脱，而且要在自己的心目中，为自己辩解。他想说服的，不仅是读者，主要是他自己。他之所以说服不了读者，是因为他没能说服自己……”在做精神分析的讨论之前，我忍不住要引用一下Z射线，即安德烈·弗罗萨尔（André Frossard）的表扬信，他是喜欢我的书的。他写道：

与其说迪韦尔热在《世界报》上撰文，是试图对《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进行分析和驳斥，倒不如说是他满足于对作者打一场诛心的官司。在这一部辩证论的宏文巨制中，据说雷蒙·阿隆一味掩饰他的怨气，只怨自己竟不属于这伙天之骄子、这伙左派知识分子之列，仿佛左派知识分子一向只替弱者、受苦者、受欺凌的人打抱不平。1945

年的半吊子恐怖时期，左派知识分子当真几十个几十个地纵身钻到肃奸运动的车轮下，去阻止自封的抗敌分子，对莫须有的维希分子进行了报复。这可是真而又真的。在斯大林掌权时期，这个今日已为俄国人带着明显的宽慰而唾弃的青史留名的人物，我们的左派知识分子却依然装模作样地去顶礼膜拜，其崇高的目的只在于不要断掉被吃人魔王关在食品柜式集中营里的无数政治犯的最后活路。因为迪韦尔热和萨特教导人们，为了帮助牺牲者和被压迫者，就得对俄国的集中营保持沉默，要不断地揭露法国的资本主义统治。可见，热爱真理，就得靠故意遗漏而撒谎。在交易厅咖啡馆里，周末玩耍劳特纸牌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家，就这样舍车保帅。真是多么明智，多么仁义，多么完美！不幸的是，至少在迪韦尔热先生成为他们的代表之前，真正的左派人士都有或者曾经有过这样的迹象——他们是不会玩弄这一类权术的。或者是我大错特错，或者是迪韦尔热先生来自极右；但只有他一个孤家寡人能相信自己终于击中了左派的要害。他这条路还没有走到1/4。

433

1954年，当我写《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时，我是否感到内疚呢？自我剖析并不比恶意批评的剖析更能动摇信念。读者可以随其所愿相信我，或者不相信我。这一类的攻击触动不了我，尽管我比较敏感。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从我采取的知识分子的或政治的立场中不会捞到任何好处。相反，《里瓦罗尔》周刊或《法国面面观》杂志的恭维夸奖之中夹杂着逐出教门之意。就算有加布里埃尔·马塞尔和皮埃尔-亨利·西蒙的恭维表扬，在知识界中也抵消不了莫里斯·纳多、让·普荣

(在《现代》杂志)以及随便哪一个《法国观察家》杂志的编辑的大张挞伐、猛烈抨击带来的负面影响。我的思想的演变取决于事物的发展和我的思维。我自以为对自己是忠实的,与我的年轻时代,也是前后一贯的。

我再引述让·普荣在《现代》杂志上的文章中的一段话。照这个批评家说起来,我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在法国是不存在的。改善法国人的生活的必要改革,国家领导人一向拒不接受。他写道:

434 他(指阿隆)能将“真正的解放”和“理想的解放”做一比较吗?能将现实与幻想做一比较吗?而幻想又在哪里呢?而这些改革,由谁来建议呢?由谁来推行呢?人们从哪儿可以看到,这种可以改变我们命运的和平行动呢?问题无疑在于怎样付诸行动,但假如这问题存在的话,显然是因为阿隆所拥护的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有意识地不愿意解决。他是他们的宫廷小丑,而不是他们的君主顾问,或只是自己的想象中的花样。事实上,一场革新经济的大事业必将引起社会和政治的严重后果,像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改革,只有拥护革命性改革的人才会接受。这就是为什么要为左派的团结而努力。这不是躲在梦乡里,而是回到现实中来。

在这一时期,法国经济的重振在一些诚实的观察家看来已是显而易见的了。让·普荣重又拿出让-保罗·萨特爱谈的论点<sup>①</sup>:

---

① 他的论点是从阿尔弗雷德·索维那里借鉴来的,但是他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后者的思想。

法国资本家的马尔萨斯主义使他们反对经济发展，因为这会使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受到威胁。现在我们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只消老老实实在地将苏联工人和法国工人的条件做一比较，就可以知道什么叫“理想的解放”和“真正的解放”。我并未就此认为让·普荣和《现代》杂志会承认他们昔日的错误、无知和无赖。他们和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同，共产党人醒悟过来后，就会公开承认错误，大多数人还懂得他们还得反戈一击，因为自己已经看清了真面目。面对一门整体学说，面对一种无所不包的世俗宗教，我感到只有两种态度是可取的：或者赞同，或者拒绝。参与但不赞同，同行但不受党员身份约束，简单地说，正是同路人的那些做法，最使我在思想上起反感。许多前共产党人，都是从他们的盲目性中汲取教训的。让-保罗·萨特或让·普荣式的进步分子，总是在多少接近法国共产党的各种立场之间摇摆不定，从来没有任何可能用真正的思想考虑问题，也不会后悔自己的荒唐谬误。

在我所有的书中，这是唯一一本受到新闻界这样对待的，就是说严格从政治出发，或者不如说从偏见出发来对待我的这一本书。《快报》采取的半中立态度，标志着一条分水岭。P. H. 西蒙，一个有点左倾的天主教民主人士（按惯用的词来说），在《十字街头》（1955年6月22日）上对我表示了赞成。他说：

从阿隆这一方面来讲，如果他倾向于改良主义，也无疑是由于现实主义，但我感到，更多的是出于人道的顾虑——正如加缪在《反抗者》的最后几章里表现的那样。毫无疑问，知识界对他和加缪的责难如出一辙：什么起不

了实效呀，什么无耻地与保卫资本家的势力合作呀，等等。在这一点上，问题就变成技术性的了。问题在于要知道真正解放的道路能否解放群众，遏制他们的贫困化，建立一种秩序，其代价低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神话。无论如何，在道德方面，不能不同意阿隆所说的：“政治还没有发现避免暴力的秘诀。但是，暴力一旦自认为服务于历史的真理和绝对的真理，那么它就会成为更加惨无人道的东西。”

最通常的指责——甚至在善意的批评当中也是这样——是指责我的“怀疑主义”，指责这本书的全盘否定性。这部分是出于误会，可归咎于这本书的结论，在此，我不揣冒昧地引述如下：

狂信盲从的批评能教人学会理性信仰或怀疑主义吗？当人们不再打算用刀枪迫使教徒和犹太人改变其宗教信仰，不再重复“除了教会别无救星”时，人们并没有停止对上帝的热爱。如果人们拒绝神化一个阶级、一种斗争技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人们就会不再追求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和一个不那么令人痛苦的共同命运了吗？确实，无保留的比较是没有价值的。随着人们更好地识别伦理道德和对教会的服从，教会的经验就更加真实了。一旦人们放弃了教条，各种世俗宗教就会融化成各种不同的意见、舆论。然而，既不指望革命能带来奇迹性的变化，也不指望计划能带来奇迹性变化的人，却不甘心接受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他并不把他的灵魂交给抽象的人道，交给一个



暴虐专制的党、一种荒诞无稽的经院哲学，因为他热爱活生生的人，他参加活跃的团体，尊重真理。

也许事态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也许有一天，知识分子发现了政治的种种局限性，因而对之失去了兴趣。我们乐意接受这种靠不住的前景。我们并不受到冷漠的威胁。人们还没有眼看着就要失去自相残杀的机会和动机。如果宽容来自怀疑，那么人们就该教人去怀疑各种模式和各种乌托邦，去请那些宣传教人升天的先知，连同那些预言天要塌下来的人。假如怀疑派能消除狂信盲从，我们衷心召唤怀疑派的降临。

436

最后一句话被人从上下文中抽了出来。其实，在我看来，怀疑主义并不意味着失掉一切信仰，或者说对公共事业漠不关心。我希望，有思想的人一旦摆脱了世俗宗教的束缚，就不要再为无可辩解的东西辩解了。我承认，可能他们认识到政治的各种局限性以后，就会不关心政治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自相残杀的机会和动机日益增多，并且蠢蠢欲动，对各种模式或乌托邦的怀疑，至少能够减少以信仰的名义来残杀同类的人的数量。

即使误会消除了，这本书就不会遭受平庸的批判而一蹶不振吗？你们破是破了，但是你们又立了什么呢？

我很想再和杜巴勒神父对话。请看，照他的说法，我衷心向往的是：“一个意识形态时期的结束。一种对技术进步的合理使用，目的在于建设目前可行的人类世界。到那时，自由将会在全世界尽可能成为现实的和真实的，即使它表现得相当平淡无奇。在杜巴勒神父看来，这大概是一个精神的激情已经消

退的人，他会好好地利用历史，并且能够较好地从事政治活动。由此，批评在纠正不合理的東西时，又剔除了其中某些有价值的东西。”

我其实认为，根据经验，大地上的社会生活组织是相当平淡无奇的。苏联的模式是一场噩梦，美国的模式是不完善的和庸俗的。工业社会仍然将是我们时代的文明的主要特征。那些期待或希望人间天堂的人，他们神化了人和制度，再也看不到历史让我们认识的人和制度。小资产阶级满意了，劳动者因使用先进机器而减少了痛苦，纳税制度降低了一些人的傲气并满足了穷人的最低需求，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被认为是平淡无奇的。成了畸形的怪物，苏联的现实就不那么平淡无奇了吗？

## 第三部

※

祸患之中的教师  
(1955 ~ 1969)



## 第十三章 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

1955年6月，我渴望入选巴黎大学，我难以掩饰自己这个强烈的愿望。为什么呢？是不是战后被政治麻醉剂麻痹了的在大学执教的雄心又苏醒了呢？我设想——或许是错误地设想——新闻工作能够给予我的一切，我已经得到了。我再一次感到了青年时代的那种焦虑不安：我是否避重就轻而被引诱上了一条本不是或至少不一定是我该走的道路？战前我写的书并没有预示着我会做《费加罗报》的专栏作家。我还记得当我对莱昂·勃鲁姆政府的评论激怒了左派人士时，塞勒斯汀·布格勒挖苦我，给我算了命。

巴黎大学的规矩我已经忘掉，这时候重捡起来，对此我抱着期望。1950年7月，一个先天愚型的女儿出生了，几个月后，埃玛纽埃尔又被突如其来的白血病夺去了生命，这使我受到无法言状的打击。厄运是不存在学徒期的。当它向我们袭来时，我们还得从头学起。我在这方面是一个坏学生，迟钝而又具有反抗意识。我本想以学消愁，躲避烦恼，可是，躲避不成，反而愈加感到不知所措。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迷惘，我越发为时间没能治愈的创伤感到痛苦。我期望巴黎大学给予我帮助，我的愿望没有落空。它并没有归还我在1950年被永远夺走的東西，可是它却帮助我重新开始了生活，让我与其他人并与我自己和解了。

选举包括两个阶段，各专业选出自己的候选人，学院正式

教授大会以绝对多数（第三轮以相对多数）推选出这些候选人当中的一名。学院并不总是听取各个专业自己的选择。在我年轻的时候，巴黎大学一共只有五十来个教授，也就是说只有五十来个人有投票权，所以这个制度还勉强行得通。各学科间的区分不像今天这样明显，并不妨碍大多数教授相互了解，他们还是同在一个狭小的社会环境中活动。他们大多数来自乌尔姆街（巴黎高师所在地），但归根结底，一般都服从学术小镇朗代尔诺（Landerneau）的主导舆论。（可能我给了尚不了解的巴黎大学很高的评价，其实它那时并不具备，至少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不管怎样，随着教授大会的规模不断变大，乌合之众出现了，大多数有投票权者一点儿也不知道，或者说几乎不知道每个候选人的条件和著作，所以一个专家的当选变得越来越偶然。会议期间发生事故，教授们急于就餐而陆续离去，答辩词的质量有时比学术方面的因素更能决定选票的多少。

重大日子的那些答辩——或者说重大选举的日子——吸引着公众。那一天要选举的候选人越多，待补的教席越重要，出席会议的教授的人数也就随之增多。在学院大会就像在波旁宫一样，一些演说家能够吸引听众，很快就使会场静寂无声，而另外一些人的讲话则消失在听众窃窃私语的嘈杂声中。介绍和赞誉的方式简直能使一个不抱成见的听众目瞪口呆。夸耀一个巴黎大学候选人的教学优点，这实际上是把更快地贬入冷宫，因为按照惯例，吹捧他作为教授的优点，往往使人联想到他作为学者的弱点。我参加过几次这种口才比赛，暗暗感到气愤：那些讲话就像悼念死者的赞颂文章，巴黎大学居然拥有这么多天才人物，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

丹尼斯·布罗根在评论选举我的那场活动时写道，这样的

选举在英国是难以想象的。这篇文章我后来没有找到。显然，共产党员教授和亲共教授们都不希望我成功。依附左派的非共产党人由于我在几个星期前发表了《知识分子的鸦片》而对我怀恨在心。乔治·古尔维奇的优点之一是，擅长“大学活动主义”（四处打电话，并且挨家挨户争取选票）。他鼓动乔治·巴朗迪埃当候选人，还向那些愿意听信他的人断言，我的著作和文章表明我不宜当一名社会学教授，而应该去当部长。

我的最终获胜，与我个人的意志和本领无关。我没有搞大学里的那种竞选活动。我拜访了哲学专业的同事和其他专业的负责人。巴黎大学中我的高师校友，甚至同一届的同学都不少；与小我大约15岁的巴朗迪埃比起来，他们更了解我，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考虑我的政治观点，而是投票给一个老同学。后来，受众人爱戴的学院秘书博纳弗瓦小姐对我说：“您可能是因年龄而获胜的。”新闻记者居然靠年龄而战胜了“年轻人”。为了不忘记我的朋友们的作用，为了避免把当时的情况说得一团漆黑，除了哲学专业中我的那些支持者（亨利·古伊埃、德·冈迪亚克、勒内·普瓦里埃、费迪南·阿尔奎、拉加什），还应提到亨利·马鲁。听说，他在大会上提起最近选举了一个共产党人，并且表示他是为《历史哲学导论》的作者辩护，而不是为《知识分子的鸦片》的作者辩护。

以前在巴黎大学，人们装作不知道——有的时候忘记了——教员们在讲坛之外宣扬的观点。说实话，有些教员对我的敌意并不是由于我的政治观点。某个人，其职业是伦理学家，激昂慷慨地宣称宁可投票选魔鬼也不选我。我的过错是什么呢？我没有照规矩办事，不肯到一个外省的大学去“流放”几年，我脱离了学院工作，并且投身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这些

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总之，巴朗迪埃的不利条件仅仅是年纪轻——但这与我的缺点相比，算是无足轻重。巴朗迪埃一直忠于古尔维奇——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友好的关系。一系列拜访之后的选举，相当于拜山门的仪式。一旦经受并战胜了考验，  
442 当选者就被所有人接受了，这里既有支持过他的人，也有打击过他的人。其他的争吵，其他的地下联系，取代了选举前或者为了选举而结成的联盟。

在另一章里，我曾思忖过报界的同行们是否会接纳我和怎样看待我；对于大学里的同事们，我也应提出同样的问题。他们是把我当作重返家庭的回头浪子，还是当作自称能同时从事两种活动的叛逆者？或者是把我看成试图在巴黎大学提升自己的声誉，并且在与大学尊严不大相容的笔战中连累母校的新闻记者？有时，在这个或那个大学同事那里，我感觉到了他们的种种看法，这些看法同我那些新闻界同行的观点是一样的。我背离了常规，而所有行业都不信任边缘人物。各种怀疑和不满可能因我过于敏感而显得严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终于平息下来了。

我毫无困难地适应了这个表面看起来崭新的职业。1938年我接替过马克斯·博纳富（Max Bonnafous）先生的职位，他去当某部长办公室负责人，我因此在波尔多当了6个月的社会学教授。我在国家行政学院和政治学院讲授的那些课程，以及许多使用法文、英文和德文的讲座，可以说使我保持了良好的授课能力。我擅长口头表达，这一能力过去会考时曾给老师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也没有丢掉。我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使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应对共产党大学生。哲学系图书馆馆长罗默先生是个众所周知的人，他告诉我，甚至共产党大学生都



尊重我的教学。

阔别 27 年的巴黎大学，并没有什么使我感到出人意料的地方，它尚未发生很大的变化。巴黎大学的彻底变化发生在 1955 ~ 1968 年，那时我正在那里教书。哲学系拥有大约 12 名教师（在选举我的前两轮投票中，他们形成了人数相等的两派，第三轮时，12 个人中的一个人改变了立场，使我获得微弱多数）。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但还没有多到使管理人员受不了的程度。每个教授都配备一名助教，由助教来批改论文、指导大学生的实验课，同时也教授一些课程。

最使我震惊的，是学校建筑的破旧。与阶梯教室相连的狭窄的办公室中的椅子和旧货摊上的一样。所有的房间和教室都是阴暗的、肮脏的，一幅凄惨的景象。我不禁回想起一些我了解的美国和英国的大学。在我看来，学校建筑的破旧表明了制度的衰败。 443

从 1930 年代以来，几乎什么都没有变。最优秀的学生仍然参加获得高等教育合格证书的考试，而且不来巴黎大学上课。其他人，除了助教的帮助，就由他们自生自灭了。教授们主要讲授那些所谓的权威性的课程。我每周的授课时间是 3 个小时——这是一个沉重又轻松的差事，要根据每个人对教学的理解而定。在法兰西学院，课程每年都必须有创新。而在巴黎大学，一切都要服从教授的意愿，或者更新自己的教学法，或者完全相反，保留时间以从事自己的研究。与美国和英国的著名大学比起来，我觉得巴黎大学就像 19 世纪的残余。正教授，除了上帝，他是他讲坛的唯一主人，他亲自了解候选考生，这些人获得学士学位后在他的指导下撰写学术论文，以取得大学文凭，或者准备一篇国家级博士论文。教授很少接待本科生，

因为他没有时间。

从1955年起，大多数大学生就必须在一个不同于中学的天地里应付局面了。年复一年，那些接受高等教育而又没有明确目标和特殊志向的男生女生，其人数越来越多。过去的做法愈来愈不符合时代要求。一些教授编写的讲义值得出版发行。由于免除了所有强制性的要求，教授们要么在工作的重负下被压弯了腰，要么全然相反，无须为备课或论文答辩花费气力、熬夜，只要遵守3个小时的教学规定就行了。

444 巴黎大学（或者仍像人们称呼的那样——索邦大学）文学院依然保持着它的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国家级博士论文都在巴黎通过答辩。那个不管有无道理都被当作某一学科的权威的教授，对于题目的选择，甚至对研究的方向总是具有过分的影响，往往弄得研究工作光开花，结不了果。1968年5月事件中，一些学官大人的问题被揭露出来了，这并不全属于无稽之谈。欧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在经济史方面，杜里（Durry）夫人在法国文学方面，对青年人和他们的职业拥有决定权。有时，一个巴黎大学的著名导师仅通过笔和纸，就能同时指导几十篇国家级博士论文和第三阶段博士论文，这还不包括大学里的论文。早在大学生上街游行之前，这种权力的集中而不是人才的集中就使我感到很气愤。

在《费加罗报》和一些社会学杂志（尤其是《密涅瓦》杂志和《欧洲社会学档案》杂志）上，我多次批评过法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批评首先针对的是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批评很猛烈，以至于像一个主管公职的部长告诉我的那样，我成了教师资格获得者协会的眼中钉）。我说过，这种教师资格会考从理论上讲保持了它的作用：招聘中学教员、公立中学

的教师。不同于德国和英国的是，教师（professeur）这个词既适用于大学的学官大人，也适用于大学教师资格获得者（或者是中学师资合格者）：他们有时在中学初中部给小孩子和青少年上语法课、数学课以及历史课。这种词汇上的特殊情况很容易解释：公立中学的教师一点儿也用不着羡慕大学学院里的同行们。在哲学界，亨利·柏格森和布伦什维格都在公立中学教过几年书。伊波利特亦是如此。阿兰也不想离开亨利四世中学的高师文科预备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只有很少一部分青年人去公立中学读书。1938年，大学一年招收中学毕业生约1.5万人，而这一年适龄入学者有600至70万人。公立中学的学生们仅代表了少数幸运儿，他们由于拥有外国没有的高质量的师资而受益匪浅。整个教育制度仿佛都是以中等教育为重点，这损害了第三阶段的教育，即大学学院里的高等教育。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象征着大学学院是隶属于公立中学的。这些教师资格获得者所受的培养和教育应归功于大学学院，而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要为公立中学服务。

445

我对某些教师资格的会考（如哲学、语言）有亲身体会，而且通过间接的方式，我也了解了其他学科的教师资格会考（如古典文学、历史）。总之，对此我掌握了足够的情况来对这些考试进行评价，判断其利弊。所有的教师资格会考，无论是何种水平的，都要求具备修辞方面的才能，从中学毕业考试开始，这就是取得成功的条件。用法语或是用外语进行的哲学的和文学的写作，仍旧是最主要的考查点。当然，根据会考的不同，对自己知识的运用和发挥也不同，在这种会考中要表现你的哲学修养，在那种会考中则要发挥你的文学鉴赏力和识别力。所有这些传统的考试，与其说是着眼于考生的科学、教育

水平，不如说是重在考生的表面优点。法语翻译成外语，或者外语翻译成法语，这的确需要并且可以衡量考生的各种语言知识，包括古文和现代文的知识。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研究中获取比训练写作要多得多的好处。同样，那些研究德国或英国的人没有研究语言学，也不真正熟悉这些语言从属的文化，就“摘得”（或仍在摘得？）这种大、中学教师资格。如果说在我们的大学里有许多德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教员，而真正的德国、英国或西班牙问题的专家却寥若晨星，那么从很大程度上讲，错误要归咎于这种教师资格会考制、考试提纲的内容和论文题目（论人，纪事）。

在具有教师资格会考制的所有学科里，准备考试耗尽了学生和教员们的精力，而一个人在考试中获得成功并不能保证他的教学质量。为此，我感到很可悲。对这种制度提出疑问的同时，我还要谈谈对形势的分析。195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试图取消初等和中等教育二元制。显而易见，等级的区别仍然继续存在着，但是各个等级的教育被统一起来了：各社会阶层的所有孩子都进同样的幼儿园，进同样的小学，  
446 然后进入同样的中学。如同公立中学的初级班已经消失了一样，中等教育的初中部也将从公立中学消失（现在它们正在被逐渐取消）。

单一的学校——如果我们可以借用半个世纪前爱德华·赫里欧喜欢的这个用语——将会搞乱我所了解的那种教育制度，维希政府的部长们也曾给这个制度宣判了死刑，然而，他们的动机与战后改革者们的动机截然不同。维希时代，部长们想要结束初等教育的隔离、封闭状态，因而要求高师的学生必须有

中学毕业文凭。这也造成了初等和中等教育人员的融合。从那时起，人们就可以预见各个中学的人员编制势将扩大，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些学校性质的变化。

中学教员逐渐失去了公立中学教师资格获得者所具有的威望（而1933年在勒阿弗尔，这些人还属于社会名流）。教师资格获得者慢慢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陌生的、令人失望的世界，成了自己所获文凭和从事的工作互不相称的牺牲品。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各个等级的教育机构的扩充便于许多教师资格获得者很快进入大学学院。但是，这种扩充不可能按照同一速度无限制地继续下去。适龄考生的人数每年下降大约10万人，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不再增长，从事中等教育的教员格外年轻。对于一个大学助教职位，有50名教师资格获得者来竞争。同时，大多数教师资格会考都有数百名候选人，而教育部确定的名单中往往只有几十人。

1960年代初，我对教师资格会考制的批评，首先针对的是由此而产生的高等教育的偏差。文学院把培养中等教育师资作为主要任务，而不是培养研究人员。此外，各种文凭的区别——如大、中学教师资格获得者，中学教师资格获得者和学士学位——造成了教育机构内部教师队伍的混乱，因为教师的义务和报酬不是依照他们现在的能力确定的，而是根据他们从事本职业以前通过的各种考试或会考而定的。

今天怎么样呢？各种教师资格会考继续存在，就我所知，没有多少改变。或许由于法国教学及研究单位的增多，这些会考不再具有那样权威的影响，这些单位是一些比较严密的组织，比较追求创新，受会考和考题汇编的束缚比过去少一些。但是，现在的教师资格会考还是保留着相同的局限性，这些考

试既不注重学术水平，也不重视教学能力。由于候选人和当选者的人数之间存在差异，教师资格会考便成了一种选拔形式，既不比别的形式好，也不比别的形式坏。反过来讲，反对大学招生用的选拔制，就会引起一系列必然的和可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与其他人一起，我揭露了业士学位概念的含混不清，它既是中等教育结业证书，又有大学第一阶段学习的资格。在我执教于巴黎大学的几年时间里，几经修改的业士学位逐渐变成了近似于中等教育结业证书的东西，然而有业士学位的人并未因此丧失了直接上大学的资格，换句话说，所有业士都拥有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利。然而，这种制度令人奇怪的结果是：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除去大学院系，都要进行入学考试。不管是商业学校，还是政治学院，任何一个业士如若没有其他证书，不经考试是不能入学的。甚至像法国大学科技学院（IUT）这样的两年制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也要在考生中进行选择，并为他们开辟就业之途。只有那些文学院或法学院是例外，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它们保护了成千上万的无业青年。

拒绝挑选考生的结果，每个人都可以预料到，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赞成进行“筛选”。这个忌讳的字眼仅仅表示反对业士自由进入大学院系，这里主要是指文学院，其次是法学院和经济学院（1969年又分出一个“教学和研究单位”）。根据统计数据，在几十万注册的大学生中，有多少人是在碰运气或是在享受给予大学生的好处却没有确定的计划，甚至当真不怎么想学下去？

最初，对于这种制度的不合理，即把为数不多的资金浪费

在那些既拿不到文凭又得不到收益的假大学生身上，我感到很气愤。我的观点没有变，但我觉得自己比过去宽容多了。当然，保持一定比例的冒牌大学生，不就是间接削减国家用于真正的高等教育和真正的科学研究的基金吗？在我刚到巴黎大学的时候，所有的教师就已经看到从学期开始到期末，听课人数不断减少，最好的情况也要减少 20% ~ 25%。大学生不仅不见教授，而且不上课，不做作业，甚至不参加年终考试。社会学方面的种种调查并不总能发现这些“逃学者”的踪迹。

1955 ~ 1968 年，我目睹了古老的巴黎大学的变革。大学论文被取消了，第三阶段学位论文被采用了。1955 年，只有一名助教帮助我，而 10 年之后，大约有 10 名助教管理学生。学生和教师的人数在逐年增加。当我授课时，笛卡儿阶梯教室坐满了人，我向几百名素不相识的听众讲话。1967 年年底，我决定离开巴黎大学并且成为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的非兼职研究主任，这是因为我感到这个大学摇摇欲坠，一个气息奄奄的体制使我们陷于瘫痪和思想枯竭。

对于社会学来说，1955 ~ 1968 年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一段吉利的日子。就我所知，1955 年在大学里的社会学教授职位并不比 1939 年（我已在图卢兹大学任教）多。就在 1955 年这一年，巴黎大学新增加了一个社会心理学教授席位，这给我的当选提供了便利。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心理学教授职位，斯托佐尔（Jean Stoetzel）将成为乔治·达维的继承者候选人，这对他而言有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乔治·达维担任了文学院院长，乔治·古尔维奇也占据了关键性的职位，暗中掌握着学官的大权。大多数学位论文要经他审阅。如果不说是研究人员，那么至少大学生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他常常控制不住自己而

449 突然发火，使得考生们非常恐慌。尽管乔治·古尔维奇进行了不少活动，出版了许多东西，对知识界的权威有特别的爱好，但他从来没有获得（他的任何一个继承者也没有获得）无愧学官大人称号的权威。社会学与传统的学科比起来，仍然是一个二流学科。那些传统学科的地位由于进行教师资格会考而得到了质量上的保证。大战以来，在几个先驱者（乔治·弗里德曼等）的影响之下，社会学在大学以外，在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特别是在这个中心的实验室——社会学研究中心里发展起来了。在巴黎、图卢兹、波尔多、斯特拉斯堡进行的社会学教学，与我在1/4世纪以前所了解并接受的社会学教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但其实我没有上过这样的课）相比，并没有多少变化。课程的重点是介绍重要的创始人和教师们自己的理论，或者是某些重大课题，如阶级和阶级斗争、自杀问题、劳动分工等。此外，社会学家开始探索经验论的研究，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被卷入巴黎大学教授之间的空谈玄虚或明争暗斗。

我在巴黎大学执教期间，研究人员才开始与大学拉近距离。这纯粹是巧合，没有因果关系。专修社会学的大学生人数增加了，社会科学颇得人心，人文科学开始衰落，这一切都有利于社会学在大学院系里提高地位——这种地位的提高，事后看来似乎是1968年5月事件的起因之一。从我个人来讲，我愿意承担责任，承认我在两年内增设了社会学学士学位。是功是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就这样一次体制改革而言，成功之快，堪称罕有伦比。

社会学终于被列入了大学文学院的教学大纲。学位是自由选修的，等于半个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学士文凭。社会



学学士学位不是教学方面的学士学位（因为社会学并没有被列入中学教学大纲），但与以前的状况相比，这已经是一个进步。我坚持主张这个学士学位必须拥有三个考试合格证书（社会学通论、社会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第四个考试合格证书由大学生们在课程表上自选课程（经济史、人种学等）。450 我坚持这三个必备的证书各自以本身的概念来确定。在教师会议里并不是没有人反对政治经济学证书。古尔维奇显然对此持反对态度。有些人或许还记得涂尔干和他对经济学的批判。最后，没有费多大劲儿，我终于说服了大多数人。这是由于我的论据更充分，还是由于我的法语比古尔维奇更地道呢？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的法语讲得比他好，那是理所当然的。

我那好胜的秉性驱使我与我所喜爱和尊重的艾蒂安布尔（René Etiemble）进行了一场争论。我们讨论了社会学通论的教学大纲，我们又提到了一些被列入伦理学和社会学教学大纲的人物，如卢梭、孟德斯鸠，并且沿用了“先驱”“奠基者”等字眼。艾蒂安布尔嚷道：“还有阿拉伯社会学、中国社会学，这怎么办？总是局限在我们自己狭小的国土内，好像法国包括了所有文化似的……”被这段话略微激怒的我，用一种不大符合大学习惯的方式回答说：“我完全同意我的朋友艾蒂安布尔的意见，但是，我建议把阿拉伯社会学或中国社会学，推迟到我的同事的学生们有能力教授这些课程时再列入教学大纲。”一阵大笑结束了这场辩论。艾蒂安布尔很喜欢嘲弄别人，而对别人笑话他就受不了……不过，我相信他早已原谅了我们大学合作中的这段小插曲。

社会学学士学位没有存在多久，1968年开始实行富歇改革时它就消失了。这个改革本身很快也由于1968年5月事件

而被中断了。不管怎么样，社会学作为大学里的一门学科从此得到了承认，1960年代的风潮幸亏没有再上涨，尽管如此，这门学科一直吸引着众多大学生。

1955年，当我把“工业社会”作为第一堂公共课的主题时，我打破了常规：把五年计划、耕地集体化、莫斯科的诉讼案件都列入了我的研究之中。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呢？因为苏联代表了当代社会制度的一种理想模式——它的目的是要赶上美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在巴黎大学的一间阶梯教室里回忆那些集中营以及列宁战友的供词，使学院式的社会学与公众的议论声接近起来。乔治·古尔维奇的课程就像他撰写的书一样，充满了分类和定义，表现了完全相反的特点。这些课使学生们脱离了日常生活方式，把他们带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带有一点儿神秘色彩，挤满了各种“小集团”，它由于存在多种社交方式而显得颇有生气，同时又被分成了多种不同的层次。

我们两人谁有道理呢？这个问题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然而，社会学使大学生摆脱偏见，摆脱在过去亲历的现实中形成的自发意识，所以社会学倒是有好处的。同样，大学教师尽可能客观地探讨一般只有新闻界和宣传讲演才涉及的那些问题，这也并非无用。1955 ~ 1956年、1956 ~ 1957年、1957 ~ 1958年，最初的那些课程——“工业社会十八讲”“阶级斗争”“民主制与极权主义”等没有吸引多少学生，第一学年只有几十个人，以后人数逐年增多，这未必就是成功的征兆，但说明注册听课的人的数量确实增加了。此外，这些课程虽然听众不多，但是很快就拥有了数千名读者（巴黎大学的课程讲义是公开发售的）。

这样的课题选择并不是没有风险的。渴望脱离新闻界的我

差一点儿又重陷进去。但是，我还想通过讲这些课，准备我的一部代表作——《从马克思到帕累托》，对此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着，甚至动手写了一些东西。我想尝试一下分门别类阐释下列理论的可能性，这些理论是：增长论 [科林·克拉克 (Colin Clark)、让·富拉斯蒂埃 (Jean Fourastié)]，政体论 (资本主义 - 社会主义)，社会阶级论，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里的精英论。我没有把握说事前就构思好了这三本小册子。第一年，我听任自己下了这节课又去上另一堂课，没有一个整体计划。而结果竟奇迹般地不那么差劲。

在以后的章节里，我还要谈到上述那些书的内容。我有必要说一说我在那个时期的思想状况和我对听众的关心。有些大学生或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准马克思主义者，虎视眈眈，在转角处等着抓辫子。而我来时，甚至来之前就已经有了右翼记者的名声。我必须制服这些马克思主义者，用我的知识说服他们，让所有人认识到我是一名现任教师。在《工业社会十八讲》中，我不止一次对苏联采取含蓄态度。为了证明我态度的客观，我不得不给我反对的那个政治制度留下存疑的特权，对它表现出宽容的姿态。我感到自己的确达到了目的。请别忘记，赫鲁晓夫于1956年在二十大做了报告，而我正是在这一年在大学首次讲课。我在课堂上讲述的那些事实，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证实了它们的真实性。

452

很难说我与大学生们，至少是第一阶段（大一、大二）的大学生们到底关系如何。他们很少来找我，一般是请助教帮助解决问题。开始，鉴于他们人数不多，我还嘱咐他们做报告，也就是要求他们当着同学和老师的面做报告。可是，我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学生们几乎不听他们同学讲话，他

们指望的只是老师的评语。我努力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即使是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我认为让学生们取笑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是可鄙的。我不能保证说我从未犯过我厌恶的这种错误，但至少我能够说我从未故意这样做过。

不知在什么情况下，有时来听课的皮埃尔·哈斯内尔 (Pierre Hasser) 就古希腊大史学家修昔底德做了一个出色惊人的报告。我对他倍加赞赏，而这些赞扬之词对他来讲并不过分。我对他说，无论是作为大学生还是教员，我从没有听到过这样高质量的演讲 (皮埃尔这时已获得大学教师资格<sup>①</sup>)。一名学生在下课时对我说：“如果您没有承认我们今天听到的演讲是异乎寻常的，我就会讨厌您了。”第二个星期，我也写了一篇关于修昔底德的论文，并决意不能比皮埃尔等而下之。

453

我同那些准备获取高等教育毕业文凭或写作国家级博士论文的学生的关系不存在什么问题。我宁可让他们自己选择论文题目，尤其是国家级博士论文的题目：“如果你们头脑里没有一个题目，甚至连研究方面的兴趣和想法都没有，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写国家级博士论文呢？这篇论文不应当是学校里的功课练习。你们要为这篇论文花费一生中的几年时间，不要把这几年用来对付学校里的名流，或仅为应付职业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这种态度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端正的。而对某些导师，在某种情况下，或许有些大学生屈从于强制性的命令或者职业的

---

① 让-克洛德·卡萨诺瓦 (Jean-Claude Casanova) 后来对我说，我当时是这样说的：“自从听过萨特当着布伦什维格的面做的报告，我再也没有听说过像今天这样出色的报告。”我相信卡萨诺瓦记得对。其实，萨特的话带来希望，但不叫人目眩神迷。我这么说，不过想强调我钦佩的心情而已。

需要，对这种情况，双方都有责任。

我与研究生班的助教和指导他们写论文的前辈们之间的关系却非常难处。我的女儿多米尼克多次责备我在大学生面前把助教们弄得十分尴尬。所以，皮埃尔·布尔迪厄在1960年代初当我的助教时，在我主持的学术讨论会上可以说从不讲话。当我和皮埃尔·哈斯内尔被认为是共同主持一个国际关系学术讨论会时，有好几次我伤害了他（或者使他不快）。事实上，我与巴蒂斯特·杜罗塞尔（J. - B. Duroselle）两人配合主持一个学术讨论会的方式，对于阿隆与哈斯内尔这一对人是不合适的。在1960年代，我已经充分克服了讲话过多、与他人合作时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的恶习。皮埃尔·哈斯内尔讲话越无拘束，越能发挥其才华。他滔滔不绝地讲话，从自己的观点一直扯到他的对话者有可能产生的反对意见，包了整场戏。他的敏锐、他谈吐的分寸感使他比别人——自然也包括我——更占优势，以至于和他谈话变得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去引导讨论会，每个听众将偶然得到对自己合适的养料（或者说他口吐珠玑，奇思妙想联翩）。

话虽这样讲，那些学术讨论会，尤其是1960年我当选为兼职主任指导的第六专业学术讨论会，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自由的讨论、共同的研究，没有咬文嚼字的争辩。当然，由于每次启发报告和随之进行的讨论质量不一，各次讨论会也就很能见高低。一些今天被同辈视为科学团体之精英的人曾在这里找到了乐趣，并汲取了某些东西（比如，我想到了乔恩·埃尔斯特，他在巴黎大学通过了一篇国家级博士论文，这是继50年前他的一个同胞之后第二个申请并获得了国家博士学位的挪威人）。我收到过这种学术讨论会的一个常客寄来

的信，他的观点接近极左，他在这封感人的信里对这种讨论方式表示谢意。

至于论文答辩，我的记忆比较复杂。首先，我要说：与我的某些同事不同，我认真地、完整地阅读了所有论文。正因为同事们怀疑我不肯服从职业所提出的要求，我才要与那些工作最认真的人见个高低，并将此视为名誉攸关的事。但是，这种职业责任心，同样也表现在讲话的坦率上面，而这种坦率被别人看成苛刻也有一定的道理。评审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还指责我利用半天的答辩会上师生尊卑仍然悬殊的机会，压低别人，抬高自己，出尽风头。而评审委员会的委员使用或滥用他的地位捞取外快。

巴黎大学人人都有自己的风格。这个人喜欢挑剔拼写错误、细枝末节或英语洋腔毛病；那个人则愿意在论文送交后发表一些引人注目的讲演，而这些讲演既不能使听众了解论文的价值，也不能让十年寒窗的作者为自己的作品辩护。我一直采用坦率的办法：竭力就一部作品的主要思想和大家交换意见。为此，我得到了一个严厉甚至是残酷的名声。这个名声从某种程度上讲，对我也还合适。论文答辩时，不仅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之间，而且在审查委员会成员和学位申请者之间都展开了那种口才比赛。学位申请者常常有可能变成“亲密的同人”彼此之间竞争的牺牲品。

阿兰·图莱纳（Alain Touraine）在他写的一本书里讲述了乔治·弗里德曼、让·斯托佐尔和我对他进行的一次考试。对阿兰·图莱纳，我在过去，而且一直到现在，都确实怀有好感。在巴黎的社会学家团体里，他以优雅的风度、自然庄重的举止和绝对真诚而显得很出众。我对他没有丝毫不满和怨恨。

他要求我当他的论文指导教师，而这时他的论文已经做完了。他希望我来评审他的论文，也许他把我看得比其他教师高，也许我的出席可以给答辩仪式增加光彩。在欧内斯特·拉布鲁斯和乔治·古尔维奇两人讨论了第二篇论文（《阶级意识的经验研究》）之后——像往常一样，由于他们两人中的第一人显示口才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这个讨论会被延长了——阿兰·图莱纳旁若无人地阐述了他的学位论文，并用一首西班牙语诗歌作为结束语。答辩委员会主席让我发言，我开口就说：“让我们回到地球上来吧！”

在两篇学位论文的答辩中间有一段休息时间，阿兰·图莱纳仿佛剑客冲刺前那样说：“我害怕的只有阿隆。”这些话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当时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愈是使听众感到我对他持友好态度，我对学位论文的评价就愈加使他难堪。我批评图莱纳进行的分析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然而他并没有掌握好概念，没有哲学家的修养。我是错还是对呢？这个问题没法查考。我可以替自己辩护的是：我反复阅读了论文，并且征求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专家的意见。如果弗里德曼和斯托佐尔没有因为我的话而加倍显得苛求，那么，或许我还不至于起这样的破坏作用。图莱纳十分窘迫，几乎要放弃为自己辩护。那气氛简直令人窒息；拉布鲁斯低声对我说：“这太过分了，这简直是不可能的。”雅克·勒高夫坐在那里焦虑不安，想发言质问评审委员会的成员们：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的导师兼保护人乔治·弗里德曼和对第六部并不熟悉的斯托佐尔。阿兰·图莱纳整整几个星期，在梦中或不如说在梦魇中都会再次见到那天下午的情景。晚上，他接待了事先邀请的全巴黎知识界和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一个夫人对我说，那个

进山门的招待会开得叫人十分难受。拉扎费尔德却颇为欣赏对学位论文的公开讨论，他告诉我说，我的即席发言简直可以照原样发表（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尽管在其他场合我也用同样的坦率态度来讲话，但是从未有一场论文答辩达到这样的紧张程度。我同米歇尔·克罗吉埃（Michel Crozier）进行讨论；我的意见并不都是恰当的，听众不止一次对他的敏捷答辩报以掌声。我与弗朗索瓦·布里科（François Bourricaud）和亨利·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的谈话一直是温和而友好的。

我特别记得有两篇学位论文，我对它们的主要观点提出了疑问，然而这并没有使论文的作者过于慌乱不安。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是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希望获得国家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阐述了马克思的思想，题目是《从异化到享乐》。乔治·古尔维奇就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他的思想的各个阶段以及1837 ~ 1848年他所受的影响，与纳维尔讨论了两个多小时。古尔维奇倾向于圣西门和费希特，纳维尔则倾向于黑格尔和唯物主义者。当时钟已走过7点半，我才发了言。我只提了一条意见，而它却是一条触及实质的意见。照纳维尔的看法，卡尔·马克思把数量引进经济分析，他在经济学史方面的决定性贡献正在这里。然而，由于剩余价值观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我便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是否计算了剩余价值？”显然，尽管马克思通过一些数据设想（而不是确定资本主义）积累了很可观的剩余价值，但人们并没有计算过剩余价值（通常，他设想剥削率为100%；换句话说，剩余劳动——为生产与工资相等的价值而进行的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劳动——在一天中



要占半天)。纳维尔, 如果我的记忆是准确的话, 除了回应说马克思试图确定数量这一点, 几乎无言对答。拉布鲁斯起来想替他解围, 然而他的论据贫乏, 或者毋宁说是毫无意义的。他对我说: “人们还没有计算剩余价值, 但这并不表明在下个世纪人们还不知道它。” 明确指出剩余价值观念脱离了量化概念的理由, 对我来讲是很容易的。唯一有价值的答辩是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做出的: 另外一些概念, 另外一些理论, 没法用数量计算, 但并不因此而没有意义(比方说机会的价值)。我本来会同意这个回答, 但是纳维尔的论文不管怎样已站不住脚了。卡尔·马克思肯定是研究了他那个时代可使用的统计数字; 如果那时有国家簿记资料, 他也会赶去进行研究的。至于他的主要贡献, 比如《资本论》第一卷, 计算只是在推理时以数字说明的形式起作用。同样在那里, 他对造成谵妄的幻想起了很大作用。如果剥削率达到 100%, 那么当人对人的剥削最终被消灭时, 领取工资者积攒下来的收入应该有多少呢?

457

另一次论文答辩我也还记得, 那是一个希腊人, 名叫阿克赛洛斯, 他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又是一个海德格尔主义者。他的研究名为《马克思, 技术的思想家》。或许海德格尔的一篇论文启发了他, 因而他把马克思的思想与技术在全球的传播联系起来。我的同事帕特里奥尼·德·冈迪亚克是科斯塔斯·阿克赛洛斯的朋友, 他知道我对这项研究的保留态度, 因而希望推迟我发言的时间。可以说, 我只提出了一个问题: 关于技术, 马克思写了什么著作, 他的技术哲学是什么? 他回答我说: “这也许是作者思考中缺少的主要对象。” 对话没有再深入下去。

由于我已经下决心充分完成我作为社会学家的义务, 因而

就在第六部创建了一个研究中心，叫作“历史社会学欧洲中心”。皮埃尔·布尔迪厄是秘书长和鼓动者。直到1968年5月事件造成我和他的关系破裂前，他一直是实际上的领导人。在涂尔干直系门徒这一代人，与通过经验调查而由信奉哲学转向社会学的那一代人之间，我属于中间的一代。如果在1945年我去波尔多大学当了教授，我会不会做调查工作，并同大学生一起当学徒，或许会，但我不敢肯定。乔治·弗里德曼的转变不彻底。对我来说，返回巴黎大学太晚了。我已经50岁，又不愿意放弃新闻工作和在法国政治中的活动；国际关系（它很少需要经验调查）占去了我一半的注意力和时间。皮埃尔·布尔迪厄服完兵役回来，已经做了实地工作。他的确尽其所能，不负众望，成为他那一代人中的“大人物”之一。当时他还没有露出未来会变成这样一种人的苗头：宗派的头目，自信而又喜欢支配人，大学里搞阴谋的专家，对那些可能使他不愉快的人毫不留情。从比较人道的角度来说，我对他还有其他期待。

458 我在巴黎大学的职位使我加入了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委员会。我在那里既体验到了官僚主义，也体验到了各个压力集团间的斗争。委员会要审查研究员候选人的资格，也要考察研究员的补缺和晋升问题。社会学家们——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并取得了成就——不大重视文凭（比如大、中学教师资格会考证书），他们自己也没有这些文凭。除了文凭，候选人拟订的规划对选拔也起决定作用，至少从原则上说是这样的。委员会成员们全都真诚地力图找到最好的候选人，他们的意见不会一致，因为政治观点、派别关系、关注领域各不相同，相互交叉或者相互排斥。民主管理中的专断毛

病，有目共睹。

做了四年的社会学委员会主席，我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并改善了我们的工作。当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是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对我的耿直感到心悦诚服的时候，他们常常听从我的建议。最使我受震动的是，当委员们做出了公正的决定时，他们几乎所有人都露出某种满意的神情。这倒小小地证实了我对人之本性的那种根深蒂固的乐观态度。这些社会学家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也会叫自己的感情和派性给正义让路。

对我来讲，1955~1968年是大学活动最多的几年，这几年的活动主要是对阿尔及利亚问题、1967年戴高乐将军的记者招待会以及1968年5月事件分别做了一次引起轰动的表态。在这13年中，我根据笔记发表了我所讲授的课程中5门课程的讲义<sup>①</sup>；在课堂上我讲授了《和平与战争》中的一部分，但是后来我完全重写了；我给政治学院讲授了第一堂在法国从未开过的关于核战略的课，事后我用3个星期写了《大辩论》。1957年，我汇集了3篇分别谈论右派、衰落、战争的论文，编成了《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1965年，我为大不列颠百科459  
全书出版社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一本书，这本书等到1968年才在法国出版，题目是《进步梦幻的破灭》。相反，我没有利用为时一年的关于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的那门课和关于斯宾诺莎的政治思想的课，我也没有利用为时一年的（每周两小时）关于马克思的课和关于平等的课（每周两小时）。这

---

① 《工业社会十八讲》《阶级斗争》《民主制与极权主义》《社会学主要思潮》（这门课的题目是：历史社会学的各个重要学说）。

样的教学从某个方面来讲是偏离了现实、偏离了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问题的。

在我看来，这几年的教学——我再重复一遍——是一种幸运。它帮助我不是在遗忘中而是在接受中重新找到内心的平衡。对于大学生、巴黎大学以及社会学思想在法国的发展，这是否也是一种好的机遇呢？对此我不好做出答复。不管怎样，这里有一些意见是我的大多数同事会接受的。

通过讲授课程和撰写文章，我对发展社会学家团体做了贡献。涂尔干在他的第二篇论文里，把孟德斯鸠和卢梭当作社会学的先驱。我在解释《论法的精神》一书时，曾把它看成一本已经受到社会学中实际问题的影响的著作。如果仔细斟酌一下，那篇论文几乎是平庸之作，但它已被遗忘了。同样，我甚至提醒我的学生和同事们注意：托克维尔是属于他们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不是社会学思想的先驱，而是一个拓荒者。托克维尔过去被那些没有发现他是一个伟大作家的哲学家、文学史专家所忽视，而今后，他将被归入社会学家、研究美洲文化的专家和历史学家的行列。弗朗索瓦·富雷(François Furet)对《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是尊重的，并把这本杰出的著作列入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文献。当然，在丰富法国社会学家的历史意识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强调自己的功劳，去强调将是可笑的，而且与社会学的思想也是不协调的。我对这种意识的丰富所做出的贡献，就像战前我帮助人们理解马克思·韦伯的伟大一样。

当然，在塑造我所描述的7个伟大人物中的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形象时，我同涂尔干派的正统观念决裂了。乔治·达  
460 维作为忠实的继承人，在一份批评报告中告诉了我这一点。一

个比较宽容的英国社会学家对我夸奖备至，但也没有忘记提醒我说，涂尔干是杰出的社会学家。好吧，可是，他尤其是一个唯社会学论者。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著作可能包含了唯社会学的所有错误：认为社会学的解释方法比别的解释方法拥有更高的权威；使用“社会”这个概念时，把它看成囊括一切的、具体的、范畴分明的现实。在这个概念中，价值和现实的意义混淆不清，以至于他因此做出判断：在社会与宗教信仰的对象——上帝之间，他看不出有什么区别。涂尔干的天才不会让人怀疑他胸襟狭隘，也不会让人怀疑他盲目狂信。

乔治·达维批评我从社会学滑向了政治学。除了学院对学科所做的区分，这两个学科的区分有什么意义呢？在达维的反对意见中有价值的是：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都没有脱离古典哲学的传统，即使他们两人都强调社会状况与政治制度的联系，并因此揭示了政治制度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后果。与孔德和涂尔干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宣称社会因素统治政治因素，没有走向极端，说与社会因素相比，政治因素微不足道。奥古斯特·孔德和埃米尔·涂尔干<sup>①</sup>在政治方面都没有传世之作，特别是对他们本来认为与现代社会精神和要求相符合的政体，没有留下任何重要著作，这不是偶然。托克维尔归根结底还是研究政治的，所以至今还能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孟德斯鸠与托克维尔探讨政治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后果，孔德与涂尔干则从社会整体性出发，只给政治以次要地位，那么，该不该把两个学派对立起来呢？或许应该，但是社会学为

---

<sup>①</sup> 对于涂尔干的评论可能太严厉了。在“社会学课程”中，在中间团体的问题上，他发展了带有浓厚托克维尔色彩的观点。

461 什么非要建立在一些假设的固定主张之上，非此，社会学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了吗？在我看来，我的功绩是坚持认为社会学不包括唯社会学的哲学。我的错误是没有深入分析，没有在解释的方式和社会类型的争论中表态。我所写的关于历史的解释和理解、国际关系、法国社会或发展方式的著作，都绕开了决定论或功能主义的极端方式。在巴黎大学和法兰西学院，我本应对这些原则性争论表态的。

尽管我有点犹豫不决，但我自认为在巴黎大学的天地里，我对社会上的议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引用赫鲁晓夫的报告时，我提醒人们注意土地的集体化、莫斯科的诉讼案。关于“工业社会”的三门课给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工具，然而不幸的是这三门课令我惋惜，因为它们本来是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它们没有使那些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感到人生地疏。它们划出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展开了意识形态的竞争。它们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不管怎样，它们给大学生和有文化的人提供了一个发达社会中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和自由民主制的景象。

除了这两个功绩，我忘了最主要的。我是否启发了一些人的思想？我是否帮助一些大学生度过了他们的青年时期并帮助他们克服了苦恼？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还对我的课留有深刻的记忆，并感到从中学到的东西，超过了弄张文凭的本领，何况这种文凭已经相当贬值了？我不知道，而且永远也不会知道。当然，和我亲近的人，如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雷蒙德·穆兰（Raymonde Moulin）、让·巴什勒（Jean Baechler）等人——这里只提几个最知己的好友，他们各有特点，与我也不同之处——肯定都不会否认，参加我的学术讨论会以及和

我谈话都是有收获的。除了这些为数不多的人，我怎么会知道别处的情况呢？一名法国教授是在同默不作声、严阵以待的听众讲话。有时他思忖着是不是听众们没有听演讲者说的话，仿佛杂技演员在表演而观众却不赏光。法国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在我看来一直是我在世界上遇到的最挑剔、最负心的听众。 462

我开了十几门课，也用英语、德语做过学术报告。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我一向不难赢得听众，可以说我不难感到他们的实际存在。人们对听众讲话——我一直这样做——而不是照本宣科或背诵准备好的讲稿时就会猜测听众的反应，猜测什么时候话题使他们厌烦，什么时候唤起他们的好奇心，什么时候会引起听众的混乱骚动。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学生们，我几乎一直对他们抱有好感，特别是他们的知情达礼。他们那种善良的、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使来自巴黎大学的我心满意足，甚至受宠若惊。

在哈佛大学，我对一些出类拔萃的大学生做了一个即席讲话。散会后没有几分钟，他们当中的一个就过来对我讲：“我刚给我的女朋友打了电话，告诉她今天晚上和您在一起，我是多么高兴。”另外，我还收到一封信，那是在一堂课上，面对几百名老成持重、自信而沉默的学生，我不禁流露出一种孤独感。事后一个大学生给我寄来一封令人感动的信，可以说它安慰了我，或者说使我安了心。

为什么法国大学生几乎从不表现出英国、美国或德国学生那种愉快和友好之情呢？考试或会考制度可能是一种因素。或许巴黎大学的学生们已经成了性情孤僻的人。他们了解助教，但是几乎不了解教授。他们不表露自己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或

许他们也同其他国家的学生一样感受到了。几年后，一个学生——他现在是大学校长——对我讲起我开设的关于孟德斯鸠的课，就好像这门课在他的读书生涯中是一个重大事件。可以说，对于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并希望完成它的教授来讲，法国听众的抵制情绪是一种挑战。在巴黎大学，一直到最后，我都在努力战胜那些课程，下决心要赢得这几百个人、这几百个年轻的头脑。他们中的一些人当然早就被我争取过来了，另一些人则难以对付，我梦想着用语言把他们团结到一个令人愉快的共同体中。

463 从1955年到1968年这一时期，在巴黎知识界和学术界，在法国和外国，我的处境逐渐发生了变化。1945~1955年这个时期以《知识分子的鸦片》告终。这本书由于背叛知识分子而给我招来了滔天大罪，但并没有妨碍我入选巴黎大学教授。1955~1968年又以轰动一时的《难觅的革命》而宣告结束。这本书使我得到更多人的承认，在国外可能比在法国还要多。非马克思主义的或前马克思主义的左派阅读了《工业社会十八讲》。编年史出版社围绕《和平与战争》组织了一次书面的圆桌会议。哈佛大学、巴塞尔大学、布鲁塞尔大学、牛津大学等大学授予我的名誉博士学位，证明了国外大学对我的欢迎。在英国，我被邀请去做了被称为引人入胜的演讲，在苏格兰（阿伯丁大学）出席了吉福德讲座，在牛津大学出席了萨哈罗夫演讲会，在剑桥大学出席了马歇尔演讲会的讲座，还在牛津大学出席了齐吉尔演讲会的讲座，在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大学，我也同样开了讲座。1963年关于托马斯·杰斐逊的演讲于1965年汇编成《论自由》一书，等等。



作为记者和教师，我没有理由指责公众和制度的不公正。我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那天，甚至在开始上课的那天晚上，想起了我那在灾难中结束了生命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会因为儿子的成功——他们会这样说的——而得到宽慰的。从个人来讲，我不能确定已经完成了自我实现。1970年，我认为自己还年轻，或者毋宁说还没有感到年龄的负担；我没有计算怎样才能更好地使用我或许尚存的时间。也可能像那些评论常常写的那样，我是一个理性的作家；然而对于我的生涯和著述是否井井有条，我还是抱怀疑态度。

## 第十四章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

464 1956年，三件大事震撼了欧洲并扰乱了法国知识界：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几乎同时发生的匈牙利革命和法英远征。

赫鲁晓夫的讲话使西方的公众舆论、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目瞪口呆。由于法国人是时间最长、最固执地拒绝承认古拉格劳改营的现实和苏联政体性质的人，所以这个震动就更加剧烈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简直可以说这篇著名报告没有暴露任何秘密。大清洗、古拉格劳改营、整批居民迁移流放、莫斯科大审判，那些有心了解情况的人对此并非不知道。然而，甚至让-保罗·萨特和莫里斯·梅洛-庞蒂都在《现代》杂志（1949年5月）中承认说：“当1/20的公民被关在集中营里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但是关于这一点，他们的作品中只出现了一次，但通过哲学评论并非没有减轻这种对现实的让步，他们的评论我直接引用：“我们的共产党人能接受集中营和压迫，是因为他们指望由此通过经济基础产生奇迹，出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他们错了。但这正是他们所想的。”古拉格劳改营还不足以说服存在主义者：苏联站到了营垒的错误一方。“不管苏联现实社会的性质如何，在力量的平衡中，它大致站到了反对我们所知的剥削形式的斗争力量一边……”结论是（如果可以下结论）：“殖民地是各民主制国家的劳动营地……”

465

赫鲁晓夫的报告所“揭露”的大部分事情，法国人在前共产党人（鲍里斯·苏瓦林、安东·西里卡、维克多·谢尔盖、克拉夫琴科）或社会学家（大卫·鲁塞、米歇尔·科里内）的书中是不难找到的。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一下证实了，那些粗浅的或者执拗的“反共分子”的“宣传”原来都是真的。

说实在的，赫鲁晓夫并没有讲出“真相、所有的真相、唯一的真相”。关于党内大审判和大清洗，他讲的基本上是实话。关于斯大林本人，他还没有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他并不放弃为了省心省事而编造谎言。他不满足于从根本上推翻斯大林元帅，他丑化斯大林，将其说成是一个可怜虫，没有能力领导战时的国家和军队。

共产党人和接近共产党的人，甚至非共产党人都必须在两种态度中做出选择：要么公开宣布过去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要么全然相反，抵赖自己写过的东西，硬充事后诸葛亮。法国共产党人迫不得已采取了第一种态度；或多或少赞成共产党的左派人物则宁可采取第二种态度。两种人里面绝大多数人对于真情实况都采取了轻率的态度。在苏联，我问过一名共产党知识分子，从他名叫奥拉伯·奥格鲁来看，他大概是土耳其裔，我和他有些私交。我问他：“赫鲁晓夫报告使你了解了什么吗？”他犹豫了几秒钟后说：“几乎什么也没有。”他属于共产党第二代，他的父亲领导过一个集体农庄。

环境促使我参加了一些论战。在《他们一向是这样说的》的题目下，我抨击了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和莫里斯·迪韦尔热。在《法国观察家》杂志中，前者曾这样写道：“对于历史学家来讲，针对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466 作用、他的糟糕的估计和错误，赫鲁晓夫所做的那些揭露没有任何令人惊奇的地方。”我用他写的斯大林传记中的一段话来反驳他：“实际上他是自己的总司令、自己的国防部部长、自己的军需官、自己的后勤部部长、自己的外交部部长，甚至是自己的礼宾官……接着他采取了一个惊人的行动，他把西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1360 个工厂撤往伏尔加、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在 4 年的战争中，他日复一日地、几乎无时无刻地保持着耐心、韧性和警惕。”我评论说：“多伊彻在个人崇拜的时代是这样讲的。今天赫鲁晓夫揭露的事竟然一点儿也不使他感到惊讶，照赫鲁晓夫的话，斯大林一直在捧着一个地球仪指挥作战。我不相信赫鲁晓夫对战时斯大林的作用看得很对。他夸大其词，多伊彻亦如此。”接着，我和多伊彻两人展开了一场颇长的论战。我的对话者终于提出不要从狭义上去理解他对斯大林在战时的作用的评价：这些评价是讽刺性的，是说反话。论战逐渐涉及未来的景况，多伊彻考虑到各种场面，其中包括出现一位拿破仑，唯独没有考虑那可能性最大的正在发生着的情况：政体保持原来的建制，但排除了斯大林身上那种病态的过激行为。

我指责莫里斯·迪韦尔热针对赫鲁晓夫报告所写文章的措辞：“与以前的大多数暴君比起来，斯大林既不好也不坏。”我让他想想他曾对法西斯一党制和共产党一党制做的比较：“在俄国共产党内，社会等级的特点消失了：精英人物的定期流动成为可能；与群众的联系建立起来了。”进一步再谈到大清洗时，他说：“俄国一党制仿佛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各个支部连续不断地更换。对各种清洗的害怕使党员们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不断地激起他们的热情。”我的评论如下：“赫鲁晓

夫像一个庸俗的‘一贯反共分子’，对那些毁掉军队、行政部门和共产党主要部分的大清洗很愤慨。莫里斯·迪韦尔热比这种庸俗的愤慨高明得多。清除党员对党的生命力就如同‘更新细胞’一样，对有机体的健康大有好处。”

我在1956年7月10日写了一篇文章，结论是这样的：467  
“赫鲁晓夫的报告不能为斯大林时代盖棺论定。歌颂这个伟人的话，也同样不算盖棺论定。但是对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采取等距离的态度也是不公平的。当涉及大清洗、整批居民的流放和彻头彻尾捏造的供词时，反共分子是完全有理的。真理不会始终是中庸的。20世纪的专制暴行就是无度的。”今后，我仍然会以同样的措辞坚持这个结论。

不幸的是，当我重读我为《费加罗报》写的关于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和法英远征的文章时，我却不再感到满意了。在某种程度上，好战的气氛以及泛滥到巴黎的黩武思想毒化了我。我从不赞成军事行动；正当匈牙利发生革命时，以色列、法国和英国联合作战，这在我看来是荒诞的，而且使我很气愤。然而，我看到重新占据苏伊士运河的威胁可能促使纳赛尔上校与运河的用户进行谈判并能达成协议时，就听凭自己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

事后，我自责没有果断地把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是的，纳赛尔上校进行国有化的方式是挑衅性的，但是对于英法运输石油的船来讲，国有化一事并不存在禁止它们自由通过运河的严重危险。关于领航员的作用“不可缺少”的说法，我本应立即揭露它，尽管我对运河的通航情况一无所知。<sup>①</sup>安德烈·希尔巴赫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个神话负有责任。

---

<sup>①</sup> 我记得一个船长的信曾讲过这个传说：在运河上航行没有任何困难。

468 幸好，尽管我中了毒，但还没有到发狂的地步；我从来不同意把 1936 年 3 月的事件与 1956 年 7 月的事件进行比较，也不同意说近东事件将会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如下论点：“与 1936 年 3 月进行比较，错误体现在很多方面。德国军队一旦进驻莱茵区，除了战争以外再没有什么能把它们赶走，而且欧洲的力量对比肯定要发生变化。纳赛尔上校尚未最终掌握运河，即便他在后来的谈判中取胜——而这是不大可能的——他毕竟还没有成为一个军事强国的首领。”（1956 年 8 月 4 ~ 5 日）

1956 年 11 月 2 日，当法英远征开始时，我警告人们不要存什么幻想。我说：

暴力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在阿尔及利亚，几个月来，人们很不理解暴力是为何种对象服务的。今后有必要让那些目标不致引起人们的任何疑虑，应当使我们的领导者和世界舆论清楚地了解这些目标。反对人们所称的阿拉伯或穆斯林的民族独立运动，简直是发疯，突尼斯和摩洛哥已经宣布并最终获得独立，对此提出疑问也同样是发疯。在北非，法国的目标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巩固并加强温和派的力量，这些温和派既向往民族独立，也同样渴望与法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在苏伊士是找不到解决突尼斯、摩洛哥或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办法的。我们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机会，就是敲敲那些表现出泛伊斯兰主义的狂热的人的脑袋，给我们的谈判对手以最大的勇气……

今天，我们大家都很难理解，正当举世谴责殖民化历史的时

候，英国人和法国人为什么要去冒这样的险。联合王国已经无偿放弃了它在亚洲的属地。印度一旦独立，保留印度的航道还有什么重要意义？埃及作为运河的负责人，为什么不会设法尽力满足用户，以增加它的收入？事实上，如同我那时多次写过的那样，苏伊士事件包含双重赌注：通行自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向西方人挑战的纳赛尔上校取得威望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会造成的后果。面对纳赛尔的挑战，感情上的反应比政治上的估计更多地影响了英国内阁和居伊·摩勒政府的决议。英国人和法国人不愿意、也不应当忍受这种侮辱。因此，在巴黎和在伦敦一样，传闻四起，军事准备也开始了。从个人来讲，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以后几个月，特别是秋季，我不再相信法英会采取行动；威胁是为了帮助谈判。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避免事先谴责对苏伊士运河的占领，毫无疑问，我错了；在香榭丽舍圆形广场的《费加罗报》报社群情激动，布里松尤为激动，但这不能成为我的借口，只能说明我的几篇文章为什么模棱两可。

469

以色列部队进攻西奈半岛时情况就不同了，伦敦政府和巴黎政府同时借口让交战国停止接触，向开罗发出了最后通牒。法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勾结是毫无疑问的。反对实行了几个月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看起来几乎只是一个打垮纳赛尔上校的借口。这件事从道义上讲是没法自圆其说的，而在军事上也不怎么妙。大家都知道，为了侥幸取胜，非得速战速决。然而，最后通牒发出以后，过了几天英法才开始登陆。欧洲各国的外交并没有取得美国政府的宽容。正置身于竞选连任活动中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勃然大怒。在伦敦，社会舆论对这种无赖的炮舰外交是很气不平的。英镑抵挡不住那些自发的或是受华盛顿影响的打击。英国首相与其说是向布尔加宁那封提到苏联导弹的恐

吓信屈服，不如说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在这几个星期中，我的文章对美国也没采取宽容的态度。美国的外交政策惹恼了纳赛尔上校，这不仅仅是由于它拒绝给阿斯旺大坝提供资金，而且也由于它拒绝的方式。杜勒斯从这一个会议跑到那一个会议，多方活动，想劝阻英法不要干预。最后，在联合国，美国竟和苏联站在一起谴责它的同盟者。与此同时，它也在大会里纠集了大多数人，谴责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

470 近东和东欧同时发生的危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教育了我。大国之间的勾结在我看来可以说是很明显的了。两国都要求自己的卫星国或同盟国服从自己的命令；当然，匈牙利渴望自由，从本质上讲，不同于英国想保持自己的帝国地位这种徒劳意愿，也不同于法国想用侮辱纳赛尔来打垮阿尔及利亚的反抗者这种徒劳的意愿。然而，表面上仍有类似之处：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不能依靠任何外援；曾经是强国的西欧民主国家没有美国的赞许，也不再拥有诉诸武力的能力。

在这几个月里，也就是7月至11月，我对谈判、军事准备，以及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争吵了解得不多。我没有料到，美国人明知法英两国集中了军队，却没有告知他们美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我更没有想到法英的计划在政治上荒谬到这种程度，如果稍微乖觉一点儿，登陆应在最后通牒发出后立即进行，造成既成事实。不管怎么样，结局仍会是一样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出于不同的理由，都想叫纳赛尔垮台。在苏联的支持下，纳赛尔居然不买这个账。最后，法国人和英国人只好空手而归，徒呼奈何。至少，这样毕竟免掉了一场弄巧成拙、丢人现眼、贻笑大方的丑剧。他们如果当真占领了运河地区，那才像唱经班的小和尚，耍手段碰一鼻子灰。



在这令人惊愕的失败之后，我感到需要毫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给《明日》周刊投了一篇《费加罗报》不会发表的文章。法国人和英国人把世界舆论从匈牙利悲剧转移开去，而且有可能鼓励了莫斯科的政治寡头去进行镇压。“既然同盟国想表现其独立性，美国就把自己的原则置于友谊之上。美国把它最亲密的盟友的失败变为自己的胜利。”我在下文提出：政治家拔出了剑，就得在台上一决胜负。我说：“如果他们胜利了，还可以减罪。然而，他们失败了。” 471

居伊·摩勒政府投身于苏伊士冒险，因为埃及人支持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并展开了一场狂热的反法宣传。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策显得更加危险了；我们成了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头号攻击目标。我要求共和国总统召见我——这种事我一生顶多做过两三次——想告诉他“绥靖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勒内·科蒂友好地接见了我们，他讲了话，在我们会面的65分钟或70分钟里，他几乎只给我留有5~10分钟的时间讲话。我告辞后，他没再说什么，似乎对我十分满意。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一书于1957年6月初，即我返回大学两年后出版；这下我就被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此时，就连居伊·摩勒和布尔热·莫努里（第四共和国历届参议院主席中最被忽视的一个）的政治对手，即“自由派人士”，都不使用“独立”这个字眼。他们谴责镇压、酷刑，他们建议进行谈判。《世界报》和《快报》都是执政者的眼中钉，也都没有明确指出它们认为既合适又可行的解决办法。这样我就违反了外交方面那种或明或暗、捉迷藏的规则，或者说在从一个场面转入另一个场面时，我鲁莽行事了。进行谈判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要思想和行动的勇气：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独立

的权利，就不会有谈判；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意味着至少有一部分法国人不得不离开阿尔及利亚。

在这几个星期里，该书文字简练而激烈，加之我是作者，更引起众人的议论：《费加罗报》的评论员改变了立场。为什么？同行中竭力使我失去信誉的不乏其人，他们要么否认我有任何长处（你说的都已经人所共知），要么强加给我一些不同于“左派”的，因而也就不那么体面的动机。

472 我的表态当然使那些不了解我的人，甚至那些自以为了解我的人感到惊讶。可这并不标志着我的思想出现了断裂，或许是由于我的过错而给人们造成了断裂的印象。事实上，1943 ~ 1944年在伦敦与朋友谈话时，那时胜利已无疑问，我一直认为法国在战后不再拥有维持帝国的殖民统治的必备条件<sup>①</sup>；借自由的名义进行战争，将会激起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意识，将使受奴役的人不再尊重他们的主子，使主子们想用武力来维持威信。立即放弃印度支那，或者更明确地讲，在法兰西共同体内立即给予印度支那三国独立自由，这在我看来是第一个必不可少的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大部分的人力、物力投入北非和黑非洲，以便通过一代人的努力逐步解放我们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这些观点在戴高乐紧跟派那里给我招来了可疑人物的名声，姑且不提“背叛”这个字眼——那些硬要垄断爱国主义的人喜欢用这个字眼来指控别人。

1945年那段令我记忆犹新的插曲既表明抗敌人士的思想状况，也说明了我自己的观点。在《国际事务》杂志（1945年10月号）上，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对法国外交政策

---

<sup>①</sup> 如果我使用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那就谁也说服不了。

的思考》。我在文章中提醒人们注意，保持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构成了法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我还指出：

法国的殖民地并非全都位于兵力所及的地方。遥远的殖民地并不体现为一种物质利益。我们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有可能起重要作用的地区是地中海，尤其是西地中海。法兰西帝国中唯一能够有效地补充我国资源的是黑非洲。从1942年年底起，非洲就是法国复兴的摇篮，并且就我们的前途来讲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了坚持根本立场，在其他地方的让步是可以考虑的。应当补充说，保卫帝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单纯简单地维持现行的殖民制度。相反，具有开明性质的改革可能是帝国继续存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473

我的话说得何等谨慎！莱奥·哈蒙是当时一家刊物——好像是一家季刊的社长，这家刊物曾经出版抵抗运动研究委员会的著作，却拒绝接受我写的这篇约稿，原因是其中有“其他地方的让步”。在前一章里，读者已经在《连锁战争》中看到有关印度支那战争的几行论述。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序言里，我写道：

从个人来讲，我是对自由主义略感惋惜的凯恩斯主义者，赞同与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民族主义达成协议，确信大西洋联盟的巩固是和平的最好保障。根据人们对政治经济、北非或东西关系的看法，我可以被划为左派，也可以被划为右派。

我也没有参加关于1947~1954年的越南问题的讨论。让·路

易·米西卡和多米尼克·沃尔顿在访谈我时批评了我的半沉默状态。我认为他们说得有理；事后，我很惋惜没有用白纸黑字记录下来我私下说的那些话。我本应多谈谈，特别是多写写。但是，当我回想起这一时期时，我并不感觉自己像那些年轻的审讯者所期望的那样有罪。在冲突的最初几年里，即1947~1950年，继冷战而来的有多种波折变故、对柏林的封锁、法国的多次罢工和暴动、欧洲的重建，因而，冷战成为最引人注目的事件。1947~1948年，法国民族主义者责怪敌视欧洲殖民帝国的美国人。社会党人在政府中占有席位，他们并没有替法兰西联盟讲话，这个政党与其他政党相比，拿不出更多解决办法。戴高乐将军和戴高乐派猛烈抨击那种与胡志明签订协议、只有愿望而无行动的做法。我与《费加罗报》开始合作时，那种微弱的政治和精神上的权威是逐步增长的。1949年，法国成功拉住美国来捍卫联盟国家。1949年北京建立了共产党政权以后，法军在1950年的边境冲突中接连失败，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总理无须明示也明白了：他们希望结束这场没有出路的战争；他们不知怎样走出陷阱。美国人害怕法国人打退堂鼓；我用一种可悲的讽刺口气回答他们说：“法国政府甚至软弱到了无法撤退的地步。”我本不应用“甚至”（even），而应用“特别”（surtout）。撤退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要花费很大气力。

1953年访问日本后，我在越南待了一周，纳瓦尔将军向我简单地描述了他的计划：他打算在表面上不利于我国远征部队的情况下和越南人打一场仗，以消耗越南人在中国人的赞助下创建的几个师。法国军队虽然有些衰败，但仍然保持着对越军的某种优势，无论是在无防御工事的旷野作战还是传统的打法上都是这样。越军一旦被削弱或丧失了战斗力，它就有可能

变成游击队，而游击队是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消灭的，只好由政治来加以克服或同它妥协。

纳瓦尔将军的讲话是那样清楚，含有一种使人信服的智慧。我没本事检验他的论据，虽然后来的事实驳倒了这些论据。以后法国炮兵的所谓优势、越南正规军进攻我们远征军精锐部队、所谓尖刀部队留守阵地所付出的代价等一系列事件，都驳倒了他的论点。毛泽东和列宁的忠实信徒武元甲在日内瓦会议前几个星期便确定了进攻日期，以便在谈判前或谈判期间取得胜利。为保卫老挝而选择坚守奠边府阵地，这在1953年春天似乎表现为一种政治上不理智的冒险。当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时候，想从那里撤出，为时已晚。

不管怎样，从1954年起，我发誓不再像前几年那样谨小慎微了。1954年，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采取轰动一时的行动，给予突尼斯内部自治权，显然这将导致它的独立。皮埃尔·布里松自己也表示同意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由此导致了整个北非的变化。关于摩洛哥，我几乎什么都没写，但我尽全力帮助埃德加·富尔，努力把摩洛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从马达加斯加请回拉巴特，这几乎肯定会导致摩洛哥王国的独立。我参加了那次午餐，席间，当时的内阁总理埃德加·富尔向皮埃尔·布里松试探性地提到让穆罕默德苏丹回国的想法。埃德加·富尔主持的是一个杂牌内阁，其中的戴高乐分子以科尼格将军为首，反对那种模仿孟戴斯·弗朗斯在突尼斯的做法的政策。皮埃尔·布里松受到相反的影响。我向他陈述非殖民化的势在必行，我认为这也符合民主主义的思想。从另一方面讲，那些老牌“非洲派”也反复对他说——他们是有道理的——穆罕默德回国，将导致摩洛哥的独立，搞垮法国在非洲的统治事业，有可能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

皮埃尔·布里松写了一篇社论，反对穆罕默德回国，题目是《永不》。我向他指出了发表这种政治主张的危险，后人会把这作为当事人和评论者之盲目性的例子。我从没有忘记阿尔伯特·萨罗在1936年3月说的“永不”：法国永不接受让斯特拉斯堡的大教堂置于德国的炮火下。法国有多少执政者明明心里知道某些事件必然要发生，而偏偏要用空话来拒绝呀！

阿尔及利亚的反抗开始于1954年11月，即法国在印度支那失败几个月以后，也是在孟戴斯·弗朗斯访问巴尔杜（突尼斯）几个月之后。这两个插曲并没有创造出瓦解法兰西帝国的力量，却为解放这种力量打开了闸门，由此涌入了民族解放的洪涛，民族解放得到了阿拉伯人、穆斯林、苏联人，甚至西方国家无数反殖民主义者的支持。

在共和阵线取得有限胜利以后，居伊·摩勒领导的而不是孟戴斯·弗朗斯领导的政府，再没有对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提出疑问，却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本土“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拥护者的压力下支持不住了。这届政府根本谈不上选择另一条路线，只能继续奉行前任政府的方针。由于居伊·摩勒在理论上代表左派，所以竟敢派兵去阿尔及利亚，使旨在维持帝国最后一块碎片的爱国主义复活起来，或者毋宁说是为了保持这三个省为法国领土的合法组成部分。

我对阿尔及利亚没有直接的了解，因为我没有去过那儿。在我的突尼斯朋友库泰亚的家待的几个星期，并没有使我对“殖民化”生出好感，尽管在1949年那里的气氛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讨厌人口稠密的西贡，远征军的士兵充斥着那里的街道、酒馆和旅馆；“国民政府”的执政者们软弱无能，掩饰不了法国统治将持续下去。1946年，对德国的军事占领也使我

感到厌恶。

我读到的和知道的让阿尔及利亚永归法国的主张没有引起我任何好感，我的判断和信念首先来自我的思考。凭什么阿尔及利亚人要接受一个在他们看来低于突尼斯或摩洛哥的地位的地位呢？为什么这些“文明人”，这些“法国化的人”不希望得到独立（就像一切殖民地国家的优秀分子已经获得或正在获得的独立）呢？

当然，正如人们所说，“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同于东邻西舍的两个保护国，这首先是由于阿尔及利亚具有法国一个省的地位，其次是由于那里住着 100 万法国公民。在阿尔及利亚，国家的轮廓和踪迹已经没有了，而在两个邻近的保护国却保存过一段时间。至于建立在阿尔及利亚社会之中，尤其是在其边缘的法国社会，一旦阿尔及利亚政府替代了总督和总督衙门，那个法国社会就难以维持下去了。只要阿尔及利亚成了阿尔及利亚人的地方，那么部分法国人或全部法国人的离去，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我的唯一功劳（或者说我的过错）是，对许多开明人士不肯承认、更不愿写出来的事情做了彻底分析并将我的分析白纸黑字地写了出来。1955 年，《费加罗报》容忍我发表了好几篇讲述局势、强调治理的文章。1956 年年初，我上书共和阵线政府。1957 年年初，由于担心法国再一次陷入没有出路的冒险，而且这次冒险可以同印度支那事件相比拟或者更为严重，我赶紧又写了一本小册子。国家制度经受不了战争的拖延，几年过去了，一场荒唐透顶的内战已经露出苗头。我长久地思考着，我不害怕意料之中的各种打击，我所关心的是我的职责；埃里克·德·丹皮埃尔和夏尔·奥伦戈，他们两位拿走了这本七拼八凑的小册子，但不管怎样，反正我的主要观点都在里面了。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的内容是什么呢？一共有两篇文章，一篇写于1956年4月，这是写给共和阵线政府总理的，第二篇写于1957年5月6日，也就是一年之后，婉转的措辞不在我的考虑之内，对右派和左派论点的反驳在我看来是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

今天的法国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19世纪那种帝国了：

法国的革命者在以自由的名义征服的欧洲多方敲诈勒索，而他们却问心无愧。苏联共产党人以解放人民的名义，在东欧用暴力把他们的制度强加于人，而他们也问心无愧。当我们在非洲使用武力时，我们却于心有愧，可是，我们每年都要在那里投资几百亿，有时甚至是几千亿。

可是法国，或至少是相当一部分法国舆论，不同意用帝国统治的严厉的强制手段。阿尔及利亚人，或至少相当一部分阿尔及利亚人渴望独立：

阿尔及利亚尽管没有与另外两个前保护国相同的民族传统，仍然不能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它不能再作为法国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的政治的统一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体化，按照人们给予这个词的解释，已经是不可行的了。阿尔及利亚按照居民人数在国民议会中实行比例代表制，这将是搞垮现政权的最可靠的办法。地中海两岸的人口增长率过于不同，所以这些种族和信仰都不同的人民不可能成为同一国家的组成部分。承认阿尔及利亚不是法国的，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尊严，这实际上就是承认明天将有一个阿尔及利亚国家。这样，如果说明天将会有



一个阿尔及利亚国家，那么从理论上讲这个国家后天（如果不是明天）就将是独立的……在否认一体化的同时，人们正在经历一个将以独立告终的过程。

一体化还是独立？雅克·苏斯戴尔也从这个选择出发，最后得出了一体化的结论，因为他迎合当时的俗套，即所谓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至于我，我的结论倾向另一种选择，但我并没有建议居伊·摩勒政府在朝夕之间就放弃阿尔及利亚——而且，出于许多原因，这也不可能。我奉劝这个左派内阁清楚地思考一下自己的政策：“法国可以合理地提出的唯一的战争目的应该是这样的：让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不要让法国人以自认为丢脸的政策使阿尔及利亚人蒙受难以承受的耻辱……”简言之，我请居伊·摩勒承认阿尔及利亚人建立国家的权利，而这个国家将是独立的。第一篇呈文是用一句古怪的、引起公愤的句子结束的：“如果法国人只赞成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战斗……不如英勇地放弃和撤出，免得进行一种违心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既没有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没有带来成功的可能。”“英勇地放弃”这句话在当时有多少戴高乐派对此大加讪笑，而几年以后，他们却自愿捡起这个说法来歌颂戴高乐将军的伟大！

第二篇呈文是批评居伊·摩勒的政策并预见其失败的。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从不接受“停火、选举、谈判”三部曲。绥靖并不能创造自由选举的必要条件，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不会把在法国军队保护下进行的选举看成自由的选举。最后我驳斥了几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论的拥护者所引用的经济观点：今后阿尔及利亚对宗主国来讲，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

是负担。在一体化的口号下，这个负担将会越来越沉重，因为我们必须努力减少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生活水平的不平衡。

一段孟德斯鸠的语录充实了我的序言：“到处都说真话，祖国也一样。每个公民都不得不为他的祖国献身，而谁也没有义务为国家去骗人。”这两段从《法国知识和道德的改造》中引来的勒南的语录，使人们回想起 1870 年的失败的原因：“我们所缺少的，不是勇气，而是头脑。”

对我的小册子的种种评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或许是一张匿名的明信片上的话。几行字像是出自一个普通人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手：

分析是客观的、清醒的和深入的，通篇都风采高华、令人尊敬，然而这些分析对于那些感性的、出自本能的、由条件反射引起的事情来说却是完全无效的。

在那些最有意思的信件中，有一封是伊夫·布蒂里埃 (Yves Boutjilier) 写的，他先是保罗·雷诺的财政部部长，后又于 1940 年给贝当元帅当财政部部长。我不认识他，他讲的并不是我那本关于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小册子，而是几个星期前出版的《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在这个集子的关于衰落的第二篇论文中，我阐述了关于非殖民化的论点。我摘录这封信的几个片段如下：

西欧的民族主义——以法国的民族主义为原型——是一种严重的病症，战争意识中的自豪感与可怕的虚荣心微妙地混合在一起，是恶毒与暴力之母。唉，这就是我们灌

输给阿尔及利亚人和其他北非穆斯林居民的民族主义。能否使美国人明白，在阿拉伯国家中如此蔓延的革命民族主义是“人权”之敌，而清教徒在道义上又如此珍惜人权……美国能否和平地与苏联人分割阿拉伯世界呢？如果它天真地以为自己可以在一个地区保持着无可争议的影响，例如从阿拉伯半岛到卡萨布兰卡，那么它就重犯了罗斯福的错误，罗斯福在贝奈斯的影响下，把斯大林当成一个民主主义者……如果法国、撒哈拉地区和阿尔及利亚结为联邦，而这个联邦又同时与摩洛哥和突尼斯联合起来，在经济上与欧洲共同体六国联合起来，军事上与北约联合起来，那么这个联邦就会永远把整个马格里布地区笼络在西方阵营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在阿尔及利亚流血显然是毫无用处的……您写得太好了，以自由主义思想的名义通过武力维持现状是荒谬的，引用那些认为对方有理的原则是愚蠢的……人们应相信，在北非的最终失败将导致第五共和国的产生，如果不是人民阵线的共和国，至少是非常进步的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早晚要陷入集体主义的专政……所以，战争的目的非常清楚，并且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也不能分什么主次。把马格里布地区维持在西方阵营里，革新国内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当前的巨大任务，而局势使完成这项任务成为可能。这项任务符合青年们的意愿，也在军队的职责范围内。

480

这封信是用一些哲学思考来结尾的：

您写道，法国革命者以自由的名义不断进行敲诈勒

索，却感到问心无愧。这话极对，但是谁也不肯说，谁也不肯承认。我们甚至应当走得更远，我们应当承认，把普遍的和绝对的观念引进政治而不考虑历史的、具体的、特殊的前提，正是用大原则来让人们在罪恶中心安理得……这些观点是法西斯主义的吗？如果这样称呼他们的思想以迫使政治哲学家们保持沉默，那真是太容易了。幸运的是，西蒙娜·韦伊的著作，依然存在，您的著作，儒弗内尔、珍妮·赫希劳特 (Jeanne Hersch) 的著作，埃里克·韦尔的政治哲学论著，依然存在。这个具体化了的的思想表明，从事本世纪最伟大事业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让形式上的民主制过渡到真正的民主制，我赞成实行这样的民主制，这样，那些背叛人民利益和要求的人，便再也不能以人民的名义去搞把戏了……作为欧洲的空论家，您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就是，欧洲要听从苏联的随意支配。您是政治哲学家，您选择要干的事，正是他们要让您干的事，正好帮了思想敌人的大忙。

其他寄信来的人提到了所谓“欧洲解决办法”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人可能怀有的敌意。下文我还要谈谈那些没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性。现在，我只指出几点：我们的欧洲伙伴没有一个愿意参与阿尔及利亚的事情；赞成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论的人是些盲目的国家主义者，他们想单独决定我们在北非那些省份的前途。所考虑到的具体情况，现实主义的政策，已经预见到他们的国家独立以后，阿尔及利亚的自由与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可能发生矛盾，但是不能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优先性，理由很简单：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阿尔及利亚，既不会有国

家的自由，也不会有个人的自由。

那些怀有敌意或荒谬的来信——把伊夫·布蒂里埃写的信算在里面是不对的——我举不胜举。一个医生——阿尔及尔医学院的教授这样写道：

阿尔及利亚人非常欣赏你乐意提供给他们的放弃这个国家的明智建议。他们希望在一部著作里，你能把这些建议扩展到以色列国家，这个国家的土地并不比阿尔及利亚的领土更为慷慨。如果你认为你不能考虑这个颇为重要的问题，你就会使我们相信，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很少是出于法国和法国人的利益，而较多的是出于你们同教门的利益：事实上，我们知道，孟戴斯曾经想把整个北非送给东方国家，以便在那里欢迎所有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并使以色列国家摆脱一个永久性的烦恼。

这封信是由一个医学教授写给一个所谓“亲爱的同人”的，这就足以使人想象出其他更没有教养的来信者会写出什么样的信。

罗伯特·拉科斯特，当时住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部长，仅仅读了《世界报》发表的那个小册子的几段节选，就把他“私下的一些想法”告诉了我：

谁告诉你现在实行的绥靖政策是我的唯一观点？当我的每一句话都会对我们的对手产生直接影响的时候，难道我有权利讲出我所有的想法吗？你知道，我的职责是在这里尽可能创造最好的条件，以便在政治上公正地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你知道得很清楚，暴力和恐怖是反叛政体的

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上支持叛乱分子的政治体系。对我来说，对任何人来说，却不可能脱离这些现实，除非想要进行可耻的谈判，使我们的国家处于一种由我们的敌人任意践踏的可笑地位，就如同床前踏脚毯一样。

482 抱有敌意的信件不太多；表示赞成和祝贺的信件却潮涌而至，有的来自大学的同事和朋友，有的来自官员以及经济界和政界的知名人士。在发表了这个小册子之后，第一次，也可能是一生中唯一一次，我被拖入“政界”。即使在 1946 ~ 1955 年，那时我尚未重操大学教师的旧业，可我仍然是像大学教师那样而不是像新闻记者那样生活。在各个部的邀请名单上是没有我的名字的，更不要说爱丽舍宫了（在第五共和国时亦如此）。1957 年的最后几个月，一些撰写关于阿尔及利亚报告的高级官员开始与我建立联系。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发言人皮埃尔·亨特在 1979 年对我提起，我们曾在那个时候相遇过。这个时期最使我震惊的，是那些统治法国的人的信念和他们出于对“舆论”的担心而在公开场合讲的话二者之间的差距，这些人认为自己是受了“舆论”的束缚。姑且不说乔治·皮杜尔、雅克·苏斯戴尔和米歇尔·德勃雷，他们的真诚是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的，我心里思忖着，第四共和国的头面人物中是否有一人相信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论。

或许我应当补充说一下雅克·沙邦-戴尔马先生。在马塞尔·布路斯坦家吃午饭时，我曾与他进行过一次颇为激烈的辩论。埃德加·富尔“造就了”摩洛哥的独立，他把在阿尔及利亚完成同样业绩的不快使命留给了别人。在同一时期，我屡次向皮埃尔·布里松说，尽管在当权者中间我没有找到自告奋

勇的人来完成这项净化精神和民族的使命，但是，“所有人”的想法却都和我一样。我不能说服他，也要使他动摇，于是就挑动他说：“那么，你去问问路易·加布里埃尔-罗比内本人预料到的东西吧。”罗比内来会见了我们，皮埃尔·布里松首先说：“你怎样预测阿尔及利亚事件的结局？”罗比内回答得很干脆，他说：“所有这一切将以独立告终。”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很难再坚持那些幻想了。公正地说，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曾建议当局死守最后的阵地，守住最后一道战壕。而他的儿子，后来的外交部部长，与其说同意他父亲的意愿，不如说是赞成我的怀疑论观点。

新闻界——伯夫-梅里主持的《世界报》除外——是不会宽恕我的。我就不再提帕斯卡尔·皮雅那篇文章了，他在文章中责怪我提出让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撤回本土并将其安置在营地中的建议，而左派的报纸又不承认我有任何功劳可言。 483

《快报》周刊1957年4月5日号用整整一个版面刊登刚刚出版的《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一书的节选。三篇论文中的第二篇《论衰落》，简要地论述了“阿尔及利亚僵局”。论文的按语再次提出了老问题：“对于那些仍然记得他在《战斗报》上写过出色社论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左派人物；对于现在是《费加罗报》专栏文章的读者来说，他是一个右派人物；对于他在巴黎大学所授社会学的听众来讲，他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法被归类的大学教师。那么雷蒙·阿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左派偏爱的右翼人物，还是一个选择了与右派对话的左派人物呢？”编者随后立即补充说，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是无聊的——在这一点上他没有说错。

《快报》周刊编辑部从《论衰落》这篇文章中摘出来了如

下几个节选小题目：《帝国的毁灭在不久的将来是不可避免的，在1945年那虚假的胜利中就已经孕育了这种毁灭的萌芽》；《法国的扩张再不能与主权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帝国是亏本的买卖》；《没有法兰西联盟，法国仍可以生存》；《为什么不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协商?》。如果在今天，这些建议会被多数法国人所接受。一些评论——可能是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撰写的——以某种方式反对我对“自由主义者”和批评政府政策的人的指责，说他们不肯把他们的思想阐释透彻。

首先，《快报》拿“经济的失败主义”和“历史性的放弃”来指责我。“帝国是亏本的买卖”这种用语既没有被接受，也没有遭到驳斥；这种用语在殖民条约时代是错误的（不用谈18世纪了），但是，“在殖民条约失效而又未曾形成变局的情况下，这个用语毫无疑问是真实的”（我看不出这句话有什么意义）。不管怎么样，经济方面的计算不应当强加给政治方面的决定。由此而得出结论：“至于丧失阿尔及利亚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可能给今天带来的悲剧性后果，那就越发显得这是十年来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一向包含在既成事实中的一个事件。”

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面对一个历史悲剧所产生的偏见的幼稚。当然，阿尔及利亚的“丧失”并没有“一向”包含在一切既成事实之中，但是，到了1957年，法国十年来（最好说是一个世纪以来）奉行的政策造成了一种执政者应当承担责任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只能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种：要么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要么拒绝这种对话。第一种决定至少要求承认阿尔及利亚有权独立，第二种决定则要



求继续推行绥靖政策；其余的都是废话。两个月之后，让·达尼埃尔在6月21日的《快报》上信誓旦旦，在一篇署名文章里攻击我。在两个可选择的决定中，他再次放弃采纳其中任何一种，而企图在笔战中寻找避难所。他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开始了指责，把我从未想到过的计划（立即把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遣返回国）算在我的账上。那么，在《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一书中，我到底写了些什么？“依照各种可能性来看，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胜利，将会迫使一部分居住在地中海对岸的法国人离去。”这是真实的还是错误的？达尼埃尔不回答。他宁可进行人身攻击：“从保守主义过渡到失败主义，算来总是一码事。因为假如说1955年《费加罗报》曾经掀起一场运动，支持费拉特·阿巴斯先生提出的并得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同意的计划，规定阿尔及利亚的内部自治，那么阿隆先生或许就不会被迫主张从阿尔及利亚遣送大量法国人回国了。”我那时不是《费加罗报》的社长；再说，阿尔及利亚的内部自治，就算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肯同意，也会导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或者用让·达尼埃尔先生自己的话来说，那就会导致阿尔及利亚的“丧失”。

我们要问这位“开明人士”，你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能够让大家不像我一样陷入“失败主义”？他提出建立一个“生气勃勃的法国-北非联邦”。说实话，这是个有深刻含义的观点，但是，一个联邦必须以主权国家为前提。为了使阿尔及利亚加入这样一个联邦，就应当使它享有一个与其他伙伴国（如突尼斯、摩洛哥、法国）相似的地位，就是说必须享有主权或独立。我的争辩对手却忘记了这个明显的事实，他想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进行谈判，制定一项“真正

的根本法”。至于经济失败主义，这对“阿尔及利亚与更糟糕的殖民主义都是同样严重的错误”。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高度概括的话：“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已经不再是人们不知道真相，而是人们不愿意讲出真相。”那时候我就想过，甚至今天我还在想：让·达尼埃尔是不知道真相，还是不愿说出真相？

在同一期《快报》上，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用另一种迂回方式攻击我：“我看你们<sup>①</sup>指控雷蒙·阿隆先生，自己却成为笑柄。其实，他不过是整理整理别人的思想（我的意思是别人在他之前已经表达了这些思想），并且以冷若冰霜的洞察力进行逻辑推理。而这些道理本来不必郑重其事，谁都能一眼便看透。”不管是“冷若冰霜的洞察力”，还是“整理整理别人的思想”，莫里亚克和他在《快报》的一些同事，却没有拿出与我一样的分析；而且，通过他们之中一个祖籍是北非的人之笔，他们拒绝了这种分析。<sup>②</sup>

我的同事埃蒂安·伯尔纳多年来跟我友好相处，他的攻击使我吃惊和失望。不同于让·达尼埃尔的是，他首先诚实地概述了我在《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一书中的思想（而不是《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一书的）。他承认我“具备一种勇气去毫不犹豫地公开讲出并毫不含糊地写出一些别人不敢推论的结论。而另外一些人虽然无法克制自己倾向于这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动用意志来摆脱诱惑”。接着他就开始了攻击：“实证主义、抽象的智力是枯燥无情的，阻碍了他全面考虑现实，而有关使命和精神的东西，并不是没有实效的。”最妙的一段话

---

① 他在对执政者讲话。

② 有几次，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完全不是这样对待我的。

涉及我个人的结论。我同意给予阿尔及利亚人独立的权利，所以我就是一个右派人物，可以与赞成慕尼黑、赞成停战议和、赞成失败的人彼此彼此，结成难兄难弟。

雷蒙·阿隆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敌人，他宣称，右派和左 486  
派的概念是思考各种政治现实的幼稚方式。然而，这种急急为昌盛者锦上添花、匆匆对衰落者落井下石的现实主义，这种只承认天平和计算机的判决的实证主义，这种只想说明既成事实的斯多葛学派宿命论，直至这种擅长以分解求理解的巧妙分析才智，从中我不得不辨别出右派思想的各种特征。这种右派思想的特征在思想发展史中可能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右派思想有时会通过通情达理的委曲求全走向失败主义。

为了反对我这样“为命运做辩解”，埃蒂安·伯尔纳宁可按照皮埃尔·亨利·西蒙的话去“修改命运”。顺便指出一个细节，他忘了，法国在1938年、1939年和1940年曾为本国的自由而战，而到了1957年，它却为反对阿尔及利亚人的自由而战。这种遗忘出自一个基督徒，实在叫人惊讶。

雅克·苏斯戴尔用性质相仿的小册子《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和法国的衰落——答雷蒙·阿隆》来答复我。让我们举出他论战中最出色的一个例子：“如果说《快报》是拉丁区的《人道报》，那么阿隆先生就是财主们的赛尔旺-施莱贝尔，就是钢铁业的莫里亚克和金融界的克洛德·布尔岱。”苏斯戴尔几次三番提到的这个指责，实际上是针对一个敏感问题：在一场心理战中，谁顶得住，谁就赢，谁削弱自己的志气，谁就壮了敌人的威风。毫无疑问，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肯定从

我的著述中得到了好处。

在骨子里，阿尔及利亚前总督支持这样的论点，即阿尔及利亚不会提出殖民化问题：“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有权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待在那里。”随后便是经济方面的论据：“……撒哈拉的利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对于今天和可预料的未来，这是唯一可望填补我们能源亏损而不用依赖阿拉伯人或美国人的机会……法国的经济独立现在已经唾手可得。今天要付出最大代价的事情肯定是放弃阿尔及利亚，因为这意味着失掉撒哈拉。”他同样也采用了日尔曼·蒂利翁（Germanie Tillion）书中的结论：“对于阿尔及利亚来讲，法国不过是代表生死之别。”

至于“居民的迁移”——法国人从阿尔及利亚返回——他宣布这是不可行的，至少在民主制度下行不通：“人们不能抛弃阿尔及利亚，这将是不可体面的，同时也是不可能的。”除了这些争论，令人觉得奇怪的是苏斯戴尔在一些主要问题上的论点（如阿尔及利亚实行什么制度？）非常模糊，苏斯戴尔断言，放弃帝国就相当于自甘没落。法国本土将不再是法国。25年之后，他和我之间仍然没有闹个水落石出。但是，面对2000万穆斯林，法国怎么能把自己的主权强加给他们？

对于那些可以预料的来自《法国面面观》杂志——《法兰西行动报》的化身——的一般性攻击，我暂且放在一边。我要引用的是博·德·罗梅尼的一段话，这个人执拗地把自己的文章命名为《被金钱出卖的阿尔及利亚》。他说：“从雷蒙·阿隆和他的大资本家朋友的态度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阴谋放弃阿尔及利亚，并把阿尔及利亚的种种利益转移到其他国家，这个阴谋已经露出苗头……”我还记得6月26日的《十

字架报》有两篇文章是关于我的，一篇是安德烈·斯蒂比奥（André Stibio）写的，另一篇是路易·泰尔努瓦（Louis Terrenoire）的。我这里摘录前面一篇文章的结论：

采取这种行为的人喜欢一个美国式的“小欧洲”的法国，胜过一个富有海外领地的世界强国法国。他把阿尔及利亚出卖给大陆，为了盟国间的关系而让我们失去那些忠实的穆斯林。这个论点值得讨论。它出自这样一个作家，当他谈到自己，笔下总是用“勇气”这个字眼，而当他影射别人时，他就搬出了“因循守旧”或“怯懦”这些词。这个论点妙在表明了他的亲欧和亲美色彩。因为这样一来，什么都清楚了，一切都向美国治下的和平看齐，而戴高乐在今天和过去，肯定是不愿意接受这种美国治下的和平的。

然而，安德烈·斯蒂比奥搞错了：戴高乐将军同样认为，法国若要重新推行一项世界政策，那就必须摆脱阿尔及利亚战争。我采取的立场是建立在阿尔及利亚所处的世界环境这一现实基础上的，根本不以小欧洲的政策或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利益为依据。

488

特别应该提一提路易·泰尔努瓦的文章，因为就是这个泰尔努瓦成了法国-穆斯林友协的主席。在他曲意奉承我的许多话里面，有一句我至今还觉得蛮有味道：“考虑到他的过去，人们很惋惜，雷蒙·阿隆先生不可抑制地使人想起‘皮埃尔·赖伐尔’这个人，他认为各种事情在1940年就已经定局了。”参照荷兰的例子，他反驳说：“你们想想，法国人，就连最不起眼的税狗子，血管里都流着行省总督的血液，他们会像荷兰

人那样做吗？印度尼西亚不过是殖民地，而阿尔及利亚以及撒哈拉和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路易·泰尔努瓦作为戴高乐派，毕竟同意了我这一观点：“现在这样的政权是没有能力这么做的，但是法国社会，如果它愿意，还来得及做到这一点。”当戴高乐将军在一些像路易·泰尔努瓦那样的人的召唤下重新上台执政时，他不愿意，也不能够立即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谈判，更别提允许其独立了。他是3年后才这样做的。或许是由于秘密军队组织的过错，大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舍命逃回祖国。早在1957年6月的小册子里，我就对这个结局做了预言。当时法国政府奉行同一政策，5年之后这个结局证实了我的预见，对此我并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大多数法国人都离去了，但是他们是逐步离去的，是否阿尔及利亚也可以这样呢？我不能确定。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那些道德败坏的官员，还给那不可避免的悲剧添了一场不成其为内战的内战。

我从未觉得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一书需要什么特别的勇气。有人身危险吗？很小。除去来了两封匿名信外别无他事，这些信说我受到了地下“公安”法庭的审判。有精神上或政治上的危险吗？也没有。因为在知识界和政治界，大多数人是赞成我用白纸黑字写出论据和由此而得出的结论的。

我遭受的危险是在夫人街一个专给天主教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大厅里经历的。莫里斯·舒曼、艾德蒙·米歇莱应当是在我之后发言的。我在比较安静的气氛中讲了几分钟话，接着逐渐从各个角落里发出一些声音打断我。其中一个插话者用假装温和的语气对我说，你给我讲讲美鲁萨（这是一个阿尔及利亚村庄，村民都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杀害了）。当时由

于很厌烦，我错误地回答了他的话，我说：“在我们这方面，也同样有一些我们并不能引以为豪的举动。”这句话一下子点燃了火药。舒曼站起来吼道：“我不允许你侮辱法国官员。”由于得到大多数听众的喝彩，他取得了胜利。米歇莱也并没有比我更好地通过这次考验。演讲结束后，治安警察劝我等十分钟再出去；一群疯狂的人聚集在一起，可能并不是要猛烈抨击我，而是要羞辱我，以发泄他们的愤怒。让-吕克·巴罗迪（Jean-Luc Parodi）留下来，与苏珊和我待在一起，保护我们。雅克和罗伦斯·德·波旁-布赛审慎地表示他们对舒曼的口吻感到遗憾。安鲁士当时在场，他第二天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非常严厉地批评了舒曼，而且毫无保留地同意我的意见：

怎么能不同意您的论点呢？而且您不要以为我是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说这番话的，我是作为一个倾心严格的作风和主持真理的知识分子在讲话；而这正是人们应当要求知识分子具备的唯一的道德标准。当然对于您所处的状况，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勇气。这给了我一个机会，向您再一次表达我对您早就抱有的好感和钦佩。公正是智者的仁爱表现。

许多年以后，戴高乐重返政坛，阿尔及利亚也独立了，我又向莫里斯·舒曼提到了夫人街的那个晚上。当时，从我内心来讲，我对舒曼的看法并不像安鲁士那样严厉。我知道他抵挡不住当演说家的诱惑，这个演说家被听众所陶醉，听众控制了他，即便他也想掌握听众，为自己得到虚幻的陶醉。他回答我说：“既然第四共和国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为什么我还去讲

阿尔及利亚独立呢?”当然,我确实不是搞政治的料。他很愿意承认,为了使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成为可能,必须有一些人首先打破沉默。那些写作并享有一定名望的人承担着某种责任。他们的言论对事态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尽管这种影响很小。正是为了这个理由,那时我就在内心思考着我是应当讲话,还是应当沉默。宣布法国人首先厌倦这场没有出路的战争,实际上就是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我們自己的斗志。如果那时我认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符合国家利益,认为它能够使爱国的阿尔及利亚人满意,而且是能够实现的,我就不会出版《阿尔及利亚的悲剧》这本书了。就我看来,我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和任何一种政治判断相比,都是同样准确的。一个法国军队中的阿尔及利亚中尉找到了最恰当的措辞,他的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某些人认为,您的论点出于清醒的头脑和正直不苟的风格,加强了我們阿尔及利亚人的事业,所以您就没有权利摆出您的论点。真是荒唐!很遗憾,像您这样的法国人是少数……我希望您不要误解我,说我竟会把您当作我們民族独立运动的同谋者。”

小册子引起了一些议论,“放弃”的论点已经不再遭到各种沙龙和编辑部的排斥。怀着友好的热情,我們亲爱的朋友珍妮·亚历山大搞错了,她说:“我立即就想到,这可与左拉的《我控诉》相比。我有机会向一些人提到过这个类比,他们一直都同意我这个观点。”不,这个比喻是不合适的。左拉站起来反对的是狂热的、盲目的偏激,而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所抱的狂热却贯穿着疑虑。在食堂里,军官们都在讨论《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指挥官并不都同意那些颠覆战争论者,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用心理技巧就可以把阿尔及利亚人改变成法国



的爱国主义者。珍妮·亚历山大本人几个月后也认为议论已经平息了。最初，我的小册子在外面并非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约翰·肯尼迪在参议院引用了我的话；《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社论，从我采取的立场中看出思想观点转变的征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给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对于那些荒谬而流行的指责——指责我唯唯诺诺——这本小册子宣告了我无罪。然而，它没有给我洗去另一个污点：我一直是铁石心肠的算计者和冷酷的思想家。我从没有感到应当答复这些话。在夫人街晚会后的第二天，亨利·毕洛给我写了一封令人钦佩的信，我希望其中一些句子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努力避免给我们所爱的人带来更大的不幸，是一种朴素的友情……为了不使过多的法国人和穆斯林无谓地死在这场没有胜算的战争中，他写出了《阿尔及利亚的悲剧》这本书……”这样，我自以为我的行动是对的。事后想想，我到底成功了没有呢？这就是用笔墨代替行动的人老要吃亏的地方。

491

1958年夏天，也就是戴高乐将军返回政府执政后不久，我接到哈佛大学授予我的名誉博士学位，并被邀请在授予学位典礼上讲话（另一个发言人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麦克·艾尔罗伊）。第四共和国的垮台，至少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害怕出现一个外交上的莫边府而引起的。那些冲击总督署和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地方机关的人群，在四面八方吼叫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那些法国-穆斯林友协的游行在几天、几个星期中造成了一种错觉，仿佛信念战胜了计数器。从个人来讲，我没有动摇过一分钟。但是，在哈佛，再次引起对我的小册子的辩论，并且在一些对法国不太友好的外国公众面前揭露出同胞的盲目性，

揭露他们固执地把阿尔及利亚暴乱算在第四共和国的账上，我认为是不合适的，这次暴乱与一个历史运动是不可分的，而这个历史运动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欧洲宗主国的殖民地。法新社所转载的我讲话的节选使人们以为我已改变了观点，而且已转而支持——或者屈服于——1958年民众和国家的突然变化。为了澄清事实，同时也为了避免扩散那个关于机会主义转变的传说，我在《世界报》的“自由谈”栏里发表了 my 演说的大段节选，同时我还发表了另一本小册子《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

1957年，我应邀访问加拿大（法语区）公共事务学院，碰到了一大批政治家，他们中大多数还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让·勒萨日（平静的革命者）、勒内·莱维斯克（R. Levesque）和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P. E. Trudeau）。当时特鲁多还完全是个花花公子，老驾着一辆“美洲豹”兜风，如果我的记忆是准确的话。去加拿大之后，我又应哈佛大学的邀请办了三次讲座，讲座内容经过进一步阐释，形成了1958年第四共和国结束后出版的《不变的与可变的》。就在1957~1958年，我的公共课也是针对工业社会之政治制度的。10年之后出版的这门课的讲义，仍然保留着1958年事件的痕迹——我不愿抹掉它。其中一章的题目是“丝线与剑锋”，分别借用了古列尔莫·费雷罗和戴高乐将军的用语。

法制表面上被尊重，但是第四共和国向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军队的叛乱让步了，（至少可以说）戴高乐将军与这场叛乱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他本人在5月15日之前什么也没讲，但他没有否定他最忠实的伙伴的狂热宣传。

在《愤怒通讯》报上，米歇尔·德勃雷甚至宣扬一种反叛政府的权利，我说错了，是反叛政府的义务，只要这个政府

竟敢动摇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主权的话。一些戴高乐分子被怀疑参与了导致5月13日事件的13个阴谋中的某个阴谋，而其中的一个阴谋是针对萨朗将军的。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与戴高乐派于1958年分道扬镳。但是，我并不因此把戴高乐将军与他的追随者混为一谈，他本人是最不可能玷污自己的双手的，尽管他并非不知道某些阴谋者的动机和行动。评论家各有自己的爱憎，认为戴高乐将军挽救了一些议员，使他们没被人扔到窗外，或者说是他点燃了5月13日炸弹中的一枚。事实上，这两个角色，他都扮演了。

此外，一些流言传播着戴高乐将军的一些话，并且把他说是比较接近自由主义者，而不怎么接近极端分子。有人向我证实说，戴高乐将军在一次谈话中表示我反对苏斯戴尔是有道理的。不管怎么样，可以这样说，由于他的权威和威望，戴高乐将军比其他所有人都更有可能找到出路，或者让法国人忍受战事拖下去。从1957年到1958年，我努力去说服人们；从1958年开始，我被遣去充当一个旁观者或评论者的角色。我怎么还能够去参加那个保卫共和联盟的戴高乐派政党呢？这个联盟是由米歇尔·德勃雷和雅克·苏斯戴尔匆匆忙忙为了应付选举而搞起来的，目的在于为阿尔及利亚属于法国的主张辩解。但是，493反过来讲，当事情的发展趋势尚不清楚的时候，为什么采取反对的态度呢？每时每刻，不管官方的理论是什么，安德烈·马尔罗都毫不犹豫地投身去为将军服务。在我看来，一个自负为政治作家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政府首脑的一些把戏、手腕乃至阴谋诡计中去，这是不妥当的，哪怕这些手腕或许是必要的。既然我已经清楚地申明了我自己的理论，我就应当继续保持独立，真实地解析将军的生平足迹，而不用一些措辞去改变其本来面目。

第二本小册子《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没有引起多少争论，尽管这本书论据充足，但严谨度同《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相差很大。在第一章里，我用可靠的数据指出为什么一体化——让阿尔及利亚像巴黎大区和洛林那样变成法国的一个省——是不可能的。阿尔及利亚居民和法国居民文化不同，人口体制或经济体制也不一样，怎么能实行同一的社会法律呢？石油财富不足以填平地中海南北两岸在生活条件上的鸿沟。（20年以后，尽管石油价格上涨了19倍左右，我的看法还是符合实际的。）为此，在日尔曼·蒂利翁的《1957年的阿尔及利亚》发表后展开的一场奇怪的争论中，我表示了态；这本书比《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早发表几个星期。蒂埃里·莫勒尼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论的无条件支持者，他引用日尔曼·蒂利翁的话下结论说：“要么是法国，要么是饥荒。”他从人类学家的著作里汲取了作者本人尚未断言的东西。但蒂利翁毕竟说过这样一句话：“反殖民主义是否正在变成贫困化的遁词呢？”

我承认：

形式上的自由主义可以是利己主义的伪装。在阿尔及利亚这件事上，这两种解释都是可以的：建议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对话的人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引用人民自决权的信条，幻想与穆斯林友好。他也可能是一个资本家，只想少花钱，而对阿尔及利亚独立后的悲惨局面无动于衷（当然，一切左派人士都属于前一个高尚的阶层，一切右翼分子都属于第二个可鄙的阶层……）。那个慈悲无边的阿尔及利亚前总督，令人惊讶地与罗热·杜歇先生、德·赛利尼先生以及《阿尔及尔回声报》的其他编辑这批出类拔萃之辈心心

相印，那是完完全全出于对阿里和穆罕默德的爱，出于对卡比尔人和阿拉伯人的爱。如果说勒·勃伦·凯利斯先生和艾蒂安·包尔纳先生谴责我厚颜无耻，那么这是基督徒的情感迫使他们让阿尔及利亚人免于受民族解放阵线的祸患和暴政。

在题为“法国意识的危机”的第二章里，我试图说服我的同胞，帝国的丧失并不会使我们的国家走向衰亡：

失败主义，就是不再希望与民族主义者和解。放弃主义，就是拒绝与取得独立的国家合作。堵塞我们前途的难道不正是那种断言人民渴望自治与法国在非洲的使命不相容的人吗？衰亡的国家是那些拒绝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国家。祖国的掘墓人以预防衰亡为借口，把爱国主义引向绝路。

第三章题为“五月风暴”，简单叙述了对1958年5月事件的分析、戴高乐将军重掌政权以及第四共和国的失败。我顺便讨论了阿尔贝·加缪在一篇文章中<sup>①</sup>表述的观点：“除了他对公正的渴望和他的慷慨，阿尔贝·加缪的态度并没有超出一个好心的殖民主义者的水平。他拒绝阿拉伯人要求的合法性：不管怎样，人们应当承认，关于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纯粹是感情用事的语言。从来就没有过阿尔及利亚民族。犹太人、土耳其人、希腊人、意大利人、柏柏尔人本来都有权利要求领导这个潜在的民族。”我对此反驳说：“这些穆斯林在过去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人愿意建立这样一个民族。

---

<sup>①</sup> Reproduit dans *Actuelles III*, Gallimard, 1958.

这个要求是感情用事吗？当然，就像所有革命的要求一样。”阿尔贝·加缪推荐的措施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论者主张的措施是一样的，即“个人联邦制”（换句话说，就是穆斯林和法国人在民事上和政治上平等）。他希望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问题上一点儿也不让步”。他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要求从某些方面来讲是阿拉伯新帝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埃及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充当了这种新帝国主义的首领，而现在俄国正利用这种新帝国主义来达到自己反西方的战略目的。”

这些文章已经被遗忘了；而人们还记得他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声明，或者说还记得他回答一个记者的访问：“我信仰正义，但是在正义之前，我首先要保卫母亲。”<sup>①</sup>这句话从根本上来讲毫无意义。阿尔及利亚的反抗向所有法国人，特别是向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提出了一个良心问题。为什么阿尔贝·加缪在他对母亲的爱中找到了对这种意识问题的答案呢？我们明白，在对阿尔及利亚的眷恋、儿子的爱和正义的关切中，他的心被撕碎了，他拒绝在对立的两个阵营中表态。但是，把“母亲”和“正义”放在一起做比较，在我看来似乎是书生语言，而不是判断一个悲剧性的冲突。我丝毫不想攻击加缪应有的荣誉，我也不怀疑他高尚的灵魂和他的诚意。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年代的人来讲，仍然具有教育意义的是，为什么包括阿尔贝·加缪这样的人，当时都拒绝阿尔及利亚的所谓“民族主义”，拒绝由少数积极分子推动但可能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独立愿望。

关于戴高乐将军的制宪计划，我似乎没有搞错：

---

<sup>①</sup> 1982年《再作幻想》一书中，克洛德·布瓦依埃尔和雅克·布瓦依埃尔（Claude et Jacques Broyelle）夫妇重新引用了这句话来说明加缪采取的立场。

毫无疑问，戴高乐将军真诚地希望复兴共和国，即使是一个议会制的共和国……第五共和国的体制并非险些变成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妥协物，而是险些恢复到半议会式的君主制。内阁将对议会负责，但总理将由共和国总统选任，而总统本人却像君主那样，掌握着在我们这个世纪的议会制度下帝王自己都已丧失的一些特权。倒退或许并非完全没有益处。汲取巴约讲话精神的宪法，对法国的问题并没有给出持久性的答案，但它提供了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戴高乐将军可以行使他那绝对而又有限的权力……（“绝对而又有限”是莫拉斯的用语。）

496

尽管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我受到了冲击（5月15日，他从精神上保护了阿尔及尔的“叛乱者”），1958年7月，即五月革命几个星期之后，我仍然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的机会都多：“戴高乐将军比任何人都更拥有重建和平的手段，因为他既能够进行战争，又有宽宏大量的名声。”我没有把将军描写成五月事件中上校们或阴谋者的代表或首领，而是把他写成政治家，能使军队服从命令，或许他还能开始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对话：“极端分子和阴谋者所希望的，与历史的需要和绝大多数法国人的希望是背道而驰的。五月革命有可能成为法国政治革新的开端，条件是革命要赶快吃掉自己的孩子。”

在这个小册子之后，我定期给《论证》杂志写关于第五共和国，特别是关于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的文章。在1958年11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里，我引证了《自由法兰西》1943年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分析了波拿巴当时的处境：“国家处于危机之中，议会和议员们威信扫地，只有一个人拥有民心

和威望。”我并非没有认识到造成国家危机的不同原因之间的区别（1848年的社会冲突、1940年的军事失败、1958年帝国的丧失），也并非没有看到这些拥有民心的政治家的区别：“波拿巴处境的受益者，不管他叫路易-拿破仑、布朗热、贝当，还是叫戴高乐，也不管他是一个冒险家、一个意志薄弱者、一个老军人，还是一个真正的伟人，反正都要拿出自己的本领，超越法国的争吵，既当右派又当左派，把1789年以前的法国和1789年以后的法国联合起来。”

497 我重读了对1958年宪法的分析——可能与贝当元帅准备的宪法距离很远——没觉得太为难。乔治·维德尔在一封友好的信中祝贺我对局势和宪法所做的精彩分析，他对我做了颇有趣味的明确分析：

你想象的贝当宪法至少有可能存在过。在第7版杜居伊（Léon Duguit）和莫尼埃（Henry Monnier）宪法集中，你将找到原文（第386页）。你从第10页开始读：“国家元首的权力来自一个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聚集了全国的当选人和各属地的代表。代表大会体现国家并承担起它的命运。作为国家最高利益的仲裁人，他保证机构的运转，同时，在必要的时候行使解散议会的权力来保持政府与国家间的相互信任。”

乔治·维德尔补充说，元帅的这些流产的计划与戴高乐将军的观点碰巧一致，既不能表明赞成1958年宪法，也不能表明反对1958年宪法。

我对第四共和国及1958年形势的判断，今天仍然往往为



史学家们所引用：

对第四共和国的敌视就像 1940 年人们看到的对第三共和国的敌视一样。这种严厉态度虽然有时不太公平，但至少表露了一种健康的感情：法国人已经不再愿意因内阁不稳定而变成人们的笑柄了。不管这个不稳定状况的后果是什么，即使这些后果要比人们通常想的少，内阁的频繁危机还是使政权在法国人和外国人的眼里丧失了威信。从长久看，一个国家不能屈服于自己所蔑视的人。

相反，对这段时间外交方面的情况（大西洋联盟、与德国和解、欧洲组织）和超过了人们希望的经济状况（这种希望是解放时的乐观派所抱有的），我是持赞赏态度的。法国人是否指责第四共和国丧失了帝国，或者曾经想挽救它？法国人是否把帝国的丧失当作国家的灾难，或者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意义呢？“第四共和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碰壁，没法再打下去，既没本事打胜仗，又没本事用谈判来结束战争，只好另请高明。”

这时，我就把宪法看成一部议会制帝国的宪法——以后的事件并没有否定我的判断——而且在这篇文章里，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在系统地反戴高乐主义，但人们把这一点归功于我了，并且找出了很好的论据：“由于没有像英美那样，在民主体制中加入全民表决的因素，法国就在二流的无名议员和神明天授的领袖之间摇摆起来。戴高乐将军尤其是一个神明天授的领袖，但他的历史雄心则可与华盛顿相比拟。”1958 年秋天，雅克·谢瓦利埃的朋友鲍里斯·苏瓦林告诉我，戴高乐将军企图

通过法雷斯和安鲁士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但没有成功。

1959年5月，我又写了一篇关于政府经济政策的文章。当时，让纳内当着部长，递给我一张明信片：

我刚读了您在《论证》杂志上写的关于我们经济政策的文章。这是最好的、唯一恰当的文章。谢谢，谢谢您注明我不是一个“自由派”。

借新政体成立一周年之际，我又在《论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年之后，处于极端派和开明派之间的夏尔·戴高乐》。这篇文章仍然忠实于我自己的观点，以宽容的态度分析了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

那些认为承认阿尔及利亚自决权是正确的人，那些认为通过武力维持殖民统治与20世纪法国的使命背道而驰的人，完全没有理由否定自己。共和国总统目前只能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要赞成此前刚批判过的东西。否则就应当认错道歉，追悔对居伊·摩勒的批评。

至于我对将军本人的态度，用词必然比较微妙，甚至比较暧昧。我对内部移民的企图（比如孟戴斯-弗朗斯主张过的）感到悲哀：

第五共和国依然存在，在现在这样一个法国，戴高乐将军在一个尽可能不那么坏的制度中是一个最好的君主……他拥有个人权力，但他在1945年复兴了共和国。

他引导了1958年的革命，从中建立一个专制的但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或军事独裁的共和国。他想挽救法兰西帝国的其他属地，但是他把独立权交给了黑非洲。他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但并不排除一种演变。结论是：我们想帮助他，但是仍然相信，阿尔及利亚趋向独立的运动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在期待中姑且让他先干着吧。

以后《论证》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直到1962年4月20日写的最后一篇，都反映了我在判断上的犹豫不决，或者说我秉性上的摇摆不定。1959年秋天，在5月16日关于自治的讲话以后，我预见到——而且并没有弄错——民族解放阵线或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将拒绝停止战斗和参加竞选战。将军建议走一条介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和“放弃”之间的第三条路线，在这条路线的尽头，阿尔及利亚将紧密地与法国联系在一起，在法国的范围内自治。但是到底有没有这样一条中间道路呢？

1960年3月，在街垒战危机之后，我在一篇题为《唯一的人，孤独的人》的文章中表达了对将军的钦佩，也没有忘记提醒人们，宣布自决的原则不足以终止对立。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在政府没有明确执行原则的条件时，是不会把武器放置一旁的。没有与民族解放阵线或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达成协议，人们是不会从居伊·摩勒确定的那个著名的“停火、选举、谈判”三部曲中走出来的。与此同时，那篇赞扬《唯一的人，孤独的人》的文章，其题目便表明了 my 疑虑和担心：用一个历史推举出来的伟人正统去代替民主正统，是否妥当呢？“将军愈是强调他个人掌握的正统，他就愈削弱他自己建立起来的宪政……戴高乐将军几乎时时被拉去做那些他不想

做的事。他害怕叛乱，但他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就像一个反叛者。他害怕军事政变，但1958年他重掌政权时，就是借助了一个政权受到威胁而发动的军事政变。他热望联合所有法国人，但他从未做到，因为这种联合是与20年来要完成的种种任务的性质相违背的。”由此，他那通过各种离奇古怪的波折而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国家正统的抱负产生了。

1960年秋天，我的态度更加严厉。我写了一篇题为《自大》的文章，把戴高乐将军刚上台时的要求与两年后的形势做了比较：

如果人们把戴高乐将军当成这样一种人，他认为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国家的趋势不可避免，同时也符合世纪的精神，而且与维护法国利益相适应，那么他就是一个开明人士。但如果人们把他看成一个拒绝与战斗着的人进行讨论的人，那么他就是一个极端主义者。只有那些客气礼貌地要求独立的人，才有权获得独立。

这篇文章不够公正，是我在美国哈佛大学短暂停留时写的。乔治·弗里德曼（正确地）指责了我的语气：

在现实环境中，我看不到任何人能像戴高乐那样保卫自由的主旨，而这是你一生都在捍卫的东西。将军还有机会达到目的。好些人已经懂了，并且为之庆幸。所以我很惊讶，你仿佛以你的名义和威望，为那些活着就想毁他的人提供担保……由于了解你，我相信，如果你在法国，自从写了《自大》一文，你一定会改变你的论战目标。

在下一篇文章里，我引用了乔治·弗里德曼的信，并且解释说：“我从未怀疑过，在所有法国人中，戴高乐将军是最有能力为阿尔及利亚的肿瘤动手术的人。“唯一的人、孤独的人”保护着我们的自由，并在精神混乱和骚动之中居间调停。”将军在1960年11月的讲话，又跨出了一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将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之后到来。而且这个共和国将有一个独立的外交。”这样，将军就给予了阿尔及利亚一种与法兰西联合体其他成员国相似的地位，但是他在关键的一点上还是没有讲清：谁将负责阿尔及利亚共和国？

我的不安始终集中在一点上：

一切最终都归结到旁观者们两年来不厌其烦地提出的问题上：既然戴高乐将军作为历史哲学家，已经认识到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已经死了，独立的阿尔及利亚势在必行，可是，作为国家元首，戴高乐将军又将在多长时间里拒绝对话呢？如果拒绝对话，在他的战略与他的战术之间、在他所遇见的结果与他坚持的拒绝之间存在的悲剧式矛盾，还将持续多久呢？ 501

在剑桥写的文章的末尾，作为对弗里德曼的答复，我下结论说：

我们大概起不了多少作用，没什么事可做。我们赞成他，也许会连累他；批评他，也许会削弱他……我们大声疾呼：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戴高乐将军身上，我们对体面的和平最后所抱的希望——也就是说一种能使法国与阿尔

及利亚民族主义者言归于好的和平，能使法国人不至于因此而拿起武器自相残杀的和平——全然在于将军身上。这样的大声疾呼，也许不会全无好处。

在“一小撮”将军的阴谋和1961年4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之后，我不再怀疑国家首脑是否已经属于“放弃派”，已经决定在预先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基础上，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

在三年的犹豫和幻想之后，戴高乐将军只得委曲求全，并决定与民族解放阵线讨论阿尔及利亚的前途。这不仅违背了他自己多次许下的诺言，而且不考虑军队的情绪……如同以前人们讲的那样，难道这还不算“佛罗伦萨式”<sup>①</sup>的《君主论》吗？他派《愤怒通讯》报的社长当政府总理并负责接见布尔吉巴先生，难道还不算古人说的“佛罗伦萨式”权术吗？他把1958年5月15日“战斗部队的动乱”算在第四共和国的账上，而他自己却借重“兵变”做了“兵变”要做的事。这难道还不算“佛罗伦萨式”的统治术吗？

下文，我把自己摆在“受骗者”的位置上：

1960年1月宣布自决，1961年4月答应独立，5月13日的胜利者感到被愚弄了。戴高乐派从他们那里窃取了一场革

---

<sup>①</sup> 佛罗伦萨是《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的故乡。“佛罗萨式”权术即“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主张和风格。——译者注

命。如果为了反对第四共和国的放弃派有权暴动，如果像前任总理说的那样，当政府考虑放弃一部分国土时，服从的义务就终止了，那么为什么四个将军，而不是失败了的英雄将成为罪犯呢？我个人毫不怀疑他们那时是罪犯……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脾气又变了，因此用了一个不恰当的题目，叫作《别了，戴高乐主义》。我说话为什么那样咄咄逼人？比塞大港事件的插曲使我感到愤怒；也许我错把这件事的全部责任推给了法国政府，但是给予伊斯兰国家的一名首脑、法国的一个真挚的朋友这样一个血的教训，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残忍的，也是违背我们国家的利益的。同时，戴高乐将军通过单方面让步，逐渐让出冲突之焦点的战略，在我看来也是不合情理的。所以惹出了那些可能引起震动的但肯定是令人不快的俏皮挖苦话：“人们不能用路易十四的方式搞非殖民化……皮杜尔为了挽救法兰西帝国，会把战争进行到底。戴高乐将军进行战争是为了挽救放弃政策的脸面。”这时，我批评了整个戴高乐派的战略：“将军只是在一丝不苟地打完手里和口袋里所有的牌以后，才同意坐到谈判桌旁……这样，如果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要求得到撒哈拉，那又怎么办呢？”

民族解放阵线作为获胜者参加了谈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者或许在战场上打了败仗，但是他们赢得了战争，因为法国政府承认他们的要求是正义的，声明准备满足他们的要求并祝愿‘解脱’……”从1957年起，我就宣布这个结局是预料之中的：“如果民族解放军能够在阿尔及利亚拖住40万法国士兵，它就会给予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一个它所需要的‘军事胜利’。因为可以预见到，法国人民对这样一场战争终

究会厌倦，这场战争打得越长，越暴露出不公正和虚荣心。”

至于文章的最后几行，读到那尖刻辛辣的文字，我也感到不好意思，但是这几行文字不管怎样却是说得通的：“将军谈到了解脱，而不仅仅是非殖民化，他认为，完全放弃——即重新组织，然后遣返法国人和继续想当法国人的穆斯林——将是除了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达成协议外不可避免的解决办法。不管这个协议是否达成，显然，两三年前本来可以救得出的东西，一点儿也没有救出来。”今天，读者会反驳说：他难道能救出什么东西来吗？

后面那篇做结论的文章，我还是要签上名字，因为它可以说是对前几篇文章的自我批评。

503

在这个杂志里，凡是关注第五共和国专栏的人，都不会不知道我在判断上犹豫不决。在我看来，只有为了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才能同意父道主义的君主制在1958年宪法的幌子下被引进来。只有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进行谈判，才有了一个达到目的的机会。因为自决这句话的作用，仅仅是掩盖阿尔及利亚命运早已注定这件事，这是由法国政府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商定的。戴高乐的骄傲自大似乎关闭了谈判的道路，愤慨胜过了希望。希望是伴随着1961年1月的公民投票而重新产生的。去年夏天，在荒谬的比塞大港悲剧后，希望又让位给了愤怒。

如果一个人“确信解脱符合法国的利益和使命，并为了把非殖民化（他们自己人曾称之为弃守）进行到底而冒生命和荣誉之险”，我绝不计较应当给予他什么样的荣誉。但是，“‘佛罗伦萨式’权术在20世纪看来，同样是亏本的。指责活动家取得



胜利代价过高，这是容易的。而隐瞒阴谋诡计和表里不一的代价，那就更加容易了”。

采取中间立场的人，以公平合理自居。我照录了极端派和自由派的指责，既不接受也不反对它们中的任何一派。一方面，“是否必须把‘绥靖政策’拖三年半，才能实现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政治谈判呢？有没有必要为了撒哈拉问题而中断在埃维昂进行的初期谈判，然后突然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任何一届阿尔及利亚政府都不会放弃对沙漠和石油的主权？”另一方面，“如果已经决定不让他们信守誓言，为什么要走遍军官食堂？为什么要让这些军官向居民们庄严宣誓？从‘我理解你们’到1962年4月的公民投票，有位泰尔努瓦先生只看到一条笔直的没有迂回曲折的路线——天真无邪。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和军官从中看到了一系列丑恶的出尔反尔和厚颜无耻的阴谋诡计”。

我并不完全地简单地一笔勾销这些指责，理由非常简单，却是决定性的：这就是成功和现实。

当君主在他自己的罗网里挣扎的时候，批评家大有可为。可是一旦挣脱出罗网，君主便有了不可辩驳的理由：504  
道路虽然是漫长的，但毕竟把我引到了目的地。如果走了一条捷径，我会成功吗？马基雅维利信徒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去乞灵一种现实来对付敌人追念的各种可能性。内战、秘密军队组织的叛乱，如果这些事是结束法国人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战争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人们还有理由为此而责备政府吗？

不止一次，我向这个阵营或那个阵营的极端分子讲明了我

自己的观点：

无条件支持当局的人欢呼任何事件，即便这些事件取笑了他们昨天的誓言。对方只顾揭露戴高乐将军，哪怕事件的发展实现了他们昨天的希望。是不是戴高乐派或戴高乐的反对派，既不像前者，也不像后者？在引起 L. 泰尔努瓦先生、J. 苏斯戴尔先生和 M. 舒曼先生发火的《阿尔及利亚的悲剧》这本小册子里，我使用了“勇敢的放弃”这样的措辞……然而正是戴高乐将军把放弃的意愿搞成了英雄主义。省力的办法是推行“绥靖主义”，而法国的最高利益则是不要死赖在帝国的残余部分……戴高乐将军享有而且有理由继续享有历史功绩的美誉，因为他说服了他的国家：非殖民化意味着变化，而不是失败。这个事业并非他发起的，而且他那派人一直使这个事业处于瘫痪状态。但是他在阿尔及利亚终于完成了这个险些成为悲剧的事业。

《埃维昂协议》签字和法国人最终从阿尔及利亚匆匆撤走，至今已将近 20 年了。阿尔及利亚有 2000 万人，如果还需要的话，这证实了反对一体化的人是有道理的。碳氢化合物的价格猛涨，基本上改变了我在《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中使用的计算数据。如果法国保留着在撒哈拉的主权，就可以用法郎支付部分石油，或者通过售出它剩余的其他种类的碳氢化合物来补偿用外汇购买石油的花费。不管一些史学家或论战者写些什么，我反对殖民主义，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不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是出于人们不加区别地叫作道德的、政治的、历史的信念，或者说国家利益的信念。

我不知道，在两千年后，我们是否应当从道德上谴责罗马人征服凯尔特高卢人。至少，征服者应该经常想想孟德斯鸠的格言：“应当由征服者来对他做的一部分坏事做出补偿。这样我就给征服权下了如下的定义：这是一个必要的、合法的而又不幸的权利，它留下一笔永远需要补偿的巨额债务，用以偿还对人性所欠的债。”19世纪征服阿尔及利亚，需要至少20年时间，一些高明的人那时就认为这是时代的错误，注定要失败。在他们取得表面胜利一个多世纪后，当征服者要拿起武器使他们不稳定的统治永久化时，原来可能得到的好处就全部消失了。阿尔及利亚人尽管人种混杂（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缺乏像摩洛哥那样的国家传统，但照样有理由要求享有建立国家的权利，并肯定自己的本性。他们的要求符合思想的历史发展趋势和法国的真正利益：一体化政策是除了独立外的唯一选择，而人口和经济状况却使它成为不可能。

过去曾经批评过拙作《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的一些“自由派”今天友好地对我说：事件的发展证实你有理，但是难道在1957年，事情就像你断言的那样确定了吗？埃蒂安·伯尔纳曾写道（我向他提起他写过关于《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的一篇文章）：

关于阿尔及利亚事件——对此我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应当想想我是人民共和党一派，这一派祝愿并希望阿尔及利亚向开明的方向发展。我就不再谈论我在《人类的大地》一书中写的所有关于突尼斯和摩洛哥首先向内部自治演变……并反对殖民化的那些段落了。这或许是“第三势力”的幻想之一。对这种幻想的批判是极其严厉

的，而且并非没有一些强有力的理由。这并不仅仅是虔诚的祝愿。我加入了人民共和党执行委员会，1958年，这个委员会通过多数人拒绝给予皮杜尔以信任，并阻止他成立一个推行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论的内阁。等到普夫里姆林当上了总理，在阿尔萨斯的一家报纸上发表文章，提起“停火”，这就引起了兵变，搞垮了第四共和国。在我看来，那时候胜败尚未定局，你就做出完全独立的结论，你的立场就是没有站对，简单地说，没有站在中间派的立场上。根据某种现实主义的衡量，考虑实力与群众的比重，你肯定是有道理的，这正是我想用一句简短而恶毒的论战语言来形容的“典型的右派观点”。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结成联邦，在共同体内共存并合作的梦想，无疑是乌托邦。你头一个预见到这一点，为此我不得不向你认输……

让·达尼埃尔同样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说道：阿尔及利亚事件并非不可避免地要按它现在的样子发展。叛方领袖并不希望所有法国人大批逃离，他们激烈地争吵着；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考虑进行讨论，并不要求马上获得他们渴望的独立。至于我，对这些合乎人情的遗憾并不反对，我也不断言，在细节上，事件的发展一定不会是另一种情况。在与沙邦·戴尔马的谈话中，我也提到了在凡尔赛宫宣布的法国-马格里布邦联。1957年，我并没有建议立即独立并遣送法国人：我是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权辩护，因为这项权利，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不打算予以承认。

我不认为由于20年来有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大量重要文章被发表，我就需要修改上一代人的那些判断。现在，我们对民族解放阵线与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内部争执、一些领导人

秘密访问爱丽舍宫、内部游击队的没落等，有了更多的了解。自从法国军队停止保护人身安全，地下军组织和对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行凶加快了阿尔及利亚法国居民逃命般的离开——这是1955~1956年的决定所酿成的后果。1957年，我宣布，在数年战争后，国家终有一天将一无所得地罢手认输。事情就是这样；或许不能不这样。悲剧毫不留情地上演到底。可能是奉了戴高乐将军本人的命令，大部分本地保安队员被送给战胜者出气雪恨，而将军本人却用他的口才把失败说成胜利，把暴行遮盖得干干净净。

至于我，既不为发表两本小册子后悔，也不为1958年和1962年的两次表态内疚。就像1940~1944年那样，法国人再次互相指责，说对方叛变。绝大部分法国人当时都拥护政府的政策，奉行了动员令。赛尔旺-施莱贝尔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但仍应召去阿尔及利亚当中尉。其他一些法国人，如弗朗西斯·让松，在民族解放阵线里服役，或者确切地说，建立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秘密组织。121名知识分子，其中包括J.-P. 萨特，签署了一项声明鼓励法国青年改变主意。

121人声明发表时，我正在哈佛大学；顷刻间，一些美国教授干劲十足地去争取别人签名响应，并谴责对121人进行司法追究。几天内，我与几十个美国教授进行了讨论，并劝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要签署这篇声明：

让青年人改变观点，这对知识分子和J.-P. 萨特没有危险，但对那些听从他们劝告的人是危险的。我理解那些拒绝打阿尔及利亚的青年，但是我讨厌坐在长椅上的知识分子代替应征入伍的青年去提高觉悟。应当让青年自己选择，而我们应当随他们选择。如果你们，你们插手这场论战，就

将承担额外的责任：你们把法国人进一步推向内战，因为拒绝国家动员，就相当于取消国家公约。如果明天，我们法国人在你们政府发动一场我们认为不正义的战争时号召你们的青年人背弃正义，你们会怎么想，你们这些美国人？

我的论点打动了对话者。支持 121 人的提案被撤销了，或者说没有得到预计那么多的签名（对这一点我有点记不大清楚了）。

508      1960 年 10 月，当“提案战”打得火热时，我写了一篇关于卖国的文章，重新使用了我为安德烈·泰里夫的书所做的序言。这篇文章又一次成为反对内战的激烈辩词。论战首先针对弗朗西斯·让松建立的联络网。让松写了些什么呢？

我知道人们控告我们背叛。但我想：我们出卖了谁？出卖了什么？从法律上说，我们陷入了内战，因为阿尔及利亚人完全被正式看成了法国公民，所以我们没有出卖法国。实际上，国家共同体不复存在了。它的轴心在哪儿？它的主力线在哪儿？它的固定点在哪儿？……既然共和国总统本人——法国的救星——凭仗武力而掌了权，并且不实行他自己号召投票通过的宪法，充当篡窃的拥护者，那么，任何形式的公民责任感都不能使我承认还存在“合法行为”及共同的义务。

不用管第一条理由：阿尔及利亚战争从法律上说是一场内战，因为阿尔及利亚人在纸面上享有法国公民的资格。这样，让松是作为一个造反派而不是一个外国势力的代理人在采取行动（实际上，阿尔及利亚人不把这看成内战）。这里还有一个主要论点：逃

兵。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网仅仅承认并象征着共同体解体。1960年是不是就应当注意到这个共同体的瓦解，并从中得到结论呢？我的答复是：不是。“我和另外一些人，不支持第四共和国最后几届政府，也不支持第五共和国政府。然而，如果说有人愿意同那些主张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在一起，或支持他们，那么我既没有感到应当，也没有想去同民族解放阵线一起战斗，或为它战斗。”

对各种极权制和民主制做一番比较，就能弄清楚当时的良心问题。“极权国家把反对派拒于共同体之外，把反对派当成叛逆，所以反对派就认为自己已经解除了对国家担负的一切义务。”在民主制国家则不一样：公民宣誓服从多数派法则，这是政治誓言而不是向国家宣誓，所以必须有不可抗拒的理由，才敢食言。

509

我发表异乎寻常的观点，甚至认为，1940年6月的法国的分裂还不及这一次厉害。当时，维希政府还是半自治的，它认为暂时的中立符合法国利益，而戴高乐派起来反对它，不是用一个法国反对另一个法国，而是用一种政策反对另一种政策。这对我来说——一直到1942年11月——象征着贝当元帅和戴高乐将军两块招牌之间的冲突：“那时和现在，我都相信，人民如此富于派性，所以法国人民只有一个机会来挽救自己的团结并继续生存下去。这就是不懈努力，克服自己身上的恶魔，克服各党各派唯我爱国、唯我算国家化身的那种野心。”

我列举了许多理由，认为在1961年公民并没有不可辩驳的道理取消国民公约：基本上，个人和政治的自由依然存在；政府并非不知道人民的意愿；当然战争在我看来是不公正的，而不是公正的，但在阿尔及利亚的少数法国人不应被遗忘。尊重少数也是民主制的传统。人们不能机械地、不顾环境地实施自决权：“一个右派人物声明支持与民族解放阵线谈判，并支

持向独立推进，有助于激起双方妥协的愿望。没有妥协精神，一场无休止的战祸、一次悲剧式的分裂就无法挽回。那些参加民族解放阵线的法国人是否也能产生这样的影响？”

我并不掩饰这场论战的含糊不清之处：“人们是不会同外国民族主义者一起战斗的，即使人们认为他们的事业比自己国家的事业更合乎正义。相反，人们会说：消极地不赞成一种人们认为不正义的政策是不是够了呢？”这篇文章使我得到了梅洛-庞蒂先生的一封赞许信，他写了另一个提议，反对121人的提议，我签了字。在巴黎大学，在秘密军队组织的凶杀手段  
510 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在一次院长出席的全体教师会上，我主张超越那个并不威胁民主制的危机，共同维护国家统一（我没有把秘密军队组织看得了不起，因为法国民众都不要它）。

在1958年5月13日以后的日子里，许多演说家在阿尔及利亚绝不忘掉提我的名字来惹起愤怒，甚至激起仇恨的叫喊。1960年，我的同姓人罗伯特·阿隆认定我是属于那些由于缺乏对法国的信任而想放弃阿尔及利亚的人。在有关“五月风暴”的一系列文章里，一个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生把我的小册子列入冒犯众怒、“令人可耻”的书的单子里，不过从那以后我与他的关系还是挺友好的。

从各方面投来的漫骂侮辱信件都是匿名的，它们几乎不能触动我。1960年代末期，我好几次碰到一个从阿尔及利亚逃回来的夫人。最后，她相信了我，坦率地对我讲：“当您发表《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时，我们多么讨厌您；今天，我们想，那时我们怎么会那样盲目。实际上，只有您才关心我们。您对我们说，等到法国放弃阿尔及利亚的时候，它将没有钱给你们，这些钱都让徒劳无益的战争花掉了。”



一方面，阿隆追述了20世纪法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细致地描绘了各种行为人的主  
活的周边环境都写了进去肖  
有触及。另一方面，他把到  
书中，每篇著作的核心内容，他用几页提要加以说明。阿隆还补充了对其评论的各种反应，收入了他曾收到的赞同或反对他的信件，以及他自己写的回顾性评论。从某种程度上讲，《雷蒙·阿隆回忆录》归纳了他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著述。

——茨维坦·托多洛夫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资助出版



甲骨文官方微信



定价：168.00 元（上、下）